

知識的價值，除了以學術標準衡量，也以實際對社會的貢獻
大小，以及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來評定。

◎ 新書上市

所謂的知識分子

Intellectuals

保羅·約翰遜 (Paul Johnson) 著 楊正茂等 譯



2007年11月出版 400頁 · 32.00元 卜大中 推薦序
趙少康、顏福慶、林添枝 特別推薦

作者簡介

保羅·約翰遜 (Paul Johnson)

1928年生，牛津大學麥格德林學院畢業。英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者，美國《時代雜誌》票選2000年100大人物。上尉軍階退伍之後，在巴黎擔任《真相》月刊 (Realités) 助理編輯。1955至1970年間任職英國《新政治家》雜誌。

他曾為全球最著名的報紙及雜誌寫稿，到過五大洲採訪新聞，替報社及電視專訪過各國總統及總理，也在大學與企業開班授課。閒暇期間，喜歡畫畫及爬山。

著作等身，包括《猶太人史》、《當代》、《英國人民史》等，其中最著名、爭議也最多的就是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

譯者簡介

楊正潤

南京大學教授，翻譯第2、11、12、13章。

施敏、孟冰純、趙育春

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分別翻譯第1、6、8章，第7、9、10章及第4、5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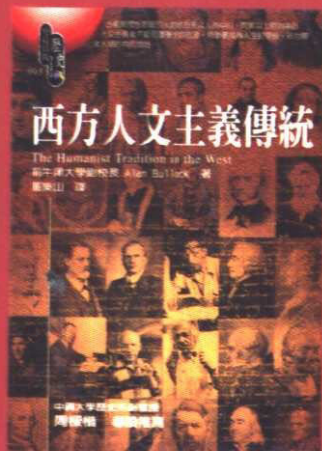
林志懋

台大哲學系畢業，翻譯第3章。

西方人文主義傳統

亞倫·布洛克 著◎董樂山 譯◎定價：330 元

- ★ 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周樑楷 導讀推薦
- ★ 台大、中興大學歷史系及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暑期中學教師進修班 推薦用書
- ★ 中央日報精選好書



「人文主義」是西方文明發展最重要的基調，但定義莫衷一是，究竟真相如何？又該如何解讀？

人文主義者重在使哲學成為人生的學校，致力解決人類的共同問題。本書為影響廣泛的西方文明尋找貼切的歷史解釋，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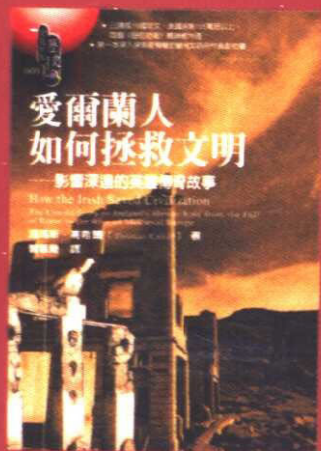
本精闢詳盡的入門書。作者的目的不在為專家而作，而是為那些有心了解歷史的過去，以及將眼界放在未來的讀者而寫。

愛爾蘭人如何拯救文明

——影響深遠的英雄傳奇故事

湯瑪斯·高希爾 著◎曾蕙蘭 譯◎定價：260 元

- ★ 已譯成 16 國語文，風行全球，雄踞《紐約時報》
暢銷榜 78 週，全美銷售 115 萬冊以上
- ★ 誠品選書



這是第一本深入探索愛爾蘭對歐洲文明所作貢獻的書。當羅馬帝國衰亡，這批愛爾蘭人不只保住了拉丁文學的命脈，也開創了方言文學的先河。當伊斯蘭世界開始在中古時期擴大版圖時，沒有愛爾蘭人的貢獻，西方基督文明

恐怕無力阻擋伊斯蘭文明的入侵。這些愛爾蘭人在客居的海灣和山谷中重建了文明，為枯槁的歐洲文化注入了新生命，使往後的歐洲文明得以傳播開來。

歷史 Historia 011

所謂的知識分子

作者／保羅·約翰遜 (Paul Johnson)

譯者／楊正潤、施敏、孟冰純、趙育春、林志戀

發行人／簡志忠

資深主編／林秀禎

主編／黃曉勝

出版者／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

電話／(02) 2570-3939

傳真／(02) 2570-3636

郵撥帳號／19423061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黃曉勝

美術編輯／王祥樺

校對／譚寶璇

排版／莊寶鈴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印刷／祥峯印刷廠

2002年3月初版

2002年4月3刷

Intellectuals

Copyright © 1988 by Paul Johnson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2 by The Eurasian Publishing Group (imprint:
Athena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 450 元 特價 199 元

ISBN 957-607-764-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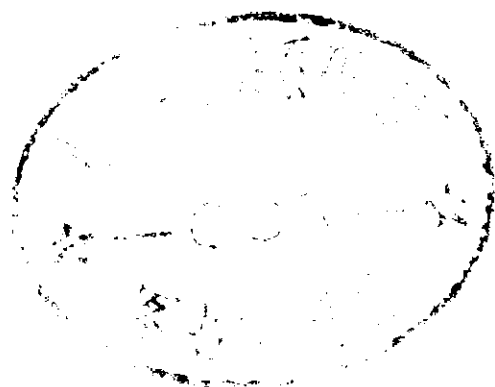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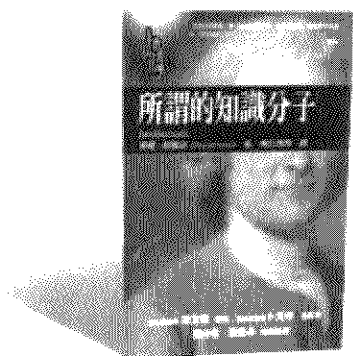
所謂的知識分子

Intellectuals

保羅·約翰遜 (Paul Johnson) 著

楊正潤等 譯





C · O · N · T · E · N · T · S

7	6	5	4	3	2	1	導	推薦序：
布萊希特	海明威	托爾斯泰	易卜生	馬克思	雪萊	盧梭	讀：	知識分子的道德貧困
——刻意雕琢形象的冷血作家	——帶著威士忌的大師與騙子	——自認是上帝兄長的沒落貴族	——把勛章當珠寶戴的劇作家	——披上科學外衣的詩人革命家	——沉醉在性愛派對中的浪漫詩人	——無時不在枷鎖中的瘋子	從污名化裡找回利齒	卜大中
263	211	165	129	087	053	015	南方朔	005

August 7/05



C · O · N · T · E · N · T · S

13	12	11	10	9	8
理性的逃亡	海爾曼——除了謊言還是謊言的好萊塢編劇	高蘭茨——被良心折磨的出版家	威爾森——因為懺悔所以可貴	沙特——專研女生內衣的哲學老師	羅素——最愛惡作劇的哲學家
4 4 3	4 1 9	3 9 3	3 7 1	3 3 5	2 9 5

知識分子的道德貧困

政治評論家 卜大中

看過法哲阿弘 (Raymond Aron) 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痛責冷戰時代美蘇兩國知識分子「陷溺在一種跟國家合一的制度裡」、所謂「擬似的同一性」；再看薩依德在《知識分子論》一書揭槩「從事批評和維持批判立場是知識分子生命的重大面向」，並要求知識分子具備「雙重視角」；又看傅柯強調知識分子必須站在主體位置獨立思考之後；再讀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會不由得有如五雷轟頂。原來，正是這些大知識分子們根據他們自以為是的獨立思考的結論，給周圍甚至世界不少人們造成苦難。更糟的是，原來這麼多頂著歷史光環的聖賢智者，人格竟是如此卑劣下作。

保羅·約翰遜引經據典地解剖了那些吾人心中的完人和大哲，包括盧梭、雪萊、馬克思、易卜生、托爾斯泰、海明威、羅素、沙特、喬姆斯基等人，發現他們虛偽、虛榮、傲慢、自私、易怒、貪婪、吝嗇、刻薄、粗暴、好色、偏執、頑固、說謊、自我中心、極度自戀、忘恩負義、言行不一、表裡不一、雙重標準、自欺欺人……幾乎人類所有的惡行劣跡全在他們身上出現。可是他們卻宣稱自己愛人類，宣稱他們要改造人類社會、造就幸福的烏托邦……。

本書作者用五項標準檢驗這些知識分子：道德、對周圍親友的態度、對自己理念實踐的行動力、表裡一致的誠實，以及他認為最「關鍵」的問題——知識分子對暴力的態度。

結果，那些大哲沒一個考試及格。公、私德部分一場糊塗已不必多說，對自己父母、兄弟、姐妹、朋友、隨從、情人、傭人不只是冷漠刻薄，簡直是冷酷冷血。至於對自己理念的實踐，不是做不到甚至反其道而行，就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偏執到底以致生靈受害而不顧。而表裡是否一致、是否誠信，就更是不堪聞問。最「關鍵」的暴力問題更令人失望，大師們個個口口聲聲和平博愛，卻爲了實現自己的理念，無視於或甚至縱容鼓動暴力。馬克思不必說了；沙特、羅素、高蘭茨、海爾曼、喬姆斯基，都先後一度美化或合理化希特勒、史達林、波布的大屠殺，而後來令他們狼狽尷尬，名譽掃地應算是現世報。這讓我想到台灣一些所謂知識分子的大師、名嘴、名流者，爲了實現中國統一的抽象理念，竟硬要合理化連中共都羞於強辯的七千萬中國人非自然死亡——包括天安門屠殺——的史實。

中國儒家講究士大夫要內聖外王、言行合一，但大儒朱熹卻刑求官妓嚴幼芳以公報私仇，又迷信風水挖了別人的墓來葬母，而且不讓母親生前吃到好米，自己還娶兩個尼姑爲妾。此外，陸游、海瑞、米芾這些「士」也都有不少惡行劣跡。可見古今中外的知識分子都有相同的「道德貧困」。

在這本饒富趣味的書中指出，每個被作者點名的知識分子都在言行上背叛自己。「他們在自己所欲攀附之權貴人士的圈子裡通常毫無批判能力，只是一味附和。因此他們非常危險……我們必須牢記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在第一位。」

試圖以抽象概念改造社會和高道德標準的吃人禮教，已造成人們大量的苦難，因此檢驗知識分子是不是謀殺犯變得非常重要。作者雖是保守主義者，卻用功至勤地搜集大量資料讓這些知識分子「現出原形」。本書的貢獻即在對知識分子「除魅」，並使凡夫俗子清醒，不再跟著「吹笛人」走向毀滅。知識分子云乎哉，必須施予嚴厲的監督檢驗才行。

從污名化裡找回利齒

文化評論家 南方朔

有些書，如果沒有先看導讀，就最好不要讀下去。對這樣的書，導讀是「批判式閱讀」和「創造式閱讀」的先決條件。

由英國保守派機關刊物《新政治家》主編、知名歷史家保羅·約翰遜所寫的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即是這樣的一本著作。在他的筆下，曾對現代文明有過巨大貢獻的十餘位傑出知識分子，他們的思想與事功都被完全略而不提，而卻徹底著墨於他們的生活。於是，這些思想人物一個個都成了貪財、愛名、寡情、自私、性關係錯亂的卑瑣角色。在他似真還假、但無疑花了許多功夫搜尋資料的著作裡，「知識分子」這個稱號已遭受到嚴重的「污名化」攻擊。面對這本十分八卦、但也不得不承認非常好看的著作，思慮周密的人就會追究下去；這本著作之立意何在？它的時代背景是什麼？而它又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當我們有了這樣的疑問，就已走出了「批判式閱讀」的第一步。

而研究英美近代「反知識分子論」(Anti-intellectualism)的人都知道，這本著作並非孤立的出

版事件，它乃是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出現的有關「知識分子」角色論爭裡重要的一環。

眾所周知，具有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狹義而言，乃以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發生於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 為其濫觴。一整代的法國知識分子聯合起來為公平正義而與當朝者相抗衡。但就廣義而言，「知識分子」的歷史當然沒有這麼短暫。從啟蒙時代以降，「知識分子」就以普遍化的良心與理性代行人身分出現。他們以願景勾勒未來，推動時代前行。而在英國，過去兩百年裡，「進步知識分子」和「保守知識分子」間即一直處於一種長期的緊張狀態中。由於英國「進步知識分子」始終以工黨和工黨的周邊組織為基地，進步與保守間的攻伐，使得「保守知識分子」在戰術上出現了一種獨特的傳統，那就是以犬儒式的態度，對「知識分子」的生活行為展開抨擊。這種情況在第二次大戰後始終未曾間斷。

而據兩名英國學者詹寧斯 (Jeremy Jennings) 和坎普—威奇 (Anthony Kemp-Welch) 所編的近著《政治中的知識分子：從德雷福斯事件到盧布迪》一書所述，這種情況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出了一個引爆點，那就是從七〇年代後期開始掌權的保守黨柴契爾夫人，由於「進步知識分子」不滿她的種種作為，一九八五年牛津大學在教授們投票後，決定取消原擬頒授給她的榮譽學位。這是重大的導火線，加上其他問題，親保守黨的倫敦經濟學院、劍橋和牛津教授，以及保守派刊物如《旁觀者週刊》和《週日電訊報》、《新政治家》等，遂開始了攻擊。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於一九八八年出版，即是這場論爭的產物。除了這本著作外，牛津的保守教授凱瑞 (John Carey) 於一九九二年出版《知識分子與群眾》，對蕭伯納、威爾斯 (H. G. Wells)、維琴尼亞·吳爾夫 (Virginia

Woolf)、勞倫斯 (D. H. Lawrence)、福斯特 (E. M. Foster) 等展開抨擊，也是保守派這方的力作。一九九二年英國親自由派的 BBC，特邀後殖民先驅薩依德 (Edward Said) 至倫敦，做了一系列專談「知識分子」角色的演講，即是「進步知識分子」這邊的主要回應。由這樣的脈絡，這本《所謂的知識分子》為何要如此寫，意義就很清楚了。

而可能更值得注意的，乃是英美一體。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引發的這場論爭，勢不可避免地延燒到美國，加上一九八九年東歐及蘇聯瓦解，對整個西方的知識界造成極大的衝擊，這些因素的相互激盪，遂使得這場有關「知識分子」角色的論爭，一直在持續中，縱使到了現在，也仍然未曾停止。後續的發展甚至已超越了狹義的「知識分子」角色這個課題，而更深入到檢討當代思想趨勢這個新的方向。

在當代有關「知識分子」角色這場論爭裡，現任洛杉磯加州大學教授的雅可比 (Russell Jacoby) 乃是不容忽視的總論型人物，他先後有過《最後的知識分子們》及《烏托邦的終結》等著作。在這些著作裡他指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教育體系擴張，原本散在民間以先民立命的「知識分子」，即開始被體制所收編。「良心知識分子」開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識分子」則在專業化的名目下，成爲新的主流。他們不再對政治或社會的任何事務提出不同的願景，而只會從事各種瑣碎小事的思考與鑽研。其甚者，乃是在學院也日益模擬企業的情況下，大家忙著找題目領補助，忙著旅行演講和上電視做秀。這種情況就像是法國著名「反叛知識分子」德勃艾 (Regis Debray) 所說的，從一九六〇年代後，「知識分子」已越來越和「名流」同義。而這種情況隨著東歐及蘇聯的瓦

解，已變得更為嚴重。因為就保守派而言，東歐及蘇聯的瓦解，所肯定的乃是資本主義現狀的優越性。既然優越，任何對它所做的批判遂彷彿都變得失去了正當性。九〇年代之後，西方主要「知識分子」皆大幅退卻，有些重要思想人物如英國的柯亨（G. A. Cohen）在哈佛所出的近著《如果你是平等主義，你的如此富裕由何而來？》裡，甚至無力地將不平等問題的解決訴諸於宗教情懷。這都充分地顯示出，由於東歐及蘇聯瓦解，「社會主義」已被污名化，在「進步知識分子」這一邊，已出現嚴重的「政治枯竭」（Political Exhaustion）。在當代重量級人物裡，著名的羅蒂（Richard Rorty）更明白自承：「我不認為我們能像祖父輩那一代一樣，替人的尊嚴、自由和平等未來問題有所感覺。我們沒有能力從現實走到理論上可能的未來。」在這個「政治枯竭」也不再願景的時代，已有人指出一個嚴酷的問題，那就是如果現在出現越戰一樣的戰爭，是否還會和以前一樣出現反戰運動？

這也就是薩依德所謂的：當代「知識分子」已被「拔掉了批判的牙齒」（Defanged）。而除了不再有願景、怯於批判，使得「知識分子」淪為體制裡「製造同意」的合謀者之外，當代新的思想在這樣的變化裡，也淪為蓋爾納（Ernest Gellner）所謂的「誇張式的瑣碎」（Conspicuous Triviality），或休斯（H. Stuart Hughes）所謂的「矯揉做作的反叛」（Sophisticated Rebel）。當代思想已不再談論實在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等方面之不公不義，但卻對虛擬的文化、語言文本等異常耽溺，思想問題則變成了文化或文本問題，而願景與行動則毫無生存的空間。當代思想只在瑣碎地方賣弄小聰明，但對世界上日增的強凌弱、富暴窮等現象無動於衷，難怪雅可比教授要感慨地說，

這是一種「零售清醒，批發瘋狂」了！

人類的歷史現在已走到了一個新的「默然苟存的時代」(Era of Acquiescence)的階段。「知識分子」已在時代的變化裡被收編、被污名化、被自我放棄。他們看得到文本的細節，看不見滔滔濁世裡越來越多的野蠻與不平。法國當代保守派「知識分子」領袖列維(Bernard-Henry Lévy)諷刺的寫下如此墓誌銘：「知識分子、雄性名詞、社會及文化範疇，在德雷福斯事件時興起於巴黎，二十世紀末死於巴黎。」

二十世紀初，德國思想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主張「知識分子」應獨立飄浮，替世界代言。他說過，只有獨立知識分子的存在，始可能勾勒願景，讓人類歷史走向更好的未來，而不只是隨著盲目的力量而浮沉。因此，「知識分子」是有用的。過去，「知識分子」可能太過專擅，因而會造成極端的烏托邦；但今日，卻走到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冷漠、無能，甚或瀕臨絕種。這兩個極端都不對，已必須重找新的良心基礎、新的願景、新的分析方法，以及新的實踐動力。而無論如何，最重要的，乃是要找回它業已失去的批判利齒。

這篇導讀，希望對讀者諸君閱讀本書能有幫助。

1 盧梭——無時不在枷鎖中的瘋子

將天火帶到人間

過去兩百多年，知識分子的影響力穩步增長。在現代社會形成的進程中，世俗知識分子地位的上升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回顧漫長的歷史，在許多領域內，這都是一個新的現象。誠然，「知識分子」開始是指教士、書記員，還有占卜者。從那時起，他們就宣稱自己在指導著社會。但不管怎樣，他們都是宗教文化的衛道士，所以無論他們是天真質樸，還是老於世故，他們對於道德及意識形態方面的革新，都必然受制於外界權威確定的準則和既定的傳統。他們不是也不可能具有自由的精神而成爲思想的探險家。

隨著教權的沒落，十八世紀出現了一類新型的導師來填補空缺，引起了社會的注意。這些世俗的知識分子可能是自然神論者、懷疑論者或無神論者。他們像任何一位主教或長老一樣，隨時準備告訴人類如何處理各種事務。從一開始，他們就宣稱要致力爲人類謀利，有責任宣講福音，通過他

們的教誨引導人類前進。對這一自封的任務，他們比神職前輩們表現出更激進的態度。他們認為自己與那些自稱得到神示的宗教毫無瓜葛。對於過去集體創造的智慧結晶、傳統的遺產，以及先輩經驗形成的既定法規，選擇信從或全盤否定都取決於他們自認為良好的感覺。伴隨著不斷增長的自信和勇氣，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人宣稱，他們可以診斷社會的弊病，而且能用獨立的智慧來加以治療：他們不僅能夠設想出社會結構的模式，並且可以把人類的基本習俗改造得更好。與神職前輩不同，他們不再是諸神的僕人和闡釋者，而是神的取代者。他們的英雄是普羅米修斯，是他盜取了天火帶到人間。

這批新的世俗知識分子的最鮮明特徵之一，是他們的一種愛好：對宗教及其主要人物進行批判性的考察。這些偉大的信仰體系，在多大程度上有益或有害於人性？在多大程度上，這些教皇和牧師實踐了他們關於純潔和真理、博愛和仁慈的戒律？無論是對教會還是教士，他們的評價都是尖刻的。到現在，兩百多年過去了，期間宗教的影響繼續衰落，世俗的知識分子在我們觀念和制度的形成方面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現在是考察他們檔案的時候了，不僅是公開的檔案，也包括私生活。我特別看重這類證據：知識分子告訴人們該如何行事時的道德和判斷力的可信程度。他們在生活中如何管理自己？他們對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同伴有幾分忠誠？他們在處理性和錢的問題時，是否公正？他們所說的、所寫的都是真實的嗎？他們自己的體系是如何面對時間和實踐的考驗？

讓我們從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一七一二—一七八）開始探究吧。他是現代知識分子的第一人，是他們的原型，在許多方面是他們中最有影響力的。比他年長的人物如伏爾泰，已經著手

摧毀祭壇和爲理性加冕。盧梭卻第一個結合了所有現代普羅米修斯的顯著特點：宣稱他有權全盤拒絕現存秩序，有信心以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所構想的原理徹底重建新秩序，相信這可以通過政治程序來實現。還有，不可忽略的是，他認識到本能、直覺和衝動在人類行爲方面的巨大作用。他相信他對人類有一種無與倫比的愛，並富有卓越的天分和領悟力來增加人類的福祉。在盧梭自己的時代及之後的歲月裡，無數人根據他對自己的評價去認識他。

無論從長遠還是短期來看，他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在他去世後的那一代人中，他的影響力達到了神話般的地步。雖然他死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前的十年，可是許多同代人認爲，這場革命以至歐洲舊秩序的推翻，都應歸結於他，路易十四和拿破崙也持有這樣的觀點。柏克（Edmund Burke，譯註：英國輝格黨政論家，法國大革命的反對者）談到大革命中的傑出人物時說：「他們的領袖之間激烈的爭論著，他們之中到底誰與盧梭最相似？……盧梭便是他們標準的完美人物。」正如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所說的：「盧梭透過高尚的靈魂和高貴的人格表現他身爲人類導師的價值。」在大革命期間，國民議會投票決定把盧梭的遺骸遷葬於先賢祠。在儀式上，主持者宣稱：「我們在道德、風俗、法律、情感和習慣方面有益於健康的改善，應歸功於盧梭。」

然而，在更深的層次上，在一段更長的時間中，盧梭改變了文明人的一些基本看法，更換了人類思想的內容，盧梭的影響戲劇性地延續了很長時間，我們可以歸納爲五個主要層面。

首先，我們所有的現代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盧梭學說的影響，尤其是他的作品《愛彌兒》。他推廣並在一定程度上開創了對自然的崇拜和對野外生活的興趣，對清新、自然、富有生機和

天然而生的事物的探索。他開始了對城市生活的腐敗的批判，他對文明進行了鑒定，對其虛假打上烙印。他首倡冷水浴、規律性鍛鍊、塑造個性的體育運動與週末的郊居活動。

其次，和他對自然重新評價相關的是，盧梭教導人們對功利主義者文化的緩慢進展所導致的逐漸累進的變革表示懷疑，就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拒絕啓蒙主義，儘管他也是其中一分子，他尋找更加激進的解決方式。他堅持認為，作為治療社會弊端方法的「理性」，本身就存在嚴重的局限性。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人類的心靈不能適應必要的變化，因為它是被隱藏的、未被發掘的詩意的洞察力和直覺的資源，必須用它來裁決理性否定一切的指令。循著這種思想線索，盧梭寫下了《懺悔錄》，這部作品完成於一七七〇年，但在他去世後才出版。

第三，盧梭為浪漫主義運動和後世的自省文學開了個頭，他把文藝復興的主要成就——人的發現，進一步領入一個巨大的舞台。他深入自我的內部，並把它表現出來讓公眾檢查。這是第一次向讀者展現心靈的內部，也是現代文學的一個特色，儘管他的描述具有欺騙性，被展示的這顆心帶有誤導性，表面坦率，內裡卻充滿狡詐。

盧梭所推行的第四個觀念，在某些方面是他所有觀念中影響最深遠的。他認為社會從自然原始狀態演化到複雜的城市，人類腐化了：天生的自私（盧梭稱之為 *amour de soi*，即自愛）轉變成傷害性要大得多的本能，他稱之為 *amour-propre*（即虛榮），其中包含自負和自尊，每個人都用別人對自己的看法評價自己，因而企圖讓別人對他的金錢、力量、智慧和優良的品德留下深刻的印象。天生的自私心變得好勝和貪婪，於是疏遠他人，把別人視為對手而不是兄弟，從而使別人與自己疏遠

(譯註：或譯為「異化」)。疏遠導致了人們的心理病態，其特徵是表相和真相之間悲劇性的分離。

正如盧梭所看到的，競爭的罪惡摧毀了人類與生俱來的公有觀念，並激發了人類所有最邪惡的品質，包括剝削他人的欲望。因此，盧梭不信任私有財產，他把私有財產當成社會犯罪的根源。他的第五項革新，是在工業革命前夕，發展了批評資本主義的成分。在劇本《納爾西斯》的序言及《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的論文中，他都把財產和競爭當成疏遠的首要原因。這是一個思想的礦床，馬克思和其他人都在此開採，其中包括了盧梭的文化進化思想。對盧梭而言，「自然」是指「原始」或前文化。所有的文化都帶來問題，因為文化是人與他人的連繫，導致了惡的傾向：《愛彌兒》中指出「人的呼吸對他的同伴來說就是致命的」。因此，人們生活於其中的文化，其本身是一個發展的、人造的結構，它支配著人的行為，能夠通過改變其文化和競爭的力量，來改善、更確切地說是徹底改造人的行為——就是說，憑藉社會工程。

這些觀點涵蓋內容之廣泛，幾乎自身就可以組成一部現代思想百科全書。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思想都發源於盧梭，他的閱讀面很廣：笛卡兒、拉伯雷 (Rabelais)、田斯卡 (Pascal)、萊布尼茲、培爾 (Bayle)、封坦奈爾 (Fontenelle)、高乃依 (Corneille)、佩脫拉克、塔索 (Tasso) 等人，他特別專注於洛克和蒙田。斯塔爾夫人 (Germaine de Staël) 相信盧梭擁有「人所蒙賜的最卓絕的才能」，她說：「他什麼都沒有發明。」但又接著說：「他把一切都注入激情的火焰。」盧梭的文風簡潔、直率、強勁有力，更確切地說是熱情洋溢，這使得他的觀點顯得如此生動、清新，使男男女女在震驚中得到啓示。

天生的作家

那麼，這位具有非凡道德和智慧力量的藥劑師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他又是如何得到這一切的呢？盧梭是瑞士人，一七二二年生於日內瓦，成長於喀爾文派教徒家庭。他的父親以撒是鐘表匠，生意不好，愛招惹是非，常常捲入打鬥衝突；母親貝爾納出身富裕之家，生下盧梭後不久死於產褥熱。父母雙方都不是出身於那些連繫緊密的家族（這些家族形成了日內瓦的寡頭政治，並組成了「二百人議會」和「二十五人核心議會」），但是盧梭父母兩家都享有完全的表決權和合法的特權，盧梭也一向很清楚自己優越的身分。從權益出發（而不是通過智力），他天生就是保守主義者，終身鄙視沒有表決權的民眾。此外，這個家庭經濟上也很殷實。

盧梭沒有姐妹，只有一個年長他七歲的哥哥。因為盧梭的容貌和母親非常相似，所以鰥居的父親對他很寵愛。然而，以撒對待兒子的態度總在含淚的關愛與暴力威脅之間搖擺，以致受寵愛的盧梭後來在《愛彌兒》中，對父親的這種教養方式有所指責。「那些充滿野心、貪婪，而又專制、偏執的父親，對自己的孩子漠不關心，畜牲般地麻木不仁，這對孩子所造成的傷害，超過母親盲目的溺愛一百倍。」盧梭的哥哥正是其父野蠻行爲的主要受害者。一七一八年，盧梭的哥哥被送往管教所，這是父親的要求，因為父親認爲他的邪惡已無可救藥。一七二三年，盧梭的哥哥逃跑了，從此再也沒有露面。盧梭便成了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這種處境與不少現代知識分子相似。儘管在許多

方面他備受溺愛，可是從童年開始，他就表現出強烈的被剝奪感——也許是他最明顯的個性特徵——自憐。

死亡又很快使他失去了父親和養母。他不喜歡做雕刻匠的學徒，於是在一七二八年十六歲時逃走，改信天主教，目的是爲了得到住在安錫（Anancy）的華倫夫人（Madame Françoise-Louise de Warens）的庇護。盧梭早年經歷的細節在他的《懺悔錄》中有記載，但並不可信，有關他自己的信件和大量的原始資料已經被用來確定明顯的事實。華倫夫人享受著法國皇室爲其提供的年金，似乎同時爲法國政府和羅馬天主教會做代理人。盧梭在華倫夫人家中靠她養活，度過了十四個年頭中的大半時光（一七二八—四二）。這期間，盧梭做過華倫夫人的情夫，也曾獨自外出漫遊。一直到三十多歲，盧梭都過著失敗而又依賴的生活，尤其是依賴女人。他自己至少嘗試過十三種職業，比如雕刻匠、男僕、神學院學生、樂師、公務員、農夫、私人教師、出納員、樂譜抄寫員、作家、私人秘書等。一七四三年，他有了一份似乎是肥缺的差事：法國駐威尼斯大使孟泰居伯爵（Comte de Montaignu）的秘書。但這份差事也只維持了十一個月，因他被解僱並爲逃避威尼斯立法院的逮捕而告終。孟泰居說（他的說法似乎比盧梭自己說的要可信），他的這位秘書注定是貧困的，因爲他「性情令人討厭」、「說不出的傲慢」，這是他「精神錯亂」和「自視過高」的結果。

經過許多年，盧梭逐漸認識到自己天生是一位作家，有使用文字非凡的能力。他寫到自己的時候特別富於感染力，卻不太忠於事實。盧梭確實可以成爲一位出色的律師（作爲軍人的孟泰居不喜歡盧梭的原因之一，就是當這位大使爲了一個詞而絞盡腦汁時，負責記錄的盧梭習慣於誇張地打哈

欠，甚至走到窗口去)。一七四五年，盧梭遇上了比他年輕十歲的女僕麗瓦塞，她同意成爲他家中永久的主婦，這使盧梭漂泊不定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穩定下來。與此同時，他遇見了狄德羅 (Denis Diderot)，並成了朋友。狄德羅是啓蒙運動的主要人物，《百科全書》的主編。與盧梭相似，他也是工匠的兒子，一位典型的靠自己奮鬥成功的作家。狄德羅是一個友善的人，也是熱中培養天才的人。盧梭要大大感謝狄德羅，因爲通過他，盧梭結識了日耳曼文學評論家兼外交官格里姆 (Friedrich Melchior Grimm)。格里姆地位顯赫，正是他將盧梭引入了被稱爲「哲學家旅館的主人」德霍爾巴赫男爵 (Baron d'Holbach) 的著名激進派沙龍。

法國知識分子的力量正在展現，並在十八世紀下半葉穩步增強。但是在二七四〇和五〇年代，他們作爲社會批評家的處境仍不穩定。一旦國家覺得受到了威脅，很容易就會向他們突然施以暴行。盧梭後來大聲指責他所遭受的迫害，但實際上與多數同時代的人相比，他受到的迫害並不多。伏爾泰就會被他冒犯過的一個貴族的僕人公開杖笞過，而且在巴士底監獄待過將近一年。當時，如果有誰出售禁書，就會被罰在奴隸船上服十年苦役。一七四九年七月，狄德羅因爲出版了一本爲無神論辯護的書，就被逮捕單獨囚禁在樊尚堡。狄德羅在那兒被關了三個月，盧梭曾去探望他。在去樊尚堡的路上，盧梭看到了第戎學院的徵文布告，題目是：「科學和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於道德的改善？」

發生在一七五〇年的這段插曲，成爲盧梭一生的轉捩點。在靈感的閃光中，他發現了他該做的事。其他應徵者很自然地爲科學和藝術事業進行辯護，盧梭卻論證自然的優越。正如他在《懺悔錄》

中所述，他突然對「真理、自由和美德」極度狂熱。他說，他對自己宣布：「美德、真理！我哭得越來越厲害：真理、美德！」他接著說，他的短衣「在不知不覺中，已為淚水濕透」。浸透的淚水可能是真的：對他而言，眼淚是說來就來的。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時候盧梭就下了決心，隨後寫下了幾行論文，這是他的信念的精華。他以這種怪誕的方式得了獎，且幾乎一夕成名。這是一個三十九歲的男人，迄今為止不得志並遭受痛苦，又渴求別人的注意和獲取名聲，他終於一舉達到目的。他的論文軟弱無力，現在看來幾乎無法卒讀。回顧這段文學往事時，人們通常會覺得，如此一篇無價值的文章竟然能夠引起轟動，似乎是不可思議的；確如著名評論家勒梅特（Jules Lemaitre）所說，盧梭的一步登天，是「人類的愚蠢最有力的證據之一」。

《論藝術與科學》論文的出版，儘管流傳很廣，發表後收到的回信就近三百封，但並沒有使盧梭富有起來。此書實際的銷售量不大，而且從中賺到錢的是那些書商。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盧梭可以自由進出貴族的府第和莊園了，這是為那些走紅的知識分子設立的。盧梭有時也確實靠抄寫樂譜養活自己（他有一手漂亮的字），但在一七五〇年以後，他的生活就一直依靠貴族的款待了，除非盧梭寧可選擇同他的資助人激烈地爭吵一番（這種情況經常出現）。盧梭成為職業作家，他總是有著豐富的思想，當他沉靜下來時，就能輕鬆地寫出好文章。但是無論在盧梭的時代，還是在以後的很長時間裡，他的作品の影響變化極大。《社會契約論》常被認為包含了盧梭成熟的政治哲學，這本書寫於一七五二年，十年以後才出版，在他生前很少被人閱讀，只是在一七九一年被重印了一次。當時的五百家圖書館中只有一家收藏了這本書。一位名叫麥克唐納（Joan Macdonald）的學者，曾查

閱過出版於一七八九至九一年間的一千一百一十四種政治性小冊子，她發現只有十二種參考了《社會契約論》。正如她所說的：「必須將對盧梭的崇拜和他的政治思想的影響區分開。」這種崇拜始於那篇得獎論文，但佐以他的另外兩本書，這種崇拜繼續膨脹。第一部是他的小說《新愛洛伊絲》，副標題是「戀人的情書」，這部作品模仿了理查遜（Richardson）的《克拉麗莎》。小說敘述一位年輕女子的追求、誘惑、懊悔和懲罰，此書具有非凡的技巧，它既引起了讀者，特別是婦女——尤其是萌芽中的中產階級婦女市場——對情欲的興趣，同時它還引發了她們的道德感。書中的題材在當時看來是非常露骨的，但最終的教訓卻很恰當。巴黎大主教指控這部小說「表面上似乎禁止，實際卻暗中下了淫欲的毒藥」，但這只會增加此書的銷售量。盧梭自己的一篇措詞巧妙的序言也達到了這個效果。他在序言中斷言，只讀書中一頁的姑娘是迷途的人，接著又說，「而那些貞潔的少女是不讀愛情小說的」。事實上，無論是貞潔少女還是正派婦人，都讀這部小說，並引用書中高度道德化的結論來為自己辯護。總而言之，這本來就是一本暢銷書，事實上也成爲了暢銷書，儘管大部分人買的是盜版。

一七六二年，隨著《愛彌兒》出版，盧梭的聲望再一次提高，他在此書闡發了大量關於自然、關於人對自然的反應的觀點。這些觀點成爲浪漫主義時代的主要食糧，但在當時是原創的。這本書也出色地爲他獲取了最多的讀者。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盧梭太聰明了，他知道自己的長處，作爲真理和美德的先知，他指出理性的缺陷，並考慮到宗教在人們心靈所占有的位置，這是他日益增長的感召力的一個部分。因此，《愛彌兒》中有一章標題就是「信仰宣言」。在這一章中，他指責了他

在啓蒙運動中的知識分子伙伴，尤其是那些無神論者和純粹的自然神論者，指責他們自高自大、固執己見，「他們自稱懷疑論，又宣稱自己無所不知」，他們無視削弱信仰對正派的男士和女士所造成的損害：「他們不僅毀掉了人們所尊崇的一切，而且將之踐踏在腳下。他們盜走了受苦受難者從宗教獲得的慰藉。他們取消了可以約束富貴者和權勢者的情欲的唯一力量。」這類指責極富效果。但爲了與之平衡，盧梭覺得有必要對官方教會也進行批評，尤其是他們崇拜奇蹟和鼓吹迷信。盧梭阻止盜印他的書是極爲冒失的，特別是從他冒險在作品上簽名以後。在法國教會的眼中，盧梭已經被懷疑是雙重叛教者：他曾改奉天主教，後來爲了重新成爲日內瓦市民，他又重新信仰喀爾文教。巴黎議會當時由詹森教派（Jansenist）統治，他們對《愛彌兒》中的反天主教思想表示最強烈的不滿，下令在法院門口當眾焚毀，並發出逮捕盧梭的命令。一些高層的朋友及時向盧梭提出警告，從此他便開始了長達數年的逃亡生活。天主教以外的喀爾文教徒也反對《愛彌兒》，盧梭被迫從一個城鎮遷往另一個城鎮。不過，無論在英國（一七六六至六七年，他在那兒待了十五個月），還是在法國（從一七六七年以後，他居住在法國），盧梭從來不缺乏有權勢的保護人。盧梭最後的十年中，政府對他失去了興趣，而且他的主要敵人是知識分子同行，特別是伏爾泰。爲了回應他們，盧梭在巴黎寫了《懺悔錄》，一七七〇年後在那兒定居。盧梭沒有冒險出版此書，但透過他在時尚豪宅中的朗誦而廣爲人知。一七七八年當盧梭去世時，他的名聲重新高漲，並在大革命時期達至頂峰。

自憐的眼淚

盧梭在生前已獲得巨大成功。在不帶偏見的現代人眼中，他似乎沒有太多好抱怨的。但在文學史上，盧梭是最大的牢騷者之一。他一直堅認自己一生悲慘而又遭受迫害。他以那麼慘痛的話語，經常重複著怨言，使人們感到不能不相信他。從另一方面來看，盧梭的確是堅強的：他忍受著慢性疾病的折磨。他是「一個備受疾病困擾的可憐人。……一生中的每一天，都在病痛與死亡之間掙扎」。他「三十年不能入睡」。接著他說：「自然造就我是爲了讓我受苦受難的，它給了我一個耐得住病痛的體格，疾病不能耗盡我的力量，而我的體格總是以同樣的強度感受到自身。」確實，盧梭的生殖器官一直都有病症。一七五五年在給他的朋友特隆欽醫生的信中說：「我的器官先天畸形。」他的傳記作家克羅克（Lester Crocker）在經過一番仔細調查分析後寫道：「我可以肯定，盧梭生下來就患有尿道下裂症，陰莖是畸形的，上面尿道裂開，直通腹表。」他成年後，尿道變狹，不得不痛苦地使用導管，這無論在心理上還是生理上，都使問題更加惡化。盧梭混跡於上流社會的時候，需要解手時麻煩便來了。盧梭曾寫道：「我仍會發抖地想到自己處在女士的包圍中，被迫一直等到某個好話題結束……當我終於找到一處合適的樓梯間，另外一群女士又把我擋住了，我又來到庭院，那裡川流不息的馬車隨時會向我撞過來，貴婦的女僕們看著我，跟班們在牆邊排成一線在笑話我。我找不到一面牆或廢棄的角落可以解決迫切的問題。總而言之，我只能在所有人的視線中解

手，還會濺到一些穿著白襪的貴族腿上。」

這段話中充滿自憐，卻也表明，還有許多其他證據顯示盧梭的健康狀況並沒有他自己所描繪的那樣糟。有時爲了適應他的論點，他又會說自己的健康極佳。他的失眠症部分出自他的幻覺，因爲各種各樣的人都證實聽見過他的鼾聲。曾與盧梭結伴同去英國的休謨（David Hume）寫道：「盧梭是我所認識的最身強力壯的人之一。在極惡劣的天氣中，所有的水手幾乎都快要被凍死了，他卻還能徹夜伏案工作十小時，毫無傷害。」

盧梭不斷擔心自己的健康狀況，無論是否經過證實，這是他自憐的原動力，這種擔心將他包圍並成爲他一生中每段插曲的食糧。在很早的時候，他就習於向別人講述自己的「故事」，目的是爲了博得同情，尤其是那些名門貴婦的同情。他稱自己是「所有凡人中最不幸的」，說「無情的命運總是追隨我的足跡」，並聲稱「沒有多少人流過我那麼多眼淚」。他堅稱「我的命運是那種樣子，沒有人敢描述，沒有人會相信」。實際上，他經常描述自己的遭遇，有不少人信了他的話，直到他們更加了解了他的爲人。儘管那樣，仍有不少憐憫保留下來。德·艾皮奈夫人（Madame d'Épinay）曾經是盧梭的一位女恩主，盧梭卻對待她非常刻薄，即使如此，在看清盧梭的爲人後，這位夫人仍說：「當他用那樸實而又獨創的方式敘述自己的不幸時，我的心仍會被打動。」像盧梭這種人在軍隊中被叫做「老兵」，即深諳人們心理的老練騙子。盧梭年輕的時候，曾寫過求助信，其中一封被保留下來，人們並不爲這種事感到驚奇。這封信是寫給薩伏伊（Savoie）總督的，爲了申請一份年金，理由是他患上了一種可怕的、會毀壞容貌的疾病，並且很快就會死掉。

自憐的背後是壓倒一切的利己主義。無論是他受的苦難，還是他的特質，盧梭都覺得自己與他人完全不同。他寫道：「你們的不幸怎麼會和我的相同呢？我的處境絕無僅有，有史以來聞所未聞……。」類似的話還有：「能夠以我愛的方式來愛我的人尚未出世。」「從來沒有人比我更具有愛的稟賦。」「我天生就是從未有過的最好的朋友。」「如果我知道還有人比我更好，我會非常恐懼地放棄這種生活。」「爲我介紹一位比我更好的人吧：比我更有愛心，比我更溫柔，比我更敏感……。」「子孫後代會向我表示敬意……因爲這是我應得的。」「我爲自己而喜悅。」「……因我的自尊而得到安慰。」「……如果歐洲能有一個開明的政府，那他們一定會爲我樹立雕像。」無怪乎柏克會做出這樣的評價：「自大，就是盧梭僅次於瘋狂的第二大弱點。」

盧梭自大的一个方面是他相信自己沒有卑劣的情感。「我的感情是如此優秀，根本就不會有仇恨。」「我對自己太熱愛了，不會去恨任何人。」「我從來不知道什麼是仇恨的感情，至於妒忌、邪惡、報復，從來沒有進入我的心。……我偶爾會生氣，但從不要弄心機或是心存惡意。」事實上，他經常會記仇和尋機報復。人們注意到這一點。在知識分子中，盧梭第一個反覆自稱是「人類的朋友」。儘管總體上他愛人類，但他卻養成了愛與人爭吵的特別喜好。日內瓦的特隆欽醫生曾是他的朋友，也是受害者之一，他就抗議道：「人類的的朋友怎麼可能從來不是人的朋友？或者難得是？」盧梭對此做了回答，並維護了自己對那些應受到指責的人進行譴責的權利：「我是人類的的朋友，而人是到處都有——我也沒有必要走得太遠。」作爲利己主義者，盧梭往往將自己所遭受到的敵意，同樣施之於真理和美德本身。因此，無論怎樣對付他的敵人，沒有任何事是過分的，他們的存在本身

就使永恆懲罰的教義具有了意義。他曾對德·艾皮奈夫人說過：「我天性並不殘忍，但是當我看到這個世界因為那些妖魔鬼怪而沒有正義存在，我就寧願相信，有個地獄在等著他們。」

既然盧梭自視過高、自私自利、又愛吵架，但為什麼還那麼多人要與他交朋友？這個問題把我們引入了盧梭個性的核心及其歷史意義。部分出於偶然，部分出於本能，部分是精心的設計。盧梭在知識分子中第一個系統地利用特權階層的有罪心理，而且他這樣做的時候還採用了全新的方式，有意利用了對原始質樸的崇拜。他成為具有現代特徵的人物——「憤怒的青年」（譯註：指一九五〇、六〇年代英國一批對現實不滿的青年作家）的原型。就天性而言，他不是反社會的，其實從很小起，他就想在社會中大放光彩。他特別渴望得到上流社會婦女的笑容，他寫道：「女裁縫、女侍者、女店員，我對她們不感興趣。我所需要的是年輕的貴婦。」他是個明顯的、而且無法改變的外省人，在很多方面是鄉巴佬，也沒受過良好的教育。一七四〇年代，他初次試圖闖入上流社會，參加上流社會自身的遊戲，卻徹底失敗；他的第一個劇本是為了取悅一位上流社會的有夫之婦，結果卻是一場恥辱和災難。

然而，他的論文成功了，他打出「自然」這張牌，富人的獎賞向他開放了，他改變了自己的策略。他沒有遮掩他的土里土氣，反而強調這一點，並將之視為美德。接著計謀奏效了，在受過良好教育的法國貴族中已經形成一種習俗，他們對老一套的等級特權的舊制度感到越來越擔憂，於是就培養作家成為避邪的護身符。當代社會評論家杜克洛（C. P. Duclos）寫道：「在那些大人物中，即便有些人並不是真的喜歡知識分子，也要假裝喜歡，因為這是時尚。」所以大多數作家都得到恩主

的庇護，並且極力模仿他們的上司。盧梭的做法正相反，他成爲他們沙龍中一位更有趣、更受歡迎的來客。他是那麼出色，正如他們稱呼他的那樣，一個高智慧的「自然的野獸」或「熊」。盧梭刻意地強調情感，用以反對傳統，他強調的是內心的衝動而不是禮儀。他宣稱：「我的感情就是這樣絕不能偽裝，這使我不必溫文爾雅。」他承認，「照常規看來，我笨拙、不討人喜歡而又粗野。我不會爲兩個小錢奉承人，我是一個野蠻人。」或說這樣的話：「我內心的東西使我免受禮貌的約束。」

盧梭的這種處世態度與他的作品非常符合，這比同代的大部分作家的藻飾文風要簡約得多。他的直率同他對性問題的直言不諱十分匹配（《新愛洛伊絲》是最早談論婦女緊身胸衣之類東西的作品之一）。盧梭有意誇大他對社會常規的反抗，他精心選擇簡樸、寬鬆的服裝，這成爲後來所有早期浪漫主義作家的一大特徵。他自己後來回憶道：「我是從我的穿著開始我的革新的。我拋棄了鑲金飾帶和白長襪，戴上圓假髮，我拋棄了佩劍、賣掉了手錶。」然後他又留長了鬚髮，他稱之爲「我那留著雜亂鬚鬚的日常隨興風格」。盧梭可以說是第一個毛髮蓬亂的名士。多年下來，他形成一套用服裝變化來吸引公眾注意力的方法。在紐沙特爾（Neufchâtel）、拉姆塞（Allan Ramsay）曾爲盧梭作畫，畫中盧梭身著亞美尼亞式長袍，一種束著腰帶的長袖長袍。穿著這件長袍，盧梭甚至上過教堂。剛開始，當地人對此非常反感，但漸漸也就習以爲常，這也成爲盧梭的標誌了。在他訪問英國期間，盧梭仍是這身行頭來到特魯里街劇院，他急於回應圍觀人群的歡呼，加里克夫人（Mrs Garrick，譯註：其夫加里克爲十八世紀英國著名演員，以演出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物著稱）不得不抓住他的長袍，以防他從車上跌下去。

無論有意與否，盧梭是一位超級自我宣傳家。他的怪異癖好、離經叛道、極端化的個性，甚至於他的吵架，都極吸引人們的注意，無論對那些貴族恩主，還是對讀者和崇拜者，他的個性無疑是他的吸引力之一。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對於相當多的知識分子領袖人物而言，個人與公眾的關係是他們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其中怪誕的服飾和外表並非微不足道。在此或其他許多方面上，盧梭都稱得上是潮流的領導者。誰能說他有何不對呢？多數人對於別人的觀念，尤其是新觀念，往往會排斥，但是又會被人格所吸引。放縱的個性是一種方法，它把苦藥包上了糖衣，誘使公眾去看看那些論述觀念的作品。

盧梭是一位出眾的心理學家，即便是忘恩負義這種最令人討厭的惡行，他也從中得到積極的好處，成爲他出鋒頭、獲取關注和恩寵的技巧的一部分。對他而言，這似乎不是過錯。他在表白信仰自然的同時，實際上是一個精於算計的人；毫不誇張地說，他使自己相信，他就是人類道德的楷模，所以按照這樣的邏輯，其他人就比他更會算計，動機更加不純。所以他們在同他的交往中，會極力占便宜，他一定要以機智勝過他們。因此他與別人打交道的原則十分簡單：他們給予，他拿走。他還以一個厚顏無恥的理由來支持這個原則：因爲他是世上無與倫比的，所以任何幫助他的人，實際上都是在爲自己謀利。他的這套理論模式，見之於他給第戎學院頒獎信的回信中。信中說，他的論文揭示出未爲人知的真理的界限，「你們慷慨地讚美了我的勇氣，你們也給了自己更高的榮譽。是的，先生們，你們給我的光榮，也是你們自己的桂冠。」當他的名聲爲他帶來別人的殷勤款待時，他使出了同樣的手法；這確實成了他的第二個天性。首先，他堅持那些關愛不過是他應

得的。「作爲病人，我有權放縱，這是人類虧欠那些陷於痛苦中的人的。」或者說：「我是那麼貧窮……應受到特別的寵愛。」

他還說，他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接受援助，這使他非常苦惱。「當我屈服於人們的再三懇求，不得已接受了某種饋贈的時候，與其說是爲了利益，還不如說是爲了得到和平與安寧。贈予者無論花費了多少，實際上他還是欠我的——因爲我付出的更多。」這樣一來，比如說對別人的鄉間別墅或是小莊園，他有權確定借用的條件。他不承擔任何社會義務，因爲「我的幸福觀是……絕不做任何自己不樂意做的事」。因此，他會對東道主說出這樣的話：「我必須強調，你一定得給我完全的自由。」「如果你讓我感到一絲不快，你將永遠不會再看見我。」他的致謝信（如果這個名稱合適的話）往往令人很不舒服：「我感謝你。」接下來就會說：「在你的一再勸說下，我就來造訪。如果你沒有讓我爲這次造訪付出如此昂貴的代價，我的感謝也許會更爲熱烈。」

正如盧梭的一位傳記作家指出的，他總是給人設下小小的圈套。他會強調自己的困難與貧窮，當別人提供幫助時，他卻裝出受到了意外的傷害，甚至表現出憤慨。諸如：「你們的建議讓我感到寒心。當你們把朋友當成僕人時，你們是多麼誤解了自己的利益。」接著說：「我不是不願意聽從你們的提議，假若你們懂得我不是廉價出售的。」盧梭的這番話，使得打算邀請他的東道主亂了手腳，只好重新制定招待計畫。這是盧梭誘惑人們（不僅是比他社會地位高的人）的心理手法之一。在他的字典裡是沒有真心誠意的「感謝」這個詞的。蒙特莫倫西——盧森堡公爵曾借給他一處莊園，盧梭寫信給他說：「我既不讚揚你，也不感謝你，但是我住在你的屋子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說話

方式——我也用自己的語言來表達一切。」這一策略非常靈光，公爵夫人滿懷歉意地回覆他：「你不必感謝我們——是元帥和我欠了你的債。」

受迫害妄想症

盧梭並不打算只過斯金波 (Harold Skimpole) 那種愜意的生活。他這個人太複雜，也對那種生活方式沒有興趣。他除了冷靜而又精明實際的特點外，還確實帶有妄想狂的成分，這不允許他滿足於輕鬆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寄生生活。事實上，他與每一個和他有親近關係的人，尤其是與那些和他交朋友的人爭吵，不只激烈而且常常是永久性的爭吵；研究了這些令人痛苦而又反覆重現的吵架故事，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他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他的病症混雜著偉大又獨創的天才思想，而且這兩者的結合不僅對盧梭個人是危險的，對於其他人也是危險的。毫無疑問，堅信自己完全正確，這是他的主要症狀。如果盧梭沒有任何才能，也許這種症狀就可以得到治療，或者最壞也不過是造成個人一場小小的悲劇。可是盧梭作為作家具有驚人的天賦，這使他為人們所接受和稱讚，甚至享有盛名。他確信他永遠是正確的，這不是他主觀的評判，而是世界對他的評判——當然，除去他的敵人，這種想法對他來說是不可動搖的。

這些敵人每一個都是盧梭昔日的好友或贊助人，他們戴著友善的假面具，竭力利用他和毀滅他（這是盧梭與他們吵翻後得出的結論）。無私友誼的觀念對他來說是陌生的，而且因為他比別人好，

連他自己都不能感受到這種強烈的要求，其他人就更不可能感受到了。盧梭對他所有「朋友」的行爲一開始就進行仔細的分析，當他們有所欺騙，就會立即察覺到。他與狄德羅爭吵，儘管狄德羅對他的幫助極大。他與格里姆爭吵。對盧梭最慈善的資助人是德·艾皮奈夫人，可是他恩將仇報，特別粗暴地傷害了她。盧梭與伏爾泰爭論不休——關於這一點並不難理解。盧梭與休謨也吵翻了，而休謨以自己的價值標準把他視爲文壇上的殉道士，將他介紹到英國，他受到英雄般的歡迎，並且盡其所能使他的英國之行成功和愉快。此外還有幾十次較小的爭執，比如與他日內瓦的朋友特隆欽醫生之間的爭吵。盧梭把他與別人之間的大多數主要爭論寫成長篇的抗辯信。這些文獻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也創造了辯護技巧的奇蹟，這些信以超人的計謀狡猾地編造證據、篡改歷史、混淆時間次序，目的就是證明對方是個怪物。一七六六年七月十日，盧梭給休謨寫過一封十八頁的信。休謨的傳記作者說這封信「同一個痴呆病人始終如一的邏輯相一致，至今仍然是一個精神錯亂者所製造出來最傑出、最迷人的文獻之一」。

盧梭逐漸相信，那些假裝愛他的男女各自對他的敵對和行爲並不是孤立的，而是統一行動的組成部分。在一個錯綜複雜的長期陰謀中，他們全都是代理人，他們要打垮他，使他煩惱，甚至於毀滅他，破壞他的工作。他回顧自己的一生，決定將陰謀追溯到他十六歲爲凡賽莉伯爵夫人當侍僕的時候：「我相信，從那時起，我就遭受秘密勢力的惡意玩弄，此後它們一直在反對我，這使我厭惡對此要負責任的表面上的秩序，是可以理解的。」其實毫不誇張地說，與其他作家比起來，法國當局對待盧梭是相當不錯的，只有一次想逮捕他，而且首席審查官馬爾舍伯總是設法使他的作品得以

發表。不過盧梭越來越覺得自己是一個國際網絡的受害者，特別是在他訪問英國期間。他確認休謨在幾十個幫手的幫助下正在策劃這場陰謀。他曾寫信給大法官坎登爵士，說他的性命正處於危險之中，要求提供武力保護，讓他離開這個國家。但大法官對這個瘋子的來信早已習以為常，坎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盧梭最終離開英國之前，在多佛（Dover）的表現簡直是歇斯底里。他跑到一艘船上，把自己鎖在船艙裡，還爬上一根桿子，異想天開地對人群說道：現在麗瓦塞也是陰謀者之一，要用武力留他在英國。

回到歐洲大陸後，盧梭在前門釘上布告，控訴和他敵對的各種社會成員，他列舉出：牧師、知識界名流、平民、婦女、瑞士人。他認定法國外交大臣什瓦則爾公爵親自負責這個國際陰謀，花費大量時間組織了一個龐大的間諜網絡，他們的任務就是使盧梭的生活陷入悲慘的境地。一些社會事件，比如法國占領科西嘉，盧梭專門為此撰文，在他的筆下被巧妙地編織成傳奇故事。說也奇怪，盧梭是在什瓦則爾的請求下動筆的。為爭取波蘭獨立，盧梭為波蘭的民族主義者寫過類似的文章。一七七〇年，當什瓦則爾下台時，盧梭還曾經心緒煩亂：又一個不祥之兆。盧梭宣稱，他從未發現過原罪（這不同於他把自己跟真理和正義同一起來），正是因為這一點，「他們」下決心要懲罰他。但陰謀的細節是毫無疑問的，它「巨大得無法想像」，「他們要圍著我建造一座密不透風的、黑暗的大廈；他們要把我活埋在棺材裡……如果我要旅行，無論我去哪兒，一切都是預先安排好用來控制我的。指令將會下達給旅客、馬車夫、客棧老板……我在路上每走一步、每見一事，都有這些令我厭惡的東西，我的心將會受到傷害。」這種受迫害的妄想症，在他最後的作品《對話錄》（寫於一七

七二年）和《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一七七六）中都有反映。當他完成了《對話錄》後，盧梭確信「他們」企圖消滅他。一七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盧梭來到聖母院，打算要求保護自己的手稿，並放置在聖壇上，但是通向聖壇的門卻莫名奇妙地鎖上了。不祥之兆！於是他將手稿抄寫了六份，非常迷信地分別存放於不同的人手中；其中的一份落到了約翰遜博士（Dr Johnson）的學者女友布斯口（Brooke Boothby）女士的手中，她在一七八〇年將此稿首次出版。當然，那時盧梭已經入土了，不過他仍然堅信有成千上萬的特務在追蹤著他。

這種精神病症所帶來的折磨真使人苦不堪言，因此不論何時不可能不對他產生同情。不幸的是，他不能就這樣被打發掉，盧梭是有史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把自己描繪成人類的朋友，尤其是真理的原則和美的典範，不論過去現在，他仍然是這樣廣泛地被人接受，因而有必要更認真地考察一番他作為真理闡述者與富有美德的人的操作。我們發現了什麼呢？事實真理的問題意義尤為重大，因為盧梭死後，是他的《懺悔錄》使他廣為人知。他自己宣稱，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努力披露一個人一生全部的內心真實，是一種新的、絕對真實的自傳。正如十年後，鮑斯韋爾（James Boswell）為約翰遜博士寫了一部絕對精確的新型傳記。

盧梭聲稱這部作品是絕對誠實的。在一七七〇至七一年的冬天，盧梭在擁擠的沙龍中舉行了《懺悔錄》的朗誦會，包括吃飯休息，朗誦持續了十五至十七個小時。他的攻擊如此令人難以忍受，受害者之一的德·艾皮奈夫人請求當局下令停止朗誦。盧梭同意停止，但在最後一次朗誦會上，他又說了這樣的話：「我講的都是真話。如果有人知道的事實與我剛才說的相反，即使他們得到一千

次證實，那仍然是謊言和矇騙……（任何人）用他自己的眼睛來考察我的天性、性格、操守、志趣、愛好、習慣以後，如果還認為我是一個不誠實的人，那麼他自己就是一個理應被掐死的人！」這席話帶來一片沉默，令人印象深刻。

披上真理的外衣

盧梭聲稱擁有超人的記憶力，並以此來支持自己說實話者的頭銜。更重要的是，他要讀者確信他是真誠直率的，因為他是第一個披露自己性生活細節的人。他的態度不是強健男子的自我炫耀，而是懷著羞愧和勉強。正是他把自己的性經歷稱做是「一座黑暗而污穢的迷宮」，「最難說出口的倒不是罪惡的事，而是那些使我們覺得可笑又可恥的事。」但是他的勉強又有幾分可信呢？年輕的盧梭曾在黑夜中遊盪於杜林（Turin）的偏僻街區，向婦女裸露自己的臀部。「在她們的眼前展露我的臀部時，我從中獲取了無法形容的愚蠢的愉悅。」盧梭天生有裸露癖，不論在性或其他方面都是如此，他敘述自己性生活的方式就有這種意味。他描述過他的性受虐狂。當嚴厲的牧師的妹妹朗拜爾西埃處罰他，打他屁股的時候，盧梭是多麼地樂意，他是故意犯錯去招惹懲罰。盧梭還鼓勵一位稍長的女子格羅登也來抽打他，「當我躺在一位專橫女士的腳下，服從她的命令，向她討饒——我會感到一種甜蜜的快樂。」他還告訴讀者，當他還是小男孩的時候，他是怎樣開始手淫的，盧梭還對手淫進行了辯護，因為這可以使青年避免得到性病，還因為「容易害羞和膽怯的人發現這種惡習非

常方便，對於想像力豐富的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可以對一切女士想入非非，讓美人服務於快樂，可以隨心所欲而不必徵得同意」。他還為自己在杜林收容所時被一個同性戀者誘惑尋找藉口。他也承認自己曾和一個花匠同享華倫夫人的寵愛。據盧梭自己描述，當他突然發現一個女孩的其中一個乳房沒有乳頭，便無法和她做愛，他甚至記下了那個女孩惱羞成怒離他而去所說的話：「離女人遠一點，去研究數學吧！」盧梭坦白地承認，晚年時他又恢復了手淫，這比追求一種積極的情愛生活要便利得多。部分是出於故意，部分是出於無意識，盧梭在性問題上的態度，留給別人的印象基本上帶有些孩子氣，他一直把他的情婦華倫夫人稱做「媽媽」。

這些有損名聲的招認使人們相信盧梭是尊重事實的，他還敘述其他可恥但與性愛無關的事，包括偷竊、說謊、怯懦、背信棄義，來強化人們對他的信任。不過他的敘述還是帶有狡猾的成分。他的自我指控使得其後他對敵人的指控更加具有說服力，比如狄德羅便曾憤怒地發現：「他用令人厭惡的色彩描繪自己，以便給他那些不公而又殘酷的非難披上真理的外衣！」此外，盧梭的自我責難帶有欺騙性，因為每到關鍵之處，在赤裸裸的坦白之後就是表述得極富技巧的無罪開脫。這樣讀者最終還是對他抱以同情，甚至絕對信任他的誠實。而且，盧梭所講的實話，往往證明只有一半的真實：他所選擇的誠實，在許多地方是《懺悔錄》及他的書信中最不誠實的地方。盧梭那麼坦率承認的「事實」常常是冒出來的，按照現代學者的觀點，是不精確的、歪曲的，或根本不存在的，有時他的作品就有證據清楚地證明這一點。例如，關於他的同性戀，在《懺悔錄》和《愛彌兒》中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說法。關於他鉅細靡遺的記憶力，只是一個神話。他記錯了父親的去世年份，而且說

他父親活到大約六十歲，其實是七十五歲。關於他在杜林收容所的所有細節實際上全是謊言，而這可是他早年生活中最重要的經歷之一。人們漸漸發現，《懺悔錄》中的敘述如果沒有書外的證據來證明，就不能相信。確實，人們很難不贊同關於盧梭的一位最淵博的現代評論家赫伊津哈（J. H. Huizinga）的觀點。他認為，盧梭一再強調《懺悔錄》的真實和誠實，就使得其中的歪曲和虛假顯得尤為可恥：「越是一遍又一遍地仔細閱讀此書，越是深入地鑽研進去，越多的醜行便顯而易見。」爲什麼盧梭的欺騙如此危險，爲什麼他的昔日友人對於他的杜撰如此擔憂——因爲他具有魔鬼般的技巧和才華。就像他的一位公正的傳記作者克羅克教授所說的：「盧梭對他的爭吵的所有敘述（包括他在威尼斯的那一段），信服力和雄辯令人難以抗拒，他表現出來的真誠神態，在在使他所講的震撼人心。」

盧梭對於事實的忠實就是如此。那麼他的美德又如何呢？我們任何人的生活幾乎都禁不起貼近的考察。經過無數學者的研究，盧梭的生活便可怕地暴露出來，在進行道德評價時，就發現了某些卑鄙的東西。假定他的主張以至對道德、操守的影響是正確的，那就別無選擇了。盧梭說自己是個生來就爲了愛的人，而且他說起有關愛的教義來比大多數的教士都執著得多。既然如此，他是如何對最親近的人表達愛的天性呢？盧梭剛出生就失去了母親，也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他對其母沒有任何感情，因爲從未見過她。但是他對其他家庭成員也沒有表露過感情，確切地說，是毫無興趣。他的父親對他來說什麼也不是，他的去世只是爲他提供一個繼承遺產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講，盧梭關心失散多年的哥哥，在某種程度上是爲了確認他已不在人世，這樣家產就是他的了。他

是以財產的角度來看待家庭的。他在《懺悔錄》中形容自己：「我的明顯的自相矛盾是：把貪得無厭與對金錢的極度蔑視結合在一起。」在盧梭的一生中找不出太多蔑視金錢的證據。他描述過家庭遺產被證明該為他所得，以及他收到匯票時的情景。經過極力的克制，他拖到第二天才打開信封，「我故意慢慢地打開它，看見那筆匯款就在裡面。我立即就感到了欣喜，但我發誓，最強烈的快樂征服了我。」

如果說這就是他對自己家人的態度，那麼他又是如何對待華倫夫人（他事實上的養母）呢？答案是：卑鄙！在盧梭貧困潦倒時，華倫夫人至少援救過他四次。到後來盧梭得勢、而她卻變得落魄時，他卻沒為她做任何事。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一七四〇年代在繼承了家庭的遺產後，盧梭寄給華倫夫人「一點錢」，可是他拒絕拿出更多的錢來，因為他覺得這些錢只會被圍繞在她身邊的「無賴們」拿走，這是一個藉口。後來，華倫夫人又向他求助，盧梭卻置之不理。華倫夫人的最後兩年時光是在病榻上度過的，她可能在一七六一年死於營養不良。夏梅特伯爵和他們兩人都認識，他強烈譴責盧梭沒有「至少歸還他所花費掉的那位慷慨女恩主的錢」。盧梭在《懺悔錄》中，以完美無缺的謊言談論她，稱頌她是「女人和母親當中最好的一位」。他解釋自己為什麼沒有給她寫信，是因為害怕華倫夫人知道自己的困窘後會忍不住感到悲傷。他最後說道：「去享用妳慈愛的果實吧，在妳身邊為妳的弟子準備好他希望有一天能獲得的那個位置吧！妳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因為上天結束了妳的苦難，免得讓妳看到他的痛苦處境。」這是典型的盧梭風格，以純粹自我中心主義者的態度對待她的去世。

盧梭真的能愛一個女人而沒有極端自利的保留嗎？據盧梭自己說，「我一生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愛人」是蘇菲，即居德托伯爵夫人（Comtesse d'Houdetot），她是他的女恩主德·艾皮奈夫人的表妹。也許盧梭愛過她，不過，他說他給她寫情書是非常「小心謹慎」的，因為如果被發表，對兩人而言一樣會造成傷害。一七四五年，麗瓦塞成爲盧梭的情婦，當時她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女僕，跟盧梭同居了三十二年，直至盧梭過世，盧梭說自己「從未對她感到一點點愛意……我用她滿足肉體的需要，純粹是一種性關係，這種需要同她本人毫無關係」。他還寫道：「我曾經對她說過，我不會和她分手，也永遠不會娶她。」兩人在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之後，曾在一些朋友面前舉行過一次模擬婚禮。盧梭藉此機會發表了一次自吹自擂的演說，宣稱後人一定會爲他塑像，而且「作爲盧梭的朋友，將不是空虛的榮譽」。

在某種程度上，盧梭看不起麗瓦塞，認爲她是一個粗俗的、沒有文化的女傭人；他也看不起自己，因爲自己居然與這樣一個女人爲伴。盧梭指責她的母親太貪婪，她的兄弟偷了他四十二件上好襯衫（不過無法證明麗瓦塞的家人像盧梭所描繪的那樣壞）。據盧梭說，麗瓦塞不能讀、不能寫，而且不會看時間，也不知道是幾月幾號。他從不帶她外出。宴請賓客時，盧梭不允許她入座，當她送進食物時，他便「拿她取樂」。盧梭甚至把麗瓦塞犯的語法錯誤彙編起來，以博蒙特莫倫西——盧森堡公爵夫人一樂。他那麼傲慢地使喚麗瓦塞，甚至令他一些有身分的朋友都感到震驚。當時，人們對麗瓦塞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認爲她是一個歹毒的搬弄是非的人，而無數把盧梭偶像化的傳記作家用最不堪的手法描繪麗瓦塞，以此來爲盧梭對她心胸狹窄的行爲開脫。雖然如此，但是麗瓦塞也有

一些強有力的辯護者。

公正地說，盧梭也稱讚過麗瓦塞：「天使般的心腸」、「溫柔而正直」、「出色的顧問」、「單純而毫不輕佻的姑娘」。他發現她「膽怯而且容易控制」。其實，盧梭是否了解麗瓦塞這一點完全不清楚，原因可能是盧梭太自戀，不可能去研究她。鮑斯韋爾提供了一幅關於她的最可靠的畫像。他曾在「一七六四年拜訪過盧梭五次，後來他又把麗瓦塞護送到英國。他認為她是「一個嬌小、活潑、整潔的法國姑娘」。鮑斯韋爾希望通過收買她能夠進一步接近盧梭，並且從她手中乞得了兩封盧梭寫給她的信（只剩下一封存世）。信中的盧梭是深情的，他們的關係相當親密。麗瓦塞告訴鮑斯韋爾：「我已經跟隨盧梭先生二十二年了。我不會放棄我的這個位置去當法蘭西皇后。」從另一方面來說，當鮑斯韋爾成爲她的旅伴後，他不費吹灰之力就勾引了她。有關這段經歷的詳盡記敘，被他的文學遺囑執行人從他的日記手稿中刪去了，遺囑執行人在空白處標上了「應受指責的章節」的字樣。不過，還是有一句被疏漏了。那是在多佛，鮑斯韋爾記道：「昨天一大早，我就到了她的床上，又做了一次那件事，總共十三次了。」他留下的敘述足以說明，超乎絕大多數人的想像，麗瓦塞是一個相當複雜、老於世故的女人。事實似乎是這樣，在許多方面，麗瓦塞忠實於盧梭，但也會利用他，這是盧梭以自己的行爲教會她的，因爲盧梭也在利用她。盧梭把最大的溫情放在動物身上。鮑斯韋爾記錄下盧梭與他的小貓、還有小狗蘇丹在一起嬉戲的愉快場面。他給了蘇丹一個情人，他是不能去爲人尋找的。他帶著蘇丹一同來到英國，而蘇丹的狂吠差點使盧梭不能出席一場加里克專爲盧梭在特魯里街舉辦的義演。

盧梭把麗瓦塞留在身邊，甚至珍愛她，因為她能為他做一些動物做不到的事：比如，為他安置導管以緩解尿道狹窄的痛苦。盧梭絕不允許第三者介入他們的關係。有一次，一個出版商送給麗瓦塞一條裙子，盧梭為此大發雷霆；他還迅速否決了一項向她提供年金的計畫，因為這可能使她不再依賴他。最主要的是，他不准孩子們來剝奪他對她的權利，這也導致他犯下了最大的罪行，因為盧梭的名聲大半有賴於他的兒童教育理論。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愛彌兒》、《社會契約論》，甚至還有《新愛洛伊絲》，都以許多教育理論作為基本的主題。不過令人費解的是，他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為，卻與他所寫的相反，他對孩子毫無興趣。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為證實自己的理論而去研究過孩子。他曾經聲稱，沒有人比他更喜歡和孩子們一塊玩耍。有一件軼事卻不足以消除人們對此的疑慮：法國畫家德拉克洛瓦（Delacroix）在他的日記中（一八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寫道，有人在杜伊勒利宮（Tuileries）的花園中見過盧梭，「一個小孩的球碰到了這位哲學家的腿，盧梭勃然大怒，拄著手杖追趕這個小孩。」根據我們對盧梭個性的了解，他很可能從來就沒有做過好父親。雖然如此，在發現盧梭對自己親身骨肉所做的事情後，就會令人感到厭惡與震驚。

遺棄五個孩子的理由

一七四六至四七年的冬天，麗瓦塞生下了第一個孩子，我們不知道是男還是女，連名字也沒有。（據盧梭自己說）「世界上最大的難題」就是說服麗瓦塞必須遺棄這個孩子，以「保全她的名

譽」。她「哀嘆著順從了」。盧梭在孩子的襁褓裡放了一張帶暗記的卡片，然後叫助產士把包裹放到棄嬰收容所去。盧梭與麗瓦塞後來又生下了四個孩子，他們用同樣的方式處置，只是在第一個孩子以後，盧梭再也不自找麻煩地放卡片了。五個孩子都沒有名字，很可能都沒活多久。一七四六年的《法蘭西信使報》一篇有關棄嬰收容所歷史的文章中提到，棄嬰收容所每年被三千名以上的棄嬰所擠滿。一七五八年，盧梭本人指出這個數字已上升到了五千零八十二人。一七七二年平均數上升到近八千人，大約有三分之二的棄嬰在頭一年就死亡了，平均百分之十四的棄嬰可以活到七歲，在這些孩子中又只有百分之五活到成年，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淪為乞丐和流浪漢。盧梭從未記住過他五個孩子的出生日期，對他們的命運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只有在一七六一年，他以為麗瓦塞將不久於人世，於是憑著當年做過標記的卡片對第一個孩子的下落草草進行了一番尋查，但很快就停止了。

盧梭不可能使自己的行為完全保密，在不同的場合，例如一七五一年和一七六一年，盧梭被迫在私人信件中為自己辯解。盧梭對無神論的攻擊觸怒了伏爾泰，一七六四年，伏爾泰出版了一本小書《公民感情》，以日內瓦牧師署名。書中公開發指責盧梭拋棄了自己的五個孩子，還說盧梭是梅毒病患和殺人凶手。盧梭對此指控的否認被普遍接受了。然而，對這段插曲的思考，成為盧梭下決心寫下《懺悔錄》的其中一個因素，這本書基本上是為了反駁或掩飾已為公眾所知的事實。在此書中，他兩次就孩子的問題為自己辯解，在《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和許多書信中，他又回到這一主題。在所有這些作品中，在二十五年之久的時間裡，他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公開或私下地努力為自己辯護。但這卻使事情變得更糟，因為這些辯護把冷酷和自私結合在一起，又加上了虛偽。首先，

他指責那個不道德、不信神的知識分子小團體，是他們把孤兒院的概念放進他那天真的頭腦中。接著他說，有孩子是「一件很麻煩的事」，他負擔不起。「當房間裡充滿了家庭的煩惱和孩子的吵鬧時，我的心靈如何能得到工作所必需的寧靜呢？」他將被迫降格去做卑賤的工作，「所有那些不光彩的行爲，使我充滿了正當的恐懼。」「我完全知道沒有一個父親會比我更加慈愛」，不過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與麗瓦塞的母親有任何接觸，「一想到要把我的孩子託付給那種粗俗的家庭，我忍不住會發抖。」至於說他殘忍，任何一個有著他那種卓越道德品性的人怎麼會犯下這種罪行？「……我熱愛偉大、真、美與正義；我痛恨任何類型的惡，我根本沒有憎恨或傷害的能力，甚至於沒有能力想到這些。當我看到一切善良、慷慨、和藹的人，就感受到甜美而又愉快的情緒；我要問，在心中，能夠同時讚賞墮落，沒有絲毫自責，就把最甜蜜的義務踐踏在腳下嗎？不！我認爲，並高聲地斷言——這是不可能的！盧梭，在他的一生中，沒有一時一刻是沒有感情、沒有憐憫心的人，更不是一個喪盡天良的父親。」

爲了合理自己的善行，盧梭不得不進一步用明確的理由來爲他的行爲辯護。在這一點上，幾乎是很意外地，盧梭把我們直接引進了他的私人事務和政治哲學的核心。我們詳細討論盧梭拋棄孩子的行爲是正確的，不僅僅因爲這是反映他不近人情的最引人注意的一個事例，而且也是一個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個過程產生了他的政治和國家職能理論。盧梭把自己也看成是一個棄兒。在很大程度上，他從未真正長大，他一生都是依賴別人的孩子，他把華倫夫人當做母親，把麗瓦塞當做保姆。《懺悔錄》中的許多篇章及在他更多的書信中，都強調了孩子的成分。不少與盧梭有過交往的

人，例如休謨，都把他看成一個孩子。他們一開始把盧梭當做是個無惡意的孩子，是可以管教的。付出一定代價後，他們才發現，與他們打交道的是一個才華橫溢又富有野性的少年犯。在許多方面，盧梭也自覺是個孩子，於是他就無法養育自己的骨肉。必須有某種東西來取代他的位置，這便是國家，以孤兒院的形式出現的國家。

所以，盧梭認為他所做的是「一個正確又明智的安排」。這正是柏拉圖所提倡的。孩子們「最好不要過於小心地養育，如此會使他們更加強健」。他們將會「比他們的父親更加快樂」。「我過去曾希望，」他寫道：「我現在仍希望自己像他們那樣成長和受教育。」總而言之，盧梭把他的責任轉嫁給國家，「我若是能夠擁有同樣的幸運，我想我就是是在履行公民和父親的職責，而且我把自己看成是柏拉圖共和國中的一員。」

盧梭宣稱，他對處置自己子女方法的思考結果，就是他在《愛彌兒》中表述出來的教育理論。顯然，這也有助於他完成同年出版的《社會契約論》。開始是在特定的情況下，一種個人的自我辯護——對他行爲的一連串匆忙的、病態的、又反覆考慮過的辯解，這一點他自己起初也知道，這個開端就是不正常的——其後又逐步發展，由於反覆的自辯和日益增長的自負，就連自己也真的相信了，並形成一種主張：對於社會道德的改善，教育是關鍵，既然如此，教育就是國家的事。國家必須造就所有人的思想，不僅僅是兒童（因爲在孤兒院中已經對盧梭的孩子這樣做了），而且也包括成年的公民。根據一連串古怪又可恥的道德邏輯，盧梭作爲人父的惡行是同他思想的子孫——未來的極權主義國家——連繫在一起的。

論社會契約

圍繞著盧梭的政治學觀點總是存在著不少混亂，因為在很多方面，他是一個前後不一、自相矛盾的作家。有關盧梭的研究變得如此龐大的一個原因是，學術研究要致力解決「難題」。盧梭在一些文章中表現為保守主義者，強烈反對革命：「想像發動群眾所造成的危險。」「那些製造革命的人幾乎總是以大發怒火結束，使自己套上比過去更重的枷鎖。」「我就不願捲入任何革命陰謀，這一向會導致混亂、暴力和血腥。」「整個人類的解放不應該以任何個人的生命為代價。」但是他的作品也充滿強烈的悲痛。「我痛恨那些大人物，我痛恨他們的等級、他們的尖刻、他們的偏見、他們的吝嗇！痛恨他們所有的罪惡！」他曾寫信給一位貴婦說：「正是你們這些有錢人、妳的那個階級，從我手中奪去了我孩子們的麵包。」盧梭還承認「對那些有錢人和功成名就的人心懷忿恨，就好像他們的財富和幸福是損害了我才獲得的」。好些富人們「是一群餓狼，一旦嘗過了人肉的味道後，就拒絕其他食物了」。他有許多有力的格言，語氣激進，因此使得他的作品對年輕人特別富有吸引力。「土地裡結出的果實屬於我們大家，土地本身不屬於任何人。」「人生而自由，卻無時不在枷鎖中。」他在《百科全書》「政治經濟學」條目中，概括了他對統治階級的態度：「你們需要我，因為我富有而你們貧窮。讓我們達成協議吧，我給你們為我服務的榮幸，若是你們把所有的麻煩都交給我，我會指導你們。」

然而，一旦我們理解了盧梭所要創建的國家性質，他的觀點就開始連貫起來。必須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本質上是平等主義的社會制度來取代現存的社會制度，但是實現這個目的時，不允許用革命來破壞秩序。有錢人和特權階層的統治力量，將被代表普遍意志的國家取代，所有的人根據契約都應當服從它。這種服從將會變成本能和自願，因為國家會通過系統的文化工程的作用，向一切人灌輸美德。國家就是父親、家長，它的全體公民就是父親般的孤兒院中的孩子（約翰遜博士有關的評論似乎令人困惑，但他一針見血地戳穿了盧梭的詭辯：「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誠然，兒童公民，與盧梭自己的孩子不同，他們最初是通過自由契約同意服從於國家孤兒院。這通過了他們的集體意志，因此具有合法性。此後，他們沒有權利覺得在受限，因為他們要法律，就必須熱愛他們承擔的義務。

儘管盧梭將普遍意志解釋為自由，但它本質上是獨裁者的工具，是後來所謂「民主集權制」的雛形。在普遍意志名義下制定的法律，必須具有道德的權威。「人們為自己制定的法律不可能是公正的。」「普遍意志是永久合理的。」此外，倘若國家具具有「良好的動機」（例如，它的長期目標是令人嚮往的），普遍意志就可以很安全地讓領袖們來解釋，因為「他們很清楚地知道，普遍意志永遠支持最有利於公眾利益的決定」。因此，任何人一旦發現自己是在普遍意志的對立面，他就一定是犯了錯誤：「當一種與我的觀點對立的觀點盛行時，那就證明我錯了，我以爲是普遍意志，其實並不是。」更確切地說，「如果我獨特的見解被時代所接受，我就走到了我的意志的反面，我也會因此失去了自由。」這種說法使我們幾乎進入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小說《中午的黑暗》中

的寒冷區，或是想到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新話語」（Newspeak，譯註：以模稜兩可和自相矛盾為特點的宣傳語言，出自歐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

盧梭的國家不僅是權威主義，而且是極權主義，因為它控制著人類活動的每個方面，包括思想。在社會契約之下，個人被要求「將他自己和他所有的權利轉讓給整個社區」（即國家）。盧梭堅信在人天生的自私與其社會責任之間，在人與公民之間，存在著無法消除的衝突，這使人感到痛苦。社會契約使國家成為國家，其功能就是使人重新統一，「讓人成為人，你就會使他盡可能地幸福。或者讓他把一切交給國家，或者把一切留給自己。但是你要把他的心靈分開，就是把他劈成了兩半。」因此，你們必須把公民當成兒童來看待，控制他們的發育和思想，把「社會法律種植在他們的心底」。這樣，他們便成為「天生的社會人，自覺的公民；他們將會成為一體，他們一定善良，一定幸福，而他們的幸福就是共和國的幸福」。

這一程序要求完全的服從。最初的社會契約是他為科西嘉所設計的制度，其誓詞是這樣的：「我把我自己，我的身體、財物、意志和所有的權力，都奉獻給科西嘉國民，承認她對我、對我自己及所有靠我生活的人的所有權。」這樣，國家「擁有所有的人和他們的所有權力」，並控制著他們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每一方面，這種生活是斯巴達式的，反對奢侈、反對城市，人們除非獲得特殊批准，否則不能進入城鎮。盧梭為科西嘉所設想的國家，在許多方面實際上正是波布政權試圖在柬埔寨創立的國家的先例。這完全不必驚奇，因為巴黎政權受過教育的領袖已經全盤吸收了盧梭的學說。當然，盧梭自己也非常真誠地相信，這樣的國家是令人滿意的，因為人民會被訓練得去喜歡

它。他沒有用「洗腦」這個詞，但他寫道：「誰控制了人們的思想，誰就可以控制他們的行動。」這種控制的確立，要從嬰兒期開始就將公民當做國家的子女對待，訓練他們，「只是在與國家機體的關係中考察自己」，「因為不依靠國家，他們就不存在，沒有了國家，他們也不存在，國家擁有他們的一切，國家就是他們的一切。」這也預示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的核心理論：「一切都存在於國家之內；國家以外，什麼也沒有；沒有什麼可以對抗國家。」要使國家被人接受和達到成功，就需要文化工程，教育的進步便成為文化工程成功的關鍵。盧梭思想的核心是：公民是孩子，國家是父親，他堅持政府應全盤掌握所有子女的撫育工作。這是盧梭的學說帶來的真正的革命——這樣，他就把政治程序引入人類存在的中心位置。他使立法者、同時也是導師成為救世主，他能夠解決人類所有的問題，創造新人。他寫道：「一切根本上都依靠政治。」美德是好政府的產物，「與其將惡歸咎於人，不如歸咎於沒有管理好的人。」政治的進步和新型國家的實現是醫治人類弊病的萬能藥物，政治無所不能。盧梭因而為二十世紀的主要欺騙和愚蠢行為準備了藍圖。

評價

盧梭生前的名望及死後的影響力有點令人困惑，人類易於受騙上當實際是人類的一種嗜好，他們拒絕接受他所不願承認的證據。對盧梭作品的易於被人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盧梭提出了一個尖銳的要求：不但要成為有品德的人，而且要成為那個時代最有品德的人。當盧梭的種種缺點和

惡行不僅廣爲人知，而且成爲國際性的論題時，爲什麼他這種荒謬而卑劣的要求沒有崩潰？對盧梭進行攻擊的畢竟不是陌生人，也不是政治對手，而是他昔日的友人和曾襄助過他的同伴。他們對盧梭的指責是嚴厲的，他們集體的控訴是毀滅性的。休謨曾一度評價盧梭：「和藹、謙遜、多情、無私而且極其敏感。」但經過更多的接觸以後，他的判斷是：盧梭「簡直是個怪物，他自以爲是世間唯一的重要人物」。狄德羅與盧梭經過長時間的交往後，概括盧梭的爲人：「不老實、像撒旦一樣自負、忘恩負義、殘忍、偽善、充滿敵意。」格里姆認爲他「可惡而可笑」。在伏爾泰的眼中，他是個「自負而卑鄙的怪物」。在對盧梭的所有評價中，最可悲的是那些心地善良而又幫助過他的女人們所留下的，如德·艾皮奈夫人，還有她那無惡意的丈夫。她對盧梭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沒有什麼東西留給你，只有憐憫。」這些評價並非針對盧梭的言論，而是他的行動。從那時算起，兩百多年過去了，學者們挖掘出大量資料，無情地證實了這些評價。一位現代學者將盧梭的缺點列舉如下：他是「受虐狂、暴露狂、神經衰弱者、疑心病患者、手淫者、隱性同性戀、缺乏父母人情、早期妄想狂患者、孤芳自賞、滿腹內疚、病態的膽怯、盜竊癖、幼稚病、易怒且貪財」。

這樣的指責及所列舉的廣泛證據，並沒有改變某些人對盧梭和其作品的尊敬，對他們來說，過去和現在，其人其作都具有智慧和情感上的吸引力。在他的一生中，無論與多少朋友反目成仇，他總能輕鬆地找到新朋友，招募到新的崇拜者、信徒、顯貴，爲他提供住宅、晚宴和他所渴望的奉承。盧梭去世後，他的遺骸葬於埃默農維爾（Ermononville）湖中的白楊島上，這裡很快成爲來自歐洲各地男女的世俗朝聖地，就如同中世紀聖徒的殿堂。對於這些朝聖者怪誕舉止的描述，讀來可

博一笑：「我跪下雙膝……將我的唇貼在冰涼的石碑上……一遍又一遍地親吻著。」眾所周知，他的遺物，如菸袋和瓶子，在「聖堂」裡被妥善保存。有人記得一五二二年，伊拉斯謨（Erasmus）和科利特（John Colet）到坎特布里（Canterbury）去參觀聖托馬斯·貝克特（St Thomas Becket）的墓地時，他們嘲笑過那眾多的朝拜者。宗教改革已經過去二百年了，如果他們發現了「聖盧梭」（喬治·桑〔George Sand〕對他的敬稱），不知他們會說些什麼？他們會以為這類事早已結束了。當盧梭的遺骸被遷到先賢祠後，人們的歡呼延續了很久。康德說盧梭「有一個無比完美的敏感的心靈」；雪萊把盧梭看成「卓越的天才」；席勒認為「只有天堂的天使才能與他的基督一般的靈魂相匹配」；約翰·彌爾、艾略特、雨果、福婁拜都向他表示過深深的敬意；托爾斯泰曾說盧梭與福音書「兩者對我的一生起過重大和有益的影響」；一位當今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李維史陀，在他的重要著作《憂鬱的熱帶》中，熱情地讚揚盧梭，說他是「我們的大師，我們的兄弟……如果把書的每一頁都獻給他，應該是不會褻瀆他的偉大的一種紀念」。所有的一切都令人非常困惑，而且使人想到知識分子也會和其他任何人一樣，失去理性，不合邏輯和迷信。事實似乎是這樣：盧梭是一位天才作家，但他的生活和思想都致命地不健全。一位女士對盧梭做了最好的概括，她就是盧梭自稱唯一愛過的居德托伯爵夫人，她一直活到一八一三年，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刻做了這樣的評價：「他醜陋得令我害怕，愛情沒有使他更有吸引力。不過，他是個可憐的人，我只有用溫柔和仁慈對待他。他是一個有趣的瘋子。」

2 雪萊——沉醉在性愛派對中的浪漫詩人

我們需要生活的詩

一八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一位十九歲的英國從男爵爵位繼承人，寫信給索塞克斯郡 (Sussex) 的一位年輕女教師說：「我不是貴族，根本不是其中的一員，我熱烈地盼望著這樣一個時代：人們勇於依據自然和理性生活，因此也合於德行。」這種說法完全是盧梭式的，不過信的作者、詩人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1—1822) 所說由知識分子和作家指導人類的主張，比起盧梭要走得遠。和盧梭一樣，雪萊相信社會已經完全腐敗，應該被改造，開明人士具有道德的權利和義務，通過自己獨立的理智，依據基本的原則重建社會。但雪萊也在證明，知識分子，特別是詩人——他認為詩人是知識群體的領袖——在這一過程中占有一個特權的位置，實際上，「詩人是這個世界未被承認的立法者」。

一八二一年雪萊在他長達一萬字的論文《詩辯》中，代表他的知識分子同伴發出挑戰，這篇論

文是自古以來關於文學的社會目的最有影響力的論述之一。雪萊論說詩不僅是展示詞語的技巧或消遣，它在所有寫作形式中，具有最嚴肅的目的，詩是預言、法律和知識。社會在道德感受力的指導下，才可能取得進步。教會本應提供這種指導，但已證明是失敗的；科學也不能提供，理性主義本身不能產生道德目的，當科學和理性主義偽裝成倫理學的時候，就製造出道德的災難，諸如法國革命的恐怖和拿破崙的獨裁。有詩才能填補道德的真空，並為進步提供真正創造性的力量。詩「提供心靈千萬種尚未被理解的思想，從而喚醒了心靈，擴大心靈的領域。詩揭開了世界隱藏的美好面紗」。道德的最大秘密就是愛；或者說超越我們自己的本性，把我們與別人的思想、行為或人身上的美合一起來。」詩跟自私自利和物質的追求搏鬥，詩鼓勵群體精神。「人爲了達到至善，就必須深刻而周密地想像，他就必須把自己放在另一個人和其他許多人的位置上；他人的痛苦和快樂必須成爲他自己的痛苦和快樂。道德的偉大工具是想像，詩則作用於原因而有助於效果。」詩的成就推動著文明的道德進步；事實上，詩，它的豐富想像力，它天然的環境自由，構成了一切文明和道德準則棲息其上的三腳架。對社會的徹底重建需要想像性的詩歌，「我們需要創造機能來想像我們所知；我們需要豐富的衝動來實踐我們的想像；我們需要生活的詩。」確實，雪萊不僅提出了對詩人的要求準則，而且他第一次對後來成爲十九世紀社會主要特徵的物質主義提出了根本的批評：「詩，及其以金錢爲可見化身的自我原則，成爲世人的上帝和財神。」

雪萊在詩中的確實踐了他所宣揚的東西。他是個偉大的詩人，他的詩可以在許多層面上欣賞和理解，但最深的層面——雪萊自己所想達到的層面——本質上是道德和政治的，他是最徹底政治化

的英國詩人；他的主要作品及許多比較短的詩，都對某種社會行動發出號召，都是一種公開的預言。他最長的詩篇《伊斯蘭的背叛》（近五千行），關係到壓迫、起義和自由；《讚智力的美》意指善的精神，體現一切人的自由和平等，慶祝它戰勝了既定的惡；《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敘述了另一場取得成功的革命和這位神話人物的勝利，普羅米修斯對雪萊來說（正如對於馬克思和其他人），象徵著領導人類在地球上建立烏托邦的知識分子；《沈西》重複了反叛暴政的主題；《腫腿的僭主》也是這一主題，是對喬治四世的攻擊；《暴政的假面遊行》攻擊了喬治四世的大臣；《歐茲曼迪爾斯》是一首十四行詩，很有力量，詩中雪萊讚美了對專制的復仇；在《寫於歐根山中》這首抒情詩裡，他指出包圍著世界的是週而復始的暴政，並籲請讀者加入他的正義的烏托邦；《西風頌》又一次請求讀者傳播他的政治信息，「把我不能流動的思想傳遍宇宙」，以此「加速新生」，「把我的文字撒向人間」；《給雲雀》中說到詩人的聲音難以被人聽到、信息難以流傳的類似詩句。雪萊在世時，對自己的作品不能風行感到失望，他渴望自己的道德和政治主張能夠深入社會。他最富激情的詩中的兩首，都是懇求他的作品能廣泛流傳和為人注意，這並非偶然。簡而言之，作為一位藝術家，雪萊顯然不是自我中心主義者，很少詩人像他那樣為自我滿足而寫作。

強烈的火焰

雪萊是怎樣一個人呢？直到最近，一般的觀點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兼未亡人瑪麗·雪萊不辭辛

勞所做的宣傳：這位詩人是個極其純潔、天真、不諳世事的人物，沒有過失和惡行，獻身於藝術和同胞，他絕不是一個政治家，頂多是個極其聰明和過於敏感的孩子。這一觀點被他同代人對他外貌的描述所強化了：他苗條、蒼白、纖弱，直到二十幾歲還保持著青春的嬌嫩。盧梭所開啓的對波希米亞式服裝的崇拜，也為第二代和第三代浪漫派知識分子所保留。拜倫所炫耀的不僅是適於他那地中海式或東方式的服裝，甚至當他穿歐式服裝時，也總是喜歡寬寬大大，並且除去精緻的領帶，敞開襯衫的領口，甚至根本不穿外套，只穿襯衣。他對令人不舒服的習俗表現出貴族式的蔑視，這也為比較平民化的詩人如濟慈所效仿。雪萊同樣接受了這種時尚，還加上自己的風格：他喜愛學生式的夾克衫和帽子，對他來說，有時衣服顯得有些緊，但特別符合他想帶來的效果：那種青春的本色和清新，有點笨拙，但很迷人。特別討女士喜歡，正如她們喜歡不繫飾帶、不扣鈕釦的拜倫。這有助於雪萊創造一個具有影響力、始終如一、但又是神話式的形象。在阿諾德（Matthew Arnold）對他的讚頌中，可以發現這一形象幾乎有了大理石般固定的形式，阿諾德說他是「美麗而不切實際的安琪兒，枉然地在空中拍著閃爍的銀色翅膀」。阿諾德的這一評論見之於他有關拜倫的評論，他發現拜倫的詩遠比雪萊的嚴肅和厚重，後者具有「不實在」這種「無可救藥的毛病」。另一方面，從人品來說，雪萊是個「美麗而有魅力的人物」，「遠遠超出拜倫」。很難想像有什麼比阿諾德更不合情理的評判了，他的全部觀點都是錯誤的，這表明阿諾德對這兩人所知甚少，也沒有認真閱讀過雪萊的作品。但十分奇怪的是，他對雪萊性格的判斷同拜倫的並沒有什麼不一樣，拜倫寫道，雪萊「無疑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好、最少私心的人，我所認識的一切人同他相比，無不顯得粗魯」；還說雪萊

是「最無私而善良的人，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更能為別人犧牲自己的財富和感情」。這些評論是雪萊的悲劇結局還清楚地留存在拜倫心中時做出的，所以他的態度並不能當真。拜倫對於雪萊的認識，大多依據他與雪萊的談話為基礎。儘管如此，拜倫是個深諳世故的人、敏銳的裁判官、狂熱的謊言揭露者，拜倫的說法是有影響的，雪萊也給同時代的那些心胸比較封閉的波希米亞式的藝術家留下了同樣的印象。

然而，實際情況根本不是如此，任何一個把雪萊當成詩人尊敬的人（就如我），都會對此感到驚訝。事實真相見之於各種不同的材料，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是雪萊的信件。這些信件顯示，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時，雪萊的專心致志令人吃驚，但他又是冷酷無情甚至是野蠻地清除那些阻擋他道路的人。同盧梭一樣，整體來說，他愛人類，但對特定的人卻常是殘酷無情。強烈的愛使他燃燒，但這是一種抽象的火焰，可憐的凡人靠近時常常會被烤焦。他把觀念放在人之上，他的一生就是在證明無情理念是怎麼回事。

伊頓的無神論者

雪萊一七九二年八月四日出生在索塞克斯郡的菲爾德莊園，這是一幢喬治王朝式的大房子，跟許多重要的知識分子一樣，他不是獨生子女，但在許多方面，他卻占據著一個更容易墮落的位置：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一份巨大的財產和爵位的繼承人，作為長兄，其下有四個妹妹，比他小二至

九歲。現代人已經難以理解他這種身分在十八世紀末的意義：對於他的父母，甚至他的妹妹而言，他是萬物的君王。

雪萊的家庭是古老家族的一個小分支，跟當地的大地主諾福克公爵有著種種連繫。這個家庭家財萬貫，是由雪萊的祖父——第一代從男爵——畢西爵士新近聚積起來的，他出生在新澤西的紐瓦克，是一位新世界的冒險者，粗俗、頑強、精力充沛。雪萊顯然繼承了他那種幹勁和冷酷。雪萊的父親提莫西爵士一八一五年繼承了爵位，比較而言，他性格溫和，不得罪人，作為索瑞漢姆(Shoreham)的下議員，多年來他忠於職守，生活上無可指責，並逐步從穩健的輝格黨立場轉為托利黨的中間派。

雪萊在莊園中被溺愛他的父母和崇拜他的妹妹們所包圍，懶散地度過了童年時代。他很早就顯示出對自然和自然科學的熱情，還曾用化學試劑和熱氣球進行過實驗，一生都保持著這方面的興趣。一八〇四年，當他十二歲時，被送進了伊頓公學，度過了六年。雪萊很努力學習，極其熟練地掌握了拉丁語和希臘語，廣泛涉獵古代文學，終其一身都是如此。對那些嚴肅作品和小說，他都是一位貪婪而且速度極快的讀者。他是那個時代裡繼柯勒律治(Coleridge)之後又一位讀書最多的詩人，他也是學校裡的神童。一八〇九年，他十七歲時，前任王室醫生、伊頓公學的兼職教師林德向他介紹了葛德文(William Godwin)的《政治正義論》，這是當時左派的基本教科書。林德對信奉魔鬼也有興趣，他激發了雪萊對超自然和神秘事物的激情，這種激情不是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諾桑覺寺》中被大大地嘲笑的當時流行的哥德式小說(譯註：十八世紀流行的小說模式，內容恐怖

怪誕，多以中世紀的哥德式城堡為背景，故得此名），而且是光明會（Illuminati）及其他秘密革命社團的實際活動。

光明會是一七七六年由啓蒙運動中的理性主義者保護人威肖普特（Adam Weishaupt）在日耳曼的因古茲塔德大學（University of Ingoldstadt）建立的，目標是對世界加以啓蒙，直至（如他所說的）「君王和國家不經過暴力從地球上消失，人類組成一個家庭，世界成爲有理性的人的居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成了雪萊始終如一的目標。但是他在吸取光明會的思想時，也一道吸取了它的敵人所做的攻擊性宣傳，特別是巴路埃爾神父（Abbe Barruel）轟動一時的極端主義小冊子《雅各賓主義歷史的回憶錄》，這本小冊子不但攻擊光明會，還攻擊共濟會成員、玫瑰十字會會員（Rosicrucian，譯註：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一些秘密會社成員的總稱，這些會社如玫瑰十字架兄弟會、玫瑰十字架武士等等，均以中間有一朵紅色玫瑰的十字架爲標誌）和猶太人，雪萊多年著迷這本令人生厭的書，還常常推薦給朋友（他的第二任妻子瑪麗一八一八年寫作《科學怪人》時就利用過這本書），在雪萊的腦海中，它同他當時和以後所閱讀的大量哥德式小說混合在一起了。

這樣，從十多歲起，雪萊對政治的投入既帶著對秘密會社的興趣，又帶上了巴路埃爾神父及其同道所宣傳的歷史陰謀論色彩，始終擺脫不了，實際上這些妨礙了他去認識英國政治以及利物浦（Liverpool）和卡色爾瑞（Castlereagh）這些人的動機和政策，把他們看成惡的化身。他早期幾乎全部的政治活動都是向激進派作家亨特（Leigh Hunt）提議成立一個由「開明、公正人士」組成的秘密會社，以抵抗「自由的敵人的聯合」。事實上，熟悉雪萊的人一向把他的政治看成是文學上的空

話，純粹是哥德式小說在現實生活中的投影。皮科克 (Thomas Love Peacock) 在他的小說《夢魘修道院》中諷刺了這種對秘密會社的愛好，他把雪萊描繪成書中的斯西羅坡，他「如今被那種改造世界的激情弄得困擾不安，他在空氣中建立了許多城堡，裡面滿是秘密法庭和光明會那幫人，這些人始終是他想像的更新人類計畫中的成員」。在某種程度上，雪萊應當因他這種毫無意義的烏托邦主義而受到責備。按照他朋友豪格 (Thomas Jefferson Hogg, 譯註：雪萊在牛津大學時的同學，因支持雪萊無神論的著作，與雪萊一起被牛津大學開除) 的說法，他不僅堅持「以狂熱的激情」向一切願意聽的人大聲朗讀一本叫《恐怖秘事》的書，而且他自己寫過兩部哥德式小說：《查斯特羅齊》出版於他在伊頓的最後一學期；他在牛津的第一學期出版了《玫瑰十字會會員聖歐文》，皆被女詩人勃朗寧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公正地看成「寄宿學校裡的白痴行爲」而不予置評。

雪萊還在學校時就被稱作「伊頓的無神論者」，他因此而著名，或者說臭名昭著，這點很重要，可以聯想到後來他對家庭毫不寬容的責怪。他的祖父和父親絕沒有想到要去約束他青年時期的寫作，其中當然也包括詩，他們鼓勵他寫，資助他出版。據雪萊的妹妹海倫說，老畢西爵士還為他的學生詩集資助出版。一八一〇年九月，就在他去牛津大學之前，畢西爵士為雪萊的《維克多和卡吉爾原創詩集》付費印刷了一千五百冊。這年秋天，雪萊去牛津，他的父親提莫西帶他去著名書商斯拉特 (Slater) 的書店，並且說：「這是我兒子，他具有文學才華，他已經是個作家了，無論他要印什麼古怪的東西，都請滿足他的願望。」提莫西確實鼓勵他寫出能獲獎的詩，在《巴特農神殿》(Parthenon, 譯註：牛津大學的一份文學雜誌) 上發表。顯然，他希望引導雪萊離開他認為的青春期

騷動，進入嚴肅的文學。他對兒子寫作的資助有明確的條件：雪萊可以在他的朋友中間表達他的反宗教觀點，但不能出版，以免毀了他的大學生活。

毫無疑問，現存的一封信中透露出雪萊是同意這一點的。此後他卻開始以最惡劣、最徹底的方
式來違背他的諾言。一八一一年三月，他是牛津大學學院中的一年級學生，寫了一本挑釁的小冊子
來表明他的宗教觀，他的論述既不新穎，也非毫無根據——可直接溯源於洛克和休謨。雪萊寫道，既
然思想來自於感覺，「上帝」就不可能從感性、知覺中推導出來，信仰不是自由意志的行為，因此
不信仰也不可能是罪惡。雪萊把這沉悶的詭辯加上富有煽動性的標題：「無神論的必然性」，並印出
放在牛津的書店裡，寄給所有的主教和各學院的首腦。簡單地說，他的行為是精心設計的挑釁，在
大學當局看來，它所產生的反應也許正是他所期待的：他被開除了。提莫西灰心喪氣，特別是因爲
他收到過兒子的一封信，信上否認他所做過的事。兩人在倫敦的旅館裡做了一次痛苦的會面，父親
要求兒子放棄他的觀點，至少到長大一點再說；兒子則堅持這些觀點對他來說比家人心靈平靜更重
要，父親「罵著、叫喊著、賭咒發誓，然後又哭起來」，雪萊大聲笑著，「突然爆發出一陣惡魔般的
笑聲」，「他從座位上滑了下來，全身平躺在地上」。結果達成的協議是，雪萊從父親那裡每年得到
一筆兩百英鎊的生活費。隨後又有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一八一一年八月）：雪萊同她妹妹伊麗莎
白的同學、十六歲的哈麗艾特結婚了。

此後，雪萊同家庭的關係破裂了。在爭論中，他起先試圖把母親、後來又想把妹妹拉到他這邊
來，但失敗了。他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宣稱，他全家是「一群冷酷、自私、精於算計的動物，除了

吃、喝、睡，活在世上就沒有其他的目的和事情」。他給家中各人的信讀來讓人驚奇，在他想榨出錢來的時候，他狡猾地連哄帶騙，其他時候就凶狠、粗暴並加以威脅。他給父親的信，從虛偽的辯護升格為責罵，還混合著令人難以容忍的恩賜意味。比如一八一一年八月三十日，他在信中求情說：「我在困境中求助，不知道除了你以外，還有什麼更多成功的把握……你會寬宏地原諒年輕人的錯誤的。」他在十月十二日的信中傲慢地說：「雖然社會習俗使你這一家之主與別人一樣，易於為偏見和情欲所誤導，但我願坦承，除了社會的最高層，在一般人心目中，甚至對於錯誤，因有其價值也給予尊重，這幾乎是很自然的事。」三天以後，他譴責提莫西「怯懦的、下流的、卑鄙的迫害手段……你對我粗暴而無恥。當我因無神論被開除，你就希望我在西班牙被人殺掉，這種美妙的願望同犯罪完全一樣，也許對我來說這也好：讓英國的法律去懲罰凶手，讓懦夫受到譴責而退縮。我一有機會就會去見你——如果你不想聽到我的名字，我就偏要叫它，不要以為我是個任人宰割的可憐蟲——只要我有足夠的錢，我就會到倫敦來見你，對著你的耳朵喊：畢西、畢西、畢西，一直喊畢西，直到把你喊聾」。這封信沒有署名。

雪萊對他的母親就更加凶狠。他妹妹伊麗莎白跟他朋友格萊漢姆訂婚了，母親同意，他卻不贊成。十月二十二日雪萊寫信給母親，指責她同格萊漢姆有私，就用伊麗莎白的婚姻來加以掩飾。這封可怕的信看來沒有任何事實基礎，他還在同一天寫信給伊麗莎白，告訴她那封信的內容，並要她把信拿給父親看。在跟別人的通信中，他也說到他母親的「下流和墮落」。結果家庭律師惠頓被委派拆閱和處理雪萊寫給家中的一切信件。惠頓為人和藹可親，急於在他們父子之間締造和平，但結果

被傲慢的雪萊完全拒之門外。惠頓抱怨雪萊給母親的信「不適當」（在那種情況下的溫和說法），此後，連惠頓的信也被雪萊退回來，上面潦草地寫著：「惠頓信上所用的詞語，證明雪萊先生把它退回是公正的，好讓他冷靜地仔細閱讀，雪萊先生要求惠頓先生在跟紳士打交道時（這種機會也許不多）不要拆開私人信件，否則，厚顏無恥的卑鄙行爲將會遭到嚴懲。」

全家似乎害怕雪萊動粗，提莫西寫信給惠頓說：「如果他留在索塞克斯，我一定要找特警到身邊來。他母親和妹妹也嚇得要命，一聽到狗叫就衝上樓梯，他現在除了一年兩百英鎊之外就無話可說。」還有一件更令人感到可怕的事，雪萊此時過著波希米亞式的浪蕩生活，還在引誘一到幾個妹妹到他那裡去。在日期註明是一八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一封信中，他企圖勸誘菲爾德莊園的獵人把一封偷偷帶給海倫（「記住，海倫，我不會忘記妳」）。這封信是很陰險的，海倫只有十二歲，足以使父母感到心寒。他還急於逗弄他更年幼的妹妹瑪莉。雪萊很快成爲葛德文圈子裡的一員，並結識了葛德文那位不受拘束的女兒瑪麗——她母親是女權主義的領袖沃爾斯通格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以及與瑪麗同父異母的妹妹、更具野性的克萊爾（Claire Clairmont）。成年以後，雪萊時常找來年輕婦女圍著他，生活在一起，並且讓屬於他圈子的任何男子分享——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對他來說，他的妹妹們似乎是這種「家庭」的天然候選人，而且在他看來，幫助她們「逃離」父母家中討厭的物質主義，是他的道德責任。他還有個計畫：把伊麗莎白和海倫從在哈克萊的寄宿學校裡誘騙出來，讓瑪麗和克萊爾同她們會合。幸運的是，此事沒有發生。雪萊本來就沒有給亂倫劃出過一條界限，他跟拜倫一樣迷戀這類事，但沒有拜倫離譜——拜倫和他的同父異母姐姐

奧古斯塔相戀。雪萊的長詩《伊斯蘭的背叛》中的男女主角就是兄妹，經印刷商反對，強迫雪萊做了修改，這同拜倫《厄巴德斯的新娘》中的男女關係是一樣的。雪萊也和拜倫一樣，總是以爲自己對性行爲的準則永遠有豁免權。

雪萊的這種做法使跟他有關係的女子活得很艱難。她們之間除了克萊爾可能是例外，無法證明她們有誰喜歡那種共享的想法，或是對任何形式的亂倫有絲毫的興趣。使雪萊不快的是，所有人（正如他自己的家人）都想過正常的家庭生活，但這位詩人卻不能這樣活下去，在各種各樣的變更、替換、危險和刺激中，他才顯示出勃勃生機；動搖不定、焦慮不安，對於他的作品似乎是不可少的，他可以捲起一本書或一張紙，到任何地方傾瀉出他的詩句。他住在有家具的出租房或住宅裡的時候，卻四處搬家，常常被債主逼債，或者繼續處於令人十分痛苦的人物戲劇的中心，遭受四面八方的打擊。但是他繼續工作和寫作，博覽群書，產量驚人，其中大多數都具有很高的品質。他發現很具刺激性的動盪不安的生活方式，不僅對妻子哈麗艾特造成災難，對其他人也都一樣。

十六歲的妻子哈麗艾特

哈麗艾特是可愛的中產階級少女，整潔而非常傳統，是一位成功商人的女兒。她爲神一般的詩人而傾倒，失去了理性跟他私奔，此後她的一生不可避免地通向災難。在四年中，她跟雪萊一起過著不穩定的生活，先後移居倫敦、愛丁堡、約克、凱斯威克、北威爾斯、林茅斯，又到威爾斯、都

柏林、倫敦和泰晤士河谷。在其中一些地方，雪萊從事非法的政治活動，引起了地方法官和警察甚至中央政府的注意；他到哪裡都跟商人發生麻煩，他們等著他付清帳單；他也同鄰居結怨，他那些危險的化學實驗使鄰居們驚恐，還有看到他那個家庭中的不正常關係也感到厭惡和氣憤，這種關係幾乎總是涉入兩個或更多的年輕女人。在迪斯特里克湖和威爾斯，他的住房有兩次受到當地民眾的攻擊，他被迫逃亡，面對債主和警察，他也是一逃了之。

哈麗艾特盡其所能分擔他的活動，幫助他散發非法的政治傳單。雪萊的第一部長詩《仙后麥布》是題獻給她的，她因而非常高興。哈麗艾特爲他生下女兒艾安蒂，之後又懷了兒子查爾斯，但她沒有使雪萊永遠迷戀的能力，其他任何女人也都一樣。雪萊的愛情深沉、誠摯、熱烈甚至是持久的——但總是變換對象。一八一四年六月，他突然向哈麗艾特宣布一項消息：他同葛德文的女兒瑪麗相愛了，並已一道去了歐洲大陸（克萊爾緊跟在後面）。她得知後大吃一驚，反應出乎雪萊的意料，也使他不快，他是那種崇高的利己主義者，有強烈的道德化傾向，他認爲對於他的決定，別人不但有義務服從，而且要歡呼，若不這樣，他馬上就會生氣。

雪萊在離開哈麗艾特以後給她的信，跟他給父親的信是同一個模式，開始是屈尊恩賜的樣子，當哈麗艾特沒有照他的方式看問題的時候，就轉爲一種自以爲是的憤怒。他在一八一四年七月十四日寫給哈麗艾特的信中說道：「妳從來沒有以能使我完全滿足的激情來填補我的心靈，這並不是我的恥辱。」他說他始終對她寬宏大量，而且仍然是她最好的朋友。到了下個月，他又邀請哈麗艾特去特魯瓦（Troyes），以加入他本人、瑪麗和克萊爾之間：「在那裡，妳至少可以找到一個堅定的、

永遠的朋友，妳的利益永遠是寶貴的，妳的感情永遠不會被故意傷害。除我之外，妳別指望能從任何人身上獲得。」一個月以後，雪萊發現這樣的策略沒有作用，變得更加咄咄逼人：「我認爲自己比那些名義上的朋友都更有價值、更好得多……我的主要意圖一直是要用津貼讓妳大吃一驚。甚至現在，我對另一個人的狂熱而持久的激情，指引著我寧願跟她而不是跟妳交往，我仍然一直在忙於考慮怎樣才能對妳長久地、真正地有所幫助……不料回報卻是用恥辱和責備使我受到傷害——如此空前而卓越的關愛，是要求得到一種完全不同的回報的。」第二天，他又寫道：「無論妳是否繼續充分信任我那禁得起考驗的、始終如一的誠實，想一想吧，這麼長時間來，妳一直樂於把妳的未來置於我心靈的監督和影響之下，服從我們之間的友誼所建造的法則。」

寫這些信的部分目的是爲了從哈麗艾特那裡要錢（這時她還有些錢），部分目的是爲了向她施加壓力，向債主和敵人隱瞞他的行蹤，還有就是爲了阻止她去找律師。信中不時提到「我的人身安全」和「我的安全和舒適」，雪萊是個極其敏感的人，但對別人的感情卻似乎十分遲鈍（這種結合並不少見）。當雪萊發現哈麗艾特爲了自己的權利，最終採取法律步驟時，他的怒火爆發了：「如果妳真的已經墮落到這種程度，這樣做就會毀了妳自己的目標。甚至現在，我還會想起我們過去的友情，我還希望妳沒有完全喪失寬宏大量的美德，這會使我對妳做出的讓步比法律能提供給妳的要多得多。如果收到這封信還堅持訴諸法律的話，顯然，我今後就只能把妳看成敵人，把妳看成是……最卑鄙、最陰險的叛徒。」他還加上這樣幾句：「我是個白痴，還在等待妳的偉大或寬宏大量。」他責怪她「醜惡而卑鄙的自私」，企圖「傷害正在同貧困奮鬥的無辜者」。這時，他的自我欺騙完美無缺

了，他確信，他的行爲自始至終無可指責，而哈麗艾特則是不可原諒的，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豪格說：「我深信，這使我成爲人類更永恆的朋友和更有用的戀人，真理和美德的更熱烈的擁護者。」

雪萊有許多孩子氣的特點，其中之一就是他能將最傷人的辱罵跟要求得到恩惠結合在一起，比如在給母親的信中，指責母親與人通姦，隨後又要求她寄給他「我的伽伐尼機和日光顯微鏡」，他對哈麗艾特的辱罵中又夾著要求，不只要錢，還要衣服，「我需要襪子、毛衣和沃爾斯通格拉夫特夫人的《遺著》」，他還告訴哈麗艾特，沒有錢，「我必定會餓死……親愛的哈麗艾特，快給我寄些生活費來。」他也不問一下她的情況，雖然他知道哈麗艾特懷著他的孩子，此後，突然沒有信來了，哈麗艾特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雪萊先生變得放蕩荒淫，這完全歸功於葛德文的《政治正義論》……下個月我要分娩了，他不會在我身邊，不會的，他現在不關心我了，他再也不會過問我，或給我來信說說他在做些什麼。一句話，我曾經愛過的人死了。這是個吸血鬼。」

雪萊的兒子，哈麗艾特起名爲查爾斯·畢西，生於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父親是否見過他並不清楚。哈麗艾特的姐姐伊麗莎仍然對妹妹忠心耿耿——因此雪萊開始帶著強烈的敵意來看待伊麗莎——她決心不讓雪萊的波希米亞式女人撫養孩子。雪萊同盧梭不一樣，他不把自己的孩子看做「麻煩的東西」，而是竭盡全力要得到他們，但是法律上的爭奪必然對他不利的，孩子由大法官法庭監護，此後雪萊對他們也失去了興趣。哈麗艾特的生活被毀壞了，一八一六年九月，她把孩子留給了父母，在切爾西（Chelsea）住下了。她的最後一封信是寫給她姐姐的：「妳的一切友愛我都無法報答了，想到這些，我就常常心痛。我知道妳會原諒我的，因爲天性使妳對任何人都不會苛刻嚴厲。」

十一月九日，哈麗艾特失蹤了。十二月十日，她的屍體在海德公園的塞本庭河中被人發現。屍體腫大，據說她已懷孕，但並無確鑿的證據。雪萊很久以來一直到處說假話，說他跟哈麗艾特是依據共同的協議分居的，他對哈麗艾特死亡的反應是責罵她的家庭並製造出一套謊言，他寫信給瑪麗說：「事情是：這個可憐的女人——她那個討厭的、不合人情的家庭中頭腦最簡單的女人——被她父親的家中趕了出來，就墮落為妓女，後來又跟一個叫史密斯的馬夫同居，那傢伙拋棄了她，她就自殺了。毫無疑問，她的姐姐是一條貪婪的毒蛇，沒有從我跟她的關係中得到好處，就透過這可憐人的死，以保證她自己能繼承老人——他現在也快死了——的家產！……人人對我都公平，都在證明我對她誠實而慷慨。」接著，兩天以後，他又給這位姐姐寫了一封特別冷酷無情的信。

在雪萊虛偽的謊言中，有一部分可以用這樣一個事實來解釋：他正在為另一個自殺事件而困擾不安，他對此也負有責任。范妮是葛德文的女兒，是葛德文跟第二任妻子結婚之前所生，比瑪麗年長四歲，被認為（哈麗艾特這樣說的）「極其單純、敏感」。雪萊用盡辦法想把她弄到手，早在一八一二年十二月就給她寫信說：「我是被稱為『人』的那種可怕的、長著長爪的動物之一，我向妳保證，我一直是我的同類中最不會害人的，我靠素食生活，自我出生以來，從沒有傷過人，我鼓足勇氣請妳一定要關心我。」范妮也許在雪萊的計畫裡起過重要作用：雪萊試圖建立一個激進的同仁團體，實行性共享，由他本人、瑪麗、克萊爾、豪格、皮科克及克萊爾的兄弟查爾斯·克萊蒙特等人組成。不管怎麼說，雪萊使她著迷了，而葛德文和他的妻子則認為，她是悲劇性地愛上了雪萊。一八一四年九月十日至十四日，雪萊獨自在倫敦，瑪麗和克萊爾在巴斯，范妮晚上去雪萊的住所拜

訪，可能在那裡雪萊誘姦了她。此後雪萊去了巴斯，十月九日，他們三人收到范妮的一封信非常消沉的信，郵戳上是在布雷斯特爾。雪萊立即動身去找她，但沒有找到。實際上她已去西萬斯了，第二天她在麥克威斯阿姆斯旅館的一間房裡服用了過量的鴉片。雪萊在他的信裡從來沒有提過她，但在一八一五年的一首詩中說到她（「我們分手時，她的聲音在發抖」），寫到自己（「一個頭髮灰白、有著雄鷹般眼睛的青年」）坐在她的墓旁，但這只是一個念頭，他從來沒有去過她的墳地，那裡沒有標記。

激情的犧牲品

在雪萊理念的祭壇上，還有其他犧牲品，其中一位是希欽納，她是索塞克斯的年輕工人階級婦女，父親是走私起家的酒店主，她的努力和犧牲帶來了奇蹟，成了赫斯特皮爾波因特（Hurstpierpoint）的教師。她以思想激進聞名，雪萊開始跟她通信。一八一二年雪萊在都柏林鼓吹愛爾蘭的解放，卻沒有得到響應。離開那裡時，他手頭有一大堆顛覆性的資料，他很聰明地把資料寄給希欽納小姐，讓她在索塞克斯散發。這些資料放在一個大木箱裡，但是頗具特色的是，他付了可以寄到豪里海德的錢，他以爲郵件會繼續往前送，希欽納小姐收到時會付款。但是郵箱在進入口岸時被打開了，內政部自然得到了報告，就對這位女教師進行監視，此事毀了她的前程。但希欽納有她的名望，這時雪萊又邀請她加入他的小團體，希欽納的父親和朋友竭力反對，她卻同意了。雪

萊還說服希欽納借給他一百英鎊，大概是生活儲金之需。

在這一階段，雪萊對她大加讚揚：「雖然她出身於非常微賤的家庭，但她在青年時代就養成了深入和細緻思考的習慣；她的心靈超越了偏見的束縛，天生喜歡追究和探討。」雪萊還在給她的一封信中，稱他是他的暴風雨中的「岩石」，「我的更好的本質，我的理性的判斷者、行爲的指導者、價值的啓迪者」；她是「給所到之處帶來幸福、革新和自由的那些人中的一個」。她去了林茅斯，加入了雪萊一伙。在那裡，據說她「整天笑啊、講啊、寫啊」，並散發雪萊的傳單。但是哈麗艾特和她的姐姐很快增長了對她的不滿，雪萊本人並不反對他那些女人之間有某種競爭性的緊張，但這一次，他很快同她們一樣，對希欽納不滿了。他似乎同她在海邊長時間的散步時誘姦過她，不過不久就感到厭倦了。到哈麗艾特和伊麗莎轉而攻擊她時，他就決定：希欽納必須離開。總之，那時他已經同葛德文一家接觸，他發現那裡的年輕女士們更讓人心動，於是希欽納被打發回到索塞克斯，繼續她在那裡的事業，並答應給她每星期兩英鎊的薪資。在那裡她被當成某位先生遺棄的情婦，成了笑柄。雪萊在給豪格的信中嘲弄地說：「這個已離去的痛苦折磨人的女教師，我稱她是褐色魔鬼，她一定收到我們的津貼了。我付出這筆款子的時候心情沉痛，但不得不付。由於我錯誤、草率的決定，她失去了安寧的生活環境；她現在說，由於我的殘暴，她失去了名譽，健康受到了損害，心靈的平靜遭到了破壞：承受著一切女人精神上 and 肉體上所經歷的痛苦，完全是一個犧牲品。」雪萊又忍不住再加上一句：「這女人是個狡猾、淺薄、醜陋、不男不女的野獸。」事實上，希欽納只收到工資中的第一筆，她借出的一百英鎊卻再也拿不回。她重新回到微賤之中，是雪萊把她拉出來的，

她是爲雪萊的激情所燒焦的犧牲品。

還可以舉一個相似的、地位甚至更低下的人物爲例，就是丹恩，他是個十五歲的小伙子，雪萊把他當做僕人從愛爾蘭帶了回來。我們對雪萊的僕人所知甚少，雖然他通常有三、四個僕人。在給葛德文的一封信中，雪萊爲他的懶散生活辯解：「如果讓我去織布，讓我妻子去烹飪或做家庭主婦，那麼在目前這種社會狀態中，我們很快就會變成和現在完全不同的人，我可以說，那對我們的同胞更沒有用處。」所以一定得有僕人，無論雪萊是不是養得起他們，他通常是用很低的工資僱用本地人，但是丹恩不同，因爲雪萊在都柏林時發現他在張貼非法標語時非常能幹。一八一二年在林茅斯，他又讓丹恩在牆上和谷倉上貼傳單，並告訴他，如果被當局盤問，就編造「在路上遇到兩位先生」這樣一套故事。八月十八日，丹恩在邦斯特普爾（Barnstaple）被捕，他就照此說了一通，但是根本沒用，依據喬治三世三十九號法令七十九款判定他有罪，罰款兩百英鎊或六個月監禁。誰都以爲（包括當局）雪萊會交罰款的，但雪萊的處理方法卻是從他的清潔女工那裡借來二十九先令，從鄰居那裡借來三英鎊，作爲丹恩逃跑的費用（當自己的僕人碰到麻煩時，拜倫給他們的幫助同雪萊形成顯著的對比，拜倫不斷爲他那個長絡腮鬍子的總管福西里支付罰款），這樣丹恩進了監獄。他被釋放以後又去雪萊那裡工作，但六個月後被解僱，正式的理由是行爲「不道德」——他可能在監獄裡學到一些壞習慣——真正的原因是雪萊需要省錢。丹恩還有十英鎊工資被欠著，這筆錢從來沒有還。這是另一個受到傷害又淹沒在黑暗之中的犧牲品。

關於雪萊的行爲，必須說明的是，所有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他還很年輕，一八一二年，他才

二十歲，他遺棄哈麗艾特跟瑪麗私奔時二十二歲。我們常常會忘記，這一代英國詩人在改造了英語世界的文學時是多麼年輕。他們去世的時候實在是太年輕了——濟慈二十五歲、雪萊二十九歲、拜倫三十六歲。拜倫永遠離開英國以後，一八一六年五月十日在日內瓦湖邊跟雪萊第一次相會時，也不過二十八歲，而雪萊二十四歲，瑪麗和克萊爾僅十八歲。對於瑪麗在初夏長夜裡的日內瓦湖畔寫出的小說《科學怪人》，你也許會說，這是女學生的作品；然而，如果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還是孩子，但他們也是成人，他們否定了這個世界的價值標準，提出了自己的體系來取代它，很像一九六〇年代的學生。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年紀輕就可以不承擔責任，或是出於年輕而要求特權——正好完全相反。特別是雪萊，他堅持認為自己對世界有一種極其嚴肅的使命，他智力上的成熟非常迅速，他的《仙后麥布》儘管某些方面幼稚，但極為有力，這是他二十歲時寫的，次年出版。一八一五至一六年以後，雪萊進入二十歲至三十歲這一階段的中期，創作進入高峰，在這一階段，不僅顯示出他極其廣博的閱讀範圍，而且顯示出可觀的思想深度。毫無疑問，雪萊有著強健的、同時也是細緻和敏感的心靈。他還那麼年輕，就接受了身為父母的責任。

讓我們現在看看他的孩子。他總共有七個孩子，各有三個不同的母親，頭兩個孩子艾安蒂和查爾斯是哈麗艾特所生，被判由法庭監護。雪萊為此苦苦爭奪，他失敗的部分原因是法庭被他在《仙后麥布》中所提出的某些觀點嚇壞了，雪萊則認為，這場訴訟主要是企圖迫使他從思想上放棄革命目標。他的判決公布以後，他繼續思考其中的不公平，恨透了大法官艾爾頓勳爵，但是他也沒有對孩子們表現出進一步的關懷。根據法庭的判決，他每四個月應付三十英鎊給那兩個與養父母住在一

起的孩子，這筆款項從他的津貼費中扣除。他從來沒有使用過法庭允許的探望孩子的權利，雖然孩子中年齡較大的艾安蒂在雪萊死的時候已經九歲了，他也從來沒有給他們寫過信。除了做做樣子，他從來沒有關心過他們的幸福，他在一八二〇年二月十七日不得不給他們的養父托馬斯寫了唯一的一封信，信的實質是訴說他自己的冤屈，這是一個冷酷無情的文獻。此外，在他現存的任何信件和日記中，他從來沒有提到過這兩個孩子，他似乎已經把他們趕出了他的腦海，不過在他的自傳體詩《心之靈》中，他們幽靈般地出現過（詩中把哈麗艾特當成「那時的行星」而撇開）：

姐姐和弟弟，長得像學生的嬰兒，

一個被拋棄的母親恍惚中的希望

他跟瑪麗生了四個孩子，其中三個死了，兒子珀西生於一八一九年，只有他一人活了下來，維持了血脈。瑪麗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兒，早夭；他們的兒子威廉四歲時在羅馬得了腸胃炎，雪萊在他身邊連坐了三夜，但最終還是回天乏術。女兒卡萊拉的死，一部分是由於雪萊的過失，也許因為這樣，使雪萊想盡各種方法努力挽救，她死得太早，還在襁褓中。一八一八年八月，瑪麗和這嬰兒留在比較涼爽的避暑勝地盧卡溫泉，雪萊自己在艾斯特，位於俯視威尼斯的群山中。他堅持要瑪麗和這孩子立即到他那裡去，這是一年最熱的季節中可怕的五天旅程，雪萊並不知道在動身前小卡萊拉就身體不適了，她到了那裡就病倒，情況沒有好轉。然而，三個星期以後，又是完全爲了雪萊自己

的方便——他正醉心於同拜倫交流他們的激進觀點——他專橫地指示瑪麗帶著孩子跟他一道去威尼斯。可憐的卡萊拉，按照她母親的說法，「虛弱而且發燒，十分可怕」，這次旅行，在酷熱的天氣裡從上午三點三十分持續到下午五點，到帕都亞的時候，孩子顯然已病得很厲害了，雪萊卻堅持去威尼斯。途中，卡萊拉發病到「嘴和眼睛不斷抽搐」，到達威尼斯一個小時以後，她死了。雪萊承認，「這一料想不到的打擊」（這實在是預見的）使瑪麗陷入「絕望狀態」。這是他們關係惡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

那年冬天進入了下一個階段，一個私生女孩，以艾琳娜為名做了洗禮，她是雪萊在那不勒斯的兒子。在給這孩子登記的時候，雪萊把自己的名字和母親的名字給了她，取名瑪麗·葛德文·雪萊，但可以確定的是，雪萊的妻子不是孩子的母親。此後不久，雪萊過去的一個僕人福基——他娶了雪萊孩子的保姆伊麗絲——對雪萊進行敲詐，藉口是雪萊稱這孩子的母親是瑪麗，犯了誹報罪。可能伊麗絲是孩子的母親，但也有很多強有力的證據反對這一說法，伊麗絲則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一八二〇年，伊麗絲告訴英國駐威尼斯的領事賀普納，雪萊在那不勒斯棄嬰收容所裡寄放了一個女嬰，她是克萊爾所生。儘管雪萊的聲譽不佳，賀普納迄今為止對雪萊都給予很高的評價。這時，他對雪萊的行為感到厭惡，把這件事告訴了拜倫，拜倫回信說：「這些事實沒有多少可以懷疑的——情況就是這樣。」他知道雪萊和克萊爾之間的事。克萊爾是拜倫私生女阿麗格拉的母親。在拜倫一八一六年春天離開英國前，克萊爾已經在挑逗他，拜倫對於誘姦處女是有些猶豫不決的，但是克萊爾告訴他，她已經跟雪萊上過床，這時拜倫才跟她上床。事實上，克萊爾不但勾引了拜倫，

而且也想幫助他勾引瑪麗·雪萊，所以拜倫對克萊爾的道德評價極低，這也是他爲什麼不允許克萊爾撫養阿麗格拉的原因之一，雖然將孩子和母親分開對孩子是不幸的事。拜倫感到滿意的是，阿麗格拉是他的而不是雪萊的孩子，因爲他確信那時雪萊與克萊爾沒有發生過性關係，但拜倫相信當瑪麗不在家的時候，他們會不時重溫舊情，艾琳娜就是其結果。雪萊的辯護者們還有種種其他的解釋，但是克萊爾和雪萊是那孩子的母親和父親的答案最具可能性。瑪麗被這件事壓垮了——她從來沒有喜歡過克萊爾，甚至反對她繼續在他們家中出現。如果這嬰兒仍同他們在一道，克萊爾就成了這個家庭中的永久成員，她同雪萊的私通可能恢復。爲了回應瑪麗的憂傷，雪萊決定拋棄這個嬰兒，以他的英雄盧梭爲榜樣，借用孤兒院。一八二〇年，這孩子才十八個月就死在那裡，並不令人奇怪。第二年，雪萊爲了對賀普納和其他人的批評表示不屑理睬，他在給瑪麗的一封信中，用一句毫不帶感情的話總結了這件事，也透露出他的內心世界：「除了我們自己的知覺以外，對任何事或人的意見——這本來完全應當注意的——我很快又變得漠不關心了。」

混亂的金錢與性關係

那麼，雪萊是在亂交嗎？他與拜倫確實不可相提並論。拜倫在一八一八年九月宣稱，在兩年半的時間裡，他在威尼斯女人身上花了兩千五百英鎊以上，睡過「至少兩百個各種各樣的人——也許更多」；後來他又列舉了他的情婦中二十四個人的姓名。另一方面，拜倫在某些方面比雪萊有一種

更好的榮譽感，他從不躲躲閃閃或欺騙哄人，雪萊曾寫信給兩性關係的改革家和女權主義者勞倫斯（J. H. Lawrence）說：「如果我被指控犯下什麼巨大的、破壞性的罪惡，我會發抖的，那就是誘姦。」這只是理論而非他的實踐。除了說過的這些事外，雪萊還跟一位出身上層的義大利女子維維安尼有過一段情。他把有關她的一切都告訴了拜倫，但又補充說：「我告訴你的這些請什麼也不要說，因為這一切未為人知，瑪麗也許會爲此而十分生氣。」似乎雪萊所希望的，是有女子提供他穩固而舒適的生活，又允許他附帶進行一些私通作爲回報，他也允許（原則上在任何情況下）他妻子有同樣的自由。我們將會看到，這樣的安排，成爲主要的男性知識分子不斷出現的目標。但這種目標從來不能實行，在雪萊那裡就確實行不通，他自己所獲得的自由，首先爲哈麗艾特、後來爲瑪麗帶來了極度痛苦；她們完全不需要相應的自由。

雪萊顯然常常同他的激進派朋友亨特討論這類觀點，畫家海頓（Benjamin Robert Haydon）曾記載：雪萊「向亨特夫人及其他在場的婦女滔滔不絕地談論……貞操的邪惡和荒謬」。在談論中，亨特的話使海頓大吃一驚，「如果他同意，任何年輕人同他妻子睡覺，他都不會介意」，海頓又寫道：「雪萊勇敢地以自己的原則行事——亨特爲這些原則辯護，雖然沒有精力去實行，但滿足於私下的愛撫。」這些女子是怎麼想的，並沒有記錄。當雪萊告訴哈麗艾特，她可以同他的朋友豪格睡覺，被她斷然拒絕了；雪萊又向瑪麗提供了同樣的便利，她似乎同意了，但最後的決定是她不喜歡這個男人。現存的證據表明，雪萊本人性愛自由的實驗，只是跟那些最普通的姦夫一樣偷偷摸摸、見不得人，而且把他捲入了難免的遮掩和撒謊的紛擾之中。

同樣的故事也見之於他對錢財的處理方式，由於複雜，說來費力，我在這裡只是簡單說一下。在理論上，雪萊完全不承認私有財產，更不用說繼承權，以及他自己從中得到好處的長子繼承權了。在《改革的哲學觀》一書中，他宣布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原則：「財產的平等必然是文明不斷完善的最後結果，這也是社會制度走向完善的條件之一，無論最後成功的希望有多少，我們有責任去關注它。」但同時，對那些具有特權、但是開明的人士，就如他本人，也必須牢牢掌握他們所繼承的財富，以便推進這一事業。在富有的、激進的知識分子當中，這種說法已為人們所熟悉，幾乎是普遍地用來證明自己的正義性，雪萊就是利用這種說法，從他父親家盡量榨錢。對他來說，不幸的是，他在給自己的導師葛德文的第一封信裡，就驕傲地自我介紹：「我是索塞克斯一個有錢人的兒子……我是透過限定繼承權，每年六千英鎊財富的繼承人。」對這段話，葛德文必定是豎著耳朵聽的。葛德文不僅是激進派的主要哲學家，而且是財務方面天生的糊塗蟲，也是從未有過的、最無恥的金錢騙子之一。從各種各樣好心的朋友那裡弄來的、真讓人吃驚的大筆錢財，在他那糾纏不清的重重債務中消失了，什麼痕跡也沒有留下。他抓住了當時還很年輕無知的雪萊，就再也不放過他了。他不但拿走雪萊家中的錢，而且用十九世紀初期債務人的一切下流伎倆把他徹底拖垮：過期未付的債券、打折的證券，還有臭名昭著的「死後清還契約」，即某一定財產的年輕繼承人，在他們的父親死亡之前，大大地提高折扣數目，以高利率借款。雪萊採取了所有這些災難性的步驟，把利率抬得極高，直接落進葛德文的財務黑洞。

葛德文從來沒有還過一個便士，這似乎也沒有給他的貧困家庭帶來過任何益處。雪萊終於對這

條寄生蟲發火了，他寫信說：「我在幾年之中給你的錢已經達到了一個很大的數目，爲了籌措這筆錢，我又花了差不多四倍的款項，已經讓我一貧如洗。這種交易雖然不是你情我願，但除此以外，這些錢並沒有給你帶來任何的好處，像是被扔進了大海。」錢的損失還不是雪萊同葛德文交往中所受到的唯一傷害，哈麗艾特明確地發現，這位大哲學家用各種方法使她的丈夫變得粗俗冷酷，特別是在對錢的態度上。她說雪萊爲了瑪麗而拋棄她以後，有次去看她，這時瑪麗的孩子威廉已經出世，「他說他很高興這是個男孩，因爲這樣弄錢方便而且正當些。」他的意思是說，他可用較低的利率以「死後清還契約」來借款了，說這種話的不是一位二十二歲的詩人——理想主義者——而是一個耍弄花招的長期欠債人。

葛德文並不是雪萊生活中唯一的吸血鬼，還有另一個始終向他討錢的知識分子亨特。四分之一世紀以後，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對《愛丁堡評論》的編輯納皮埃這樣概括亨特：他給亨特回信時，「並不是不害怕成爲許多這樣的人中的一個；任何時候當他需要時，就去向他們借二十英鎊。」實際上，亨特已經被寫成了狄更斯小說《荒涼山莊》中的斯金坡爾而流傳千古了，狄更斯對一位朋友承認：「我想他是一切文字的圖畫中最精確的一幅肖像……他絕對是一個真實人物的重現。」在雪萊生前，亨特剛開始他漫長的借貸生涯，他向盧梭效法，勸告他的犧牲品，他從他們的慷慨中得到好處是給他們幫忙。雪萊死了以後，亨特就轉向了拜倫，拜倫後來明確地免除了亨特欠他的債務。拜倫認爲亨特在掠奪雪萊，其實，亨特做的某些事比這更壞，他勸誘雪萊說，對他們這樣具有先進思想的人來說，還清欠債在道德上是不必要的，爲人類而工作這本身就夠

了。

這樣，雪萊這位信奉真理和美德的人，變得終身都在躲避債務，成了騙子。他到處借錢，向各種各樣的人借錢，多數從來沒有還過。雪萊無論什麼時候搬家，通常都是匆匆忙忙的，丟在後面的是曾經信任過他、後來對他非常氣憤的一群人。年輕的希萊並不是雪萊欺騙過的唯一愛爾蘭人，他顯然還向勞來斯借過一大筆錢，這是一位共和主義的編輯，他們在都柏林成了朋友。雪萊離開以後，他無法還清這筆款項，就非常焦急地寫信給豪格打聽雪萊的行蹤，不久以後他就因欠債被捕。雪萊不但沒有打算還他的債，好讓他從監獄中放出來，反而責罵抱怨他，他給他們在都柏林的共同朋友紐金特寫信說：「我擔心他欺騙了你，正如他欺騙了我一樣。」更惡劣的是，雪萊在林茅斯用他的名字（「尊敬的勞來斯先生」）簽了一張借據，這是偽造罪，可以判處死刑的。

雪萊在威爾斯逗留時欺騙了另外一些人。他一八一二年到了那裡，租下一個農莊，僱用了一些僕人，但他很快就因為六十至七十英鎊的債務在卡爾那溫（Caernarvon）被捕了，他在威爾斯的投資保證人威廉斯和鄉村醫生羅伯茨博士，把雪萊保釋了出來，債務和費用則是由倫敦的一位律師拜德威爾支付的。這三人都將為他們的大方感到後悔。三十多年後的一八四四年，羅伯茨博士仍然企圖從雪萊的財產中收回這位詩人欠他的三十英鎊。拜德威爾同樣是徒勞地想要回他的錢。一年後，雪萊寫信給威廉斯說：「我從拜德威爾先生那裡收到一封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專橫的來信，對此，我以不可屈服的精神予以答覆。」雪萊喜歡唱高調。威廉斯的兄弟歐文是農場主人，他借給雪萊一百英鎊，我們看到雪萊給威廉斯的信，要求歐文再提供二十五英鎊，並且說：「我將從你對這一要

求的依從得知，朋友不在身邊是不是友誼的冷卻劑。」下一年，雪萊爲欠威廉斯的這筆錢進行了一場糾纏不清的反控，兩人的關係破裂了。無論威廉斯還是歐文都沒有收回任何欠款；然而雪萊對任何一個欠他錢的人（葛德文和亨特除外），都是非常凶狠且大義凜然。另一位威爾斯人伊萬斯收到過兩封討債信，雪萊提醒他，他欠雪萊的錢：「對任何人來說，信用借款都是最緊迫的事，必然要盡快歸還，你會爲淡忘和拖欠而感到悔恨。」

雪萊說的信用借款究竟指什麼，還不清楚。他在向婦女借錢的時候也並不遲疑，包括洗衣婦、打雜女工、林茅斯的女房東（她最後非常聰明地扣住雪萊的書，從欠她的三十英鎊中要回二十英鎊），以及他的義大利朋友維維安尼（從她那裡借到兩百二十克郎）。他欠各種商人的錢，比如說，一八一七年四月，他和亨特同意付款給一位叫克爾克曼的人，要跟他買鋼琴，鋼琴及時送來了，但是到四年以後錢還沒付。同樣地，雪萊說動了朋德街著名的馬車製造商查特爾給他造一輛好車，價值五百三十二英鎊十一先令六便士，雪萊至死都在用這輛車，查特爾最後把這位詩人送上了法庭，但是到了一八四〇年代他還在試圖收回車錢。受到雪萊特別剝削的一伙人，是賒帳出版他詩集的小印書商。開始，雪萊向牛津的書商斯拉特借二十英鎊，這時雪萊被開除了，斯拉特顯然喜歡他，急於把他從貪得無厭的放債人那裡救出來，結果雪萊卻把他捲入更耗費驚人的困境。一八三一年，斯拉特的鉛管工兄弟寫信給提莫西爵士說：「爲了使你的兒子不必去找猶太人借高利貸，我如此正直的努力卻造成巨大的災難……我們已經損失一千三百英鎊以上。」他們終於因債務而被逮捕，欠款似乎始終沒有得到償還。出版《阿拉斯特》的韋布里吉（Weybridge）的印刷商，直到四年半以後還

在催促雪萊付款，無法證明他最終是否收到了欠款。對第三位書商，雪萊寫信給他說：「如果你供書給我，我答應給你『死後清還』的債券比例是，每提供價值一百英鎊的書，我付兩百五十英鎊。」他告訴書商，他父親和祖父的年齡分別是六十三和八十五歲，但實際上是六十一和八十三歲。第四位書商兼出版商霍克漢姆（Thomas Hookham）不僅賒貸給雪萊印刷《仙后麥布》，而且還借錢給他。霍克漢姆也是沒有得到償還的，而且因為犯了同情哈麗艾特的罪，成為被雪萊痛恨的對象，雪萊在一八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給瑪麗的信中寫道：「如果妳見到霍克漢姆，不要公開侮辱他，我還抱有希望……我要讓這個無情無義的惡棍悔恨不已——終身悔恨，他會不得好死，他的傲慢會被打得粉碎，我要一點一點地扼殺他那自私的靈魂。」

讓他成爲一個普通人

雪萊在性關係和財務問題上的不端，以及同父親、母親、妻子、孩子、朋友、同伴和商人的關係，所有這些問題的公分母是什麼？除了自己，他沒有能力看到別人的觀點，簡言之是想像力的缺乏。這是非常奇怪的，因為想像在他的政治復興理論的核心，按照雪萊的說法，需要用想像或「智力的美」來改造世界；正是因為詩人在最高水平上具有這種品質，因為詩人的想像力在全人類中最具有價值、最富創造性，所以他才把詩人稱作世界自然的立法者，儘管沒有被承認。然而他就是這樣一個詩人，而且是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也許他能夠想像性地同情整個階級、被奴役的農業勞動

者、路德派成員（Luddites，譯註：十九世紀初發生英國工人搗毀機器的運動，被稱為路德運動，這些工人被稱為路德派）、彼得盧（Peterloo，譯註：一八一九年八月十六日，英國八萬多工人在曼徹斯特郊外聖彼得廣場發生騷亂，當局進行鎮壓，十一人死亡，四百餘人受傷。一些人套用英法滑鐵盧大戰稱這次事件為『彼得盧』）的叛亂者、工廠工人，他卻從來沒有正眼看人；他能夠抽象地感受整個人類的苦難，然而，不只一次，甚至幾百次可以證明，他不可能透過想像，深入到所有同他日常交往的那些人的頭腦和心靈之中。從書商到從男爵、從女僕到情婦，雪萊完全不能看到他們有權採取同他自己不同的觀點。對他們（對他的）不肯讓步，他就轉而辱罵。雪萊一八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寫給威廉斯的一封信，就把他想像力的局限完全概括出來，信的開頭是對不幸的拜德威爾的文字攻擊；接著是對更加不幸的希欽納小姐的猛烈抨擊（「一個具有極端的觀點和可怕的熱情，而又是冷酷地、堅定不移地進行報復的女人……對她落入磨難，我由衷感到高興」）；這封信以對人類的誓言結束——「我準備為我的國家和朋友做任何事，為他們服務」；最後是「其中也包括你，我仍然是你親愛的朋友」。就是這位威廉斯正在受他的騙，很快就成為另一個吃足苦頭的債權人。

雪萊運用他所具有的卓絕詩才，一生致力於政治的進步，他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在想像力上的欠缺，也沒有努力去改善，或去了解他希望幫助的那些人的實際情況。他甚至在把腳踏進愛爾蘭之前就寫好了《告愛爾蘭人民書》，到了那裡以後，他也從來沒有帶著同情試圖去調查情況，了解愛爾蘭人實際的需要；他甚至秘密計畫消滅他們所信奉的宗教。對於英國的政治和公眾的意見，對於滑鐵盧戰役之後政府所面臨的問題的危險性，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貞誠的努力，雪萊同樣一無所知。他

自己也從來沒有通過正如他說的、必不可少的那種想像性的深入探索，去增加這方面的了解，或者公正對待卡色爾瑞和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那樣有著良好誠意又敏感的人物。相反地，他在《暴政的假面遊行》裡辱罵他們，正如他在信中辱罵他的債權人和被他拋棄的女人們。

雪萊顯然想進行一場徹底的社會政治改革，包括消滅組織化的宗教。但是如何達到這一目標他並不清楚，有時他宣揚非暴力，有人把他看成非暴力抵抗運動真正的第一位佈道者、甘地的先驅。他在《告愛爾蘭人民書》裡寫道：「同武力或暴力不發生任何關係。以暴力為目的的同盟必然遭到真正的革新者最強烈的批評！……一切秘密的同盟也是不好的。」但雪萊有時也試圖組織秘密團體，他的某些詩只有看成是在激發直接行動時才能讀得懂。《暴政的假面遊行》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三四〇至三四四行的那一節支持非暴力，但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節，是以「你們人多，他們是少數」結束的，並且被重複（第二部，一五一至一五四行、二六九至二七二行），這是在呼籲起義。拜倫和雪萊是一樣的叛逆者，但拜倫更是行動家而非知識分子——他完全不相信那種一廂情願的社會改造——對於雪萊的烏托邦，他持非常懷疑的態度，雪萊的優秀詩作《朱利安和馬達羅》記錄了他們兩人在威尼斯的長時間談話，馬達羅（拜倫）如此說雪萊的政治方案，「在我看來，就文字而論／你的體系也許無懈可擊」，但認為實際上「這種宏大的理論」不過是「徒然」。

在這首寫於一八一八至一九年的詩中，雪萊承認了拜倫的批評，這一事實標示雪萊對粗糙的政治教義的遲疑。雪萊接近拜倫時極其謙遜：「我對同拜倫勳爵競爭毫無信心，可以說，其他也沒有任何人是值得去競爭的……他的每一個字都打上了不朽的印記。」有一階段，拜倫的力量幾乎使他

感到氣餒，比如他曾這樣說：「太陽使螢火蟲黯然失色。」確實可以看到，拜倫對雪萊的影響是在幫助他成熟。但是拜倫開始發現自己的角色是被壓迫人民——先是義大利人，然後是希臘人——的組織者，雪萊不同，他開始轉變為反對任何直接的行動。非常有意思的是，雪萊在他生命的末期，開始對盧梭採取了批判的態度，把他同法國革命的恐怖暴行連在一起。在雪萊未完成的詩《生命的勝利》中，盧梭是以維吉爾式（Virgilian）的敘述人物出現的，是煉獄中的一個囚徒，因為他犯了錯誤，相信理想可以在生活中實現，詩在這裡中斷了，但是，完全不清楚的是，雪萊是否由此拋棄了實際的政治，而集中於想像的、純粹的理想主義。

在雪萊死前的幾個月中，確實沒有證據表明他的性格有什麼根本的變化，克萊爾活到八十多歲，變成了一個明白事理的女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由此獲得了寫作《阿斯朋信件》的靈感）（譯註：《阿斯朋信件》敘述一位美國記者爲了獲得詩人阿斯朋寫給情婦的信件而使用種種伎倆，但最後仍遭失敗。阿斯朋和他的情婦分別影射雪萊和克萊爾），她在這些事發生了六十年後寫道：「哈麗艾特的自殺對雪萊產生了正面的影響——他遠不是那麼自信了，也不像過去那麼野性了。」雖然克萊爾是在那麼多年以後用望遠鏡來觀察，但她說的也許是相當真實的。雪萊確實不再那麼極端地以自我爲中心了，但這種變化是逐步的，他至死也絕沒有完成。一八二二年，雪萊和拜倫兩人都曾建造自己的船，即「唐璜號」和「博利瓦號」。雪萊對航行特別迷戀，爲了這個目的，他堅持要在斯佩吉亞（Spezia）海灣的勒瑞齊（Lerici）租房度過夏天。瑪麗又懷孕了，她極不願意去，主要因爲那裡太熱，他們兩人逐步分離了，瑪麗的幻想破滅，厭倦了他們不自然的流放生活。此外，還出現了一

種新的危機。雪萊航行的伙伴是愛德華，他是東印度公司的半薪上尉，雪萊對愛德華還沒正式結婚的美麗妻子珍妮越來越感興趣，珍妮是個音樂家，善於彈奏吉他和唱歌（一如克萊爾），正是雪萊喜歡的型，他們在夏天的月光下舉行了音樂會，雪萊寫了幾首關於珍妮的詩並送給了她。瑪麗被取代了嗎？正如她曾經取代了哈麗艾特？

六月十六日，正如瑪麗所擔心的，她流產了，再次陷入絕望之中。兩天之後，雪萊寫了一封信，清楚地表明他們的婚姻實際上走到了盡頭：「我只是覺得我需要那種能夠知道我的感情及理解我的人……瑪麗做不到。一定要對她隱瞞這種使她痛苦的事，這也許是必要的。這正是坦塔羅斯（Tantalus）的災難（譯註：在希臘神話中，坦塔羅斯國王被主神宙斯懲罰站在冥河中，他饑餓欲食時，頭頂的果枝就盪開；口渴欲飲時，腰下的水流就退去），她具有如此出色的能力和純潔的心靈，卻甘於家庭生活，必然是不會得到同情的。」雪萊還寫道：「我越來越喜歡珍妮……她對音樂的體會，她外貌和舉止的優雅，多少彌補了她文學情趣的缺乏。」到月底，瑪麗發現，她的地位、酷暑和這房子，都是難以忍受的了，她寫道：「我希望能打斷我身上的鎖鏈，離開這個地牢。」

瑪麗以悲劇的、料想不到的形式獲得了自己的解放。雪萊一直迷戀於速度，如果他出生在二十世紀，也許會獻身於賽車甚至飛行，他的詩《阿特拉斯的女巫》讚美了穿越空間旅行的快樂。他的船唐璜號是爲了追求速度而建造的，雪萊還把它改造得速度更快，船身二十四呎長，但有兩根主桅，並配備了縱帆船，他和愛德華還給它裝上了新的全套中桅帆，還惹人注目地增加了帆的面積，進一步提高速度，拜倫的造船工程師根據雪萊的要求，又造了隱帆、副船尾和副船首。這樣它就成

了一艘速度很快、也很危險的船，航行起來「如同女巫」，在天氣惡劣的時候，它可以升起三張大三角帆和一張風暴帆，高出水面三吋。雪萊和愛德華乘著這艘改裝過的船，從利佛諾駛往勒瑞齊。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下午，他們在不斷變壞的天氣裡出發，掛了滿帆。在六點三十分暴風雨來的時候，本地的義大利船隻都匆匆返回港口，其中一艘船上的船長說，他看到雪萊的船在巨浪中還掛著滿帆；船長請他們到他船上來，或者至少把帆收下來，「不然，你們會出事的。」但是兩人中的一個（可能是雪萊）喊道：「不！」他抓住同伴的手臂，不准他收帆，「似乎發怒了。」唐璜號在離開海岸十哩的地方沉沒了，仍然掛著滿帆；兩人都溺死。

在這之前一年，濟慈在羅馬死於結核病；兩年後，拜倫在希臘被他的醫生放血致死。英國文學史上一個短暫而輝煌的時期結束了。瑪麗帶著小珀西這位未來的從男爵（查爾斯已死）回到倫敦，開始耐心地為雪萊建造一座神話般的紀念碑，但是傷疤仍然存在，她看到了知識分子生活底下的一面，也感受到了理念的殺傷力。當一位朋友看著珀西學著讀書的樣子時說：「我確信，他會成長為一個不平凡的人。」瑪麗·雪萊發怒了，她十分生氣地說：「我請求上帝，讓他成爲一個普通人。」

3 馬克思——披上科學外衣的詩人革命家

科學的面具

馬克思 (Karl Marx, 一八一八—一八三三) 對現實事件、人類心靈所產生的衝擊，比任何一位現代知識分子都要來得大。之所以如此，最主要並不是因為他的思想概念與方法論吸引人——儘管他在這兩方面確實對不夠嚴謹的心靈有強烈的感染力——而是因為他的哲學已經在全球兩個最大的國家（俄國與中國）及其眾多衛星國，落實為實際的制度。就此而言，他可堪比擬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從五世紀到十三世紀，教會領導人最常閱讀的就是聖奧古斯丁的著作，他的思想也而在中世紀基督教世界的形成過程中占有主導地位。但馬克思的影響力更為直接，因為他想像自己所應擁有的那種個人獨裁（底下將會討論這一點），由他三個最重要的門徒——列寧、史達林與毛澤東——付諸實現，並給人類帶來難以衡量的後果。就此而言，這三人可說是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是他那個時代、十九世紀中葉的產物，而馬克思主義則是典型的十九世紀哲學，其特徵

就在於宣稱自己是科學的。「科學的」，是馬克思最強烈的讚美詞，他慣用這個詞來區分自己與其眾多敵對者：他與他的作品是「科學的」，他的敵對者則否；他覺得已經找到一種類似達爾文演化論的科學方法，可以解釋歷史上的人類行爲；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而且歷來的其他哲學都不是科學，也不可能有其他哲學會是科學——這個觀念深植於他的門徒所建立的國家官方教條中，因而左右了這些國家的學校與大學所有學科的教學。這種情形還擴及非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因爲知識分子，特別是學者，爲權力所蠱惑，而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力則誘使許多教學者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納入他們自己的學科領域，特別是不精確或看似精確的學科，像是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與地理學。如果一九四一到四五年中歐與東歐爭奪戰中獲勝的是希特勒，而非史達林，而且希特勒把他的意志加諸世界上的廣大地區，那麼毫無疑問地，同樣宣稱科學的納粹教條，譬如其種族理論，將被賦予學術的假面具，滲透到世界各地的大學之中。但軍事上的勝利讓馬克思主義者占了上風，而不是納粹。

他其實是個詩人

因此，關於馬克思，我們必須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在何種意義上，他算是一位科學家？——如果他是的話。也就是說，在謹慎搜尋並評估證據以追求客觀知識這一點上，他投入了多少努力？根據他的傳記所揭露的，顯然馬克思主要還是一個學究型的學者，而且有兩方面的學究血統。他的律師

父親海因利希，原本叫做希爾謝·哈列維·馬克思，是猶太教士之子；這位教士同時也是猶太教典學者，是梅因茲（Mainz）著名猶太教士哈列維的後裔；哈列維之子敏茲是帕都亞的猶太教典學校負責人。馬克思的母親普列思博克同樣是著名學者與賢人後裔的拉比之女。馬克思是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於特利爾（Trier，當時是普魯士領地），家裡有九個孩子，但他是唯一活過中年的兒子，姐妹們分別嫁給工程師、書商、律師。這是個正在發跡的典型中產階級家庭，馬克思的父親是個自由主義者，被描述為「一個真正的十八世紀法國人，非常熟悉伏爾泰與盧梭」。一八一六年，普魯士頒布命令，禁止猶太人在法界與醫界中擔任高階職位，海因利希遵守這個命令而成爲新教徒，並在一八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讓他的六個孩子受洗。馬克思在十五歲接受堅信禮，有一段時間似乎是個狂熱的基督徒。他就讀於一所原屬耶穌會、後來脫離教會的高中，畢業後進入波昂大學，接著又轉到柏林大學，這是當時全世界最好的大學。他從未接受過任何猶太教育，也無此打算，而且不曾顯示出對猶太訴求有任何的興趣。不過，我們必須說，馬克思發展出某種學究類型的性格特徵，特別是猶太教典式的性格：他習於大量蒐羅雷同的材料，並策劃永遠不會完成的百科全書式著作；對所有非學究型人物表現得尖刻輕蔑；與其他學者應對時極端武斷且易怒。的確，可以說馬克思所有的作品都有著猶太教典研究的印記：他的作品根本就是在評註與批判他那個領域裡的其他作品。

馬克思成爲一位古典學者，後來更專注於當時所流行的黑格爾式哲學。他取得了博士學位，但卻是在標準較柏林大學爲低的耶拿大學，且其表現似乎從未好到足以在學院裡得到一個職位。一八四二年，他擔任《萊茵報》記者，並編了五個月的報，直到該報在一八四三年被禁；之後他在巴黎

爲《德法年鑑》及其他期刊撰稿，直到一八四五年被驅逐出境；接著他又到了布魯塞爾，參與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並在一八四八年爲該組織撰寫宣言（亦即著名的《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他被迫遷徙，落腳於倫敦，這次是永久定居於此了。在一八六〇與七〇年代，有幾年的時間，他又投入革命政治，發起國際工人協會（譯註：又稱第一國際，一八六四年創立於倫敦）。不過，他大多數時間都待在倫敦，直到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去世，這三十四年間，他都在大英博物館裡爲一部大部頭的資本研究著作找材料，並嘗試使其出版。一八六七年，他親眼看到第一卷付梓，但第二及第三卷是由他的伙伴恩格斯根據他的筆記編纂，在他死後出版。

在那個時期，馬克思過的是一種學者生涯。他曾經抱怨道：「我是一部被迫要狼吞書本的機器。」但在更深層的意義上，他並不是真正的學者，而且根本就不是科學家。他的興趣不在於尋找真理，而在於宣揚真理。馬克思有三種分身：詩人、記者與道德家，每一種都很重要。三者加在一起，再結合無比的意志力，使他成爲一個傑出的作家與觀察家。但他身上沒有什麼可稱爲科學之物，在所有重要的關節上，他其實是反科學的。

馬克思的詩人身份比一般所認爲的更具重要性，儘管他的詩意想像很快就被吸收到他的政治幻想中。馬克思還是個小男孩時就開始寫詩，主要環繞著兩大主題：其一是他對鄰居女孩燕妮的愛，他在一八四一年娶了這個兼具普魯士與蘇格蘭血統的女孩；其二是世界的毀滅。他寫了許多詩，其中三卷手稿送給了燕妮，並傳給他們的女兒蘿拉；一九一一年蘿拉死後，這些詩稿就不知去向。但還是有四十篇詩作留存下來，包括一部悲劇詩篇《奧蘭寧》，馬克思許之爲他那個時代的《浮士

德》。有兩篇詩作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發表於柏林一份名為《雅典娜》的刊物上，題為《野蠻人之歌》；野蠻是他的詩篇中常見的調子，加上對於人類處境強烈的悲觀、憎恨、墮落與暴力的迷惑、相約自殺、與惡魔的約定等。「我們受縛、破碎、空虛、害怕／永遠被鏈鎖在大理石般冷冽的存有上，」年輕的馬克思寫道：「……我們是冷酷上帝參養的人猿。」他讓自己以上帝的位格說出「我將對人類吼出巨大的咒詛」，而詩作外表下所蘊含的概念是：有一個普遍性的世界危機正逐漸形成。他喜歡引用歌德作品《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的對白：「一切存在之物皆當消亡」，譬如在反對拿破崙三世的小冊子《霧月十八日》中就用上這句話，且終其一生都懷有這種既存體系即將遭受巨大災難的末日幻想。這種幻想出現在詩作中，作為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的背景，而且還是《資本論》的高潮所在。

簡言之，馬克思自始至終都是一位末世論作家。著名的例子像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原始手稿中，有一個段落令人想起馬克思的詩作，主題是關於「末日審判」：「當城市燃燒的火光映照於天空……當『天國和諧曲』在如雷砲聲的伴奏下，響起《馬賽曲》與《卡曼紐》的旋律（譯註：這兩首都 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流行的革命歌曲），當斷頭台打起拍子、激昂的群眾尖叫著『大事必成、大事必成』（譯註：這也是法國大革命時期革命歌曲中的歌詞），而自我意識被吊上了燈柱（譯註：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革命群眾視巴黎的路燈為政府的象徵物，搗毀路燈並把被他們殺害的人吊在燈柱上）。」後來在《共產黨宣言》裡又出現《奧蘭寧》的回聲，無產階級披上了英雄的斗篷。在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四日的可怕演說「歷史就是審判官，而無產階級就是執刑者」中，馬克思詩作裡的末日論調再次爆發：恐

怖、刻上紅色十字的房子、災難的隱喻、地震、地殼崩裂時噴出的岩漿。重點是，馬克思的最後審判日概念，不管是陰森可怖的詩詞渲染或日後的經濟學說法，都只是藝術的幻想而非科學的見解。這個概念一直在馬克思心中，當他成爲政治經濟學家時，他以之爲起點倒推回溯，尋找使之必然成立的證據，而不是從客觀檢視過的資料裡推論出這個概念。馬克思的歷史預測之所以如此戲劇性、對那些相信資本主義之滅亡與審判即將到來的激進讀者們有這麼大吸引力，當然是詩意元素使然。詩人的天賦不時在馬克思的文章中顯現，留下一些令人難忘的章節。就此而論，馬克思憑藉的是直覺，而非推理或計算的能力，他終究是個詩人。

但他也是個記者，從某方面來看，他還是個好記者呢。馬克思發現，策劃一本大部頭的書，不只是困難，根本就是不可能，更別提撰寫了，連《資本論》都是把一系列文章兜湊而成，並無任何真正的形式。但他很適合針對剛發生的事件寫出短而犀利、代表個人意見的文章。他相信社會正瀕臨崩潰的邊緣，因爲他的詩意想象是這麼告訴他。所以，幾乎每一件大新聞，他都可以牽連到此一普遍性原則上，這使得他的新聞寫作具有顯著的一致性。一八五一年八月，有一個追隨過老一輩社會主義者歐文（Robert Owen）的人，叫做達那，現在是《紐約論壇報》資深主管，他請馬克思擔任該報的歐洲政治新聞記者，以一篇一英鎊的代價每週寫兩篇稿子。在接下去的十年間，馬克思寫了將近五百篇稿，其中有大約一百二十五篇是由恩格斯捉刀。這些稿件在紐約還要經過審訂與大幅修改，但其中強而有力的論證完全是馬克思的，這也是這些文章的力量所在。事實上，他最大的天賦就是做一個評論記者。他對雋語格言的運用十分精彩，但多不是他自己發明。馬拉（Jean Paul

Marat，譯註：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領導人之一）想出「工人無祖國」與「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他們的鎖鏈」；關於布爾喬亞階級穿的衣服背面繡有封建紋章這個著名笑話，出自海涅（Heinrich Heine），「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也是；布朗（Louis Blanc）提供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出自沙佩爾（Karl Schapper）的是「各國工人，聯合起來！」；而出自布朗基（Auguste Blanqui）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但馬克思也能想出他自己的：「德國人在政治上考慮過的，正是其他國家做過的事情。」「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陽，人繞著它轉，直到他開始繞著自己轉。」「資產階級的婚姻實際上是共妻制。」「革命的大無畏精神，敢於向他的敵人叫囂這樣的話：『我算不了什麼，但我必須主宰一切。』」「統治階級的觀念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觀念。」他甚至還有一種罕見的天賦，能在論證中的正確時機、以極具破壞力的組合，凸顯別人的話並善加利用。至今不曾有任何政論寫手超越《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三句話：「工人失去的只是他們的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正是馬克思對於有力短句的新聞眼光，挽救他的哲學免於被遺忘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裡。

失敗的學者

如果詩提供了影像，新聞雋語為馬克思的著作打光，那麼學術名詞就是它的壓艙石。馬克思是個學者，或是更糟，他是個失敗的學者。心懷怨憤、想當教授沒當成的馬克思，打算創建新的哲學

學派，好讓世人大吃一驚，這個學派同時也是一項行動計畫，目的是要讓他掌握權力。因此，他對黑格爾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第二版序中說道：「我坦承自己是那位大思想家的門徒」，而且《資本論》裡「在討論價值理論時，賣弄起黑格爾式術語」。但他說，他自己的「辯證方法」與黑格爾的「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者，但「另一方面，就我的看法，觀念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其中被改造過的物質事物而已」。因此，他主張「在黑格爾的著作中，辯證法是倒立的。如果你們想要發現隱藏在神秘包裝之內的合理內核，就必須把它再轉正朝上。」

當時，馬克思想以這項發現獲取學術名聲，他自認為黑格爾方法的這項致命缺陷是他的驚人發現，使他能夠以新的哲學取代整個黑格爾體系。的確，這是一種將使一切既有哲學過時的超哲學，但他仍然接受黑格爾辯證法是「人類理解之鑰」，不僅加以使用，而且終其一生都無法掙脫。因為辯證法及其「矛盾」解釋了不斷升高的普遍性危機，這是源自他青少年時期的詩意幻想。他在邁向生命終點時寫道（一八七三年一月十四日），商業循環表現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且將產生「這些循環的頂點，亦即一次普遍危機」，以至於「把辯證法灌進」「新的德意志帝國暴發戶們」頭腦裡去。

這一切與現實世界的政治、經濟有任何的關係嗎？一點關係也沒有。正如馬克思的哲學起源於詩意的幻想，其哲學的闡釋也只是搬弄學術術語而已。但要啓動馬克思的知性機制，需要的是一種道德衝動。他在對高利貸與放債者的憎恨中找到這種道德衝動，此一強烈情緒與他自己的財務困難

有直接關連（底下我們會談到這一點）。在他最早的一些嚴肅著作中，如一八四四年發表於《德法年鑑》的〈論猶太人問題〉兩篇，可以找到這種情緒的表現。黑格爾的門徒全都反猶，只是程度各有不同；一八四三年，鮑爾（Bruno Bauer）這位黑格爾左派中的反猶領導人物，發表一篇文章要求猶太人徹底放棄猶太教。馬克思的〈論猶太人問題〉就是對這篇文章的回應。他並不反對鮑爾的反猶立場，事實上他同樣反猶並為之背書，還引用其說法以示贊同，但他不同意鮑爾的解決辦法。鮑爾相信，猶太人的反社會本性源自其宗教，可藉由撕裂猶太人與其信仰間的連帶而加以治癒，馬克思對此加以反駁。依馬克思的看法，猶太人問題是一種社會與經濟之惡，他寫道：「我們來觀察一下現實的猶太人。不是安息日的猶太人……而是平素的猶太人。」他問道：「猶太教的世俗基礎是什麼呢？實際的需要、自私自利。猶太人的世俗崇拜是什麼呢？做生意。他的世俗上帝是什麼呢？金錢。」猶太人已經逐步把這種「實際的」宗教散布到全社會：

錢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此外別無他神可以存在。錢貶抑人類的眾神，並把眾神都變成商品。錢是一切事物自足的價值。因此它剝奪了整個世界本有的價值，包括人類世界和自然界。錢是人類勞動與存在的異化本質：這個本質支配人類，人類卻向它膜拜。猶太人的神已經世俗化，成為世界的神。

猶太人已經腐化了基督徒，令基督徒相信「他們除了比自己鄰居富有外，在人世間沒有別的使

命」，而「整個大地都是交易所」，政治權力則已成了金權的「奴隸」，因此，解決之道在於經濟。「拜金猶太人」已經成了「現代的一般性反社會因素」，而要「使猶太人不可能產生」，就必須消除製造猶太人金錢活動的「前提」、「可能性」。消除了猶太人對金錢的態度，則猶太人及其宗教，還有猶太人加諸世界的腐化基督教義，都會一起消失：「只有將自身從做生意和金錢解放出來，因而也是從現實的、實際的猶太教解放出來，我們的時代才能自我解放。」

至此，關於世界出了什麼差錯，馬克思的說法是學生酒館裡的反猶主義加盧梭的綜合體。在之後的三年裡，亦即一八四四到四六年，他擴展這套說法而成其成熟期的哲學；在這段期間，他認定社會的邪惡元素、他所反抗的高利貸金權，不只是猶太人，而是整個布爾喬亞階級。爲了確認這一點，他巧妙地運用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一邊是金權、財富、資本，也就是布爾喬亞的工具，另一邊則是新的救贖力量：無產階級。這番論證是以嚴格的黑格爾學派用語來表達，把德國哲學術語的可觀資源全都用上，儘管其背後顯然是道德性衝動，而最終的想像（末日危機）依然是詩意的。因此，革命即將到來，在德國，這將是哲學性的：「一個若不從其他一切領域解放出來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領域，簡言之，這個領域就是人的完全喪失，只有通過人的完全救贖才能救贖自身。這個社會解體的結果，作爲一個特定階級來說，就是無產階級。」馬克思似乎是在說，無產階級，這個不是階級的階級、這個階級性與各階級的溶劑，是一種沒有歷史的救贖力量，無視於歷史定律且最後要終結歷史——奇怪的是，這種說法本身是一種非常猶太式的概念，無產階級成了彌賽亞、救世主。革命包括兩個元素：「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因此，知識分子將形成精

英、一般人，而工人則是戰鬥步兵。

馬克思把財富界定為擴張至整個布爾喬亞階級的猶太金權，並以其新哲學的意涵為無產階級下定義，接下來他要運用黑格爾式的辯證法，邁向其哲學核心，也就是導向重大危機的各種事件。這段關鍵的文字如此做結：

私有財產孕育了無產階級做為自身的判決，而無產階級執行之；正如薪資勞動帶給別人財富、帶給自己悲慘作為自身的判決，也是由無產階級來執行。如果無產階級勝利，這絕不意味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專制者，因為唯有藉由廢除自身及其對立面，無產階級才能取得勝利。屆時，無產階級及其命定的對立面——私有財產——都將消失。

至此，馬克思成功定義了最初見於詩意想像中的大災難。但這是德國學院用語下的定義，並不具備大學課堂外之現實世界用語下的任何實際意涵。

即使當馬克思開始賦予這些事件政治意涵時，用的依然是哲學術語：「非革命無以致社會主義於存在。當組織活動開始時，當靈魂、物自身出現時，社會主義才能將所有的政治面紗全部拋開。」馬克思真正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他和維多利亞女王寫信時一樣，經常給文句畫底線。但他畫的底線對於傳達意思並無太多的實際助益，他的意思依然淹沒在德國學院派哲學晦澀難解的概念中。為了增強其概念的說服力，馬克思再次訴諸慣用的誇大手法，強調他所描述的是全球性的過程，但依

然是術語連篇。像是：「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行動，共產主義，只能有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或是：「共產主義只有在其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同時發生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仰賴此一發展的世界商業為前提。」然而，即便馬克思的意思清楚，他的敘述不必然具備任何有效性，充其量只是一位道德哲學家的附帶意見。如果把上面所引文句的意思顛倒，聽來也同樣有理或同樣無理。那麼，有什麼樣的事實、來自現實世界的證據，可以把道德哲學家的這些預言、這些天啓轉換成科學？

著作遠離事實

馬克思對於事實證據的態度模稜兩可，就像他對待黑格爾的哲學一樣。一方面，他耗費數十年生命在收集事實，累積成一百本以上厚厚的筆記，但這些都是在圖書館、在藍皮書（譯註：指英國政府或議會報告書）中找到的事實。至於用自己的眼睛與耳朵、透過檢視這個世界與居住其中的人們而發現的事實，引不起馬克思的興趣。他無可救藥地全然埋首案牘之中，地球上沒有任何事物能讓他離開圖書館與研究。他對貧窮與剝削的興趣可追溯至一八四二年秋天，當時他二十四歲，寫了一系列文章談規範當地農民檢柴權利的法律。據恩格斯所言，馬克思告訴他：「是他對於盜林相關法令的研究，加上對摩塞爾（Moselle）地區農民階級的探討，使他的注意力從純政治轉向經濟狀況，進而轉向社會主義。」但並無證據顯示馬克思與農民、地主實際交談過，或看過當地的狀況。同樣

地，他在一八四四年爲金融週刊《前瞻》寫過一篇談西里西亞織工苦況的文章，但他從未去過西里西亞，而且就我們所知，他也從未與他所描述的任何織工交談過——如果他真這麼做過，那就太不像馬克思了。馬克思一生都在寫財金與工業方面的文章，但他只認識兩個有財金與工業背景的人。一個是在荷蘭的叔叔飛利浦（Lion Phillips），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所創辦的公司後來成爲飛利浦電器公司這家大企業。如果馬克思能花點時間去了解，飛利浦叔叔對整個資本主義進程的看法既博聞又有趣，但他只請益過一次，是關於高層金融活動中的一項技術性問題。雖然他四度拜訪飛利浦，都是爲了家庭用度的純個人事務。另一位見多識廣的人士就是恩格斯本人，但馬克思回絕與恩格斯同訪一間棉花廠的邀約，而且就我們所知，馬克思在他一生中，從未涉足任何磨坊、工廠、礦場或其他工業場所。

更令人驚訝的是，馬克思敵視具有這方面經歷的革命同志，也就是政治覺醒的工人。他一直到一八四五年才頭一次和這樣的人碰面，當時他到倫敦做短期訪問，並出席德國工人教育協會的一場會議。他不喜歡所見到的情景：這些人大多是技術工人、錶匠、印刷工、鞋匠，其領導人是一位林務員；他們自我教育、守紀律、嚴肅、有禮貌、非常不喜放蕩不羈的名士作風、很想改變社會但做法溫和穩健；他們不認同馬克思的末日想像，特別是不講他的學院術語。馬克思蔑視這些人：革命炮灰，如此而已。馬克思總是喜歡與像他這樣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合作。他與恩格斯創立共產主義者同盟時，還有組成國際工人協會時，都設法將工人階級社會主義者排除在任何有影響力的職位之外，在委員會中也只是以無產階級代表身分聊備一格。他的動機有一部分是知識分子的勢利眼，有

一部分是因為這些有工廠實際經歷的人較傾向於反暴力，支持溫和、漸進的改良——他們見多識廣，對於馬克思宣稱末日式革命不僅必要且勢不可免的說法，抱持著懷疑。馬克思有些最爲惡毒的攻訐就是針對這類的人而發。一八四六年三月，在共產主義者同盟於布魯塞爾召開的會議上，他迫使魏特林（William Weitling）接受某種形式的審判。魏特林是個窮苦洗衣婦的私生子，從來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這個裁縫學徒完全憑藉自學苦讀，在德國工人之間贏得廣大支持。這場審判的目的是要堅持教條的「正確性」，並壓制工人階級分子的傲慢，這些人缺乏馬克思認爲必要的哲學訓練。馬克思對魏特林的攻訐火力異常猛烈。馬克思說，魏特林有罪，因爲他發動了一場沒有教條的騷亂。這在野蠻的俄羅斯完全沒問題，在那裡，「你可以和愚蠢的年輕人、和基督的使徒們成功地建立聯盟。但在像德國這種文明國家，你必須了解，沒有我們的教條是不可能辦成任何事情。」而且，「如果你試圖影響工人們，特別是德國工人，卻沒有一整套的教條和清楚的科學觀念，那麼你就只是在玩一場空洞且不顧後果的宣傳遊戲。一方面不可避免會塑造出一位神靈感應的使徒，另一方面則是一群張大嘴聽他胡扯的驢蛋。」魏特林的答覆是，他還沒淪落爲只知書面研究所製造之教條的社會主義者，他是爲實際的工人們講話，不會聽命於純理論學者之見，這些學者離現實勞動的苦難世界太遠了。一位在場目擊者說，這番話「令馬克思暴跳如雷，他以拳頭猛擊桌面，力道之大，連桌燈都搖晃起來。他跳起來大叫：『無知完全無濟於事！』」會議結束後，馬克思「依然在房間裡憤怒地來回踱著大步」。

日後的攻訐繼續著這種模式，包括攻訐工人階級出身的社會主義者，以及針對工作、薪資等實

際問題鼓吹實用性解決辦法，而非教條主義式革命，因而取得工人廣大支持的任何領導人。馬克思攻擊過排版工人出身的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農業改革者克利蓋（Hermann Kriege），以及第一位真正有重要影響力的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與勞工組織家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在《反克利蓋的通告》中，對農業、特別是對克利蓋移居的美國農業一無所知的馬克思，痛批克利蓋所提配給每個農民一百六十英畝公地的主張，他說應該利用分配土地的承諾來徵召農民，但共產社會一旦建立，土地就必須集體持有。蒲魯東是一個反教條主義者，他寫道：「看在老天的份上，在消滅所有先驗的（宗教）教條主義之後，我們千萬別試圖給人民灌輸另一種的教條……別使自己成了另一種不容異端的領導人。」馬克思討厭這段文字。他對蒲魯東的猛烈抨擊之作《哲學的貧困》寫於一八四六年六月，書中指責蒲魯東「幼稚」，對經濟學與哲學極端「無知」，尤其用錯了黑格爾的觀念與技巧：「蒲魯東先生對黑格爾辯證法的認識僅限於一些成語而已。」至於拉薩爾，則成了馬克思最粗暴的反猶太種族譏刺之受害者：他是「伊威希男爵」（Baron Izig，譯註：十九世紀一部德國小說中利慾薰心、玩弄陰謀詭計的猶太人角色）、「猶太黑人」、「一個靠生髮油和廉價珠寶遮掩的油膩猶太人」。「現在我完全明白，」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寫道：「他的頭形和他的頭髮生長情況顯示，他是當初和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黑人後代（除非他的母親或父親那邊的祖母和黑人私通）。猶太人與黑裔日耳曼人的這種結合，必然要產生異於尋常的雜種來。」

當時的馬克思既不願親自調查工業中的工作狀況，也不願向經歷這些狀況的聰明工人學習。他

何必學呢？他在一八四〇年代末期就已經運用黑格爾辯證法、根據所有的必要材料，得到人類命運的結論。剩下的就只是找出事實加以證實，這些事實可以在新聞報導、政府藍皮書與前人著作所收集的證據中蒐羅，而這些材料全都可以在圖書館內找到。何必再找答案？在馬克思看來，問題就在找到正確的事實——合乎結論的事實。哲學家雅斯塔（Karl Jaspers）曾給馬克思的方法做了個很好的摘要：

馬克思的寫作風格不是研究調查的風格……他不引用與自己的理論相衝突的例子或事實，只引用清楚支持或確證他視之為終極真理者。整個做法是一種辯護，而非研究調查，是對宣稱令人信服的完備真理所做的辯護，但這不是科學的信服，而是信徒的信服。

那麼，就此而論，「事實」並非馬克思著作的核心，而是附屬性的，用以支持無關事實、早已達致的結論。那麼，《資本論》，這座馬克思的學者生涯所依賴的紀念碑，就不應被視為是在考察該書聲稱所要描述的經濟進程之性質，而是道德哲學的演練，類似卡萊爾（Thomas Carlyle）或羅斯金（John Ruskin）的小冊子。這部著作是長篇大論且往往前後不一致的佈道文，是一個對工業進程與所有制原則懷有強烈、但本質上非理性之恨意的人所發動的攻擊。奇怪的是，其中並無一個核心論證來整合書中內容。馬克思原本在一八五七年所構想的這部著作包含六卷：資本、土地、工資與勞動、國家、貿易，最後一卷是論世界市場與危機。但事實證明，完成這個計畫所需的自我紀律超

出了馬克思的能力極限。他實際完成的唯一一卷（令人困惑的是，這一卷其實是兩卷），實在是毫無邏輯可言，而是任意編排次序的一系列單篇文章。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發現這部書的結構如此混亂，因此認為讀者「必須」跳過第一部，從第二部第四章開始看起。但他的馬克思主義評註者憤怒地駁斥了這種詮釋。事實上，阿圖塞的做法並無太大助益。恩格斯自己為《資本論》第一卷所寫的摘要，只是更凸顯該書結構上的弱點，甚至是毫無結構可言。馬克思死後，恩格斯從一千五百頁的馬克思筆記中弄出第二卷，並改寫了其中四分之一。其結果是沉悶、雜亂的六百頁文字討論資本流通，多半是在評論一八六〇年代的經濟理論。恩格斯從一八八五到九三年整理出來的第三卷，探討之前尚未提到的資本之所有面向，但只是一系列的筆記，其中有一千頁在談高利貸，大部分是馬克思的備忘便條。這些材料幾乎都寫於一八六〇年代初期，與馬克思撰寫第一卷是同一時期。所以，事實上沒有什麼可以阻礙馬克思親自完成這本書，除了精力不足外，還有就是自己不曉得這本書根本雜亂無章。

我們不打算討論第二卷和第三卷，因為馬克思實在不太可能以這種形式發表，或許他真的不算加以發表，因為事實上他有十五年時間沒有處理這些材料。至於他所完成的第一卷，真正重要的只有兩章：第八章〈工作日〉，以及後半卷末尾的第二十四章〈原始積累〉，這章裡頭包括著名的第七節〈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不管從哪一方面來看，這一節都不是科學分析，只是一篇預言。馬克思說，一、「大資本家的人數將會逐步減少」；二、「貧窮、受壓迫、被奴役、墮落與受剝削的大眾則相應增加」；三、「工人階級越來越憤怒」。這三種力量加在一起，產生出黑格爾式危機，

或者說是在青少年時期詩意想像災難的政經版：「生產資料的集中與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無法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的喪鐘就要響起。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這種說法十分振奮人心，也取悅了許多世代的社會主義狂熱分子，但就其宣稱爲科學預測而言，並不比一本占星流年命書強。

相較之下，第八章〈工作日〉倒是一篇資本主義衝擊英國無產階級生活的事實分析；事實上，這一章是馬克思著作中唯一從實際面處理工人議題，也是他的整個哲學表面上的主題，因此，其「科學」價值值得我們加以檢視。如我們之前所言，因爲馬克思真正在尋找的事實只限與其成見相符者，也因爲這種做法與所有科學原則相衝突，所以該章從一開始就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但除了帶有偏見地篩選事實之外，馬克思是否也曲解或篡改了這些事實？現在我們必須對此加以考量。

該章試圖證明——這也是馬克思道德控訴的核心——資本主義的本性就是逐步強化對工人的剝削，因此，資本主義僱用的人越多，就會有越多的工人被剝削，也正是這個道德上的嚴重惡行導致最終的危機。如果要以科學方法證成他的論點，馬克思必須證明底下兩點：一、儘管前資本主義工作坊的工作條件已經那麼糟，但在工業資本主義下，情況還要更糟得多；二、既然資本的特性是非人、無情，那麼在資本化程度最高的產業中，對工人的剝削將升高到最嚴重的地步。但馬克思連第一點都不想去證明。他寫道：「英國從大工業產生到一八四五年這段時期，我將只略加觸及，至於更完整的細節，請讀者參考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馬克思還說，後續的政府出版品，特別是工廠視察員報告，肯定了「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方法本質的洞見」，並證明「他對工廠環境描寫入

微的用心多麼令人驚嘆」。

不了解資本主義的《資本論》

簡言之，馬克思對一八六〇年代中期資本主義工作條件之科學考察的第一部分，完全只根據一部二十年前出版的作品：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那麼，這唯一的資料來源，又可賦之以多少的科學價值呢？恩格斯生於一八二〇年，是萊茵地區巴爾曼（Barmen）一位成功的棉布製造商之子，在一八三七年參與了家族事業。一八四二年，他被送到曼徹斯特分公司，在英國待了二十個月。在這段期間，除了曼徹斯特之外，他還去過倫敦、奧德罕、羅奇代爾、阿希頓、里茲、布拉福與哈德斯菲爾德等地。因此，他在紡織貿易方面有直接的經驗，但對英國其他方面的狀況，就沒有第一手的認識了。例如，他對採礦一無所知，也從未下過任何礦坑；對於鄉村地區或鄉村勞工，他也毫無認識，但他在書中花了整整兩章談〈礦工〉與〈田地上的無產階級〉。一九五八年，兩位嚴謹的學者，亨德森（W. O. Henderson）與查洛尼（W. H. Chaloner），重新編譯了恩格斯的書，並檢視他的資料出處及所有引文的原文。他們的分析結果幾乎徹底摧毀了這本書的客觀歷史評價，並還原其真正的面貌——一部政論作品、一本宣傳冊子、一篇長篇演講稿。恩格斯撰寫這本書時，曾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寫道：「我在世界輿論的審判庭上，控訴英國中產階級所犯下謀殺大眾、批發搶劫及法條裡的一切罪名。」

這段話差不多為這本書做了總結：這是一本列舉罪狀的起訴書。書中許多部分，包括對前資本主義時期及工業化初期階段的所有考察，並非根據第一手資料，而是一些評價有問題的二手資料，特別是蓋斯克爾（Peter Gaskell）的《英國製造業人口》，這是一本浪漫神話的作品，試圖證明十八世紀是英國自耕農與工匠的黃金歲月。事實上，正如一八四二年的「皇家童工問題調查委員會」的結論所證明，前資本主義小作坊的工作條件比蘭開夏的新型大棉廠要糟得多。儘管恩格斯把他所引用的資料說得好像出版沒多久，但其實那都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甚至四十年以前的出版品。他提供夜班工人的私生子數據，卻不提這些數據是一八〇一年的資料；他引用一篇關於愛丁堡公共衛生的新聞報導，卻不讓他的讀者知道那是寫於一八一八年。在書中許多地方，他對那些使其過時證據效力盡失的事實與事件視而不見。

恩格斯對資料的曲解究竟是蓄意蒙蔽讀者，抑或是自欺，我們並不那麼清楚；但有時候，這種欺騙顯然是有心之作。他引述一八三三年工廠調查委員會所揭發的惡劣工作條件，卻不告訴讀者一八三三年已經通過阿爾朔普爵士的「工廠法」，並已實施有年，目的就是消除委員會報告中所提到的狀況。他在運用主要參考資料之一，凱醫生（Dr. J. P. Kay）的《曼徹斯特棉紡織業受僱工人階級的生理與道德狀況》，也採取了相同的瞞騙手法：該書促成地方政府在公共衛生方面的根本改革，但恩格斯卻提都不提。當犯罪統計數據不支持恩格斯的論點時，他便加以曲解或忽視。事實上，他不斷地蓄意隱瞞與其論證抵觸或化解他所要揭露之「罪孽」的那些事實。仔細檢查過恩格斯引自二手資料的文句之後，顯示這些引文往往被刪節、濃縮、篡改或歪曲，卻一律放在引號之中，彷彿一字

未改似的。亨德森與查洛尼版本中處處可見的腳註，列舉出恩格斯的歪曲與不誠實。單單看第七章的一節〈無產階級〉就好，在一五二、一五五、一五七、一五九、一六〇、一六三、一六五、一六七、一六八、一七〇、一七二、一七四、一七八、一七九、一八二、一八五、一八六、一八八、一八九、一九〇、一九一、一九四與二〇三頁，都出現包括事實與謄寫的錯誤。

馬克思不可能不知道恩格斯著作有這些問題、甚至是不誠實，因為其中許多問題早在一八四八年，就由德國經濟學家西爾第布蘭德（Bruno Hildebrand）在一本馬克思熟知的出版品中仔細揭露。不僅如此，馬克思自己還蓄意強化恩格斯的曲解：對於恩格斯的書出版後，各種工廠法及其他補救性立法的強力執法所帶來的大幅改善，而且影響所及正好就是恩格斯所凸顯的那些狀況，馬克思都略而不告訴讀者。無論如何，馬克思在這些一手與二手書面資料的運用上，與恩格斯著作同樣粗略輕率、帶有偏見地扭曲與明顯地不誠實。事實上，他們往往同謀欺騙，只不過馬克思編起謊來更加膽大妄為。在一次特別惡名昭彰的案例中，馬克思更是超越了自己的記錄。那是一八六四年九月國際工人協會成立時所謂的「就職演說」，馬克思爲了煽動冷漠的英國工人階級，急於證明他們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於是蓄意篡改格萊斯頓（W. E. Gladstone）的一八六三年預算演說。格萊斯頓在評論國家財富增長時，是這麼說的：「我應當懷著幾乎是憂慮和悲痛的心情，來看待財富與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如果我相信這種增長僅限於富裕階級的話。」但是，他又說：「我們很高興知道，英國勞動者的一般狀況在過去這二十年間的改善程度，就我們所知是極爲少見的，我們幾乎可以宣稱這在任何國家、任何年代的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馬克思卻在他的演說中，讓格萊斯頓

的話變成：「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於有產階級。」正因為格萊斯頓所言屬實，而且有許多統計數據為證，也因為不管怎麼說，大家都知道格萊斯頓一心認為有必要確保財富盡可能廣泛分配，所以馬克思很難想出更肆無忌憚的方式來顛倒其意。《晨星報》被馬克思當成資料來源，但這家報紙，還有其他報紙與《漢薩德》(Hansard，譯註：亦即議會議事錄，因為長達一百一十五年期間是由英國印刷商漢薩德(Luke Hansard)及其子承印而得名)，都正確轉述了格萊斯頓的話。儘管有人指出馬克思引用錯誤，但他在《資本論》中再犯同樣的錯，及其他與事實不符的錯誤。而當這項錯誤再次被提及並指責時，馬克思又大灑墨水製造混淆；有二十年之久，馬克思、恩格斯，後來還有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都捲入這場紛爭，試圖為無可辯之事做辯護。他們始終無人承認最初那個顯而易見的錯誤，而這場爭辯的結果是順了馬克思的意圖，讓有些讀者留下爭論兩造各執一詞的印象。其實根本無爭論可言，馬克思知道格萊斯頓從未說過這樣的話，而且他是蓄意欺騙。這種情形不只一次，馬克思同樣篡改過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話。

馬克思有計畫地篡改引用資料，在一八八〇年代就已引起兩位劍橋學者的注意。這兩位學者以法文修訂版(一八七二—七五)的《資本論》為本，在劍橋經濟學社發表一篇報告，題為〈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十五章對藍皮書的運用〉。這兩位學者說，他們一開始查對馬克思的資料出處，「是想要針對某些論點推導出更完整的資訊」，卻震驚於「越來越多的不符之處」，於是他們決定檢視「如此明顯之錯誤的影響與重要性」。他們發現，藍皮書內文與馬克思引文之間的差異不單是疏漏所致，「更顯示有一種造成曲解的力量存在」。他們發現，在某些情形下，引文經常「視情況所需而刪

節縮短，這些刪去的段落很可能大大不利於馬克思試圖證明的結論」。另外一些情況則是，「從報告書中不同部分的個別敘述抽出，拼湊成虛構的引文；接著，給這些引文加上引號，以藍皮書直接引文的所有權威加諸讀者。」在縫紉機這個主題上，「他以駭人聽聞的魯莽方式運用藍皮書……就爲了證明與藍皮書真正內容恰恰相反的結論。」這兩位學者下了一個結論：他們的證據或許「不足以提出蓄意篡改的指控」，但的確顯示「在權威的運用上有一種幾乎是犯罪的魯莽」，並證明「應以持疑的態度處理馬克思著作的其他部分」。

真相是，即便對馬克思的證據運用方式進行最輕描淡寫的審查，都會令我們不得不以多疑的心態，看待他所撰寫每一篇有賴事實資料的文章。他從來都不值得信賴。資本論的關鍵第八章整章，都是爲了證明一個禁不起客觀檢視的論點，而進行蓄意且有計畫的篡改。他犯了四項造假之罪：第一，他採用過時的材料，因爲新的材料不支持他的論點；第二，他挑選某些狀況特別糟的產業作爲資本主義的典型。這種欺騙對馬克思特別重要，因爲不這麼做，他根本就寫不出第八章。他的論點是：資本主義會製造出越來越糟的狀況；資本僱用的工人越多，就必須以更惡劣的方式對待工人，以確保有足夠的收益。他所詳細引用以證明此一論點的證據，幾乎都來自老舊行業裡小型、效率差、資本化程度偏低的工廠，而且這些行業多半都是前資本主義式，如製陶、製衣、鍛冶、麵包烘焙、火柴業、壁紙業、花邊編織。以他所舉的特殊例子而言，有許多行業的狀況之所以糟糕，正是因爲工廠缺乏資本，所以沒有辦法引進機械設備。結果，馬克思所討論的是前資本主義的狀況，卻忽視就在他眼前的真相：資本越多，苦難越少。等他真的論及高度資本化的現代產業，就發現缺乏

支持其論點的證據；因此，在討論鋼鐵業時，他只好遁回眉批插話式的評論（「多麼沒心沒肝的坦率！」「多麼油嘴滑舌的措詞！」）；討論鐵路業時，則被逼得把意外事件舊聞的發黃簡報拿出來用（「最新的鐵道災難」），之所以必須如此，是因為他主張每位乘客每旅行一哩的事故發生率不斷上升，但事實上，這項數據正大幅下滑，而且到了《資本論》出版時，鐵路已經成爲世界史上最安全的大眾旅行方式。

第三，馬克思從工廠視察報告中引用一些狀況惡劣、虐待工人的案例，彷彿這些是體系不可避免的常態。其實，這些案例是被視察員稱爲「騙子廠主」的責任，這些廠主就是視察員奉命偵查並起訴的對象，所以正逐步被消滅。第四，馬克思以視察報告作爲主要證據，正好暴露出他最大的騙局。他的論點是：資本主義的本性是無法改造的，而且，布爾喬亞國家與資本主義聯手陷工人於慘境中，因爲國家「是管理整個統治階級共同事務的執行委員會」。但如果這是真的，國會就絕不會通過各種工廠法，國家也不會去執行。可以說，經過馬克思選擇性引用（有時還加以篡改）的事實，全都出自國家（視察員、法院、治安法官）改善現況的努力，這些努力必然涉及揭露與懲罰那些該爲惡劣狀況負責的人。如果此一體系未曾自我改革——按馬克思的推論，這是不可能的事——那麼《資本論》也就不可能被寫出來了。因爲馬克思不願親自實地考察，只好被迫仰賴那些被他指爲「統治階級」的人所提供的證據，而這些人正試圖把事情導向正軌，而且成效日著。如此一來，馬克思只得曲解他的主要證據來源，不然就要放棄他的論點。因此，這本書是結構性地不誠實，當時如此，現在還是如此。

馬克思因爲不曾嘗試去理解工業的運作方式，所以無法掌握或不想去掌握底下的事實：打從工業革命萌發之初，也就是一七六〇到九〇年間，那些能夠取得充裕資本且有效率的製造商，一直都樂於給他們的勞動力提供較好的工作條件；因此，他們傾向於支持工廠立法，以及和立法同樣重要的有效執法，因爲這樣可以消除他們眼中的不公平競爭。所以狀況有所改善，也因爲狀況有所改善，工人們並未如馬克思預言起而造反，這位預言家因而受窘。我們閱讀《資本論》所得到印象是：馬克思根本就不了解資本主義。他之所以不了解，正是因爲他不科學：他沒有親自考察事實，也沒有客觀運用別人考察得來的事實。從頭到尾，不只是《資本論》，還包括他所有的著作，都反映出對真相的藐視，有時可以說是輕蔑。這就是爲什麼馬克思主義作爲一種體系，不能產生它所聲稱的結果；因此，稱之爲「科學的」，實在是太荒謬了。

民主獨裁的化身

如果對真理之愛不是馬克思的動機，儘管他看似個學者，那麼，什麼才是生命中激勵他的力量？爲了找出這個力量，我們必須更加仔細檢視他的人格特質。我底下所要說的是個事實，從某些方面來看，還是個令人沮喪的事實：許許多多的知性作品並非出自大腦與想像力的抽象運作，而是根源於深層的人格。馬克思就是此一原理的顯著範例。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思的哲學是他詩意想像、新聞技巧與學究氣的混合表現；但我們還可以證明，其哲學的實際內涵也與其人格的四個面向

有關：嗜好暴力、渴求權力、理財無方，尤其是他慣於剝削身邊的人。

一直存在於馬克思主義之中、且由馬克思主義政權的實際行為所不斷展示的暴力意味，其實就是馬克思本人的一種投射。馬克思一輩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詞暴力氛圍中，這些言詞暴力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成激烈的爭吵，有時還演變成身體上的攻擊。後來成爲馬克思夫人的燕妮對馬克思的第一個印象，可以說就是馬克思家人之間的爭吵。在波昂大學時，馬克思因爲攜帶槍枝而被警方逮捕，幾乎被退學；波昂大學的檔案顯示，他涉及學生之間的衝突、與人決鬥，並在左眼留下一道傷口。馬克思與家人的爭吵使父親晚年抑鬱而終，最後並導致與母親徹底決裂。燕妮保留下來的早期書信中寫道：「請不要寫得這麼怨恨惱怒」，顯然他與人不間斷的爭吵，許多是源自他慣於在書寫時使用激烈的詞句，言語中更是如此，而且往往是受酒精刺激所致。馬克思並非酒鬼，但經常喝酒，而且往往喝得很兇，有時還與人拚酒。馬克思有一部分的問題是，從二十幾歲開始，他就一直都是個流亡者，幾乎只生活在外國城市裡的流亡社群中，主要是來自德國的流亡社群。他很少接觸這些流亡者之外的人，也從不試著與別人打成一片。而且，他所交往的這些流亡者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狹隘的團體，革命政治是他們全部的興趣所在。這個情況本身有助於解釋馬克思對於生命的狹隘觀點，而且很難想像有哪一種社會背景更能誘發他好爭吵的本性，因爲這種流亡圈子一向以爭辯兇狠而聲名狼藉。據燕妮的說法，除了在布魯塞爾外，這種爭吵從沒停過。馬克思在巴黎磨坊路的編輯會議必須把窗戶關起來舉行，這樣外面的人才不會聽到那沒完沒了的吼叫。

但這些都是漫無目標的爭吵。從鮑爾開始，馬克思和每一個交往的人吵，除非他們接受他的完

全支配。結果是，許多人都描述過暴怒中的馬克思，而且多半帶著敵意。鮑爾的弟弟曾經寫過一首關於馬克思的詩：「特利爾來的黑傢伙正在發怒／他捏緊兇惡的拳頭，他的咆哮無休無止／彷彿一萬個魔鬼抓著他的頭髮。」馬克思個頭矮壯、黑髮而有絡腮鬚，膚色土黃（他的小孩叫他「摩爾人」），戴著普魯士風的單眼鏡片。目睹馬克思「審判」魏特林的亞倫可夫（Pavel Annenkov）描述他的「濃密黑髮、多毛的手與扣錯釦子的大衣」；他不講禮貌，「驕傲且隱約帶著輕蔑」；他「尖銳、金屬般的聲音，與他經常加諸人與事的極端評斷恰恰相合」；他說的每一句話都帶著一種「刺耳的語調」。他最喜歡的莎士比亞作品是《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欣賞埃賈克斯與瑟塞蒂茲激烈的詈罵。他喜歡引用裡頭的文句，其中一段話（「你這個糊塗的君主：你頭殼裡的腦子不比我手肘裡的多」）的受害者是他的革命伙伴海因岑（Karl Heinzen），此人則對這個愛生氣的小個子做了令人難忘的描述，以為報復。他發現馬克思「髒得令人難以忍受」，是「人猿與貓生下的小雜種」，有著「亂糟糟的煤黑色頭髮與髒髒的黃皮膚」。他說，不可能說得出究竟馬克思的衣服和皮膚是天生的泥巴色，或根本就是骯髒；他有一雙細小、兇狠、帶著惡意的眼睛，「迸射出邪惡之火」；他有一句慣用語：「我要消滅你。」

事實上，馬克思有許多時間都用於鉅細靡遺地蒐集政治對手與政敵的資料，如果認為對他有利用，他會毫不猶豫地把這些資料交給警方。公開場合中的大吵，例如國際工人協會的一八七二年海牙會議，隱約預示了蘇俄的清算鬥爭：史達林時期發生的事，沒有一件不是早在馬克思的行爲中就已預見。有時還真的血濺五步。一八五〇年，馬克思惡聲惡氣地大罵維利希（August von

Willich)，氣得維利希要找他決鬥。儘管馬克思以前與人決鬥過，但他說「不想與普魯士的官員打打鬧鬧」，不過他不會阻止他的年輕助理施拉姆代替他，雖然施拉姆這輩子還沒用過手槍，但維利希可是個神槍手。結果施拉姆受了傷，而維利希這次決鬥的助手是極爲奸詐的鐵綬（Gustav Techow），他是馬克思的同伙，但燕妮看穿此人因而極爲憎惡；鐵綬殺害過不只一個革命同伴，後來因爲謀殺警官而被吊死。只要能配合他的計謀，馬克思本人並不排斥暴力、甚至是恐怖主義。在一八四九年對普魯士政府的聲言中，他語帶威脅：「我們鐵面無情，不向你們要求任何寬恕。當輪到我們動手的時候，我們不會掩飾我們的恐怖手段。」次年，他在日耳曼地區散發的〈行動計畫〉中，特別鼓動暴民使用武力：「我們非但不能反對所謂的暴行，這些人民復仇的榜樣所對抗的是帶給我們可恨記憶的可恨個人與公共建築，我們不能只是對這些榜樣表示寬容，還要對他們伸出援手。」有時候，他也願意支持暗殺行動，如果這麼做有用的話。一八七八年，當馬克思得到有人在菩提樹大道謀刺威廉一世失敗的消息時，在場的一位革命同志寇巴列夫斯基記得馬克思當時大發脾氣，「不斷咒罵這個沒有完成其恐怖行動的恐怖分子」。似乎可以確定的是，一旦馬克思權力穩固，他將會大施暴力與酷行。不過，馬克思當然從未取得足以發動大規模革命的地位——不管是不是暴力革命——因此，他把被壓抑的怒氣轉移到他的書中，這些書也就總是帶著一種堅不妥協與極端主義的語氣，書中許多段落都令人有懷帶怒意而寫的印象。不久之後，列寧、史達林與毛澤東以極大的規模，實現了馬克思心中所感受、其書中所散發的暴力。

我們不可能說得出馬克思實際上是怎麼看待其行動的道德性，不管是扭曲真理或鼓動暴力。在

某種意義上，他是一個道德感強烈的人，心中充滿了熱切的渴望，想要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但他卻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嘲弄道德：他主張道德是「不科學的」，而且可能會成爲革命的障礙。他似乎認爲，共產主義的到來將給人類行爲帶來類似形上學的改變，道德也將隨之消散。和許多自我中心的個人一樣，馬克思傾向認爲道德並不適用於他自己，不然就是把他的利益等同於道德。當然，在他看來，無產階級的利益與他自己觀點的實現，根本是同一回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Michael Bakunin）提到，馬克思是「認真要獻身於無產階級運動，儘管其中總是混雜著個人的虛榮」。他一直都很自戀；有一封年輕時代的長信被保存下來，這封信表面上是寫給他父親，其實是寫給他自己，內容也是關於他自己。其他人的感受與觀點不會引起他太多的興趣或關注。他所投入的任何事業，都必須由他一手操控。恩格斯從他編輯《新萊茵報》的情形觀察到：「編輯部的人事組織根本就是由馬克思獨裁。」他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搞民主，除非是按照他所附加特殊、曲解的意涵；他討厭任何一種的選舉，他在新聞評論中，把英國普選斥之爲只是縱酒狂歡。

從各種資料來見證馬克思的政治意圖與行爲，值得注意的是，「獨裁者」一詞經常被提到。亞倫可夫稱他爲「民主獨裁者的化身」；一名普魯士警方幹員回報馬克思在倫敦的狀況時，以少見的明智提到：「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徵是對權力無限的野心與熱愛……他是其黨派的絕對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獨自進行，並專斷地下達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對意見。」鐵綬（維利希的奸詐助手）有一次設計把馬克思灌醉，讓他說出心裡話，因而能精彩地速寫馬克思：他是「一個個性特出的人」，有著「罕見的優越才智」，「如果他的心腸能匹配他的才智，而且愛心和他所懷抱的恨意一樣

多，我會願意爲他赴湯蹈火。」但「他缺乏高貴的靈魂。我確信，一種最危險的個人野心已經吃掉他所有的良善……個人權力的取得是他一切努力的目的」。巴枯寧對馬克思的最終評價也有著相同的意味：「馬克思不信上帝，倒是很信他自己，並且要每個人都服侍他。他的心所充滿的不是愛，而是怨苦，他對人類非常缺乏同情心。」

馬克思習慣性的發怒、他專斷獨裁的習性與他的怨苦，無疑反映出他的權力意識，以及因無法更有效運用權力而產生的強烈挫折感。年輕時，他過著一種波希米亞式、經常是怠惰浪蕩的生活；剛邁入中年的他，仍然覺得很難理智且有計畫地工作，常常整晚熬夜聊天，然後躺在沙發上半睡半醒地過了大半個白天。到了中老年，他的生活作息較爲規律，在工作上卻始終缺乏自我約束力。但他連一點點的批評都懷恨在心。他與盧梭的相同特質之一，就是喜歡與朋友、贊助人爭吵，特別是當他們給他忠告時。他的忠實伙伴庫格曼醫生在一八七四年建議他，只要他的生活過得稍微有計畫一點，要完成《資本論》就不會有什麼困難，但馬克思卻與他從此一刀兩斷，並加以殘酷無情的辱罵。

他易怒的自我主義除了有心理因素外，也有生理上的因素。他的生活格外不健康，很少運動，吃的是口味很重的食物，而且經常吃很多；菸抽得兇、酒喝得多，尤其愛大杯喝麥酒，下場就是他的肝一天到晚出毛病。他不常洗澡，加上飲食不當，或許可以說明折磨他四分之一世紀、名副其實的癩疫。這些癩疫使他天生的煩躁易怒更加嚴重，而且似乎在他撰寫《資本論》時惡化到了極點。「不管發生什麼事，」馬克思可怖地寫信給恩格斯：「只要布爾喬亞存在一天，我希望他們會記得我

的斑疹。」這些癩的數量、大小與嚴重性差異不定，但有時會出現在全身各處，包括他的臉、鼻梁、臀部（這意味他不能寫作），還有陰莖。一八七三年，這些癩導致神經崩潰，症狀是顫抖和嚴重的暴怒。

慣於剝削身邊的人

他的易怒與挫折感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這個原因或許也正是他憎恨資本主義體系的根源所在，那就是他在金錢處理上荒誕而無能。年輕時，他因此被迫以高利向放債人伸手，而對高利貸的強烈憎惡是他整個道德哲學真正的情緒動力。這解釋了何以他花這麼多時間與空間在這個主題上、何以他的整個階級理論根植於反猶太主義，還有何以他從馬丁·路德的一篇反猶文章中，挑選出一大段強烈譴責高利貸的文字放進《資本論》裡。

馬克思的金錢問題從大學時代就開始，並且終其一生都糾纏不去。這是源自一種非常孩子氣的心態。馬克思借錢時欠缺考慮，把錢花掉之後，那些被他嚴重輕忽的帳單，加上利息，變成了負債時，他又是一貫地既驚且怒。他把任何以資本為基礎的體系必然會有的利息，看成是違反人性的罪行，並且是人對人的剝削根源所在，而這種剝削正是他的整個理論體系打算要消除的。這是一般性的說法，但在他自身狀況的特定脈絡下，馬克思解決自身難題的方法就是剝削身邊抓得到的任何一個人，首先就是他自己的家人。錢是他的家書中最重要話題。他的父親給他的最後一封信是寫於

一八三八年二月，當時他的父親已經快死了，信中不斷重複抱怨馬克思不關心家人，除非是爲了得到家人的幫助。他還抱怨：「現在你的法律課程上到第四個月，而你也已經花了兩百八十泰勒。我一整個冬天也賺不了這麼多。」三個月後，他就過世了。馬克思並不打算參加葬禮，反而開始對他的母親施壓。他早已習慣向朋友借貸並定期哄家人給錢的生活方式。他宣稱家裡「相當富有」，並且有義務支持他的重要工作。除了斷斷續續的記者生涯，而且當記者的目的是爲了政治，不是爲了賺錢，馬克思從未認真嘗試找一份工作。不過倒是在倫敦時，他曾經應徵一份鐵路局辦事員的工作（一八六二年九月），但被打回了票，理由是字寫得太難看。馬克思不願尋求謀生之道，似乎是他的家人對他乞求援手冷漠以對的主要原因。馬克思的母親不只拒絕爲他還債，因爲她相信馬克思只會再欠更多的債，最後還與他斷絕所有關係。她痛苦地希望「馬克思會積攢資本，而不是只會寫關於資本的文章」。

無論如何，馬克思藉由繼承獲得了金額可觀的一筆錢。父親死後留給他六千金法郎，其中一部分花在武裝比利時工人。他的母親死於一八五六年，留給他的錢不如他所預期，但那是因爲他向飛利浦叔叔的借貸已經預支了遺產。他也從吳爾夫（Wilhelm Wolf）一八六四年過世後留下的遺產中得到一筆不少的收入。其他收入則來自他的妻子和岳家（她帶過來的嫁妝裡也包括一套飾有先祖阿蓋爾〔Argyll〕家族徽章的銀餐具、刀叉與床單枕套）。他們倆得到的錢足供溫飽，而且他們每年的實際收入從未少於兩百英鎊，是一個技術工人平均薪資的三倍。但不管是馬克思本人還是燕妮，兩人除了花錢之外，都對金錢沒有任何興趣。遺產和貸款一點一滴用掉，事實上，他們總在欠人家

錢，而且經常是債台高築。那套銀餐具定期要向當舖老闆報到，此外還加上許多別的東西，包括家人的衣服。有一段時間，只有馬克思能夠出門，因為家裡只剩一條褲子。燕妮的家人和馬克思的家人一樣，拒絕繼續幫助這個女婿，他們認為他不可救藥地懶惰、揮霍。一八五一年三月，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告知女兒出生時抱怨道：「我家裡現在簡直是一文不名。」

此時，恩格斯當然就成了新的剝削對象。從一八四〇年代中期他們開始合作以來，一直到馬克思過世，恩格斯是馬克思家主要的收入來源。他自己的收入大概超過一半給了馬克思，但總金額不可能算得出來，因為他不定額提供金錢達四分之一個世紀之久，相信馬克思一再保證下一筆捐款就快到了，他很快就能恢復正常。兩人之間完全是馬克思這邊在剝削的不對等關係，因為馬克思一直都是個支配性強的合伙人，有時可以說是盛氣凌人。但奇怪的是，他們彼此需要，就像舞台上演雙簧的喜劇演員，無法分開表演，經常抱怨但到頭來還是相互支持。但在一八六三年，恩格斯覺得馬克思麻木不仁的乞討實在太過火了，兩人之間的合作關係因此差點破裂。恩格斯在曼徹斯特有兩幢房子，一幢用來招待生意上的客人，另一幢則是給他的情人瑪麗住。瑪麗過世時，恩格斯極為悲痛，卻因收到馬克思一封無情的信（一八六三年一月六日）而勃然大怒；信裡對恩格斯的傷痛簡短致意後，隨即轉入更重要的正題，要起錢來了。沒有什麼比這件事更能說明馬克思堅定不移的自私性格。恩格斯回了一封冷淡的覆函，而且這件事差點就讓他們關係劃下句點。就某些方面而言，兩人之間的關係再也不能一如往昔，因為這件事讓恩格斯認清馬克思性格上的缺陷。恩格斯似乎就是在這段期間，確定馬克思沒有辦法找到一份工作養活家人，或是把自己的事務打理出任何的秩

序，唯一能做的就是給他一份定期救濟金。因此，恩格斯在一八六九年把公司賣掉，讓自己每年至少有八百英鎊的可靠收入，其中三百五十英鎊給馬克思。因此，馬克思在生命最後的十五年裡，靠著「食利者」給的年金過活，並享有某種的保障。儘管如此，馬克思似乎過的是每年五百英鎊開銷的生活，甚至更多，這使他理直氣壯地告訴恩格斯：「即使從商業的角度來看，這兒連純粹的無產階級生活都配不上。」因此，向恩格斯做更多乞求的信繼續發出。

但馬克思揮霍又不願工作的主要受害者當然是他自己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妻子。燕妮是社會主義史上悲劇性的可憐人之一，她有明顯的蘇格蘭人外貌：蒼白的膚色、綠眼珠，以及和父親那邊祖母一樣的赭紅色頭髮，這位祖母是死於弗洛登的阿蓋爾伯爵後裔。她是個美女，馬克思愛她——他的詩可以證明這一點——她也熱愛馬克思，並為他與她的家人、與馬克思的家人起了爭執；爲了她的愛，燕妮受苦多年，一直到死。一個像馬克思這樣自私自利的人，怎能激起這樣的愛情？我想，答案是馬克思強壯、有派頭，青壯年時長得英俊，雖然常常髒兮兮的；尤其是，他言語風趣。歷史學家很少注意到這項特質，但這點經常有助於解釋一種看似神秘的吸引力（這也是希特勒的長處之一，不管是在私底下或公開演講的場合）。馬克思的幽默往往既傷人又無禮，儘管如此，他的精彩笑話還是能引人發笑。要是他不幽默，憑他諸多令人不悅的個性，絕對不會有人追隨他，而婦女們也會轉身離去。想打動百般疲憊、活得甚至比男人還辛苦的女人心，笑話是最有效的方法。常有人聽到馬克思與燕妮在一起的笑聲，日後也是馬克思的幽默笑話讓女兒們圍繞在他身旁。

馬克思以他妻子的蘇格蘭貴族血統（經過他的誇大）、男爵暨普魯士政府資深官員之女的身分爲

傲。他在一八六〇年代於倫敦辦了一場舞會，請帖上稱燕妮的本姓「魏斯特法倫」。他經常說，他和真正的貴族相處比和吝嗇的布爾喬亞處得好（據在場者的說法，他在說「布爾喬亞」這個字時，帶著一種尖銳而輕蔑的特殊音調）。至於燕妮，一旦從嫁給四處漂泊、無業革命分子的可怕現實中清醒過來，她會樂意安於布爾喬亞的生活，不管有多麼卑微。從一八四八年開始，接下來至少十年間，她的生活就像是一場噩夢。一八四八年三月三日，比利時下令將馬克思驅逐出境，並將他逮捕入獄，燕妮也和一群娼妓擠在一間小房間裡過夜。第二天，這家人就被警方解送到邊境。次年，馬克思有許多時間都是在逃亡或是受審。到了一八四九年六月，他已經一貧如洗。次月，他向一位朋友坦承：「屬於內人的最後一件珠寶已經找到它通往當舖之路。」他憑藉一種荒謬卻一直存在的革命樂觀主義來維繫自己的精神，他在給恩格斯的信裡這麼寫著：「無論發生任何事情，革命火山的巨大爆發從未如現在這般迫在眉睫。容後細述。」但燕妮沒有這種慰藉，而且她懷著身孕。他們在倫敦尋得安全，卻也潦倒。此時她已有了三個孩子，燕妮、蘿拉與埃德加爾，一八四九年十一月又生了第四個，叫做格維或格維多。五個月後，他們因為繳不出房租，被趕出位於切爾西（Chelsea）的房子，當著「切爾西所有流氓」（燕妮之語）面前被掃地出門、流落街頭。他們賣掉床，還肉販、牛奶商、藥劑師與麵包店的帳。他們在萊斯特廣場骯髒的德國寄宿宿舍找到避風港，那年冬天，小嬰兒格維多就死在那裡。關於那段日子，燕妮留下的是一份絕望的記錄，此後，她的精神，以及她對馬克思的愛意，再也沒有真正恢復過來。

一八五〇年五月二十四日，英國駐柏林大使收到由一位機靈的普魯士警方密探所做的一份報

告，報告中非常詳盡地描述以馬克思為中心的德國革命分子活動情形。沒有什麼比這份報告更清楚表達燕妮所必須忍受的事情：

（馬克思）過的是一種波希米亞式知識分子的生活。他很少做洗臉、梳理和換床單這類事情，而且經常醉酒。雖然他經常連續好幾天什麼事都不做，但當他有許多工作要做時，他會夜以繼日、不知疲倦地持久力工作。他寤寐無定時，經常通宵熬夜，然後在日正當中時，躺在沙發上和衣睡到傍晚，就算全世界的人在他房裡穿梭來去也不以為意（屋裡總共只有兩個房間）。……屋裡沒有一件家具乾淨、牢靠，樣樣都支離破碎、扯成稀爛，每件東西都積著半吋塵埃，處處都亂到不能再亂。（客廳）中央有一張老式的大桌子，上面蓋著油氈布，布上擺著手稿、書報，還有小孩的玩具、他妻子針線籃裡的碎布料、幾隻杯口缺角的杯子、刀子、叉子、燈、一瓶墨水、平底玻璃杯、荷蘭燒陶土菸斗、菸草、菸灰……就算是舊貨鋪老闆，要他拿這些精彩的零碎東西去送人，他都會覺得不好意思。你一進到馬克思的房間，菸和菸草味會燻得你淚眼汪汪……每樣東西都髒兮兮地蓋著灰塵，因此，找位子坐成了一樁風險的事。這裡有張三隻腳的椅子，另一張有小孩在上頭玩扮家家酒的椅子碰巧有四隻腳，是給訪客坐的，但小孩扮家家酒的東西還沒移開，如果你坐上去，就得冒著賠上一條褲子的風險。

這份一八五〇年的報告所描述的，大概是這家人運氣最背的時候。但接下來的幾年裡，其他的

打擊繼續降臨。一八五一年出生的女兒芙蘭契絲卡次年就死了，至於埃德加爾，這個集眾愛於一身的兒子、馬克思的最愛，他叫他穆希（Musch，意思是小蒼蠅），在這個骯髒的環境下染上胃腸炎，死於一八五五年，這對馬克思與燕妮都是一個可怕的打擊。燕妮不會從這次打擊中復原。「每一天，」馬克思寫道：「我的妻子都告訴我，她希望自己此刻已經入墓……。」另一個女兒愛琳娜三個月前剛出生，但對馬克思而言，兩者不能相提並論。他期盼有幾個兒子，而如今一個也無；女孩子們對他可有可無，頂多只能當個文書助手。

革命家族的悲劇

一八六〇年，燕妮染上天花，失去她僅存的容貌；從那時起，一直到一八八一年死去，她慢慢退居馬克思生活的幕後，成了一個疲憊、夢幻破滅的女人，小小的恩惠便能令她感激不已，像是從當舖贖回她的銀飾、一幢屬於她自己的房子。一八五六年，感謝恩格斯，這個家庭得以離開蘇活區（Soho，譯註：倫敦的夜總會聚集區），搬到哈佛斯塔山（Haverstock Hill）葛拉夫頓街九號的一幢租屋；九年後，又要感謝恩格斯，他們找到更好的房子，在梅特蘭公園路（Maitland Park Road）上。從那時起，他們的僕人不曾少於兩個。馬克思開始養成每天早上讀《泰晤士報》的習慣，還被選入當地的教區委員會。每逢晴朗的星期天，他就隆重其事地帶領家人外出散步，他親自領頭大步，後面跟著妻子、女兒與友人。

但馬克思的布爾喬亞化，卻帶來另一種形式的剝削，這次是對他的女兒們。他的三個女兒都很聰明，可能有人會想，馬克思爲了補償她們身爲革命家之女而承受混亂、貧困的童年，至少會依照他激進主張的邏輯，鼓勵她們開創事業。但事實上，馬克思不讓她們受完整的教育，不准她們接受任何訓練，並專制地禁止她們發展事業。就像最愛他的愛琳娜對南非女作家席萊納（Olive Schreiner）所言：「在漫長、悲慘的歲月中，有一道陰影籠罩在我們之間。」這些女孩子們被留在家中，學鋼琴、水彩畫，如同商人之女。她們年歲漸長，馬克思偶爾還是會和一起搞革命的朋友們上酒吧狂飲，但據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譯註：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所言，他不准這些朋友們在他的房子裡唱低俗猥褻的歌，因爲女孩子們可能會聽見。

後來，他又不同意那些與他同樣是革命分子的人向他女兒求婚。他無法、或是沒有阻止他們結婚，卻使得事事不順，而他的反對也造成了傷害。蘿拉的丈夫拉法格（Paul Lafargue，譯註：法國勞工黨創始人之一）來自古巴，有黑人血統，馬克思叫他「小黑人」或「大猩猩」。他也不喜歡娶了小燕妮的龍格（Charles Longuet），在他看來，兩個女婿都是白癡：「龍格是最後一個蒲魯東主義（Proudhonist）者，而拉法格是最後一個巴枯寧主義者——他們倆見鬼去吧！」最年輕的愛琳娜，則因馬克思不准女孩子們開展事業與敵視求婚者而受苦最深。她被教養成把男人——也就是她的父親——當成宇宙的中心。或許是意料中的結局，她最後愛上一個甚至比她父親更自我中心的男人——艾威林（Edward Aveling）。後來投身左翼政治的作家艾威林，是個喜歡拈花惹草、吃軟飯的傢伙，專門誘拐女演員；愛琳娜想要做個女演員，自然就成了受害者。一個尖銳的歷史小諷刺：艾威林、愛

琳娜與蕭伯納參加了易卜生劇作《玩偶之家》在倫敦的非正式首讀會，這齣戲是對女性自由的精彩辯護，而愛琳娜在戲中扮演諾拉的角色。馬克思死後沒多久，愛琳娜就成了艾威林的情婦，從此一直是受他折磨的奴隸，如同她的母親燕妮會是她父親的奴隸。

然而，馬克思需要他的妻子，可能超過他所願意承認的程度。一八八一年燕妮死後，馬克思迅速地衰頹，什麼工作都不做，在歐洲各個療養地接受治療，或是到阿爾及爾、蒙地卡羅和瑞士旅遊，尋找陽光與新鮮空氣。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他因為自己在俄國的影響力日增而雀躍：「不論我在什麼地方的成功，都不會比這更使我愉快的了。」但馬克思至死都是個破壞性人物，他自鳴得意地說：「我感到滿意的是，我打擊了那個僅次於英國、舊社會真正堡壘的強權。」三個月後，他披著晨衣，坐在爐邊死去。他的女兒燕妮幾個星期前剛過世，另外兩個女兒也有同樣悲劇性的結局。愛琳娜因她丈夫的行爲而心碎，在一八九八年吞服過量鴉片，本來兩人可能是要相約自殺，但她丈夫卻未履行諾言。十三年後，蘿拉與拉法格也相約自殺，而兩人都如約實行。

不過，這個悲劇性的家族有一名令人好奇又曖昧的倖存者，是馬克思最怪誕的剝削行爲產物。在對英國資本家惡行的種種研究中，馬克思看過許多低工資工人的案例，但他從來沒有找到一個可以說根本無薪可支的工人。不過，這樣的工人的確存在，就在他自己家裡。當馬克思帶領自己家人做隆重的星期天散步時，負責殿後並帶著野餐籃及其他行李輜重的，是個矮胖模樣的女性，她就是海倫，家裡人叫她「琳蘅」。她生於一八一三年，是農家出身，在八歲那年來到馮·魏斯特法倫家當保姆，餬口無虞，但沒有任何酬勞。一八四五年，男爵夫人爲她已出嫁的女兒感到難過又焦慮，就

把當時二十二歲的琳蘅給了燕妮，以減輕她的負擔。琳蘅留在馬克思家中，直到一八九〇年過世。愛琳娜說她「待人最溫柔，但自己一生清心寡欲」。她的工作極為辛苦，不光是煮飯擦地，還要管燕妮不擅長的家中開銷，但馬克思從未付她任何酬勞。在一八四九到五〇年間，這家人生活最黑暗的時期，琳蘅成了馬克思的情婦，並生下一個孩子。當時小男孩格維多剛死不久，但燕妮又再次懷孕。這家人住在兩個房間裡，而馬克思不只要瞞著妻子，不讓她知道琳蘅的情形，也要瞞著他絡繹不絕的革命訪客。到最後，燕妮在她諸多悲慘之外，又發現或被告知了這件事，或許她對馬克思的愛就是因為這件事而劃下句點。她稱之為「一件我不想再細述的事，雖然它在我們私下與公開的生活中增添了許多傷痛」。這段話出現在她寫於一八六五年的自傳初稿中，這份三十七頁的初稿有二十九頁保存下來，其他描述她與馬克思爭吵的部分，大概是被愛琳娜給毀了。

琳蘅的小孩在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生於蘇活區迪恩街二十八號，是個兒子，戶口報的名字是亨利·弗雷德瑞克·德穆特。馬克思一直都不認帳，並一口否認他是父親的傳言。他很可能是想學盧梭，把這個小孩交給孤兒院，或是讓別人收養，但琳蘅比盧梭的情婦堅強，堅持自己認養這個男孩。這個男孩被送出去給一個叫路易斯的工人階級家庭照料，但獲准回馬克思家做客。當然，他不准走前門，並被迫只能在廚房見他媽媽。馬克思很怕人們會發現弗雷迪（譯註：弗雷德瑞克的暱稱）的父親是誰，對他的革命導師與先知地位造成致命的傷害。他在信中提及此事之處都被隱瞞，但還是有一處隱晦地提到。馬克思最後說服恩格斯私下認養弗雷迪，作為應付家人的託詞，譬如愛琳娜就相信這個說法。但儘管恩格斯一如往常，爲了兩人的合作，準備任憑馬克思需索，但他並不打算

把這個秘密帶進墳墓裡去。恩格斯因喉癌死於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沒辦法說話，但他不打算讓愛琳娜（他稱她菟西）一直認定她父親毫無污點，於是在一塊板子上寫道：「弗雷迪是馬克思之子。菟西想把她父親當成偶像。」恩格斯的秘書兼管家芙蕾柏格，在一八九八年九月二日寫給倍倍爾（August Bebel）的信中說，恩格斯親口告訴她真相，她還說：「可笑的是，弗雷迪長得很像馬克思，典型的猶太臉與藍黑色頭髮，真的只有盲目的偏見才會在他身上看到與將軍（她對恩格斯的稱呼）有任何相像之處。」愛琳娜接納弗雷迪為同父異母兄弟，並且與他親近，她寫給他的信有九封保存下來。但她沒有帶給他任何好運道，因為他的情人艾威林把弗雷迪一輩子的積蓄都借走，再也沒有歸還。

琳蘅是馬克思唯一一個認識透徹的工人階級成員，也是他與無產階級的一次真實接觸。或許弗雷迪也算一個，因為他被當成工人階級小孩扶養長大，並且在一八八八年，那年他三十六歲，取得他夢寐以求的機工合格證書。他差不多一輩子都在國王十字（King's Cross）與哈克尼（Hackney）公司工作，並且是機工工會的長期會員。但馬克思從不了解他，他們只見過一次面，當時弗雷迪大概是正從廚房外的樓梯走上來，那時他完全沒想到，這位革命哲學家是他的父親。弗雷迪死於一九二九年一月，那時，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幻想已經駭人地具體成形，而史達林，這位達致馬克思所企盼之絕對權力的統治者，剛剛要開始他對俄國農民的災難性攻擊。



4 易卜生——把勳章當珠寶戴的劇作家

挪威小城

所有的寫作都是艱難的，而創意是知識分子的苦役中最為艱難的。創意的革新，特別是在基礎範圍內的改革，需要更加超乎平常的專注和精力。若想終其一生在藝術上不斷地拓展創意的領域，就意味著自我約束和心智勤奮都要達到一定水準，這是很少作家能夠具備的。不過，這正是易卜生（Henrik Ibsen，一八二八——一九〇六）一貫的工作風格。難以設想，無論哪個時代或哪個領域，有哪位作家比他更為成功地致力於此。他不僅創造了現代戲劇，而且寫出了一系列至今仍是現代戲劇劇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劇本。他眼看西方劇壇空洞無力，於是在自己的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對戲劇進行改造，使它成爲一種豐富多彩、強而有力的藝術形式。此外，他不僅徹底改革了他的藝術，而且改變了他的同代人乃至後人的社會觀念。盧梭在十八世紀後期所做的，正是易卜生爲十九世紀後期所做的。然而，盧梭勸說男人與女人回歸自然，並因此促進了一場集體性的革命；而易卜生則宣揚

個體對支配每個小城鎮、甚至每個家庭的陳舊生活方式進行反抗。易卜生教導人們（尤其是婦女），個體意識及個人思想的自由比社會的要求在道德上更重要，因此促成了人們在觀念和行為上的革命，這場革命甚至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就已經開始，並跳躍式地一次次發生，延續至今。在佛洛伊德之前很久，他就為這個寬容的社會奠定了基礎，對人們反政府的實際行為方式產生過如此大的影響，這點也許連盧梭都不曾做到。易卜生及其作品構成了現代性大門的基石之一。

與易卜生加倍低微的個人背景相比，他所有的成就愈發顯得卓越。說「加倍」是指他自己不僅貧窮，而且來自一個弱小貧困、根本沒有真正文化傳統的國家。中世紀初葉，即西元九〇〇至一一〇〇年時，挪威曾是個強大頗具創業精神的國度，此後便開始衰落了，特別是在一三八七年，獨立的挪威的最後一位國王奧拉夫四世（Olaf IV）去世以後；一五三六年便成為丹麥的一個省，持續了近三個世紀。為了紀念一位丹麥統治者，首都奧斯陸（Oslo）被更名為克里斯蒂亞那（Christiana），而且所有重要的文化形式如詩、小說和戲劇，都用丹麥語。一八一四至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之後，挪威有了所謂的「艾茲伏爾憲章」（Eidsvoll Constitution），保證在瑞典王國中享有自治權；然而直到一九〇五年，挪威才成為獨立的君主國。十九世紀以前，挪威語與其說是民族語言，倒不如說是粗俗的外省方言。直到一八一三年，丹麥才有了第一所大學，而且晚至一八五〇年第一座挪威劇院才在卑爾根（Bergen）建成。在易卜生青年時期和成年初期，丹麥文化仍然占據著統治地位。用挪威語寫作，就是將自己甚至從其他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孤立出來，更不必說全世界了，丹麥語依舊是文學語言。

這個國家本身既淒涼又萎靡。依照歐洲的標準，該國首都只是一個小省城，僅兩萬居民，是個混亂、粗野的地方。一八二八年三月二十日，易卜生出生在濱海的希恩（Skien），離南面的海岸一百哩，是一個狼和麻瘋病仍很常見的蠻荒之地。幾年前，這個小城由於一個女僕的粗心大意而被燒成了平地，女僕因此被處以死刑。正如易卜生在他的自傳中所描述的，那兒迷信、膽怯而又野蠻，可以聽到海水沖擊水壩的怒號與鋸床尖利的轟鳴：「當我後來讀到有關斷頭台的描述時，我總是想起那些鋸條來。」市政廳旁邊立著頸手枷，「一個大約一人高的紅褐色木樁，頂端有一個原先被染成黑色的巨大圓形把手……木樁正面懸掛著一條鐵鏈，鐵鏈上打開著的鉤環在我看來就像兩條小手臂，迫不及待地想伸出來扼住我的脖子……（市政廳）下面是地牢，帶有柵欄的窗戶面對著市場。透過這些柵欄，我看到許多蒼白而陰鬱的面孔。」

孤獨者的史詩

易卜生生於商人家庭，是五個孩子（四男一女）中最大的一個，父親克努特，祖上都是商船船長；母親出身於水手家庭。易卜生六歲時，父親破產了，開始變得意志消沉、遊手好閒、脾氣暴躁、好與人打官司——就像《野鴨》中的老艾克達爾。他的母親曾經相貌出眾，是個不得意的女演員，後來退隱家中，用玩偶打發時光。家中常常負債，主要以土豆為食。易卜生長得矮小醜陋，成長過程還一直籠罩在私生子謠言的陰影中，傳聞是當地一個登徒子的兒子。易卜生有時信以為真，

喝醉酒時會脫口而出，然而，並沒有證據證實。度過羞辱的童年後，他被送到一個名叫格里姆斯達（Grimstad）的陰沉海港小城，在一家藥房當學徒。在那兒，他的運氣依然不佳，他師傅長期經營不善，最終還是破產了。

易卜生從這種窘境中掙脫出來的漫長過程，是一部孤獨自學者的史詩。他從一八五〇年開始自修大學課程。從那時起，直到以後許多年，他的生活一直極為窮困。他寫過詩、無韻詩劇、劇評與政治評論。他最早的劇本——諷刺劇《諾爾曼人》——沒能上演；第一部被搬上舞台的詩體悲劇《凱替來恩》失敗了；第二部搬上舞台的《聖約翰之夜》同樣運氣不佳；第三部劇作《勇士之墓》在卑爾根失利；第四部散文體劇作《厄斯特羅的英格夫人》匿名演出，同樣也失敗了。他的第一部受到關注和好評的作品《索爾豪格的宴會》，依照他自己的看法，只是微不足道的傳統之作而已。倘若他憑自己的喜好創作，就像詩劇《戀愛的喜劇》那樣，則會被歸入「淫蕩」一類，根本不能上演。然而，他卻因此逐漸獲得了大量的舞台經驗。卑爾根第一家挪威語劇院的創建人、音樂家布爾（Ole Bull），以每月五英鎊的酬金請他擔任寄宿劇作家。往後六年裡，他成了劇場的雜役，做過舞台布景、化妝、售票甚至導演（可是他從未參加過演出；這也是他的弱點，所以他對於指導演員缺乏信心）。劇院條件很簡陋：如在倫敦和巴黎大約從一八一〇年就開始使用煤氣燈了，而這裡直到他離開的那年（一八五六年）才使用。以後，他又在新建的克里斯蒂亞那劇院度過了五年。憑著驚人的努力，他的技巧日益嫻熟，並開始付諸實踐。但是，一八六二年新劇院破產，他也被解僱了。此時他已結婚，負債累累，常被債務困擾，故精神憂鬱，經常酗酒。學生們曾經看見他毫無知覺地躺在街

邊水溝裡。有人募集了一筆錢，送給這位「醉酒詩人易卜生」去國外。他自己則不斷地給王室和國會寫信，請求政府撥款使他能到南方去旅行，這些信今天讀起來真是哀婉動人。他終於得到了一筆錢，在隨後的將近四分之一世紀裡（一八六四至九二年），他離鄉背井，在羅馬、德勒斯登和慕尼黑生活。成功的最初跡象出現於一八六四年，他的詩劇《覬覦王位的人》被列入重建後的克里斯蒂亞那劇院的上演劇目。易卜生習慣將他所有的劇作先出版成書，實際上，從拜倫和雪萊開始，十九世紀大多數詩人都是這樣。通常要幾年以後，有時甚至是許多年以後，劇本才被真正搬上舞台。不過，每部劇本印刷和銷售的冊數都在慢慢增長：五千冊、八千冊，然後是一萬冊，甚至一萬五千冊。舞台演出也隨之而來。易卜生的名聲曾三次達到高峰，第一次是在一八六六至六七年，他創作了大型詩劇《布朗德》和《培爾·金特》——同一時期，馬克思出版了《資本論》。《布朗德》是對傳統物質主義的一次衝擊，它呼籲人們遵從個人的良心，以反抗社會的法則，也許這正是他一生創作的核心主題。《布朗德》的發表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不僅在挪威，甚至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易卜生首次被視作反抗正統觀念的領袖；他越過了狹小的挪威國界。

第二次高峰是在一八七〇年代。從《布朗德》開始，他將革新的思想付諸戲劇，但同時他也得出一個必然的結論：這類劇作若搬上舞台，其影響力一定遠遠超過在書齋中閱讀。這種想法促使他放棄了詩體，而採用散文體，並賦予新型的戲劇現實主義。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詩為想像而作，散文為思考而作。」這種轉變，正如易卜生所有的進展，經歷了許多年才完成。有時，易卜生顯得極不活躍，靜靜地思考而不工作。劇作家實際上並不像小說家那樣將大量時間用於寫作，甚至在一

齣長劇中所使用的詞彙都很少。戲劇創作與其說是在考慮主題和邏輯，不如說更注重間斷發生的、個別的戲劇化細節，這些細節並不發展為情節，而是成為情節中的材料。易卜生的情況是，創作以前那段時期特別艱難，因為他所做的是全新的工作。像所有最偉大的藝術家一樣，他不能忍受重複，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基本上都不同於以往，通常是通往未知領域的新的第一步。可是，一旦他確定想要在舞台上展現的東西，他的創作就既快又好。作為他新方針的最初的重要成果，《社會支柱》、《玩偶之家》和《群鬼》恰好與漫長的維多利亞中期繁榮的衰敗，以及社會上新產生的焦慮不安情緒一致。易卜生提出了許多令人不安的問題，如金錢的力量、對婦女的壓迫，甚至人們忌諱的性病問題。他以簡潔的日常語言和人人都能識別的布景，將基本的政治、社會問題忠實地展現在舞台上。他所引起的激情、憤怒、憎惡都是巨大的，並從斯堪的納維亞擴展到廣大的其他地區。《社會支柱》標示著他的影響力已達到中歐的觀眾，《玩偶之家》則深入到盎格魯—撒克遜人的世界。它們是最初的現代戲劇，也開啓了易卜生成為世界性人物的過程。

但是，易卜生發現自己難以定下心來做一位具有社會目標的劇作家，即使是在贏得世界聲譽之後。經過多年漫長的積累，他事業的第三次高峰到來了。這一時期，可以看到他從政治問題轉向個人解放問題，與人類生存的任何其他方面相比，這個問題在他的心目中可能占據著更為重要的位置。他在記事簿上寫道：「解放在於保證個人獲得自身自由的權利，每個人都按照他特殊的需要生活。」他不斷地論證說，除非社會中人們的實際行為能夠保證個人權利，否則，形式上的政治自由將毫無意義。因此在第三次高峰期間，他還創作了《野鴨》、《羅斯莫莊》、《海達·高布樂》、《建

《建築師》和《約翰·蓋勃呂爾·博克曼》，這些劇作當時令很多人大感困惑，甚至難以理解，但現在已成為他最有價值的作品：這些劇本探索著人類的心理、人類對於自由的追求、心靈中的無意識，以及如何才能控制他人這一可怕的主題。易卜生不僅始終在藝術領域做著某些新穎和獨創的工作，而且對那些還未完全闡述清楚的、甚至未曾為人探討的觀念，他都十分敏感，這正是他的長處。正如丹麥批評家、曾經是他好友的勃蘭兌斯（Georg Brandes）所說，易卜生「同當代正在孕育萌動的種種思想有著神秘的一致……他的耳朵能夠聽到低沉的隆隆聲，這聲音宣告著那些暗中破壞社會根基的思想」。

不僅如此，這些思想已傳遍世界。世界各地的戲劇觀眾從他的戲劇中那些遭受苦難的受害者和深受折磨的剝削者的形象上，能夠找到自己 and 鄰居的影子。他對傳統價值觀念的攻擊、為個人解放制定的規劃，以及關於所有人都該有充分發揮自己才能機會的呼籲，到處受到歡迎。從一八九〇年代初，當易卜生載譽回到故鄉克里斯蒂亞那後，他的劇本在世界各地被日益頻繁地搬演。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裡（他於一九〇六年去世），這位當年的藥房學徒成了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最出名的人物。他甚至同俄國的托爾斯泰一起被公認是在世最偉大的作家和預言家。他的名聲經由阿契爾（William Archer，譯註：蘇格蘭戲劇評論家和翻譯家，因翻譯易卜生的作品而聞名）和蕭伯納這樣的作家傳播開來。新聞記者們千里迢迢地趕到他在維多利亞街的陰暗寓所，進行採訪。易卜生每天在格蘭特飯店咖啡廳裡的露面，成為首都的一道景觀。在那兒他獨自一人坐著，對著鏡子，好看到屋子裡的其他人。他邊讀報紙邊飲用一杯啤酒，外加一小杯法國白蘭地。他每天非常準時地走進咖啡廳，這時全

屋的人都站起身向他舉帽致敬，直到這位偉人落座後，其他人才敢再坐下來。英國作家勒加林 (Richard le Gallienne) 和許多人一樣，特意到挪威去觀看這一場景，就像其他人紛紛趕到雅斯納雅波良納 (Yasnaya Polyana) 去瞻仰托爾斯泰一樣。勒加林如此描繪了易卜生的進場：「一副冷峻、不滿的神情，嘴唇緊閉，古板而嚴肅，正直而嚴峻……在他那羊皮紙似的臉上，以及銳利如獾一般的眼睛裡，看不到絲毫人類的溫情，就彷彿一位蘇格蘭長老走進了教堂。」

正如勒加林所提示的，關於這位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有一些對他不完全正確的說法，當他在世時，就因為受到普遍的崇拜和公眾的敬仰而使評價固定了下來。這是一位偉大的解放者，他研究並看透了人類，他為此悲嘆，他的作品教導人們如何從傳統的羈絆和令人窒息的偏見中解放自己。然而，倘若他對人類懷有如此強烈的感情，那麼為什麼他似乎又在排斥個體的人呢？他為什麼拒絕同他們接近，而寧可通過閱讀報紙的專欄來了解他們？為什麼他總是獨自一人？他那強烈的、強加於己的孤立從何而來？

荒謬的虛榮心

人們越是靠近觀察這位偉人，就越是發現他的古怪。作為一個踐踏傳統、主張波希米亞式的自由生活方式的人，他自己卻擺出一副嚴肅的正統形象；甚至這種正統已經達到了滑稽的程度。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女路易絲公主，發現他的帽子裡頂部粘著一面小鏡子，爲了用來梳理頭髮。許多人首

先注意到易卜生的是他那驚人的虛榮心，這一點在比爾博姆（Max Beerbohm）的著名漫畫中得到了充分表現。當然，情況也並非總是如此。易卜生妻子的繼母托勒森夫人曾寫道，當她在卑爾根初次遇見易卜生時，「他看上去像個怕羞的小土撥鼠……那時他還沒有學會鄙視他的人類同伴，而且缺乏自信心。」一八五六年，《索爾豪格的宴會》獲得成功之後，易卜生開始變得非常講究服飾，他採用了詩人的帶褶邊的護腕、黃色的手套及精緻的手杖。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他更關注服裝了，但偏好更加沉悶的樣式，這與他在公眾面前日益封閉的形象十分相稱。因此，年輕的作家保爾森（John Paulsen）曾描述一八七六年在奧地利阿爾卑斯山區的易卜生：「黑色的燕尾服上繫著勳章綬帶，刺眼的白亞麻襯衣，雅致的領帶，閃光的黑綢禮帽，金架眼鏡……漂亮的、緊抿的嘴唇，薄得彷彿刀刃一般……我好像是面對著一道封閉的峭壁，一個難解的謎。」易卜生隨身攜帶著一支帶有碩大金質飾帽的胡桃木大手杖。第二年，他從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得到第一個名譽博士學位；自此以後，他不僅暗示他希望被稱作「博士」，而且身穿一件黑色的長外套禮服。他的衣著過於正式，以至於阿爾卑斯山區的農村姑娘把他當成牧師，在他散步時跪下來親吻他的手。

他對服飾的關注異常仔細。他在信中詳盡地指示如何將他的衣服掛進衣櫃，短襪和襯褲如何放進箱子。他總是自己擦皮靴，甚至自己縫鈕釦，當然是讓僕人先把線穿進針眼裡。一八八七年，他後來的傳記作家耶格（Henrik Jaeger）來拜訪他，他每天上午都要在穿戴打扮上花費一個小時。然而，他在服飾上的一番努力並沒奏效。對於多數人來說，他看上去像個水手長或船主；他的面孔跟其祖先相似，由於長期在外活動而呈赤紅色，特別是喝過酒以後。記者韋斯滕（Gottfried Weisstein）

認為，他以那種令人難忘的、不容置疑的口吻表述老生常談的習慣，使他像個「瘦小的德國教授」，這位教授「希望將信息刻在我們大腦的記憶裡，『明天，我將乘火車去慕尼黑』」。

易卜生的虛榮心在某一方面達到近乎荒謬的程度，甚至那些對他最不加批判的崇拜者也感到難以爲此辯護。易卜生一生都熱中於獎牌和勳章。事實上，爲了得到它們，他甚至讓人爲難。易卜生具備一定的繪畫技能，常畫些誘人的小玩意。「星球勳章」是他留存至今的第一部卡通畫，他還打算繪製一個「易卜生之家的勳章」贈送給他的妻子，然而他真正想得到的是屬於自己的勳章。一八六九年夏季，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一場探討語言問題的知識分子會議上——這是國際舞台上一場新的、但也有人認爲是導致災難的革新——他榮獲了第一枚勳章。易卜生首次被捧爲名流：他整個晚上都在王宮內同國王卡爾十五世（Carl XV）一道喝著香檳酒，國王贈予他一枚瓦薩（Vasa）勳章。後來，勃蘭兌斯在與易卜生初次會面時（他們已經長時間互通書信），驚奇地發現他在家中也戴著那枚勳章。

如果勃蘭兌斯發現第二年易卜生已在懇求獲得更多的勳章，他必將更爲驚訝。一八七〇年九月，易卜生寫信給一位經營這類事務的丹麥律師，請求幫忙獲取丹尼保格（Danneborg）勳章：「你不知道這種東西在挪威的影響力……一枚丹麥勳章將會極大地提高我在那兒的聲望……這對我太重了。」兩個月後，他又給一位亞美尼亞籍的代理人寫了封信，此人雖在斯德哥爾摩經營業務，但與埃及宮廷素有連繫，他在信中索求一枚埃及獎章，因爲這「將極大地提高我在挪威文學界的聲望」。最終，他得到了一枚土耳其的梅德齊底（Medjidi）勳章，他欣喜地稱之爲「一個漂亮的東

西」。一八七三年是他的獎章豐收年：他贏得了一枚奧地利獎章和一枚挪威的聖奧拉夫（St Olaf）勳章。然而，他積聚更多獎章的努力仍舊毫不鬆懈。他曾向一位朋友否認他對於這些獎章「有任何個人的欲望」，但是「一旦它們進入我的生活，我是不會拒絕的」。這是一句謊言，他的信件可以證明這點。甚至據說在七〇年代，爲了得到獎章，他會脫帽向帶有皇家或貴族徽章的馬車致敬，即使車上空無一人。

這個特別的故事也許是惡意捏造。但是有大量的資料可以證實易卜生對獎章的痴迷，因爲他堅持在每一個可能的場合展示他那堆不斷增多的光彩奪目的勳章。據說早在一八七八年，他出席一個俱樂部的晚宴時，身上披掛著所有的獎章，其中一個像狗項圈似的繞在他的脖子上。瑞典畫家保利（Georg Pauli）曾經碰見易卜生在羅馬的大街上炫耀他的獎章（不光是綬帶，還有星形勳章）。有時，他似乎每晚都把它們戴在身上。他爲自己的行爲辯解道，當有「年輕的朋友們」在場時，它「提醒我必須舉止適度」。儘管如此，如果他沒有佩戴那些獎章，邀請他出席晚宴的人總是感到寬慰，因爲這些獎章會引人發笑，甚至公開暴笑，如同傳遞水酒那樣傳開去。有時，他甚至在大白天也佩戴著它們。當他乘坐的回挪威的船停靠卑爾根碼頭時，他穿上正式的服裝，佩戴著勳章，走上甲板。易卜生驚恐地發現他的四個過去的酒友：兩個木匠、一個教堂司事和一個代理人，正等著迎接他，並在大喊：「歡迎老易卜生！」他隨即返回船艙，畏縮在那兒，直到他們離去。甚至到了晚年，他依舊逢迎權貴。一八九八年，由於他太急切地想得到丹尼保格大十字勳章，於是在被正式授予之前，先從一位珠寶商那兒買了一枚；實際上丹麥國王除了頒發給他一枚外，還送過他一枚飾有

寶石的樣品。因此他最後共擁有二枚勳章，其中兩枚不得不還給宮廷珠寶商。

胸中貯存著辛酸與仇恨

這位世界名人雖與他的戰利品一起熠熠生輝，然而他最終給人們留下的印象與其說是虛榮或愚蠢，還不如說是怨恨的力量和赤裸裸地被壓抑的憤怒。儘管易卜生身材矮小，但憑著碩大的頭顱和粗壯的頸脖，他的身上似乎煥發著力量。勃蘭兌斯說：「他看上去就彷彿你需要借助一根棍棒才能制服他。」他還有一雙令人驚恐的眼睛，維多利亞時代的後期，似乎是這種凶猛日光的時代：格萊斯頓（Gladstone）的這種日光投射到一位下院議員身上時，能使這位議員忘掉自己想說的話；托爾斯泰同樣用他那蛇怪般的眼睛，使評論家們張口結舌；易卜生的凝視，令人想到正在考慮判決的法官。勃蘭兌斯說，他逐漸地灌輸著恐懼，「他的胸中貯存著二十四年的辛酸與仇恨」。任何一個完全了解他的人都不安地意識到，就在他外表下面潛伏著火山般一觸即發的狂怒。

飲酒容易引起脾氣的爆發。除了一段短暫的時期外，易卜生飲酒從不過量，更不是個酒鬼。他從不在工作的時候喝酒。清晨，他總是穿一件剛剛熨燙過的晨衣，頭腦清醒地坐在寫字桌前，毫無醉後的不適。但是他在社交場合則借助酒來克服他那強烈的羞怯和沉默寡言，不過那種能使他的舌頭放鬆的酒精同樣也能燃起他的怒火。在羅馬的斯堪的納維亞俱樂部，他在飯後的怒火已使他聲名狼藉，令人們震驚。而且，這種情況特別容易發生在沒完沒了的表彰和慶祝宴會上，此類宴會是十

九世紀全歐洲和北美的一大特色，尤其為斯堪的納維亞人所喜愛。易卜生似乎參加過上百次此類宴會，結局通常是災難性的。克納松（Frederick Knudtzon）在義大利結識了易卜生，據他講述，在一次氣氛友好的晚宴上，易卜生攻擊了一位身患結核病的（這是那麼多斯堪的納維亞人住在南方的原因之一）年輕畫家洛郎厄（August Lorange）。易卜生說他是個糟透了的畫家：「你不配用兩條腿走路，而應該用四肢在地上爬行。」克納松補充說：「他對這個不曾冒犯過他人又毫無防備的青年的攻擊，令我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雖然易卜生沒有猛擊他的腦袋，這個不幸的肺結核病人也應該好好和他理論一番了。」最後，當他們準備離席時，易卜生已經踉踉跄跄，不得不被人送回家去。不幸的是，酒雖然在下面敲打他的兩條腿，但不一定能讓他那條野蠻的舌頭平靜下來。在羅馬的另一次晚宴之後，保利和挪威畫家羅斯（Christian Ross）把披掛著所有獎章的易卜生送回家，他「喋喋不休地數落我們的不是，以表明他對我們的感激和信任。他說我是個『討厭、自負的青年』，而羅斯是『一個十分討厭的人物』」。一八九一年，勃蘭兌斯為向他表示敬意，在克里斯蒂亞那的格蘭特飯店舉辦盛大的晚宴，而易卜生卻製造了一種「壓抑的氣氛」。當勃蘭兌斯「慷慨地發言頌揚他時」，他卻賣弄地搖晃著腦袋，「拒絕對主人的發言致答詞」，只是說「對於這類演講，任何人都可以說上一大套」。最後他宣稱對挪威文學「一無所知」，這是對主人的侮辱。在其他以他為主客的招待會上，他會別過臉去，不理會其他的客人。有時，他喝得太多，以致只會一個勁兒地重複說：「什麼，什麼，什麼？」

確實，有時也會輪到易卜生自己成為斯堪的納維亞式狂飲的受害者。人們甚至可以寫一本書來

描繪一下當時那些混亂不堪的宴會。一八九八年，在一個專為易卜生舉辦的隆重宴會上，主要發言人斯坎道夫教授喝得酩酊大醉，他的兩位鄰座，一位主教和一位伯爵不得不阻止他。這時，一位客人咯咯笑起來，他大聲嚷道：「閉上你的——嘴，我在發言。」在此同時，易卜生被一個頗具藝術鑒賞力但已喝醉了的畫家緊緊地抱住了，他氣惱地大喊：「把這個人拖開！」清醒的時候，他不會做出過分的、使他內疚的舉動，事實上他很會吹毛求疵。一次，一位裝扮成男人的姑娘被人違例偷偷地帶進羅馬斯堪的納維亞俱樂部，他堅決要求將這名會員開除。任何浮誇或是不合禮儀的行為，都容易激起他的怒火。他是一個發怒專家，對他而言，性情暴躁本身就是一種藝術形式。實際上，他甚至很看重怒火的自然發作形式。他後來寫道，他創作狂暴的詩劇《布朗德》時，「我將一隻蠍子放進啤酒杯擱在桌上。這條蟲子不時地焦躁起來，然後，我將一片熟透了的水果丟進杯中，牠立刻凶猛地刺進去，把毒汁射入水果中，而後牠又恢復了常態。」

他是否從這個生物身上看到自己在發洩胸中的怒氣？他的那些通常隱藏著怒火、有時爆發出來的劇作，是否就是一種深刻的治療行為？沒有人了解易卜生的內心深處，但他的許多熟人都意識到，他早年的生活和奮鬥在他心中留下了巨大而無法平息的怨恨。在這方面，他和盧梭十分相像：他的自我終生都帶有傷痕，結果變成了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怪物。很不公正的是，他認為他的父母親應對他不幸的青年時期負責；他的同胞手足也有連帶的罪責。自從離開希恩以後，他就再也沒有設法同家裡保持連繫。反過來，一八五八年，爲了向他富有的舅舅派於斯借錢，他最後一次去希恩，卻有意地不去探望父母。他同姐姐海德維格有些連繫，但這可能和未還清的債務有關。一八六

七年，他寫給他的同事、作家比昂遜（Bjornstjerne Bjornson，譯註：挪威小說家、詩人、劇作家，詩作《是的，我們熱愛這片土地》被採用為挪威國歌歌詞。一九〇三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一封可怕的信——比昂遜的女兒後來嫁給了易卜生的兒子——他寫道：「怒火增強了我的力量。如果一場戰爭即將來臨，那麼就讓它爆發吧！……我將不會放過母親子宮裡的嬰孩，也不會保留也許激發過人們行動的那些思想和情感，他們將有幸成為我的犧牲品……你知道嗎？我之所以終生都不理會我的父母和全家，是因為我無法忍受繼續保持一種建立在不完全理解基礎上的關係。」他的父親一八七七年去世時，易卜生已有近四十年不曾與他連繫了。他在寫給舅舅的信中為自己辯解說，「主要原因」是「從很早起境況就不允許」。他真正的意思是指他們已經敗落了，而他正在上升，他不想被他們牽累。他以他們為恥，擔心他們可能會提出經濟上的要求。他越富有，越有能力幫助他們，就越不想與他們聯絡。他從未試圖幫助過他那跛足的弟弟亞歷山大——他最後去了美國並死於一八八八年，終年五十三歲，墓碑刻著：「為陌生人所敬愛，為陌生人所哀悼。」同樣地，易卜生也沒理睬最小的弟弟派於斯，他先後做過水手、店主和燈塔看守人。奧勒的生活一直十分窮困，但卻是唯一幫助過他們可憐的父親的孩子。易卜生曾為他寫過一封求職介紹信，但從沒給過他一分錢，也不曾在遺囑中留給他任何東西；一九一七年，奧勒死在一家老人收容所裡，一貧如洗。

在正常的家庭生活背後，有一個被更加小心地隱藏起來的、痛苦的故事。這故事可能出自易卜生自己的某齣戲劇——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易卜生的整個一生就是一齣遮遮掩掩的易卜生式戲劇。一八四六年，他十八歲，仍然生活在那家藥房，他與那兒僱用的一位比他年長十歲的女僕金斯達特

私通，對方並且懷孕了，一八四六年十月九日生下一個男孩，取名漢斯。這姑娘不是一個目不識丁的鄉下人，而是出身於一個頗有聲望的自由農場主家庭，祖父勞夫特斯曾領導一次著名的反抗丹麥統治的農民起義，死時被綁在阿克舒斯塞（Akershus Fortress）內的岩石上。這姑娘是個極其謹慎的人，她回到父母身邊，生下了孩子，此後再沒有指望從孩子的父親那裡得到任何東西。但是按照挪威法律及地方議會的法令，易卜生必須支付撫養費，直至漢斯十四歲。易卜生本來就很貧困，因此十分痛恨對他微薄薪酬的這種搜刮，就再也不能原諒那孩子和他母親。就像盧梭一樣，他從來不承認漢斯是自己的兒子，也從不關心他，或是甘願從經濟上或其他方面給這孩子最微小的幫助。男孩後來成了鐵匠，一直和母親生活在一起，直到二十九歲。金斯達特的眼睛瞎了，她父母的房子被奪走了，於是就住進一間小棚屋，她的兒子在岩石上刻上「饑餓之山」幾個字。金斯達特死時也是一貧如洗，那是一八九二年六月五日，終年七十四歲，易卜生很可能不知道她的死訊。

漢斯絕不是一個粗魯的人，他曾閱讀過大量的書籍，特別是歷史著作和遊記，他還是熟練的小提琴製造師。但他常常喝醉酒，生活得過且過。他有時到克里斯蒂亞那去，那裡了解他秘密的人都為他酷似其大名鼎鼎的父親而震驚。他們中的一些人設想了一個計畫，讓漢斯穿上和易卜生相似的衣服，然後，一大早就坐到格蘭特飯店裡那位名人通常占用的桌子前，這樣，當易卜生早晨前來享用他的啤酒時，他將面對他自己犯下的罪孽的直接證據。然而，他們沒有膽量這麼做。研究易卜生的權威布爾（Francis Bull）說，漢斯只與他的父親見過一次面。那是在一八九二年，身無分文的兒子來到父親的寓所想要點錢。易卜生開門，顯然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兒子，那時漢斯已經四十六

歲。他沒再否認他們之間的關係，但他只給了漢斯五個克郎，並說道：「這是我給你母親的，對你來說足夠了。」——然後，當著他的面砰的一聲關上大門。父親與兒子再也不曾相見，漢斯從易卜生的遺產中一無所得。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日，他窮困潦倒地死去了。

毫無疑問，易卜生排斥他的子女們，無論是合法的或私生的，其原因之一是擔心他們覬覦他的錢。早年生活的貧困給他留下渴求安全的永久傷痛，唯有不斷地賺取、積聚和保存金錢，才能緩解痛苦。這是他生活中的一股強大驅動力。他的吝嗇與他的其他任何方面一樣，都是超人一等的。爲了錢，他隨時準備撒謊。他私底下仇恨君主政體，是個無神論者，因而他寫給卡爾十五世的申請一百英鎊年金的請願書就顯得出人意料：「我並非在爭取某種掛名職務，而是爲我所堅信的上帝賦予我的使命奮鬥……這取決於陛下崇高的幫助，我是否必須保持沉默，屈服於那種傷害心靈的最殘酷的剝奪，當我已確知被賦予了戰鬥的精神武器時，這種剝奪卻逼迫人放棄生命的使命去屈膝投降。」這時（一八六六），他因《布朗德》已稍有收益，開始存錢。他先是將銀幣藏在一條短襪中，然後發展到購買政府發行的債券。在義大利，流亡的同伴注意到他把哪怕是最微小的花費都記在筆記本上。從一八七〇到一九〇〇年他第一次中風，保留著兩本黑色的筆記簿，一本用來記載收入，另一本則記錄投資，他的投資全都是絕對保險的政府債券。直到他生命的最後十年，按照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標準，他的收入不論怎樣都算不上豐厚，因爲他的劇作很遲才得以在世界各地上演，而且，任何情況下，版權都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但是，一八八〇年，他的收入首次超過一千英鎊，根據當時挪威人的標準，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他的財產總額繼續穩步增長，投資也是如此。實際

上，很可能沒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樣把個人收益中如此大的部分用於投資，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五年裡，他投資的比例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間。這一切都是爲了什麼呢？當他的婚生子西居爾問道，他們爲什麼生活得如此儉樸時，他回答說：「睡得好而吃不好，比吃得好而睡不好強。」儘管他的財富在增加，他和他的家依舊住在陳舊的房子裡。他說他羨慕比昂遜，因爲他擁有房子與土地，但他自己從不打算購買任何房產，甚至不買家具。易卜生最後在維多利亞街和阿賓斯街（Arbiens Street）的寓所，與他過去的住處一樣，不像是私人住宅倒像旅館。

但是，易卜生所有的寓所都有一個不同尋常的特徵：這些寓所看起來被分成了兩半，丈夫和妻子各自占領一個獨立的堡壘，以進行防禦和向對方發起進攻。這是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履行他年輕時的誓言，因爲他曾告訴他最早的朋友迪尤「他的妻子，如果他會有一個妻子的話，就必須住在單獨的樓層裡。他們只有在吃飯的時候才見面，而且彼此也不以『你』稱呼」。訂婚之後經過冷淡的兩年，一八五八年，易卜生與卑爾根市教長的女兒蘇姍娜結爲夫婦。蘇姍娜喜好讀書，勇於決斷，相貌平平，但有一頭漂亮的秀髮。她那位頗有才學的繼母托勒森夫人曾經蔑地談起易卜生，說除了齊克果，她不知道還有誰「如此明顯地強迫自己孤獨」。這場婚姻有用但不溫馨。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對易卜生的成功是至關重要的。因爲他的劇作不是被拒絕就是失敗，他的精神一度極爲沮喪，他認真地考慮起發展自己的另一才能，即繪畫，而她則竭力阻止，強迫他每天堅持寫作。正如西居爾後來所說的：「世界將感謝我的母親，她使人間少了一位拙劣的畫家，卻得到了一位偉大的作家。」西居爾生於一八五九年，他總是將其母親描繪成易卜生身後的力量：「他是天才，她是他的志氣。」

他知道這一點，但儘管他到生命的盡頭，也不會甘願承認這一點。」

很自然，西居爾把這場婚姻描繪成工作上的合作關係，而當時其他人，包括易卜生自己卻並不這麼認為。根據一位年輕的丹麥人施內克盧特（Martin Schneckloth）的日記，易卜生一家在義大利的生活是一派淒涼。他寫道，易卜生陷入「絕望的處境」，因為他發現自己娶了一個他並不愛的女人，而且「不可能和解」。他發現易卜生「個性專橫、固執，以自我為中心，跟他熱情的男子氣奇怪地混合的，是他個性的懦弱與強制的理想主義，然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不屑於表達那些理想：而她是十足的女性氣度，雖不老練，但性格沉穩、堅定，明智和愚蠢混合在一起，不乏感情但缺少謙和與女性的愛心……他們彼此向對方發起戰爭，殘酷而無情，可是她依然愛著他，即使只是因為他們的兒子。他們可憐的兒子命運最悲慘，這是任何其他孩子從未有過的。」他繼續寫道：「易卜生自己一心只顧他的工作，以致那句箴言『人性第一，藝術第二』實際上已經被顛倒了。我認為他對妻子的愛早就消亡了……他現在的罪過在於他不能訓誡自己去糾正這種處境，反而一定要把他那種喜怒無常、專橫暴虐的個性，凌駕於妻子和他們心靈扭曲、滿懷恐懼的可憐的兒子頭上。」面對易卜生冷酷的自私，蘇姍娜並非毫無防禦之力。比昂遜的妻子曾引述她在西居爾出生後所說的話，她說再也不會有孩子了，這也就意味著不再有性生活了（不過她是個有敵意的見證人）。離婚的謠言不時地冒出來。易卜生的確憎惡婚姻，他在二一八八三年寫道：「婚姻使每個人都戴上奴隸的標記。」但是，出於謹慎和渴望安全，他始終維持著自己的婚姻。在一封他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七日寄給妻子的怪信中，他激烈地否認他將離開她而心向希爾杜的謠傳，並把這些謠言歸咎於他所憎惡的

托勒森夫人。易卜生常常對妻子十分苛刻和不滿，但是蘇姍娜知道如何施行報復。當他發火時，她只不過當面嘲笑他，心裡明白他天生膽怯而且懼怕暴力。她甚至耍弄他的恐懼感，搜集報上登載有關日常慘禍的恐怖報導給他看。綜合說來，他們不可能是和睦相處的一對。

缺乏憐憫之心

易卜生對他的朋友們同樣態度冷淡，時常發火。也許，朋友這個字不夠確切。對他的作家伙伴比昂遜，他同別人一樣了解，而且相識更久，但他們之間的通信讀起來卻令人痛心。他把比昂遜看成競爭對手，而且妒忌他早年的成功、外向的性格、他的快樂、友好的風格和他明顯善於享受生活的能力。事實上，比昂遜不遺餘力地幫助易卜生贏得公眾的認同，而易卜生冷酷無情的忘恩負義，卻令人感到卑鄙。他們的關係類似於盧梭與狄德羅，像盧梭一樣，易卜生是索取，而比昂遜則是給予，儘管他們之間最後沒有爆發一場引人注目的爭吵。

易卜生覺得互利互惠是件難事，鑒於比昂遜爲他所做的一切，比昂遜六十歲生日時，在別人的勸告下，易卜生終於發出一封賀電，這是一個最低熱度的傑作：「易卜生祝您生日快樂。」但他卻期待比昂遜能盡力爲他效勞。當評論家彼得森（Clemens Petersen）就《培爾·金特》發表了一篇充滿敵意的評論時，易卜生給比昂遜寫了一封憤怒的信，但後者與此卻沒有任何關係。易卜生爲何不打倒彼得森呢？他說：「在任由他故意冒犯真理和正義之前，我本可以打得他毫無知覺。」第二

天，他在附言中又寫道：「我有意把這些話留到冷靜下來時閱讀……無論如何，我要把信寄出去。」然後，他又激動了起來，繼續寫道：「我只是因為你毫無行動才責備你，你不該什麼都不做，允許有人在我缺席的情況下，把我的聲譽放在拍賣師的錘子下面。」

但是，易卜生一邊期望著比昂遜為自己進行爭辯，一邊又把他當做一個嘲諷遊戲的好材料。易卜生所扮演的正是他自己的劇作《青年同盟》中的那個令人厭惡的角色史丹斯戈，一個攻擊進步運動的殘暴成性的人。這部作品是忘恩負義的紀念碑。易卜生在劇中，將攻擊面擴大到所有在經濟上接濟過他、為他申請政府補貼而簽過名的人。依照他的觀點，任何有聲望的人都是合理的攻擊目標；然而，任何對他的微小觸及又令他十分痛恨。保爾森出版了一部小說，描寫一位專橫跋扈、嗜好獎章的父親。易卜生抓住一次機會，在他送給自己的請柬背面寫上「惡棍」，然後公開地在聚會上將它遞還給保爾森——十年後，昆斯貝里侯爵用到王爾德身上的也是同一種手段。

實際上，易卜生同其他所有作家的關係都是以爭吵告終，即便不會發生過任何爭執，這種關係也將因營養不良而死亡。他不會遵循約翰遜博士的勸告：「友誼的維持必須依賴於不斷地修補。」他總是使友誼處於緊張狀態，其間穿插著一段段的沉寂，也總是另一方做出努力。事實上，他近乎表達了一種反友誼哲學。勃蘭兌斯由於違背禮俗同一位有夫之婦同居，而遭到哥本哈根人排斥，他寫信給易卜生，抱怨他沒有朋友了，易卜生回答道：「當一個人像你一樣的處境時」——其言外之意是「我的情況也是如此」——「如果緊張地投入到他終生的事業當中，他實際上就不可能指望有朋友……朋友是一種昂貴的奢侈品，如果一個人在一生中將他的資本投入到一種天職或使命中去，他

就無力再承受友情。朋友的昂貴之處不在於爲他們做了什麼，而在於爲他們著想。許多超凡的雄心都因此而破滅。我已經歷過這種事，這便是爲什麼我等待了許多年才取得了我所盼望的成功。」正如我們所考察的其他知識分子一樣，這封冷酷的、透露真情的信，揭示了公開的信條與個人弱點之間的內在連繫。易卜生是在對人性講話：「成爲你自己！」然而在這封信中，他實際上承認，成爲自我必然包含著他人的犧牲。從根本上來說，個人的解放是無情的，是以自我爲中心的。從易卜生來看，他如果沒有忽略、漠視甚至在需要時蹂躪他人，他就不可能成爲一位卓有成就的劇作家。易卜生藝術方法的核心，是創造性的自利原則。正如他給托勒森夫人的信中所寫的：「大多數批評都可以歸結爲指責作家想保持自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護自我的本性，使它保持純粹，並從所有侵犯它的因素中解放出來。」

創造性的自利，是易卜生將自己性格中的缺陷轉化爲力量源泉的一種嘗試。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就常常表現出令人驚訝的孤獨，他的老師評論道：「一張老人面孔，一種內省人格。」一位與他同時代的人作證說：「我們這些小男孩不喜歡他，因爲他脾氣總是那麼壞。」只有一次聽到他「像其他人一樣」發出笑聲。以後，到青年時期，貧困使他越發孤僻：他會獨自一人長時間地外出散步，這樣，同寓所中的其他客人與僕人以爲他出門吃飯去了（令人傷感的是，易卜生的自私後來迫使他的兒子採用類似的花招；因爲不願邀請其他男孩到他那陰森森的家裡做客，他就告訴他們，他的母親是個體格強壯的黑人，她把他的弟弟囚禁在一個箱子裡，而實際上他根本沒有這樣一個弟弟）。易卜生漫長而孤獨的散步逐漸變成習慣，他寫道：「我曾經身背一個背包，在不同的時間徒步

漫遊了多數信奉天主教的國家。」易卜生是個天生的流亡者；他至少把周圍的社會看做是異己的，常常把它看做是敵對的。年輕時，他寫道：「我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戰爭狀態，對手是囚禁我的小社區。」

因此，易卜生選擇實際的流亡生活，度過他一生最漫長、也最富創造性的階段，也就不足為怪了。這種狀況加深了他的疏離感，也使他封閉在充滿爭吵與敵意的、極其狹小的移民群體中。易卜生開始意識到被隔絕的缺點，一八五八年，他在的一封信中描述自己「被封閉在一種令人困窘的冷漠之中，這使別人難以與我建立起親近的關係……相信我，從十月黨人的立場來觀察這個世界，不是令人愉快的」。然而六年以後，他開始安於自己在與人交往方面的無能。一八六四年，他寫信給比昂遜：「我不能與那些給予自己自由並毫無保留的人建立起親密的關係……我寧願（將真實的自我）封閉起來。」他的孤寂變得富有創造性，它本身成爲一種主題。從他現存最早寫於一八四七年的詩作〈辭職〉，到一八七〇至七一年中止創作爲止，孤獨始終是他詩中潛在的主題。正如勃蘭兌斯所說：「這是一本關於孤獨的詩集，它描述了孤獨的需要，孤獨的衝突，孤獨的反抗。」他的創作反映了內心的孤獨，成爲他的防禦物、避難所和一種武器，以對抗異化的世界；正如施內克盧特對他在義大利的生活所做的評述，「他所有的思想和激情」都獻給了「對文學聲譽著了魔般的追求」。他漸漸開始把他自高自大的孤獨與自我隱蔽，看成一種必不可少策略，甚至是一種優點。他告訴勃蘭兌斯，整個人類生存狀況如一艘失事的船，因此「唯一明智的行動就是拯救自己」。晚年時，他勸導一位年輕的婦女：「你絕不要把任何事情告訴別人……人生最有價值的事情就是保守秘密。」

不過，以爲這樣的方針能執行下去自然是不現實的，它蛻化成對人類普遍的敵意。勃蘭兌斯不

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他無限地藐視人類。」他仇恨的探照燈系統地掃過人類社會的所有方面，它似乎是示愛般地不時停落在某些特別激起他憎惡的思想和制度上。他憎恨保守主義者。也許他是第一位這樣的作家——他物色到的人才將變成一支龐大的軍隊——勸說一個保守的政府資助一位作家，這位作家致力於攻擊這個政府所珍惜的一切（當他再次申請更多的資助時，政府撥款部門的一位成員里德沃爾說，易卜生應受一頓痛打而不是另一筆補助金）。對於自由主義者，易卜生甚至更加仇恨，說他們是「可憐的廢物，人類的路障」，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偽君子、撒謊者、胡說八道的傢伙和雜種狗」。他和他同時代的托爾斯泰一樣，也特別厭惡議會制度，在他看來，這是無窮盡的腐敗和欺瞞的根源；他喜歡俄國的原因之一就是那兒沒有議會。他憎惡民主。正如揚松（Kristofer Janson）的日記中所說的，他隨意講出的格言讀起來讓人感到可怖。「大多數是什麼？是無知的群眾。智慧總是屬於少數人。」他認為，大多數人「沒有資格持有觀點」。他對勃蘭兌斯說過類似的話：「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把自己與任何有大多數人支持的黨派聯在一起。」如果他把自己看成何種人的話，那就是無政府主義者，他愚蠢地相信（正如以後的許多人一樣）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本質上是相同的。「必須廢除政府」，他對喜歡收集他各種觀點的勃蘭兌斯這樣說道：「現在有一場革命，我將樂於助其一臂之力，消滅國家的概念，建立自由意志的原則。」

易卜生認為，對於公眾生活，他具有始終如一的哲學。他把自己喜歡的一句話給了他劇中的角色斯多克芒醫生：「少數人總是正確的。」他向勃蘭兌斯解釋，所謂少數人指的是「那些提前進入大多數人還未能達到的領域的人」。在某種程度上，他把自己看做斯多克芒醫生，他對勃蘭兌斯說：

知識界的先行者無法讓大多數人聚集在他的周圍。十年以後，大多數人可以達到斯多克芒醫生在人們聚會時所站立的地點。然而在這十年裡，這位醫生並非站立不動的：他至少比其他人超前了十年。大多數人，群眾、烏合之眾永遠無法趕上他；他也絕不可能把他們召集在身後。我自己感受到一種類似的、毫不減弱的壓力迫使我前進。人們現在站在我寫作早期作品時的位置上，但我自己已不在那兒了，我已到達別的地點——遠遠地在他們的前面——或者說我希望如此。

這種觀點本身是典型維多利亞式的，問題在於它假定已覺醒的少數人引導人類永遠朝著一個令人嚮往的方向前進。易卜生從沒有想到過，少數人——即後來列寧所謂的「先驅中的精英」或希特勒說的「旗手」——可能將人類引入深淵。易卜生如果目睹二十世紀的種種過分行爲，一定會感到驚訝和恐懼，然而對這一世紀思想的形成，他竟起了那麼大的作用。

易卜生自稱能預見未來，但他對未來的理解卻極其錯誤，其原因在於他個性中天生的缺陷，他沒有同情別人的能力，這種個性正與他的思想對立。當個人與群體就像他劇本所表現的那樣，只是體現思想時，他能夠以深刻的洞察力和豐富的同理心對待他們。然而，一旦他們成爲真實的人走進他的生活，他就急忙逃開或露出敵意。他最後的一系列劇作強有力地掌握了人類的心理，也正符合他自己在生活中爭吵、發火和憤世嫉俗，以及他在不多的私人關係中注定惡化的狀態。他對公眾的態度，也反映出思想與現實的對立。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他給克里斯蒂亞那的工人聯盟發了一份電報：「在我國所有階級中，工人階級使我感到最爲親近。」這是謊話，除了他的錢袋，任何東

西都不會讓他感到親近。在現實生活中，他從來沒有對工人表示過絲毫的關注，對他們的見解也只有蔑視。沒有任何資料能夠證明他曾幫助過工人運動。另外，他發現迎合學生是精明之舉；反過來，他們喜歡以點燃火炬的隊伍向他表示敬意。但是，他與他們的實際交往在一場激烈的爭吵中結束了，這是從一八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寫給挪威學生同盟的一封信中反映出來的，他在信中痛斥他們當中「占優勢的反動分子」。

喜歡年輕姑娘

相同的故事也發生在他和女性的關係之中。從理論上看，他是站在她們這一邊的，可以說，對於最終改進婦女的社會地位，他比十九世紀任何作家都做得更多。一部《玩偶之家》帶來了明確的信息——婚姻並非神聖不可侵犯的，丈夫的權威遭到公開的挑戰，自我發現比其他任何事情更為重要——這些真正揭開了婦女運動的序幕。他對婦女描述的才能無人可以超越。正如《海達·高布樂》所顯示的，幾乎沒有人在表現女性情感世界方面能與他並駕齊驅。公正地說，在現實生活中，正如在具體觀念上，他不時地設法幫助婦女。一次宴會上，他醉酒後發言，表示贊成婦女進入羅馬斯堪的納維亞俱樂部，當時場面特別激動，也許不會為她們帶來多少益處——聽眾中的一位伯爵夫人驚恐之下昏厥過去。但是，對於真正參與這一事業的婦女，尤其那些同樣是作家的女性，他根本毫無耐心。一八九一年在勃蘭兌斯於格蘭特飯店為他舉辦的那場災難性的晚宴上，當他發現他被安排在中

年女畫家謝蘭（Kitty Kielland）的身邊時，他火了。謝蘭大膽地批評了《海達·高布樂》中愛爾務斯泰夫人的性格，他粗暴地回答道：「我寫作是爲了描繪人，我對狂熱的女學者們喜歡或不喜歡什麼毫不關心。」在他看來，所謂地獄，就是參加一個時間較長的宴會時，座位挨著一位年老的、鼓吹婦女參政的女人或女作家——而在二八九〇年代，在所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首都，這兩種人都十分多。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他想方設法逃避挪威婦女權力聯盟以他的名義在克里斯蒂亞那舉行的一個正式大型晚宴。當他無法避開時，就做了一場很能代表其個性的、怒氣沖沖的演說。在斯德哥爾摩兩個婦女社團聯合爲他舉辦的晚宴上，他脾氣同樣暴躁；不過災難還是避免了，因爲女士們有所察覺，於是讓年輕漂亮的姑娘們表演民間舞蹈，眾所周知，易卜生非常喜歡她們。

跳舞的姑娘中有位羅莎，她的母親是一位寫兒童故事的作者。羅莎後來成爲一長列姑娘中最後一位與易卜生有過複雜的、從某種意義上看也是極不穩定關係的人。易卜生似乎總是對非常年輕的女孩有興趣，這使他痛苦地聯想起他沒有實現的願望。他在卑爾根劇院工作時，第一次真誠地愛上了一位年僅十五歲的姑娘亨利可。但是他沒有錢，豪斯特的父親反對，於是事情也就不了了之。等到他第一次獲得成功時，他自覺已太老太醜了。如果他去爭取一位比他年輕許多的姑娘，就有遭受斷然拒絕的危險。儘管如此，他仍繼續締結著危險的私交。一八七〇年，與才華橫溢的婦女右翼分子勞拉交往；四年以後，同他那年老女房東年僅十歲的孫女希爾德交往。這種喜好並沒有隨著年齡的增長有所減弱，而是恰恰相反。他被老年歌德與美麗的威廉默的感情故事吸引了，歌德的這種情感使他的藝術作品重新煥發青春。女演員只要年輕美貌，通常能夠說服易卜生去做她們想要他做的

事情，當她們把其他年輕姑娘介紹給他時，就更是如此。他到斯堪的納維亞各國首府去訪問時，姑娘們會聚集在他下榻的旅館周圍；有時，他願意同她們交談，並且親吻她們，贈送一張他自己的照片。一般說來，他喜歡年輕姑娘，但他的興趣常常特別集中於一個人身上，一八九一年時是喜爾朵，羅莎則是最後一個。

她們當中最重要的是愛米莉和海倫娜兩人，一八八九年易卜生在阿爾卑斯山區度假時認識了她們。她們的日記和許多信件都保存至今。愛米莉是一位十八歲的奧地利姑娘（易卜生年長她四十三歲），她在日記中寫道：「他的熱情應該使我感到驕傲……他對我所說的話充滿了強烈感情……他說，在他整個一生中，從來沒有在結識任何人時感到如此快樂。他從來沒有像讚美我這樣讚美過任何人。」他請求她「對他絕對地坦誠，這樣我們就可以成爲合作伙伴」。她認爲自己愛上了他，「但是，我們倆都覺得在公開場合最好仍像兩個陌生人那樣。」他們分手後，易卜生寫給她的信完全不會給她帶來任何傷害。四十年後，她告訴作家楚克爾（E. A. Zucker）說，他們甚至從來沒有親吻過；但是她又說易卜生曾提到過他離婚的可能性——然後他們將結婚和周遊世界。海倫娜是一位更爲老練的、來自慕尼黑的城市姑娘，她允許他親吻，但她心裡明白，他們的關係是浪漫的、書本上的，不是性關係，也不是嚴肅的。當她問他是如何看待她的，易卜生回答道：「妳非常年輕，還是一個孩子，妳是青春的化身，我的創作需要這些。」這句話自然解釋了他所謂的「合作伙伴」的含意。四十年後，海倫娜寫道：「他同年輕姑娘們的關係，絲毫沒有通常意義上的、對妻子不忠的成分，這只是出於他的想像力的需要。」這樣的姑娘是爲他的戲劇所採用的原型，是觀念製造出來的

血肉之軀，而不是具有感情的、由於她們自身而令他希望去喜愛的活生生的女人。

因此，易卜生不可能認真考慮過與這些姑娘中的某一個發生性關係，更別提結婚了。他對性有極大的抑制力，他的醫生布爾說，即使進行醫療檢查，他也不願暴露性器官。那兒是否有什麼毛病——或者他認為有毛病？至少從理論上講，易卜生是一個深諳女性心理的人，有人想把他稱作男性調情者。他確實是引著愛米莉往前走。愛米莉是個想像力過於豐富的姑娘，無疑也很愚蠢，她沒有想到易卜生在利用她。一八九一年二月，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東西，於是中斷了他們之間的通信。同月，評論家伊萊亞斯（Julius Elias）說，一次在柏林用過午餐後，易卜生告訴他：

他在提羅爾（Tyrol）遇見了……一位個性鮮明的維也納姑娘，她立刻把他引為知己……她對嫁給某位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的想法毫無興趣……誘惑她、令她迷戀和高興的事情，是引誘其他女人的丈夫離開她們。她是一個有魔法的小破壞者……一隻捕食的小鳥，她非常高興將易卜生歸入被她征服的人當中。他非常非常仔細地研究過她，她在他身上並沒有獲得真正的成功。「她沒有抓住我，而是我抓住了她——爲了我的戲劇。」

簡而言之，易卜生只不過利用愛米莉來對他劇中的一個人物進行設計，即《建築師》中的房格爾，他在創作時進行了改造，將她寫成一個應受指責的角色。從伊萊亞斯的敘述及一段時間後所發表的易卜生信件，使得人們都認為可憐的愛米莉就是喜爾朵。在她漫長的一生中（她始終獨身一

人，終年九十二歲），大部分時間被當成邪惡的女人而遭譴責。易卜生不僅把真實的人放入他的構思中，而且在無所顧忌地暴露她們時，冷酷地漠視她們的情感，這都是他特有的行徑。勞拉是最慘的例子，她是一位不幸的挪威少婦，易卜生曾與她見過幾次面。她的生活受到丈夫巨大的影響，她想幫助丈夫，就去偷竊；當她的罪行被察覺時，丈夫把她看成是累贅和恥辱，而且一度把她送進了精神病院。易卜生把她看成受壓迫的婦女的象徵——又一個觀念製造的人物，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並用她塑造了他的《玩偶之家》中的虛構人物娜拉。這部光彩奪目的劇作，吸引了世界廣大公眾的注意，他們自然將刺眼的聚光燈投射到勞拉身上，人們普遍認為她就是原型。她十分痛苦，希望易卜生公開聲明娜拉不是她。這樣做不會使他受到絲毫的損失，但他那封回絕信簡直就是卑鄙騙子的一篇傑作，他說：「我實在不明白勞拉的腦子裡想的是什麼，她總設法把我捲入這些瑣碎的爭吵中去。她建議我發表聲明，證明『她不是娜拉』，這不僅毫無意義，也很荒謬，因為我從沒有說過她是……我想你會贊同我，對我們共同的朋友來說，我最好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

易卜生這種冷酷無情的角色掠奪行爲，不僅涉及與他最親近的人，也包括那些實實在在的陌生人。那部毀了愛米莉一生的劇作，也打擊並傷害了他的妻子，因為人們很自然地把蘇珊娜理解爲《建築師》中索爾尼斯的妻子，她是建築師的合作者，也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這部劇作中還有一個人物佛斯里，也是偷竊了他人性格所塑造的。有位婦女曾好幾次很驚訝地被易卜生邀請共餐，她總是欣然前往。他們的交往突然中斷時，她再次感到有些詫異——當她觀看了這部劇作時才恍然大悟，她從開雅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已經被利用了。

「恰恰相反！」

易卜生經常寫到愛情，畢竟這是他詩集中最重要的主題，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那麼他是在一種否定的意義上表達孤獨的痛苦。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他是否愛過，或能夠愛上一個具體的人，而不是愛上某種思想或作為某種思想化身的人。仇恨才是他更爲真實的感情，而在仇恨的背後，隱藏著一種更爲基本的感情——恐懼。易卜生的個性最深處，潛伏著一種無處不在、未曾言說而又不可言說的恐懼。這可能是他身上最重要的特點。他從母親的身上繼承了膽怯，一有機會，她就把自己鎖在屋子裡。易卜生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也是常把自己關在室內。其他的孩子注意到他的恐懼——例如，他不敢坐雪橇在冰上滑行——終其一生，「懦弱」這個詞總是被那些觀察他的人用到他身上，既是指他的精神，也是指他的行爲。

他的生活中曾經發生過一件特別可怕的事情。那是在一八五一年，他只有二十三歲，正在爲激進派的一份報紙匿名撰寫評論文章。同年七月，警察突然對報社進行搜查並逮捕了他的兩位朋友——阿比爾高和工人領袖特拉內。幸而警察在報社文件裡沒有發現任何東西可以將易卜生與那些文章連繫起來。驚恐之下，他一連隱匿了幾個星期。那兩個人被判監禁七年。易卜生太膽怯了，他既不敢爲他們挺身而出，也不敢對這種野蠻的處罰提出抗議。他是一個善於言而怯於行的人。一八六四年，普魯士侵略丹麥，吞併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他因此憤怒不已，猛烈地斥責挪威政府優柔寡斷，未能援助丹麥，他說：「所有的豬都集中在那裡，我不得不從

中逃出來使自己乾淨些。」然而，他並沒做任何實際的事情來幫助丹麥。一位自願參軍作戰的年輕丹麥學生布魯恩問易卜生——他對其大事聲張的言論早有耳聞——爲何不也去志願投身戰鬥，然而他得到的卻是一個站不住腳的回答：「我們詩人有其他的任務要完成。」易卜生在個人生活上與在政治事務中同樣怯懦。他同第一位戀人亨莉可關係的破裂，僅僅因爲她那令人生畏的父親發現他們兩人坐在一起，而易卜生簡直是驚恐萬分地逃之夭夭。許多年以後，亨莉可已經結婚，他們之間曾有過一次交談，易卜生說：「我奇怪爲什麼我們的關係沒有繼續發展。」亨莉可回答道：「你不記得了嗎？——你逃跑了。」易卜生說：「是的，是的，我在面對面時從來不是一個勇敢的人。」

易卜生是一個上了年紀的、易受驚嚇的兒童，變成了年輕的老婦。他所懼怕的事情若列成表，那可是沒完沒了的。貝瑟（Vilhelm Bergsøe）曾描述一八六七年易卜生站在伊斯基亞島（Ischia）上，擔心懸崖和岩石會坍塌，而且懼怕那兒的高度，他尖叫道：「我要離開這兒，我要回家。」在大街上走著的時候，易卜生總是擔憂瓦片會落在他的頭上。加里波底（Garibaldi）的起義令他極度不安，因爲他害怕大街流血。他也擔心地震，害怕乘船：「我不願和那些那不勒斯人一起乘船，如果遇到風暴，他們只會平躺在船底向聖母馬利亞禱告，而不去把船帆收起來。」他的另一種擔心是害怕霍亂的突然蔓延——實際上，傳染性疾病一直是他最擔憂的事情。一八八〇年八月三十日，他寫信給兒子西居爾說：「我很不贊成你把行李存放在安娜達埃的醫院中的想法，她所照料的孩子都來自那種階級，可以想到天花這類流行病會在他們當中蔓延的。」他懼怕暴風雨，無論在海上還是在陸地上；他害怕洗澡（「很容易引起肌肉痙攣致命性的發作」）；也害怕馬（「馬亂踢的習性是眾所

周知的」及任何一個手拿射擊運動手槍的人（「遠遠地躲開攜帶著這類武器的人」）。他特別懼怕馬車事故。他的腦海中糾纏著冰雹的危險性，他會把冰雹取來測量周長。令孩子們煩惱的是，他堅持吹滅聖誕樹上的蠟燭，因為有引起火災的危險。他的妻子無需用報紙上有關災難的描述來恐嚇他，因為他自己已經匆匆地瀏覽過報紙了——這是他戲劇情節的主要來源——而且戰戰兢兢地研究了這些有關自然災難和人為災難的報導。他寫給西居爾的信件，就是一份份離奇的警告目錄表——「我幾乎讀了每一份登載事故的挪威報紙，這些事故都是由於使用裝有彈藥的火器不慎造成的。」——並且請兒子謹慎小心：「發生任何小事故都請速來電報。」「即使最小的疏忽也會造成最嚴重的後果。」「一舉一動都要小心仔細。」

最讓他感到恐怖的是狗。貝瑟說，有一次在義大利，他被一條馴服的狗嚇住了，然後突然拔腿就跑。這條狗追上去，還咬了他。易卜生大聲喊道：「這條狗瘋了，必須射死牠，否則我也要瘋了。」他「因憤怒而口沫橫飛，而且直到好幾天後，他的恐懼方才消失」。康德松（Krudtson）的記載則更讓人吃驚，確實也更令人不快：事情發生在義大利，易卜生與其他幾位斯堪的納維亞人在一家飯店共進午餐，喝了很多酒，「空中打了一個雷。易卜生似乎一開始心裡就有些憤慨，（它）重重地壓在他的心上，急需某種發洩。」當他們起身準備離去時，易卜生已站不穩，於是有兩個人不得不扶著他行走。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一扇鐵門上，「門後有一條大狗正衝著我們狂吠」。然後：

易卜生手中有一根手杖，現在他開始用手杖捅那條狗。那是一隻像小獅子一樣的龐然大物。

牠跑上前來，易卜生用手杖又戳又打，用各種方法引牠發怒，他成功了。狗衝到門上，易卜生又拿手杖戳打牠，激怒了這條狗。毫無疑問，要是沒有那扇結實的鐵門隔在牠和我們之間，牠會把我們撕成碎片的……易卜生站在那兒戲弄那條狗肯定有六或八分鐘之久。

正如這件事所表明的，易卜生一生的暴躁與他終生的恐懼是緊密相關的，他發怒是因為恐懼，酒精可以麻木恐懼感，但也釋放了怒火；這個怒氣沖沖的男人，體內隱藏著一個膽怯的自我。易卜生早就喪失了信仰，或者他自稱如此，但是直到他進入墳墓都帶著對罪孽和懲罰的恐懼。他厭惡有關宗教的玩笑，他說：「有些東西是不能開玩笑的。」他宣稱基督教「使男人與女人道德敗壞，而且束縛了他們的手腳」，然而他自己卻依然非常迷信。他也許不相信神，但他懼怕魔鬼。他曾在《培爾·金特》上寫道：「生存就是同內心和靈魂中的神魔戰鬥。」比昂遜寫信給他說：「你的頭腦中有許多妖怪，我認爲你應該安撫他們……他們與主人對立而成爲一支危險的軍隊。」易卜生對這一點十分清楚，他提到他的「超級魔鬼——我鎖上我的房門，把他帶出去」。他說：「在我所寫的東西裡一定有妖怪。」他在自己的書桌上放置著一排吐著紅舌頭的橡皮小惡魔。曾有幾次在幾杯烈性酒下肚以後，當他對社會理性的批判瓦解了，變成怒火，這時他看上去彷彿魔鬼附體一般。甚至連他最重要的擁護者阿契爾也認爲，他的政治和哲學觀點，如果仔細研究的話，與其說是激進的，不如說是混亂的。「我越來越確信，」他在一八八七年寫道：「易卜生絕不是一位全方位的思想家，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根本不是有系統的思想家。」阿契爾認爲，易卜生僅僅是唱反調，反駁每一種已

確立的思想原則。挪威小說家溫塞特 (Sigrid Undset) 的父親英瓦爾在羅馬聽了易卜生在半醉狀態下情緒激昂的演講，他曾記下：「他是一個徹底的無政府主義者，想要毀滅一切……人類必須從地基開始重建世界……社會和其他的一切都必須被消滅……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事業就是將現存的結構變成虛無。」這些話是什麼意思？沒有什麼意思，實際上，這只是在一顆不懂得愛或是不會表達愛的心靈深處，恐懼與仇恨爭奪統治所帶出的結果。北半球國家的酒吧裡，塞滿了以同樣方式高談闊論的男人。

從一九〇〇年的那次中風以後，易卜生進入了生命的最後歲月。程度較輕的中風不時地復發，他仍然時而脾氣暴躁，時而憂心忡忡，他那好挖苦人的妻子就看著他。這時他最焦慮的是安全保險的問題，儘管他發火的主要根源在於身體衰弱和極其厭惡被人幫助。通常是怒火占據上風。他的長年護士被告知，一旦她幫助他走到街上，就要立刻走開，如果她沒有這麼做，「易卜生就衝著她揮舞著手杖，於是她逃回寓所。」一位理髮師每天都來替他修面，易卜生從沒有對他說過一個字，只有一次，他突然喃喃地說道：「醜陋的魔鬼！」他死於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蘇姍娜後來聲稱，就在他臨終前，他說道：「我親愛的、親愛的妻子，妳對我一直是那麼好，那麼和藹。」這話聽起來似乎與他的性格完全不符。無論如何，布爾醫生的日記表明，那天下午，他一直昏迷不醒，不能說話。另一種說法似乎合理得多，他最後的一句話是：「恰恰相反！」

5 托爾斯泰——自認是上帝兄長的沒落貴族

高高在上

在我們所考察的所有知識分子中，托爾斯泰（Lea Tolstoy，一八二八—一九一〇）是最雄心勃勃的一個。他的膽大妄為令人敬畏，有時令人恐懼。他逐漸相信，憑藉他自身的才智，以及胸中湧動的精神力量，就能夠改造社會的道德。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的理想是「將人世變成神聖的基督王國」。他把自己看成「從摩西、彌賽亞、孔子、早期希臘人、佛陀、蘇格拉底到巴斯卡、斯賓諾莎、費爾巴哈，以及所有沒沒無聞的知識分子」的使徒和繼承人，「他們從不相信任何教義，而是真誠地按照生命的意義去思考和說話。」但是，托爾斯泰並打算做個「沒沒無聞」的人。從他的日記可以看出，當他還只是個二十五歲的青年時，就意識到一種獨特的力量和統領道德的使命。「今天讀了一篇關於文學天才性格的作品，喚醒了我的自信：無論是工作能力還是工作熱忱，我都是傑出的。」「至今我還未遇到一個像我這樣有道德的人，一個能夠相信我時刻銘記著一生向善並隨時

準備爲之犧牲一切的人。」他感到自己的心靈「無比崇高」，並爲別人不了解他的品質而沮喪：「爲什麼沒有人愛我？我不蠢，也不醜陋，既不邪惡，也非頭腦空空之流。這真是不可理解。」不論他如何努力去同情別人，跟他們打成一片，他仍常感到與別人的某種隔閡。奇怪的是，他感到自己正高踞他人之上，對他們進行道德審判。當他成爲一位作家，也許是所有作家中最偉大的一位時，他便輕而易舉地確認了這種上帝般的力量。他對高爾基說道：「我在寫作的時候，突然對某個角色產生了憐憫之心，於是我就賦予他某種美德，或去掉其他某些人身上的美德，這樣一來，與其他角色相比，他就不會顯得過於黯淡。」而當他成爲一個社會改革者時，那種以上帝自居的欲望也就越發強烈，因爲他的實際規劃和神一樣廣大，正如他自己界定的：「謀求全世界幸福的願望……我們稱之爲上帝。」甚至，他覺得神已占據他整個身心，他在日記中寫道：「幫幫我，天父，駐留在我的軀體中。你和我早已同體，你就是『我』。」但是，正如高爾基所注意到的，托爾斯泰對他的造物主充滿了極度的猜疑，這就阻礙了他與上帝共存於同一個靈魂之中。高爾基說，這種情況使他想到「一個洞穴中的兩頭熊」。有時托爾斯泰似乎會認爲自己是上帝的兄弟，甚至是上帝的兄長。

托爾斯泰爲什麼會對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呢？也許，在他的崇高感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自己的出身。托爾斯泰和易卜生一樣生於一八二八年，但托爾斯泰在那個幅員遼闊的國度裡是世襲統治階級中的一員。在以後的三十多年中，俄國一直保持著被稱爲農奴制的奴隸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依照法律，在農奴家庭，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依附於他們耕種的土地，他們的人身所有權跟隨著地契。直到一八六一年這種制度被廢除時，有些貴族家庭擁有的農奴多達二十萬人。以這種標準

來衡量，托爾斯泰家族還算不上富有。托爾斯泰的祖父與父親都是揮金如土的人，其父拯救自己的方法，是與伏爾康斯基王子（Prince Volkonsky）相貌平平的女兒結婚。但是伏爾康斯基家族地位十分顯赫，是王國的締造者之一，一六一二年，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s）成立時，伏爾康斯基家族的社會地位與羅曼諾夫家族相等。托爾斯泰的外祖父曾經是凱瑟琳大帝的總司令，他母親的嫁妝包括圖拉省（Tula）附近的雅斯納雅波良納莊園。托爾斯泰從母親那兒繼承了這個莊園，占地四千英畝，有三百三十名農奴。

托爾斯泰青年時期很少考慮經營土地的責任，實際上，他變賣了部分地產，用來償還賭債。但是他對自己的爵位、門第及由此帶來進入上流社會沙龍的權利感到驕傲，甚至有些自負。他的文學界朋友們對他的做作和勢利不無吃驚。屠格涅夫寫道：「我無法理解這種對討厭的貴族頭銜的可笑迷戀。」涅克拉索夫（Nekrasov）的評價是：「他使我們大家都感到厭惡。」托爾斯泰竭力想在上流社會和藝術家圈子中占據上風的行徑，令他們頗為不滿。屠格涅夫曾經很生氣地質問他：「你為什麼要到我們中間來呢？這兒不是你待的地方——回到你夫人那裡去吧。」隨著年齡的增長，托爾斯泰摒棄了特權階級許多浮華的秉性，但代之以一種更為深入的土地購買欲，用他的文學創作的收益，以一種王國奠基者般的冷酷無情，貪婪地陸續買下數公頃土地。他不僅擁有土地，而且還統治土地，直到他決定放棄一些土地為止。托爾斯泰的精神實質是獨裁主義，這源自於對土地和農奴的世襲權力。他的兒子伊里亞寫道：「世上的人分為兩類，一部分是我們這樣的人，另一部分是其他所有的人。我們是特殊的人，而其他的人不能與我們相提並論……盲目的自大和自尊被反覆地灌輸進

我們的頭腦，我發現它們是如此根深柢固，難以擺脫，（我的父親）對此負有相當的責任。」直到生命盡頭，托爾斯泰依然認為他天生就是各方面的統治者。高爾基曾提到，直到晚年，托爾斯泰仍然是主子，希望他的意願立刻得到遵從。

與這種根深柢固的統治欲相伴而來的是對被統治的強烈反感。托爾斯泰有著堅定的意志，生活環境則使這種意志力愈發強大。在他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去世了，他的三位哥哥都性格脆弱而且時運不濟，生活放蕩，他由一位身無分文的遠親塔吉亞娜姑母帶大。她竭力想把他撫養成一個有責任感、慷慨無私的人，但她對他並沒有支配的權力。就像盧梭的文章一樣，托爾斯泰描述自己早年生活的作品（少年）及日記，也以真誠的表象迷惑了讀者，實際上，其中隱瞞的成分遠遠多於披露的部分。例如，他描述了如何被一位凶惡的家庭教師聖托馬斯先生打罵，「這就是我一生都對任何形式的暴力心懷恐懼和厭惡的原因之一。」事實上，直到晚年，托爾斯泰對各種形式的暴力從不感到驚訝，其中包括他自己狂暴的天性。至於說到聖托馬斯，在托爾斯泰九歲時，這位家庭教師就管不住他了，自此以後，他就開始隨心所欲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學校裡讀自己想讀的書，想工作時就工作（常常十分努力）。十二歲開始寫詩，十六歲考入伏爾加河畔的喀山大學（Kazan University），出於將來從事外交工作的考慮，他曾一度在東方語文學系讀書，以後他還學過法律。十九歲時，托爾斯泰放棄大學教育，回到雅斯納雅波良納，開始自修。他既讀了流行小說——德·科克（de Kock）、大仲馬、尤金·蘇（Eugene Sue）的作品，也讀了笛卡兒，特別是盧梭的著作。在許多重要的方面，他是盧梭身後的學生；托爾斯泰晚年時說，除了新約中的耶穌基督，盧梭是對

他影響最大的人。他從盧梭身上發現了相似的精神，另一個巨大的自我，盧梭也意識到最高的善，並急切地想把它傳授給世界。與盧梭一樣，托爾斯泰基本上是靠自學，同時也具有自修者的傲慢、缺乏安全感，以及知識分子的敏感等所有特點。在成爲一位職業作家以前，他也與盧梭一樣曾嘗試過許多工作——外交、法律、教育改革、農業、服軍役、音樂。

軍旅生涯

托爾斯泰以一個初級軍官的身分在軍中服役，幾乎是偶然地，他發現了自己的專長。一八五一年，二十二歲的托爾斯泰來到高加索，他的哥哥尼古拉正在那兒服役。而他到那兒去並沒有實際的動機，只是想找點事情做以消磨時光。他榮獲了幾枚勳章，這使他在沙龍中爲人注意。托爾斯泰在軍隊裡度過了將近五年時光，先是在前線山區作戰，然後在克里米亞抗擊英國人、法國人和土耳其人。他是傲慢的俄羅斯帝制的擁護者。當他被軍隊僱用並被派往砲兵部隊時——當地人沒有火砲——他寫信給哥哥謝爾蓋說：「我將全力以赴地用槍打垮那些掠奪成性的狂暴亞洲人。」實際上，他從不否認他支持俄羅斯帝國主義或沙文主義精神，他堅信，俄羅斯是一個獨特的種族，具有獨一無二的道德品質（具體表現在農民身上），肩負著上帝賦予在人世間履行職責的使命。

這些也是托爾斯泰的軍官同事們簡單而又未說出口的信念，托爾斯泰的想法正反映了他們的想法。但是，他感到自己在另外一些方面又與眾不同。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必須永遠習慣於這樣

想：我是一個例外，我站在自己時代的前面，或者說，我是那種不肯妥協、不能適應環境的人，並且永遠不會滿足。」軍隊中對他的看法各不相同，有的人認為他謙遜，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他「一臉不知天高地厚、志得意滿的神情」。不過，他們都注意到他那凶狠、憤懣的注視，時時令人敬畏的眼睛，任何人都會在他的注視下退縮。無論是否在戰場都沒有人懷疑他的勇敢，這是他強大的意志所起的作用。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他就逼著自己學習騎馬，他克服了羞澀的毛病。他還強迫自己去狩獵，包括危險的獵熊活動；由於驕傲自大而放鬆了警惕，他第一次去獵熊時就受了重傷，幾乎丟了性命。在軍隊中，他在砲火下表現勇敢，終於被升為准尉，但是他想榮獲勳章的努力卻落了空。他曾三次被推薦受勳，但在某一層次上受到阻礙。在軍隊裡，誰急於得到勳章很容易被人察覺，引起反感。實際上，托爾斯泰並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軍官，他不僅態度傲慢，不願服從和學習，而且與同事不能團結。他是個不合群、獨來獨往的人。如果看不到有益前程的事，他會擅自離開前線。他的上校說：「托爾斯泰急於嗅到火藥味，但這只是間歇性的。」他設法避開「與戰爭相伴的困難和艱苦。他常像個遊客似地四處遊盪，但是一旦聽到射擊聲，他會立刻出現在戰場上。等到戰鬥結束，什麼時候他一高興，就又隨心所欲，不知去向了」。

托爾斯泰一直都喜歡做戲。他甘願犧牲舒適、享樂甚至生命，只要他的所作所為顯得崇高，有戲劇效果，能夠為人矚目。還是學生的時候，為了強調自己身上的俄羅斯人剛毅性格，托爾斯泰為自己做了一個可兼作斗篷的軍用睡袋。他的這種姿態引起了周圍人的評頭論足。在軍隊中，他更願意表現而不願意服務，那些繁瑣的日常事務，以及軍隊生活中任何不能帶來聲譽或不為別人注意的

東西，他都不感興趣。因此，通常的情況是：他的英勇、美德和尊嚴是為公眾舞台，而不是為單調乏味、沒沒無聞的日常事務而預備的。

不過，從某個方面來看，他的軍旅生涯確實具有傳奇色彩。這期間，他使自己成為一名出色的作家。回頭來看，托爾斯泰顯然是一位天生的作家。根據他後來的敘述，同樣明顯的是，從很小的時候起，他就能通過準確的細節觀察自然和人，這一點無人能超越。但是，天生的作家卻並不一定能成為真正的作家。在參軍途中第一次看到高加索群山時，他就開始顯露出在這兩方面具有的過人天賦。壯麗的景色不僅使他大開眼界，喚起心中一直處於沉睡狀態的衝動——將這一切訴諸文字，而且激發了他第三個突出的特徵——他體悟到上帝的崇高，並希望自己以某種方式與之融為一體。很快，他寫出了《童年》，然後又寫了反映軍旅生活的故事和速寫：《襲擊》、《哥薩克》、《伐木》、《彈子房記分人的筆記》、三篇《塞伐斯托波爾速寫》、《少年》（《青年》的一部分）、《一個地主的早晨》、《聖誕夜》。《童年》於一八五二年七月寄出，發表後極為成功；《哥薩克》當時沒有寫完，以後又花了十年時間；《聖誕夜》一直沒有完成，托爾斯泰將其中部分素材，即反抗車臣首領沙米爾的戰爭內容保留在他最後那篇傑出的小說《哈澤爾·穆巴拉特》中，他寫這篇小說時已是一位老人了。令人驚異的是，這些作品中大部分內容是在他服役期間短暫的空閒時間裡，甚至是在前線寫成的，而且，根據托爾斯泰自己所說，那段時期，他還不時地追逐哥薩克婦女、賭博、酗酒。寫作的衝動必定是難以抗拒的，為了滿足這種寫作衝動，他的勤奮和意志令人敬畏。

但是，創作的衝動時有時無，而這正是托爾斯泰的悲劇之所在。有時，他寫作時精神振奮，並

自豪地意識到自己的才能。例如，一八五八年十月，他寫道：「我將講一個既無頭又無尾的故事。」一八六〇年初他寫道：「我正在寫一些東西，它們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就像呼吸一樣自然。我以應受譴責的驕傲向你坦白，我的寫作使我鄙視你們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他的寫作並非總是那麼容易，他給自己設置了很高的標準，因此，寫作是艱苦的，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戰爭與和平》中的大部分內容至少寫過七遍。《安娜·卡列尼娜》的修改稿就更多了，而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其中的內容發生了基本而重大的變化。在這些連續的修改稿中，安娜從一個令人反感的高級妓女發生了質的變化，成了我們所看到的悲劇性的女主角。爲了使作品趨於完美，托爾斯泰付出了極大的心力，這一切表明，他深知自己作爲一名藝術家的崇高使命。他怎麼可能沒有意識到呢？他的作品有時甚至超越了任何一位作家，而且可以肯定地說，沒有人會像他那樣將大自然描寫得如此逼真、細膩。寫於一八五六年的〈暴風雪〉，記述了他從高加索返回雅斯納雅波良納途中遭遇的一場暴風雪和他險些喪生的經歷，其中有一股幾乎令人目眩的力量。這部作品是他成熟的寫作技巧早期的範例，直接得益於剪裁和精確的細節。他既沒有用聯想或寓意，也沒有詩的意象或暗示。正如克蘭克肖（Edward Crankshaw）所說的，他就像一個畫家，不屑於運用明暗的對照，而只要那種完美的清新明晰。另一位評論家把他比爲一位前拉斐爾派（Pre-Raphaelite）的畫家：形狀、質地、色調、聲音、氣味、感覺，所有這一切都以水晶般透明直接地傳達出來。以下有兩個例子，兩個段落都是經過多次修改而成的。第一段，描寫性格外向的渥倫斯基：

「好哇，真好哇！」他自言自語，把一條腿擱在另一條腿上，用手按住，撫摸了一下他昨天墜下馬時微微擦傷的小腿的富於彈性的筋肉……他愉快地感覺著自己強壯腿上的輕微疼痛，他愉快地感覺呼吸時胸脯筋肉的運動。晴朗、帶著涼意的八月天，那使安娜感到那麼絕望，卻使他感到心曠神怡……他從馬車窗口眺望到的一切，就像他自己一樣的清新、快樂和壯健：在落日餘暉裡閃耀著家家戶戶的屋頂，圍牆和屋角的鮮明輪廓，甚至種著馬鈴薯的田野——這一切都是明朗的，就像一幅剛剛畫好、塗上油彩的美麗風景畫。

下面的一段描寫列文與他的狗拉斯卡在捕捉山鵲：

月亮失去了光輝，宛如一小塊白雲浮在空中；星星一顆也看不見了。以前在露珠裡發出銀白色光輝的水草，現在閃著金黃色。爛泥塘像一片琥珀。青翠的草現在變成黃綠色……一頭鷓鴣醒了，停在乾草堆上，牠的頭一會兒轉到這邊一會兒轉到那邊，不滿地望著沼澤。烏鴉飛向原野，一個赤腳的男孩把馬群趕到老頭身邊，這個老頭撩開了大衣坐起來搔癢。火藥般的煙霧像牛奶一樣，散布在蔥綠的青草上。

顯而易見，托爾斯泰的寫作才能直接源於他對大自然的崇拜，而且，雖然時高時低，但他直到晚年都保持著這種能力和激情。在一八九六年七月十九日的日記中寫著，他在已經犁過的土地上，

看到一株牛蒡草的小嫩芽還活著，「被塵土染黑了，但仍然活著，花蕊是紅色的……它使我想寫作，在整個田野的中心，它獨自堅持著活到最後，它以某種方式堅持下來了。」當托爾斯泰用他那冷靜、銳利而準確的眼光觀察大自然，然後用精確的、高度標準的筆法把這一切付諸文字時，無論怎麼說，他獲得了他的性格所允許的最大幸福和心靈平靜。

遺憾的是，僅僅寫作並不能讓他滿足，他希望擁有權力，僅僅支配小說中的人物對他來說是不夠的，因為他覺得自己並非小說人物的一員，他們是不同的人，甚至是不同的種類。只是偶爾地主要是在安娜身上，他便奇蹟般地進入他所描寫的人物內心，他在這裡獲得的巨大成功很容易使人們想到某些危險：對這位非同一般的作家做出一般性的推斷。但是，他通常是從外部、從遠處、從上面來觀察大多數人。他的農奴、士兵和農民被出色地描繪成一群動物般的人。他也描寫馬——托爾斯泰對馬具有豐富的知識和了解——而且寫得很成功，並賦予同樣的精神。他為我們觀察，引導我們經歷一場偉大的戰鬥，而他彷彿是從另一個星球觀察這一切。他並沒有為我們動感情，而我們卻被他為了我們所做的有選擇的觀察而感動，於是他控制了我們的感情：我們處於一位偉大的小說家的手掌中，而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始終超然、冷淡，如同奧林匹斯山上的神祇。與年長於他的同代人狄更斯，以及與他幾乎同齡的福婁拜相比——這兩位小說家的創造力達到同樣的高度——托爾斯泰投入小說中的感情更少。對於小說，他有，或者說，他認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們把托爾斯泰看成是職業小說家，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事實。在他的兩部主要著作中，他嘗試著只有被稱為天才的東西：把大量細節組織成偉大主題的目的模式，並使主題導入悲劇

性的結局。作為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他不重複自己：《戰爭與和平》綜覽了整個社會與時代，《安娜·卡列尼娜》則把焦點緊緊地集中在一個特殊的人物集團。這些作品使他成為民族英雄，並為他帶來了世界性的名譽和財富，以及具有道德洞察力的聲望，這是過去任何作家都不曾享有的。但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他並非用於寫小說。托爾斯泰一生中有三個創作期：一八五〇年代，早期的短篇小說；六〇年代，花費六年時間寫成《戰爭與和平》；七〇年代，創作《安娜·卡列尼娜》。在其漫長一生的其餘歲月中，他也做了一大堆其他的事，他認為這些事具有更高的道德價值。

把家庭帶進混亂的荒野

舊制度下的貴族都感到難以擺脫這樣一種觀念，即寫作是比較下等的工作。拜倫從不認為寫詩是他最重要的工作，那只是為了幫助附屬國的人民取得獨立，他感到自己有責任去引導這符合他的社會地位。托爾斯泰也是如此，甚至，他覺得自己的職責不僅僅是引導，而且要成為一位預言家，有時得扮演彌賽亞的角色。那麼，他花時間寫作又是在幹些什麼呢？他對詩人費特（Fet）說：「寫小說既愚蠢又令人羞愧。」請注意第二個形容詞「羞愧」，藝術是在粗暴地濫用上帝賜予的天賦。這是一個斷斷續續出現的話題，而當托爾斯泰覺得需要對傳統進行攻擊時，他總是把這種天賦用於組合更強硬的措詞，所以他時常放棄藝術，行使道德導師的職務，而且隨著年歲的增高，這種傾向日益顯著。

這是一場自欺欺人的災難。令人驚異的是，儘管托爾斯泰對自己的思考像世間任何人一樣多——甚至盧梭也是如此——他寫過大量關於自己的文章，而且他的許多小說都是以各種方式圍繞著自己，但他很可能極其缺乏自我認識。身為作家，他當之無愧，而且，他寫作時，對周圍的人及普通大眾來說不具有什麼危險。但是，無論如何，他不想成爲世俗的作家。他期望去領導，雖然他在這方面除了意願外，根本不具備能力；他希望發出預言，創立一種新的宗教，以改造這個世界，但無論從道德還是從智力方面來看，他都不具有完成這些任務的資格。這樣一來，偉大的小說沒有寫出來，他卻引導著，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拖著自己和他的家庭走進一片混亂的荒野。

爲什麼托爾斯泰覺得自己必須去完成偉大的道德任務？進一步的原因是：他和拜倫一樣知道自己是個罪人，但不同於拜倫的是，他有一種壓倒一切的罪惡感。托爾斯泰的罪惡感，是有所選擇地使用的、不精確的工具——他自身的某些最壞的缺點，甚至罪過，他傲慢的惡劣結果，這些，他根本不認爲是罪惡——然而，這是一種非常強烈的罪惡感，而且可以肯定，他常常爲自己青年時期的許多行爲自責。一八四九年初，他似乎曾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沉溺於賭博。五月一日，他寫信給哥哥謝爾蓋說：「我到聖彼得堡來沒有任何正當理由。我在這兒沒做什麼有意義的事情，只是揮霍了許多錢，並陷入債務之中。」他告訴謝爾蓋，趕緊變賣部分房產：「我正等著錢度過難關，我絕對必須立刻得到三千五百盧布。」他接著又寫道：「這種極端愚蠢的行爲一生只能做一次。我不得不爲我的自由和哲學研究付出代價（沒有人把我痛打一頓，這是我最大的不幸）。現在，我已經付出代價了。」事實上，在此後的十年中，他仍然時不時地去賭博，有時沉溺於其中，損失慘重。他逐步

賣掉許多地產，還欠了許多債，有親戚朋友的，有商人的，其中許多他從未償還。在軍中服役時，他也賭博。曾有一段時期，他打算在軍隊裡辦一份名為《軍人之頁》的報紙，爲了投資辦報，他變賣了雅斯納雅波良納的主樓；但是當五千盧布賣房錢一寄到，他就又拿去賭博，而且很快輸光。離開軍隊去歐洲旅行時，他又賭博，結局和以往差不多。詩人波隆斯基 (Polonsky) 於一八五七年七月在斯圖加特 (Stuttgart) 見過他，他寫道：「非常不幸，他迷上了輪盤賭……他完全被騙了。他投下三千法郎，最後一個子兒也不剩。」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輪盤賭進行了六輪，輸掉了一切。」「向一個法國人借了兩百盧布，然後又輸了。」「向屠格涅夫借錢，全輸了。」若干年後，他的妻子發現，雖然他對自己嗜賭的惡習感到非常內疚，最終並戒掉了這一惡習，但他似乎並不因未能償還那時的欠債而有所悔恨，其中有些錢還是向窮人借的。償還舊債可沒有什麼戲劇性。

托爾斯泰對自己的性欲和性滿足有著更加強烈的罪惡感。然而在這方面，他的自我譴責也是奇怪地有所選擇的，甚至是在縱容自己。托爾斯泰認爲自己有很強的性欲，他在日記中寫道：「必須有一個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寧。」（一八五三年五月四日）「可怕的情欲是人體的一種疾病。」（一八五六年六月六日）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告訴自己的傳記作者莫德 (Aylmer Maude)，自己的欲望太強烈了，以至於不能沒有性生活，直到八十一歲爲止。青年時期，與女性交往總讓他感到非常羞澀，因此，他常去妓院，但那地方令他厭惡，並給他帶來了必然的結果。他寫於一八四七年三月的一則日記記錄著他因「從慣常的管道染上了淋病」，正被迫接受治療。一八五二年，他在給哥哥尼古拉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況：「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銀的副作用讓我遭受了說不出的痛

苦。」可是他仍然繼續光顧妓院，除了妓女，還有吉普賽女郎、高加索姑娘、當地的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俄羅斯鄉村姑娘。日記的基調是不變的自我譴責，並摻雜著對引誘他的女性的憎惡：「好像是玫瑰色的什麼東西……我打開後門，她進來了。現在看到她我就無法忍受，如此淫蕩，可恥、可恨，（她）使我違背了我的準則。」（一八五一年四月十八日）「女人把我引入歧途。」（一八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接下來的一天，他下了很大的決心，但是『女傭們妨礙了我』（一八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一八五六年四月中的某一天，托爾斯泰從妓院回來後，在日記中寫道：『太可怕了，但這絕對是最後一次。』一八五六年另一篇日記裡寫道：『令人作嘔。女人。愚蠢的音樂，女人、衝動、雪茄煙霧、女人、女人、女人。』一八五六年，屠格涅夫的一段記錄讓我們從另一面了解托爾斯泰，當時，他正把屠格涅夫的住所當旅館一樣住著。『整個晚上都在喝酒比賽，與吉普賽人打牌，然後像死人一般睡到第二天下午兩點。』」

當托爾斯泰住在農村、尤其是住在自己的莊園裡時，他開始物色漂亮的農奴姑娘。對他而言，這也會激起比單純的情欲更多的東西。若干年後，他寫到雅斯納雅波良納時說：「我記得在那兒度過的許多個夜晚和年輕美麗的杜尼亞莎……她那強健的、充滿女性魅力的身體。」一八五六年托爾斯泰到歐洲去旅行的動機之一，是逃避一位漂亮女奴的誘惑。他知道，父親也曾有過類似的事情，那個女人後來生下一個男孩。這男孩只被當成莊園裡管理馬廄的男奴（後來成了馬夫）。托爾斯泰從歐洲回來後，仍然不能控制住自己不把手伸向女人，尤其是一個名叫阿克西尼雅的已婚婦女。一八五八年五月，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天，在古老的大樹林裡，我是一個傻瓜，一頭野獸。她那古銅

色的皮膚和她的眼睛。我愛上了她，這是我一生中從未有過的事，頭腦中再沒有別的東西。」那個姑娘「很整潔，而且相貌不難看，有著黑亮的眼睛和低沉的嗓音，充溢著新鮮而健康的氣息，豐滿的胸部在圍裙之上高高聳起」。可能在一八五九年七月，阿克西尼雅生了一個兒子，名叫季莫費。托爾斯泰把她帶回家中做僕人，而且曾有一段時期，允許那個小男孩待在母親身邊。然而，像易卜生，還有他自己的父親一樣，他從未承認那個男孩是他的，也從沒有付出絲毫關心。更令人驚訝的是，他曾一度公開鼓吹教育農民是完全必要的，並親自在莊園裡為農民子弟辦學校，但他並未讓自己的私生子學會讀書和寫字。也許，他是擔心日後的繼承權要求。他似乎並無憐憫之心，從不考慮非婚生子女的各種權利，而屠格涅夫不僅承認自己的私生女，甚至設法適當地把她教養成成人。托爾斯泰對此心懷怨恨，也許是因為屠格涅夫的做法反襯出他自己不當的行為。有一次，托爾斯泰含沙射影地提到她的身世，言詞間侮辱了那位可憐的姑娘，從而引起一場他與屠格涅夫的激烈爭吵，而且差點以決鬥的方式了結。因此，托爾斯泰的私生子季莫費被指派管理馬廄；後來由於行為不端，被降級為守林人。一九〇〇年以後，季莫費的資料就沒有了，那時他已經四十三歲，但是我們知道，他一直受到托爾斯泰兒子阿列克賽的幫助，阿列克賽讓他當自己的馬車夫。

托爾斯泰知道，引誘村婦、經常出入妓院都是有罪的行為，並為這些罪過而自責。然而他往往更責怪婦女，她們都是夏娃，都是誘人的妖婦。儘管他一生需要女人並且利用了她們——或許正因為如此——但他不信任、討厭甚至憎恨她們。從某些方面看，他認為女性性徵是令人憎惡的。晚年時，他這樣說道：「看到一個裸露著胸脯的女人總是讓我噁心，甚至我年輕的時候就有這種感覺。」

從天性來說，托爾斯泰是挑剔的，甚至是清教徒式的。如果說他自己的性欲讓他煩躁不安，那麼這發生在別人身上就會激起他最強烈的反感。一八五七年在巴黎時，有一段時間，他對女性的追逐達到了高峰，他寫道：「我所下榻的帶家具的公寓裡，居住著三十六戶家庭，其中十九戶是非法的。這真讓人作嘔。」耽於色欲就是墮落，而女人則是墮落的根源。一八四七年六月十六日，當時托爾斯泰才十九歲，他寫道：

現在，我要給自己制定以下的規則，把女人的陪伴當成無法避免的社會罪惡，要盡可能地避開她們。誰是我們身上淫蕩、放縱、輕佻，以及其他一切惡習的根源，難道不是女人？誰應當為我們所喪失的勇敢、堅定、理智、公正等天性中的美德承擔責任，難道不是女人？

關於托爾斯泰，真正令人沮喪的是他至死都保持著這些幼稚的、某些方面具有東方色彩的婦女觀。與他描述安娜·卡列尼娜時所下的功夫相比，在現實生活中，他似乎從來不曾打算認真深入地理解女性的心靈。實際上，他不會承認婦女能夠成爲嚴肅、成熟和有道德的人。一八九八年，七十歲的托爾斯泰寫道：「一般說來，（女性）都是愚笨的，但是當她爲魔鬼服務時，魔鬼會借給她頭腦。然後，爲了幹出什麼骯髒的事情來，她能奇蹟般地思考，而且眼光長遠，意志堅定。」他還寫道：「不可能要求女人在道德感的基礎上評估她那排他性的愛情，她做不到這點，因爲她不具備真正的道德感，即一種高於一切的情感。」他強烈反對穆勒（J. S. Mill）在《婦女的屈從地位》中的

婦女解放觀，他認為甚至應該禁止未婚婦女從事某種職業。實際上，在他看來，妓女是對婦女的極少的「體面稱呼」之一。他在一篇文章中證明妓女現象是合理的：

我們能夠像許多「自由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允許亂交現象存在嗎？不能！這將毀滅家庭生活。爲了解決難題，進化法則演變出一座「金橋」，那就是娼妓制度的形式。想一想，如果倫敦沒有七萬個妓女，會成爲什麼樣子？如果沒有她們，體面和德行將遭何種命運，家庭生活又如何保存下去？還會有多少婦女和年輕姑娘能夠保持貞潔？沒有了，我認爲爲了維護家庭，娼妓是必不可少的。

性怪物

托爾斯泰的難題在於，雖然他信賴家庭，但實際上並不相信婚姻；至少，他不相信賦予夫妻雙方平等權利與義務的基督教婚姻。也許，還從未有比他更不適應這種制度的人了。村中有位名叫阿爾塞涅那娃的姑娘，一個二十一歲的孤兒，幸運地逃脫了托爾斯泰的追逐。當時托爾斯泰已經快三十歲了，他愛上這姑娘，甚至曾有一段時期把自己看做她的未婚夫。然而，他只是喜愛她孩子氣的一面，當她表現出更加成熟和女性化的特徵時，卻使他反感。他的日記和信件講述了這個故事。

「真遺憾，她既沒有骨頭，也沒有火氣——像塊布丁。」但是「她的微笑是痛苦的服從」，「她被教壞了，無知，甚至愚蠢……我開始殘酷地刺激她，她的笑變得極不自在，眼裡滾動著淚水」。猶豫了八個月並毫不留情地訓斥她之後，托爾斯泰激怒了這位姑娘，他收到了她的一封信，於是以此為藉口斷絕了他們的關係。「我們相距甚遠。愛情和婚姻除了不幸，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好處。」他寫信給姑母說：「我的行為極端惡劣。我請求上帝饒恕我……但事情已經無法挽回了。」

托爾斯泰三十四歲時，他的選擇最終落到一位醫生十八歲的女兒索尼雅身上。作為婚配對象，當時的他並沒有多少資本：沒有多少錢，是個出名的賭徒，還因為侮辱地方長官與當局惹上麻煩。幾年前，他在日記中這樣描述自己：具有「最平庸的醜陋而粗俗的相貌……灰色的小眼睛，蠢笨而談不上聰明……一張農民的面孔，農民一樣的大手和大腳」。不僅如此，他厭惡牙醫，從不去找他，以致到一八六二年，他的牙齒幾乎全掉了。然而，貝爾斯當時卻是一個相貌平常，還未完全成熟的少女，只有五呎高，她正在與兩個姐妹競爭；她很高興得到了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先正式地寫信向貝爾斯求婚，爾後似乎又猶豫不決起來，直到最後一分鐘。那場婚禮實際上預示著災難。那天上午，他突然衝進她的房間，堅決地說：「我來是想說明還有時間……所有這一切還可以停止。」她聽罷突然大哭起來。舉行婚禮時，托爾斯泰遲到了一個小時，整理好行裝，她又哭了。婚禮之後，他們一起晚餐，接著索尼雅換了衣服。然後他們坐上一輛有六匹馬的被稱為「睡鼠」的馬車。索尼雅再次哭了起來。托爾斯泰是個孤兒，不能理解她的行為，於是大聲喊道：「如果離開家讓妳這麼傷心的話，妳就不可能非常愛我。」在馬車裡，他開始粗魯地撫摸她，她把他推開了。他們在

一個名叫比魯勒伏的旅館訂了套房。她爲他倒茶時雙手直發抖。他再次想撫摸她，但又一次被拒絕了。托爾斯泰在日記中無情地寫道：「她一直淚汪汪的。在馬車裡，她明白了一切，這很簡單。但是她害怕。」他認爲她是「病態的」。不過他最終還是得到了她，而且她（他自認爲）也有所反應，他接著寫道：「難以置信的幸福。我無法相信它可以像生命一般長久。」

當然不可能那樣長久，即使是最順服的妻子，也會發現難以忍受這樣一個罕見的利己主義者。索尼雅有充分的智慧和勇氣來抵制托爾斯泰壓倒一切的意志，至少有時能做到。因此，他們創造了歷史上最糟糕的（也是記錄最完備的）婚姻之一。托爾斯泰以一種災難性的錯誤判斷，將這場婚姻公布於眾。這位知識分子的一個特點是認爲保守秘密，尤其是那些有關性生活的秘密是有害的。所有的事情都應該「公開」，每一個潘朵拉盒子的蓋子都必須揭開，丈夫與妻子應該相互告訴對方「所有的一切」。於是，許多不必要的痛苦由此產生。托爾斯泰開始履行他的「公開性」準則，他堅決要求妻子閱讀他已經寫了十五年的日記。她吃驚地發現——那些日記毫無保留——裡面記載著他所有性生活的細節，包括光顧妓院，以及他與妓女、吉普賽女郎、鄉村婦女、女農奴，特別是還有他母親的女友等的性關係。她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把這些可怕的日記拿走——爲什麼你要拿給我？」後來她對他說：「是的，我已經原諒你了。但這太可怕了。」這些話都出自索尼雅的日記，她十一歲就開始寫日記了。托爾斯泰的「公開性」原則之一就是夫妻雙方都應該堅持寫日記，而且可以互看對方的日記——這是消除相互猜疑和痛苦的有效方法。

自從索尼雅得知丈夫是個（正如她所看到的）性怪物，並受到驚嚇後，托爾斯泰婚姻中的性生

活很可能再也沒有恢復。不僅如此，托爾斯泰未曾預料到的是，她還從日記中讀出了他小心翼翼隱藏起來的（他自以為做到了這點）思想上的毛病。比如，索尼雅發現托爾斯泰沒有償還賭債；她還看出，他沒有告訴那些與他發生性關係的女人他曾得過性病，而且可能還未治好。對於一個感覺靈敏的讀者來說——有誰能比妻子更加敏感呢——從日記清楚地傳達出來的自私自利，在她的眼裡要比作者自己看到的更明顯。此外，托爾斯泰日記中生動的性生活描寫，在她的腦海中與恐懼糾纏在一起——她懼怕屈從於丈夫的要求，以及隨之而來的痛苦而沒完沒了的懷孕。二十二年中，她忍受了十二次懷孕的痛苦；而且接連失去了幾個孩子，先是佩加死了，當時她正懷著尼古拉，而尼古拉在出生的那年也死了；早產的萬涅奇卡很快也離開了人世。托爾斯泰並沒有幫助妻子承擔起撫養孩子的事，只是對其中的細節懷有一種密切但又遲鈍的興趣。長子謝爾蓋出生時，他堅決要求待在產房裡（後來他把這段經歷用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個場景）。索尼雅不能自己為孩子哺乳，托爾斯泰因此而大發雷霆。由於不斷懷孕和流產，妻子對他的性要求的反感越發顯現出來，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道：「對一個身體強健的男人而言，再沒有比有一個多病的妻子更糟的事了。」

早在剛結婚不久，他就不再愛她了；她的悲劇在於心中始終保留著對丈夫的愛。這時期，她在日記中這樣傾訴：

除了這蒙辱的愛情和壞脾氣外，我一無所有，而這兩樣正是我所有不幸的根源，因為我的壞脾氣總是影響我的愛情。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他的愛和同情，但他不願給我。我所有的自尊都

被踐踏在泥淖裡了。我只是一隻被壓扁了的可憐蟲，沒有人需要，也沒有人愛護，一個挺著大肚子、不斷因懷孕而嘔吐的無用東西。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場婚姻還是一直維持了下來。他們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後，在一九〇〇年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索尼雅寫信給托爾斯泰說：「我要感謝你過去曾給我的幸福，遺憾的是在我們的整個生活中，並非始終都是那麼強烈、完整和平靜。」但這只是一個讓步的姿態而已。從一開始，索尼雅就具備設法維持婚姻的功能，使自己成爲丈夫各種事務的代理人，而且是他在某些方面不得不依賴的代理人，爲他提供不可缺少的服務，並成爲他難以管束的奴隸。她承擔起可怕的任務，把他那些字跡難以辨認的小說手稿謄寫成清晰整潔的副本。這可是一份苦差事，但是從某種角度來看，她又十分喜歡這份工作，因爲她很早就發現，當托爾斯泰施展真正的專長時，他不再是讓人難以忍受的，也不會給別人造成傷害。正如她在寫給妹妹塔吉亞娜的信中所說，當他寫小說時，他們兩人是最幸福的，因爲一來寫作可以賺錢，而他的其他行爲只會浪費錢。但是「錢倒是次要的，主要是我喜愛他的文學作品，我崇拜它們，它們打動了我」。她從痛苦的經歷中發現，托爾斯泰一旦停止寫小說，就容易做出蠢事來填補生活的空間，這必然會傷害她竭力想保持完整的婚姻。

托爾斯泰考慮問題的方式則完全不同。養活和維持一個家庭需要錢，而他的小說可以賺錢，於是他把寫作小說和賺錢的需要連繫在一起，並因此厭惡這兩件事情。在他看來，小說與婚姻是相連

繫的，而索尼雅總是催促他去寫小說，這就強化了兩者的連繫。然後他意識到，婚姻與小說都將妨礙他做出預言的真正工作，正如他在《懺悔錄》中所寫的：

幸福的家庭生活所需要的新環境，已使我偏離了對生命意義的所有探尋。那時，我的全部存在都集中於家庭、妻子和孩子們身上，因此也集中於關心我們的生活資料的增長上。我對自我完善的努力追求，都被設法為家庭獲取最好的生活條件而取代了。

因此，托爾斯泰逐漸地不僅把婚姻視為巨大痛苦的根源，而且視為道德進步的障礙。他對自己特殊的不幸進行總結，並猛烈地抨擊婚姻制度和婚姻中的愛情。一八九七年，在一次如同李爾王那樣的感情迸發中，他對女兒丹尼雅說道：

我能夠理解為什麼墮落的男人可以在婚姻中得到拯救，但是我不明白純潔的姑娘為什麼甘願捲入這種事情。如果我是姑娘，我說什麼也不會結婚的。至於說到愛情，無論是對男人還是女人——因為我知道什麼是愛情，那是一種不體面的、尤其是不健康的情感，一點也不美、崇高或詩意——我真不該為它打開大門。我本應該盡可能地小心謹慎，避免這種疾病的毒害，就像我將盡力保護自己不染上各種比它的症狀輕得多的傳染病，比如白喉、斑疹或是猩紅熱。

正如托爾斯泰的其他許多文章一樣，這段話表明托爾斯泰從沒有嚴肅地考慮過婚姻問題。看一看《安娜·卡列尼娜》中那句著名的開頭：「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人們只要在自己看到的情況中搜尋一下，就會清楚地發現，這句話無論前半句或後半句都有可爭辯之處，甚至還不如說，相反的情況更爲真實。很顯然，不幸家庭反覆出現的各種模式——例如，丈夫是個酒鬼或賭棍、妻子不稱職甚至紅杏出牆，諸如此類，不幸家庭的各種印記總在令人厭煩地雷同和重複；而另一方面，卻有各種各樣的幸福家庭。對於這個主題，托爾斯泰從沒有嚴肅、真誠地考慮過，因爲他不能嚴肅和真誠地去考慮婦女問題：出於恐懼、憤懣和厭惡，以致逃避這個主題。托爾斯泰的婚姻在道德上的失敗與他在理智上的失敗——即他不能對女性做出公正的評價——兩者有著密切的關係。

豬一般蠢的農民

不論怎樣，雖然托爾斯泰的婚姻命運在某些方面從一開始就已注定，但如果不是由於繼承的莊園地產又造成問題，他們也許可以生活得好一些。除了賭和性以外，田產是使他產生罪惡感的第二個也是最重要的根源。這種罪惡感逐漸壓倒了他，並最終毀了他穩定的生活。田產是他的驕傲和權力的源泉，但同時也是他精神不安的根源，因爲土地和農民不可分割地連繫在一起。托爾斯泰很小時就繼承了母親留下的田產，而且幾乎就從那一刻起，他已開始思考一個重大的問題——這種思考

某些方面是應受尊重的，某些方面則是寬容自己——「我應該如何對待我的農奴呢？」如果他是一個明智的人，會明白經營田產並不適合他；他的天賦和職責是寫作。他應該賣掉田產，使自己擺脫精神上的困擾，通過作品來實施領導的責任。遺憾的是，他並不是一個明智的人。他既沒有放棄這個問題，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它。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他一直在這個問題上動搖、猶豫，結果弄得一團糟。

一八四〇年代末期，托爾斯泰繼承田產後不久，便開始著手對農民的「改造」。後來他宣稱：「農奴應當被解放的思想，對於一八四〇年代我們這個圈子裡的人來說，完全是聞所未聞。」這話並不對，在大約三十多年內，解放農奴的思想已經傳遍各地；它是所有小小的外省哲學俱樂部的討論主題；如果不是這樣，托爾斯泰恐怕也不會想到這個問題。托爾斯泰著手「改革」的同時，也進行了一些其他的革新，包括他自己設計的水流打穀機。所有這些努力沒有一個產生實效。由於面臨著諸多固有的困難，以及「豬一般蠢」的（正像他自己所說的）農民，他很快就放棄了。這段時間唯一的成果，是他在〈一個地主的早晨〉中塑造聶赫留道夫的形象，並藉聶赫留道夫之口，表達了年輕的托爾斯泰心中的幻滅：「除了愚蠢的例行公事、惡習、猜疑和失望外，我什麼也沒看到。我在荒廢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華。」十八個月以後，托爾斯泰離開了田莊，繼續縱情聲色、賭博、服軍役、寫作。但是，他仍然被農民，或者更確切地說，農民的概念——他從不把他們看成個別的人——所困擾。他對他們的態度仍然極其矛盾，他在日記中寫道：「整個晚上我都在對蘇賓談我們俄羅斯的農奴制。農奴制的確是一種罪惡，但又是一種令人極其愉快的罪惡。」

一八五六年，他又開始第二次「改革」。他宣布，農奴只要付清三十年的地租，就可以獲得解放。他在做這件事時並沒有請教那些有過類似經驗的熟人，這倒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情卻是，農奴們都相信當時的傳聞：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打算無條件解放他們。他們懷疑其中有詐，並沒有看出托爾斯泰伯爵的自命不凡，只是擔心他在耍什麼（不存在的）花招，於是斷然拒絕了他的建議。托爾斯泰憤慨不已，痛罵他們是一群愚昧無知、不可救藥的原始人。關於這個問題，托爾斯泰早已表現出某種紛亂的情緒，他給前任內政部長布盧多夫伯爵寫了一封歇斯底里的信：「如果六個月內農奴們不獲得自由，我們免不了將遭受一場大屠殺。」對於自己家裡那些認為他的計畫荒唐、不成熟的人——比如，姑母塔吉亞娜——他表現出極端的仇視：「我開始對我的姑母產生了一種無言的仇恨，儘管她對我那麼慈愛。」

這時，托爾斯泰轉向了教育，把教育看成是解決農民問題一勞永逸的辦法。從盧梭開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奇怪的幻想，以為可以透過創建一種新的體制，一舉解決人類諸多教育由來已久的難題。托爾斯泰開始親自為農民的孩子講課。他給亞歷山德娜·托爾斯泰雅伯爵夫人（譯註：托爾斯泰的孀孀）寫信說：「當我走進學校，看到這些衣衫襤褸、骯髒、瘦弱的孩子們睜著明亮的眼睛，臉上時常流露出天使般的神情，這時，一種驚慌和恐懼感就會襲上心頭，我彷彿看到一群快要淹死的人……我寄望於教育，只是為了拯救這些普希金、奧斯格羅特拉茨基（Ostrograds，譯註：俄國數學家）、菲拉列特（Filaretovs，譯註：莫斯科主教），這些正在溺水的人。」在一段很短的時間裡，他非常樂意教這些孩子。後來，他曾對官方派來為他作傳的比留柯夫（P. I. Biryukov）說，那是他一生

中最美好的時光：「我生命中最愉快的時光不是來自對女性的愛，而是來自對人民的愛、對孩子的愛。那是一段多麼美妙的時光。」他的一番努力到底成效如何，並無記載。學校裡沒有規章，也不要求學生做課外作業。他寫道：「他們到學校來，只要帶著他們易於接受新東西的天性，並深信今天在學校會和昨天一樣快活。」不久，他就創建了許多學校，組織成一個網絡，一度達到七十個學校，但是他自己在教育上的努力並沒有持續很久。他漸漸感到厭煩了，於是離家到德國旅行，表面上好像是去考察那裡的教育改革，但著名的福羅培爾（Julius Froebel）令他很失望：他根本不聽托爾斯泰的，只是自顧自地說個不停，不管怎樣，「他只不過是個猶太人」。

一八六一年，俄國的情況忽然發生了變化，亞歷山大二世頒布了一道法令，解放農奴。托爾斯泰痛斥這項決定，因為它是國家的一道法令，而這時他已開始否定國家。第二年，他結了婚，於是田產又有了不同的意義：既是他那人口不斷增加的家庭居住的地方，而且和他的小說一樣，又是他們收入的來源。此時正是托爾斯泰一生中最富創造力的時期，《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這一時期完成的。隨著作品收入的逐漸增加，托爾斯泰購買了土地，並且在莊園內投資，比如，曾經有一個時期，他的養馬場內飼養著四百匹馬，有五位女管家和家庭教師住在莊園裡，此外還有十一位家僕。但他從未忘記過「改革」，不只是針對農民，而且包括自己、家庭，甚至整個世界。這一願望只是潛伏在他的心底，任何時候都可能引發激烈的行動。

缺乏愛心的正當理由

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以及創立新的宗教運動，這些願望在托爾斯泰的心中是緊密連繫在一起的。早在一八五五年，他就在文章中寫道，他要創造一種信仰，基礎是「基督的宗教，但這種信仰淨化了教義和神秘主義，許諾現世的幸福，而非來世的幸福」。這是陳腐的想法，是多少世紀以來無數幼稚的宗教改革家們每日杜撰的想法。托爾斯泰並不是神學家，雖然他寫過兩篇長文：《教義問答》與《四部福音書的綜合和翻譯》，但這些文章無助於使人相信他是個有系統理論的思想家。他許多有關宗教的文章，除了使用含混的泛神論術語外，沒有多少意義。例如：「認識上帝和生存是同一件事，上帝是生命。活著追尋上帝，那麼，你將與上帝同在。」

但是，盤旋在托爾斯泰頭腦中的宗教觀念有著潛在的危險性，因為這些觀念與他的政治衝動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非常容易燃燒的東西，很可能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突然噴出火焰。自從他完成並出版了那部大大提高聲譽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之後，他就變得焦躁不安，不再滿足於寫作，而是準備公開大鬧一場：成爲世界名人和預言家，一個有無數讀者和崇拜者來尋求智慧和指導的人。

第一次爆發是在一八八一年十二月，當時托爾斯泰與家人住在莫斯科。他來到莫斯科某個貧民區的市場，把錢分給乞丐並傾聽他們講述自己的生活。一大群人圍住了他，他躲進附近一家簡陋的小客棧，在那兒看到的景象令他更加苦惱。回到家中，他脫下皮大衣，坐到餐桌前，身著制服、戴

著白手套、打著領結的僕人端上五道菜的晚餐。他突然大聲喊道：「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不能這樣生活下去！這讓人無法忍受！」他揮舞著手臂，威脅說要放棄他們所有的財產，索尼雅嚇壞了。托爾斯泰立即以當時剛剛完成的人口調查作為數據基礎，著手為窮人制定新的救濟制度，然後又匆匆忙忙地趕往鄉村，和他當時的精神導師、所謂的「農民預言家」蘇塔耶夫（V. K. Syutayev）商討如何更深入地進行改革。索尼雅獨自留在莫斯科，帶著他們生病的兒子，僅四個月大的阿列克賽。

伯爵夫人認為遭到遺棄，因此寫了一封信，對他們痛苦的關係說出了一些新的看法。這封信不僅概括了她與丈夫相處時的種種困難，而且還有她與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知識分子打交道時的憤懣，這是大多數人都會從信中感覺到的。她說：「我最小的孩子還未痊癒，而我自己又是那麼虛弱、可憐。你和蘇塔耶夫也許並不特別愛你們的孩子，但我們這些平凡的人，既不能夠也不希望扭曲自己的情感，或以向整個世界表白愛心之類的東西，作為對個人缺乏愛心的正當理由。」

索尼雅多年來一直觀察托爾斯泰的行爲，不只是他對自己家人的行爲，於是她提出了一個問題：他所愛的只是作為概念的人類，因此，他是否真的愛過一個具體的人？例如，他不幸的哥哥德米特里無疑是個需要同情的人：他沉淪在貧民窟裡、和妓女結婚，一八五六年年紀輕輕就死於肺結核。托爾斯泰勉強抽出一個小時，在他哥哥臨終前到床前看望一下，但拒絕參加葬禮——他要去參加一個晚會——雖然他後來將這兩段插曲都巧妙地運用到小說創作中。托爾斯泰的另一個哥哥尼古拉也死於肺結核，也是應得到憐憫的人，但是托爾斯泰拒絕去探望他。最終，尼古拉不得不自己趕到他那裡，並死在他的懷裡。托爾斯泰的第三位兄長謝爾蓋由於賭博輸光了所有的財產，托爾斯泰

幾乎沒給他任何幫助。無疑他們都是弱者，而托爾斯泰的原則之一就是輔助弱者。

托爾斯泰的友誼就是如此。只有一次，對他在喀山大學時的同學季亞科夫老人顯得既無私又謙和，但是這種友情很快就消失了。通常的情況是，托爾斯泰索取，他的朋友們給予。索尼雅在爲他抄寫早期的日記時寫道：「（他的）自我崇拜在對（他們）每一個人的態度上都表現了出來。讓人驚訝的是，就人們對他的愛而言，竟然可以達到他們每個人都只爲他存在。」更爲驚人的是，那些認識他的人，除了他的追隨者及依靠他、奉承他的人外，還包括那些具有獨立人格和高度批判精神的人，他們全都心甘情願地忍受他的利己主義，而且無視這一點，反而對他表示尊崇。他們在他令人敬畏的目光之下退縮，在他強大的意志力面前屈服，理所當然地在他天才的聖壇前膜拜。契訶夫是敏感、目光銳利的人，他完全意識到托爾斯泰的諸多缺點，但卻這樣說道：「我懼怕托爾斯泰離開人世。如果他死了，那麼我的生命中將出現巨大的空白……我從沒有像愛他那樣愛過任何人……只要文學界仍有一個托爾斯泰存在，那麼做一個文學家就是輕鬆愉快的事，甚至當你意識到自己一事無成、無所作爲的時候，都不會顯得那麼可怕，因爲托爾斯泰足以完成一切。」

屠格涅夫應有更充分的理由認識到托爾斯泰的自私和冷酷，因爲對於這兩點，他早已深深地領教過了。他曾經慷慨周到地幫助過這位年輕的作家，他得到的回報卻是冷淡、忘恩負義。托爾斯泰明知一些觀點是他朋友所珍愛的，他卻慣於野蠻地、雖然也常常是精彩地加以辱罵。屠格涅夫是偉人，心腸軟、性格溫和，不會對托爾斯泰做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事情來，但他承認自己被托爾斯泰的言行激怒了，他還「從未見識過如此令人不快的、銳利的眼光，加上刻毒的三言兩

語，真足以把人逼瘋了」。有一次，屠格涅夫把自己花費了許多心血創作的小說《父與子》拿給托爾斯泰看，托爾斯泰看著看著就很快地睡著了。屠格涅夫回轉身來，發現他正在打鼾。另一次，兩人因為屠格涅夫的女兒而發生激烈爭吵並威脅用決鬥來解決，屠格涅夫寬宏大量地先道歉，而托爾斯泰則（據索尼雅所說）嘲笑道：「你懼怕我，我鄙視你，再不想和你打交道。」詩人費特曾竭力想讓兩人言歸於好，但托爾斯泰卻對他說：「屠格涅夫是個無賴，應該被痛打一頓。我請求你把我的話忠實地轉告他，就像你曾忠實地把他對我的稱讚轉述給我一樣。」托爾斯泰在他的日記中寫了許多關於屠格涅夫令人不快、並不屬實的事情。兩人的通信中也反映出他們之間友誼的不平衡。一八八三年，屠格涅夫明白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於是給托爾斯泰寫了最後一封信：「我親愛的朋友，俄羅斯土地上偉大的作家，請聽從我的請求吧。請讓我知道你是否收到了這封信，並允許我再一次緊緊地、緊緊地擁抱你、你的妻子和你的家人。我已經疲憊不堪，不能再寫下去了。」儘管屠格涅夫直到兩個月後才去世，但托爾斯泰對這一可憐的請求從未做出任何回應。因此，沒有人會對托爾斯泰得知朋友死訊後的反應有什麼深刻的印象，他說：「我總是懷念著屠格涅夫，我愛他、同情他、讀他的作品，我跟他生活在一起。」這是演員的腔調，他扮演著公眾對他期望的角色。正如索尼雅所注意到的，人與人之間的愛情或真正的友情所必需的互不干涉和親密無間，托爾斯泰都不具有。相反地，他之所以信奉博愛精神，是因為這可以在公眾舞台上表演得更加喧鬧，更富戲劇性和轟動效果。

不斷更換角色的演員

假如他是個演員的話，他就是那種不斷變換角色的演員，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爲人類服務這個偉大的中心題目上不斷更換角色的演員。他教訓人的衝動比誰都要強烈。一旦某種事物吸引了他，他就想寫一本關於它的書，或者著手進行一連串根本性的改革，卻常常又怕麻煩，自己不去領會它，也不去請教真正的專家。托爾斯泰曾經營了幾個月的農業，就去設計和製造農業機械；學習彈鋼琴沒多久便開始寫《音樂基礎和學習音樂的規則》；剛剛開辦了一所學校，他就徹底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他深信終其一生都能夠掌握任何學科，並發現其中的錯誤，然後，從第一條原理開始重寫它的規則。就像他改良土壤一樣，他至少嘗試過三次教育改革，並在最後一次自己編寫課本。索尼雅對此十分厭惡，不時給予冷嘲熱諷，但又不得不把原稿抄寫成清清楚楚的副本，她抱怨道：「我鄙視這些讀本、代數、語法，我實在裝不出感興趣的樣子。」

托爾斯泰總是像熱中於教育人一樣熱中於行動，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在其一生中有一段時期覺得有必要把自己當成「勞動者」中的一員。這種想法在一八六〇與七〇年代就時不時地冒出來，最認真地付諸行動是在一八八四年一月。他放棄了爵位（但沒有放棄他那種專斷的作風），並堅決要求別人稱他爲「平凡的列夫·尼古拉耶維奇」。跟這種語氣相配合的是知識分子喜歡的服裝花樣：打扮得像個農民。這種階級的易裝癖與托爾斯泰對戲劇和戲裝的喜好正相一致。這種裝束與他的外形也十分相稱，他有著一副農民的體格和相貌，他的靴子、罩衫，以及他的大鬍子和帽子，所

有這一切都成了新托爾斯泰——這位全人類的預言家的制服。這是大多數世俗知識分子似乎都具有的公共關係方面的天才的一個重要方面。新聞記者不遠千里來探望他。托爾斯泰晚年時，攝影術已經普及，新聞影片才剛剛起步。作為媒體上的第一位預言家，他的農民裝束配合他顯露的聖體，真是十分理想。

托爾斯泰表演體力勞動也被拍成照片和電影。從一八八〇年代起，他就宣稱體力勞動是「絕對必須的」。索尼雅寫道：「他七點起床，天還黑著。他為全家打水，並用雪橇把盛水的大木桶拉回來。他鋸開長木，劈開堆積起來，為生火準備。他不吃白麵包，也不到其他任何地方去。」托爾斯泰自己的日記記述了他和孩子們一起打掃房間，他說：「我羞於做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如倒便壺。」幾天後，他克服了厭惡情緒去做了。他還曾到一個鞋匠的茅舍去求教，並這麼描寫該鞋匠：「他坐在那骯髒的、黑暗的角落裡，多麼像一道光，閃耀著道德的光輝。」在這比較困難的行當中短期學習之後，托爾斯泰開始給自己和家人做靴子，也給費特做了一雙，但沒有資料表明這位詩人是否滿意。托爾斯泰的兒子們拒絕穿父親為他們做的鞋。在這不斷重複的勞動中，托爾斯泰總是欣喜若狂：「這讓我感到變成了一個勞動者，因為心靈在發育成長。」但是沒過多久，他就對補鞋的工作厭倦了，開始轉向農業勞動：他用大車拖運肥料、拉木材、犁地，還幫著修建茅舍。他自認為是位木匠，讓別人給拍下照片，一把鑿刀插在他的寬皮帶上，鋸子懸掛在腰間。這段時間也沒有持續很久，結束得像開始一樣迅速。

除了他真正的工作——寫作外，托爾斯泰做什麼都沒有耐性。他缺乏耐心、毅力，以及在困難

面前的恆心。儘管他略知養馬，但自他很快對此失去了興趣之後，他的良馬育種場也變得一團糟。索尼雅曾爲這事與他發生過口角，那是一八八四年六月十八日，她聲稱這些馬的情況非常糟糕：他把這些良種馬從巴勒斯坦的撒馬利亞買來，又聽憑這些馬死於無人照管和過度勞動。她說，這種結果與他做過的一切事情都一樣，甚至包括他的慈善事業：沒有考慮周全的、適當的計畫，缺乏一致性，缺少受過專門訓練的人去從事專門的工作，整個宗旨無時無刻不在變化。托爾斯泰衝出房間，大聲喊著想移居美洲。

托爾斯泰在自己的莊園中造成的混亂局面只是使他的家庭受到傷害，而他的公眾行爲，特別是他對公眾的說教造成了更大範圍的危害。當然，並非他所有的行爲都在誤導民眾。從一八六五年開始，爲了引起民眾對俄羅斯部分地區周期性饑荒的注意，托爾斯泰曾做了一些有價值的、部分成功的工作。尤其在一八九〇年那場大饑荒中，他的救濟方案起了相當好的作用，而政府則想方設法地隱瞞饑荒的嚴重性。有一次，他還參與救援一個在俄羅斯深受迫害的少數民族——杜科波爾派（Doukhobors，譯註：一個宗教派別，杜科波爾原義爲「靈性鬥士」，十八世紀產生於俄國，一八九九年因受迫害而移居加拿大）教徒，政府打算將這些吃素食的和平主義者聚集到一起，然後消滅掉。托爾斯泰爲他們蒙受的不公平待遇大聲疾呼，最終爲他們爭取到移居加拿大的許可。但另一方面，對於另一個受迫害的民族——猶太人——托爾斯泰則態度苛刻，他的觀點加重了他們面臨的困難。

然而，更爲嚴重的是托爾斯泰的獨裁主義觀點：只有他才能解除世界的痛苦，他拒絕參與任何非他本人計畫和控制的救助活動。他的自私甚至控制著他的善舉。關於大部分政治問題，如土地改

革、開拓殖民地、戰爭、君主政體、國家、所有權等問題，他的觀點在一生的不同時期發生過根本性的變化，自相矛盾的例子不勝枚舉。但他在一件事情上是始終不變的，他拒絕以個人身分參與任何在俄羅斯進行系統改革的計畫——即反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用日益激烈的言詞痛罵自由主義者的「改良」學說是一種妄想，甚至是徹頭徹尾的罪惡。他痛恨民主，鄙視議會，稱國家杜馬的代表們是「裝作長大了的小孩子」。他認為，沒有議會的俄羅斯將是比擁有議會的英國自由得多的國家，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不去響應議會改革。托爾斯泰尤其痛恨俄羅斯的自由主義傳統，在《戰爭與和平》中，他公開辱罵第一位自覺的改革家斯皮蘭斯基伯爵（Count Speransky）。他讓安德烈王子對斯皮蘭斯基的新國家議會的建議如此評價：「這和我有什麼關係……所有這些能讓我更幸福還是更好？」這是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陰暗的事實，即在半個世紀中，有關沙皇制度的任何系統的改革，俄國最偉大的作家總是冷眼相對，並竭盡全力阻礙和嘲笑那些試圖讓這個制度文明起來的人。

那麼，托爾斯泰的選擇又是什麼呢？如果他像狄更斯、康拉德或其他偉大的小說家一樣，認為結構的改革只有有限的價值，需要的是改善人的心靈，那麼他還有點道理。然而托爾斯泰一方面強調必須完善個人道德，但他同時又不停留於此：他不斷地暗示，某種巨大的道德劇變是必須的，已經迫在眉睫，且將徹底改變這個世界，創立一個天堂般的國度。他那些烏托邦式的努力正是為了勾畫這個太平盛世的藍圖。在這種幻想的背後並沒有什麼深刻的思想，其中包含著有關社會大變革的某種純粹戲劇性的特點，而這種變革，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就是馬克思革命理論的詩化的源泉。

此外，托爾斯泰也和馬克思一樣，對歷史缺乏全面的理解。他不僅對歷史所知甚微，而且沒有

考慮過偉大的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屠格涅夫曾為他的《戰爭與和平》惋惜，因為他加入小說中的那些令人尷尬的歷史演講帶有明顯的自學者特點，這些歷史演講都很「滑稽」，是純粹的「詭計」。福婁拜在寫給屠格涅夫的信中也提到他對小說中的「哲學」感到驚愕。我們讀這部偉大的作品，並非為了其中的歷史理論，剛好相反。托爾斯泰是個決定論者和反個性主義者，對他而言，認為歷史事件只是權勢者深思熟慮的決定所造成的想法，這完全是一種錯覺。那些掌權者甚至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更不用說去策劃了。只有無意識的活動才是重要的。歷史是無名人物的無數個決定的產物，而他們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一無所知。從某種角度看，這種想法與馬克思殊途同歸，但不清楚是什麼原因促使托爾斯泰走上這樣的思想路線，也許這就是他對俄國羅曼蒂克的觀點：農民是最高主宰者與決定的力量。他相信，在所有的歷史事件中，真正決定我們生活的，是隱藏在背後的規律。這些規律不為人所知，而且很可能是不可知的，因而，與其面對這不愉快的事實，不如假定歷史是那些偉人和英雄檢驗他們的自由意志所造成的。從本質上看，托爾斯泰是個神秘論者，他拒絕接受關於事件如何發生的顯而易見的解釋，而是要去探尋和認識潛藏在表層之下的秘密過程。這種認識通常被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憑藉直覺集體地領悟——這種群體，對馬克思來說是無產階級，對托爾斯泰來說是農民。當然，他們需要解釋者（如馬克思）或預言家（如托爾斯泰），但從本質上來說，他們集體的力量和他們的「正義性」推動歷史車輪的運動。在《戰爭與和平》中，為了證明他的歷史發展觀，托爾斯泰歪曲了真相。他改變了拿破崙戰爭的原貌並加以利用，以適應他的普羅克羅斯忒斯之床（譯註：普羅克羅斯忒斯是希臘神話中的巨人，羈留旅客，縛之床榻，體長者砍去下肢，

體短者拉長，以讓他們與床等長）。

因此，托爾斯泰傾向於採用集體主義者的方法來解決俄國的社會問題，也就不算奇怪了。

早在一八六五年八月十三日，托爾斯泰在記事簿上談到對俄國農村饑荒的思考：「俄羅斯全民族的任務是為世界奉獻一種新的思想，即一種沒有土地私有制的社會結構。只要人類的家庭仍然存在，那麼財產與盜竊就比英國憲法更加具有真實性……俄國的改革只能以此為基礎。」四十三年後，他偶然看到這段話，為自己的預知能力驚訝不已。那時候，托爾斯泰早就與馬克思主義者及早期的列寧主義者建立了聯繫，比如孟特耶洛夫（S. I. Murtyanov），他在西伯利亞流放地與托爾斯泰互通信件，並拒絕了托爾斯泰放棄暴力的請求：「托爾斯泰，改造我是困難的。社會主義是我的信仰和上帝。當然，這與你所宣揚的幾乎是同一件事，只不過你採用的戰術是『愛』，而我們採用的戰術，按照你的說法，是『暴力』。」兩人所爭論的是戰術而非戰略，是手段而非目標。事實上，托爾斯泰說到的「上帝」及稱自己為基督徒，這都和人們對他的猜想沒有多大差別。鑒於他不僅否認基督耶穌的神性，而且斷言：稱耶穌為「上帝」或向上帝祈禱是「最嚴重的瀆神行為」，因此一九〇一年二月，東正教會開除了他的教籍也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實際上，關於基督和教會的學說，他只是從舊約和新約中選擇了那些與他的看法相吻合的部分，而拋棄了其餘的。從價值意義上看，他都算不上一個基督徒。由於他在各個時期以不同的方式限定「上帝」，他到底是否信仰上帝也就更難判斷了。從根本上說，「上帝」似乎就是托爾斯泰所希望發生的徹底改革，這是一種世俗的而非宗教的概念。至於說到傳統的聖父上帝，至多也就是同他平等，被他不無妒忌地觀察著、評論著，是同

一獸穴中的另一頭熊。

晚年時的托爾斯泰轉向反對任何形式的愛國主義、帝國主義、戰爭與暴力，僅此一項就阻礙了他與馬克思主義者結成任何聯盟。他還猜測，掌握權力的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不會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拋棄國家形式。他在一八九八年寫道，如果馬克思主義者的「末日審判」真的發生了，那麼「唯一可能的事情就是專政統治將會轉換。現在是資產階級占據著統治地位，到那時，工人階級的領導者將統治國家」。但他並不為這種情況過分擔憂，因為他總是在設想，在某種專制制度下，財產轉交給民眾的事也會發生——沙皇可以像其他人一樣做到這一點。不管怎樣，他從沒有將馬克思主義者當成敵人，真正的敵人是西方的民主主義者和議會中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正在到處傳播他們的思想，腐蝕整個世界。在他晚年的兩篇文章《給中國人的一封信》和《論俄國革命的意義》（都寫於一九〇六年）中，他堅定地把他自己和俄國跟東方統一起來。他寫道：「歐洲人所做的一切可以、而且應該成為東方人民的樣本，但東方人從中學到的，並不是該做些什麼，而是任何情況下不該做些什麼。追隨著歐洲國家的道路就等於直接走上一條毀滅之路。」世界最大的危險，莫過於英國與美國的「民主制度」，這種制度不可避免地與對國家形式的崇拜，以及對國家行使的制度化暴力的崇拜捆綁在一起。俄國必須從西方社會移開目光，放棄工業化，廢除國家制度，並採納不抵抗政策。

根據俄國以後所發生的事來看，這些思想給人某種古怪的感覺，甚至跟俄國當時已經發生的變化也絕對無法統一起來。在一九〇六年，俄國工業化進程速度之快超過了當時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俄國採用了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這種形式後來成了史達林極權主義國家的一塊絆腳石。然而，

處於人生這個階段的托爾斯泰與外部現實世界已少有連繫，甚至對它失去了興趣。他已經在雅斯納雅波良納創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他不僅居住在那裡，甚至統治著那個世界。他認識到國家的權力已經腐化，這正是他反對國家形式的原因，但他沒有看到一個十分明顯的事實——比如，索尼雅就意識到了——權力所導致的腐敗具有多種形式。一位偉人、預言家和先知，對他們的追隨者們也行使著權力，而且，由於他們的奉承、諂媚，特別是吹捧，他自己也腐敗了。

預言家的宮廷恩怨

到了一八八〇年代中期，雅斯納雅波良納已經逐漸變成了一個宮廷聖地。各種各樣的人都到此尋求指導、幫助、恢復信心，以及智慧的奇蹟，或是來訴說他們自己的稀奇古怪的觀點——素食主義者、斯維登堡教派信徒（Swedenborgians）、母乳餵養法的支持者、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經濟學說的推崇者、修道士、僧侶、喇嘛、和尚、和平主義者、逃避兵役者、妄想狂、瘋子，以及慢性病人。除此以外，還有一個由托爾斯泰的助手和崇拜者組成的固定圈子，雖然其中的成員在不斷地變換著。所有的人都從某一方面把托爾斯泰看成他們的精神導師，他扮演著教皇、家長和救世主的角色。就像一七八〇年代趕往盧梭墓地的朝聖者一樣，拜訪者在雅斯納雅波良納花園的涼亭牆上，或寫或刻留下各種各樣的題詞，諸如：「打倒極刑！」「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向天才致敬！」「祝托爾斯泰長壽！」「圖拉省現實主義作家向托爾斯泰伯爵致敬！」。托爾斯泰在聲名遠揚的晚年樹

立了一種範例，這種現象在享有世界聲譽的重要知識分子中（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十分常見：他創建了一個影子政府，著手處理世界各地的「問題」，提供解決的辦法，與各國總統或國王書信往來，發出抗議書，發表聲明，特別是在諸多文件、信件上簽字，允許各種有關宗教或世俗的、有益或有有害的事借用自己的名義。

從一八九〇年代起，作為這個雜亂政體的統治者，托爾斯泰甚至為他的王國招了一位首相——切爾特科夫（Vladimir Grigorevich Cherkov），一位富有的前副官。此人因善於鑽營，逐漸成為這一宮廷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曾與這位大師一起拍過照片：薄薄的嘴如同一道縫，眼袋下垂，留著小鬍子，一副勤勉不懈的奉獻者、改革家的神態。他很快便開始對托爾斯泰的行為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並不斷提醒這位老人發出過的誓約和預言，幫助他保持自己理想的形象標準，常常把他推向更為極端的方向。自然而然地，他使自己變成了阿諛奉承合唱團的指揮，托爾斯泰聽了他們的聲音頗為得意。

來訪者和內部圈子裡的成員記錄下托爾斯泰隨意講出的格言，卻沒有給人留下多少印象，反而使人想起《拿破崙流亡語錄》或《希特勒的桌邊談話》之類的內容——奇怪的總結式的語句、過時的老生常談、乏味的成見和陳腔濫調，諸如：「隨著年歲增長，我愈加堅信，愛是至高無上的。」「不必理會近六十年來的文學，全是胡說，要讀六十年前的作品。」「我們每個人心中的上帝使我們大家彼此更為接近，正如所有的線條會聚到中心，我們所有的人都會集到上帝之中。」「飛機和飛彈的使用，最初引起人們注意的是新的稅收又要強加到人民身上了。這說明一個事實，在一定道德狀

態的社會裡，物質的進步除了帶來危害別無好處。」關於接種天花疫苗，他寫道：「想方設法逃避死亡毫無意義，無論如何你總是要死的。」「如果農民擁有土地，我們也就不會有那些愚蠢的花壇。」「如果女人不那麼多嘴多舌的話，這個世界會美好得多……她們總愛發表自己的觀點，這是一種天真的利己主義特徵。」「上海的中國人居住區雖然沒有警察，但人們相處得和睦而融洽。」「無論什麼樣的教育兒童都不需要……我認為一個人學得越多就越愚蠢。」「法國人是最富同情心的民族。」「如果沒有宗教，就總有人行為放蕩、言語粗俗，或是酗酒鬧事。」「為公眾的事業工作，人就應該這樣活著。」「鳥兒的活路就是草葉。」「越壞就越好。」

陷在預言家宮廷中心的是托爾斯泰的家人。由於他們的父親選擇了公眾生活，他們也被公眾的注視灼燒著。他們被迫加入他創造的戲劇表演，並也帶上了傷痕。我曾在前面引用過他的兒子伊利亞所說的成爲「特殊的」人的危險。另一個兒子安德烈深受精神崩潰的折磨，拋棄了妻子與家庭，加入一個反猶太的「黑色一百」組織。托爾斯泰對性的日益憎惡使他的女兒們都感到了壓力，他不僅反對自己的女兒有追求者，而且厭惡她們所選擇的男友。一八九七年，大女兒丹尼雅早已三十三歲，愛上了一個有六個孩子的鰥夫，此人看起來舉止得體，但是個自由主義者，因此托爾斯泰十分惱火，對丹尼雅進行了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告誡，列舉了婚姻的種種罪惡；瑪莎也墜入愛河並希望結婚，也得到同樣的待遇；小女兒亞歷山德娜則最有可能成爲他的信徒，因爲她和自己的母親相處得很不融洽。

托爾斯泰的精神激變帶來的壓力主要由他的妻子索尼雅承受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他強

迫她滿足自己的性欲，使她一再地懷孕。然後，他突然堅決主張他們應該放棄性生活，「像兄妹」一樣地生活在一起。她對那些在她看來是侮辱妻子身分的行為表示抗議，特別是當他決定放棄個人生活的隱私，公開談論和記錄他們的私生活，她不願外人把頭探進她的臥房。當托爾斯泰提出分房時，她堅持保留雙人床，作為他們繼續保持婚姻關係的象徵。與此同時，他又顯示出無端的妒忌來，並寫了一篇小說〈克萊采奏鳴曲〉，描寫一位瘋狂嫉妒的丈夫，因憎恨妻子與小提琴家的關係而殺死了她。索尼雅謄寫了這篇小說（像她抄寫他所有的作品一樣），越抄越感到厭惡和驚恐。她意識到人們可能會認為她就是女主角。由於審查機關的干涉，小說未能發表，但已經以手抄本的形式四處流傳，謠言也跟著散布開來。於是，她感到必須要求公開發表這篇小說，也許能使人們確信她並非故事中的女主角。與這半公開化的爭執相對應的，是隱藏在幕後令人厭惡的爭吵，起因是托爾斯泰不能遵守保持純潔生活的承諾，他不時地對妻子進行性攻擊。一八八八年末，他在日記中寫道：「魔鬼附在我的身上……第二天，也就是二十號上午，我睡得很糟。犯了罪以後，是那麼令人噁心。」幾天後，他又寫道：「我被更強大的力量纏住了，墮落了。」直到一八九八年，他告訴莫德：「昨天晚上，我又成了一個丈夫，但是沒有理由放棄自我鬥爭。上帝也許會保證我再不這樣了。」

托爾斯泰如此詳細地與外人談論自己婚姻中的性生活，使索尼雅感到她最隱秘的私生活被完全暴露在公眾的注目之下。正是伴隨著這些年日益加劇的緊張氣氛，托爾斯泰的公開性原則顯得越來越愚蠢。起初，她不願讀他的日記——任何一個有理智、正常的人都不會願意的——但逐漸也就習慣了。事實上，由於托爾斯泰的筆跡太潦草，索尼雅漸漸習慣把他的日記抄成清楚的副本，於是就

有了原本和通行本。但是，知識分子們都有一個習慣，他們寫任何文章時都會考慮到發表的問題，因此會習慣地把自己的日記當做辯護文章和宣傳工具，而且作為自衛或進攻的武器，對付那些可能出現的批評家，特別是他們的親人。托爾斯泰便是這種傾向的一個最好的例證。隨著他與索尼雅的關係逐漸惡化，他在日記中越來越多地指責她，而且也不再擔心她會看到這些內容了。早在一八九〇年，她就寫道：「我一直幫他抄日記，他開始為這件事憂慮了……他想要毀掉以前的日記，以便僅僅以一副德高望重的面目出現在他的孩子和公眾面前。他的虛榮心太強了！」沒過多久，他就把當時正在寫的日記藏了起來。於是「公開性」原則瓦解了，接著兩個人都變得行動詭秘起來。他用日記——此時他看成是秘密日記——極為詳細地記下他和索尼雅關於《克萊采奏鳴曲》的爭吵，「托爾斯泰和我的關係徹底完結了……我偷偷地讀他的日記，我真想知道我還能在生活中加進些什麼讓我們重新和解。但是他的日記只是加深了我的絕望。很明顯，他發現我一直在偷看他的日記，他就把日記藏了起來。」接著她又說：「以前，他要我謄寫他的作品，現在他把這事交給了他的女兒們（她沒有說『我們的』），而且小心翼翼地作品藏起來，以防被我看到。他這種有計畫地把我從他的個人生活中排除出去的做法要讓我瘋了，這真是讓人難以忍受的痛苦。」托爾斯泰開始記一本「秘密」日記，並把它藏在他的一隻長筒靴裡，這是他拋棄「公開性」原則的最後一著。索尼雅在他平常的日記裡什麼也沒有發現，於是開始懷疑是否還有一本秘密日記，於是四處搜尋，最後找到了，並成功帶走悄悄地細讀。讀完之後，她在日記裡粘上一張紙，上面寫著：「帶著一顆痛苦的心，我抄下了我丈夫這本令人悲哀的日記。關於我，甚至關於他的婚姻，他所說的是多麼不公正、

殘忍和——願上帝和尼古拉耶維奇寬恕我——不真實，這是歪曲和捏造。」

這場噩夢般的日記之戰的背景是這樣的：索尼雅堅持「正常的」生活方式，托爾斯泰從道德上對此感到極端地厭惡，他越來越堅信，妻子的這種要求在阻礙他追求精神的完善。事實上，索尼雅並不是托爾斯泰所說的那種十足的勢利主義者，她並不排斥他的諸多宣教中的道德真理，正如她給他的信中所寫的：「和人們在一起時，我看見了燈，我承認那是光，但是我無法走得更快，我被人群、也被我周圍的環境和習慣往後拉。」然而，隨著年歲漸高，托爾斯泰對他和索尼雅一起過的那種奢華的生活越來越缺乏耐心，而且日益厭煩。比如他寫道：「我們坐在院子裡，吃著十盤菜，有冰淇淋、僕人、銀餐具——而乞丐們從門口經過。」在給她的信中，他寫道：「我剛從你的生活方式中被拯救出來，就好像從一場可怕的恐怖中被拯救出來，這種生活方式幾乎引著我去自殺。我不能回到過去的生活方式中去，從中我看到的是毀滅……妳我之間有一場生死之戰。」

一九一〇年六月，這場鬥爭達到了令人同情的悲劇性高潮，而導火線則是切爾特科夫從流放地回來了，索尼雅恨他，而他顯然也把她看成控制預言家的競爭對手。由於托爾斯泰的新秘書布爾加科夫（Valentin Bulgakov）保存的口記，在整個事情的發生過程上，我們有了一份在某種程度上非常客觀的記錄。布爾加科夫最初受切爾特科夫指派，把每天的生活記錄寄給托爾斯泰的秘書。這種情況表明，托爾斯泰身邊的人正為他的日記而糾纏不休。然而，根據布爾加科夫的敘述，自從切爾特科夫從流放地回來，「出現在雅斯納雅波良納的舞台上之後，托爾斯泰的家中便發生了一連串戲劇性的事件。我意識到自己被這種『審查制度』嚴格地控制住了，於是，儘管他一再要求，我以各

種事由爲藉口，不再給（切爾特科夫）寄去我的日記副本。」布爾加科夫說他是帶著對伯爵夫人的偏見來到雅斯納雅波良納的，來之前他就得到「警告」：索尼雅「雖不能說是充滿敵意，但卻是個徹底冷漠無情的女人」。事實上，布爾加科夫發現索尼雅「爲人謙和，熱情周到」；「我喜歡她那褐色眼睛裡閃耀的直率目光，我喜歡她的樸實、和藹和聰慧。」他的日記表明，他逐漸意識到，與其說她在犯罪，不如說別人對她犯了罪；他的偶像托爾斯泰開始搖搖欲墜。

切爾特科夫回來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占有托爾斯泰的日記。他瞞著托爾斯泰，私下把那些日記都拍了照片。七月一日，索尼雅堅決要求把日記中「令人不快的章節」刪掉，這樣就不會被發表。當時還發生爭吵。事後，她和布爾加科夫一同乘坐馬車時，哀求他勸說切爾特科夫將日記歸還，「一路上她啜泣不已，非常可憐……看著這個悲泣的、不幸的女人，我無法不產生深深的同情。」當布爾加科夫和切爾特科夫談到日記的事情時，他顯得「極度狂躁不安」，並指責布爾加科夫把日記收藏之處告訴了伯爵夫人，而且「使我非常詫異……他竟做出令人憎惡的怪相，朝我伸出了舌頭」。顯然，切爾特科夫向托爾斯泰抱怨過。托爾斯泰寫了一封信給索尼雅（七月十四日），在信中他堅決認爲：「最近這幾年，妳的性情變得越來越易煩躁、專橫和缺乏自制力」；他們夫妻兩人現在對「生活的目的和意義的理解已經完全背道而馳」。爲了解決爭端，日記被密封起來，鎖在銀行裡。

一個星期後，即七月二十二日，托爾斯泰寫道：「愛情是兩個彼此分離的靈魂通過肉體的結合。」但就在同一天，爲了簽署新遺囑，他秘密地到附近的格羅蒙特村。他把所有著作版權都留給最小的女兒，並指定切爾特科夫爲遺產管理人。切爾特科夫安排了這一切，還親自草擬了文件。由

於擔心布爾加科夫可能會告訴索尼雅，這些事情都瞞著他悄悄進行。切爾特科夫抱怨說，他不能斷定托爾斯泰是否明白他簽署了什麼東西，「而且，就這樣，我們做了索尼雅一直最擔心的事：托爾斯泰死後，他的家庭將被剝奪對他著作權的繼承權，而這正是她一直唯恐失去、小心翼翼守衛的物質利益。」切爾特科夫接著說道，索尼雅本能地預感到「某些不可挽回的、可怕的事情剛剛發生」。

八月三日，發生了一場「噩夢般的爭吵」。索尼雅明顯地譴責切爾特科夫與她的丈夫有同性戀關係，托爾斯泰「氣得僵在那兒」。九月十四日，又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吵，切爾特科夫當著她的面對托爾斯泰說道：「如果我有一個你這樣的妻子，我會開槍打死自己。」切爾特科夫又對她說道：「只要我願意，我本可以把妳的家庭從泥淖中拉出來，可是我沒有。」一個星期以後，托爾斯泰發現索尼雅已經在長筒靴中找到了他的秘密日記，還讀過。第二天，他違背了先前同妻子的協定，把切爾特科夫的相片重新掛在他的書房裡。當他出門騎馬時，她把相片撕了個粉碎，在盥洗室裡用水沖走。接著，她燒掉一把玩具手槍，衝進花園裡。最小的女兒亞歷山德娜也常常捲入爭吵，養成了一副對母親時刻準備還擊的姿態，這激怒了索尼雅，她喊道：「這是有教養的小姐還是馬車夫？」——這些，無疑涉及家中最深的秘密。

十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晚上，托爾斯泰發現索尼雅半夜裡悄悄翻查他的文件，顯然是在尋找秘密遺囑。他喚醒亞歷山德娜，並宣布：「我現在就離開這兒——永遠。」當晚，他上了一系列火車。第二天上午，切爾特科夫得意洋洋地將此事告訴了布爾加科夫，「他臉上洋溢著快樂和激動」。索尼雅得知這個消息後，縱身跳入池塘，從這以後，她曾幾次企圖自殺，雖然這些行爲不那麼令人信

服。十一月一日，托爾斯泰染上了支氣管炎和肺炎，不得不離開火車，被安頓在里雅占——烏拉爾 (Ryazan-Ural) 線上的阿斯塔波沃車站 (Astapovo Station)。兩天後，索尼雅及其子女乘快車趕來探望他。七日，傳出了預言家去世的消息。托爾斯泰生命中的最後歲月令人心碎，特別是對那些欽佩他的小說的人而言，因為他們從中看不到體現了理論爭執的、對重大問題的崇高辯論，而是充塞著猜疑、怨恨、報復、狡詐、背叛、脾氣暴躁、歇斯底里及偏執卑劣的行徑。這是最惡劣的家庭爭端，由於一個好干涉別人生活、自私自利的外人的介入而惡化，並以災難告終。後來，托爾斯泰的崇拜者們努力把阿斯塔波沃車站臨終床上的場景，變成一幕「聖經」般的悲劇，但事實卻是，他那暴風雨般的漫長人生的結尾並非轟然巨響，而是一聲哀鳴。

托爾斯泰的例子再次說明，當知識分子以人爲代價追求抽象的思想時將會有什麼結果。歷史學家總是喜歡把這看成序幕，一個很快席捲了整個俄國的重大民族災禍而並不足道的個人序幕。托爾斯泰試圖帶來一場他認爲絕對必要的徹底的道德改革，結果卻毀滅了家庭，也毀滅了他自己。然而他仍然渴望著並預言——而且通過他的作品極大地鼓勵著——俄羅斯自身的一場千年的變革，不是透過他所鄙視的那種漸進的、艱難的改革，而是透過一場火山爆發般的社會劇變。不久，這場變革終於到來了，它是一系列托爾斯泰無法預見的事件的結果，其實現的手段會讓他想到就不寒而慄。這場變革使托爾斯泰所有關於社會復興的學說變得毫無意義，他所熱愛的神聖俄羅斯似乎被永遠地毀滅了。令人厭惡而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隨之而來的新耶路撒冷的主要犧牲者正是他所熱愛的農民，二千萬農民成了思想祭壇上成批被屠殺的祭品。

6 海明威——帶著威士忌的大師與騙子

新的焦點——美國

儘管在整個十九世紀，美國的人口和國力都在增長，並且在十九世紀末已經成爲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工業強國，然而，美國社會要出現如我所描述的那種知識分子，尚需一段較長的時日。這有幾個原因：獨立的美國從來就不曾有過舊制度，特權的建立與其說是依據占有的慣例，還不如說是以自然形成的公平原則爲基礎。不存在不合理、不公正的既定秩序以供新型知識分子去設計方案，不需要用建立在理性和道德基礎上的太平盛世的模式來取代。與此相反：美國本身就是對不公正的舊秩序進行革命的產物。美國的憲法以理性和道德的原則爲基礎，經過籌劃和撰寫，再通過和頒布，然後按照早期的實施經驗，由一批知識淵博而又富有哲學旨趣和道德修養的人士加以修改。因而，統治階級和知識階級之間毫無分歧，他們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正如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所說的，在美國沒有一個制度化的神職人員所組成的階

級，因此也就沒有對教權主義的反抗，教權主義正是使那麼多歐洲知識分子產生騷動的原因。宗教在美國是很普遍的，但卻處於非宗教人士的控制之下。他們只關心自己的行爲，而不是教義。宗教是自願行爲，還有多種教派，它所表現的是自由，而不是對自由的限制。此外，美國是一塊富足又充滿機遇的土地，這裡土地便宜，供應充足，任何人都不會貧窮；這裡沒有任何舉目所及的不公道，而在歐洲，正是這些不義鼓勵了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聰明人接受那些激進的思想；這裡沒有什麼罪孽迫切需要上天復仇——確實如此，大多數人都在忙於賺錢、花錢、開發、鞏固，有誰顧得了對他們社會的基本設定提出質疑？

驅走歐洲寄生蟲：愛默生

早期的美國知識分子如歐文（Washington Irving），在歐洲生活了很長時間，他們的語調和舉止、風度和旨趣都來自歐洲，他們是文化殖民主義的活遺產。出自本土、獨立的美國知識分子精神，本身就是對歐文這一代卑躬屈膝態度的反抗。這一精神最初、也最具代表性的倡導者——十九世紀美國知識分子的典範——是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他宣稱他的目的是要把「歐洲這條寄生蟲」從美國的身體和大腦中驅走，「用對美國的熱情趕走對歐洲的熱情」；他也曾去過歐洲，但帶著批評和排斥的態度；他思想中對美國方式的堅定主張同他對自己社會的設想，有著廣泛的同一性，隨著他年齡的增長，兩者更加接近，他的設想也正好與歐洲知識界的看法相對立。

一八〇三年，愛默生出生在波士頓，父親是基督教一位論派牧師。後來，他自己也成爲牧師，不過因爲不能專注主持聖餐儀式而離開了這個職位。他去歐洲旅行時，發現了康德，回國後，定居在麻薩諸塞州的康科特（Concord），在那裡他發起了美國本土的第一個哲學思潮——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他把主要內容寫入第一本著作《自然》中，一八三六年出版，是一部新柏拉圖主義的著作，帶有某些反理性成分和神秘主義的色彩，也有一點浪漫主義，尤其是其朦朧的色彩。愛默生寫過許多筆記和日記，其中的一本寫道：

這就是我，我來到這個世界，在宇宙之間傳遞我的自我，從事某種自然不能摒除、我自己也不能棄而不爲的善事，然後我將復歸於神聖的沉默和永恆，我作爲人，也來自其中。上帝是富足的，他的胸懷中包容著遠非我一人，維護著他們所有的生命、需求和美。我希望我可以說，愛默生，他的手、身體和歷史，都是不潔而令人厭惡的；但是我，我不會把自我同他或任何人混而爲一，在他的生命之上，在一切生物之上，我永遠會把善德之海向人類澆灌。河水不能倒流，人類的罪惡和死亡也不能腐敗永恆的能量，它會把自己散發給人們，正如太陽散發給光線，大海散發給水滴。

這段話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不過是些老生常談，但在一個崇拜黑格爾主義和早期的卡萊爾時代，許多美國人爲此而驕傲，感到他們年輕的國家已經產生了一位屬於他們自己的知識分子。有人

認為，愛默生的吸引力基礎不是「因為人們理解他，而是因為認為這樣的人應該得到鼓勵」。《自然》出版一年後，愛默生在哈佛大學做了一場名為「美國學者」的演說，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稱之為「我們知識分子的獨立宣言」。萌芽中的美國新聞界對他的主題頗感興趣。格里利（Horace Greeley）的《紐約論壇報》曾刊出過馬克思來自歐洲的報導，是全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這家報紙用聳人聽聞的方式把愛默生的超驗主義提升為國家的公共財產，就像尼亞加拉瀑布一樣。

愛默生很值得研究，因為他的經歷說明美國知識分子想要衝破本土習俗是多麼不容易。在許多方面，愛默生仍然是他的新英格蘭背景的產物，特別是在對待性的問題上，他表現出天真、清教徒式的軟弱態度。一八三三年八月，愛默生在克萊金普道克（Craigenputtock）拜訪過卡萊爾夫婦，在卡萊爾夫人看來，他有點像「天外來客」般脫離現世，而卡萊爾本人則注意到愛默生離開時像「天使，有著美麗而純淨的靈魂」。一八四八年，愛默生在弗斯特（John Foster）的住所參加一場宴會，出席的人還包括狄更斯、卡萊爾等。愛默生在日記中記錄了這次訪問他是如何竭力為美國的道德標準辯護：

我說當我來到利物浦的時候，我想知道這個城市裡的妓女問題是否一向都是那麼嚴重？在我看來，它簡直就是國家身上的致命毒瘤。我看不出任何少年還可以健康成長。但是我已聽說，多年以來，情況既沒有變糟也沒有變好。卡萊爾和狄更斯答覆我說，在我們這個時代，男性的貞操實際已不存在了，在英國能夠守身的男子屈指可數。卡萊爾顯然認為美國的情況同樣如此

……我向他保證，我們美國並不是這樣，不論新郎新娘，大多數有身分、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青年在走入洞房時仍是處子之身。

後來，當亨利·詹姆斯寫到愛默生時說：「愛默生對罪惡的渾然不覺……是我們所知他最可愛的地方之一。」然而，接著詹姆斯又尖刻地說：「我們都有這樣的印象，當良心在寂寞中嘆息時，便會尋求感官的刺激，就像那些被捕撈上岸的魚鼓動自己的腮。」很明顯，愛默生的性衝動並不強烈，他年輕的第一任妻子稱他為「爺爺」。愛默生對自己的母親十分崇敬，他的第二任妻子不得不與她同住一屋簷下直至去世為止。有時愛默生的這個妻子也會發出怨言，並被愛默生天真地記在日記裡：「把我從那些高貴的人們中拯救出來吧！我是一個小小的普通人。」他又寫道：「愛沒有，從來就沒有，阻止可憐的上帝做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自私自利總是得勢。」愛默生有一首詩〈把一切獻給愛〉寫得大膽，但是沒有什麼跡象表明他給了自己很多愛。愛默生與一位女子保持著超越婚姻的深厚友誼，屬於嚴格柏拉圖式或新柏拉圖式的，不過這並不是那位女士的選擇。愛默生曾謹慎地說出：「我也有器官，也享受過愉悅，可是也因愉悅的誘餌落入過陷阱中的經驗。」他的日記常告訴我們更多的東西，其中記載了他在一八四〇至四一年間做過的一個夢，夢中愛默生參加了一場關於婚姻的辯論，突然，一個擴音器轉向了聽眾席，「擴音器注滿了水，向四周噴去」，人們被驅散，噴水口最後對準了愛默生一個人。「當我看著它的時候，噴出的水把我全身濕透。我從夢中醒來，發覺自己身上完全是乾的。」

愛默生所娶的兩任妻子都是經過審慎考慮的，爲此他得到了一筆資金，足以讓他的生活在某個程度上不需依賴著述。他的投資穩健，這使他與當時飛速發展的企業體制建立了密切的關係。最終，愛默生在全國獲得了無人匹敵的名望，被視爲哲人、先知。其實，與其說這是因爲他的著作的關係，不如說是由於他的巡迴演說，這也是企業體制的組成部分。他的旅程的第一站是波士頓，演說主題是「人類生活」；然後在紐約，演說的題目是「時代」。此後，愛默生對一些偉大的思想家進行了研究，於是便有了「代表人物」的演說。作爲演說家，愛默生以高雅又從眾的面貌出現，無論本地、區域性，甚至於全國性的報刊，都對他的演說進行詳盡的報導。一八二九年，豪布魯克（Josiah Holbrook）發起了拉西姆學園（Lycium，譯註：拉西姆學園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創辦的學校，他在其中講學並與學生進行討論）運動，以教育這個發展中的民族。愛默生的舉動正是和這一運動的發展一致。一八三〇年，辛辛那提開設了講演廳，一八三二年在克利夫蘭、一八三五年在哥倫布又相繼開設。此後，發展中的中西部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到處都有了這類場所。到了一八三〇年代末，幾乎每個重要的城鎮都擁有這種場所，與之相伴的是「青年商業圖書館」和各種講演與討論協會的出現。這些組織的主要對象是青年未婚男子，比如銀行職員、售貨員、簿記員等。在新興的城鎮中，這些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高得驚人。這些組織的目的是不讓他們在街頭遊盪及走出沙龍，以提高他們的商務專業水平和道德修養。愛默生的觀念與這種設想非常一致，他反對文化和知識的精英化，他認爲美國的文化必須真正做到民族化、普及化和民主化，其中自我完善是至關重要的。他說第一個在農舍中閱讀荷馬的美國人，對美國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他還說，如果在西行的列車上看

到有人在讀一本好書，他就想上前擁抱他。愛默生個人的經濟和政治哲學與政府的哲學是一致的，就是要推動美國人穿越大陸去完成他們明確的使命：

可以發現，唯一可靠的原則是自我調節供需的尺度。不要立法，緊咬你們的節約法，你們就抓住了關鍵。不要發津貼，而要制定平等的法律，保障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你們就不需要施捨。向有才有德者打開機遇之門，他們就會充分地發揮自己的能力，而財富也就不會落入壞人之手。在一個自由又公正的國家裡，財富會迅速地從懶惰者與低能者那裡轉向勤勞、勇敢而又意志堅強的人手中。

與此同時，馬克思正在發展和宣傳他的學說，很難想出有什麼理論像愛默生的觀點那樣正好與之相反，在這一方面，愛默生以他的實際經驗一再反駁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必然的運作方式。業主們、經理們對於他這種有啓發意義的探索非但不反對，而且極力支持。一八五一年愛默生來到了匹茲堡，當地的公司爲了年輕的職員們能夠前去聽他的演說而提前下班。他的演說目的並沒有明顯表示出是在於強化企業精神，比如「直覺與靈感」、「思維與自然的同一」、「智力的自然史」等。但是愛默生力圖證明知識再加上道德品行將有助於企業成功。許多人慕名而來，卻困惑地發現這位傑出的哲學家所說的在他們看來都是常識。《辛辛那提報》說：「他沒有裝模作樣……就像一位慈祥的老爺爺讀他那本《聖經》。」演說中愛默生還有不少題外話，諸如：「每個人都是消費者，而且

也應該是個生產者。」「憲法規定了人的價值，人應該富有。」「生命就是追求權利。」這些話打動了聽眾，認為是真話，經過報紙的簡化和挑選，這些話也成為美國大眾的共同格言。在同一系列的演說中，愛默生經常和巴納姆（P. T. Barnum，譯註：美國遊藝節目經理人，以主辦聳人聽聞的遊藝節目和奇人怪物展覽而聞名）合作，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巴納姆的演說主題是「金錢獲得的藝術」和「生活中的成功」。聽愛默生的演說成為追求文化和高雅趣味的標誌：愛默生已成為思考者的化身。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他在芝加哥做了最後的演說，《芝加哥論壇報》報導：「喝彩和掌聲……顯示了聽眾的文化修養。」對於這樣一個國家，它以對待金錢那樣的熱情去追求道德和精神的進步，並認為兩者在創造自身的新文明上都是不可少的。到了一八七〇年代末，愛默生已成為這個國家的民族英雄和導師，就像雨果之於法國或托爾斯泰之於俄國，愛默生確立了美國模式。

恨母入骨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文化和精神生活被認為是高度和諧的。如此一來，我們有必要談一談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一八九九—一九六一）。第一眼看過去，很難將海明威視為知識分子，但進一步觀察，就可以看到他不但具有知識分子的所有特徵，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並以特殊的美國方式連繫起來。此外，海明威也是一位極具獨創性的作家。他改造了同一時代的美國及所有英語國家的人表達自己的方式。他創造了新的個人化風格，這是一種世俗的、極具當代倫

理特色的風格。這種風格的起源是純美國式的，可是又非常容易和其他多種文化融合起來。他把美國人各式各樣的美國觀念融爲一體，使自己成爲他們原型的人格化。於是，在一個特定的時代，海明威便代表著美國。這就好像一七五〇年代伏爾泰代表法國、一八二〇年代拜倫代表英國一樣。

一八九九年，海明威出生在芝加哥附近的橡樹園，四分之一世紀以前，那兒曾經熱烈歡迎過愛默生。海明威的雙親埃德蒙茲與格雷絲，以及海明威本人，都是某種文化的出色成果，這種文化是愛默生和他的演說，以及這些演說所支持的經濟動力論所催生的。海明威的父母都是健康、勤奮而能幹的人，受過良好的教育，多才多藝，也非常適應他們所處的社會。他們感激他們所繼承的歐洲文化遺產，但與此同時，他們也自豪地意識到美國成功地改造了這一遺產。無論屋裡屋外，他們都敬畏上帝，過著充實的生活。海明威的父親是高明的內科醫生，還喜歡打獵、射擊、釣魚、航海、露營、探險，有著守林人的那種完備的野外生存技能，並都教給了兒子。母親非常聰明，意志堅強，在許多方面都頗有造詣，包括閱讀廣泛，能夠寫優美的散文和精巧的詩句，還會繪畫、設計和製作家具，歌也唱得很好，會彈奏不同的樂器，出版過原創歌曲。這兩位父母不僅將自己接受的一切文化遺產傳授給孩子們，而且增加了新的東西。海明威是長子，也最受寵愛。從很多方面來看，海明威的雙親都是模範家長，海明威也發展了自己極佳的閱讀和文學才能，而且還是內行的體育愛好者和全能運動員。

這對父母都是虔誠的教徒，都是基督教公理會教友。醫生父親還是一位嚴格的安息日主義者，不僅每個禮拜日都上教堂、做飯前禱告，而且根據妹妹姍尼的描述：「我們要舉行家庭早禱，加上

讀《聖經》，再唱一兩首讚美詩。」父母時刻都在對孩子們強調主流新教的道德準則，任何違背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格雷絲會用毛刷抽打孩子們的屁股，而醫生父親則是使用磨剃刀的皮帶。如果孩子們被發現撒了謊或罵人，就會被責罰用苦澀的肥皂擦洗自己的嘴，體罰後，孩子們還得跪下來請求上帝的饒恕。埃德蒙茲始終都堅定地把基督教精神等同於男性尊嚴和紳士風度，他曾寫信給海明威說：「我希望你表現出男子漢所有的善良、高貴、勇敢和謙恭，敬畏上帝，尊重女士。」母親則希望自己的兒子能成爲一位傳統的新教英雄，不吸菸、不飲酒，婚前沒有性行爲，對婚姻忠誠，始終尊重並順從父母，特別是母親。

從孩童時期，海明威就拒絕接受父母的宗教，絲毫不想成爲父母所希望的那種兒子。在十幾歲的時候，海明威似乎就已下定決心，打算隨著自己的天賦和所有的愛好去發展。他希望自己既成爲名人，又得到美滿的生活。這是一種浪漫、文學化的念頭，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道德化的，其中毫無宗教的內容。確實，海明威似乎沒有什麼宗教思想。十七歲時，他私下放棄了自己的信仰，當時他遇見了比爾·史密斯（Bill Smith）與凱蒂·史密斯（Katy Smith，後來成爲帕索斯〔Passos〕的妻子），他們的父親是信奉無神論的紳士，寫過一本「證明」耶穌基督從未存在的書。海明威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堪薩斯市星報》，他還搬進了一處無人管理的公寓，此時可能就不再去教堂了。最晚到一九一八年，海明威快二十歲時，跟母親保證說：「別再爲讓我成爲好基督徒而擔心、哭泣和煩惱了。其實，我還是像往常一樣每晚都做祈禱，信仰仍然堅定。」不過這是海明威的謊話，他這麼說不過是爲了避免和家庭發生衝突。

海明威不僅不再信仰上帝，而且認爲組織化的宗教對人類的幸福構成威脅。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曾說，她只看見海明威跪過兩次：一次是在他們的婚禮上，另一次是在他們的兒子洗禮時。爲了取悅第二任妻子寶琳娜，海明威成了羅馬天主教徒。當寶琳娜試圖執行天主教的教律時（比如反對節育），如果使他感到不便，他就會勃然大怒。他的小說《一方明淨之地》，嘲弄和戲擬了上帝；《午後之死》對耶穌的十字架受難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在《第五縱隊》中，他褻瀆對上帝的感恩。他對羅馬天主教的認識，就是對它的厭惡。西班牙內戰初期，某地幾百座教堂被焚毀，聖壇和神職人員被污辱，成千上萬的神父、僧侶、修女被屠殺。海明威知道那個地方，還表示過喜歡那個地方，可是發生這件不幸的事後，海明威卻沒有任何的抗議。在海明威離開第二任妻子後，甚至也不肯在形式上裝成天主教徒了。實際上，自他成年後的全部時間裡，他都不是基督徒，他崇拜他自己所確定的觀念。

海明威這種對宗教的拒絕是青春期的知識分子的特性，更是對父母道德文化的拒絕的一個部分。後來，他又竭力將母親和父親區分開來，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爲父親開脫。當父親自殺時，他企圖看成是母親的責任。儘管原因是清楚的，因爲這位醫生早已知道自己患了一種痛苦又到了末期的疾病。埃德蒙茲在夫妻關係中是弱者，不過一旦兒子與他們發生爭執時，他總是完全支持妻子，所以這種爭吵與其說是兒子與母親之間，還不如說是與父母雙方之間的。但是，海明威把反抗都集中在母親格雷絲身上。在我看來，海明威這麼做很可能是因爲他意識到，他以自我爲中心的意志和文學才能主要來自母親。格雷絲是一個令人人生畏的女人，正如海明威也變成一個令人人生畏的男人，一

山不能容二虎。

一九二〇年，他們的爭執達到了頂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期，海明威加入了義大利前線的野戰救護隊，得到戰爭英雄之類的回報，但他不僅沒有找到一份工作，而且他的遊手好閒和墮落行爲（按照父母的標準）還使父母十分不快。這年七月，格雷絲向兒子遞交了一份「大抗議書」，她說，每個母親的一生就像是一家銀行，「當她所生的每一個孩子來到人世時，都帶著一本有巨額存款的銀行帳戶，似乎是取之不盡的。孩子總是從中一次又一次取款。」「在他整個少年時期，帳戶上沒有任何進項。」然後孩子長成青年，「銀行的帳戶一直是透支狀態」，「只有幾個便士的進項，就是孩子自願給母親的一些幫助、一些關心，以及『謝謝妳』這樣的話。」到孩子成人，銀行仍在支出愛和同情：

這個時候，帳戶上需要一些存款，需要大筆的存款，這就是感謝和理解，對母親的思想和事務表示關切；還要給家庭帶來些許的慰藉；有意地去支持母親的一些特別的偏愛；無論如何不要傷害她的思想。把鮮花、水果、糖果或可愛的穿戴帶回家中給母親，再加上吻和擁抱……這是一種悄悄支付帳單的方式，把它們從母親心頭除去……存入的款項將會使帳戶得到好名聲。據我所知，許多母親都在接受這些東西，以及更多有價值的禮品和回報，這都來自她們的兒子，而我的兒子比他們能幹。海明威，我的兒子，除非你清醒過來，停止你這種遊手好閒、尋歡作樂的生活……不再用你那張漂亮的臉蛋去做交易……不再忽視你對上帝和救世主耶穌基督

應盡的職責……否則，你前面只有破產並無其他，你已經透支過度！

格雷絲對這份文件思考了三天，精心潤色，正如海明威對待他的獲獎作品，然後，親自交給海明威。可以看到，從那時起，海明威就有一種道德上強烈的受辱感，混合在一起的是他認為自己是正當的。這對於他的小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海明威對此的反應是可以預料的，伴隨著長期以來逐漸積累的怒氣，從此他就把母親當做敵人般仇恨。帕索斯說海明威是他所見過的人當中唯一一個真正仇恨自己母親的。另一個舊識蘭漢姆(Lanham)將軍證實：「從我與海明威交往之初，每當他提到自己的母親時，總是稱之為『那條母狗』。恐怕他對我至少說過一千遍，他是多麼恨她。」這種仇恨反覆以種種方式反映在他的小說中。仇恨甚至相應地蔓延到了他姐姐身上，「我的姐姐母狗馬塞利娜」、「一個名符其實的婊子」。仇恨又逐漸地擴展到整個家庭上，在一些不相干的地方也常流露出來，比如在其自傳《流動的饗宴》中，談到那些拙劣的畫家時（他的母親也作畫），他說：「他們不會像家人那樣做出可怕的事使親人受到創傷，對於那些糟糕的畫家，你所要做的就是不去理睬他們。可是，對於家裡的人，即便你已經學會不去看他們，不去聽他們，不去回他們的信，他們在許多方面還是很危險。」海明威對母親的怨恨是如此之深，以至於在相當程度上毒害了他的一生，尤其是因為他內心總是留存著愧疚感，這種感覺一直困擾著他，也使他的仇恨永不消退。一九四九年，格雷絲已近八十歲高齡，但海明威依舊恨她，他從古巴的住處寫信給出版商說：「我不想見到她，而且她也知道，她永遠不可能來這

裡。」海明威對其母親的強烈反感超過了對純粹功利主義的厭惡，這種情緒近似於馬克思對待資本主義制度的態度。對於海明威來說，對母親的仇恨已經上升到了哲學體系的高度。

家庭的破裂將海明威趕到了《多倫多星報》，此後，他又以駐外記者和小說家的身分去了歐洲。他不僅否定了父母的宗教，也否定了他母親在其傳統有力的散文中，對基督教文化的樂觀主義所表達的見解，而這正是海明威所厭惡的。促使海明威追求文學的完美——成了他顯著的特色——的力量之一，就是他有一股不可遏制的欲望：要跟母親寫得不一樣。他母親在寫作中總是使用陳舊、傳統、過分雕琢的文學修辭（海明威特別憎惡母親寫給他的信中的一句話，這句話被認為可以體現她的寫作風格：「我是以所認識的兩個最優秀、最高貴的紳士來為你取名的。」）。

散文就是建築物，不是內部裝潢

從一九二一年起，海明威過著駐外記者的生活，將巴黎當成基地，報導中東戰事和國際會議，不過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流亡於塞納河左岸的文人。海明威寫詩，也試圖寫些散文，同時拼命閱讀。他從母親那裡繼承的許多習慣之一，就是隨身攜帶書籍，他把書塞在口袋裡，只要有空閒，就可以隨時隨地看書。海明威什麼書都讀，而且一生都喜歡買書，因此無論他住在哪裡，家中總有整堆整堆的書倚牆而立。海明威打算在古巴的寓所建造一個藏書七千四百冊的工作圖書館，這些書可以讓他專門研究他所感興趣的問題，文學占了其中大部分，他反覆閱讀著這些書。當海明威來到巴

黎時，他幾乎閱讀了所有的英文經典著作，但他決心還要擴大自己的閱讀範圍。海明威從未受過高等教育，雖不因此耿耿於懷，卻有點遺憾，想竭力填補由此留下的任何缺陷。於是，他專心致志閱讀了斯丹達爾、福婁拜、巴爾扎克、莫泊桑和左拉；還有俄國的重要小說家，如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也有美國作家，如亨利·詹姆斯、馬克·吐溫 and 克萊恩（Stephen Crane）。對於現代作家，他也有興趣，例如：康拉德、艾略特、史坦因（Gerrude Stein）、龐德（Ezra Pound）、勞倫斯、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以及喬伊斯。海明威的閱讀如此廣泛，也是受到日益強烈的寫作衝動所驅使。從十五歲開始，他就很崇拜吉卜林，而且終生在研究吉卜林。這時，海明威又密切注意康拉德，以及喬伊斯那本出色的小說集《都柏林人》。像所有真正優秀的作家那樣，海明威不僅大量閱讀，而且還進行分析和學習那些二流作家，如馬里亞特（Marryat）、沃爾浦爾（Hugh Walpole）、穆爾（George Moore）。

一九二二年海明威來到巴黎後，結識了福特（Ford Madox Ford），進入了巴黎知識界的中心地帶。福特非常善於挖掘文學天才，曾出版過勞倫斯、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溫德姆·劉易斯（Wyndham Lewis）、蘭塞姆（Arthur Ransome）等。一九二三年福特出版了《大西洋兩岸評論》，根據龐德的推薦，他僱用了海明威擔任兼職助理。海明威很佩服福特經營文學的才幹，但也頗多怨言：福特忽視多數年輕的作家；對新風格和新的文學形式沒有多大興趣；他的趣味與那些主流刊物過於親近法英兩國，尤其是他認為最好的文學作品，他特別輕視量和質都在向上提升的美國文學。海明威視自己為美國先鋒派文學的主持者，曾埋怨：「福特把一切全他媽的搞得一團糟。」海

明威安置在聖路易島上小小的辦公室裡，下面是三山出版社（Three Mountain Press）。從那時起，海明威就冒著風險使《評論》向美國文學傾斜。《評論》發表的作品中英國人占六十篇，法國人占四十篇，美國人則占九十篇。在福特離開巴黎前往美國旅行期間，海明威毫不留情地變更了七月號和八月號兩期，變成美國文學新秀的成果展。當福特回來，他不得不對此表示歉意：「有異常之多的美國新秀的作品，我們一直在堅持美國人發表作品的權利——但卻從未如此有效地把他們的作品介紹給我們的讀者。」

海明威對自己的文學聲譽和影響有著強烈的追求，在這漫長的過程中，他更注意發展自己的才能，而非關心左岸文化界中的派別陰謀和紛爭，龐德把海明威介紹給福特時說：「他的詩寫得很好，他也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散文家。」這一評價很有眼光，因為一九二二年這句話出現時，海明威還沒有形成成熟的風格，但他正在努力，可以從他早期筆記上多處的塗改得到證明，很可能從來沒有一個小說家，在形成自己個人的寫作風格上，付出如此艱辛的努力和時間。這些年來對海明威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範例：作家應該如何獲得他自己的專業技巧。在崇高目標和毅力方面，可以媲美的是易卜生，爲了成爲劇作家，易卜生也是極盡艱辛，他們在文學技巧上同樣具有革命性的影響。

海明威相信他所承接的是一個虛假的世界（可以他父母的宗教和道德文化爲代表），必定會被一個真實的世界所取代。他所謂的真理是什麼呢？絕不是繼自父母的基督教所揭示的真理——他認爲這些都是毫不相干的東西而予以拒絕；也不是任何來自過去或反映了別人意見的思想信條所說的真理——無論多麼偉大。對於他自己而言，真理就是他親身所見、所感、所聽、所嗅、所品味過的東西。

海明威欽佩康拉德的文學理論，以及他對自己的目標的總結：「一絲不苟地忠於我自己所感覺到的真理。」這正是他的起點。但你又怎樣來表達這種真理呢？大多數人，包括大部分職業作家在寫作時，往往都是以別人的眼睛進入事物去觀察，這是因為他們繼承了陳舊的表達和語言組合方式，以及陳腔濫調的隱喻、題材和文學想像。新聞記者尤其如此，爲了時效性，重複與貧乏習以爲常。但是海明威卻得益於在《堪薩斯星報》的良好訓練，該報相繼幾任編輯編了一本收錄一百一十條規則的書，目的是爲了讓記者使用樸實、簡潔、明快、擺脫陳腔濫調的英語，這些規則被嚴格地執行。海明威後來說：「那些都是我所學到的寫作規則中最好的。」一九二二年他報導熱那亞會議，在此期間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教他如電報式不帶感情的敘事技巧，海明威很快就吸收了，而且越來越喜歡。當他向斯蒂芬斯展示自己的第一個成果時，大喊著：「斯蒂芬斯，看看這份電文：沒有贅詞、沒有形容詞、沒有副詞——除了血、骨和肉就什麼也沒有了……這是一種新的語言！」

在自己新聞工作的訓練基礎上，海明威創立了自己的方法，它既是一種理論，也是一種實踐。他一次又一次寫下許多東西，談論如何寫作——在《流動的饗宴》、《非洲的青山》、《午後之死》等作品中都有。他爲自己確立的「寫作基本原則」是值得研究的。海明威曾繼康拉德之後爲小說藝術界定：「設法找到給你帶來激情的東西、使你感到興奮的行爲，然後寫下來，寫得清清楚楚，這樣讀者就能看個明白。」一切都要寫得簡潔、扼要、樸實，用動詞和短句；不必多餘或製造效果。他曾寫道：「散文就是建築物，不是內部裝潢，巴洛克風格已經過去了。」海明威特別注意表述的精確性，爲了找到詞語，他不厭其煩地查閱字典。有一點很重要，在他散文風格的形成期，海明威

也是詩人，並深受龐德的影響。海明威曾說，龐德教給他的東西超過了其他的人。龐德「相信精確語——即有一個唯一正確的詞可以運用——他教我不要依賴形容詞」。海明威還非常仔細地研究過喬伊斯，喬伊斯對動詞的精確性特別敏感，成了海明威尊敬和模仿的另一位作家。說到海明威的文學前輩，確實可以說他是吉卜林和喬伊斯聯姻的產兒。

真誠的散文風格

事實上，海明威的風格是非常獨特的，他不但影響了人們的寫作方法，甚至包括觀察方法。從一九二五至五〇年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海明威的影響壓過所有的人，而且是持續不斷、無所不在，以至於我們今天根本不可能從散文，尤其是在小說中去掉海明威的因素。不過在一九二〇年代早期，海明威發現自己很難得到支持者，甚至出版也遇到困難。他的第一部作品集《三個短篇和十首詩》在巴黎出版，這是一次典型的先鋒派文學的試驗，但一些大型刊物卻對他不屑一顧。自認為富有冒險精神的《日晷》雜誌直到一九二五年仍拒絕刊登海明威的小說，包括那篇出色的故事〈打不敗的人〉。海明威所做的是所有真正具有獨創性的偉大作家都會做的事——他開闢了自己的市場，以自己的趣味感染讀者。在一九二三至二五年，海明威的方法已顯露出來，他對事件進行質樸的、精確的描繪，同時又將相應的情緒精細地暗示出來。一九二五年，隨著《在我們的時代裡》的出版，海明威得到了突破。福特感到可以把海明威捧為美國第一流的作家：「最大的真誠，最熟練的

技巧，最完美無缺的作品。」對威爾森 (Edmund Wilson) 來說，這本書展現了散文的「首要特徵」，即「極大的原創性」和感人至深的「藝術尊嚴」。緊隨著成功的第一次，又有兩部生動的悲劇性小說問世了，一部是《太陽依舊上升》(一九二六)，另一部是《戰地春夢》(一九二九)，後一部也許是他最好的作品。這些作品銷售了幾十萬冊，被各種類型的作家讀了再讀，他們為此領悟、消化、嫉妒和爭論。早在一九二七年，帕克 (Dorothy Parker) 就在《紐約客》上對海明威的作品集《沒有女人的男人》進行過評論，指出他的影響是「危險的」——「他所做的一些最簡單的事，看上去很容易就能辦到，但是，看看那些試著去做同樣事情的男孩們吧！」

海明威的風格可以被套用，但不可能被成功地模仿。因為這種風格跟作品的題材，尤其是與作品的道德態度是不可分開的。海明威的目的是要避免任何類型的直白說教，他還譴責別人的這種做法，即使他們是最偉大的作家。他曾寫道：「我熱愛《戰爭與和平》，因為此書對於戰爭與人物作了精彩深入而又真實的描寫，但我從不相信這位偉大伯爵的思想……即便他可能比世上其他任何人創造出更多的東西、具有更強的洞察力、擁有更多的真理。不過他那種沉悶而自以為是救世主的思想，並不比許多其他熱中傳道的歷史教授更高明。從他那裡，我懂得不要相信自己創立了以大寫字母開頭的思想體系。在寫作時要盡可能地真實、坦率、客觀、謙遜。」在海明威最優秀的作品中，總是盡量避免向讀者說教，甚至盡量把讀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筆下人物的行動方式上來。然而，他的作品處處充滿著新的世俗道德，這種道德從海明威對事件和動作的描述中直接顯露出來。

精巧的普遍性是海明威道德的實質，也使他成為知識分子的原型，這種道德反映了他的美國特

色。在他的眼中，美國人精力充沛、積極主動、強健有力，甚至帶有暴力色彩，他們是實踐者、成功者、創造者、征服者、平定者、追求者、建設者。海明威本人就是精力充沛、積極主動、強健有力甚至有暴力傾向的人。當他與龐德和福特談論文學時，會不時中斷討論而繞著福特的工作室與假想的對手進行拳擊。他是一個魁梧、強壯的男人，精通廣泛的體育運動。作為美國人和作家，海明威很自然地過著一種充滿行動的生活，並描寫這種生活。行動是海明威的主題。

當然，這樣的主題中並沒有新東西。行動也是吉卜林的主題，吉卜林的英雄或主角是士兵、強盜、技師、海員和大大小小的統治者——他筆下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甚至動物和機械裝置，都不時為暴力行動的傾向和動機所支配。但是吉卜林不是知識分子，他是天才，他有一個「守護神」，但他不相信憑藉自己一個人的智力可以改變世界，他也不拒絕這個世界巨大的智慧遺產；相反地，吉卜林完全贊成它的法律和習俗，認為這是芸芸眾生所無法改變的，他還寓意深長地描述了反抗者的受罰。海明威同拜倫更為接近，拜倫是另一位渴望行動，並以熱情的技巧描述行動的作家。他完全不相信自己的朋友雪萊的那套烏托邦式的革命計畫，對他而言，這些不過是抽象的理想而非可行的概念。雪萊本人在《朱利安和馬達羅》中把他的觀點給說了出來，拜倫已經為自己形成了一套道德體系，用以對抗他永遠離開妻子和英國時所否定的傳統道德規範。從這個意義上，而且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拜倫算得上是一位知識分子。他從沒正式確定自己的體系，這體系是前後完全一致的。拜倫的思想強烈地表現在他的書信中，也滲透在他偉大的敘事詩中的每一頁，如《恰爾德·哈洛德》和《唐璜》。這是一個充滿榮譽和責任的體系，雖然沒有編纂整理，但他以行動來作說明。任何一個

讀過這些詩的人，不會不清楚拜倫是怎樣看待善和惡的，尤其是如何評判英雄主義。

從例子中可知，海明威風格與拜倫相似。海明威曾表明他的理想是有能力展現「壓迫下的優雅」（這是由他母親的名字而來的一句難解的話，譯註：海明威的母親名為格雷絲，有「優雅」之意），但他並沒有做進一步的解釋。很可能，他的道德觀是難以做出確切定義的，如果試圖定義，倒會使它受到損傷和削弱。但是，很明顯，他的道德觀是可以說明的，而且在海明威所有作品的背後，它都是一種推動力。他的小說是行動的小說，因此也成為思想的小說，因為對於海明威來說，根本就不存在什麼道德中立的行動。在海明威，甚至於對一餐飯的描寫也是一種道德說明，因為吃和喝中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東西，有正確也有錯誤的吃與喝的方式。幾乎所有的行動都可以表現為正確的或是不正確的，確切地講，是高貴的或卑賤的。作者並不表明自己的道德標準，可是他是在一個隱喻的道德框架中敘述一切，所以行動就是代表自己在說話。這個道德框架是個人的，沒有宗教信仰，確實不是基督教的。他的雙親，尤其是他的母親發現他的小說是不道德的，是常常令人難以容忍的，因為她至少發現這些小說帶有強烈的道德色彩，在她看來那是一種虛假、褻瀆神明的道德。海明威說過，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暗示，通姦也有正當和不正當的方式，偷竊與殺人也是如此。海明威小說中的精華就是他對人物的觀察，如拳擊手、漁夫、鬥牛士、士兵、作家、運動員，或者幾乎所有的人，都依據各自的價值標準做出明確而又熟練的行動，力圖幸福而正直地生活，然而他們通常是以失敗告終。悲劇的產生是因為他們的價值觀被證明是虛幻的或錯誤的，或者是由於自身的缺點、外來的陷害或難以駕馭的客觀事實而導致失敗。但由於看到了真理，由於獲得了發現真理的能力和正

視真理的勇氣，即使失敗也得到了補償。海明威筆下的人物能否挺立或倒下，就得看他們是否真誠。真誠是海明威散文中最基本的成分，而且正是一條貫穿其道德體系的線索，是它始終如一的原則。

年輕大師、老江湖騙子

創立了自己的風格和道德標準後，海明威發現自己必須遵循這兩者來生活。在某種程度上，他已變成了自己想像的受害者、囚徒和奴隸，他被迫在現實生活中照著他的小說來演出。就這一點而言，海明威並不是唯一的一個。當拜倫發表《恰爾德·哈羅德》的第一章，就發現自己正按著詩中所指的那條路行走；寫《唐璜》時，也許稍稍改變了方向，但其實已經沒有給自己留下多少選擇餘地，只有按照自己的詩生活下去。這種生活一方面很合拜倫的口味，另一方面也是一種被迫的行動：他樂於扮演登徒子、英雄和解放者的角色。與海明威同時代的人中，馬爾羅（Andre Malraux）亦然，他也是一位行動的知識分子和小說家，而且還是革命家、探險家、藝術財寶的海盜、抵抗運動的英雄，他的職業生涯結束前，是坐在戴高樂總統右手的資深內閣部長。對於海明威來說，一個人並不是那麼確定的，他追求的「真實」生活、充滿行動的生活，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對於他那類小說是至關重要的。如關於西班牙內戰的小說《戰地鐘聲》（一九四〇）中的英雄喬丹所說的，他「想知道它到底是什麼，而不是它被認為是什麼」。海明威是一個迷戀暴力的

知識分子，是一個真實的人。他在《多倫多星報》工作時，一位敏銳的同事對當時二十歲的海明威做過這樣的評價：「他是世上從未有過的奇特組合，既極度敏感又執著於暴力。」海明威酷愛他父親所有的戶外活動，而且範圍更廣——滑雪、深海捕魚、圍獵，還有戰爭。毫無疑問，有時他非常勇敢，《紐約時報》的記者馬修斯曾描述過海明威在一九三八年厄波羅河（Edro）戰役中是如何將他從急流中搶救出來的，海明威從中顯露了他超凡的力量：「危難時刻，他確實是一條好漢。」一些白人職業獵手同樣是見證人，他們曾帶著他去東非遊獵，表現出色。海明威的膽量並非未經思考或本能，而是出於理性，他對危險有著敏銳的感覺，許多軼事可以證明。他知道害怕是怎麼回事，也知道如何克服自己的恐懼——從來沒有作家把膽怯刻劃得比他更生動。海明威使讀者感覺到他的意識就活在他的小說中。

這也正是為什麼海明威的硬漢形象能夠伴隨著他的名聲而迅速傳播開來。如同盧梭以後的其他知識分子一樣，海明威的宣傳能力也很出眾，他創造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可以目睹的「海明威」，這與舊式、天鵝絨般柔軟、悠閒的浪漫派形象正好相反，這個海明威形象在他的時代裡發揮了自由者的作用，代表了新式的男子漢形象：獵裝、威士忌酒、子彈袋、槍支、鴨舌帽、一撮火藥、菸草。他的煩惱之一，是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大一些。在二〇年代，海明威很快就升級做了「爸爸」，而時髦女郎在他面前就變成了「女兒」。到了四〇年代初，「海明威爸爸」就已成爲人們所熟知的雜誌封面人物，同好萊塢的頂尖男星一樣出名。歷史上從來沒有作家像海明威那樣有這麼多的採訪和照片。海明威那張留著白鬍子的臉終於比托爾斯泰更有名了。

但是爲了把他的道德人格化，爲了維護他所創造的傳說，海明威如同在服苦役，一直到死，他都不允許自己停下來。正如他母親將母愛角色視爲銀行帳戶，海明威也不斷地將自己的行動經歷存入他的個人戶頭，然後支領出來放入他的小說中。一九一七至一八年他在義大利戰爭的經歷是他的原始資本；二〇年代，海明威已經花掉了這筆資金的大部分，於是就用瘋狂的體育運動和鬥牛比賽來平衡支出；三〇年代，他透過圍獵儲存了有價值的東西，西班牙內戰又讓他意外得到了一筆橫財。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提供的機會海明威卻懶於好好利用，當他投入時，已嫌遲了，沒能爲他的寫作資本添加些什麼。此後，他的主要進帳來自於打獵和釣魚。他也曾試圖重新參加圍獵射殺和鬥牛巡迴演出，但帶來的與其說是回報，還不如說是笑料。威爾森指出了這種海明威在寫作上和行動上都存在的巨大反差：「年輕的大師與老江湖騙子。」事實上，海明威仍喜歡一些運動激烈的消遣，但並不如他自己說的那樣狂熱。人們可以察覺到海明威對荒野的熱情已經消退，只要有膽量，似乎更願意掛起獵槍，坐在他的圖書館中。當他向出版商斯克里布納（Charles Scribner）敘述自己的境況時，他的口氣虛假、牽強又帶點自誇，例如在一九四九年，海明威寫信給斯克里布納：「爲了慶祝我的五十歲生日……我做愛二次，還到俱樂部連續打中十隻鴿子（飛得非常快）。我與朋友們喝了一箱法國酒，花了整個下午在海上尋找大魚。」

真的？假的？還是言過其實？沒有人知道。無論海明威對自己或對別人的評述，都不能不經核實就當成事實。儘管在他設想的道德中，真實在其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海明威仍有著知識分子的典型信念，在他看來，真實必須是自我自覺的僕從。他認爲——有時是在鼓吹——撒謊是他成爲作

家的訓練項目的（士兵之家都是說謊者，地說謊，當想前，就已有說女演員瑪許訂斯城的同事說

在海明威朋友他釣到了當職業拳擊手宣稱自己有印的就是看起來顯的理由。比離了婚，甚至

在海明威歷有關。當然海明威的生平

義大利的經歷簡直是罕見的厚顏無恥：最初說是自願參軍，因為視力不佳而未被錄用，但檔案中並沒有找到這些證據，根本不可能發生；實際上，他只是是一名非戰鬥人員，還是出於他自己的選擇。在許多場合，包括面對報紙採訪時，他說他在義大利第六十九步兵團服役，還參加過三次重大戰役，又宣稱自己屬於精銳的阿第堤團（Arditi）。他向在英國軍隊服役的朋友、外號「現金」的多爾曼——史密斯說，他是在格拉帕峰（Mount Grappa）指揮阿第堤團的時身負重傷的。他還告訴在西班牙內戰時結識的朋友杜蘭將軍，他第一次是指揮一個連，後來就指揮一個營，那時他僅十九歲。海明威確實受過傷——這點毫無疑問——不過在受傷的原因和真相上，他一直撒謊。他編造了陰囊被子彈射中的故事，而且還是兩次，為此他不得不讓自己的辜丸擱在墊子上。他還稱自己被機槍子彈擊倒兩次，被點四五口徑的子彈擊中三十二次。他說他還受了天主教的洗禮，因為護士們以為他快要死了。所有的這一切都是謊言。

戰爭揭穿了海明威的謊言。在西班牙，他非常妒忌馬修斯，因為身為通訊記者的馬修斯才能比他更為出色。海明威在一封寫給家人的信中，編造了一套關於他在特魯埃爾（Teruel）前線的謊話：「頭一個將戰鬥報導發到紐約，比馬修斯還早了十個小時。回來後，與步兵一起投入了總攻擊，跟隨一個爆破連和二個步兵團進城，發了這條消息。返回後，要將最精彩的逐戶爭奪戰的戰況整理好，用電報發出去……。」至於說一九四四年他是第一個進入解放了的巴黎，也是謊話。在性愛方面，海明威依舊說謊，比如在他那些義大利傳聞中，有一則最常被人反覆提起：據說有位來自西西里的飯店老闆娘把海明威的衣服藏了起來，因此被迫與她私通了一星期之久。他告訴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譯註：美國藝術批評家，他收了許多這類虛假的信件）在《太陽依舊上升》寫完後，與一位女子上了床，妻子突然返回，於是他被迫將那個女人從屋頂偷偷地送出去。這裡面沒有一句實話。一九二五年在潘普洛納（Pamplona），海明威與情敵發生了一場聞名的爭鬥，他的情敵是「猶太佬洛布」，海明威自這件事上又說了假話，他說洛布拿著槍，威脅著要殺他（這一情節在《太陽依舊上升》中被改頭換面）。海明威在結婚、離婚和解決辦法的問題上都撒過謊，不僅僅是對相關的女人，也對自己的母親撒謊。他對第二位妻子瑪莎所說的謊言到了厚顏無恥的地步，瑪莎駁斥他是「自閔希豪生（Munchausen，譯註：德國鄉紳，擅講誇張的故事）以來最大的說謊家」。與其他某些身兼小說家的說謊家一樣，海明威也留下了做假的痕跡：在他那些最著名的短篇小說中，有幾篇內容看來大部分似乎帶有自傳的性質，但很可能純屬虛構。關於海明威，人們所能說的一切就是他對真實並不尊重。

西班牙內戰

接下來，海明威很自然地進入「低沉的、不誠實的十年」——一九三〇年代。他從來就沒有前後一致的政治信念，他的道德觀念實際上只關係到個人的忠誠。帕索斯曾一度是海明威的朋友，他評價年輕時的海明威是「在我接觸過的人中，以最精明的頭腦，提出赤裸裸的政治要求的」，但我們很難對這個論斷找到很多證據。在一九三二年的選舉中，海明威支持社會主義者德布茲（Eugene

Debs)，但到了一九三五年，在多數問題上，他又成了共產黨陣線的擁護者。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的共產黨雜誌《新群眾》，刊登了海明威一篇措詞激烈的文章〈誰殺害了退休者？〉。在一場席捲佛羅里達的颶風中，有四百五十名受僱於聯邦政府工程項目的退休鐵路工人喪生，海明威譴責政府應該負起責任——這是共產黨具有代表性的宣傳鼓動實驗。在海明威看來，整個十年中似乎只有共產黨才是反法西斯運動唯一合法且值得信任的指導者，如果對共產黨進行批評，或是參加共產黨以外的各種活動，都是背信棄義的行為。他說，如果誰反共產黨的陣線，那他「不是傻瓜，就是無賴」。他絕不允許自己的名字登載在由《紳士》雜誌所辦的新左翼刊物《視野》的刊頭，因為他發現該雜誌並不是共產黨的宣傳工具。

這種態度也制約著他對西班牙內戰的反應。出於職業的考慮，海明威樂於戰爭為他提供了素材——「西班牙內戰對於作家來說是最好的戰爭，也是最完備的。」海明威的道德準則為西班牙共和主義者之間的衝突、傳統權力及正義的不同概念預先進行了精心的準備。奇怪的是，由於這一準則，他自始至終接受了共產黨對於戰爭的全部混亂的方針。他曾四次親赴前線採訪（一九三七年的春季、秋季和一九三八年的春季、秋季），其實在他離開紐約之前，海明威已經對這場戰爭做了結論。此外，他還與帕索斯、麥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赫爾曼（Lillian Hellman）等人合拍一部宣傳影片《戰火中的西班牙》。海明威曾寫道：「我永遠同情那些被剝削的勞動人民去反對不在領地上的地主，即使我與這些地主一同飲酒、一同射鴿子。」而共產黨就是「這些國家人民的代表」，這場戰爭就是「人民」和「不在領地上的地主、摩爾人、義大利人和德國人」之間的鬥爭。海明威表

示他喜歡並尊重西班牙共產黨，他們是戰爭中「最好的人」。

爲了與西班牙共產黨的政策保持一致，海明威的做法是降低蘇聯的作用，特別是他們指導西班牙共產黨在國內製造的血腥殘暴行爲，造成了海明威與帕索斯之間很不體面的決裂。帕索斯有位名叫羅布萊斯（Jose Robles）的翻譯員，曾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講師。當戰爭爆發時，羅布萊斯加入共和國軍隊，也是無政府主義組織 P O U M 的領導人尼恩（Andres Nin）的朋友，做過蘇聯駐西班牙軍事代表團團長貝爾津（Jan Antonovic Berzin）將軍的翻譯，因此他了解不少莫斯科與馬德里國防部關係的內幕。貝爾津已經被史達林暗殺，後來史達林又命令西班牙共產黨清除 P O U M。尼恩被折磨致死，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則被指控爲法西斯分子而被捕處死，羅布萊斯被指控爲間諜，然後遭秘密槍殺，帕索斯爲羅布萊斯的失蹤而憂心忡忡。海明威認爲自己在政治事務方面是極其老練的，在他看來，帕索斯是個天真的新手，所以他對帕索斯的擔憂嗤之以鼻。海明威正住在馬德里的蓋洛德飯店，那是共產黨頭頭常去的地方。他曾向老友金塔尼利亞（後來證實，大部分共產黨人的處決由此人負責）詢問實情，得到保證：羅布萊斯仍活著，而且活得很好，只是已被捕，但肯定會得到公正的審判。海明威對此深信不疑，並告訴了帕索斯。事實上，羅布萊斯此時已被處死。當海明威知道他的死訊時已經很晚了，而這一個消息的來源卻是一個剛到馬德里不久的新聞記者。海明威告訴帕索斯，羅布萊斯顯然是罪有應得，帕索斯對羅布萊斯之死感到非常悲痛，拒絕接受羅布萊斯有罪的說法，並爲此公開抨擊共產黨人。帕索斯的行爲招致了海明威的斥責：「正在西班牙進行著的戰爭，一方是你曾經支持過的人民，另一方則是法西斯分子。如果你懷著對共產主義者的仇恨，

自以為有理由去攻擊正在戰鬥的人民，如果你這麼做是爲了金錢，那麼我認爲你至少應該把事實真相弄清楚。」然而事實證明，帕索斯是正確的：海明威自己才是天真幼稚的人，一個頭腦簡單而且易受愚弄的人。

直到戰爭結束，以至往後一段時間裡，海明威依然故我。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他到紐約卡內基大廳參加第二屆作家代表大會，這場會議是美國共產黨透過一個外圍組織舉辦的。在會議上的發言中，海明威爲共產黨人所做的工作達到了頂點，他的觀點是，作家必須同法西斯主義戰鬥，因爲法西斯主義是唯一不讓作家說出真話的政權。知識分子有義務到西班牙做點事——他們應該停止坐在椅子上辯論，而應該開始戰鬥：「現在就有戰爭，而且會延續很長一段時間，任何一個要研究戰爭的作家，都應該去參加。」

海明威實在是一個容易受騙的人，但他也有意識地說謊，可從他關於西班牙戰爭的小說《戰地鐘聲》中清楚地看出來，他意識到共和國事業的陰暗面，而且很可能知道西班牙共產黨的某些真相。不過直到一九四〇年，這部作品才面世，而此時一切都已經結束了。只要西班牙內戰繼續著，海明威就會與那些企圖查禁歐威爾的《向加泰隆尼亞致敬》的人站在同一條戰線上，讓真理服從政治、軍事的利益。因此，海明威在作家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完全是一派謊言。

還有一點也很奇怪，並沒有跡象顯示海明威曾「研究戰爭」。一九四一年美國正式加入了反納粹的戰爭，可是海明威沒有參加。此時，海明威爲自己在古巴哈瓦那郊外安了一個家：「瞭望田莊」(Finca Vigia)，是海明威此後大半時間的主要居住地。《戰地鐘聲》獲得了成功，成爲本世紀最暢

銷的書之一，也爲他帶來了巨額收入，而他也想享受一番，顯然，這時他最喜愛的運動是深海捕魚，但卻導致了他一生中另一段不光彩的插曲，也就是所謂「鉤子工廠」(The Crook Factory)。

可笑の間諜鬧劇

海明威特別喜歡在城市下層社會中交朋友，尤其是在西班牙語的國家。他樂意與那些可疑的人物來往，包括鬥牛士、海邊咖啡館裡的吸毒者、皮條客、妓女、業餘捕魚人、警方線民等諸如此類的人，這些人對於海明威所提供的免費酒水和小費都給予熱情的回應。一九四二年，在戰時的哈瓦那，海明威認爲那兒即將有被法西斯分子接管的危險，這種擔心困擾著他。他說，古巴有三十萬西班牙出生的居民，其中一萬五千到三萬人是「狂熱的長槍黨」。他們可能會在美國的家門口發起武裝暴動，將古巴變成納粹的前哨基地，海明威還以非常肯定的口氣說，德國的潛水艇正在古巴的水域內游弋，甚至還做了仔細的計算：由一千艘潛艇組成的艦隊可以讓三萬人的納粹精銳部隊在古巴登陸，以援助國內的叛亂者。很難說海明威自己是否真的相信這種充滿想像力的念頭：縱觀他的一生，海明威是一個混合體，表面上看，他老於世故，而實際上，他幾乎都會陷入輕信的深淵。他可能受到了蔡爾德斯(Erskine Childers)の間諜小說《沙灘之謎》的影響。海明威真的讓美國大使布雷登相信了他的話，認爲應當採取一些措施，這位大使是海明威的酒友，也是他的運動伙伴。

按照海明威的計畫，他要從那些忠於共和政府的下層朋友中招募並指揮一批人，以成立一個特

務組織監視法西斯嫌疑分子，與此同時，他還可以利用他的深海摩托艇加以適當的武裝，巡邏可能有德國潛艇出沒的區域，以便將其中的一艘引出水面。布雷登批准了這項計畫，後來還加以表揚，結果海明威每月可獲得一千美元，用以支付六個專職特務和二十個密探——這些人是他從那幫咖啡館裡的朋友中選來的。更爲重要的是，一度他還獲得了緊急軍需，每個月可得到一百二十二加侖的汽油，開動他那艘摩托艇，艇上還配備了重型機槍，滿載手榴彈。

海明威把他的摩托艇稱爲「鉤子工廠」，提高了他在哈瓦那酒徒中的威望，但是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有所謂的法西斯間諜。海明威犯了低級錯誤，爲了取得激動人心的情報，他花費了太多的錢。聯邦調查局向華盛頓報告說，海明威黨羽所提供的一切都是「一個喜歡聳人聽聞的人所做的模糊無根據的報告……他所提供的資料皆毫無價值。」海明威也意識到了聯邦調查局的敵意，於是反駁說，所有的間諜都是愛爾蘭血統的羅馬天主教徒、佛朗哥的擁護者和「逃避兵役者」。海明威鬧出了不少可笑的事，但絕不可能有什麼間諜故事，比如，海明威的特務報告說，在巴斯克人酒吧發現了一個「十分可疑的包裹」，結果裡面是一本很便宜的《聖女大德蘭傳》。至於反德國潛艇的巡邏艇，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海明威需要汽油打漁。據一位目擊者說：「他們啥事都不幹，整天四處遊盪，尋歡作樂。」海明威爲此還與人激烈爭吵。

在西班牙，海明威最欽佩的人之一是杜蘭將軍，《戰地鐘聲》中的英雄喬丹就是以這位將軍爲原型的。杜蘭的一切就是海明威想要得到的——從知識分子成爲戰略大師。杜蘭曾是音樂家，和法利雅（De Falla，譯註：西班牙作曲家）、塞戈維亞（Segovia，譯註：西班牙吉他演奏家）都是朋友，

是戰前西班牙知識精英中的一員。杜蘭的觀點正是海明威贊同的：「現代戰爭」需要「智力」，「這正是知識分子的一項工作……戰爭也是詩，悲劇的詩。」一九三四年，杜蘭在西班牙軍隊中擔任後備役，當內戰剛剛開始，他就被徵召入伍，並且很快成爲著名的將領，最後由他統率第二十軍團。共和國垮台後，杜蘭志願加入英美軍隊，但沒有成功。當海明威想出關於「鉤子工廠」的計畫時，他利用自己的影響使杜蘭從屬於美國大使館，並負責這項計畫。此時，這位將軍與他的英國妻子波蒂都是海明威瞭望田莊中的座上客。不過，杜蘭很快就發覺整個計畫是一齣鬧劇，他是在浪費時間，於是他申請其他工作，正好這時波蒂與海明威當時的妻子瑪莎之間發生了糾紛，終於在大使館的一次午宴上爆發。從那以後，海明威就再沒有與杜蘭說過話，只是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兩人偶然碰面，海明威對他譏諷說：「你成功地躲開了戰爭，不是嗎？」這正是海明威典型的口吻，他和過去的朋友爭論時常常用這種語氣。

人可以在原則上和小說中頌揚友誼的美德，但他卻會奇怪地發現，要保持長久的友誼又是多麼困難。這對許多知識分子來說是一樣的——比如盧梭和易卜生——海明威與同時代作家的爭吵尤其激烈。甚至以作家的標準看，海明威的妒忌心也是超乎尋常的，他妒忌別人的才能和獲得的成功。到一九三七年，他已經與他所認識的每一個作家發生過爭吵。只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這個例外也使他獲益匪淺。在他的自傳中，唯一沒有受到指責的作家就是龐德，而且從頭至尾海明威都是用讚賞的筆調寫他。從他們初次相識開始，海明威就欽佩龐德對其他作家無私的慷慨。他從龐德那兒聽到一些尖刻的批評（如果出自其他人之口，他是不會接受的），其中包括一九二六年時，龐德認爲

海明威應當認真地考慮寫一部長篇小說，而不是又出版一本短篇小說集，他表達的方式很獨特：「你以為你是誰？還是個青春少年嗎？」海明威似乎羨慕龐德身上沒有同行相忌的美德，顯然他知道這是自己所缺乏的。一九四五年龐德因叛國罪危在旦夕，原因是他在戰爭期間為軸心國做了三百多次廣播，海明威這時成功地挽救了他的性命。兩年前，當龐德被正式起訴時，海明威就為他辯護道：「他很明顯是瘋了。只要翻看他最近寫的詩，我想，你就可以證實他是瘋了……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他對其他藝術家是多麼慷慨大方和寬厚無私，他是活著的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應該歸功於海明威宣稱龐德已經精神錯亂的辯護，才使龐德後來被囚禁於醫院，從毒氣室中檢回一條命。

海明威也避免和喬伊斯發生爭執，也許是因為沒有機會，或者是因為海明威欣賞他的作品，海明威曾稱喬伊斯為：「我一直尊敬且仍健在的唯一作家。」除以上這些人之外，接下來的就是令人遺憾的故事了。海明威與福特·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史坦因、伊斯特曼（Max Eastman）、帕克·洛布（Harold Loeb）、麥克利什等人都爭吵過。他在文壇上的爭論有惡意中傷的傾向，就像他說謊的癖好一樣，他那些最惡劣的謊言都關係到其他作家。在自傳中，人們看到的他對溫德姆·劉易斯荒謬的描寫（比如「劉易斯從不露出他的邪惡；只要看他就令人作嘔……那雙眼睛就像強姦未遂犯」）。很明顯，海明威是在報復劉易斯曾經對他做過的批評。

在同一本自傳中，海明威還編了一連串關於菲茨傑拉德（Scott Fitzgerald）與其妻子澤爾達的謊言。澤爾達曾刺傷過海明威的自尊心，但菲茨傑拉德一直讚賞喜愛海明威，從來沒有傷害過他，所以很難理解海明威為什麼要一次又一次地攻擊他脆弱而又受傷的心靈，除非是因為嫉妒心作祟。

照海明威所說，菲茨傑拉德曾告訴過他：「你知道，除了澤爾達，我從沒有和任何人睡過覺……澤爾達說我天生就無法讓女人感到快樂，這也是使她不滿的原因。」然後夫妻二人到男性診所求診，菲茨傑拉德掏出他的陽具接受了一番檢查。海明威一再寬厚地安慰他：「你是完全正常的。」這段經歷就像是小說中的章節。

海明威與帕索斯的爭吵最是惡毒，他們的友誼甚長，因而更令人痛心。顯然，嫉妒是初因——一九三六年帕索斯成爲《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海明威只得等到來年）。然後在西班牙就發生了羅布萊斯的事情，接著在紐約就與帕索斯及其妻子凱蒂（一位更老的朋友）大吵了一架。他說帕索斯是流浪乞丐，借錢不還，而他的妻子有盜竊癖。海明威還常常嘲笑帕索斯的葡萄牙血統，猜他是私生子。海明威想把這些誹謗寫入他的小說《猶有似無》（一九三七），但出版商根據法律顧問的意見將這部分內容刪除了。一九四七年，海明威告訴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帕索斯是「可怕的勢利小人（因爲他是私生子）」。爲了報復，帕索斯在《選中的國家》中把海明威描繪成令人討厭的華納，這又使海明威告訴帕索斯的小舅子史密斯，帕索斯在古巴養了「一群凶猛的狗和貓，被訓練攻擊那些說朋友謊話的葡萄牙私生子」。在《流動的饗宴》中，海明威向帕索斯射出了最後一袋箭——他如凶殘的黑帶鱈，讓如鯊魚的傑拉爾德·墨菲成爲獵物，還成功地毀掉了海明威的第一次婚姻。海明威對帕索斯的最後一項論斷不是事實，因爲對海明威來說，要毀掉自己的婚姻根本就不需要幫手。

下一個女人

海明威的小說在描寫女人方面有卓越的領會，他和吉卜林同樣有種天賦，能不斷改變自己慣用的男性手法，對女性的觀點做出出乎預料而又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海明威對女性的思考細膩，甚至有點異性裝扮癖或異性轉化癖的色彩，顯然來自海明威對頭髮的迷戀，尤其是女子的短髮，他之所以如此，歸因於他母親長期不讓他穿男孩的衣服或修剪頭髮。不論如何，很長的一段時間，海明威發覺自己很難與女子形成何種文明的關係，他們的關係只能以女性對他的完全服從為基礎。在自家中，海明威唯一喜歡的女性就是他的妹妹尤蘇拉，海明威稱她「我可愛的妹妹尤拉」，因為尤蘇拉崇拜他。一九五〇年海明威曾告訴朋友，當他一九一九年從戰場回來時，尤蘇拉十七歲，她「總是睡在通往我房間的三樓樓梯上等我。她想在我進屋時能夠醒來，因為她聽說男人獨自飲酒是件很糟的事，她會陪我喝一點清淡的東西，直到我去睡覺，她會陪著我睡，這樣我在夜裡就不會感到孤獨。我們睡覺總是讓燈開著，除非她看到我睡著了才會關燈，而她自己一直都醒著，如果看到我要醒了，她就會把燈打開」。

這可能是海明威杜撰的，從中可反映出他理想的女人形象。但是，不管真假，海明威並不想在現實的、成人的世界中找到這種柔順。事實上，按照二十世紀美國人的標準，海明威的四個妻子中有三個對他都是少見的千依百順，但對他而言還不夠，他需要多彩多姿、戲劇性的生活。他的第一

任妻子哈德莉比海明威大八歲，家境相當富裕，在海明威的書暢銷以前，便倚靠她的錢生活。哈德莉很討人喜歡，樂於助人，也很嫵媚動人，但當她懷了海明威的第一個孩子傑克時就開始發胖，此後體重就沒減下來過。海明威會當著她的面肆無忌憚地愛撫別的女人，比如名聲敗壞的特懷斯登夫人，在《太陽依舊上升》中，她化身為跟蒙巴納斯調情的阿什莉，這也是海明威與洛布發生爭執的根源。哈德莉將這個羞辱強忍了下來，後來又容忍了海明威與寶琳娜之間的關係。寶琳娜非常性感苗條，比哈德莉還富裕，父親是阿肯色州最大的地主和穀商之一。寶琳娜深深迷戀海明威，實際上是她勾引了海明威，她與海明威勸說哈德莉同意建立一種「二人家庭」，哈德莉在一九二六年無奈地寫道：「三個早餐盤子、三件晾在繩子上的浴衣、三輛自行車。」當這種方式再也不能令他們滿意時，他們就將哈德莉擠走，先分居，然後就是離婚。哈德莉接受了現實，她在寫給海明威的信中說：「原先你比我想的要好，其實比我想的更壞（就是這個意思）。」由於哈德莉的寬容，問題得以解決。喜出望外的海明威寫了一封信恭維她：「也許對於傑克來說，有妳這個母親是件最幸運的事……我是那麼佩服妳正直的思想、頭腦和心，還有那可愛的雙手。我將永遠向上帝祈禱，希望他能補償我給妳帶來的巨大傷害。妳是我所知道的最好、最真實、最可愛的人。」

這封信中有一點點真心實意的成分，因為海明威的確認為哈德莉表現得很得體，於是他在迎娶寶琳娜的前夕就開始創造聖潔的哈德莉傳說。寶琳娜注意到哈德莉對離婚事務的處理毫不精明，就決心不讓海明威下一次還那麼幸運了。靠寶琳娜的錢他們的生活更加寬裕，她還在佛羅里達的威斯特島（Key West）買下了一處良宅並裝修換新，海明威在此逐漸喜歡上了深海捕魚。寶琳娜為海明

威生了一個兒子叫巴特里克，但是當一九三一年她又懷孕（格雷戈里）時，他們的婚姻開始走向破裂，海明威這時的興趣轉向哈瓦那，與一位金髮碧眼皮膚白皙的女子梅森交往密切，梅森的丈夫是泛美航空公司駐古巴的首腦人物，比海明威年輕十四歲。梅森苗條、漂亮、擅喝酒，還是一等的女運動員，喜歡與海明威那些酒吧朋友廝混，瘋狂的開著跑車高速奔馳。在許多方面，梅森就是海明威理想的女英雄，但她也是抑鬱症患者，無法處理生活中各種複雜的問題。她曾試圖自殺，最終把背摔壞，海明威至此也就對她失去興趣了。

與此同時，爲了奪回自己的丈夫，寶琳娜孤注一擲，寫信給海明威說，她父親剛給了她一大筆錢——難道他就不想分杯羹嗎？「這是一筆數目龐大的不義之財……只是你要讓我知道，你沒有和別的女人搞在一起。愛你的寶琳娜。」她還爲他在威斯特修建了一個游泳池，並寫信對他說：「我希望你現在正睡在我的床上，用我的浴室，喝我的威士忌……親愛的孩子爸爸，請盡快回到家裡來吧！」寶琳娜找了一名整形外科醫生，「我會把我過大的鼻子、不整齊的嘴唇、過長的耳朵修整好，再把臉上的疣子和黑痣去掉，然後就去古巴。」她還把黑髮染成了金色，結果卻更糟，她的古巴之行並沒有成行，海明威用她的名字爲自己的船命名，但並沒有帶她出遊。在《猶有似無》中，海明威便曾發出警告：「妳對男人越好、越向他表示愛意，他就會越快擺脫妳。」他自己正是如此。再者，他還是這樣的男人：當他內疚時，會將責任推給別人。如今，海明威認爲寶琳娜應對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負責，因此無論她碰到什麼樣的事都是她應得的。

下一個女人是瑪莎，一位感情熾熱、頭腦敏捷的記者兼作家，曾在布林茅爾學院（Bryn Mawr）

唸書（跟哈德利一樣）。與海明威的大多數女人一樣，她出身於美國中西部中上層階級，身材高挑、雙腿修長、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比海明威小近十歲。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海明威在威斯特的酒吧與她初次相遇，第二年便邀她同赴西班牙，這一次經歷讓瑪莎大開眼界，海明威不僅用謊言迎接她：「我知道妳會到這兒來的，女兒，因為我早已為妳做好了安排。」——她知道這全是假話；還堅持從外面把她的房門鎖上，「這樣就沒有男人打擾她了」。她發現海明威在飯店的房間又髒又亂，後來她寫道：「海明威簡直髒到了極點……在我認識的人當中，他是最不講究的男人之一。」海明威從他父親那裡繼承了對洋蔥三明治的喜愛，在西班牙的時候，他喜歡大啖當地某種三明治，還不時從褲子後口袋掏出威士忌痛飲，令人印象深刻。瑪莎容易嘔吐，看起來未必與海明威有過肉體關係，她一直拒絕和海明威生孩子，後來卻領養了一個（「當你能買到孩子，就沒有必要自己生，這就是我所做的」）。瑪莎嫁給海明威主要是因為海明威是個名作家，她自己也期待成爲一名作家，她希望海明威的文學魅力能分她一點。可是，寶琳娜爲了保住自己的丈夫還在苦苦爭取，她沒忘記哈德利輕易就離了婚的往事，於是堅持強硬條件，以致離婚延宕。這時，儘管海明威已開始責怪瑪莎破壞他的婚姻，但是朋友們可以作證，在這之前，他們就已在公開場合激烈爭吵。

瑪莎無疑是海明威的妻子中最聰明也最堅定的一個，他們的婚姻再也不可能維持下去了。舉例來說，瑪莎強烈反對海明威喝酒，喝酒使他變得很粗暴。一九四二年末，海明威在宴會上喝了酒，瑪莎堅持自己開車回家，結果路上他們就大吵了一架，海明威還用手背打她，瑪莎放慢了他那輛昂貴的林肯車的速度，然後筆直地撞上一棵樹，將海明威丟在車裡走開了。瑪莎還非常厭惡海明威的

邇邇：他在古巴豢養了一群凶猛的雄貓，這些貓會製造可怕的氣味，海明威還讓牠們在餐桌上四處亂竄，一九四三年瑪莎趁海明威外出，將這群貓統統閹割了，海明威後來滿腹怨言：「她割了我的貓！」此外，瑪莎還糾正他的法語發音，質疑他對法國酒的評鑒，嘲笑他的「鉤子工廠」，直言他應該更靠近歐洲戰火。海明威最後決定去了，他狡猾地在《柯里爾》雜誌獲得了一項任務，此事觸怒了瑪莎，因為這家雜誌過去僱用她，現在卻把她解僱了。一九四四年，瑪莎隨後來到倫敦找到海明威，此時海明威住在多徹斯特，一如往常那樣邇邇，在他床下，空威士忌酒瓶滾來滾去。

從這以後，他們的關係一路下滑。回到古巴後，海明威常在半夜酒醉後上床時把她弄醒：「我正要睡覺時，他卻把我弄醒。他嚇唬我，朝我大聲叫嚷，嘲笑我。——我的罪過其實就是我參加了戰爭而他卻沒有，但他卻不這麼說。他認為我發瘋了，只想追求刺激和危險，對誰都不負責任，自私的程度超乎想像。他就是這樣沒完沒了，那些事真的很殘忍，很醜惡。」他還揚言：「我要弄一些願意待在我身邊的人來，讓我成為家庭作家。」海明威寫了一首淫穢下流的詩，名為《致瑪莎的陰道》，以陳舊的熱水袋頸部比喻，還出現皺紋呢。無論哪個女人與他上床，他都會唸這首詩給她聽。瑪莎抱怨道，他變得「精神一年比一年更錯亂」，她「同一個奴隸主般的畜生過著奴隸的生活」，終於她出走了。他的兒子格雷戈里說：「他就是在虐待瑪莎，當他終於把她對他所有的愛都摧毀時，便離他而去，但他卻聲稱是她遺棄了他。」一九四四年年底，他們分手了，按照古巴法律，由於是瑪莎先離棄的，海明威獲得了她在那裡的所有財產。海明威說他與瑪莎的婚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錯誤」，他在寫給貝倫森的長信中列舉了她的罪狀，指控她通姦（稱她為「兔子」），還說她從沒有見

過死人，但是對暴行的描寫卻使她成爲自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以來，靠此賺錢最多的女人——她寫的全是假的。

迷戀、調情、愛撫

海明威的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婚姻一直維持到他去世，能如此是因爲他的女主角瑪麗已經下定決心，無論如何都會堅持下去。與海明威的前幾任妻子不同，瑪麗來自另一階級，是明尼蘇達州伐木工的女兒，她對所要嫁的人並沒有抱任何幻想。就在他倆交往的初期，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巴黎麗緻飯店，海明威喝醉酒，偶然看到她擔任澳洲記者的丈夫蒙克斯的照片，一氣之下將照片丟進盥洗室，拿起半自動步槍對著照片開火，碎片四飛，然後又用水沖洗。瑪麗是《時代》雜誌的記者，不像瑪莎那樣野心勃勃自命不凡，她工作勤懇、聰明伶俐。她意識到海明威需要的是女僕般的妻子而非競爭對手，便放棄了自己的新聞工作，嫁給了海明威，但她仍不得不忍受譏諷，諸如「我可從來沒有爲了給《時代》雜誌寫篇故事而去和那些將軍亂搞」。海明威稱呼瑪麗爲「爸爸口袋裡的維納斯」，還會誇耀他與她做愛的次數。他告訴蘭漢姆將軍，冷落瑪麗一段時間之後，安撫她很容易，因爲「前一天晚上已經對她灌溉了四次」（海明威死後，蘭漢姆向瑪麗求證，她嘆息著說：「要是真的該多好！」）。

瑪麗是個意志堅定的女人，是當家人，她和托爾斯泰伯爵夫人頗有相似之處。當然，那時海明

威已和托爾斯泰一樣舉世聞名，是位具有男子氣概的先知、喜歡野外活動的預言家。他擁有以他名字命名的飲料、槍、非洲狩獵服和各種各樣的露營裝備。無論他去哪裡，在西班牙、非洲，尤其是在古巴，總有一群奉承他的老友和吃白食的人簇擁著他，有時簡直像是馬戲團，在哈瓦那則較靜態。這幫諂媚者跟托爾斯泰的一樣舉止古怪，但道德品質更低，不過同樣也都能盡忠職守。在離開海明威之前，瑪莎曾記下了被她稱爲「發生在古巴的一段非常可笑而又令人愉快的一幕」，「對著這些已經成年、富有、半文盲的射鵰、釣魚的朋友，大聲朗讀《戰地鐘聲》，他們坐在地板上聽得入了神。」然而，與雅斯納雅波良納莊園相比，海明威真實的生活狀況沒有什麼粉飾，更不用談什麼正派得體了，這還得感謝海明威那些聳人聽聞的習慣。海明威的朋友不少是百萬富翁，謝伍林是其中一位富翁的夫人，她在一九四七年曾留下關於這群古巴人的描繪：他那艘船一點也不舒適，又小又髒。在瞭望田莊，身上散發著惡臭的貓在遊盪，那裡沒有熱水。海明威身上混合了酒精和汗水的臭味，鬍子也沒修，他用古怪的洋涇濱英語叨唸著，還上了癮似地用「膽小鬼」這個詞。瑪麗有一大堆事要做。

在這裡，海明威常常故意出糗。他喜歡引起女人的注意，特別是那些有魅力、名氣、討人喜歡的女人，其中有：馬琳，海明威刮臉的時候，她在浴室爲他唱歌；勞倫（「妳比我想像的還要胖」）；南希（「親愛的，妳是那麼苗條漂亮」）。維吉尼亞是海明威在巴黎麗緻飯店圈子中的一員，瑪麗會嘲諷地寫道：「我從維吉尼亞的房裡出來已經有一個半小時了，可是海明威卻說：『我一會兒就回來。』」在馬德里有一群海明威所謂的「反戰妓女」，在哈瓦那碼頭區也有一批娼妓，海明威

喜歡當著瑪麗的面與她們調情，正如他曾經在哈德利憂慮的目光下與特懷斯登夫人愛撫一樣。隨著年齡增長，他需要的女孩卻越來越年輕。有一次，海明威告訴考利（Malcolm Cowley）：「我和每個我想做愛的女人都做過愛，還有許多不是我想要的，我也希望她們做愛時全都做得很好。」這不是實話，在第二次大戰後說這樣的話就更加不真實了。在威尼斯，他迷戀上一個叫阿里亞娜的年輕女孩，這位女子既令人畏懼又令人哀憐，海明威以她為原型塑造了那部很糟的戰後小說《過河入林》中的女主角。她冷漠、勢利、反應遲鈍，她的目的就是結婚。另外，她「始終有一個鷹鉤鼻的母親在照料」（這是海明威的兒子格雷戈里所說的）。海明威向肯定是文學史上幾個最令人討厭的人物中的一個大獻殷勤，因為阿德里亞娜有成為藝術家的野心，海明威便迫使出版商勉強採用她為《過河入林》和《老人與海》這兩本書設計的封套。後一本書在一定程度上為海明威恢復了聲望，並使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兩本書的封套後來都不得不重新設計。阿德里亞娜嘲笑瑪麗「沒有教養」，海明威則讚揚阿德里亞娜受過良好的教育、很有教養，並與瑪麗對比，說瑪麗不過是「隨軍雜役」和「清潔工」。

一九五三至五四年的冬天，在海明威最後一次大規模的非洲狩獵活動中，還發生了一段丟人現眼的插曲。即便按照海明威自己的標準也算是夠骯髒的了，他的帳篷裡衣服和空酒瓶凌亂不堪。海明威身著當地土著的服裝，像馬賽人般剃了頭，將衣服染成橘紅色，手握長矛。更有甚者，他追求當地一位名叫黛芭的瓦卡穆巴族女孩，這次狩獵活動的領隊形容她如同「散發著惡臭的營地垃圾」。這個女孩及其女友們和海明威在帳篷裡慶祝，還把他的帆布床壓塌了。據瑪麗的日記記載，「白天

或黑夜都不斷傳來沉悶的對話聲」。一九五九年海明威最後一次大規模出行西班牙，海明威「巡迴馬戲團」爲了一個夏季的鬥牛賽攜帶了八十到九十件行李。一位名叫瓦萊莉的都柏林建築工人的十九歲女兒，也是比利時新聞社的特約記者，對海明威進行了採訪。海明威傾心於她，甚至動過娶她的念頭，但是他也意識到以他的年紀，瑪麗更合適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後旅程，「一位送行人」。不過，他還是以每月二百五十美元的薪水僱用了瓦萊莉，讓她加入了他的「巡迴團」。在開車時，他讓瓦萊莉坐在前座方便毛手毛腳，瑪麗坐在後座強忍了下來，她知道瓦萊莉是無惡意的，而且還爲海明威感到慶幸，因爲她，海明威粗暴的脾氣少了。——確實如此，海明威死後，瓦萊莉仍被繼續僱用（她後來嫁給了格雷戈里）。但在當時，這種事使得這個夏季變得「令人討厭、醜惡和痛苦」。

瑪麗所承受的一切是否要比托爾斯泰伯爵夫人承受的更多？很可能沒有。海明威是一個喜歡待在家裡的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與托爾斯泰是不同的，海明威並不想離開家庭步入荒野。瑪麗學了西班牙語，將海明威的家管理得井井有條，參加了他大部分的戶外活動。海明威曾寫過關於她某個階段的「情況報告書」，列舉了瑪麗的種種優點：「出色的女釣魚手、不錯的飛靶射擊手、游泳健將、真正高超的廚師、品酒家、優秀的園藝家……還能用西班牙語管理好一條船或一棟房子。」瑪麗參加他的野外旅行時常常受傷，但海明威卻從沒有表示過同情。瑪麗有次受傷後十分痛苦，她記下了他們之間的一段很有意思的對話：「你就不能保持安靜嗎？」「我正在努力。」「士兵就不會像你這樣。」「我又不是士兵。」公開場合他們會大吵大鬧，私下則暴力相向。有一次，海明威把瑪麗的打字機扔在地上，打碎了珍愛的菸灰缸，把酒潑在她的臉上，還罵她是「母狗」。瑪麗回應

道，如果他打算把她甩掉，那她是不會離開這所屋子的：「儘管你竭力要把我從這兒趕走，你是不會成功的……無論你怎麼說、怎麼做，除非把我殺了，否則我仍會在此，替你管理房子和你的瞭望田莊。直到有一天早晨，你到我這兒來，頭腦清醒時，你誠實地、明白地告訴我，你想讓我離開。」如此建議海明威不得不慎重，他再也沒有提出。

海明威的孩子們通常對父親的婚姻緘默不語，有時目睹父母的婚姻生活感到憂心忡忡，當海明威一行巡迴於世界各地時，年幼的他們就被硬塞給保姆和僕人們。據說其中一個叫艾達的保姆是女同性戀者，海明威的長子勃姆比用偷來的酒賄賂她，巴特里克則詛咒她進地獄，最年幼的格雷戈里卻害怕她會離去。格雷戈里後來寫了一本關於父親的書，透露了許多內情，充滿怨恨。格雷戈里年輕時跟加利福尼亞警方發生了一些小麻煩，他的母親寶琳娜與海明威早已離婚，這時寶琳娜打電話給海明威，向他告知狀況，希望得到安慰和指導（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海明威的回答卻是指責——「看看妳是怎麼教育他的？」——他們大吵了一架，寶琳娜「禁不住對著電話大聲叫嚷和抽泣」。那天晚上，寶琳娜被體內一陣劇烈的疼痛驚醒，第二天就死在醫院的手術台上，享年五十六歲，死因是腎上腺腫瘤，很有可能是情緒上的緊張使病情惡化。海明威指責兒子的過失，而兒子則指責父親的脾氣。「讓母親心煩意亂的原因並不是我的那些小麻煩，而是她死前八小時與他之間那場粗暴的電話交談。」格雷戈里在他的書中寫道：「一個高高在上的人物，只要他身體健康，處於他的權勢之下也是一件好事，但當他的靈魂已從內部腐爛的時候，你告訴他他在發臭，那你會遭致什麼下場呢？」

永恆的威士忌

當然，事實上海明威並沒有因為內部腐爛的靈魂而招來什麼痛苦。他是酒徒，飲酒對他來說是件重要的事，已成為他生活和工作的中心，正如毒癮之於柯勒律治。海明威慢性酒精中毒的例子可列入課本當成教材，有可能是導因遺傳性的抑鬱症，酗酒反而更加重了他的病症。海明威曾告訴麥克利什說：「問題是，在我的一生中，每當事情非常不順，我就會喝上一杯，情況立刻就會變得好了。」海明威從十多歲就開始喝酒，鐵匠迪爾沃斯曾偷偷給他喝烈性的蘋果酒。他的母親注意到這個習慣，總是擔心他會變成酒鬼（有一種說法，海明威是從與格雷絲發生第一次劇烈的爭執後開始大量喝酒的）。在義大利，他進而喝葡萄酒。在米蘭的軍官俱樂部裡，他第一次飲烈性酒。他的負傷和不幸的戀愛都會使他越喝越多。在醫院裡，有人發現他的衣櫃裡塞滿了法國白蘭地的空酒瓶，這是一個不祥的徵兆。一九二〇年代在巴黎的時候，他從一家酒類合作社買來成加侖的葡萄酒，一次喝下五到六瓶。他教菲茨傑拉德直接就著酒瓶喝，他說，這感覺就好像「一個女孩子去游泳，但是沒有穿泳衣」。在紐約，他簽下《太陽依舊上升》的出版合約後，他說他「酩酊大醉好幾天」，這可能是他第一次長期酗酒。有些人如湯姆森（Virgil Thomson）就指責他很吝嗇，不願請別人喝酒；海明威反過來常常指責那些白吃白喝的熟人，正如一九五〇年代在古巴，他就指責過泰南（Ken Tynan）。

海明威尤其喜歡和女人喝酒，對他而言，她們似乎替代了他母親對他的認可。哈德利與他一起狂飲，並在給他的信中寫道：「你知道的，我仍然珍惜你對我說過的話：你幾乎崇拜作爲酒徒的我。」海明威三十多歲的時候，在哈瓦那他有一位漂亮的女伴梅森，扮演了與哈德利相似的不幸角色，海明威跟她一塊喝杜松子、香檳等各類酒；在古巴的十年裡，他的酗酒第一次失去了控制，一位酒吧侍者說他能夠「喝下馬丁尼酒的量超過我所見過的人」。在他朋友桑查茲的住處，海明威發起酒瘋，把自己的衣服扔出窗外，還打碎了一套貴重的玻璃器皿，桑查茲的妻子被嚇壞了，驚恐尖叫，請男管家把海明威鎖起來。遊獵時，有人看見海明威在清早五點鐘的時候從帳篷裡溜出來喝酒。他的兄弟萊斯特說，三〇年代末期在威斯特時，他一天喝十七杯威士忌加蘇打水，而且晚上常常帶著一瓶香檳上床。

這一時期，他的肝臟開始讓產生劇痛，醫生警告他必須戒酒，更確切地說，是把他的飲酒限制爲飯前的三杯威士忌，但並沒有維持很久。第二次大戰期間，他的酒量不斷增加。到了一九四〇年代中期，據說吃早餐時，他會把杜松子酒倒進茶裡一塊喝。一九四八年，霍奇勒代表《柯夢波丹》雜誌採訪海明威，他說海明威在短短的時間裡就喝了七杯雙倍量的「爸爸雙杯」（哈瓦那人以海明威命名的飲料，由蘭姆酒、葡萄汁和櫻桃酒混合而成）；當他離開酒吧去吃飯時，手裡又拿著第八杯酒準備開車時喝。海明威自稱：「我曾在這兒一晚上連喝十六杯。」他還向出版商吹噓，有個晚上他以苦艾酒開場，晚餐時喝了一瓶紅葡萄酒，接下來喝伏特加，此後「又痛飲威士忌和蘇打水直至凌晨三點」。在古巴時，他的餐前酒通常是以蘭姆酒爲基酒，在歐洲，他喝十五比一濃度的馬丁尼。

一九五〇年代早期，我曾親眼目睹他在很短的時間內一連乾了六杯這類酒，那是在蒙巴納斯大教堂外的露台上。他在早餐時喝的酒可能是杜松子酒、香檳酒、蘇格蘭威士忌或所謂「墨西哥灣海流中的死亡」——這是他的另一項發明，即一大杯荷蘭杜松子酒加橙汁。位居於所有飲料之上的，是永恆的威士忌：他的兒子巴特里克說，他父親在人生的最後二十年中，每天都要對付一夸脫威士忌。

海明威飲酒的能力是眾所周知的。莉蓮曾為《紐約客》寫過海明威的人物特寫，她似乎並沒有留意到他同她談話時有很長時間在醉酒。扎菲羅談及海明威的最後一次遊獵時說：「我猜想他任何時候都是醉醺醺的，但卻很少表現出醉態來。」海明威還顯示了一種非凡的能力，他能在短時間內削減自己的飲酒量，甚至徹底把酒戒掉。這一點再加上他那健壯的體格，使他能夠活得長久。不過，慢性酒精中毒對他的影響卻是無情的。海明威遭遇過無數次意外事故，飲酒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下過定義，知識分子（他自己）是「眼鏡在鼻子上，秋天在心中」的人。海明威心中確實有個秋天——經常是寒冬——但只要他一有勇氣，就會把眼鏡從鼻梁上摘下，儘管由於得自母親的遺傳，他的左眼視力不佳（出於虛榮，他母親也拒絕戴眼鏡）。

被自己的藝術殺死

海明威一生中容易出意外，這也許是他那龐大而又笨拙的體格造成的。若是把他遭遇過的事故列成表，會長得嚇人。孩童時期他就跌過一跤，一根木棍穿進口中刺破扁桃體；魚鉤還戳進過他的

後背；在足球賽和拳擊台上他受過若干次傷。一九一八年他經歷了槍林彈雨，又被一個玻璃櫃子弄破了拳頭。兩年後，他在碎玻璃上行走割傷了腳，還因為摔倒在船上繫繩子的鐵環上，以致內出血。他被熱水爐嚴重燙傷過（一九二二）；一條腿的韌帶被撕裂（一九二五）；那隻好眼睛的瞳孔被兒子戳傷（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春天，他第一次因為喝酒而發生重大意外，回到家後，把天窗上的繩索錯當成盥洗室裡的鏈子猛拽，結果整個沉重的玻璃框架砸到頭上，造成腦震盪，還縫了九針。他腹股溝的肌肉也曾撕傷過（一九二九）。食指被拳擊吊袋碰傷、騎馬脫韁而受傷、汽車車禍傷了胳膊（一九三〇）。一次喝醉後，他想把魚叉投向鯊魚，結果投向了自己的腿（一九三五）。他踢一扇鎖著的門時，大腳趾受了傷；鏡子曾劃破過他的腳；他那隻壞眼睛的瞳孔也受傷（一九三八）。

一九四四年他又腦震盪兩次，一次是在燈火管制的時候，車子撞上水箱；另一次是從摩托車上摔進水溝。一九四五年，他堅持要代替司機開車把瑪麗送到芝加哥機場，車子打滑，他們撞上土堤，海明威斷了三根肋骨，傷了一個膝蓋，前額也被撞出了凹痕（瑪麗飛出了擋風玻璃）。一九四九年，當他戲弄一頭獅子時，被獅爪嚴重抓傷。一九五〇年，他在自己的船上摔倒，頭部和腿部都被劃傷，割斷了一根動脈，還造成第五次腦震盪。一九五三年，他從汽車上摔下來扭傷了肩膀，這年冬天在非洲，海明威還經歷了一連串的意外：他有次醉醺醺地去林中滅火，結果被嚴重燒傷；還發生了兩次飛機事故，使他再一次腦震盪，顱骨裂開，兩節脊椎粉碎，嚴重的內傷，肝臟、脾和腎都被受傷，還加上燒傷，肩膀和胳膊脫臼，括約肌喪失活動能力。意外通常是發生在他喝醉酒以後，而且這些事故幾乎一直持續到他去世：一九五八年，他攀越柵欄時，又撕裂了韌帶、扭傷了足踝；

一九五九年又發生了一次車禍。

儘管海明威的體格健壯，酒精仍直接影響了他的健康，一九三〇年代末他的肝臟開始出了問題。一九四九年當他在科爾蒂納丹佩佐滑雪時，灰塵進入他的眼睛，加上酗酒，造成嚴重的丹毒，十年以後他仍然深受其苦，從他的鼻梁到嘴巴，總有一片青黑中夾著紅紋的疤痕。接下來，由於他在西班牙的最後一次狂飲（一九五九），腎和肝又都出了毛病，而且可能是血色素沉著症（表現為肝硬化、青銅色皮膚和糖尿病），其他病症還有足踝浮腫、肌肉痙攣、長期失眠、血尿、血脂過高，以及皮膚病。他身體虛弱，未老先衰，生前最後一張照片是他在愛達荷州購置的住宅附近散步，那種悲哀的表情不言自明。即便如此，他仍舊站著，仍舊活著；但他已經無法再思考。他父親是因為害怕患上致命的病症而自殺的，海明威所怕的卻是他所患的病症不是致命的：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在抑鬱症和偏執狂治療無效後，他在他那把最好的英式雙管獵槍中裝上了兩發霰彈，然後就將自己的腦蓋炸飛了。

爲什麼海明威會渴望死亡？在作家中，這一現象並不鮮見。與海明威同時代的英國作家沃（Evelyn Waugh），當時在英國所取得的地位與海明威相當，也同海明威一樣渴望死亡。不過，沃不是知識分子，他不認爲能通過自己的頭腦來改變生活的規則，而只能服從於傳統的教會教育，五年後他自然死亡。海明威則創造了自己的以榮譽、真實和忠誠爲基礎的準則，他背棄了這一準則，這一準則也背棄了他，也許更爲嚴重的是，他覺得背棄了自己的藝術。海明威有許多嚴重的過失，但有一樣東西是他從不缺乏的：藝術上的誠實，這如同燈塔照亮了他的一生。海明威爲自己確定的任

務是，創造新的英語寫作方法和小說寫作方法；他獲得了成功。在英語歷史上，這是重大的事，現在已是英語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爲這一任務傾注了巨大的、創造性的技巧、精力和耐心。這一任務本身就是困難的，但正如他所發現，更加困難的是維護他自己所確立的創作高標準。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對他來說，這一點已經很清楚，他習慣性的抑鬱症更重。從那時起，他的短篇小說很少成功而且每下愈況。如果海明威少一點藝術家氣質，這種事情對他來說也許不是十分重要的；他完全可以去寫次等的長篇小說，許多作家就是如此。但是，當他寫出來的東西不及他最好的作品時，他知道自己知識已經無法勝任了，這時他便在酒精中尋求幫助，甚至在工作時間裡也是這樣。

一九二〇年代，有人看見海明威寫作時面前放著一杯蘭姆酒，這種習慣最初是偶爾爲之，然後變得斷斷續續，最後就習以爲常了。據說在一九四〇年代，他在清晨四點三十分醒來，「通常立即開始飲酒，同時站著寫作，一隻手握著鉛筆，另一隻手則是酒杯。」這對他工作所產生的影響完全可以想像，是場災難。無論作者有多麼高的天分，有經驗的編輯總是能夠辨別出借助酒精寫出的作品。海明威開始製造大量素質不佳的作品，或是他感覺沒有達到他自己確立最低標準的作品。有些作品雖然發表了，但品質極低，甚至是在模仿自己早期的作品。也有一兩個例外，如名著《老人與海》，儘管其中也有自我模仿的成分。但是，整體品質一直下降，海明威自己也意識到已無力恢復他的天才。這一切加速了抑鬱症與酗酒的惡性循環。海明威是一個被自己的藝術殺死的人，而他的一生所留下的教訓，值得所有的知識分子借鑒：僅有藝術是不夠的。



7 布萊希特——刻意雕琢形象的冷血作家

我該天誅地滅

那些試圖影響人類思想的人早就認識到，戲劇是最佳的手段。一六〇一年二月七日，就在埃塞克斯伯爵及其部眾在倫敦發動叛亂的前一天，他們贊助莎士比亞所屬的劇團演出了一部特殊、未經刪改的莎劇《理查二世》，此劇被認為是對王權的顛覆。由耶穌會會士領導的反宗教改革運動，也把戲劇演出作為信仰宣傳的中心。第一批世俗知識分子同樣認識到舞台的重要性。伏爾泰和盧梭都寫過劇本——盧梭還警告說，戲劇有敗壞公共道德的危害性；雨果利用戲劇摧毀最後一代波旁王朝；拜倫投入大量精力創作詩劇；甚至馬克思也寫過一部劇作。但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易卜生第一次深思熟慮、有計畫地利用戲劇舞台引發社會觀念的變革，就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一八九八—一九五六）——一個在很多方面全然不同的劇作家——在這一點上卻是易卜生自然的繼任者。他創造了複雜的現代宣傳劇，成功地利用了政府所資助的大規模劇場——二十世紀新

的文化機構。在他死後的二十年內，即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他或許是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作家。

然而，布萊希特終其一生，在某種程度上，至今仍是一位神秘人物，這是他自己和他人生最後三十年忠誠效力的共產黨精心做出的抉擇。出於許多原因，他想要把所有公眾的注意力從他的生活轉移到他的作品上；共產黨的機構同樣不願讓人對他的出身、家庭背景或生活方式細加探究，因而他的傳記儘管脈絡十分清楚，其中卻留下了大量空白。他於一八九八年二月十日出生在距慕尼黑四十哩的奧格斯堡（Augsburg），一個沉悶卻美麗的小城。跟共產黨一再宣稱的相反，他並非出身農家，父母雙方的祖先可追溯到十六世紀，一直以來都是中產階級——鄉紳、醫生、教師，繼之是火車站站長和商人。他的母親是公務員之女，父親是做紙品生意的商人，弟弟瓦爾特加入這一行後，成爲達姆施塔特科技大學（Darmstadt Technical University）造紙工藝的教授。布萊希特有心臟病，看上去又很柔弱，成了母親最寵愛的孩子（和其他許多重要知識分子一樣）。她母親說，這孩子的種種要求強烈得令人無法拒絕。布萊希特成年後，對家庭卻毫無關照，很少提到父親，也沒有報答母親的寵愛。一九二〇年他母親去世時，他執意在第二天邀請一批朋友到家裡胡鬧（他的弟弟回憶道：「我們這些人都沉浸在悲痛中。」），而且故意在母親葬禮的前一天離開小城；儘管後來在一次次罕見的自責中，他批評了自己對母親的態度：「我該天誅地滅。」

傳說布萊希特在學校不僅拒絕接受宗教信仰，還公開焚燒《聖經》和《教義問答》，並差點因他的反戰立場被開除。實際上，他寫過愛國詩，他受罰並非因爲反戰態度，而是考試作弊。他屬於一九一四年以前彈著吉他的德國青年文化，思想特色是親近自然、反對城市生活。與他同時代的大多

數中產階級青年都應徵入伍，送往前線，死在那裡，生還者則成了納粹。布萊希特並無拒服兵役，而是因爲心臟虛弱才免於入伍，當了醫護人員（他曾在慕尼黑大學短暫習醫）。他後來描繪了在軍事醫院中看到的可怕屠宰場面：「如果醫生命令我：『截下一條腿，布萊希特！』我就回答：『是，閣下。』然後把那條腿割掉。如果有人對我說：『鋸開頭骨！』我就打開那人的顱骨，笨拙地修補他的腦部。我看見他們是怎樣匆匆縫好士兵的傷口，以便盡快把他們送回前線。」但事實上，直到一九一八年十月他才入伍，當時大部分戰事已告結束，他的工作主要同性病治療有關。他後來（在接受史達林和平獎的演說中）謊稱自己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立刻」支持巴伐利亞共產主義共和國，並成爲軍方代表。他對自己的行爲有各種說法，但他的所作所爲不論在當時或以後，顯然都不是英雄。

自我宣傳的天才

一九一九年以後，布萊希特很快確立了自己的文學形象：先是一位粗魯、野蠻、嚴酷而令人生畏的評論家，之後轉向戲劇，這得歸功於他在吉他和寫歌的技藝（自始至終，他的詩才能是最出色、最純粹的），還有他那不亞於一九六〇年代保羅·麥卡尼的高亢迷人嗓音的唱歌本領。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德國戲劇的基調是強烈的左傾，布萊希特從中得到了啓示，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是《斯巴達克斯》，後來改名爲《夜半鼓聲》（一九二二），該劇獲得了克萊斯特（Kleist）最佳青年劇作家

獎。這使得右派激進分子嘩然，但這時的布萊希特更大程度上是機會主義者而非理論家，他試圖引起人們的注意，並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他的目標是「讓資產階級吃一驚」，他譴責資本主義和一切中產階級體制，抨擊軍隊，讚美怯懦並身體力行。在著名的短篇小說〈反暴力的尺度〉中，他的自傳性主角庫納爾就是一個十足的懦夫。他的朋友本雅明指出，怯懦和純粹的破壞性是他顯著的特點。他喜歡讓自己的作品激起爭吵和反感，理想情況是引起一半觀眾不滿的噓聲和另一半觀眾積極的喝彩。傳統劇評細緻的審美分析引不起他的興趣，事實上他鄙視傳統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學院型或浪漫型知識分子。

布萊希特實際上塑造了一種新型的知識分子，如同盧梭或拜倫當年所做的一樣。布萊希特自己就是這種新型文化人的典型：粗暴、冷酷無情、玩世不恭；一半是流氓，一半是精力充沛的運動員。他想要把運動場上那種喧鬧、熱烈、對抗的氣氛帶到劇場裡。他和拜倫一樣樂於與職業拳擊手交往。一九二六年他應邀為詩賽評審時，置四百首參賽詩於不顧，把獎授予了他在某自行車雜誌上發現的一首粗陋詩作。他厭棄奧—德的音樂傳統，喜愛金屬般的復調，並在與他合作的猶太作曲家魏爾（Kurt Weill）那裡找到了類似的風格。可以說，他在某種程度上要把舞台布景連骨架都顯示出來，展現製造幻景的效果裝置，這就是他所謂的新型真實，就像那些製造和操作它們的工程師一樣，效果裝置令他著迷。他把自己視為操作者，一個精神的工程師。福伊希特萬格（Lion Feuchtwanger）的長篇小說《成功》中，有位叫普羅切爾的工程師，小說中另一個人物對這位工程師的評價是：「你缺少最重要的人類感官：對歡樂的感知和一顆愛心。」那正是對布萊希特的描

述。

布萊希特在一九二〇年代的種種表現和活動，都反映了他自我宣傳的天才。他和幾乎完全同時代的海明威——當然還有其他許多知識分子——一樣都擁有這種天賦，其表現之一就是像海明威那樣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穿著風格。海明威的服裝完全是美國式的，以運動服為主。布萊希特私底下仰慕海明威，但明顯可以看出，如果有人說他偷取了「爸爸」的思想，他會非常不安。在一九二〇年代——那是歐洲知識分子能夠接受親美情緒的最後一個時期——他並不隱瞞對美國的讚賞，特別是對美國的黑幫和運動明星，他爲一九二六年的登姆普西對壘滕尼的職業拳賽寫了一首詩。他部分的衣飾觀念來自大西洋彼岸，有些則得自歐洲。束腰皮革短上衣和便帽曾是「契卡」（Cheka）組織中暴力青年最喜愛的裝束，該組織是列寧於一九一八年初創立的，布萊希特加入了創意：一條皮領帶和布袖馬甲，他想讓自己看上去像學生又像工人，瀟灑不減。他的新款式引起了不同的評價，敵人嘲諷他在無產階級的皮裝下穿著真絲襯衫；作家楚克邁耶（Carl Zuckmayer）說他像「卡車司機和基督教神學院學生的混合品」。他別出心裁地把頭髮垂直梳下蓋住前額，鬍子永遠蓄留三天——不多也不少——這便完成了他的個人風格。這些作風在一九三〇、四〇甚至五〇年後，還被年輕的知識分子廣爲模仿。他們還效法他戴「樸素的」金屬架眼鏡的習慣，他的金屬眼鏡架是灰色的，這是他最喜歡的顏色，他也在灰色的吸水紙上寫東西，當他成名後就開始出版「正在創作的作品」（即所謂手稿），都是有意弄成灰暗的平裝戲劇腳本，就像學校的課本，這種非常有效的自我推銷形式後來也被人大力模仿，他爲汽車製造商撰寫廣告詞免費得到的斯特爾牌敞篷旅遊車也是灰色的。總之，布萊

希特有非凡的形象表演天分，在這方面一九二〇年代的德國人領導著世界：幾乎與此同時，希特勒正在設計納粹黨和黨衛軍的奢華設備，並發明了後來被稱爲「聲光表演」的夜間演出技術。

希特勒的得勢是把布萊希特推向更政治化的一個因素。一九二六年，布萊希特讀了《資本論》，或者讀了一部分，便倒向共產黨，不過根據德國共產黨領導人、他的一位作曲家朋友艾斯勒的妹妹露特的證詞，他直到一九三〇年才真正加入該黨。一九二六年因爲與魏爾合作，布萊希特開始顯得重要起來，一九二八年他們創作了《三分錢歌劇》，八月三十一日首演立刻引起轟動，從法國一直延燒到全世界，成了布萊希特操作方式的典型範例。此劇主題取自蓋伊（Gay）的《乞丐的歌劇》，整段文字直接剽竊了阿默爾斯（K. L. Ammers）翻譯的維永（François Villon）的作品（阿默爾斯提出抗議後分到了部分版稅）。該劇的成功大半歸功於魏爾寫了獨創性的動聽樂曲，但布萊希特卻想辦法將該劇長紅不衰的功勞據爲己有，在與魏爾爭吵時輕蔑地說：「我要把那個冒牌的史特勞斯踢到樓下去。」

布萊希特贏得讚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從事公關和把娛樂泛政治化的出色技巧。一九三〇年，獲得《三分錢歌劇》電影拍攝權的佩斯特反對布萊希特所寫的拍攝腳本，因爲他改變了情節，共產主義色彩鮮明。布萊希特拒絕將劇本恢復原貌，這場糾紛在十月份鬧上了法庭，他在鏡頭前表演了精心策劃的憤怒模樣，儘管案子肯定對他不利——佩斯特買下的是原作，但布萊希特榨取了巨額賠償作爲放棄訴訟的條件，不僅如此，他還擺出在殘酷的資本主義制度控制下，爲維護藝術家的良知而成殉道者的姿態。他出版了自己的腳本，在其導論中強調嚴格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公正、自由

和性格都取決於生產過程」。他具有一面宣揚自己對公眾的奉獻，一面增進個人利益的卓越本領。

布萊希特聲名日盛的第二個原因，就是一九三〇年他被共產黨當成明星接納，得到黨的強大體系支持所帶來的一切好處。布萊希特在史達林時代的莫斯科始終沒多大影響，即便是在藝術問題上態度靈活得多的德國共產黨，也認為他有些作品無足輕重和離經叛道——如《馬哈岡尼城的興衰》就引起爭執、衝突和納粹組織的示威。不過，布萊希特表現得充分服從共產黨的紀律，參加柏林工人大學所辦的馬列主義講座，而實際上他內心是個黑格爾派，喜愛辯證法的幻想世界——他的思想和馬克思一樣非常德國化——並發現其中智力的魅力。他第一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作品《方法》，寫於一九三〇年夏天；他改編高爾基的《母親》，在德國各地共產黨控制的禮堂內上演。他撰寫鼓動性的電影腳本，再次與魏爾（不過魏爾從不是個熱切的馬克思主義者）合作，發展了校園歌劇或教育劇的新政治藝術形式，其目的與其說是從政治上教育觀眾，不如說是要把觀眾變成與紐倫堡人無異的訓練有素的合唱團。演員們成爲純粹的政治工具和機器人而非藝術家，劇中人物沒有個性只是類型，表演著高度形式化的動作。這種形式化所具有的藝術優勢就在於出色的舞台表演，布萊希特無疑精於此道，其政治功能也十分明顯，這種戲劇存在了數十年。布萊希特爲達到宣傳鼓動目的首創了審判場景（審判巫婆、蘇格拉底、伽利略，以及馬克思被查禁的報紙等）的使用，這成了左翼的節目，在羅素的越南戰犯法庭（譯註：一九六〇年代後期，由羅素、沙特等人組織的國際戰犯審判法庭）上不時出現。事實上，布萊希特有很多舞台上的發明——使用白粉化妝、骷髏、棺材、載有巨型武器的彩車——還常被街頭劇和遊行示威採用。

布萊希特還有在公眾面前保持聲望的手段。他讓人拍下他在一群工人中寫詩的照片，以強調浪漫的政個人主義時代已經死亡，而詩則成爲無產階級的集體活動。他公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自我批評原則，把自己的校園劇《贊同者》帶到共產黨控制的卡爾·馬克思學校，請學生們提出批評，並根據他們的意見修改劇本（成名後，他又悄悄把劇本改了回去）。他不斷強調自己劇作中合作的成分，一旦作品失敗，他便立刻聲明自己的參與很有限。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使得這項一帆風順的事業突然中斷，布萊希特在發生國會縱火案的第二天早上就離開德國。三〇年代對他來說是一段艱難的歲月，他絕不希望成爲殉道者。他到維也納一試身手，卻不喜歡那種日益增長的泛日耳曼政治氣氛，便離開維也納去了丹麥。他斷然拒絕去西班牙參戰，他去過幾趟莫斯科，當了在俄國出版的《言論》雜誌的編委（還有福伊希特萬格和布雷德爾〔Willi Bredel〕），這份工作是他唯一的固定收入。但他正確地斷定俄國對他這樣的人是個危險的地方，每次在那兒逗留的時間都不超過幾天。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間，他所寫的主要是泛政治化的平庸作品。隨後，接近三〇年代末，他突然開始一部接一部創作出品質高得多的戲劇——《伽利略傳》、《盧卡拉斯的審判》、《四川好女人》和《大膽媽媽》。他決定進軍美國市場，寫了《阿圖羅·魏的判亂》，把希特勒描寫成一個芝加哥的匪徒。隨著一九三九年戰爭的來臨，他感到丹麥的危險處境，於是遷往瑞典，之後又到芬蘭，然後——拿到了美國的簽證——穿過俄國和太平洋來到加利福尼亞的好萊塢。

籌劃事業藍圖

布萊希特以前也到過美國，但沒能在左翼圈子外產生影響。他年輕時對美國理想化的、連環漫畫的憧憬迅速破滅，他對那裡的現實始終沒有好感，事實上他憎惡美國。他無法適應好萊塢的製片體制，對成功的移民非常嫉妒（洛勒〔Peter Lore〕除外），他寫的電影劇本不受歡迎，有些計畫完全失敗。一九四四到四五年，奧登（W. H. Auden）與他合作撰寫英文版的《高加索灰闌記》，並改編《馬菲公爵夫人》，但在最後關頭，爲了維持在倫敦上演時會引起意外轟動的原作，他們的改寫中止了，布萊希特在上面劃去了自己的名字。《伽俐略傳》雖有全明星查爾斯·洛頓的卡司，仍遭到慘敗。不管在好萊塢還是百老匯，他都沒有理解市場或下決心適應。他無法忍受劇院主管，甚至不願平等合作，他要擁有絕對的支配權。

由於自認他的戲劇只有在由他個人支配的理想條件下才可能取得成功，布萊希特準備做一次浮士德式的交易。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在「國會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面前的一次做證，加速了他的計畫。該委員會當時正調查共產主義者在好萊塢的顛覆活動，布萊希特和另外十九人一起作爲「敵對的證人」被傳喚出庭。其他人都已集體達成協議，拒絕回答共產黨員身分的問題，並因此被指控輕視審訊會；其中十人被判一年監禁。然而布萊希特可不打算在美國的監獄裡服役，當被問及黨員身分時，他斷然否認：「不、不、不、不、不，從來不是。」這場審訊有點像鬧劇，因爲擔任翻

譯、國會圖書館的鮑姆嘉特比布萊希特本人的口音更重，主席托馬斯惱怒地大吼：「譯員的話和證人的話一樣讓我聽不懂。」不管怎麼樣，委員會並沒有做好準備工作，布萊希特認知到這一點，撒謊撒得流利而誠懇。「你的很多作品是否都以列寧和馬克思的哲學為基礎？」「不，我認為他們的學說並不太正確。當然我曾研究過，作為一個寫歷史劇的作家，我不得不研究這些。」當被問及他為《共產黨歌曲集》所寫的歌時，他說那些都是誤譯。事實上他打算做一個歸順聲明，宣稱「我的活動……一直是具有嚴格獨立性的純粹文學活動」，只是沒得到機會宣讀。他的撒謊是那樣令人信服，那樣一絲不苟地糾正每個事實的錯誤，表現得那麼真誠而急切地想盡其所能幫助委員會，最後他被當成特別合作的證人而得到公開感謝。其餘被傳訊的作家都為他欺騙委員會的狡猾方式而高興，以致忽略了一個事實：他因同意回答問題而背叛了他們。因此他仍然是左派的英雄。安全回到歐洲後，他在新聞界面前擺出大無畏的姿態：「當他們指控我想偷走帝國大廈時，我想我必須離開了。」

布萊希特在瑞士安頓下來，在決定如何規劃今後的事業之前，開始著手對歐洲的情況進行仔細調查。他為自己設計了一套新制服：一身剪裁合宜的灰色「工作服」，加上一頂灰布帽。他透過共產黨的關係而有了很多消息靈通的熟人，很快發現了一個對他至關重要的消息。東德新興的蘇維埃傀儡政權正努力爭取政治上的承認，以及進一步獲得文化上的自尊，一直在準備吸納一位文學界要角以幫助它獲得合法性。布萊希特在文學和思想上正好具有符合東德政權要求的身分。一九四八年十月，布萊希特前往東柏林打探情況，參加了共產黨「文化協會」專門為他舉行的歡迎會，日後當上東德總統的皮克坐在他一邊，蘇維埃政治委員杜巴諾夫上校坐在他的另一邊。當請布萊希特致答謝

詞時，他使出特有的花招，既保留了自主權，又給人留下戲劇性豐富的謙遜印象。他只是與兩邊的人握了握手，然後就坐了下來。三個月後，一場盛大而得到高額資助的《大膽媽媽》在東柏林開幕演出，取得巨大成功，西歐各國的批評家都前來觀看。這終於使布萊希特確信，應該把東德作為他戲劇活動的基地。

然而，他的主要計畫更為複雜。他發現奧地利也在尋求戰後的合法地位。奧地利人曾是希特勒最狂熱的支持者之一，並管過很多納粹集中營（包括六個大死亡營中的四個）。出於戰略原因，同盟國發現把奧地利看做「被占領國家」——嚴格說來是作為「納粹侵略的受害者」而不是敵人——更加便利，於是一九四五年後，奧地利人獲得中立國身分，因此持有一張奧地利護照非常方便。與此同時，奧地利政府和東德政府一樣，急於透過強調他們在文化上的貢獻，以重返文明的中心，他們也把布萊希特當成一名有用的新成員。一樁交易就此達成了。布萊希特聲明他想要在「一個能夠提供合適氛圍的國家裡從事智力活動」。他還說：「我要強調一點，我認為自己只是個詩人，不願為任何明確的政治意識形態服務。我拒絕接受將我遣返德國的想法。」他堅稱自己與東柏林的連繫只是表面上的。「我在柏林沒有任何官方職務和聘約，也根本不拿薪水……我打算把薩爾茨堡作為永久居住地。」這些話大半是謊言，布萊希特並沒有定居薩爾茨堡的意圖。但他得到了奧地利的護照，不僅讓他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旅行，而且給了他比東德政府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自主權。

布萊希特精心設計的策略還有第三個要素。他與東德達成協議，政府為他提供一個有龐大財力支持並歸他所有的劇團和戲院，作為對他在藝術上支持現有政權的回報。他估計這樣的投資會為他

的戲劇挺進世界舞台提供助力。事實果然如此，他的作品版權因此極為昂貴，而他打算讓東德從中得益，也不願受制於東德的出版公司。一九二二到三三年的十年間，他一直拒絕與德國共產黨的出版機構有任何瓜葛，寧願找能支付適當版稅的可靠的資本主義公司。此時他還是把版權交給西德出版商舒赫坎普，並迫使他的東德版上也印上「經美因河上法蘭克福的舒赫坎普許可」的字樣。他在世界各地出書所得的利潤和版稅全都以西德貨幣支付，並轉入他在瑞士的銀行帳戶。

到一九四九年夏天，布萊希特以兩面三刀的手段和撒謊行徑，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奧地利護照、東德政府的支持、西德出版商和瑞士的銀行帳戶。他在自己的「柏林人劇團」擔任「藝術顧問」，妻子海倫任導演，第一部大作品《潘第拉老爺》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首演。「船塢劇院」後來被轉讓給布萊希特作為「柏林人劇團」的永久駐地，畢加索為其開張畫了一幅海報。從華格納（Wagner）以來，還沒有一位藝術家擁有這種規模的理想劇院。他有六十位演員，加上服裝和舞台設計師、樂師及幾十位演出助理，共計二百五十名員工，一個劇作家夢寐以求的所有可能的奢侈也就是這些了。他可以用長達五個月時間彩排，他有權力也的確取消過已安排好的晚場表演，就為了繼續排練新戲——他把錢還給贊助人便算交差。他不必為演員的數目或演出的費用擔心，可以在充分彩排的前提下數度修改或重寫劇本，因而達到世上任何劇作家不可企及的完美程度。有一大筆旅行預算使他能帶著劇團於一九五四年到巴黎演出《大膽媽媽》，次年又去演了《高加索灰闌記》。

這些出訪是布萊希特獲得國際聲譽和影響的真正開始，而他已經為這一天準備了多年。他像潤飾劇本一樣潤飾他無產者的形象，對工作服的剪裁極為講究。他歡迎來訪，但嚴加審查，只有能夠

讓他挑選供發表的照片時，才允許別人拍照。布萊希特總是渴望自己作品以「嚴肅」吸引學者的注意，他精明地看出學者是作家聲望最好的長期支持者，這就是他當初著手出版「正在創作的作品」系列的原因，這一系列仍在繼續，但規模擴大了許多。在美國時，他有本「工作日誌」，與其說是日記，不如說是他的工作和藝術構思的流水帳，其中點綴了一些剪報之類他愛稱為「文件」的東西。

一九四五年起，他開始把這些「日誌」和其他工作記錄稱作「檔案」，用當時相當於微縮攝影的技術拍下來，並說服紐約公共圖書館收藏了一整套，目的是方便、鼓勵學生撰寫布萊希特作品的博士論文；另一套膠片到了哈佛畢業生尼豪斯手中，他已經著手寫那種論文，並順理成章地成為布萊希特形象在美國引發狂熱的宣傳者。布萊希特當時在美國已經有了一位學院派鼓吹者，就是曾研究過格奧爾格（Stefan Georg）的加州大學英文教授班特利（Eric Bentley）。一九四三年，布萊希特慫恿班特利放棄格奧爾格，改為研究自己。班特利不僅翻譯《高加索灰闌記》，也安排此劇於一九四八年在美國首演，而且成為布萊希特在大西洋彼岸的主要「吹鼓手」。布萊希特對這樣的信徒態度冷漠，迫使他們不懈地專注於他的作品。班特利證實：「他並未試圖多了解我，他也不讓我多了解他。」儘管脾氣暴躁，布萊希特深知，不斷增加的麻煩根本不會讓那些學術探子和未來的追隨者們洩氣，事實上會更加激發他們為他服務的意願。他故意變得難纏而苛刻，而一切又都是打著藝術真誠的名義。盧梭曾經如此並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布萊希特則以德國式的效率和細緻運用了這些技巧。

一九五〇年代，這些努力在美國取得越來越大的成效。布萊希特同樣孜孜不倦提高他在歐洲的聲名。在東柏林，他以戲劇贊助人的巨大權力，吸引了一批有望成為導演或舞台設計的青年。他像

個普魯士軍官一樣把他們呼來喚去——事實上，他以粗暴而獨斷的權威管理著整個劇團——他們恭敬地遵從他。他連彩排也成了戲劇界的重要事，被信徒們拍成錄影帶，不但在倫敦、巴黎和其他各地發行，還被當成「檔案」。這些年輕人是布萊希特的學說得以在全球文藝界傳播的途徑之一，但他同樣被他的圈子以外的重要知識分子所傳揚。在法國，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大眾戲劇》雜誌上為他大肆鼓吹，作為符號學——研究人類交流的方式——這門新興時髦的學科創始人之一，巴特在將布萊希特樹立為知識分子崇拜的偶像上是理想的人。在英國，有一位更有影響力的模範者叫作泰南（Kenneth Tynan），他已於一九五〇年因班特利關係轉向推崇布萊希特，並從一九五四年起成為《觀察家》雜誌的戲劇評論家。

這種對於布萊希特及其作品的熱心推銷，如果不是與西方戲劇界經濟狀況的改變同步，也許還不至於有如此成效。從一九五〇年到七五年的四分之一個世紀內，歐洲各國實際上第一次接受了政府資助戲劇的原則。新的劇團按照大規模的設計，能獲得豐厚的資金來源，其中有些部分往往來自私人機構。同以法蘭西喜劇院為原型的舊式國家劇院不同，新劇團以獨立性為榮，往往被置於政府的控制之外。表面上看，新劇團與東歐那些受到慷慨贊助的劇院，尤其是與布萊希特的劇院相似，他們確實是想以東歐為典範，致力於盛大而經過精細排練的演出。然而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不僅演古典作品，還演出來自世界各地「有意義」的新戲。布萊希特的作品便自然成了這類戲劇的選擇。事實上，在變革最為徹底的倫敦——政府資助的劇院很快取代了商業劇場——國家劇院任命泰南為第一位文學指導。因此在整個歐洲乃至全世界，觀眾們看到布萊希特的劇作在高額製作和非常理想

的條件下演出，而且往往直接按照他自己的劇院中制定的標準，甚至連華格納也沒得到過如此的好運。

就這樣，布萊希特的浮士德式交易得到了回報。他甚至在有生之年就迅速成爲世界劇壇最有影響的人物。他時時準備逃避責任，當他實在無法憑藉他的詭計逃脫時，他也盡可能少去承擔。很早之前，布萊希特就不僅實踐而且崇拜一種出於私利的奴性，他的至理名言是：「你絕不能忘記藝術是欺騙，生活也是欺騙。」要維持生存，你不得不讓自己謹慎而成功地從事各種欺騙行爲，他的作品出現了大量這樣的忠告。在《夜半鼓聲》中，懦弱的士兵克雷格勒爾誇口道：「我是個下流胚——下流胚才能（從戰爭中）生還。」主角伽利略向梅迪齊大公鞠躬說道：「你認爲我的信太謙恭了嗎？……像我這樣的人，只有趴在地上匍匐前行才能達到比較有尊嚴的位置。你知道我鄙視那些不能運用自己的頭腦填飽肚子的人。」布萊希特在台下也反覆重申這一信條。他告訴自己十五歲的兒子斯蒂芬，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貧窮，因爲貧窮就不可能慷慨。爲了生存，他說，你不得不自私自利。最重要的指示就是「善待自己」。

愛在利用價值上

這種哲學的背後是堅定不移的自私自利，這似乎成爲重要知識分子的共同特徵，但布萊希特以一貫的冷酷無情追求他利己主義的目標，即使以知識分子們的標準來看也非常罕見。他接受了關於

屈從的無情邏輯：如果他向強者低頭，他就可以統治弱者。他一生中對女人的態度也令人害怕，他讓她們全都爲他效力，她們是農場裡的母雞，他則是其中的公雞。他甚至爲他的女人們設計了服裝式樣，與他自己的形象互補：長裙，深色衣料，帶有清教徒的意味。他十七歲時首次得逞，引誘了一位比他小兩歲的女孩。青年時期，他的興趣集中在工人階級少女的身上：村姑、農民的女兒、理髮師、店員，其後還有許多女演員。沒有一位導演像布萊希特那樣無恥地利用挑選演員時所坐的長沙發，他尤其喜歡使那些受到嚴格天主教教育的姑娘墮落，不清楚的是爲何女人會覺得他具有魅力。他的一位演員女友瑪利安娜說他總是很髒，並親自爲他洗脖子和耳朵；洛頓的妻子艾爾莎說他的牙齒是「從一張黑色的嘴裡伸出的小墓碑」。雖然如此，他的嗓音卻純淨清亮，能討女人歡心，瑪利安娜說他唱歌時，那「金屬般的刺耳聲音」令她脊背顫抖；她還喜歡他的「纖細瘦弱」和「會蜇人」的「黑鈕釦般的眼睛」。布萊希特是個求愛高手，殷勤體貼（早年）、堅持不懈、鏗而不捨；不僅僅是他的母親發現他的要求總是那麼強烈，令人難以拒絕。

此外，布萊希特儘管冷酷，他還是明顯把女人看得比男人重要，他喜歡給每個人起一個只屬於他專有的名字。他不在乎嫉妒、咒罵、廝打、爭吵，事實上他甘之如飴。他的目標和雪萊一樣，以主人的身分統轄性的小團體活動。雪萊的失敗之處，對他卻是成功的，他總是能同時應付兩到三個女人。一九一九年七月，有位叫寶拉的年輕女人爲他生了個兒子，他曾經以模糊的婚姻承諾引誘了她。一九二一年二月，他開始與瑪利安娜交往，瑪利安娜也懷孕了，她想要這個孩子，但布萊希特不同意：「孩子會破壞我心境的安寧。」兩個女人終於互相發覺了對方，她們在慕尼黑的咖啡館

裡找到布萊希特，要他坐在兩人中間做建議，他先和瑪利安娜結婚，使她的孩利安娜於是朝他宣讀一份憤怒的聲明後製，但性格比較溫順，只是起身離開。

幾個星期後，布萊希特的確結婚了——

一九二三年三月又生了個女兒，取名漢於一九二四年九月搬進她的寓所，他們成員也被他弄到手，包括他忠誠的女秘中扮演過波莉。布萊希特和瑪利安娜呢？他猶豫了兩年，最終選定了海倫，羅拉贖罪說：「這沒辦法，但並無任何殺。如此令女人心碎，布萊希特卻心安棄，只為符合他的需要。

瑪格麗特就是個悲慘的例子。她是了她。她跟隨他流亡，擔任沒有報酬的國外通信（布萊希特發現自己除了母三〇年代流亡期間逐漸惡化，當她的朋

何好處，她現在不能待在醫院裡，因為我需要她。」於是她放棄了治療，繼續爲他工作，一九四一年布萊希特前往加利福尼亞時，她被拋棄在莫斯科。幾週後便猝然離開人世，手裡還拿著布萊希特發來的電報。當時她三十四歲。

另一個例子是露特，聰明的二十七歲丹麥姑娘，一九三三年開始與布萊希特發生關係，布萊希特將她從她出色的醫生丈夫身邊偷走。跟對待其他的情婦一樣，布萊希特讓她做大量秘書和文字方面的的工作。事實上，他非常重視露特對他劇本的看法，海倫因此極爲憤怒，恨露特的程度甚於布萊希特的其他女子。露特和他一起待在美國時痛苦地抱怨：「我是布萊希特後街上的妻子」、「我是一個經典作家的妓女」。她變得精神錯亂，不得不在紐約醫院接受治療。布萊希特的評論是：「沒有人會像發瘋的共產黨人那樣瘋狂。」她出院後就開始酗酒。露特跟布萊希特到了東柏林，喜怒無常，直到布萊希特把她送回丹麥——一個讓她因酗酒而崩潰之地。露特熱情而有才華，但她多年來所遭受的痛苦令人不忍回想。

海倫是布萊希特的女人中最堅韌也最恭順的一個。實際上，她扮演了他母親的角色。布萊希特永遠需要利用他人，海倫便是這樣的傑作，在很多方面，海倫意志堅強，具有領導能力和組織才能。從表面看，他們似乎是平等的，但作爲女人她缺乏自信，尤其在性魅力方面，布萊希特利用了她這個弱點。不論家中或劇院，海倫的服務不減。在家裡，海倫洗洗涮涮、到古董店搜尋精品、做飯，並爲布萊希特的同事、朋友和女人們舉辦沒完沒了的宴會。她竭盡心力爲布萊希特的職業效勞。一九四九年當布萊希特得到屬於自己的劇院後，海倫爲他管理票房、海報、布景，還擔負清

潔、打雜，以及供應膳食等一切行政事務。然而，即使殘酷，布萊希特仍讓她明白，她只掌管這座建築，與劇院的創造性活動無關，她被毫不留情地排除在這些活動之外。她經常寫信給他，要求在劇務方面得到任用。

事實上，他們在家裡各有各的房間和門鈴，這是爲了使她避開布萊希特對女性的玩弄，住在柏林期間，布萊希特無休無止，權力和地位給了他從肉體上接近許多年輕女演員的機會。有時海倫被逼得忍無可忍時會離家出走，但她通常是順從和忍耐，偶爾會給年輕的女演員忠告：布萊希特是個嫉妒心很強的人，性關係非常隨便，卻希望女人都對他忠誠，或至少在他的監視之下。布萊希特有本事通過幾個電話就查出沒有跟他一起過夜的情婦的活動，到最後，他就像一頭老雄鹿，竭力把他的一頭頭雌鹿圈養在一起。

布萊希特一生中追逐婦女，樂此不疲，無暇顧及自己的孩子。他至少有兩個私生子。露特一九四四年給他生了個兒子，早夭；他早先與寶拉所生的兒子弗蘭克雖長大成大，但一九四三年卻戰死在俄國前線，布萊希特沒有完全拒絕接受他，但對他也並不關心，很少去看他，而且從沒在日記裡提到過他。他那些合法的孩子在他的生活中也很少出現，他吝惜花在他們身上或與他們共度的任何時間。這是知識分子理想主義者的常見故事，理想比人更重要，大寫的「人類」高於男人和女人、妻子、兒女。霍默爾卡（Oscar Homolka）的妻子佛羅倫絲在美國時與布萊希特很熟，她巧妙地總結：「在人的關係方面他是人民權利的鬥士，但對親友的幸福卻並不十分關心。」布萊希特引用列寧的話反駁：要爲集體服務就不得不對個人無情。

剽竊與偽裝

同樣的原則也被布萊希特應用到作品中。布萊希特有一種極具獨創性的表現風格，但素材常常取自其他作家。對於他人的情節和思想，布萊希特是個天才的改編者和模仿家，是使他們重放光彩並跟上時代的高手。事實上，還沒有作家能只寫那麼一點點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而聲名大噪的。他會玩世不恭地問爲什麼不能？只要爲無產階級服務那又有什麼關係呢？當人們發現他剽竊了阿默爾所翻譯的維永的作品時，他承認這種所謂「在文學財產問題上的基本疏忽」——如此古怪的說法竟出自一位後來堅決維護自己著作權的人。他的《屠宰場的聖喬安娜》是對席勒《奧爾良姑娘》和蕭伯納《聖女貞德》的一種戲擬；他的《卡拉爾大娘的槍》以辛格（J. M. Synge）的《騎馬入海的人》爲藍本；《潘第拉老爺和他的男僕馬蒂》剽竊了他在芬蘭時的女房東、民俗學家伍里約克（Helia Wuolijoki）的作品——這是一個忘恩負義的範例；他的《自由和民主》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雪萊的《暴政的假面遊行》。此外，他也剽竊吉卜林、海明威。當鮑爾尼曼（Ernest Bornemann）提醒布萊希特某部劇作與海明威的短篇小說有點相似時——因而觸到了他的痛處——他大發雷霆：「滾出去——滾出去——滾出去！」海倫當時正在廚房做飯，不知道他們在吵什麼，也加入大聲尖叫：「對！滾、滾、滾！」揮舞著她的煎鍋彷彿拿著一把劍似的。

布萊希特的「基本疏忽」，是除了他的附庸者和同黨外，他在其他作家中普遍不受歡迎的原因之

一。他遭到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們（馬庫色、霍克海默等）的極義者」。阿多諾（Aldorno）說布萊希特每天花幾個小時把灰塵弄工人。在美國，他與伊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和奧登和海倫竭力破壞他剛信奉的佛教感到憤恨，他發現布萊希特「冷救世軍。布萊希特原先的合作者奧登讚賞布萊希特的詩，但不認會思考」，還發現他道德品質敗壞：「一個令人極不愉快的傢伙死刑的人之一——「事實上我想親自處死他」。托馬斯·曼也不肯人」、「非常有天分——很不幸」、「魔鬼」；布萊希特則回擊「牧師式的法西斯分子」、「半個才子」、「爬行動物」。

阿多諾和他的朋友之所以如此討厭布萊希特，原因之一是他感，看出是欺騙的行爲。當然，他們宣稱自己懂得「工人」的直基礎；他們完全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從未見過勞工之子，但至裝成無產者的衣服。布萊希特撒謊和蓄意欺騙的程度甚至令他們布的故事：他依約來到某高級飯店的門前（在倫敦是薩沃衣飯店店——地點隨時改變），當然穿著他的「工人服裝」，結果被穿到天生專橫跋扈，任何人試圖阻止他想要得到的東西，都能激怒他義制度關係的象徵。對於這個故事，他的版本是：他應邀前往

口，按要

答：「對

世。」

布萊

導演。當

人員像個

東德官方

是一項特

一項好處

布萊

倫的公軍

(Buckov

兒茂密的

之為「園

像排列的

布萊

確鑿無疑

一九三〇年起，這在他的生活中表現得時而隱晦時而清晰。整個三〇年代，布萊希特都是個史達林主義者，有時還很狂熱。美國哲學家胡克（Sidney Hook）記錄了布萊希特於一九三五年造訪他在曼哈頓巴洛街的寓所時一次令人恐怖的談話。當時（共產黨的）大清算剛開始，胡克舉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例子，問布萊希特怎麼能忍受與那些宣揚自己罪惡的美國共產主義分子共事。布萊希特說美國共產黨無足輕重——德國共產黨也不行——唯一重要的團體就是蘇聯共產黨。胡克指出他們是同一個運動的一部分，都應當對逮捕和監禁無辜的昔日同志負責任。布萊希特說：「至於那些人，他們越是無辜就越應當被槍斃。」胡克問：「你在說什麼？」布萊希特回答說：「他們越無辜就越應當被槍斃。」（據胡克的記錄，談話是用德語進行的）胡克又問：「爲什麼？爲什麼？」他反覆這樣問，但布萊希特沒有回答。胡克起身走進隔壁房，拿來布萊希特的帽子和外套。「我回來時，他仍坐在椅子上，手裡端著一杯飲料。當他看見我拿著他的帽子和外套，似乎感到驚訝。他放下杯子站起來，面帶苦笑，拿起他的帽子和外套離開了。」胡克首次發表這份記錄時，受到班特利的質疑，但根據胡克的說法，他原先向班特利講述這件事時（在一九六〇年的文化自由柏林代表大會上），班特利曾說：「那正符合布萊希特的行爲。」——讓人猛然想起拜倫聽到雪萊與克萊爾的私生子的故事時最初的反應。不僅如此，城市大學的帕特爾（Henry Pachter）教授證實，布萊希特「在我面前也說過類似的話」，並補充了布萊希特當時提出的更加驚人的理由：「五十年後，共產黨人會忘了史達林，但我確信，他們仍會讀布萊希特，因此我不能把自己和共產黨分開。」

事實是，即使在他自己的朋友被迫害時，布萊希特也從未對大清算提出過抗議。當他昔日的情

婦卡羅拉在莫斯科被捕，他的說法是：「如果她被判刑，一定是有對她不利的證據。」更有甚者，他還說，在這件案子裡，「我們並不覺得罪惡已經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卡羅拉消失了——幾乎可以肯定是被史達林殺害的。當另一位朋友崔提亞可夫被史達林槍決時，布萊希特寫了一首輓詩，直到多年後才發表，當時他的公開表態是：「這些審判非常清楚地證明了反對現政權的陰謀活動的存在……國內外所有的社會渣滓，所有的寄生蟲、職業罪犯和密探都參與其中。這群烏合之眾與（叛國者們）有著同樣的目標。我相信這是事實。」

實際上布萊希特當時總是公開支持史達林的政策，包括文藝政策。比如一九三八至三九年，他支持了對「形式主義」——其實也是任何形式的藝術實驗或創新——的攻擊。「這場反對形式主義的非常有益的運動，」他寫道：「通過證明社會內容是藝術形式發展的唯一決定性條件，促進了藝術形式的不斷發展。任何藝術的創新如果不服務於社會內容，並從中證明其存在的理由，就都是毫無意義的。」史達林去世時，布萊希特的評價是：「五大洲的被壓迫者……聽說史達林去世一定感到心臟都停止了跳動。他是他們希望的化身。」他很高興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史達林和平獎，十六萬盧布獎金的大部分直接匯入了他的瑞士帳戶，但他卻前往莫斯科領獎，並請顯然沒有察覺到自己的敏感處境的帕斯捷爾納克爲他翻譯得獎演說。帕斯捷爾納克欣然同意，但後來——這項獎那時被更改了名稱——他沒有理會布萊希特要他翻譯他讚頌列寧的一組詩的要求。布萊希特對赫魯雪夫在蘇共代表大會上關於史達林罪行的秘密報告的流傳深感沮喪，強烈反對公開發行，他對一位追隨者說出自己的理由：「我有一匹馬，癱腿、斜眼還長疥瘡。有人過來說：這馬斜視、癱腿，看看，還有

皮膚病。他說得對，但那時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沒有別的馬，不存在另一匹馬。我想，最好還是盡可能少想這匹馬的缺點。」

「不去想」是布萊希特自己必須採取的策略，因為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實際上已成爲極端史達林主義的東德政權的戲劇官員。他一開始就打算繼續這種身分，爲慶祝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皮克「當選」東德總統，他寫了一首名爲《獻給我的同胞》的宮廷詩。他把這首詩附在給皮克的一封信中，表達了他對此事的「欣喜」。總的說來，如果我們排除那些純粹的御用文人，布萊希特是共產黨屬下的所有作家中最能保持忠誠的。他把自己的名字借給政府當前推行的任何一項國際政策。他強烈抗議西德知識階層默許西德政府重整軍備，卻對東德類似的軍備行爲保持沉默。因爲自己的罪行去譴責別人是他的習慣，那幾年他的作品有個反覆出現的主題：爲了金錢和特權而效力於資本主義的西方知識分子的邪惡面。他去世前正在創作一部同樣主題的劇本，其中有大量反阿登納（Adenauer，譯註：西德總理，任內實行軍備重整，主張西歐聯合對抗蘇聯）的內容，包括一段荒誕不經的清唱劇《漢堡敘事》，裡面有這樣的小調：

阿登納，阿登納，給我們看看你的手

爲了三十枚銀幣你出賣我們的土地，等等。

這部劇爲他贏得了東德的國家文學獎一等獎。他還設法讓自己被引見給來訪的各界要人，向他

們發表譴責西德擴大軍備的演說。他在抗議的電報上簽名，為政府寫進行曲和其他的詩。

動盪的考驗

偶爾還會有其他的爭執，多半是關於錢的問題——比如與東德國家電影公司為《大膽媽媽》發生的爭執。政府起初把《戰爭讀本》當成「和平主義」而加以排斥，但當布萊希特威脅要把此事帶到共產黨控制的世界和平會議上時，政府妥協了。不過，通常讓步的是布萊希特。一九三九年的劇本《盧卡拉斯的審判》，最初是為廣播創作的反戰諷刺劇，由德索譜曲，計畫於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七日在東德國家劇院首演，事前的宣傳引起了政府的警覺，認定這部劇也是和平主義的，由於已來不及制止，就將演出減到三場，並把所有的票發給黨員工人，但仍有一些票在黑市上賣給了西柏林人，他們狂熱地為此戲喝彩，剩下的兩場演出就被取消了。一星期後，共產黨官方報紙《新德意志》以「《盧卡拉斯的審判》：德國國家劇院一次實驗的失敗」為標題發表了一篇抨擊文章，火力集中在德索的音樂上，說他是斯特拉文斯基的追隨者，「一個歐洲音樂傳統的瘋狂破壞者」。此外，劇本也因為「與現實不相符」而遭到批評。布萊希特和德索都被召集到一個持續了八小時的共產黨會議上。會議結束時，布萊希特恭恭敬敬地發言：「你還能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一個對藝術家表現出這麼大的興趣、如此關注他們說的話的政府嗎？」他還做了共產黨要求的改動，把題目變成《盧卡拉斯的譴責》，同時請德索重新配樂。雖然如此，十月十二日新的演出仍然不符合標準。《新德意志》

說，它是「一個明顯的進步」，但仍缺乏廣泛的吸引力，而且「危險地接近象徵主義」。遭到這樣的批評後，這部劇從東德舞台上消失了，但布萊希特設法讓它在西方上演。

一九五三年六月，當東德工人發動暴亂，蘇聯坦克進入東德鎮壓，對布萊希特的浮士德式交易的真正考驗來臨了。布萊希特保持忠誠，但要價很高，他甚至狡猾地利用這場悲劇來加強自己的地位，並抬高原先達成的交易條件。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去世時，布萊希特處在東德當局日益增長的壓力下，要求他遵守蘇聯文藝政策，而當時鼓吹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正是布萊希特討厭的。反映國家藝術委員會觀點的《新德意志》——該委員會中有布萊希特的對頭，並正在發起一場反對他的劇團的運動——警告說，布萊希特的劇團「無可否認地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名字所代表的一切相對立」。不僅如此，委員會正在阻止布萊希特接管船塢劇院的企圖，布萊希特的目標是挫敗委員會並奪取劇院。

暴動的發生似乎使他大吃一驚，這表明他完全脫離了普通人的生活。他有足夠的外幣，經常去國外旅行，他和妻子大都在國外購物；在東德國內，他可以進入那些只為共產黨高級官員和其他特權人物開設的特別商店，但普通百姓卻全為政府反覆無常的配給政策所擺布，很多人瀕於餓死邊緣，僅在西柏林避難的就有將近六萬人。四月份，物價暴漲，配給卡從所有自由職業者和房產主手中收回（布萊希特同時具有這兩種身分，因為他的特權地位和奧地利公民身分而得以豁免）。六月十一日，政策突然倒轉，恢復了配給卡，物價和工資政策都向明顯不利於工人的方向變化。六月十二日，建築工人發現工資被減半，要求召開群眾大會，抗議活動於六月十五日開始，人們日益高漲的

憤怒情緒一直持續到蘇聯坦克開進來。

當時住在鄉間別墅的布萊希特，儘管對暴動感到震驚，他還是迅速利用了它。他認識到在這個關頭，他的支持對政府會是多麼重要。六月十五日，他寫信給黨魁格羅提渥，堅決要求確定並公布他的劇團對劇院的所有權。言下之意就是，作為回報，不管共產黨路線是什麼，他都會支持。但黨的路線難以確定，直到兩天後，一位名叫高特林的失業西柏林人抄近路穿過東德區域領取救濟金時被逮捕，經秘密審判後，以「西方煽動者」的罪名被槍斃。於是，「法西斯分子騷亂」成了這場暴動的解釋，布萊希特很快接受了這條黨的路線。他在當天晚上向黨的領導人格羅提渥和蘇維埃政治顧問、實際上是俄國總督的塞米諾夫口述了一封信。六月二十一日，《新德意志》宣布：「國家文學獎得主布萊希特已經給社會統一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烏布里希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感到在這一時刻有必要向您表達我對社會統一黨的感情，您忠誠的布萊希特。』」布萊希特後來聲稱，那封信實際上包含了對政府的大量批評，而被引用的那句話前面還有另外兩句：「歷史會尊重德國社會統一黨的革命急躁情緒。與群眾進行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大討論，將會使社會主義的成就得到考察和捍衛。」一位瑞士記者舒特寫道：「只有一次我看到他那種孤立甚至卑微的樣子，他急急忙忙地從口袋掏出一封破破爛爛的信件原稿，他顯然已經給很多人看過了。」然而不管當時還是以後，布萊希特都沒有真正想要發表信件全文；他本該擁有信的副本而不是原件。如果他把信發表，政府也許會出示原件。布萊希特完全有可能發出一封信，然後私下抱怨他發的其實是完全不同的一封信。即使他說的是真的，他對烏布里希行爲的抱怨也沒多少實質內容。比起布萊希特微妙的支持，

東德的頭頭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慮——比如，怎樣保住性命。無論怎麼說，布萊希特是被收買並得到了好處。他們又何必猶豫不決地去刪改他那小小的感謝信？

《新德意志》兩天後發表了布萊希特的一封信，無情地揭露了他的立場。信中確實提到「有好一部分的柏林工人對一系列失敗的經濟措施的不滿情緒」，但接著寫道：「有組織的法西斯分子企圖濫用這種不滿以達到血腥的目的。有幾個小時柏林處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多虧蘇聯軍隊迅速及時的干預，這些企圖才被挫敗。顯然，蘇軍的介入決不是針對工人示威。非常明顯，這僅僅是針對準備另一場大屠殺的企圖。」在給他的西德出版商的一封信中，他重申了這種看法：「由各種落魄的年輕人」組成的「一群好戰的法西斯主義暴徒」已經湧入東柏林，正是蘇聯軍隊阻止了世界大戰。這是共產黨一貫的路線，但從來沒有一絲「法西斯主義煽動者」的跡象，布萊希特自己也不相信，他的私人日記表明他知道真相，當然，日記直到他死後很久才出版。此外，布萊希特發現，事實上普通的德國工人抗拒現有政權，這令人不快。跟多數統治階級的成員一樣，除了他屋子裡的僕人和偶爾來給他修房屋的工匠之外，他從不與其他勞動者見面。他記錄了與一位在他的鄉村別墅工作的管道工人的交談，這位工人抱怨說，有個學徒因偷竊被他解僱，正關在人民警察局，那兒全是前納粹分子，管道工希望舉行自由選舉。布萊希特回答：「那樣的話，納粹分子就會當選。」這根本不是管道工討論的邏輯，卻代表了布萊希特的思想傾向。他不相信德國人民，寧可要蘇聯的殖民統治也不要民主。

冰一樣的心

布萊希特因支持政府而得到了報償，儘管烏布里希過了近一年的時間才兌現。布萊希特在粉碎「藝術委員會」的努力中，發現自己需要洪堡大學一位年輕而出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授亨利希的幫助，他給布萊希特提供了恰當的術語進行理論闡述，這是布萊希特自己無法做到的。一九五四年初，「委員會」終於解散，被新的「文化部」代替，由布萊希特的密友貝希爾（Johannes Becher）掌權。三月份，當布萊希特被授予他垂涎已久的劇院正式所有權時，這筆交易的最後一項報酬總算付清了，他以勾引亨利希美貌的妻子伊瑟來慶祝自己的勝利，成爲自己最主要的情婦（當然是暫時的），並把她從一個小演員提升爲他在新總部裡的助手。對於錯愕的亨利希，布萊希特給了他一個無恥的建議：「現在和她離婚。你可以在兩年內再娶她。」——也就是說，到那時他和她之間就已經結束了。

不巧，兩年之後，他實際上結束了自己。一九五四年底，他的健康開始惡化，心臟病在很晚才被診斷出來。他不相信共產黨的醫術，所以到西柏林的診所就醫，他原計畫一九五六年轉到慕尼黑的一家診所，但再也沒有機會：八月十四日，一次嚴重的心臟病發作，奪去了他的生命。他對長期忍受痛苦的海倫使了最後一次詭計，他立了一份遺囑，把部分作品的版權留給四個女人：昔日的秘書兼情婦伊麗莎白得到其中最具有價值的《三分錢歌劇》，其他分給可憐的露特、伊瑟，以及他在

九五四年底勾引到手、與伊瑟同時約會的凱特。然而，受布萊希特委託公證遺囑的伊瑟顯得極不耐煩，在簽署遺囑時沒出現在律師的辦公室裡，結果遺囑無效。海倫作爲唯一的合法妻子得到最多，她也善良地將遺產分給了其他女人。布萊希特的其他願望都實現了：葬在一口灰色鋼製棺材中（爲了防蟲），而且一死去就讓人用一柄鋼製匕首穿透他的心臟。這些都照辦並予以公布：這條新聞對於很多了解他的人來說，首次證明了他原來還有顆心。

在這篇文章中，我曾力圖找些對布萊希特有利的話，但除去他總是非常勤奮地工作這一事實——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及戰爭剛結束時給歐洲人民寄去食物包裹（這也許是海倫的作爲）——對他沒什麼好話可說。他是我所研究過的知識分子中唯一一位似乎沒有絲毫挽回希望的人。

跟多數知識分子一樣，他重視思想甚於重視人，他在任何人際關係中都沒有溫情，沒有一般意義上的朋友。如果由他掌權，他樂意與人合作，但正如班特利所說，和他一起工作就是一大堆的委員會或董事會。班特利說，他對作爲個體的人不感興趣，這也許就是爲什麼他在作品中不能創造性格，而只有類型。他把人物作爲體現意圖的代表，這同樣被他運用到女人身上，他把她們當成床上的伴侶、秘書和廚師多於看成有個性的人。他的意圖到底是什麼呢？我們根本不清楚布萊希特是否有任何真正堅定的信仰。他的法語翻譯亞伯拉罕說，布萊希特死前不久告訴過他，他想重新出版自己的教育戲劇，並附上一篇新的序言，指出這些劇本並不指望被人嚴肅對待，而是作爲「那些精神運動員的柔軟體操，這是一切合格的辯證論者必須做的」。這些作品當時顯然是被嚴肅上演的，如果只是「體操」，那布萊希特的哪部作品不是呢？一九二二到二三年冬天，阿諾特·布羅耐（Arnold

Bronnen，譯註：與布萊希特同為二〇年代柏林戲劇的革新者）曾與布萊希特進行了一次關於人民需要的談話。布羅耐對布萊希特有過重要影響，他把名字從阿諾德（Arnold）改為阿諾特以便變得「強硬」和「激進」，布萊希特也仿效他。布萊希特不僅放棄了尤金（Eugen）和弗里德里克（Friedrich）這兩個太具「保皇色彩」的受洗名字，而且把貝托爾德（Berold）「硬化」為貝托爾特（Berolt）。然而這次談話中，當布羅耐強調改變世界、不再使人挨餓的必要性時，布萊希特生氣了。根據布羅耐的回憶，布萊希特說：「人們餓死關你什麼事？一個人應該有所成就，應該使自己出名，應該獲得劇院以演出自己的戲劇！」布羅耐補充說：「他對其他任何事都不感興趣。」布萊希特喜歡顯出一副矛盾、神秘、野心勃勃的樣子。他巧妙地掩蓋自己的思想，正如他用工人的服裝包裹自己的身體一樣。但也許這一次，僅此一次，他說出了他真實的想法。

8 羅素——最受惡作劇的哲學家

向人類提出勸誡

歷史上沒有一位思想家像羅素 (Bertrand Russell, 一八七二—一九七〇, 第三代羅素伯爵) 那樣，在如此漫長的時間裡勸誡人類。他出生的那一年，格蘭特將軍連任美國總統，他去世時，正是水門事件前夕。他比小說家普魯斯特和克萊恩 (Stephen Crane) 要小幾個月，又比美國總統柯立芝和英國漫畫家比爾博姆 (Max Beerbohm) 大幾個星期；他是如此長壽，他迎接了一九六八年造反的學生，也欣賞了品特 (Pinter) 的作品。在整整的一生中，他從容不迫地發出一系列的忠告、勸誡、信息、警告，而這一切涉及的學科之廣令人驚異。有一份書目 (幾乎肯定不完整) 列出了他的六十八種著作。他的第一本書是《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出版於一八九六年，從那年算起，維多利亞女王還有五年的壽命；他的遺作《分析論》(一九七三) 出版於尼克森辭職的那年。他的著書範圍涉及幾何學、哲學、數學、司法、社會重建、政治思想、神秘主義、邏輯學、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問

題、人腦、工業、原子入門（此書出版於一九二三年；三十六年後他又出了一部關於核戰的書）、自然科學、相對論、教育、懷疑論、婚姻、幸福、道德、休閒、宗教、國際事務、歷史、權力、真理、知識、權威、公民、倫理、傳記、無神論、智慧、未來、裁軍、和平、戰爭犯罪等論題。此外，他還在報紙雜誌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幾乎包含了所有你能想得到的話題，例如唇膏用法、旅遊禮儀、雪茄選擇，以及虐妻等等。

爲什麼羅素自認有資格向世人提出那麼多建議？爲什麼人們會聽他的話？對於第一個問題，無法立刻給予明確的答案。他的著述如此豐富，最大的原因很可能是他發覺寫作在他真是易如反掌，而且也可以獲得豐厚的收入。他的朋友梅爾森在一九二〇年代寫道：「每天清晨，羅素會一個人出去散步一小時，構思一天中要寫的東西。然後回來，用早晨剩下的時間寫作，他文思泉湧，下筆輕鬆，無需修改。」這項令人愜意的活動爲他帶來的經濟收入都被記錄在一本小小的記事簿上，他把一生所發表的作品或在電台做節目得到的酬金都一筆筆記入其中，放在一個貼身的口袋裡，偶有懶散或是灰心的時候，就掏出來仔細翻閱，他稱之爲「最有益的消遣」。

惹是生非的怪人

無疑，羅素並沒有多數人所經歷過的廣泛的人生體驗，對民眾的意見和情感也不大感興趣。他是孤兒，四歲時雙親都去世了，童年是在祖父家裡度過的。他的祖父是第一代羅素伯爵，也是約

翰·羅素勛爵，在改革前的舊下議院策劃了「選舉法修正案」。羅素的背景便是輝格黨望族，他們專斷地喜好激進思想，但又嚴禁自己與平民甚至中上階級有所接觸。作為前首相的老伯爵，享有維多利亞女王欽賜的彭布魯克大宅（Pembroke Lodge），該住處位於利奇蒙德公園內，羅素就在這兒長大。我總在猜想，他那清晰又古老的獨特口音是得自於他的祖父，儘管人們經常錯誤地將之歸屬於「布盧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譯註：一九〇七—二〇年的英國文藝團體，參加者多為知名文學家和學者）。但在童年時代，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他的祖母，她是一位道德嚴謹、篤信宗教的婦女，清教徒觀念鮮明。羅素的父母不僅是無神論者，而且是極端激進分子，按照他們的遺願，羅素應該在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指導下成長。他的祖母壓根就不理這一套，她讓羅素一直待在家裡，讓他身處《聖經》和藍皮書的氛圍中，由一連串的家庭教師對他進行教育（其中有一位後來被發現是無神論者）。所有這一切對羅素根本沒有影響，因為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他都是要走自己的路的。十五歲時，他用希臘語寫日記，在那些窺探的眼睛下，將自己的想法隱瞞了下來：「我已經：研究過我生長其中的那個宗教的真正基礎。」他變成了這個時代的懷疑者，在他的餘生中也始終如此。絕大多數人承認並且需要某種至高無上的神的存在，這種念頭對羅素沒有多少吸引力。他相信所有宇宙之謎的答案，都將由人類的智慧發現，或者根本就沒有答案。

沒有人比羅素對智力有更強烈的信心，儘管他傾向於把智力視為抽象、脫離實際的力量。對抽象智力的酷愛和對肉體行為的懷疑使他成為數學家，這很可能是他祖母那種清教徒式的教育方式所致。在他的一生中，對於數字的科學懷著最強烈的熱情，沒有什麼比這門學科更加遠離人群了。在

一群善於死記硬背的老師幫助下，羅素獲得了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獎學金。一八九三年，他被列為劍橋大學數學榮譽學位考試一等第七名。隨後他成為三一學院的研究員，在往後的一段時期內，他與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合寫著《數學原理》的草稿，這本書完成於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天。他寫道：「我喜歡數學，因為它是超越人類的。」在〈數學研究〉一文中，他充滿喜悅地說：「數學擁有的不僅是真理，而且是超凡的美——像雕像般靜穆而莊重的美，它不訴諸我們任何日益軟弱的天性，甚至純至美只有最偉大的藝術才能表現。」

羅素從不相信能夠或者應該鼓勵普通民眾去深入知識的新領域。他的數學專著始終具有嚴格的專業風格，對那些非專業人士不肯做出絲毫讓步。他認為哲學的思考應該以特殊的語言進行，他不僅要奮力保持，而且要強化這一神聖的準則。他是智力的祭司，禁止門外漢窺探堂奧。他與他的那些哲學家同僚——比如穆爾（G. E. Moore）——有極大的分歧，穆爾嘗試以普通常識的語言討論問題，羅素則堅持認為：「常識體現了原始人的形上學。」不管怎樣，這位智力的祭司克盡義務，自認為只能在他們所屬的那個等級中舉行伊洛西斯秘密儀式（Eleusinian Mysteries，譯註：古希臘人每年在伊洛西斯城舉行的宗教儀式），同時那個等級中的另一些人也在盡著自己的本分，以他們的知識儲備為基礎，拿出一部分易消化的成果來款待普通老百姓。因此，他將專業哲學與大眾倫理學區分開來，並在這兩個方面都進行了實踐。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七年期間，以及一九一九至二一年、一九四四至四九年，羅素都是三一學院的研究員，還花了好幾年時間在美國各大學開設講座和授課。他一生中更多的時間是用在告訴公眾他們應該思考什麼、做些什麼，智力的佈道完全占據了他那漫長的

後半生。就像一九二〇和三〇年代中的愛因斯坦一樣，對於全世界的大多數人而言，羅素變成了理論哲學家的典範和原型、演說家的化身。哲學是什麼？瞧，這就是羅素口中所談的事。

羅素是一個天才般的闡述者。早期，他寫了一部闡釋萊布尼茲著作的作品，他一向很崇敬萊布尼茲。那部傑出的概覽式巨著《西方哲學史》，是所有同類型著作中最富才智的，也自然成爲世界暢銷書。他的學術同仁對此議論紛紛，對他寫出通俗作品裝作惋惜，其實是妒忌，維根斯坦發現他所著的《贏得幸福》「真叫人難以忍受」。當他的最後一部重要哲學論著《人類知識》於一九四九年出版時，學術界的評論家拒絕認真地看待它，其中一位稱該書爲「魔術家的切口」，但公眾樂見有哲學家走出書齋步入塵世。此外，人們感到羅素無論是對是錯，都有勇氣堅持己見，並爲此甘受懲罰。正如愛因斯坦爲了逃離納粹暴政而流亡，羅素多次與各種權威發生爭執，並勇敢地接受懲罰。

例如在一九一六年的時候，他以「拒服兵役同盟」匿名寫了一份傳單，抗議不願徵兵法中的「自願條款」而將一名拒服兵役者送入監獄的做法。散發傳單者被拘捕，審訊後被判入獄。羅素給《泰晤士報》寫了一封信，承認自己是傳單的作者，結果被送上法庭，在市府大廈當著倫敦市長的面接受審判，被罰一百英鎊，但他拒付罰金，於是他在三一學院的家具被扣押出售。頭面人物組成的三一學院評議會是管理高級研究員的，於是取消了羅素的研究員資格。他們處理這件事是認真的，其中大部分人還經過長久思考，才依據最高原則付諸行動，但在公眾看來，懲罰好像多了一倍。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羅素再次受審並判罪。這次是因爲他爲一份名爲《民友》的激進報紙寫了一篇文章（德國和平的提示）。文中說：「那時美國駐軍將會占領英國和法國，無論他們能否有

效地對付德國人，毫無疑問他們是能夠威嚇罷工者的，這是美國軍隊在國內習慣性的工作。」他的此番言論輕率失貞，實在有些荒謬，因而遭到指控，按照國防法，他是「在印刷刊物上發表某些可能損害國王陛下與美利堅合眾國關係的言論」，於是被判刑六個月。他從獄中被釋放後，外交部拒絕發給他護照（至少有一段時間），常務副大臣尼科爾森爵士在卷宗上記錄羅素是「國內最愛惡作劇的怪人之一」。

一九三九至四〇年，羅素再次陷入法律糾紛，當時他被派到紐約市立大學擔任教授。此時的他因為反宗教、不道德的觀點而聲名狼藉。除了無數反基督教的文章之外，他還高談闊論，完成《無神論者的信念》，好像牧師宣道般：「我們不相信上帝，但是我們相信人類的至高無上！我們不相信死後的生命，但是我們相信善行的不朽！」他很樂於將這些言論對他那些進步的朋友們的孩子宣講。當他在紐約的任命公布，當地的聖公會和天主教會對此發出強烈的抗議，由於該大學是地方自治性的學校，市民可以訴請反對，有位婦女便在人指使之下對紐約市政當局提起訴訟，她的律師宣稱羅素寫的東西「淫蕩色情、肉欲橫流、色情狂、催欲劑、傲慢無禮、思想偏執、滿紙謊言、道德淪喪」。法官是愛爾蘭裔美國人，他也加上一番謾罵並判定羅素不能勝任該職務，因為他是「異己的無神論者和自由性愛的鼓吹者」。加迪爾市長拒絕了對此項判決的上訴，紐約法院的註冊官則公開說，羅素應該被「渾身塗滿柏油，沾上羽毛，然後驅逐出境」。

羅素最後一次與當局發生衝突是在一九六一年，當時他已八十八歲，拼命想讓自己在核武的抗議活動中因違反民法而被捕。二月十八日，羅素參加了在倫敦國防部外的一次非法「靜坐」，在人行

道上坐了幾個小時，無事發生，他只好回家。然而，八月六日，他以煽動公眾破壞法律的罪名，被傳喚在九月十二日前往博街的法庭，當天，他被判入獄一個月，減刑到一個星期（這個星期他在監獄醫院的病房中度过）。當這一判決宣布時，有人大叫：「恥辱、恥辱，一個八十八歲的老人！」但是，領新的治安官只是說：「你的年紀已經夠大了，應該更聰明一點。」

這些事是否使羅素的某些觀點已為民眾所接受，還有疑問，但是他們可以證明，羅素真誠而樂於把哲學帶出學術的象牙塔，引入日常世界。人們一想到他，就模模糊糊地覺得，他就是正在服毒的現代蘇格拉底，或者是從雨水桶中冒出來的狄歐根尼（*Diogenes*，譯註：希臘犬儒派哲學家）。事實上，認為羅素將哲學引入日常世界的觀點很容易使人產生誤解；恰恰相反，他試圖把日常世界塞入哲學中，他沒有成功，他發現這種做法並不適宜。愛因斯坦的情況就與羅素完全不同，他是物理學家，所關心的是宇宙的真實運轉，力圖把他對這一運轉的描述，按照最嚴格的標準加以經驗的證明，愛因斯坦糾正了牛頓的物理學說後，改變了我們看待宇宙的整個方式，他的學術成果有著數不盡而且歷久不衰的實用價值——他對原子論的貢獻確實是通往人造核能之路的第一個偉大的里程碑。

對人性的無知

相比之下，沒有人比羅素更遠離社會現實了。他不會操作最簡單的機械或從事任何日常事務，

而這樣的事即便是嬌生慣養的人無需動腦筋也會做。他愛喝茶，卻不會煮茶；當他的第三任妻子瑪傑麗有事外出時，要在廚房的石板上留言給他：「提起炊具上的襯墊，把壺放到加熱板上，然後等水開，然後再把水從水壺倒進茶壺裡。」他依照操作，但還是失敗了。上了歲數後，他的耳朵漸聾，爲此配上了一副助聽器，但若無別人的幫助，他仍然無法使用。人類及物質現實始終使他困惑不已，他曾寫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降臨逼迫他「改變了自己對人性的看法：……在此之前，我曾以爲父母愛自己的孩子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但是戰爭使我相信這是少有的例外。我曾以爲大多數人對於金錢的喜愛幾乎超過了其他一切，但是我發覺他們更愛破壞。我曾以爲知識分子通常都熱愛真理，但是我再次發覺，在這些人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寧要真理不要出名」。這一忿忿不平的段落暴露出他對戰爭時期（實際上是任何時候）尋常百姓的情感活動是如此無知，幾乎是蔑視公論。他的多卷本的自傳及許多言論，都使一般讀者大惑不解：如此充滿智慧的人，竟然對人性視而不見。

說來奇怪，在別人身上，羅素完全能夠發現——並爲之感嘆——一種同樣的危險：同理論上的知識相結合的，是實際上對人民的感情和需要一無所知。一九二〇年他訪問了布爾什維克的俄國，並於五月九日與列寧會面。他發現列寧是「一種具體化的理論」。羅素寫道：「我有這樣的印象，他鄙視民眾，是一位知識分子貴族。」羅素清楚地看到這種結合不可能英明地統治，他進而加上了這樣的語句：「如果我與他（列寧）會面時不知道他是誰，我絕不會猜到他是個偉人，我會認爲他是一位固執己見的教授。」他不可能也不會明白，他對列寧的描繪在一定程度上也適合他自己。他也是一位知識分子貴族，他鄙視民眾，有時候也會對民眾施以憐憫。

此外，羅素不僅僅全然不知多數民眾的實際行爲，還極度缺乏自知，他也看不到反映在列寧身上跟自己相同的特點。更嚴重的是，他沒有發現自己正暴露在非理性的情緒化力量面前，對公眾中的這股力量，他本來是感到悲哀的。羅素的總體立場是，世界的種種弊端將主要依靠邏輯、理性和節制來解決。如果男人和女人服從理性而非情感，依靠邏輯而非直覺來討論問題，實行節制而非極度放縱，那麼就不會有戰爭，人際關係就會和諧，人類生存狀況也會穩步改善。作爲數學家，羅素的觀點是：純數學中沒有一個概念不能用邏輯的術語界定，沒有一個問題不能用理性的方法解決。他並沒有愚蠢到認爲解決人類的問題就如同解數學方程式，但是他仍舊相信，只要有時間、耐心、方法和節制，理性就能夠幫助我們解決大部分麻煩，無論這些麻煩是社會的還是個人的。他確信，完全有可能用一種哲學家的超脫態度來處理這些問題。首要的一點，他認爲只要確立了適當的理性和邏輯準則，那麼絕大多數人都能夠舉止得體。

但是，問題在於羅素反覆表明，在他自己的生活環境中，所有這些主張都建立在一個不穩定的基礎上。在每一個重要關頭，他的觀點和行爲不僅取決於他的理性，也取決於他的情感。一旦危機發生，邏輯就會被拋到九霄雲外；當個人利益受到威脅時，他也不敢保證自己仍能舉止得體。他的缺點還不僅於此，當他在宣揚自己的人道理想主義時，羅素將真理置於其他考慮之上，但在背後，他也會——更傾向於——試著跳出這樣的框框。當他的正義感被激怒，他的情緒被激發起來時，他對準確性的尊重就會瓦解。況且，從理論上來說，理性和邏輯的追求者們就應當符合理性和邏輯，而羅素發覺很難做到言行一致。

寧要戰爭不要共產帝國

讓我們追溯一下羅素有關於戰爭與和平——這是個偉大的主題——思想的發展。在這方面，他所投注的精力也許超過其他部分。羅素視戰爭為無理性行爲的極端範例，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及無數次小規模戰爭，他痛恨所有的戰爭，他對戰爭的厭惡完全出於天性。一八九四年，他與愛麗絲——史密斯（Logan Pearsall Smith）的妹妹——結婚，愛麗絲是貴格會教徒，她溫順的性格和她的宗教和平主義，使羅素的觀點更加堅定，並產生符合邏輯的（正如他自己發現的）變化。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他聲明反戰立場，而且竭盡全力在大西洋兩岸爭取和平，爲此他不惜危及自己的自由和專業。但是，導致他入獄的那些言論，並不像是促進和平的人或通情達理、節制穩健的人所說的。他爲和平主義辯護的主要哲學論述是《戰爭倫理學》，他認爲戰爭從來就不需要充分的理由，它本身已具備了足夠的邏輯性。但是，他的和平主義在當時及後來都找到了一種即使算不上爭強好鬥、至少也是高度情緒化的表達方式。比如，一九一五年國王喬治五世許下了戰時戒酒的諾言，羅素立即放棄了他根據愛麗絲的請求所接受的絕對戒酒主義。羅素寫道，喬治五世此舉的動機是「爲德國人的屠殺提供便利，由此一來，似乎和平主義與酒之間必定存在著某種連繫」。在美國，他將美國的力量視爲實施和平的手段，美國總統威爾遜是世界的救世主，羅素激動地懇求他，「承擔起捍衛人類的首要責任」來對付諸交戰國。他以待救世主的心情給威爾遜寫了一封信：「一種堅定的信念迫使

我代表歐洲所有的國家發言。我以歐洲的名義，懇求閣下爲我們帶來和平。」

也許羅素會痛恨戰爭，但有不少次他也愛上了武力。在他的和平主義中，有些東西就帶有挑釁、甚至好戰的成分。宣戰後，他就寫下了這樣的話：「幾個星期以來，我覺得如果我碰巧遇上了阿斯奎斯（Asquith，譯註：英國自由黨內閣首相）或格雷（Grey，譯註：英國外交大臣），我會忍不住想殺他們。」不久之後，他真的與阿斯奎斯不期而遇，當時羅素在游泳，當他一絲不掛地從水裡出來的時候，發現首相正坐在岸邊。此時的羅素怒火已經平息，他不再去殺首相了，反而與他討論柏拉圖——阿斯奎斯是一位傑出的古典學者。我曾爲著名的編輯馬丁（Kingsley Martin）工作過，他非常了解羅素的爲人，他常說，他所遇到的所有最好鬥的人都是和平主義者，並引羅素爲證。羅素的門生艾略特也說過同樣的話：「（羅素）認爲對殺人的任何寬恕都是很好的。」這並不意味著羅素對鬥毆有什麼興趣。但是，從一定意義上說，他是一個絕對主義者，相信有絕對的解決辦法。他只一次地重複著這個念頭：由一位大有爲的治國之才發起一場行動，爲這個世界帶來永恆和平的時代。

這個念頭首次湧入他的腦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的時候，當時他表示，美國應該利用自身的優勢力量堅決要求裁減軍備：「在美國，各種族混合在一起，又相對缺少國家傳統，所以這個國家特別適宜完成這項工作。」一九四五至四九年期間，美國成爲唯一擁有核武的國家，羅素的建議重新引起廣大迴響。由於後來羅素對自己在這一階段發表的言論盡力予以否認，或者含糊其詞，或者進行種種辯解，所以確定其細節和年代的順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正如他的傳記作者克拉

克 (Ronald Clark) 曾證實的那樣，羅素在若干年中，不只一次主張對蘇聯發動先發制人的預防性戰爭。與大多數的左派人士不同，羅素從未受過蘇維埃政權的欺騙，他一向徹底地排斥馬克思主義。他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一書中描繪了一九二〇年的蘇聯之行，並對列寧及列寧所做的一切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把史達林當做怪物，對斷斷續續傳到西方的消息，如強制性的集體化、大規模的饑荒、一次次清算、集中營等，他都認為是事實。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他完全不是先進知識分子的典型。一九四四至四五年，西方的先進知識分子已接受了蘇維埃在東歐大部分地區的統治，但羅素並沒有他們的那種滿足，在羅素看來，這是西方文明的災難。「出於理智，我無比憎恨蘇維埃政府」，這是他寫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的話。他深信只有武力威懾，或是進行戰爭，才能遏制住蘇維埃的擴張。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的一封信中，他斷言：「我認為史達林繼承了希特勒想要對世界進行獨裁統治的野心。」因而，當美國第一次對日本使用核武後，他馬上就重提昔日的觀點，認為美國應以強制性的手段為世界帶來和平和裁減軍備，可以用新型的武器脅迫頑抗的蘇聯。在他的眼裡，這是一個天賜良機，而且機不可失。這一策略的文章，他首次發表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在格拉斯哥出版的工黨雜誌《向前》和十月二日的《曼徹斯特衛報》上。他在十月二十日的《隊列》寫了一篇文章〈人類的最後一次機會〉，對這一論題做了進一步的闡釋，其中還意味深長地說道：「戰爭的藉口並不難找到。」

在五年多的時間裡，羅素反覆重申類似的觀點。一九四六年的七至八月間，他在《辯論者》上陳述自己的觀點。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他在皇家學會發表講話，刊登在一九四八年一至二月的

《聯合帝國》和一九四八年一月的《新聯邦》上。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他在帝國國防學院做了一次講座，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羅素一遍遍重複自己的觀點。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他出席了威斯敏斯特學校的學生討論會，他在會上的講話收錄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出版的《十九世紀及其後》上。一九五〇年三月，他在《國際瞭望》上又發表了一篇文章。羅素向來直言不諱，他在皇家學會的講話中提出結盟——勾畫出北約的輪廓——這是向俄國發出命令：「我傾向於認為俄國會默許；如果反對的話，只要我們迅速地採取措施，世界仍能從由此導致的戰爭中生存下來，並出現唯一的政府，正如這個世界所需要的那樣。」一九四八年五月，他寫信給美國裁軍專家馬賽博士說：「如果俄國在西歐橫行，那麼所造成的毀滅性結果將無法消除。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將會被送到勞動營，不是在西伯利亞的東北部就是在白海邊，在那種地方絕大多數人會死於困苦，而倖存者將會變成野獸。如果使原子彈，首先必然會投在俄國勢力範圍之外的西歐。即使沒有原子彈，俄國也會摧毀英國的所有大型城鎮……我從未懷疑過，美國將會贏得戰爭的最終勝利，但是，除非西歐能從侵襲中倖存下來，否則將會喪失幾個世紀的文明。即便要付出如此代價，我認為一段時間的戰爭也是值得的。共產主義一定會被掃除，世界政體一定會被確立。」羅素一再強調速度的重要性：「遲早有一天，俄國也會擁有原子彈，那時，事態將會更加嚴峻得多。所有的事情都必須盡快進行，要以最快的速度。」實際上，當蘇聯試爆了一顆原子彈，他依舊堅持他的論點，強烈要求西方必須發展氫彈。「我並不認為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下，達成限制原子戰爭的協議只會造成損害，因為每一方都會以為對方在躲避戰爭。」然後，他毫不妥協地提出了「死比赤化好」的觀點：「下一場戰爭如果要來臨的

話，將會是人類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最大災難。我唯一能夠想到更大的災難是：克里姆林宮的權力擴展到全世界。」

羅素主張的預防性戰爭眾所周知，這些年來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一九四八年，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國際哲學家代表大會上，羅素爲此受到了蘇聯代表科爾曼的強烈抨擊。羅素以同樣粗暴的語氣回應他：「回去告訴你那些克里姆林宮裡的主子們，他們必須派出更能幹的奴僕來實施他們的宣傳和誘騙計畫。」直到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他還在《紐約時報》的雜誌上說：「儘管一場新的世界大戰將會非常可怕，但就我個人而言，我倒寧願戰爭而不要一個全球共產主義帝國。」

很快就忘了堅持

然而，差不多就在這時，羅素的觀點突然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就在發表那番言論的第二個月，即一九五三年十月，他就在《國家》雜誌上否認自己曾「贊成對俄國發起一場預防性戰爭」。他寫道，所有的傳聞都是「共產黨人的杜撰」。據一位朋友的記載，有一度無論什麼時候對羅素提起他那些戰後的觀點，他都會堅持說：「這不可能！都是出於共產黨新聞記者的胡編亂造。」一九五九年三月，羅素接受了英國廣播公司記者福瑞曼的電視採訪，在一次著名的「面對面」節目中，他改變了方針，美國的裁軍專家們拿出了羅素早期言論的文字材料，讓他無法抵賴。福瑞曼問他有關預防性戰爭的方針，他對福瑞曼說：「這完全是真的，而我也沒有爲此而後悔。這與我現在的想法完

全一致。」

此後，他還給英國廣播公司的《聽眾》周刊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實際上，我已經完全忘了我什麼時候會想到過一種威嚇策略，包括一場可能的、合乎需要的戰爭。一九五八年科爾貝爾格先生和馬賽先生帶來了一些我在一九四七年說過的東西，提醒我注意，我驚異地讀了。我提不出辯解的理由。」在自傳的第三卷中，他大膽地做了進一步的解釋：「當我提出那些建議時，我並沒有在意，從沒有真的希望會被人聽從，所以很快我就忘了自己所提議的東西。」接著他又說：「我只在一封私人信件及一次講話中提到這些東西，我不知會成爲報刊評析的題材。」但是根據克拉克的研究，在好幾年的時間中，羅素在無數文章和演說中一再爲預防性戰爭申辯。令人難以置信，他能夠如此徹底地忘掉這一固執而又持久的態度。

羅素對福瑞曼說，他在一九五〇年代末對核武所持的觀點，與他在戰後對預防性戰爭的支持是一致的，他這是在以另一種方式濫用別人對他的輕信。說實話，大多數人都會說他在胡說八道。但是，這裡有著某種完全不同的一致——就是前後一致的極端主義。羅素所提出的預防性戰爭和「死比赤化好」兩個例子都是由於毫不帶感情、不顧慮人類地使用邏輯推理，將論證的理性界線推向極端的例證。這正是羅素的弱點所在。他重視邏輯命令的虛假價值，以此告誡人們應該如何行事，讓邏輯超越常識本能的要求。

從此，在五〇年代中期，羅素認定核武本質上就是邪惡的，無論在何種情形下都不應使用。他跟隨著邏輯學的女巫匆匆走向另一個方向——但是同樣的極端。他第一次宣布自己反對核武，是在

一九五四年一個關於比基尼島核試驗的電台節目「人類的危險」中；然後便是各式各樣的國際會議和宣言，羅素的路線強硬起來，他贊成不惜一切代價全面廢除核武。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在《新政治家》上發表了〈致艾森豪威爾和赫魯雪夫的一封信〉，提出他的建議。第二個月，當我檢查報紙的信件箱時，我驚訝地發現了一份冗長的翻譯材料，附了一封有赫魯雪夫俄文簽名的信。這是蘇聯領導個人給羅素的答覆。當然，這大半是宣傳，對蘇聯人來說，他們的常規部隊具備極大的優勢，他們一向樂於接受銷毀核武的協定（儘管不受監督）。這封信發表時確實造成了極大的轟動。後來，美國方面勉強傳來了回應，確切地說不是來自總統本人，而是他的國務卿杜勒斯。獲得如此顯要的對待，羅素很高興，他的另一個缺點——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他的判斷力——從不是他的特長——已經失去了效用。赫魯雪夫的回信廣泛同情他的立場，這不僅把他趕入極端反美的立場，也促使他將廢除核武作為自己生活的核心。他那托爾斯泰式的嚮往開始初露端倪。

第二年，即一九五八年，羅素被選為新成立的核裁軍運動的主席，這個溫和的團體是由聖保羅教派的科林斯、小說家普里斯特利等人策劃的。爲了反對製造核武，他們在英國爭取盡可能廣泛的輿論支持。這個團體組織了一些和平示威，嚴格遵守法律而贏得同情，早期留下深刻的印象，卓有成效。但就羅素個人而言，極端主義的種種跡象很快就顯露出來。克勞謝—威廉斯（Crawshaw-Williams）在這些年中對羅素的記述是最好的，根據他的日記記載，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羅素對斯特雷奇進行了一次啓蒙式的轟炸，斯特雷奇曾經是共產黨員，後來他成爲工黨下議院議員中的左派，在戰後的艾德禮政府中擔任國防大臣。儘管眾所周知斯特雷奇相信核武威脅，但是在一九

五八年，他已經離位很久了，沒有再擔任什麼職務。當羅素聽說克勞謝——威廉斯夫婦曾經與斯特雷奇住在一起，他就問起斯特雷奇對於氫彈的看法，得到回答後，他認為這些看法是威廉斯夫婦與斯特雷奇所共有的：

「你們和斯特雷奇——你們都屬於謀殺者俱樂部。」他一邊說著，一邊猛敲他的椅臂。他解釋道，謀殺者俱樂部是由一些根本不關心廣大民眾處境的人組成的。因為作為統治者，他們覺得由於他們有特權，他們會以某種方式活下去的。羅素說：「他們建造了私人防空洞來確保自己的安全。」

當被問到他是否真的認為斯特雷奇擁有一個私人防空洞時，羅素大聲表示：「是的！他當然有。」兩個星期後，他們對氫彈展開了進一步的討論，這場討論「開始的時候很平靜」，然後突然間，「出人意料地，羅素滿腔怒火地說：『下一次你遇見你的朋友斯特雷奇的時候，告訴他我根本就無法理解，為什麼他希望納瑟（後來成爲埃及的獨裁者）有氫彈？』……他認定像斯特雷奇這種人才真正地對世界構成威脅。」

羅素火氣越來越大，對客觀事實越來越缺少興趣，他把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一律歸結爲出於最卑鄙的動機。他也有偏執狂的跡象，這些在一九六〇年都公開地表現了出來，此時他分裂了核裁軍運動，成立了他自己的直接行動派系，稱之爲「百人委員會」，從事非暴力反抗。這個派系原先的發

起者包括了一流知識分子、藝術家和作家，其中不少人絕不是極端主義分子，但是不久就失去了控制。歷史表明，所有和平主義運動中，較好鬥的成分因缺乏進展而變得失望時，就會訴諸非暴力反抗和暴力行動。這毫無例外地標誌著有大批群眾隨從的階段結束了。「百人委員會」和以後核裁軍運動的解體是這種過程的典型例證。不管怎麼說，羅素的行爲只是加速了這一注定要發生的事實進程。他在這一時期的行爲，可以歸咎於他的新秘書蘇恩曼的影響。在下文中，我會就他與蘇恩曼的關係進行一番考查，但在此處很值得提及的是在核裁軍運動的危機中，羅素的言行始終非常獨特。導致他辭去主席職務的那次會議開得越來越令人不愉快，羅素指責科林斯動機卑鄙、滿口謊言，他堅持要在私人活動中用錄音機記錄。

極端的言論

確切地說，羅素一旦擺脫了科林斯和他的朋友的限制，極端主義就完全占據了他的思想，他的言論變得非常荒謬，除了那些最狂熱的信徒外，他排斥所有的人。他們以較平靜的語氣反對把他的想法作爲信念的基本準則。一九五八年，羅素在一篇關於伏爾泰的隨筆中寫道：「不必熱誠地堅持任何主張。沒有人會熱誠地堅持七乘八等於五十六，因爲大家知道這是事實。只有在推崇一種可疑的或者可以證明其錯誤的主張時，熱誠才是必需的。」從一九六〇年起，當羅素被激怒，對那些不贊成自己觀點的人義憤填膺時，他的許多言論不僅是熱情洋溢的，而且是蠻橫可惡的，常常是憑著

一時衝動脫口而出。由此，一九六一年四月間，他在伯明罕做過一次演說，在備好的稿子上有這樣的話：「純粹根據統計學來看，麥克米倫（Macmillan，譯註：一九五七至六三年間擔任英國首相）和甘迺迪比希特勒壞上大概五十倍。」這真是壞得可以，因為（且不論其他方面）這是拿歷史事實與尚未進行的計畫相比較。但是，根據記載，其實羅素真正要說的是：「我們過去常認為希特勒邪惡，那個時候他想要殺盡所有的猶太人，但是甘迺迪和麥克米倫不僅想要殺光所有的猶太人，還想殺光我們中所有剩下的人。他們要比希特勒邪惡得多得多。」接著他還說：「我不會裝作服從一個專門組織屠殺全人類的政府……他們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邪惡的人。」

要先承認羅素的前提，他的指控才有邏輯，甚至邏輯也是有選擇地使用的。有時，羅素想到所有擁有核武的強國都同樣罪惡地設計著大規模的屠殺，他的攻擊也包括了俄國人。因此在一九六一年的一封公開信中，發信地址是「布瑞斯頓監獄」。他在信中宣稱：「甘迺迪和赫魯雪夫、阿登納和戴高樂、麥克米倫和蓋茨克爾（Gaiskell）正在追求一個共同的目標：終結人類的生命……爲了讓他們高興，所有個人的情感，所有公眾的希望……都要永遠銷毀。」不過按照慣例，他把矛頭主要指向西方，特別是英國，更多的是美國。

這表明他是多麼地健忘，他痛恨的並不只是蘇維埃政權，而是俄國和俄國人本身。在戰後初期，他就一再說蘇維埃和納粹一樣壞，甚至比納粹還要壞。克勞謝——威廉斯記下了他的一些咆哮：「所有的俄國人都都是東方的野蠻人。」「所有的俄國人都都是帝國主義者。」他曾「甚至於打算說所有的俄國人都願意『匍匐在地上出賣他們的朋友』」。但是從五〇年代後期開始，反蘇情緒被他拋到了

腦後，與此同時強烈的反美主義日益占據他的思想。反美情緒對他而言根深柢固，並且以前就曾表露過。他的這種思想是上層階級老派英國人的那種傲慢和愛國主義所驅動的，他瞧不起暴發戶和生意人，同時也反映了自由主義的進步分子對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仇恨。他激進的父母所屬的那一代人，仍將美國與民主進步連繫在一起，他們於一八六七年對美國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訪問，根據羅素的記載，因為「那些希望改造世界的年輕人前往美國，想在那兒找到答案」。他還說：「他們無法預見那些男人和女人——他們為那些人的民主熱情而喝彩；他們欽佩那些人成功地推翻了奴隸制——其實就是處死薩柯（譯註：美國的義大利移民工人，與萬澤蒂被控殺人搶劫，電刑處死，此案曾引起世界公憤，被認為判決係出於政治偏見）和萬澤蒂那伙人的祖父母。」他自己也多次訪問美國，並在美國居住了好幾年，主要目的是賺錢：「我的手頭非常緊，我指望在美國重建自己的財富。」這是他在一九一三年寫下的，也是他一再出現的老調。他總愛挑剔美國人——一八九六年他第一次造訪美國就寫道：美國人「除了做生意，對於所有的事都難以形容的懶散」——然而，關於美國對世界的影響，他的觀點變化無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把威爾遜的美國當成世界的救世主。他失望以後，在二〇年代轉為強烈的反美方針。他認為社會主義——他當時所偏愛的——不可能在歐洲實現，「直到美國也轉變成社會主義，或者至少願意保持中立」。他指控美國「慢慢地摧毀中國的文明」，預言美國的民主政治將會崩潰，除非它能夠接受集體主義，他號召「世界性的起義」以反對美國的「資本帝國主義」。他斷言，除非「美國放棄對資本主義的信念」，否則就是「文明的徹底滅亡」。

二十年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他支持美國的軍事方針。但與此同時，他越來越不喜歡美國政治。一九五〇年末，他從美國回來，給克勞謝—威廉斯寫信說：「美國共和黨人的凶惡就如同他們的愚蠢，這可不得了。我告訴每個人，我發覺研究一個警察國家的氣氛是件有趣的事：我想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會在明年五月開始。」他和參議員馬格瑞芝打賭：麥卡錫將會當選總統。當羅素開始發起抗議氫彈的運動時，他的反美情緒已完全是非理性的，一直維持到他去世。關於甘迺迪的被殺，他將之發揮成一套幼稚的陰謀理論。接著，他厭倦了氫彈問題——與托爾斯泰一樣，他注意力集中的時間很短——他又轉向了越南，並組織了一個全球性的運動，詆毀美國在那裡的行動。

羅素由他的秘書蘇恩曼提供消息，很容易便成爲最放肆的謊言的犧牲品。半個世紀以前，他曾譴責協約國爲了煽起戰爭狂熱而利用了德國人在比利時犯下種種暴行的謠言；在《戰時的正義》一書中，他又盡力揭露這些謠言中有許多是毫無根據的。在六〇年代，羅素利用自己的聲望散播並聽信來自越南的各種傳聞，其實這些傳聞已不那麼動人，其目的完全是爲了激起對美國的仇恨。這種策略在他組織的「戰犯法庭」上達到極致，最後還在斯德哥爾摩對美國進行了宣判。對這個宣傳活動，他還很容易地招募到一批適用的知識分子，如多伊車爾 (Isaac Deutscher)、沙特、西蒙波娃、南斯拉夫作家戴蒂柴 (Vladimir Dedijer，由他擔任主席)、一位墨西哥的前總統，還有一位來自菲律賓的桂冠詩人。但是，他們甚至沒有裝扮成正義或公平，因爲羅素自己說他這麼做就是要審判「戰犯約翰遜、羅斯克、麥克納馬拉、洛奇及他們的共犯」。

作為哲學家，羅素始終堅持一定要謹慎地使用語言，要使用其準確的含義。身為人類顧問，他在自傳中坦承：「在描述一個你發現不可容忍的事物時，就把它描述得令人厭惡，讓別人同你一樣憤慨。」這個難以理解的招供，竟出自一個以對問題的冷靜分析為職業、把自己的旗幟懸掛在理性旗杆上的人之口。而且，他激怒別人的企圖也只對以下這些人才起作用：憤慨無足輕重者或無論如何已在發怒者。羅素說，在美國「沒有人敢在做出一番政治評論前，不先看看門後確實無人在偷聽」，沒有一個明智的人會相信他的話。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他說「很可能在一個禮拜內，你們所有的人全都死去，好讓美國那幫瘋子高興」，這樣的話只能損害他自己，而不是甘迺迪總統。當他說在越南的美國士兵「和納粹一樣壞」時，他的擁護者就越來越少。

應該說，縱觀羅素的一生，他給人印象最深的其實是不停地爭論，而不是作為一位格言家。他的選本《格言錄》讀起來並不比托爾斯泰的好多少。「所謂紳士，就是他有一位年收入超過一千英鎊的祖父。」「你永遠不可能使非洲的民主政府運轉起來。」「兒童應該被送往寄宿學校，讓他們脫離母愛。」美國母親們的「過錯在於天生就不勝任。愛的源泉似乎已經乾涸」，以及「對待生活的科學態度幾乎不可能從女人身上學到」。

上面最後一句話是一種提醒：儘管羅素生命的最後幾十年幾乎只與政治聲明連繫在一起，但是他曾一度由於對兩次大戰間的話題所發表的評論而變得更加聲名狼藉，諸如試婚制、自由性愛、離婚改革和男女同校制。至少在理論上，他贊成女權論的倡導者們所做的闡釋。他主張婦女在婚姻之內和婚姻之外的平等，並把她們描繪成陳腐、無真正倫理基礎的道德體制下的犧牲品。人們應該享

有性自由，他嚴厲批評了「當成傳統『美德』流傳的清規戒律，以及人類自我犧牲的種種理論」。在他對婦女、社會生活、兒童及人際關係的看法中，有許多仿效了雪萊。事實上，他特別鍾情於雪萊，他說雪萊的詩句最能表達出他對生活的態度。他定居於威爾斯，一八一二至一三年間，雪萊曾嘗試在那兒建立社區。他在波特馬多（Porthmadoc）海灣對面的住宅帕拉斯朋因（Plas Penrhyn）與雪萊的朋友麥多克斯的房子出於同一位建築師之手。

給予性冒險的自由

然而，羅素對婦女的實際行爲並不總是與他的理論原則相一致，這一點與雪萊也很相似。他的第一任妻子愛麗絲是美國貴格會教徒，溫柔、體貼、大方，但她正如雪萊的哈麗艾特一樣，成爲丈夫放蕩行爲的受害者。像我們已經注意到的，羅素從小家教甚嚴，直到二十多歲時，他對待性問題仍是頗爲古板的。甚至於一九〇〇年他的兄弟弗蘭克（第二代伯爵）遺棄了自己的結髮妻子，再婚時，羅素不承認他的新婚夫人，還暗示弗蘭克別把她帶到餐桌上（後來弗蘭克在上議院的法庭上被指控犯了重婚罪）。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羅素變得很像過去的雨果，越發好色起來，越發不願遵循社會規範，除非他覺得這些規範對他有用。

一起生活十六年之後，愛麗絲實際上被拋棄了，一九一一年三月十九日，羅素在貝德福德廣場四十四號奧托琳夫人的寓所裡，拜訪了充滿活力的布盧姆斯伯里的女主人。羅素意外地發現奧托琳

的丈夫菲利普外出了，便與她做愛。在羅素的描述中，那天晚上他並沒有與奧托琳夫人有過「完全的關係」，但是他下定決心要「離開愛麗絲」，並讓奧托琳夫人「離開菲利普」。奧托琳可能覺得或認為「這種事對我無關緊要」，羅素卻確信這個丈夫「會把我們倆全殺了」，不過他又「願意為那天晚上發生的事付出代價」。羅素馬上把這一消息傳給了愛麗絲，她「勃然大怒，還說堅決要離婚，並把奧托琳的名字也牽扯進來」。經過幾番爭吵，羅素「堅定」地說，如果她威脅，「為了制止她，我會去自殺。」隨即，「她的憤怒變得無法忍受。在她大吵大鬧了幾個小時之後，我給她的侄女上了一堂關於洛克哲學的課。」羅素關於考慮自己個人私利的說法與愛麗絲的實際行為不符。愛麗絲對他始終極其克制和溫和，確實懷有深厚的感情，她同意去和她的兄弟住在一起，以方便羅素與奧托琳夫人相處，只要遵守公開場合的某些禮儀原則，她就默許他倆的關係。愛麗絲一直將離婚推遲到一九二〇年五月，之後，她仍愛著羅素。當三一學院剝奪了羅素的研究員資格時，她寫信說：「我已經存了一百英鎊要投資到公債中去，但是如果可能的話，我寧可把這筆錢都給你，因為我擔心這種迫害會嚴重影響你的收入。」在羅素入獄期間，她說：「每天我都帶著最深切的悔恨思念你，幾乎每個晚上我都曾夢見你。」羅素直到一九五〇年才與她再次會面。

與愛麗絲的分手伴隨著大量的謊言、欺騙和虛偽。羅素一度刮掉了自己的鬍鬚，為的是在同奧托琳夫人秘密約會時掩蓋身分。當羅素的朋友們發現正在發生的事情時，都極為震驚：羅素可是一向標榜自己的誠實和坦率的。這段情節帶給了他一生中一段性混亂時期。他與奧托琳夫人的關係並不令人滿意，根據他的敘述：「我那時罹患膿溢症，自己並不知道，病情影響到我的呼吸，我自

己也不知道。她也從來不願提到。」這樣他們的關係便冷淡下來。一九一三年他在阿爾卑斯結識了「一位精神分析學家的夫人」，「希望和她做愛，但我想應該先向她解釋一下奧托琳的事。」那位夫人聽了有關於目前這位情婦的情況後，沒有表現出多少興趣，但是她「可以斷定，不管怎樣，總有一天她（奧托琳）的種種缺點會被忽略的」，羅素「此後再沒有見過她」。

接下來，一九一四年在芝加哥，羅素與一個年輕女子又發生了一段有損名譽的故事。海倫是一位著名的婦科專家四個女兒中的一個，羅素在講學的時候會跟他們住在一起。按照羅素的話：「我在她父母家住了兩個晚上，只與她單獨待了片刻。她的三個姐妹為我們站崗，她們的父母有誰走過來，她們就會發出警報。」羅素安排她在那個夏天到英國來，並公開與她住在一起，他將離婚的事擱置在一邊。羅素寫信給奧托琳夫人，告訴她所發生的一切。然而，與此同時，奧托琳夫人聽說他已經把自己那糟糕的呼吸器官治好了，便對羅素表示希望重續舊好。總之，海倫抵達倫敦的時間是一九一四年八月，此時已經宣戰了。羅素決定反對這場戰爭，而且「我不想讓自己的立場摻雜私生活醜聞的成分，這將使我所說的一切都變得毫無價值」。於是他告訴海倫，他們的小小計畫中止了，「我不時與她發生關係」，但是戰爭「扼殺了我對她的激情，我傷了她的心」。他的結論是：「她是一種罕見疾病的受害者，這種病先是使她氣餒，然後使她精神失常。」關於海倫的事就到此爲止了。

在此期間，羅素又擄獲了另一位情婦，使得他的立場複雜起來。這位情婦名義上是康斯坦斯夫人，其實是交際花，以科萊特的名字逢場作戲。他們一九一六年相識。當他們第一次承認戀愛時，他們說，他們「沒有上過床」，因爲「有太多的話要說」。兩人都是和平主義者，第一次做愛時，

「我們突然聽到街上傳來一陣野獸般的狂歡聲。我從床上跳下來，看見一艘齊柏林飛艇（Zeppelin）跌落在火焰之中。勇敢者正在極度的痛苦中死亡，正是這種思想引起了街上的喧囂聲。在那一刻，科萊特的愛是我的庇護所。不是逃避殘酷的事實，那是逃避不了的，而是逃避認識到人是什麼所帶來的極度痛苦。」

巧的是，羅素的極度痛苦很快就過去了，而康斯坦斯夫人卻在幾年中忍受著痛苦的煎熬，她只要能與奧托琳夫人一塊分享羅素就心滿意足了。羅素被關在監獄期間，她們隔週輪流去探望他。據康斯坦斯夫人的理解，奧托琳夫人更願意留在她自己的丈夫身邊，如果羅素的離婚手續辦妥，康斯坦斯夫人就能夠擁有他了。因此，一九二〇年五月康斯坦斯夫人提供了能使羅素獲得中間裁定（譯註：指離婚訴訟中的中期判決，附有一定期限，如過此期限無人提出異議，離婚方可生效）的「證據」。然而羅素這時又投入了另一位更年輕的女子懷抱，這次是一位頗為解放的女權主義者，名叫多拉，羅素讓她懷了孕。她並不想結婚，因為她不贊成婚姻制度，但羅素不想讓「他的處境變得更複雜」，堅持要結婚。羅素的毫不妥協取得了成功，他們舉行了儀式，並在孩子出生之前「空出了六個禮拜的時間」。這樣一來，康斯坦斯夫人便被拋出局，而多拉則被逼進了她稱之為「羞恥而又丟臉的婚姻中」。

此時的羅素是一個五十歲的男人，他迷戀於多拉「小妖精似的魅力」，喜歡「沐浴著月光或是光著腳走過露濕的草地」。對她來說，當羅素說到軍國主義者在他家塗寫「那個……和平怪人住在這兒」，而且「每個字」都正確，就會激起她的好奇心。很自然，羅素不會稱所有人的心。這時他漸漸

發出尖利的呵呵笑聲，艾略特（他在劍橋的門生）形容爲如同「啄木鳥的叫聲」；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認爲更像是鬣狗的叫聲。他穿著老式的黑色三件套裝，很少更換（他難得同時有超過一套的服裝）。他帶鞋罩，衣領高而挺，很像他的同代人柯立芝。韋布（Beatrice Webb）的日記中曾寫道，在羅素的第二次婚姻中，他是個「相當邋遢、病態而又玩世不恭的人物，一個不成熟的老人」。但是多拉喜歡他那「濃密而且非常美麗的灰頭髮……在風中豎起，大而挺的鼻子，還有那奇特的小下巴，長長的上唇」。她注意到他的「寬而短的雙腳向外拐」，看上去「確實像個瘋漢」。她想——這是她命中注定的願望——「使他免受自己不諳世故之累」。

他們有兩個孩子，約翰和凱特。一九二七年他們在彼得斯費德（Peterfield）附近的燈塔山開辦了一所實行漸進教育法的學校。他對《紐約時報》說，理想的「合作組織由大約十個家庭組成」，把他們的孩子「集中在一起」，由他們「輪流看顧」；每天上「兩個鐘頭的課」，課程「均衡合理」，剩下的時間「自由支配」。燈塔山學校就試圖將這種理論付諸實施。但是，這個學校需要耗費巨資，爲了支付各種帳單，羅素被迫寫些粗製濫造的東西。此外，與托爾斯泰一樣，他很快厭倦了學校的日常事務，就把學校丟給了多拉。多拉以她於極度的革新觀念，用更強烈的責任感管理。

我的妻子們有一半是美國人

他們也爲性問題爭吵。韋布夫人早就預言，羅素娶的是「一個性格輕浮、具有唯物主義哲學觀

的姑娘，他不會也不可能尊重她，這段婚姻注定會失敗」。還有一點，羅素與托爾斯泰一樣堅持「坦誠」原則。對此多拉也贊同：「羅素和我……相互給予性冒險的自由。」當多拉成爲「世界性改革同盟」英國分部的秘書時，羅素沒有反對。甚至，她出席在柏林舉行的「國際性問題代表大會」，與變性手術的先驅赫爾斯費德博士、浮誇的婦科專家海爾在一道時，羅素也沒有表示異議。不過，當她公開與新聞記者巴里有染，並生了兩個孩子時——按照羅素的觀點，十八世紀的輝格黨貴婦常常與不同的男人生子——這時，羅素還是感到很不舒服。多年後，他在自傳中承認：「我在第二次婚姻生活中，曾盡力維持對妻子自由的尊重，我原以爲這種自由是我的信念所樂於接受的。但是我發現無論怎樣，我的寬宏大量和也許稱得上是基督徒式的愛與我正產生的需要並不相等。」他還說：「儘管別人已經預先向我提醒過，但我卻被理論所蒙蔽。」

關於羅素自己，某些事情他略去不提。這有悖於他的坦誠原則，這類事都是偷偷進行的。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儘管知識分子每每試圖將性生活完全公開，但最終總是因某種程度的內疚感而保守秘密，即便在典型的通姦家庭中也是如此。後來多拉曾談到她如何被一個激動不安的廚子叫回他們在康沃爾的度假屋時，那個廚子堅決不讓家庭女教師接近主人的兩個婚生孩子，因爲她已經「和男主人一塊睡過覺」（這個可憐的廚子被解僱了）。許多年之後，多拉也發現，當她不在家的時候，羅素爲了性愛的需要，也讓他的老情人康斯坦斯夫人留宿家中。最後多拉帶著新生的孩子回到家，得到一則令人不愉快的消息：「羅素給了我極大的震驚，他告訴我他現在已經移情別戀於瑪傑麗。」瑪傑麗是牛津大學學生，是在假期裡來看顧約翰和凱特的。羅素夫婦想在法國西南部度一次

四人參加的假期，夫婦兩人都帶上各自的情人。前年羅素他那無子女的兄長一過世，就讓他成了伯爵，這樣一來，情況就不同了，更顯得氣派十足。瑪傑麗急於得到一樁正式的婚姻，於是羅素就把她帶到家中生活在一起。震驚的多拉說：「起先我根本就無法相信羅素居然會對我做出這樣的事情。」她又說，這種事是「無可避免的」，「這種男人一生中會傷害許多人」；但他「悲劇性的缺點」是他「很少感到歉意」，「儘管他熱愛民眾並為他們的苦難而痛苦，但他依舊遠離他們，因為他身上有貴族氣質，同普通人缺乏連繫。」

多拉從慘痛的教訓中發現，當羅素拋棄妻子而接納另一個的時候，他絕非「不諳世故」。同他那個階層的其他有錢男人一樣，他迅速僱用了一批精明能幹的律師，全權委託他們為他獲取他所想得到的東西。這場離婚官司極其複雜和艱辛，耗時三年之久，主要是因為最先這對夫妻簽署了一份分居契約，承認雙方都有通姦行為，並一致同意雙方在任何訴訟中都不援引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曾犯下的婚姻過失。但實際上，這只不過使離婚更加困難，更加混亂，也使羅素的律師更有幹勁。雙方都渴望得到他們那兩個公認的孩子的監護權，結果是羅素成功爭取到，就像雪萊可憐的子女。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的律師們讓一個僱於羅素、被多拉從學校中解僱的司機做了一份證詞，大意是：多拉經常喝醉酒，在她的房裡有破碎的威士忌酒瓶，還同她父親和訪客睡在一起。羅素也非毫無損傷，一九三五年最後的判決下來了，離婚法庭庭長宣布說，在多拉紅杏出牆之前，「她丈夫至少就有兩例私通，而且實際上他還犯有大量的通姦罪……被告同與住在一屋中的人通姦，或是忙於相互占有。」關於這場漫長而又充滿怨恨的爭辯，讀過各種不同的敘述後，人們不能不同

情多拉，自始至終她都忠於自己的準則，這正好和羅素形成了對比，羅素一旦發現準則對他個人有所不便，便棄之不顧，然後就完全求助於法律的力量。原先多拉從未想到過結婚，而「直到一九三五年三月，我才最終擺脫了法定婚姻。我已是三十好幾了，離婚耗費了我一生中的三年光陰，使我遭受了眾多不幸，我永不會從此事中徹底地復原」。

羅素與第三任妻子瑪傑麗的婚姻維繫了十五年的好光景。他簡單地說道：「一九四九年當我的妻子決定不再需要我時，我們的婚姻就走到了盡頭。」在這段使人產生誤解的聲明背後，有長長一段關於他的種種卑劣的通姦故事。羅素向來不是一個積極搜索捕獲女性獵物捷徑的登徒子，但他會毫無顧忌地引誘任何女人上鉤。更確切地說，對於老練的姦夫在尚未開放的年代裡所必須掌握的各種伎倆，羅素確實是箇中高手。例如，有一次他寫信給奧托琳夫人說：「……對妳而言，最保險的方案就是到車站來，在月台車頭的候車室等我，然後隨我上一輛出租車到某家旅館，並與我一同進去。這種方法比其他計畫的風險要小，而且也不會引起旅館老闆的懷疑。」三十年後，他將這類經驗主動告訴給胡克：「胡克，如果哪一天你帶了女人來到旅館，而服務生似乎對你們起疑，當他報給你房間價格時，你就讓那位女生高聲抱怨：『這也貴得離譜了吧！』這樣，他肯定會認為她是你的夫人。」不過羅素通常更願意把他的女人們帶到家中，這樣辦起事來更容易。一九一五年，他把自己在倫敦拜瑞街的公寓提供給艾略特及其妻子維維恩作為臨時住所，艾略特曾是他的學生，手頭正拮据。這位詩人稱羅素為阿波里奈斯先生（Mr Apollinax），「無需承擔責任的嬰兒」。當他那「枯燥而又激昂的談話耗盡了一個下午」，他就如同「聽到半人半馬的怪物在草地上的腳步聲」。但艾

略特仍是一個輕易信賴別人的人，他常常把妻子單獨留給那個「半人半馬的怪物」，以及他那充滿激情的談話。關於以後所發生的事情，羅素對他的情婦們所說的話自相矛盾。他對奧托琳夫人講，他和維維恩之間是柏拉圖式的調情；他向康斯坦斯夫人供認，他曾和她做愛，不過經驗「可怕而又討厭」。事情的真相很可能與他這兩種敘述都相去甚遠。也許是羅素的行為造成了維維恩的精神負擔。

羅素的受害者通常是身分卑微的人：家庭女僕、保姆，或是經過屋子的隨便哪位年輕、漂亮的女性。胡克教授在描述羅素時斷言，這正是他第三次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胡克說他有「充分的證據」證明羅素「不顧年事已高，仍在追逐他遇到的每一個穿裙子的人，甚至年輕的女僕。他幹這類事臭名遠揚，還當著瑪傑麗和客人的面」。瑪傑麗離開羅素又回來，不過羅素拒絕立下忠於婚姻的誓言，最終她決定絕不再蒙受羞辱。一九五二年羅素離婚，這時他八十歲，然後又娶了一位來自布萊恩莫爾學院的教師伊迪絲，他們已經相識好幾年了，他的餘生都是由她照料。當他被指控反美時，他會瀟灑地回答道：「我的妻子們有一半是美國人。」

就理論而言，羅素同二十世紀婦女解放運動同步；就實踐而言，他仍根深柢固地停留在十九世紀，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畢竟，當老女王去世時，他差不多已經三十歲——他傾向於把女人看成是男人的附屬品。多拉寫道：「別看他提倡婦女的投票權，羅素並不真正相信婦女能與男人平等……他認為男性的智力優於女性。他曾對我說，他通常覺得駁倒女性是必然的。」在他內心深處，他似乎認為妻子們的首要職責就是為丈夫生兒育女。他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有時他試圖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到他們身上。但是，與他的英雄雪萊一樣，他那強烈的占有欲中混雜著冷漠。多拉曾埋

怨說，他變得「根本不了解他們的問題，而完全專注於自己在世界政治中擔任的角色」；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他「作爲一個父親是失敗的」。正如許多知名的知識分子那樣，人們——包括孩子和妻子們——往往會變成他思想的奴僕，並且是他自我實踐的奴僕。羅素在許多方面是一位正派、慈祥而又有教養的男士，能做出極其慷慨無私的姿態，他缺少馬克思、托爾斯泰或易卜生那種堅定的聚精會神，但他具有剝削性，尤其是在與女人們的關係上。

替身

他所剝削的對象並不僅限於女人，蘇恩曼就是個很有趣的例子。蘇恩曼是個美國人，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和倫敦經濟學院的畢業生，一九五八年加入核裁軍運動。兩年後，也就是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寫信給羅素談了他的一個計畫：成立非暴力反抗組織，作爲運動的一翼。這位老人被迷住了，鼓勵蘇恩曼來見他，結果發現這位年輕人很討人喜歡。蘇恩曼的偏激與他的觀點正好一致，他倆之間的關係非常類似於老托爾斯泰與切爾特科夫的關係。蘇恩曼成爲羅素的秘書和組織者，實際上到了一九六〇年，他已成爲這位預言之王的宮廷中的首相。更確切地說，有兩個宮廷，一個在倫敦，是羅素公開活動的中心，另一個是位於北威爾斯一個半島上的住宅。這個半島是個迷人的義大利村落，由富有的左翼建築師威廉姆——埃利斯建造，周圍絕大部分土地都歸他所有，他的妻子艾姆阿貝爾是斯特雷奇的姐妹，也是一位著名的史達林擁護者，她還寫了一本書宣傳白海運河的開掘

(據目前所知，這是靠奴工建造的)，這是在三〇年代的黑暗歲月中出現的最令人反感的文獻之一。很多富有的革新主義者，比如克勞謝—威廉斯、凱斯特勒、斯萊特 (Humphrey Slater)、軍事科學家 (後來成爲爵士) 布萊克特 (P. M. S. Blackett)，以及經濟史學家波斯坦 (M. M. Postan) 都定居在這個宜人的地區。他們在這兒享受生活的樂趣，謀劃社會的太平盛世。羅素是他們的君王，除了當地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來自世界各地的一大群朝聖者蜂擁而至，他們來此尋求智慧和贊同，正如他們的前輩曾前往雅斯納雅波良納，在托爾斯泰那裡尋找同樣的東西。

羅素很樂意對倫敦進行令他大出風頭的短暫訪問，去發表演說、遊行示威、被捕、給英國國教製造麻煩。但他更喜歡威爾斯的生活，而且，對他來說，最爲方便的是有蘇恩曼這個不領報酬而又忠心耿耿、狂熱的代理人在倫敦爲他管理事務。於是，蘇恩曼充當著羅素這位蘇丹的大臣，共計六年。一九六一年九月羅素被拘捕時，蘇恩曼與羅素一同進了監獄；蘇恩曼被釋放是在十一月，內政部要把他當成不受歡迎的外國人驅逐出境，一大批著名的進步人士簽署了一份允許他留下來的請願書，政府於是讓步。後來，當蘇恩曼似乎要完全控制羅素的思想，就像切爾特科夫對托爾斯泰那樣時，這些當初爲他求情的人士這時便感到十分懊悔。有時，老朋友要與羅素通電話都是件困難的事：因爲電話都要先經蘇恩曼，他只答應傳話。羅素寫給《泰晤士報》的許多信，以及以羅素的名義送往報社的時事評論，蘇恩曼都被指控是真正的作者。蘇恩曼自己也鼓舞羅素對他的信任，他聲稱「自一九六〇年以來，每個冠以羅素名義的重大政治動議，都是我的思想和行動的成果」；他說，有人認爲這位老人已經「被一個陰險的青年革命者所左右」，這種看法至少有「部分的真理」。

蘇恩曼必定處理過「百人委員會」、「越南戰犯法庭」，以及設立「羅素和平基金會」的大量事務。六〇年代期間，羅素的倫敦總部變得像是個微型外交部，發送過不計其數的信件和電報給各國總理和國家首腦——中國的毛澤東和周恩來、蘇聯的赫魯雪夫、埃及的納瑟、印尼的蘇卡諾、埃塞俄比亞的塞拉西、塞浦路斯的馬卡里奧斯三世等。當這些信件變得越來越長、越來越頻繁、越來越無節制時，被打擾者做出答覆的也越來越少。他們還公開評論國內事務，以致報社及時停印這些胡鬧的舉動。

那些與羅素失去連繫的老友猜測蘇恩曼是所有這些公文的作者。毫無疑問，他確實寫了其中的許多篇，但並非什麼新鮮事。羅素很有可能讓其他人以他的名義寫文章，如果他對那個問題沒有太大興趣的話。一九四一年胡克埋怨一篇在《魅力》上題為〈如果妳和已婚男士墜入愛河時該怎麼辦？〉的文章，署名是羅素。羅素承認他從中得到了五十美元，文章是妻子所寫，他只是簽名。沒有證據顯示蘇恩曼的作品嚴重歪曲羅素的觀點，因為羅素的觀點正好和他的秘書一樣激烈。根據檔案，蘇恩曼更改並加強了羅素原文中的某些段落，也有可能按照羅素口述進行（古巴導彈危機的聲明很可能就是這種情況）。當羅素克制住情緒時，他總是容易背離事先準備好的比較溫和的原稿。如果以他的名義發布的聲明中，有許多今天看起來有點幼稚的地方，那就必須記住，一九六〇年代是幼稚的十年，而羅素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常會耍小孩脾氣，尤其晚年，例如，他公開安排了一個特殊儀式，為的是見證他撕毀自己的工黨黨員證。在一次招待會上，當首相哈羅德·威爾遜伸出手臂走近他，口中稱呼著「羅素爵士」時，這位老伯爵卻故意惹人注目地把手放在口袋

裡。事實非常清楚，正如他的傳記作者克拉克強調的，與當時一些人的看法相反，羅素從來沒有變衰老。他任由蘇恩曼行事，但他依舊強有力地控制著最後一著。

事實上，當他認定蘇恩曼不再適合他的目標時，便表現得非常無情。他並不反對蘇恩曼的極端主義，但他不喜歡任何人偷去公眾對他的注意力。蘇恩曼以「羅素伯爵的私人代表」的名義多次到國外旅行，引起了很多麻煩：在中國，他勸告民眾不要服從政府，周恩來爲此十分生氣，向羅素提出抗議；一九六五年七月在赫爾辛基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上，蘇恩曼有些極其引人注目的不當行爲，羅素收到了主辦者一份憤慨的電報：「你的私人代表的發言引起了騷動，聽眾強烈不滿。大會非常激憤，基金會名聲掃地，你有必要否認自己與蘇恩曼及他的發言有關。親切的問候。」接下來又發生一九六六至六七年間越南戰犯法庭的長期爭吵。一九六九年，羅素九十七歲，蘇恩曼烏盡弓藏，就被打發走了。七月九日，羅素進一步在遺囑中免去了蘇恩曼的執行遺囑和受託人的資格，在這個月的中旬，他們的關係徹底斷絕。兩個月後，羅素又免除了蘇恩曼在「羅素和平基金會」中的董事職務。十一月，他向他的第四位妻子伊迪絲口授了一份闡述他和蘇恩曼關係的七百字聲明；聲明由伊迪絲打字，羅素在每一頁簽上自己姓名的第一個字母，語氣像是輝格黨文章，居高臨下，不容辯解，結尾是：「蘇恩曼妄自尊大。我認爲，對於蘇恩曼，我從來沒有認真照他所希望於我的那樣去看待他。早先我喜歡他，但我從沒有把他看成一個有才華、有影響和舉足輕重的人物。」這種話有點像羅素在處置他不再具吸引力的妻子時一樣。

「合邏輯的廢話！」

羅素之所以長時間用蘇恩曼，原因之一就是擅長用羅素自己感到厭惡的方法獲取資金。羅素一向熱中於金錢：賺錢、花錢，並公正地分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羅素不想擁有自己繼承的一家工程公司的三千英鎊股票，當時這家公司在製造戰爭武器，他便把這些股票交給了貧困的艾略特；他回憶道：「幾年後，當戰爭結束時，（艾略特）不再貧窮了，他又把股票交還給我。」羅素經常贈送奢侈的禮物給別人，尤其是女人。他也會吝嗇和貪婪，胡克認為他的主要過錯是虛榮和貪婪：在美國，羅素常常會寫「垃圾」文章，或為他沒經多少思考的書寫序，目的僅是爲了賺點錢。羅素爲自己辯護，他首先歸咎於那所學校——每年要花費他二千英鎊；其次是他的妻子們——第三個妻子奢侈浪費，他們離婚後，一九五〇年他所得到的——一萬一千英鎊諾貝爾獎金中，有一萬英鎊落到了她手中，他因此不得不去掙大量的錢，節約度日，還需要兼付兩份贍養費。當他想到自己有大筆的收入，他會爲此高興，所以他不時會細細查閱他的小筆記本。克勞謝——威廉斯在日記中寫道：「他喜歡我們要他娓娓道來他現在所賺到的收入。」他特別津津樂道於一九六〇年被授予的丹麥桑寧獎（Danish Sonning Prize），價值五千英鎊，免稅，他欣喜若狂：「沒有附加稅，淨收入！」他告訴克勞謝——威廉斯，他在丹麥只待兩天：「我們就是來這兒撿錢的，然後就直接回去吧。」

蘇恩曼被證實是優秀的財政部長，他會在羅素的信件中放入小紙條，寫著：「如果你相信羅素

爲和平所做的工作是有價值的，也許你會願意在經濟上支持他……這張便條是由他的秘書塞入的，羅素爵士本人壓根就不知情。」對於那些來信要求羅素親筆簽名的人，他收費三英鎊（後來減到二英鎊），新聞記者一次採訪權要付一百五十英鎊。羅素肯定知道這種勒索，因爲他收到了大量對於蘇恩曼這種美國式資金籌集方法的抗議，但他卻默許之，而且批准蘇恩曼的兩個方案。其一，蘇恩曼不顧羅素的老式出版商安溫先生的建議，拍賣羅素自傳的美國版權——這種交易方法在當時尚未有人採用——拍賣價對當時來說幾乎是天文數字：二十萬美元。其二，像布萊希特一樣，羅素積累了大量的私人檔案，蘇恩曼也爲此獲益。與同時代的邱吉爾一樣，羅素是最先意識到名人書信的經濟價值的人之一，而且保存了他所收到的全部名人來信（加上他寄出信件的副本）。到六〇年代，他的私人檔案中已存有二十五萬份文獻，被稱爲「英國個人同類檔案中最重要」。蘇恩曼是宣傳能手，他用兩輛裝甲車把檔案運到倫敦，之後賣給了加拿大大安大略省漢密爾頓市的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得到二十五萬美元。蘇恩曼的妙策是創立和平基金會，根據大西洋和平基金會的先例，羅素這個基金會獲得了免稅的慈善機構的地位。羅素洋洋自得地說：「這大違我的本意，我的同僚一定要在這個基金會上加上我的名字。」在他的晚年，他能夠把大筆款項投入所有他喜歡的事業，他既明智又愚蠢，他得意於有大筆收入，也盡可能合法地節稅，當蘇恩曼創立了這一巧妙的機構後，請他走路的門卻打開了。羅素，還有他的朋友威廉姆——埃利斯受到指責說，他們既是有錢人又是社會主義者，但爲什麼他們沒有一個人把財產散發掉呢？羅素有備而來：「恐怕你誤解了。威廉姆——埃利斯和我都是社會主義者，我們不會假裝成基督徒。」

一個是實現自我正義的進步世界，一個是特權世界，從這兩個世界中得其所需，這種技能是貫穿於許多重要知識分子一生的主題，在這方面沒有人能超過羅素。就算他沒有積極追求，他也絕不拒絕血統、聲譽、關係和頭銜帶給他的好處。比如，一九一八年博街地方法官判他二級罪服刑六個月（苦役）的時候，經過上訴，改判為一級罪，庭長宣稱：「如果羅素這樣一位享有很高聲望的人以這種方式關起來，使他的能力不能得到充分發揮，將是國家的重大損失。」在自傳中，羅素自述，對他的寬大應歸功於一位哲學家同行，即當時的外交大臣：「在貝爾福（Arthur Balfour）的居中干預下，我被定在第一級，於是在監獄的時候，只要不進行反戰宣傳，我就能夠隨心所欲地讀書和寫作。我發覺監獄在許多方面還是頗令人愉快的。」在布瑞斯頓期間，他寫《數學哲學導論》，並開始寫《心靈的分析》。他還能夠讀到最新的圖書，包括斯特雷奇顛覆性的暢銷書《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名人傳》，這本書令他笑得「如此響亮，以至於看守走到我的單人牢房前，要我謹記監獄是懲罰人的地方」。與顯貴人物關係稍遜一些的其他和平主義者，如莫奈爾（E. D. Morel），在第二級監禁中都損壞了健康。

羅素還會為一些小惠高興，諸如透過蘇恩曼的安排，從公共圖書館借到的驚悚故事超過限量的時候。羅素貪婪地閱讀了大批偵探小說，就像他們那一代劍橋大學的知識分子一樣（他的老同事麥克泰戈特〔J. E. McTaggart〕一週要看三十冊）。這時他沒有對特權提出異議——誰會呢？甚至在戰後最糟的物資短缺時期，一家有名的蘇格蘭釀酒廠每個月送他一箱威士忌，箱子上面標示「羅素伯爵」。有意無意的，羅素總讓人不能忘掉他的社會出身。他說他的第一位妻子「不是我祖母所稱呼的

那種淑女」，稱自己「二十一歲生日是「我到達法定年齡」的日子。他常常喜歡對那些他稱之為中產階級的人，例如建築師，待之以粗暴無禮為樂。如果被嚴重冒犯——比如有一次因為女演員和代理人在他倫敦的客廳裡表演「靜坐示威」，模仿了他的動作——他會去叫警察。他非常想得到功勳獎章，認為像愛丁頓（Eddington）、懷德海這此大等人物都已在他之前獲得而引以為恥。當喬治六世把勳章授予他時，他才總算滿意。左派相信他從未使用過他的頭銜，這是一種神話，不像他的第三位妻子興奮這個頭銜，當他認為頭銜能為他弄到好處時才會使用。必要的時候，他永遠是伯爵；沒必要時，他是——某種程度的——好朋友。因為任何人都不得在他面前放肆。

至於邏輯，也是只有在需要的時候才引用。當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間，羅素被勸說連同一大群作家在抗議信上簽字。我曾負責說服讓這封抗議信在《泰晤士報》刊登。按照慣例，簽名是以字母順序排列的，信頭將會是「阿姆斯等人發出」。我認為，如果這封信寫成「功勳獎章得主羅素伯爵等人發出」，那麼可以在共產主義世界造成更大的影響。《泰晤士報》的文字編輯看法也與我一致，於是就這麼進行，但被羅素注意到這個小詭計，他生氣了，打電話抗議，跟在印刷機旁邊的我連繫上了，我正在印《新政治家》。他說我故意造成錯誤的印象，好像是由他發起這封信一樣，我加以否認，並說唯一的目的是使這封信產生最大的影響力，我說：「無論怎麼說，你已同意在這封信上簽名，所以當你的名字被放在第一個時，你就不能抱怨——這是不合邏輯的。」「合邏輯的廢話！」羅素嘲諷地說道，然後砰地放下了聽筒。



9 沙特——專研女生內衣的哲學老師

另一個自我中心主義者

沙特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跟羅素一樣，都是力圖向民眾宣講自己主張的職業哲學家，但兩人的方式卻有重大的區別。羅素把哲學看成一門普通人無法參與的神聖科學，因而像他這樣一位世俗的哲學家所能做的，至多也不過是提煉出少量智慧的精華，大加稀釋，再通過報紙、通俗讀物和廣播傳播出去；相反，在沙特工作的國家裡，人們在高中就學習哲學，在咖啡館裡也常爭論哲學問題，因而沙特相信，可以通過戲劇和小說使民眾加入他的哲學體系。至少有一段時間沙特似乎成功了，毫無疑問，本世紀沒有第二位哲學家對全世界那麼多人，尤其是年輕人的思想和態度產生如此直接的衝擊。從一九四〇年代末到五〇年代，存在主義一直是流行的哲學思想。沙特的劇本曾轟動一時，著作銷售數量驚人，有幾種僅在法國就賣出兩百萬冊；他提出生活方式，主持著一個不那麼明確的世俗教堂，但這一切最終又得到了什麼呢？

與大多數一流知識分子一樣，沙特也是個自我中心主義者，了解到他童年的生活環境也就不足為奇了。他是被寵壞了的獨生子女的典型，出身外省的上層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海軍軍官，母親來自亞爾薩斯（Alsace）富有的施韋澤（Schweitzer）家族。人們都說沙特的父親是個無足輕重的人，老是受到他父親的壓制，但他的父親雖只是個綜合工藝學校的學生，倒是個聰明人，爲了彌補身材的矮小（五呎兩吋）而留著濃密的小鬍子。不幸地，沙特出生十五個月後，父親就死了，成了「我母親臥室中的一張照片而已」。他的母親安娜後來改嫁給拉洛歇爾（La Rochelle）的一家工廠的老闆麥賽。沙特生於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他繼承了父親的身高（五呎兩吋半）、頭腦和書籍，但在自傳《詞語》中，可以看出他故意把父親從他的生活中排除掉。他寫道：「假如我的父親還活著，他會整個兒壓在我身上，把我壓得粉碎，幸虧他英年早逝。」他還寫道：「在我家裡，沒有人能使我對他產生好奇心。」談到父親的書籍時，沙特說：「他和同時代人一樣，讀的書全是垃圾：……我統統賣掉，這個死去的人和我沒有什麼關係。」

那位把自己幾個兒子壓碎了的外祖父，對沙特卻十分溺愛，允許他隨意使用自己的大閱覽室。沙特的母親是個逆來順受的可憐人，最寶貴的財產就是這個小男孩。母親給沙特穿女式外套，讓他留比幼年的海明威還長的頭髮，直到八歲那年，外祖父才下令剪掉沙特的滿頭捲髮。沙特把他的童年稱作「伊甸園」，他的母親就是「受到所有人監視和支配的修女，她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專門伺候我」，「母親是屬於我的，沒有人因爲我平靜地占有她而向我提出挑釁。我不知暴力與仇恨爲何物。同時，我也被免除了嫉妒的苦澀訓練」，根本不存在「反抗」的問題，因爲「從未有人試圖把任性作

爲律規強加於我」。四歲時，他曾把鹽放進果醬罐，除此之外他再沒犯任何錯誤和受到任何處罰。人們說他長得漂亮，而「我也信以爲真」。他說著「早熟的話語」，其他人則「記住這些話，重複告訴我」，於是「我又學著編造些別的話」，他說他知道「怎樣不費力地說些老成的話」。沙特的話有時確實會讓我們想起盧梭：「善在我的心靈深處誕生，真則來自我年幼無知的領悟能力。」「我沒有任何權利，因爲充盈我全身的只有愛；我也沒有責任，因爲我做的一切都是出於愛。」外祖父「相信事物的進步，於是我也相信：進步是一條通向自我的漫長而艱苦的道路」。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件文化的財富……文化滲透了我，我又如同一道光線把文化帶給了家庭」。沙特回憶起當他要求閱讀福婁拜的《包法利夫人》（當時還被認爲是本壞書）時與母親的交談。母親說：「如果我的寶貝在這個年齡就讀這樣的書，他長大後會幹什麼呢？」沙特回答說：「我將照那樣生活。」這個機智的反應被家族內外的人興奮地重複著。

由於沙特一向不太尊重事實，所以很難說他對自己童年和少年時代的描述有多大的可信度。他的母親讀完《詞語》後深感不安，評價是「沙特對他的童年一無所知」。沙特對家庭成員的冷酷評論令她震驚。毫無疑問，他是被寵壞了。然而四歲那年，災難發生了，一場流行感冒發生，他的右眼患上了睪腺炎，從此他再也不能使用右眼。沙特一直受到眼疾的困擾，長年戴著墨鏡，六十歲時逐漸失明。當沙特進入學校之後，發現母親對他容貌的讚美是在撒謊，他其實長得醜。他個子雖矮，但體格勻稱，胸部寬闊，健壯有力。他的容貌極爲平常，有毛病的右眼甚至讓他看上去有點滑稽。醜陋的外貌給了他很大打擊，於是他以機智、嘲諷和玩笑進行報復，形成了酸溜溜的性格，成爲學

校裡的弄人。像他自己說的，後來他不斷追逐女人，「爲的是消除相貌難看所帶來的心理負擔」。

沙特接受了他那代人所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先上了拉洛歇爾一所很好的公立中學，接著在巴黎的亨利四世中學當了兩年寄宿生（該校當時可能是法國最好的中學），隨後進入曾培養出許多法蘭西學院重要院士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尼贊（Paul Nizan）、阿弘（Raymond Aron）、西蒙波娃這些才俊都是他的同時代人。沙特參加拳擊和摔角，鋼琴彈得很不錯，歌聲也渾厚動人，還給學校裡的戲劇評論雜誌畫過諷刺素描。他創作詩、長篇小說、劇本、歌曲、短篇小說及哲學論文。他仍像個弄人，只是有了更多的新把戲。他養成了每年大約讀三百本書的習慣，閱讀範圍十分廣泛，尤其酷愛美國小說。在巴黎高師他還得到了第一位情婦：西蒙娜。與他的父親一樣，如果有可能，他喜歡比較高的女人，西蒙娜就是一位瘦長的金髮女郎，比沙特高出一頭。沙特第一次參加學位考試沒有及格，第二年則以優異成績通過，名列榜首，比他小三歲的西蒙波娃名列第二。這是一九二九年六月，就像當時許多精明的年輕人一樣，沙特當了一名中學教師。

一九三〇年代是沙特迷惘的十年，他始終孜孜以求的文學聲譽並未如期而至。他的大部分時間只是在勒哈佛（Le Havre）做中學教師，過著典型的外省的懶散生活。其間他去過幾次柏林，在阿弘的建議下，他在那兒研讀了胡塞爾、海德格，研究了現象學這一當時在中歐最富獨創性的哲學。不過，他主要還是做教師的苦差事。他憎惡資產階級，確實很有階級意識，但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也許除了一些摘錄以外，他從未完整地讀過馬克思。他無疑是個叛逆者，卻是個沒有目標的叛逆者，他不參加任何黨派，對希特勒得勢毫不關心，對西班牙的戰事也無動於衷。不管他後

來是怎樣說的，事實證明，他在戰前並沒有堅定的政治觀點。從一幀照片上可以看到他參加學校授獎典禮時的裝束：黑色帶縐邊的禮服，外飾有貂皮的黃色斗篷，衣服都過於寬大。通常他只穿運動衫和敞領襯衫，不肯打領帶；只是到了中年的尾巴時，才穿上知識分子的統一裝束——白色低領毛衣，加上古怪的半皮夾克。他酒喝得很多，當教師第二年的學校授獎日，他醉後語無倫次，無法發表演說，只好被人扶下主席台，成爲可笑的一幕。從那時起，他一直同年輕人親近，尤其是青年學生。他允許學生們多少按自己的意願行事，他的訓示是：每個人只對自己負責，有權批評任何人和事。學生們在課堂上可以不穿外套，可以抽菸，可以不記筆記、不交作業。他上課從不點名或對學生體罰，也從不給他們批分數。他寫了很多東西，卻沒人願意出版他早期的小說，他只好懊惱地看著尼贊、阿弘這些朋友的作品出版，還都取得了一點聲譽。一九三六年，他終於出版了研究德國哲學的著作《哲學研究》，迴響甚微，但他開始看到自己究竟想做什麼。

沙特的作品本質上是通過小說和戲劇表達行動哲學，到三〇年代末，他更堅定了這一想法。他認爲當時所有的小說家——帕索斯、吳爾芙、福克納、喬伊斯、赫胥黎、紀德和托馬斯·曼——都反映著主要直接或間接源自笛卡兒和休謨的傳統思想。他在給尚·鮑翰（Jean Paulhan）的信中寫道，更有趣的是「寫一部海德格時代的小說，我正想這樣做」。問題在於，三〇年代沙特的小說創作和哲學研究是各自獨立進行的，只有當他將兩者緊密結合，並通過舞台迫使公眾注意，才能起到激勵人心的作用。一種哲理小說終於漸漸孕育成熟，他給這部小說起名爲《憂鬱》，出版商換了一個更有吸引力的書名：《嘔吐》。此書於一九三八年問世，但起初還是沒有什麼迴響。

行動的侏儒

使沙特出人頭地的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對法國是災難，對尼贊等朋友是死亡，也給其他人帶來危險和恥辱，但卻讓沙特獲益良多。他應徵召加入了陸軍砲兵司令部的氣象小隊，負責放熱氣球測定風向。戰友們都笑話他，他的班長——一位數學教授——評價道：「從一開始我們就知道，軍事上他對我們毫無用處。」當時法軍士氣極爲低落，沙特因從不洗澡、骯髒無比而臭名遠揚。他所做的就是寫作，每天寫五頁小說，最終寫成了《自由之路》。他還每天寫四頁《戰爭日記》和無數給女人的信。當德軍發動進攻，防線崩潰，沙特成了戰俘（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後，他依然塗塗寫寫。在特里爾附近的戰俘營裡，他實際上被衛兵當成政治人物，德國兵鄙視法國俘虜，尤其鄙視骯髒的法國戰俘，他們常常踢沙特寬大的臀部。就像當初在學校裡一樣，他靠開玩笑和爲戰俘營寫文娛節目熬了過來。他繼續努力寫他的長篇小說和戲劇，直到一九四一年三月被診斷爲「半失明」而獲釋爲止。

沙特直接去了巴黎。他在著名的孔多塞中學得到哲學教師職位，當時該校大部分教員都已流亡，轉入地下，也有的參了軍。校方並不介意他的教學方式，或正因他的教學方式而給了他一個「工作出色」的評價。他發現戰時的巴黎令人興奮，他後來寫道：「恐怖難以忍受卻又對我們十分合適……我們從未感到像德軍占領時這樣自由，如果我這樣說人們會理解嗎？」但這是因人而異的。

沙特很幸運，由於戰前未介入政治，甚至連一九三六年的「人民陣線」也沒參加，在納粹的檔案和黑名单上並沒有他的名字，至少他們認為他「清白」。他也確實算藝術家中受到優待的。當時一大批親法的德國知識分子，像海勒（Gerhardt Heller）、埃普坦（Karl Epting）、布雷默（Karl-Heinz Bremer）等人都在巴黎，他們不僅對審查制度，甚至對獲准出版的報紙雜誌上登載的劇評和書評都有影響。沙特的的小說和劇本完全可以為他們所接受，因為他們的背景是中歐哲學，尤其重視海德格，而海德格又是受納粹學術界稱許的學者。沙特從未主動與當時政權合作，最密切的連繫也只是為一份與納粹合作的週報《喜劇報》寫稿，一度還答應寫專欄。但他作品的出版、劇作的上演都通行無阻。正如馬爾羅（André Malraux）所說：「當我對付蓋世太保的時候，沙特卻得到德國審查人員許可他的劇作在巴黎上演。」

沙特隱約有種參加抵抗運動的渴望，但這一企求沒能實現，對他倒是件幸事。這是個奇怪的諷刺，人們寫知識分子時總會碰到。沙特個人的哲學已經在他腦子裡形成了，很快被稱為「存在主義」。在本質上，這是一種強調行動的哲學，認為人的性格和意義都決定於他的行動而非觀點、作為而非言論。納粹的占領激起了沙特所有反抗權威的本能，他要跟權威鬥爭。如果他真的遵循自己的哲學信條，就早該去炸毀軍車或刺殺黨衛軍成員了，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只說、只寫，他在理論、思想、精神上都是抵抗派，唯獨缺乏行動。他幫助成立了一個名為「社會主義與自由」的秘密組織，經常開會或辯論。他似乎相信，要是所有的知識分子聚集起來，一起吹響號角，納粹的耶利哥城牆就會倒塌。但當他請求紀德和馬爾羅加入這個組織時，他們都拒絕了。一些成員開始信奉馬

克思主義，比如他的哲學家同事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要說他信什麼的話，他接近蒲魯東。他就是在這種精神狀態下寫了第一份長達一百頁、談論戰後法國的政治宣言。總之，他言論不少，但缺乏行動。組織的一位成員尚·普隆這樣說道：「我們不是個有組織的抵抗團體，只是一群聚在一起的朋友，我們決心一道反納粹，並把這種信念傳播給別人。」所謂「別人」，即該組織以外的人，他們更是持批評態度。加入共產黨的沙澤拉說：「他們的幼稚從一開始就讓我吃驚，比如他們從未意識到空談給別人的工作帶來多大危害。」另一位積極抵抗派列維稱組織的活動「只是個茶話會」，而沙特自己則是「政治文盲」。這個組織最終因無所作為而解散了。

此後沙特再沒有為抵抗運動做什麼重要的事。他沒有為營救猶太人寫一個字或出一分力，他只是全神貫注地幹自己的事。他大都坐在咖啡館裡，瘋狂地寫劇本、長篇小說和哲學著作。

存在與虛無

沙特與聖日耳曼區的連繫開始是非常偶然的，但很快就聞名世界。一九四二至四三年間，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這本書非常全面地闡述了沙特的行動主義原則。寫書的那個冬天極冷，咖啡館的老闆布巴爾先生卻有辦法弄到菸草和取暖的煤。於是沙特每天在那兒寫作，裹著一件不知從哪兒弄來的鮮橙色的人造皮毛外套，雖然又難看又不合身，卻很暖和。他總是先喝下一杯奶茶，然後拿出鋼筆和墨水瓶，連續寫上四個小時，很少從稿紙上抬起頭來，就像「一個裹著

毛皮的小墨水瓶」，西蒙波娃這樣描述沙特。她指出，書中的「猥褻段落」是爲了使這部長達七百一十二頁的著作更富生氣，「有人關注普遍的生存困境，另有一個人卻一心想著肛門和義大利式的做愛。」《存在與虛無》於一九四三年六月出版，成功雖未立時而至，卻是實實在在、與日俱增的（最重要的一些評論直到一九四五年才發表）。然而，沙特通過戲劇奠定了自己重要的地位。就在《存在與虛無》出版的同一個月，他的劇作《蒼蠅》公演了，起初賣出的票很少，但很快引起了注意，更鞏固了沙特日盛的聲名。他隨即爲百代（Pathé）寫了三部電影劇本（包括傑作《事已決定》），第一次賺了一大筆錢。他參與創辦了一份新的很有影響的評論性刊物《法國通信》，次年春天又與馬爾羅、艾呂雅（Paul Elouard）一起被指派爲七星獎評審團成員，這無疑表明沙特已成爲文學界權力的掄客。就在這時，一九四四年五月，他的獨幕劇《禁閉》在老哥倫比亞劇院上演，劇中三位主角在一間會客室交談，結果發現那兒其實是地獄的前廳。這部出色的作品可以分爲兩個層面：一方面是對人物的評論，傳達了「他人即地獄」的寓意；另一方面是對《存在與虛無》的通俗演繹，是對海德格哲學的激進化的翻版，其中加進了花俏的法國式詮釋和當代事件，傳達了隱藏著對抗性的行動主義。這是法國人一向具有的傑出天賦——吸取德國的思想，們加上華麗時髦的包裝。《禁閉》在批評家和公眾那裡都獲得了極大成功，被譽爲「開創了聖日耳曼區黃金時代的文化事件」。

《禁閉》令沙特聲名卓著，這是戲劇能無比生動有力地表達思想的又一個實例。說來奇怪，沙特還是透過在公共講壇發表演說的古老形式而名揚世界的，實際上是成爲一個臭名昭著的「神聖的惡魔」。《禁閉》上演後的一年裡，法國平靜無事，每一個人，尤其是年輕人，都急切地想追回失落

文化的歲月，為戰後尋求真理的靈丹妙藥。共產黨和新生的天主教社會民主黨，為爭取對大學校園的絕對控制而激烈地鬥爭著。沙特用他的新哲學提供了變通的辦法：不要教會，也不要政黨，而要富於挑戰性的個人主義學說——如果一個人走上了敢於行動和富有勇氣的道路，他就可以看成是自己靈魂的絕對主宰。這是極權主義的惡夢之後對自由的一種信念。一九四四年秋天，透過在聖雅克街一系列關於「小說的社會技巧」的成功演說，沙特展示了他作為演說家的才能和引人入勝的力量，那時他只是間接提出了自己的部分思想。一年後，法國解放，為尋求智力刺激的渴望，沙特於十月二十九日在尚古雄街的中心會堂發表了公開演講，當時沙特自己並沒有用「存在主義」這個詞，這個詞似乎是新聞界創造的。就在八月有人請他給這一術語下定義時，沙特回答：「存在主義？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我的哲學是一種存在的哲學。」這次他決定接受媒體創造的這個新詞，給演講題名為《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連沉默都會有回音

雨果曾斷言，一種思想一旦適應了時代，就具有無比的力量。從兩方面可以明顯看出沙特的思想適逢其時，一方面他向渴望和期待自由的人們鼓吹自由，但這種自由並非唾手可得。沙特說：存在主義用行動界定人，它告訴人們，希望只存在於行動中，行動是人生存的唯一理由，因此，「人把自己交付給生活，從而描繪自己的圖像，此外一切皆是虛無。」沙特說，一九四五年的新一代歐

洲人都是新的存在主義的個人，他們「毫無理由地孤獨。當我說我們注定是自由的，指的就是這一點」。對於這樣幻滅的一代，沙特的存在主義新自由觀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他們孤獨、嚴肅、高尚，稍有侵略性但說不上暴力，反對精英，接近大眾——無一例外。任何人都可能成爲存在主義者，特別是年輕人。

另一方面，沙特領導著知識界風尚的一次重要的變革，此類重要的變革是週期性發生的。在兩次大戰之間，關於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譯註：法國猶太裔軍官，一八九四年被軍方誣告通敵，被判入獄，引起法國各界激烈的爭論，一九〇六年法國最高法院宣判無罪）和法蘭德斯（Flanders）大屠殺無止境的無謂論戰，已使法國知識分子厭倦，他們已養成獨立超然的態度。本達（Julien Benda）開風氣之先，他的極成功之作《知識分子的背叛》告誡知識分子不要受任何綱領、黨派、目標的「束縛」，而應專注於理論原則，遠離政治舞台。沙特原先恰是本達的諸多信奉者之一，一九四一年前，他比誰都更不介入。然而，就像當初用熱氣球測定風向一樣，現在他卻嗅出了社會風氣的微妙變化。他和朋友們共同創辦了一份叫《現代》的評論雜誌，並擔任主編。一九四一年九月出版的第一期上有沙特的發刊詞，迫切要求作家再次「介入」社會：

作家在他的時代都有一個位置。每一句話，哪怕是沉默都會有回音。我認爲福婁拜和龔固爾應對鎮壓巴黎公社的事件負責，因爲他們沒有爲阻止此事寫下隻言片語。你也許會說：那不關他們的事。那麼，卡拉斯審判是伏爾泰的事嗎？譴責德雷福斯事件是左拉的事嗎？

沙特演講的背景是：那年秋天，巴黎的文化界氣氛非常緊張，沙特演講的前三天就發生了一幕鬧劇，兩部芭蕾舞劇《法蘭一家》和《約會》在香榭麗舍劇院首演時，聚集的上流社會觀眾對畢加索設計的垂幕發出了不以為然的噓聲。沙特的演講事先並未廣泛宣傳，只在《解放報》、《費加洛報》、《世界報》、《戰鬥報》的小幅廣告中簡約地提了一下。然而消息還是一傳十、十傳百。那天上午八點半，當沙特走近會堂時，看到街上人潮湧動，他還生怕是共產黨組織的示威活動。人們發瘋似地往會堂裡擠，大廳已經擠滿了人，所以只允許要人進入，沙特的朋友們不得不為他開路。會場裡有婦女暈倒、椅子被擠壞，講演只好推遲一小時。沙特要做的本來是一場學術性很濃的哲學講座，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卻成了戰後傳媒的第一次重大事件。事有湊巧，本達當晚也舉行了講座，但他面對的卻是個空盪盪的大廳。

新聞界關於沙特的報導多得驚人。儘管紙張短缺，許多報紙還是大量登載沙特講稿的內容。他講話的內容和方式都受到嚴厲指摘，天主教《十字架》日報稱存在主義「比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和十九世紀的實證主義更危險」，並與共產黨的《人道報》一起把沙特稱作社會的敵人。沙特的所有作品及時地出現在梵蒂岡的禁書目錄上，而史達林的文化委員法捷耶夫則說他是個「用打字機的豺狼，使自來水筆的鬚狗」。沙特同樣也引起了同行們強烈的嫉妒，法蘭克福學派對沙特的厭憎比對布萊希特更甚。霍克海默稱他是「哲學界的無賴和騙子」。所有的攻訐只是加快了對沙特的崇拜，此時的他已經和前代的許多知識界領袖人物一樣，深諳自我推銷之道，他不能親自幹的，他的追隨者們會幫他幹。《週六晚報》尖刻地說：「自巴納姆的時代以來，我們還沒見過這樣成功的自我宣傳。」

但是對沙特現象的道德批評越多，它越是興盛。十一月號的《現代》指出，法國是一個垮掉的、道德解體的國家，剩下的只有文學和時裝業，而存在主義打算在這個墮落的時代為法國保存一點尊嚴和個性。追隨沙特不可思議地成了一種愛國行動。他的講稿匆匆擴充成書，一個月售出五十萬冊。

存在主義不僅是可以供人研究的哲學，更是可以享受的瘋狂。《存在主義問答手冊》斷言：存在主義和信仰一樣，不能解釋，只能實踐。它還告訴讀者去何處實踐。對聖日耳曼區來說，成為思想潮流的中心並不是新鮮事。沙特其實是效法伏爾泰、狄德羅和盧梭，他們都是大街盡頭古老的普洛科波咖啡館的老主顧。普洛科波咖啡館在第二帝國時期戈蒂埃（Gautier）、喬治·桑（George Sand）、巴爾扎克和左拉的時代再度興旺，那時休斯曼（Huysmans）和阿波利奈爾（Apollinaire）經常光顧的芙羅爾咖啡館才剛開業。戰前巴黎知識界的中心蒙巴那斯（Montparnasse）的特徵是：脫離政治，傾向於同性戀，不帶民族偏見，咖啡館裡點綴著苗條的雙性戀女子。聖日耳曼既是社交和色情的，也是智力的，從蒙巴那斯向聖日耳曼的轉移，其戲劇性在於，沙特的聖日耳曼是左傾、介入、強烈異性戀和極端法國化的。

沙特是個喜愛飲酒作樂的人，他喜歡威士忌、爵士樂、女子和有歌舞表演的餐館。如果他不在芙羅爾或相隔一個街區的兩醜人咖啡館，也不在街對面的利普酒吧吃飯，他就準在拉丁區的中心地帶新近突然出現、開在地下室的一家夜總會裡。在紅玫瑰酒吧有一位叫朱麗葉的歌手，沙特為她寫了一首輕快的歌曲，作家兼作曲家維昂在那裡吹長號並為《現代》寫稿。這一帶還有在多菲納街上的塔布酒吧、雅各布街上的弗蒂酒吧。沙特自己住在離此不遠的波拿巴街四十二號，在他的公寓裡

可以俯瞰聖日耳曼的教堂和兩醜人咖啡館（他的母親也住在那兒，一直幫他照料洗衣房）。這場運動甚至有自己的常設機關——由卡繆主編的《戰鬥報》。卡繆的暢銷小說都被認為是存在主義的作品，西蒙波娃後來回憶：「《戰鬥報》總是充滿讚許地報導我們所說和所寫的一切。」沙特整天發憤寫作，在這段時間寫了幾百萬字的演講稿、劇本、小說、隨筆、序言、論文、廣播稿、報導、雜文和哲學諷刺。奧蒂伯特（Jacques Audibert）說他是「一輛在圖書館、劇場、電影院到處亂停、製造混亂的卡車」。到了晚上他就要享樂了，深夜時常常喝得大醉，還好與人爭執，有一次把卡繆的眼睛都打得瘀青，引來圍觀人群。他是士兵、憤怒的一代、知情者和酒窖裡的「老鼠」們的國王。用他的主要宣傳者尚·波揚的話說，他是「千千萬萬年輕人的精神領袖」。

西蒙波娃

如果沙特是國王，那誰是王后呢？如果他是青年的精神領袖，他又在哪些方面引導著他們呢？這是兩個相關但獨立的問題，需要逐個考察。一九四五至四六年冬天，當他已成為歐洲的名人時，他已經與西蒙波娃相處近二十年了。西蒙波娃這個蒙巴那斯的女子出生在著名的圓亭咖啡館樓上的一層公寓裡。她的童年生活很艱苦，家庭被不名譽的破產擊垮了，祖父因而入獄，母親一直沒能得到嫁妝，父親又是個找不到正當職業的紈袴之徒。她痛苦地寫到自己的父母：「我的父親確信德雷福斯有罪，母親則深信上帝的存在。」她只能在讀書中求得逃避，成為高雅的女學者。她是巴黎大學

哲學系出類拔萃的學生，很快被沙特拉進圈子，沙特對她說：「從現在起，我要保護妳。」他們之間保護和被保護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一直存在著，不過對西蒙波娃來說，這是一種混雜的幸福。她比沙特高一吋，小他三歲，而且從嚴格的學術角度看，比沙特更有才能。與她同時代的岡蒂拉克（Maurice de Gandillac）認為她的著作「嚴密、精確、追根究柢、簡潔明瞭、非常專業」。儘管她很年輕，在哲學學位考試中，卻差點搶走了沙特的第一名，但主考官大衛和尚·華爾認為西蒙波娃是更出色的哲學家。她跟沙特一樣，都是有巨大感召力的作家，在很多方面還勝他一籌。她不會寫劇本，但她的自傳性作品比沙特的更精彩，儘管其中的事實同樣不可靠，她主要的長篇小說《名士風流》描寫了戰後的法國文學界，並獲龔固爾文學獎，遠勝過沙特的任何一部作品。另外，除了撒謊，她沒有沙特那些個性的弱點。

然而這位才華橫溢、意志堅定的女性，卻幾乎從第一次見到沙特起就成了他的奴僕，而且終生不渝直到沙特去世。她做他的情婦、代理妻子、廚娘、經理、女保鏢、護士，卻從未在他活著的時候得到相應的法律或經濟地位。實際上，沙特待她還不如盧梭對待麗瓦塞，因為沙特的不忠是臭名遠揚的。在文學史上，像沙特這樣自私地利用女人的例子實在少見。更不尋常的是，西蒙波娃竟然終生是女權主義者。一九四九年她出版了第一部現代女權主義的宣言《第二性》，暢銷全世界。書的開頭有這樣一句話：「女人並非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這是對盧梭《社會契約論》的卷首語有意識的回應。西蒙波娃事實上是女權運動的先驅，平心而論，她本該成為女權運動的守護神，但她在生活中卻完全背叛了自己的一切主張。

沙特如何擄獲並保持對西蒙波娃的控制一直是個謎。西蒙波娃無法真實地記述他們的關係，沙特則從不願自找麻煩地就此事寫下隻字片語。他們剛認識時，沙特比她更善於讀書，並能把書中的精華融入滔滔不絕的獨白中，使她為之傾倒。他顯然是從智力上而非性關係上支配著她。一九三〇年代大部分時間裡，她都是他的情婦，但關係也曾一度中止。四〇年代起，他們的性關係幾乎不在了，只有當沙特找不到更好的女人時才會重拾舊歡。

沙特是六〇年代所謂「男性沙文主義者」的典型。他的目標就是在成人生活中為自己重建一個童年時期的天堂，成為他所仰慕的女子閨房裡的中心人物。他把女性看成征服和占有的對象。他在《嘔吐》中寫道：「我每一種理論都是征服和占有的行爲，我希望有一天能藉此征服世界。」他要爭取完全的自由，他寫道：「尤其夢想向婦女行使這種自由的權利。」與很多勾引女性的老手不同，沙特並不討厭女人。事實上他喜歡女人勝過男人，也許是因為女性不好與他爭論。他說自己「寧可跟女人聊些瑣事，也不願與阿弘探討哲學」。他喜歡跟女人通信，有時一天就寫十幾封，他並不把女性完全當做人看待，只是把她們當成掛在腰間的戰利品。當他試圖用進一步的措詞為自己的征服策略辯護，以使之合理時，就顯得更加虛偽。他說他要像「征服野獸一樣征服女人」，只是為了「使她從野蠻狀態進入男女平等的狀態」。還有，回顧早年勾引女人的行爲時，他會反省「那些事件中的帝國主義色彩」，但沒有跡象顯示這些想法會使他放過可能的獵艷機會，這些話只是說給人聽的。

沙特一開始勾引西蒙波娃時，就對她簡述了他的性愛哲學，坦言自己與許多女人睡覺的渴望。他說自己的信條是「旅行、多配偶和透明化」。上大學時，一位朋友注意到西蒙波娃的名字在英文裡

讀起來很像「海狸」一詞，她總是沙特的「海狸」或「您」，但從不是「妳」。有時人們覺得沙特把她當做訓練有素的動物，當他寫到「對女性維護自己的自由」的方針時說：「海狸接受並尊重了這種自由。」他告訴西蒙波娃有兩種性關係，一種是「必然的性愛」，另一種是「偶然的性愛」，後者無足輕重，被愛的對象不過處於「邊緣」，受到他的關懷不會超過「兩年的租期」。他對西蒙波娃的愛是永久的、必然的，她處於「中心」而非「邊緣」。她當然也完全可以自由地貫徹同一原則，她可以有自己的「邊緣性」伴侶，只要沙特永遠得到她中心、必然的愛，但雙方都必須顯示「透明度」，而「透明度」正是知識分子談論性愛關係時喜歡用的「公開化」的代名詞，我們在托爾斯泰和羅素那裡也遇到過。沙特說，無論男女都應該告訴對方自己在做什麼。

正如可以預見到的，「透明化」的方針最終只導致了更多、更卑劣的隱瞞。西蒙波娃試圖實施這種方針，但當沙特聽到她那些多半是試驗性的、心猿意馬的戀愛故事時所流露的漠不關心神情時，顯然刺痛了她。對於她在《名士風流》中關於自己被凱斯特勒勾引的描述，他不過當做笑話一椿。此外，那些被拖入「透明化」原則的人也並不總是喜歡這一做法。她最重要的「邊緣」伙伴，某種程度上她終生愛著的，是美國小說家阿爾格倫（Nelson Algren）。當阿爾格倫七十二歲時，他們的事情已成爲回憶，在一次採訪中他對西蒙波娃的洩露表示非常憤怒。阿爾格倫說把他寫進《名士風流》已經夠糟的了，不過那起碼還有個化名遮蔽，但在她自傳的第二部《生命的精華》裡，她不僅指名道姓，還引用了他情書裡的文句，他又不能不承認是他寫的。「見鬼，情書應該是隱私。」「我去過世界各地的妓院，那裡的女人都知道要關上房門，不管是在韓國還是印度，只有這個女人猛

然把門打開，叫來公眾和新聞界。」顯然，阿爾格倫想起西蒙波娃的行爲時非常憤慨，以至於記者走後便心臟病發，當晚就死了。

沙特也實行「透明化」，但程度有限。他在談話和信件中隨時向西蒙波娃報告自己的新情婦：「這是我第一次與一個膚色淺黑的女人睡覺……她體味很大，汗毛挺重，腰背部長著黑毛，襯著白皙的軀體……她的舌頭就像支小笛，總是伸直了去構我的扁桃腺。」女人即使再處於「中心」地位，也不會願意讀到對情敵的這種描寫。一九三三年，沙特在柏林時，西蒙波娃陪了他一陣子，他對她說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有了一位叫瑪麗的新情婦，跟雪萊一樣，沙特也總是很天真地希望舊情人能稱許自己的新情人。不過，沙特從沒有坦白一切。三〇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西蒙波娃在魯昂（Rouen）教書，當她和沙特一起暫住柏林或其他地方時，沙特曾送她一枚結婚戒指，這是她最接近婚姻的時侯。他們有自己專用的語言，在旅館裡，他們自稱是奧爾甘內蒂先生和夫人，或自稱美國百萬富翁哈提克夫婦。沒有證據證明他想和她結婚，或讓她選擇另一種更合乎習俗的結合方式。她根本不知道，沙特曾幾次向另一位「邊緣」情侶求過婚。

他們的生活顯然不合她的心意，她始終無法心平氣和地接受沙特的這些情婦。她恨瑪麗，更恨之後的奧爾伽，奧爾伽的妹妹茱達後來也成了沙特的情婦，更使西蒙波娃痛恨的是，奧爾伽還是自己的學生。西蒙波娃對奧爾伽與沙特的關係很反感，把她寫進《女客》，在小說裡將她謀殺了。她在自傳中承認：「我對沙特造成這種情形感到苦惱，也因奧爾伽從中得益而生氣。」她要反擊：「我不打算把我在宇宙的中心一直占有的至高無上地位讓給她。」然而任何一個必須把自己的情人當做

「宇宙中心」的女人，在勸阻情人走出歧途時總是處於不利地位的。西蒙波娃只能試圖以參與的方式控制他們。於是，沙特、西蒙波娃和一位女子——通常是他或她的學生——三個人形成了三角關係，西蒙波娃充當監督者。「養女」一詞經常被掛在嘴邊。到四〇年代初期，沙特已經因為勾引自己的女學生而惡名遠揚。在一篇對《禁閉》懷有敵意的評論裡，弗蘭西斯（Robert Francis）就說過：「我們都熟悉沙特先生，他是一位專門研究女學生內衣的古怪哲學老師。」由於西蒙波娃的女學生中有更多合適的女子，大多數受害者都是她的學生，而西蒙波娃有時擔當著近乎淫媒的角色。在唯恐失去愛情的慌亂中，她自己也與這些女子形成親密關係，娜塔麗就是其中的一個，她是一個俄國流亡者的女兒，是西蒙波娃戰時在帕西（Passy）的莫里哀學院教書時最好的學生。一九四三年，她的父母正式控告西蒙波娃誘拐少女，這項嚴重的罪名足以判她入獄。在雙方朋友的調解下，起訴最後撤銷了，但西蒙波娃被逐出莫里哀學院，從此不准在法國教書。

經常更換妃子的後宮

第二次大戰期間，西蒙波娃真正當起沙特妻子的角色，她做飯、縫紉、洗衣、管錢。但是隨著戰爭的結束，沙特忽然發現自己已很有錢，一群為他的錢財和思想魅力所吸引的女人整天圍著他。一九四六年是沙特征服女性最成功的一年，也是標誌著他與西蒙波娃的性關係實際結束的一年。正如韋特曼（John Weighman）所說：「早些時候，在沙特那個經常更換妃子的後宮邊緣，西蒙波娃

就已心照不宣地擔當起一個資深的、從性生活中隱退的代理妻子角色。」她抱怨「他爲她們揮霍金錢」，她不無擔憂地注意到，當沙特越來越老，他的女子們卻越來越年輕，都只有十七、八歲，沙特從法律上承認她們是他的養女，這就意味著她們將繼承他的版權。她可以像海倫對布萊希特的情婦那樣，給那些女子建議和警告，儘管她沒有那個德國女人所具有的法律地位。她經常受騙，一九四六至四八年間，沙特去美洲旅行時，她得知了他與一位叫陶樂赫絲的女人熱戀的詳情，而沙特卻一面聲稱已經厭倦了陶樂赫絲「使人精疲力竭的激情」，一面又在向她求婚。後來還有維昂的金髮碧眼的愛妻米雪兒、奧爾伽漂亮的妹妹莞達，有異國風韻的金髮女演員伊芙琳——沙特在他最後一部劇作《阿爾托納的隱藏者》裡還爲她寫了一個角色。西蒙波娃最痛恨的阿萊特被沙特弄到手時才十七歲，還有希臘女孩海倫。五〇年代末，除西蒙波娃外，沙特還同時周旋於米雪兒、阿萊特、伊芙琳和莞達四位情婦之間，使出各種辦法哄騙每個人。他公開把他的《辯證理性批判》題獻給西蒙波娃，卻又讓伽利瑪出版社私下印了兩本題有「獻給莞達」的版本。《阿爾托納的隱藏者》出版時，同樣故技重施，使伊芙琳和莞達都相信書是獻給她的。

西蒙波娃討厭這些年輕女人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她認爲是她們鼓勵沙特過放縱的生活——不僅在性生活上，而且在飲酒和服藥方面都毫無節制。一九四五至五五年間，靠著不斷增加的酒精和巴必妥酸鹽攝入量，沙特完成了數量驚人的作品和其他工作。一九五四年沙特在莫斯科因飲酒過度而虛脫，被緊急送往一家診所。一旦復原，他繼續堅持每天寫三十至四十頁，經常服下整管的Corydrane藥片（這種藥在一九七一年因有危害而被回收）以維持體力。他那本談論辯證理性的書，

似乎正是在藥和酒精的影響下寫成的。沙特的傳記作者索拉爾（Annie Cohen-Solal）說他在利普、古鮑爾、巴爾扎爾或其他最愛光顧的小酒館裡，吃一頓兩小時的午飯常常要喝掉一夸脫葡萄酒。她累計出這段時間沙特每天服用的刺激品包括兩包香菸、幾斗黑菸絲、一夸脫酒精（主要是葡萄酒、伏特加、威士忌和啤酒）、二百毫克安非他命、十五克阿斯匹林、幾克巴必妥酸鹽，再加上咖啡和茶。其實西蒙波娃對沙特年輕的情婦們的批評是不公正的，她們都試圖使沙特改過自新，最年輕的阿萊特費力最大，她甚至迫使他寫出保證書，聲明不再碰Corydane、菸草和酒精。但沙特很快食言。

與卡繆論戰

被這些雖有點乖張又很仰慕他的女人包圍著，沙特的生活中很少有時間與男性在一起。他先後有過好幾位男秘書，其中幾個——像尚·各——就很能幹。他也總是被年輕的男性知識分子包圍，但他們都是靠沙特給工資、施捨或庇護的。他無法忍受與年齡相近、資歷相當的男性知識分子長期相處，因為他們隨時可能批駁他常常是不甚嚴謹的空論。尼贊在內訌可能出現之前就死了，但沙特同其他人都吵過，其中著名的人物就有阿弘、凱斯特勒、龐蒂和卡繆。

沙特與卡繆的論戰就同盧梭與狄德羅、伏爾泰與休謨或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的論戰一樣激烈，但並沒有像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那樣重歸於好。沙特似乎曾嫉妒卡繆那很討女人喜歡的英俊相貌和

他純粹作爲小說家的力量與獨創性。一九四七年六月卡繆出版的《瘟疫》，對年輕人產生了難以抗拒的影響，迅即售出三十五萬冊。這一現象成爲《現代》雜誌上幾篇思想評論攻擊的目標，但他們的友誼仍然勉強維持著。當沙特向左轉，卡繆卻變得更獨立。某種意義上，他占據的立場與喬治·奧威爾在英國的地位相同：他反對一切獨裁政體，把史達林看成是與希特勒並無二致的惡棍。跟歐威爾一樣，而與沙特不同，卡繆堅持認爲人民比思想更重要。西蒙波娃曾轉述卡繆一九四六年向她吐露的心聲：「我們，我和妳，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人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我們寧要具體不要抽象，我們寧要人民不要『主義』。我們把友誼置於政治之上。」

在她的內心深處，西蒙波娃也許是跟卡繆一致的，但一九五一至五二年間，當關於卡繆的作品《異鄉人》的最終論戰來臨時，她自然還是站在沙特的陣營裡。沙特與《現代》雜誌的同僚們把這本書看成對史達林主義的攻擊，決定分兩步討伐它。第一步，沙特把當時年僅二十九歲的尚松（Francis Jeanson）推到前台，讓他在裁決此事的編委會上發言，「既要極爲嚴峻，又至少要有禮貌。」接著，卡繆做出回答後，沙特又親自寫了一封令人極爲不快的長信攻擊卡繆本人：「一種凶暴而又講究禮節的專制已經把你占有了，這種專制由毫無實際意義的官僚體制支撐，卻自稱是依照道德法則統治的。」說他爲「虛榮心受傷害」而痛苦，耽溺於「小作家的爭吵」，「你陰鬱的自負加上你的脆弱，常使人們無法向你吐露未加渲染的真情。」這時沙特已得到所有有組織的極左派支持，他的攻擊損害了卡繆的聲譽，也使卡繆受到傷害——他是個容易受傷的人——有時想到與沙特的爭論，他會感到沮喪。但其他時候他只是把沙特看成一個可笑的人物加以嘲弄，「一個要讓母親

爲自己付所得稅的人」。

喜歡跟馬克思主義打情罵俏的

沙特無法與學術地位跟他相當的盾，前後不一，有時簡直是無聊的。要的觀點。四〇年代末，凱斯特勒和後，就變得立場搖擺不定。一九四六對支持哪個黨派猶豫不決，他似乎一於，除了他出色的秘書尙·各以外，產階級家庭，並保留著濃重的奧德口的政黨嗎？在四〇年代的法國，這就宣揚的極端個人主義哲學幾乎完全對產黨和史達林主義——這就是他與阿黨的傑出知識分子的尙·卡納巴曾厭——因爲他從未讀過馬克思，儘管多。沙特唯一積極的活動，就是幫助

聯盟」的反冷戰運

沙特在一九四八年

新的一代將透過創

支持尙·莫奈（Je

礎，這意味著要大

聯盟運動的魯塞（

實完全脫離的世界

泡裡」。一九四九年

墨西哥向陶樂赫絲

（Gary Davis）荒

（François Mauriac

「我們的政治家必須

沙特並未聽從

原是棄兒，曾因行竊

仰替代品的傾向。

主義和性解放的鼓

有條理的思想家，

穿戴和思想上
愛和自己在後
酒和服藥而發
非良師益友，
比沙特更精通

一九五二

定，是在共產
絕參加印度支
Ridgeway) 是
的時間比原來
些。從他譴責
對議會民主從
有的投票權，

沙特一九

播與證實，以
陣營不安地保
盾。他無奈地

聯的勞動營；如果沒有發生什麼有社會意義的重大事件，我們就可以繼續置身事外，不去爭論這個體制的性質。」關於布拉格對斯連斯基和其他捷克猶太共產黨員駭人聽聞的審判，他同樣迫使自己保持沉默。更有甚者，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在維也納召開的荒唐的共產主義世界和平運動大會上，他竟讓自己被人當成一隻耍把戲的熊。這就是說，爲了取悅於那位會把他稱爲「豺狼和鬣狗」的法捷耶夫，他向所有的代表們宣稱，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件大事就是：一九三六年的人民陣線、法國解放和「這次大會」——這是個明顯的謊話——不僅如此，在共產黨頭頭的指示下，他還取消了他早期的反共戲劇《骯髒的手》在維也納的演出。

在堅定支持共產黨路線的四年裡，沙特有些言行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他和羅素一樣，使人想起笛卡兒那句令人不快的真理名言：「沒有什麼荒謬、不可信的東西沒有被這些哲學家所主張過。」一九五四年六月，在一次俄國之行後，沙特接受了政治同伴《解放報》的一位記者兩小時的採訪。這可算是自三〇年代初期蕭伯納臭名昭著的東方之行以來，西方思想界要人關於蘇聯所發表的最卑躬屈膝的談話。他說蘇聯公民不去旅遊，並非因受禁止，而是他們不想離開自己美好的國家。他斷言「蘇聯公民能比我們更充分、更有效地批評政府」。他竟堅持說，「在蘇聯有絕對的批評自由」，多年後，他才承認了自己的言論不實：

一九五四年首次訪問蘇聯後，我撒了謊。其實，撒謊也許是個太重的字眼：我寫了一篇文章……其中說了許多對蘇聯友好的話，這些我自己並不相信。這樣做部分原因是我覺得一回家就

詆毀款待自己的主人不大禮貌，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在與蘇聯和我自己的思想的關係中，我應該站在什麼立場上。

這是出自「千千萬萬年輕人的精神領袖」的一份不尋常的供詞，而且與他當初的謊言一樣有欺騙性，因為沙特當時是自覺而存心地與共產黨結盟的。其實對他一九五二至五六年間的某些言行加以掩飾，倒是比較仁慈的做法。

此後的一個時期，沙特在法國及世界範圍內的社會聲譽十分低落，他不可能沒有覺察。他如釋重負地以蘇聯入侵匈牙利作為與莫斯科和共產黨決裂的理由，無論如何這是個藉口。他同樣利用尙處萌芽狀態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戴高樂的重新掌權又恰好提供了一個自一九五八年起就惹人憎惡的合適對象——作為在獨立左派，尤其是在青年中重獲威望的體面的契機。這種策略在某種程度上是真誠的，也獲得了有限的成功。沙特又經歷了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有益」的阿爾及利亞戰爭。儘管他費盡心機，仍未能像羅素那樣真正使自己被捕。一九六〇年九月，他說服大約一百二十一名知識分子簽署了一份聲明，宣稱：「公職人員或軍人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有權不服從」。以前的第四共和國政府，幾乎毫無疑問會判他入獄，但在學識出眾的戴高樂和馬爾羅兩人控制下的第五共和國，卻有一個更加精明老練的政府。馬爾羅說：「沙特在協和廣場高喊『恐怖主義者萬歲』，總比逮捕他而給我們自己找麻煩要好。」戴高樂援引維永、伏爾泰和羅曼·羅蘭的例子告誡內閣，最好別去碰知識分子：「這些人在他們的時代惹了很多麻煩，但最重要的是我們繼續尊重思想和言

論的自由，只要沒有違國家法律和民族統一。」

「我會以很多蠢話收場」

六〇年代，沙特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和第三世界旅行。「第三世界」一詞是地理學家索維(Alfred Sauvy)始創的，沙特將之推廣開來。沙特和西蒙波娃成了人人熟知的人物，被拍了很多與亞非各國獨裁者交談的照片，照片上男的穿第一世界的西服和襯衫，女的則穿女教師穿的羊毛衫、「少數民族風格」的裙子和領巾，使她顯得生氣勃勃。沙特有關那些邀請他的政權所發表的談話，和他對史達林俄國的吹捧一樣沒多大意義，只是更能讓人接受。關於卡斯楚，他說：「這個從古巴革命中誕生的國家是一種直接的民主制。」關於鐵托的南斯拉夫，他說：「這是我的哲學的實現。」談到納瑟的埃及，他說：「在此之前，我一直不願把埃及政權與社會主義連繫起來，但現在我知道自己錯了。」他尤其熱情地讚美毛澤東的中國。他喋喋不休地譴責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罪行」，將美國比作納粹（但他也將戴高樂比作納粹，忘了當他在被占領的巴黎上演戲劇時，戴高樂正與納粹作戰）。沙特與西蒙波娃始終反美。一九四七年，在一次美國之行後，西蒙波娃在《現代》雜誌上寫了一篇荒唐的文章，充塞著可笑的拼寫錯誤，以及如只有富人才能進第入五大道上的商場之類的怪論；實際上沒有一句是正確的。這篇文章成了美國女小說家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猛烈攻擊的目標。六〇年代，沙特還在羅素設在斯德哥爾摩的不光彩的國際「戰爭罪犯法庭」裡擔任重

要角色。所有這些頗爲無聊的活動都沒有對世界產生多大作用，反倒削弱了他說過的那些嚴肅的話。

然而，沙特向他的第三世界崇拜者們提出的建議中，有更具災難性的一面。雖然他自己不是一個勇於行動的人——卡繆更尖刻的一句嘲諷是：「沙特企圖坐在扶手椅中創造歷史」——他總是鼓勵別人採取行動，而他所說的行動往往意味著暴力。他成了法農（Frantz Fanon，這位非洲思想家或許可以稱之爲現代非洲黑人種族主義的創立者）的技持者，爲他宣揚暴力的聖經——《全世界受苦的人》——作了一篇比原書更血腥的序。沙特寫道，對於黑人，「殺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箭雙鵰之舉，既消滅了一個壓迫者，又消滅了他的被壓迫者。」這是存在主義的現代化：透過謀殺獲得自我解放。正是沙特杜撰了把現存秩序認定爲暴力（制度化的暴力）的語言技巧（取自德國哲學），因此用屠殺推翻它就是正當的。他宣稱：「對我而言，關鍵問題是拋棄左派不應當以暴抗暴的理論。」注意，不是「問題」而是「關鍵問題」。由於沙特的作品廣泛傳播，特別是在青年之中，他成爲很多自六〇年代末起擾亂社會的恐怖活動的理論教父。他沒有預見到，他從哲學上給予鼓勵的大部分暴力活動，可以是黑人用來打擊其他黑人而不是反抗白人的，而這本是一位比較明智的人應該預見的。通過幫助法農煽動非洲革命，他對於六〇年代中期至今席捲非洲多數國家的內戰和大規模屠殺都起了催化作用。他對當時越戰已近尾聲的東南亞，產生了更有害的影響。自一九七五年四月，在柬埔寨導致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許多可怕罪行，都是一個叫「紅色高棉」、能講法語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組織幹下的，他們的八個頭目中有五個是教師，一個是大學教授，還有一個公務員，一個

經濟學家，他們五〇年代都在法國學習，不僅加入了共產黨，還接受了沙特的哲學行動主義和「必要的暴力」學說。這些大規模屠殺的凶手都是他的信徒。

沙特自己在生前最後十五年的活動無足輕重。他跟羅素一樣，拼命想保持先鋒地位。一九六八年，他站在學生一邊，正如從第一天當教師起就做的那樣。一九六八年「五月風暴」中並沒出現多少有聲望的人物——法國的阿弘例外——所以沙特有失尊嚴的表現似乎不值得過分苛責。一次在盧森堡電台接受採訪時，沙特讚揚學生們設置街壘的行動：「暴力是遺留在學生手中唯一的東西，他們尚未進入父輩的體制……目前在我們軟弱的西方國家中，學生代表了反對既定統治的唯一力量：應該由學生決定他們的鬥爭應採取的形式，我們不應冒昧地就此事給他們提出建議。」這話出自一位花了三十年時間教導青年的人之口，實在奇怪。還有更昏庸的話，他告訴學生：「你們行動的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在權力中放入了想像。」西蒙波娃也同樣興高采烈，她熱切地表示，學生在巴黎大學牆上塗寫那些「大膽」的標語中，最令她「感動」的是「把禁止禁止掉」。沙特屈尊採訪臨時學生領袖柯恩——邦迪，就此在《新觀察家》上寫了兩篇報導。他覺得學生們「百分之百正確」，因為他們正在破壞的政權是「懦弱的政權，一個謀殺的號令」。其中一篇大半是攻擊他從前的朋友阿弘——那個愚昧的時期唯一保持清醒的人。

但是，這些滑稽的言行並非出於沙特內心，推動他進入積極角色的正是年輕的追隨者。當他五月二十日出現在巴黎大學會堂，向學生發表講話時，他看上去像一位被明亮的燈光、煙霧和學生們「尚——保羅」（沙特名字）的喊聲弄得不知所措的老人，他的助手可從不敢叫他「尚——保羅」。他的談

話沒有多大價值，結束時他說：「我現在要離開你們了，我很累。如果再不走，我會以很多蠢話收場的。」一九六九年二月十日他最後一次出現在學生面前，演講之前，他很難堪地收到學生領袖給他的一張無禮的紙條，上面寫著：「沙特，說清楚簡短些，我們還有許多規章要討論和通過。」這樣的建議絕不是他已經慣於接受和能夠遵循的。

不過，沙特此時有了新的興趣。與托爾斯泰和羅素一樣，他的注意力集中時間很短。他對學生運動的興趣持續了不到一年，隨後又做了一次同樣短暫，但更異乎尋常、與「勞動者」融為一體的努力。關於這些被理想化的神秘勞動者，他寫過很多，卻終生為他們所躲避。一九七〇年春，法國極左派做了一次為時已晚的嘗試，想把毛澤東激烈的「文化大革命」歐洲化。這場運動被稱作「無產階級左派」，沙特也同意參加，名義上擔任他們的雜誌《人民事業》的主編，主要是為了防止警察查封。運動目標的暴力性質對於沙特的口味也足夠了——號召監禁工廠經理、私刑處死國會議員——但它是原始的浪漫精神，幼稚而強烈地排斥知識分子。沙特在其中沒有真正的地位，他自己似乎察覺了，抱怨道：「如果我再和行動主義者混在一起，就會坐上輪椅被人推來推去，擋住每個人的路。」但在一些年輕的追隨者慫恿下，他最終還是沒能抗拒政治表演的誘惑。六十七歲的沙特——甚至戴高樂（讓沙特厭煩的人物）都稱他「親愛的大師」——把整個巴黎變成他的舞台背景，他在街頭賣粗製濫造的報紙，塞傳單給厭煩的路人。一位攝影師拍下了他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在愛麗舍宮忙於散發宣傳品的照片，他穿著新的「無產者」的白毛衣、厚夾克、寬鬆褲。他甚至設法讓自己被捕，但不到一小時就獲釋了。十月份他舊戲重演，站在比蘭古爾的雷諾汽車廠外的油桶上，向

汽車工人們高聲發表長篇演說，《震旦報》嘲笑他：「工人們並不懂他的話，沙特的集會只有他帶來的少數毛澤東主義者參加。」十八個月後，他又到另一家雷諾汽車廠，他這次是想偷偷混入工廠，對絕食工人給予口頭支持，但被保安人員發現，把他趕了出去。沙特的種種努力似乎並沒有激起真正的汽車工人的絲毫興趣，他全部的同盟者仍然是一向與他接近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

說個不停

但對於一個行動的失敗者，一個從未在任何真正意義上成爲行動主義者的人來說，總還有「詞語」。他把自傳的一部分題名爲《詞語》倒是很恰當的。他把「無日不寫」作爲他的座右銘，正是他堅守的誓言，他寫東西比羅素更輕鬆，一天可以寫出一萬字，但很多素質不高，或者說造作、浮誇、言過其實、缺乏充實有力的內容。五〇年代初我在巴黎，間或翻譯他的論戰文章時就發現：這些文章用法語讀起來似乎還不錯，一日要以具體的盎格魯—撒克遜語言表述就亂成一團。沙特不太講究質，一九四〇年給西蒙波娃寫信時，想到自己在紙上寫過這麼多字，他承認：「我一向認爲越多越好。」奇怪的是，沙特在後幾十年中卻對福婁拜越來越著迷，而福婁拜是一位對詞句格外講究、總是狂熱地不斷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他最終寫出一部關於福婁拜的書，長達三卷共二千八百零二頁，但很多部分幾乎不值一讀。沙特創作極豐，有些堪稱巨著，更多的卻未完成，不過它們的素材常被用於別的作品中，其中有寫法國革命的計畫，還有寫義大利文藝復興後期威尼斯畫派畫家

丁托列托 (Tintoretto)；他還有龐大的自傳規劃，並想在長度上與法國早期浪漫主義作家夏多布里昂 (Chateaubriand) 的《墓外回憶錄》相比，而《詞語》不過是一部分而已。

沙特承認詞語是他的整個生命：「我已將一切都投入文學……我把文學當做宗教的替代品。」他坦言詞語對他不僅是字母和含義而已，它們是有生命的，正像學習猶太神秘教經典或希伯來神秘哲學的猶太學生，會認為摩西五經上的字母具有宗教力量：「我感到語詞的神秘性……漸漸地，無神論吞噬了一切，作為一個不信神的人，我沒有了負擔，為世俗而寫作。我回到詞語，想知道語言的意義……我致力於此，卻感到前方是夢的死亡、令人欣喜的暴行和恐懼的永久誘惑。」這段話寫於一九五四年，當時沙特還有上百萬字要寫。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也許沒什麼意思。沙特總是寧可寫些廢話，也不願停筆。他確實證實了約翰遜博士尖刻的論斷：「法國人不管有沒有弄清楚，都要說個不停。」正如他自己所言：「(寫作)不僅是我的習慣，也是我的職業。」他對自己作品的效果持悲觀態度：「多年來，我一直以筆為劍，現在才認識到我們多麼無能。不管怎樣，我在寫作，我將繼續寫作。」

他也愛說話，有時說個沒完，有時他說話根本沒有人聽。在導演哈斯頓 (John Huston) 的自傳中有一段關於沙特的精彩描寫：一九五八至五九年間，他們共同創作一個關於佛洛伊德的電影劇本，沙特不得不搬到愛爾蘭哈斯頓的家。哈斯頓這樣描繪沙特：「像個小桶，醜陋之極，腫脹的臉上有麻子，牙齒發黃，眼珠突出。」不過他的最大特點就是說個沒完：「與他對話根本不可能，他不停地講，你沒法打斷他。你想等他停下來喘口氣，但他不會停。那些話如同山洪爆發一般湧出。」

令哈斯頓驚奇的是，沙特一面說一面還在記錄自己說的話。有時哈斯頓不能忍受他無休止的談話，只好離開房間，但沙特的聲音仍嗡嗡地在整座屋子裡跟著他轉。當他回到房間，發現沙特還在講。

這種詞語腹瀉症最終損害了他作為演說者的魅力。當他那本惹來麻煩的談論辯證法的書出版時，尚·華爾還是請他去哲學學院演講。沙特從下午六點開始，用「匆促而呆板的語調」，讀著從一個大文件夾中拿出的手稿，眼睛也不抬一下，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講稿中。一個小時後，聽眾不耐煩了。大廳很擠，有些人站著。一小時四十五分鐘後，聽眾筋疲力盡，有人躺到地板上。沙特好像忘了他們的存在。最後，華爾不得不示意沙特停止。沙特迅速拿起稿子，一言不發地走了出去。

不過，聽他講話的人總還是有的。慢慢地，沙特越來越老，追隨者也越來越少。從四〇年代末到五〇年代初，沙特掙了很多錢，但很快花光，他對金錢一向不在意。童年時代，當他想要錢時，只要從母親的錢包裡拿就有。當中學老師時，他和西蒙波娃隨意向別人借錢（也隨意借給別人），西蒙波娃承認：「我們向所有的人借錢。」沙特說：「金錢有一種我喜歡的易於消逝的特性。我愛看它從我的指間滑走、消失。」與許多知識分子不同，尤其名人，沙特用錢確實十分慷慨，他經常在咖啡館和飯店為素不相識的人付帳，並以此為樂。他也為各項社會運動捐錢，他給革命民主聯盟提供了三十萬法郎（按一九四八年的匯率，超過十萬美元）。他的秘書尚·各說他：「不可思議地慷慨和輕信。」他的慷慨和偶爾的幽默感是他性格中最好的部分，但他對金錢的態度也是不負責任的。他假裝對版稅和代理費很在行——一九四九年與海明威會面時，兩位作家除了這類話題沒談別的，這很合海明威的口味——其實那全是沙特在裝模作樣。尚·各的繼任者克羅德·弗證實：「沙特堅

決拒絕處理跟錢有關的事，他認為是浪費時間。然而他總是需要錢，爲的是要花錢，要去幫助別人。」結果他欠下出版商巨款，同時面臨繳納拖欠的巨額所得稅的壓力。他的母親偷偷幫他交了稅——因此引起了卡繆的嘲諷——但她的財力畢竟有限。到五〇年代末，沙特深陷經濟困境，一直無法真正擺脫。儘管收入一直很高，他還是欠債，手頭拮据，有一次他抱怨自己連雙新鞋都買不起。在他的支付名單上總有一大群各種身分的人等他付款或發放救濟，他們構成沙特的「外庭」，情婦們則組成「內宮」。六〇年代末沙特的經濟實力下降，領錢的人驟減，「外庭」圈子也縮小了。

神聖的惡魔

沙特在七〇年代越來越顯出一副可憐相。他過早地衰老了，實際上雙目已失明，經常醉醺醺的，老爲錢發愁，對自己的觀點也沒有把握。這時一位來自開羅的猶太青年步入他的生活，名叫列維（Benny Levy），以皮埃爾·維克多的筆名寫作，他全家在一九五六至五七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時從埃及逃出來，成了沒有國籍的人。沙特協助他在法國居留，並任用他爲秘書。維克多喜歡做些不可思議的事：戴墨鏡，有時還戴假鬍子；他觀點古怪，好走極端，並熱切地把它們強加給他的主人。於是，沙特的名字出現在兩人合作的一些奇怪的聲明或文章上。西蒙波娃擔心維克多會成爲另一個蘇恩曼，尤其當他與阿萊特結成同盟後，西蒙波娃更加痛苦。她開始害怕和憎恨他，就像托爾斯泰的索尼雅害怕和討厭切爾特科夫一樣。不過此時沙特不會再公開做什麼傻事了，他的性生活仍十分

豐富，時間都花在那些女眷身上。他的假期這樣度過：與阿萊特在法國南部他們共同擁有的房子裡過上三個星期；和堯達一起待兩個星期（通常在義大利）；去希臘島嶼陪海倫幾個星期；再與西蒙波娃共度一個月（常在羅馬）。在巴黎，他經常來往於幾個情婦的住所之間。西蒙波娃在她的小書《向沙特告別》中，無情地描寫了他最後幾年的生活：他好色貪杯，情婦們可以把整瓶的威士忌塞給他，再為控制他殘存的神志進行爭鬥。他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五日在布魯塞醫院去世，這對她們來說都是一種解脫。沙特一九六五年就秘密收阿萊特為養女，因此她繼承了包括文學資產在內的一切，主持他的遺著的出版。對西蒙波娃來說，這是最終的背叛；「中心」反被「邊緣」遮蓋了，這位法國左派知識分子的「太后」，比沙特多活了五年，但她沒有孩子也沒有繼承人。

實際上，沙特與羅素一樣，對公共政策的見解沒有任何連貫性和一致性。一旦去世，他的學說也就喪失了生命。最終，又跟羅素一樣，他朦朧的渴望也就是成為左派和青年陣營中的分子。沙特的思想的沒落十分引人注意，不管是否誤會，他畢竟一度代表著一種引人注目的，即使是思想混亂的人生哲學。總有相當一部分受過教育的公眾需要一位精神領袖，哪怕他不盡人意。曾幹過許多缺德事的盧梭，生前死後也還是得到廣泛的讚譽。沙特是另一位「神聖的惡魔」，巴黎知識界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五萬多人跟隨他的靈柩到了蒙巴那斯公墓，多數是年輕人。為了看得更清楚，有人爬到樹上，其中一個竟然掉下來跌在棺木上。他們為何前來致敬？他們蜂擁而至，究竟是出於何種信念、何種人性的真理？我們有理由問。

10 威爾森——因為懺悔所以可貴

追求真理的決心

威爾森 (Edmund Wilson, 一八九五—一九七二) 的個案很有代表性，使我們得以明確區分傳統文人和之前所談論過的那些知識分子的不同。威爾森實際上可以被這樣看待：他由最初的文人生涯，轉而成爲尋找救世良方的知識分子，然後——吃了苦頭也學了乖——恢復了他年輕時對文學的專注，這也是他真正的特長。在他出生的時代，美國文人是一個牢固確立的群體，他們在亨利·詹姆斯那裡找到了一個傑出的榜樣，對詹姆斯而言，文字就是生命，他鄙棄世俗知識分子那種認爲用憑空產生的思想就可以改造世界和人類的念頭。對他來說，歷史、傳統、秩序和既定的形式構成了文明所繼承的智慧，以及人類行爲唯一可靠的指南。詹姆斯對公共事務懷有嚴肅而超然的興趣；他在一九一五年放棄英國國籍，投入他認爲正義的事業，這一姿態表明他相信藝術家在重大問題上應當挺身而出。但文學始終是第一位的，那些爲它奉獻一生的人——守護著文學聖壇的牧師——永遠

不該追隨政治上的虛假上帝。

美國人威爾森同詹姆斯相比，儘管粗魯、固執得多，骨子裡卻有相似的傾向。跟詹姆斯不同的是，他認為歐洲——尤其是英國——從體制上腐敗了，而美國雖有很多不完美之處，卻是高尚理想的化身。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在他傳統主義者的外殼下，時常會有一個行動主義者掙扎出來。然而由於出身、背景和在一段時間裡的思想傾向，他卻循著詹姆斯一世時代的道路。他來自新英格蘭一個長老派教徒的大家庭，幼年時幾乎不認識家庭之外的任何人，父親是律師，當年任新澤西州的司法部長，有當法官的天性，威爾森繼承了這些天賦，他說他父親「根據人們的品德」與之相處，但「某種程度上是傲慢的」；正如為威爾森編輯論文的埃德爾（Leon Edel）指出的，對文學原作詳加盤查並居高臨下進行評判的嗜好，是威爾森作為評論家最顯著的特點。不過，他也從父親那兒繼承了對真理的熱愛和尋求真理的堅定決心，這使他最終獲得拯救。

左傾

威爾森的母親是個通常所說的俗人，她愛好園藝，關注大學橄欖球賽，直到生命的最後階段還出席普林斯頓大學的比賽。她盼望威爾森成為出色的運動員，對他的寫作毫無興趣，也許這樣恰好避免了如海明威和他那聰明又有文學頭腦的母親之間所產生的毀滅性緊張關係。威爾森上了常春藤盟校預校希爾學校（Hill School），一九一二至一五年間就讀普林斯頓大學，得到高斯（Christian

Gauss) 的調教。他有過一段令他厭惡的軍營生活，以《紐約夕陽報》記者的身分參加一個醫療分隊赴往法國，戰爭結束時，他是情報局的中士。

威爾森一直能堅持認真而系統的閱讀。他的筆記顯示，從一九一七年八月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的十五個月期間，共讀了二百多本書，不僅有左拉、勒南 (Renan)、詹姆斯和華頓 (Edith Wharton) 等前輩作家的書，還有從吉卜林、切斯特頓到斯特雷奇、麥肯齊 (Mackenzie)、韋斯特 (Rebecca West) 和喬伊斯這樣大範圍的當代作家的作品。沒有人比威爾森讀得仔細而會思考；他像法官般的態度閱讀，作者似乎在接受他決定生死的審判。然而作為一名作家，他就遠不是那麼有計畫了，他似乎不能做出長期的規劃。他的書越寫內容越多，越寫越長，他的非虛構作品開始時只是論文，長篇小說最初都是短篇。他原先只有記者那樣短暫的投注，一旦他對問題產生了強烈的關注，他那像法官般的尋求真理的激情就會迫使他深入挖掘，但卻耗費了相當時間。一九二〇年代他一度在《名利場》雜誌工作，之後到《新共和》、為《日晷》雜誌寫劇評，然後又回到《新共和》；他寫了詩、短篇小說，以及長篇小說《我想到了戴西》，並努力撰寫一部研究現代作家的專著《阿克賽爾的城堡》。他過著單身的「常春藤」大學畢業生那種優裕的生活，曾與女演員瑪麗·布萊爾有過短暫的（一九二二—二五）婚姻，然後於一九二九年和瑪格麗特再次結婚。這時他已是個小有名氣的文人，具有廣泛的文學興趣，並以敏銳而客觀的判斷力享有令人羨慕的名聲。

一九二〇年代的繁榮是那樣壯觀而持久，足以防止政治上的激進主義。甚至斯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 的《城市的恥辱》(揭發醜聞的文集) 這個進步的時代的一塊里程碑，也暗示美國的資本主義可能和蘇聯的集體主義一樣合理——「一個民族總是通過這種或其他途徑獲救，我想兩種都可以。」美國經濟學家蔡斯 (Stuart Chase) 在《國家》雜誌開設了為期三個月的系列專欄，討論繁榮的持久性，第一期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出版，首次在市場上引起轟動。但當經濟崩潰的範圍和相繼而來的大蕭條變得明顯後，知識界的輿論卻又反彈回去。經濟蕭條對作家的打擊尤其嚴重。一九三三年圖書的銷售量僅為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五十；波士頓古老的小布朗出版公司把一九三二至三三年說成是自他們一八三七年開始出書「迄今為止最糟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坦貝克 (John Steinbeck) 抱怨他的文字賣不出去：「人一旦破產，首先放棄的就是書。」並不是所有作家都向「左」轉，但多數人如此，他們參加了一場大範圍的不太明確而組織鬆散的運動，它時常引起爭議，卻無疑是激進的。在回顧這場運動時，文學評論家特里林 (Lionel Trilling) 把三〇年代初這股力量的出現看成是美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

可以說它創造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具有如此廣大規模和影響的美國知識階級。雖有過觀點的總的變化，但主要是左派觀點成爲這一階級存在的特徵。撇開觀點，三〇年代的政治傾向更決定了這一階級的风格——從激進主義中產生了道德緊迫感、危機意識、關懷人的拯救，正是這些標誌著美國知識分子的存在。

特里林注意到知識分子的本質已經在葉慈的詩中得到界定，那就是人不能「逃避」「心靈理智的偉大使命」，而「沒有比這更偉大的工作／清掃人類骯髒的歷史」。特里林補充，問題在於三〇年代有太多的人急於採取同詹姆斯相反的態度，急於「把主要由家庭、階級、道德或文化群體，以及社會所塗抹的歷史清掃幹淨」。

威爾森恰恰被捲入這群激動的知識分子當中，他們渴求一塊「白板」，好在上而重新書寫文明的基本文獻。一九三〇至三一年冬天，聲譽不佳、搖搖欲墜的《新共和》雜誌正缺少明確的方針，正是此時，威爾森建議它採納社會主義路線。在「對進步人士的呼籲」中，他論證道，華爾街破產之前，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人士原來滿心指望資本主義能履行諾言，為大家創造較好的生活，但資本主義已經崩潰，他希望「美國人現在在能史無前例地甘願把他們的理想主義和組織天才投入一場激進的社會實驗」。俄國將成為美國的挑戰者，因為俄國擁有「美國人讚賞的全部品質——與某種理想相結合的高效率和節約，這一理想就是在自豪、熱烈的氣氛中透過共同行動，完成一項赫克利斯式（Herculean）的業績——就像自由貨款運動——在五年之內做出一件大事的理想」。

威爾森把史達林的第一個五年計畫與自由貨款相提並論，表明羽翼初長的激進知識分子在這一階段是多麼無知，他開始以蘇聯煤礦工人勞動模範的斯達漢諾夫的工作幹勁閱讀馬克思、列寧和托洛斯基的全部政治著作。到一九三一年底，他確信變革必定是翻天覆地的，知識分子應當找到明確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出路，並給予詳細規劃。一九三二年五月，他與帕索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共同起草了一份宣言，提出一種僧侶式的政治理論，

建議進行一場「社會—經濟革命」。這年夏天，他接著發表了一份表達自己信念的個人聲明，開頭是「我期待在明年秋季的選舉中能投共產黨候選人的票」。他似乎從未真正想過加入共產黨，但他認為共產黨領導人都是「真正美國人的典範」，他們既堅持「服從嚴肅的革命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一個中央權威」，又「沒有失去對美國實際狀況的把握」。共產黨的這一主張是對的：「貧苦的大眾別無選擇，只能奪取基礎產業，依照共同的利益來管理。」

威爾森很清楚，他和他的友伴可能被看成富有、玩弄工人階級政治的門外漢。這種感覺確實是有理由的。除了讀馬克思的著作，他對這項事業的貢獻也就是為共產黨領導人福斯特舉辦了雞尾酒會，酒會上福斯特回答了剛轉為激進派的作家們的問題。威爾森引述了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一幅含有寓意的場景：有次暴雨時，李普曼待在他華盛頓的大房子裡，身著晚禮服，「舉著小煎鍋，想用來對付天花板上一個漏洞造成的水災。」——知識分子對危機無能為力的絕妙寫照。但他無意間也同樣展示了自己的畫像：他感謝忠誠的黑人女僕海蒂，她「出色地加大並補好了」他晚禮服的舊褲子，使他可以參加俄國領事館舉行的晚會，對他們的「新憲法」表示祝賀。

《到芬蘭車站》

然而，威爾森有一種真正追求真理的熱情，他實際上與這本書中寫到的其他知識分子都不同，他確曾嚴肅、真誠、持久地努力去了解社會的狀況，他希望自己當這個社會的教主。一九三一年他

完成《阿克賽爾的城堡》後，就立即投入了專題報導，這些發自全美各地的文章後來都收在《美國的不安》中。威爾森是一位優秀的傾聽者、敏銳的觀察者和一絲不苟的記錄者，他考察了賓州伯利恆的鋼鐵工業，之後到底特律去看汽車工業。他報導新英格蘭的紡織業罷工，以及西維吉尼亞和肯塔基的礦業。他又去華盛頓，再穿過堪薩斯州和中西部到科羅拉多，然後南下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他的描述引人注目，不帶偏見，善於捕捉細節，既關注階級戰爭，也關注日常的、非政治的和異乎尋常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對人和思想同樣關照——總而言之，這些文章恰恰與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相反。汽車製造商福特是「富於想像力的天才與卑鄙小人、是吝嗇和非凡意志力、是西北部的樸實閉塞與精明現實的奇妙混合」。威爾森注意到「鞋罩在底特律廣泛使用」。他記錄與經濟危機無關的爭吵、犯罪和謀殺的軼聞，描寫密西根的冬天、加州奇形怪狀的建築和新墨西哥供人度假的大農場；演員巴利莫爾的妻子是個「柔軟的小麵團」；一個中西部姑娘告訴他，她正在「充分享用資本主義的最後二十四小時」；拉古納海灘附近的舊油井鑽塔如同「拖著長及胸口的鬍子的古代巫師」；在聖地牙哥，遠處一座忽明忽滅的燈塔讓他想起「做愛的節奏」。

一九三二年那個可怕的冬天，有一千二百多萬人失業，威爾森加入了一大群前往肯塔基州觀察煤礦業罷工的知識分子中，就他所見寫出一篇觸目驚心的報導。作家們帶去了急救物資，州檢查官卻對他們說：「你們想分發多少食品就分發多少，但一旦你們觸犯法律，那我不僅有責任，而且很樂意起訴你們。」威爾森記述了小說家弗蘭克（Waldo Frank）公開威脅一位市長，這位市長說：「如莎士比亞所言，筆比劍更爲有力。我任何時候都不會怕一支布爾什維克的筆。」去參觀的知識分

子都被搜查是否攜帶槍枝，有些被驅逐，有些則挨打。在共產黨總部，威爾森看到：「畸形的人：開電梯的駝背，戴眼鏡的女侏儒，一個女人半邊臉像是因燒傷而變了顏色，但又從臉上長出一塊什麼東西。」他對於這種訪問的價值表示了正常的懷疑，寫信給帕索斯說：「這一切對我們來說非常有趣——但我不知道這對礦工們會有多大作用。」

三〇年代威爾森的激進主義中，最不同尋常的一點就是他思想的獨立和對真理的由衷關切，這使他沒有像海明威那樣成爲受共產黨隨意操縱的工具。正如他告訴帕索斯的，作家應該謹慎地成立自己的獨立組織，「這樣同志們就不能把他們當傻瓜支配了。」他已經發覺激進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容易缺少一種最重要的人類特質，即與自己所屬的社會集團認同的能力。在《共產黨人的性格》一文的註釋中，他準確地指出了知識分子的弱點：

他只能把自己的興趣與那些被放逐的少數派認同起來……他跟人類的團結只在於他想像著人類的普遍改善——這是一種動力，但力量不能高估——他在與人類的直接連繫中失去的東西，可以透過他的另一種能力得到彌補，也就是使目光越過這些關係和相關之人：他的家庭和鄰居。

對於像威爾森這樣強烈關注人類生活和性格的人來說，這種補償遠遠不夠。他決定不僅從理論淵源上探究共產主義——他已經著手寫《到芬蘭車站》，是一本敘述馬克思主義學說史的重要著作——還要考察它在蘇聯的實際應用。爲掌握真實情況，他在某些方面付出了比三〇年代任何知識分子

更大的努力。他學習用俄文閱讀和說話，精通許多俄國文學原著。一九三五年春天，他申請到一筆二千美元的古根海姆獎金前往俄國進行研究，乘坐一艘俄國客輪前往列寧格勒，很快就在船上與人攀談起來。他從列寧格勒到莫斯科，然後坐船順著伏爾加河到了敖德薩。當時大清算剛剛開始，遊客仍可以自由活動，不過他在敖德薩患了猩紅熱，接著腎臟病又突然發作。他在一所破舊骯髒卻自由得出奇的隔離醫院裡度過好幾個星期，那兒是慈善和臭蟲、社會主義和污穢的混合，許多人物都像直接從普希金作品中走出來似的——實際上，普希金活著時，那座醫院已經建成了。這所醫院為他提供了在別處無法找到的、進入俄國社會的通道。結果他離開俄國時，是帶著對史達林不斷加深的厭惡和對整個制度不安的懷疑，但他對俄國人民滿懷敬意，對他們的文學則崇拜得五體投地。

顯然，威爾森抑制不住對人的興趣，他不希望人被概念所掩蓋，這使他不能長期保持知識分子的立場。三〇年代末，文人的所有天性和熱望都回到他身上。但讓自己擺脫左派和馬克思主義的誘惑卻不是個容易的過程。《到芬蘭車站》越寫越長，直到一九四〇年才終於出版，到了第二版威爾森才譴責史達林主義是「有史以來最恐怖的暴政之一」。這本書本身就是個混合物，其中有些段落寫於他發現馬克思學說在思想上的衝擊勢不可擋的時期。因此他把馬克思的三部尖刻的政論著作《法蘭西階級鬥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和《法蘭西內戰》並稱為「現代人文科學史上最偉大的重要成果之一」。然而，威爾森顯然不能無視事實，也不偏愛思想——那種偏愛是真正世俗知識分子的標誌。他是否也具有極度的自我中心主義的特徵？正如我們看到的，這一點是這些知識分子所特有的。當我們注意到他性格的這一方面並審查他本人的行為時，發現證據並不充分。威爾森有

四個妻子。他和第一位妻子由於各自的經歷差異太大，協議分手，但仍保持著友誼。第二位妻子於一九三二年九月穿著高跟鞋參加聖巴巴拉的晚會時，絆了一跤，從台階上摔下來，因腦骨碎裂而死。在他熱中於馬克思主義的俄國期間，仍是獨身，不過一九三七年他遇見了才華橫溢、比他小七歲的年輕作家瑪麗·麥卡錫，第二年就和她結婚了。

第三任妻子為威爾森的政治生活增添了新的內容。瑪麗·麥卡錫體現著她的家庭背景和個人意向的奇妙混合。她來自西雅圖，母親既有猶太又有新英格蘭清教徒的血統，祖父母是第二代愛爾蘭農業移民，靠穀物輸送機生意起家。她出生於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下面還有三個弟弟，但不久就都成了孤兒。瑪麗先由信天主教的叔叔和嬸嬸撫養，後來由信新教的外祖父母撫養。她所受的教育處於兩個極端，一部分來自天主教修女學校，另一部分來自著名的瓦莎（Vassar）女子學校。可想而知，她既像個被寵壞的修女，又像個女學究，她真正的抱負在戲劇，寫作僅是權宜之計，但她極擅此道，是個極為敏銳的評論家，很快確立了聲名，先寫書評，後來寫劇評。她嫁給一位不成功的演員兼作家約翰魯德，但很快在事業上超過了他，他們的婚姻維持三年，瑪麗在其出色的短篇小說《殘酷而野蠻的條約》中詳細分析了這件事。她的第二次冒險是在一九三七年與拉夫同居，他是《黨派評論》雜誌的編輯，出生於俄國。從此瑪麗進入紐約激進運動的中心。

知識分子的女友

曾有人提出一個似乎荒謬卻真實的觀點：三〇年代的紐約「成了蘇聯最有趣的一部分……在這裡，史達林和托洛斯基之間的鬥爭可以公開進行」。鬥爭在《黨派評論》內部和周圍激烈展開，這份雜誌創辦於一九三四年，起初由共產黨控制。編者拉夫是一個自行其是、不肯聽話的人，所受的正規教育於十六歲時就結束了，之後他便獨立生活，睡在紐約公園的長椅上，到公共圖書館讀書。三〇年代初，他與威爾森同時轉而信奉馬克思主義，《給青年作家的一封信》標誌著他的轉變，他在信中堅稱：「我們必須斬斷與這個被稱為資本主義的瘋狂文明的一切連繫。」他在《黨派評論》上準確地說出了時代的流行現象——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窮苦已下降到工人農民的水平，他寫道：「爲了成爲無產階級思想上的助手，我已經扔掉了受資產階級作家影響的虛偽的教士長袍。」拉夫是他所謂「文學的階級戰爭」的偉大組織者，這個名稱是他一篇文章的標題，但在一九三六年因莫斯科審判一事與共產黨決裂了，他認定那是一場陷害。拉夫是作家們熟悉的守護者，對他們的集體情緒極爲敏感。他把《黨派評論》暫停了一段時間以觀察文學界的輿論動向，然後重新把雜誌辦成準托派的喉舌。他發現自己猜對了：當時環境下大多數的重要作家都站在他一邊，其中包括他的情婦瑪麗·麥卡錫，這個美麗活潑的年輕女人是個很有價值的意外收穫。

嚴格說來，把她吸引到史達林——托洛斯基之戰上來的並非政治本身，而是鬥爭帶來的戲劇性激情。芝加哥的小說家法雷爾（James T. Farrell）寫道：「現在史達林和托洛斯基雙方的支持者之間劃出了一條血線，就像一條不可逾越的河流。」共產黨頭子布朗德爾說，在共產黨會議上散發傳單的托派分子，抓到後就應該「消滅」。瑪麗後來把《黨派評論》的辦公室描繪成聯合廣場上的獨立部

隊：「整個地區都是共產黨的勢力範圍；『他們』無處不在——街道上、自助餐廳裡；幾乎每一幢被遺棄的建築裡都至少有他們的一個前線組織、學校或出版物。」《黨派評論》搬到阿斯特區與共產黨的《新大眾》共處一座樓內：「在電梯裡遇見『他們』，沉默地一起下來，忍受他們的漠視，這常常是一種可笑而又可怕的場景。」她似乎覺得這種帶著濃重火藥味的宗教戰爭令人激動。她所受的古板天主教道德訓練如何能保留下來，確實是個有趣的問題，比如教義常常嚴格規定，拒絕與任何破壞她的道德思想、政治準則的人談話、共進午餐或交往。她對政治本身的實際了解和關注並不多。她後來承認自己不知不覺地採取某種政治態度，常常是出於炫耀或取樂的願望。她太富批判性，不可能成爲三〇年代那種意義上的「同志」。她後來比較了托洛斯基與甘地，說明她對兩者都知之甚少。即使是當時，她也會在左翼集會上，在微醉狀態下揭露保皇黨勢力的鞏固或沙皇一家遭到的殘酷屠殺，以致引起一陣騷亂。回顧起來，她給人的感覺完全不是一個政治動物：最初對共產主義一無所知，後來成爲共產主義者，接著偶然成了托洛斯基分子，又變爲反共分子，最後不過是個溫和而變通的左派而已。但自始至終她都極具批判意識，部分是天生的，部分來自英語文學批評方面的訓練；其實她真正感興趣的是人而不是思想，嚴格說來，她比較算是個知識分子的女友，而不是我們這裡所定義的知識分子。

而瑪麗·麥卡錫願意做知識分子的女友還是做一個文人？拉夫毫無疑問是知識分子，卻無魅力。儘管他善於引導所謂「具有獨立思想的芸芸眾生」，卻非常嚴密地隱藏自己內心的情感。小說家斯蒂倫（William Styron）說他「是那樣守口如瓶，幾乎無法了解」。瑪麗也注意到：「如果說沒有

兩個人是相像的，他就是最與眾不同的一個。」波德霍雷茲（Norman Podhoretz）後來證實他「權力欲極強」。

於是，瑪麗·麥卡錫這位迷戀於紐約的黨派鬥爭卻不易被長期控制的浪漫女子，擺脫拉夫的影響，嫁給了威爾森。從理論上來看，這也許會成爲文學的聯姻，就像沙特和西蒙波娃那樣出色而持久的知識分子組合，然而實際上他們這種人的組合根本不可能成功。誠然，威爾森對待女人的態度與沙特有相似之處：即自我和利用。威爾森和康納利（Cyril Connolly）在一九五六年有過一次關於妻子問題的談話，談話記錄清楚地表明，在他看來，妻子的基本職能就是爲丈夫服務。他慫恿康納利擺脫現任妻子：「他應該得到另一類能更好地照顧他的女人。」康納利回答說他確實正試圖採納威爾森的建議，把自己解放出來：「我仍被粘在捕蠅紙上——我已將腿伸出大半，但還沒能完全脫身。」這兩人都把妻子們當成某種高級僕役來談論。

但威爾森跟沙特不同，他總帶著懷疑和相當程度的恐懼看待女人。他年輕時就認爲，女人是「保守主義勢力最危險的代表」，而與之對立的文學界勇士，「畢生都是一場抗爭」。他按照自己的想法，透過用另一種方式繼續施行知識分子通常很喜歡的「公開性」策略來保護自己：他在筆記本上草草寫下大段記錄，描述情婦們種種最親密的姿勢，尤其是她們與他的性關係。威爾森既是評論家又是小說家，他養成記筆記的習慣主要是受了《尤利西斯》的作者喬伊斯的影響。他認爲確實在地記下所發生的事就可以驅除某些性的恐懼和女人對他的權力。他記了很多美麗女詩人米萊（Edna St. Vincent Millay）令他著迷的事，她是威爾森的第一位，或許也是最摯愛的情人。他記述自己怎樣與

同住一套公寓的年輕人比索——也愛上了她——達成協議，分享米萊，比索愛撫她的上半身，下半身則屬於威爾森；她稱他們為「來自地獄的男孩合唱隊」。他還寫下買第一個避孕套的情形：「我到格林威治大道的藥店，在外面緊張地觀察了半天，以確證裡面沒有女士。」售貨員拿出一個大力推薦的橡膠避孕套，把它像個氣球一樣吹起來以示可靠。「但那玩藝兒破了，事實證明這是個預兆。」他記錄自己怎樣染上性病，還說自己是「性行爲的諸多危險的一個受害者……墮胎、淋病、感情糾葛和一顆破碎的心」。他對女人們與他發生關係前必須脫去的衣服有種生冷的興致：去掉「一條該死的腰帶」，就「像在吃貝殼類食物」。

最完整的段落大多是關於他第二任妻子瑪格麗特的，「她脫了衣服站在第十二街的起居室裡，胸部渾圓，柔軟而豐滿（皮膚白皙）。」她有一個「短短的小腳趾，因而我喜歡擁抱赤著腳的她，她赤裸地站著，豐滿的臀部和胸部，高大的身體和小巧的雙腳」。他還注意到「小而有力的雙手（握得很緊）……躺在床上時，她纖細的胳膊和雙腿，以及龜爪般的小手伸到每一個角落」。他描述和穿著古典舞會服裝的瑪格麗特在扶手椅上做愛的情形，「有點難對付——她以前曾把一條腿放到過胳膊上面嗎？」還有，「她脫下裙子時，內衣也隨之滑落……我是那些隨時準備好的姑娘，她說」。然後還有婚外的艷遇，有個女人「告訴我她想要我打她時，我真被嚇了一跳；她的某位朋友就喜歡鞭打自己的妻子。我買了一把帶硬毛的髮刷……起初只擦過她的身體，後來就變成抽打。我發現有點困難，也許是因爲壓抑。她事後說自己非常喜歡」。他在科森街結識的一名妓女，「幹得精力充沛又威風十足」。許多女人——多得也許都不能置信——崇敬之情溢於言表：「你真棒！」還有些諸如此類

的話。

他的第四位妻子埃莉娜受到同樣的對待。一九五六年的競選期間：「我們坐在沙發上聽總統候選人斯蒂文森在麥迪遜花園廣場進行競選演說，我開始伸手撫摸她——她正半坐半躺……當轉播中斷後，我們進入了某種更刺激的動作。」他繼續寫道：「現在我似乎再也得不到滿足。」在英國時，他厭倦了牛津修道院般的陳腐生活，急急忙忙回到倫敦，「衝向已經上了床的埃莉娜」。

他在與瑪麗·麥卡錫的第三次婚姻期間所記的筆記中，沒有任何類似帶點情色的內容；至少沒有公開發表。他們的結合從一九三八年二月維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但似乎從一開始就是失敗的。沙特也許會像對奴隸一樣對待西蒙波娃，可從未告訴她該寫些什麼。然而威爾森堅持要瑪麗寫小說，把她當做一個需要學者督導的聰明女學生來對待。瑪麗顯然是在威爾森的懇求下才嫁給他的，成為夫妻後就發現他很專橫；更多時候他不是提出意見，而是做出裁決，被她稱為「欽定本」。他喝很多酒，在他喝醉時，如果脾氣暴躁的瑪麗感到厭惡，他就會變得非常凶暴。後來她的短篇小說裡出現過醉醺醺的總愛尋釁的紅髮男人（威爾森就是紅頭髮，不過眼睛是褐色的），還有過眼睛被丈夫打得又青又腫的女人。

這樁婚姻一直拖到一九四六年，但正如瑪麗自己在離婚訴狀的證詞中所說的，致命的決裂在一九四四年的夏天就發生了。有次為十八個人所舉辦的晚會結束之後，客人都回家了，她正在洗盤子：

我問他是否願意倒垃圾。他說：「妳自己去倒。」我把兩大桶垃圾拖出來，穿過紗門時，他嘲弄地鞠了一躬，重複道：「妳自己去倒。」我打了他一個耳光——並不太重——出去倒掉垃圾便上樓。他叫我，我下去了，他從沙發上站起身，重重地揮拳打在我的臉和身上。他說：「妳覺得和我在一起不快樂。好吧，我給妳找些不快樂的事。」我衝出房子跳進汽車。

這場倒垃圾的爭吵後來被她寫進《神靈保佑的一生》，小說中，瑪莎對紅頭髮的墨菲非常害怕。

「除了墨菲，沒有人能把她嚇住……和墨菲在一起，她總是做著自己討厭的事。」瑪麗寫信給威爾森，聲明墨菲並不是他，他回信說還沒讀過那本書，但「我猜想那只是妳筆下又一個惡毒的紅髮愛爾蘭人」。

事實上，瑪麗個性太強，天賦又出眾，不可能成為這樣一位傲慢而專制的人物的理想伴侶。起初她或許打算延長對左翼政治的介入，但最終她的獨立精神促使威爾森對宣稱為進步的所有思想都產生了厭惡，她的離去標誌著威爾森終於由知識分子轉而重新擔當起更符合他天性的文人角色。一九四一年，威爾森在科德角（Cape Cod）的威爾弗利特（Wellfleet）買了一棟老式大房子，後來又繼承了家族位於紐約州北部的石造大宅，此後他像帝王一般根據季節來往於兩處住所之間。他的第四位妻子埃莉娜是個具有一半德國血統的葡萄酒商的女兒，來自盛產香檳的法國東北部城市理姆斯。威爾森帶著自鳴得意的讚許，注意到「她坦誠自然的勃勃生氣，襯托著文雅高貴的舉止」；他找到了埃莉娜這個「出色的調節者」，於是「重新開始正常工作」。埃莉娜遵照一大堆老派的歐式規

矩料理他的房子，把舒適與優雅帶進他的生活。他心滿意足地接受了她的規矩，整天穿著睡褲和晨衣，以他一貫堅持不懈的態度工作著。到下午五點就換上熨得筆挺的禮服和乾淨的襯衫、領帶，進入他所謂的「社會日程」。

從知識分子變回文人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他為轉向文學的傳統紳士的新生活做了一份記錄。他帶著一群狗散步：「牠們與一層薄雪相映襯，格外雄健」。沼澤地「在科德角灰色的天空下一片嫩黃，顯得寬闊而柔和」。他完成了「整整一天的工作」，「喝過兩杯不摻水的上等蘇格蘭威士忌」。此刻他「站在屋裡享受著它的明亮和舒適——餐廳的拱窗，蠟燭的柔光……」。八年後，他寫了一篇散文（六十歲的作家），以平和的語調稱頌延續傳統的重要。他指出：「美國的生活很容易遭受混亂、挫折、災難性的崩潰和逐漸的衰竭。」他年輕時，曾對這種命運感到恐懼，但現在，「在我六十一歲時，我發覺最讓我滿意的一件事就是自身的延續感。」他回到鄉村，「被童年時讀過的書和屬於我父母的家具包圍著」。當時他僅僅「沉湎於往事中嗎」？絕不是；他是「位於事物的中心——因為中心只能存在於一個人的頭腦中——而我的感情和思想是許多人共有的」。他這種生活態度和亨利·詹姆斯相去不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轉變為文學紳士，威爾森仍保留著當初把他推向激進的知識分子生涯

的那些基本性格。他總是懷著巨大的熱情為真理奮鬥，但他思想中存在的一些偏見毫不留情地阻擋著他接近真理。他的英國恐懼症並沒有像其他激進的衝動那樣減弱，它是反帝國主義情緒、對英國等級制度的憎恨和純粹的不安全感的混合物。從他戰後的筆記中可以感覺出，他寫下這些話時真是咬牙切齒：邱吉爾「令人厭惡和難以忍受」。他注意到（非常嚴肅地）：「據說英國人無聲無息卻又小心翼翼地在大麻業控制在他們手中。」他小心地忍受著下列一切：「牛津式的拒絕」、「英國式的惡意競爭」、「他們說『是』的兩種方式」——冷漠和缺乏誠意，「他們用一個特殊的詞『文明』來形容對其他地方來說不過是普通的禮貌行為」、他們「煽動暴力」的傾向、他們「偽君子的國際名聲」。他提到「不講信義的英格蘭」、「傲慢的英國人」，並且承認：「我在這裡已經變得那麼仇視英國，我開始同情史達林，因為他正讓英國人處境艱難。」

關於威爾森一九五四年的另一次英國之旅，我們不僅能看到他自己充滿怨恨的敘述，還有在牛津接待他的以撒·柏林（Isaac Berlin）的一篇有趣的速寫。威爾森宣布：「我目前在英國的策略是審慎地進攻。」他很高興地發覺英國知識分子比以前更「偏執」和「孤立」，牛津也已「破舊不堪，腐敗墮落」。他住的屋子「是像紐約的四等公寓那樣陰暗狹小的鴿子籠」，校舍裡的僕人「顯然心懷不滿」。有一晚遇見了小說家福斯特（E. M. Forster），「一個乍看像辦事員或眼鏡店職員的極矮小的人」，他挑釁地說，儘管他對福斯特最喜歡的三部書：《戰爭與和平》、《神曲》和吉朋（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有著同樣的熱愛，「我認為《資本論》可以與之相提並論」。這是文人與知識分子相對抗時做出的驚人論斷，威爾森注意到他的話果然使福斯特「有些窘迫」。福斯特趕

緊提出珍·奧斯汀這樣一個安全的話題，然後藉故慢慢離開：「唔，我不該把你同其他人分開。」可惜這句話中輕蔑的諷刺意味威爾森沒有覺察。當柏林問他是否「不喜歡在倫敦會見的所有文學界人士」，威爾森回答：「不，我最喜歡沃（Evelyn Waugh）和康納利。」「爲什麼？」「因爲我覺得他們非常猥褻。」

威爾森對其他作家的敵意，其實是他與許多知識分子又一個共有的特徵。勞倫斯的腦袋「小得不成比例，可看出他屬於下等階層——缺乏教養、尚未成熟的煤礦工」。威爾森筆下還有這樣一幅幅可怕的情景：菲茨傑拉德借酒澆愁，醉得躺在地板某個角落；洛威爾（Robert Lowell）暴躁而抑鬱；卡明斯（e. e. cummings，譯註：美國詩人、畫家，爲嘲弄傳統觀念而把自己的名字都改爲小寫）有著「女性」的聲音；奧登「肥胖而且老於世故……他忽然告訴我們說他不善於用鞭子打人」；帕克（Dorothy Parker）用了太多的廉價香水。布魯克斯（Van Wyck Brooks）「不理解偉大的文學作品」；康納利「從來不聽其他任何人說的俏皮話或小故事」；艾略特「身上某個地方」躲著「一個惡棍」；西特韋爾姐弟（Sitwells）「爲人了無生趣」。他居高臨下，評判中包含著許多憎惡。

對世俗事務缺乏平和的心態，是我們在知識分子隊伍中經常遇見的情況，也是威爾森離開他們很長時間後仍無法擺脫的問題。這在威爾森與美國國內稅務署官員的艱苦鬥爭中突然災難性地表現出來，爲此他寫了一本頗爲憤慨的書。他的問題很簡單：一九四六到五五年期間，他一次也沒有申報過個人所得稅，這在美國和在大多數其他國家一樣，是嚴重的罪行。事實上，美國用罰款和監禁對此罪行的懲罰通常格外嚴厲，以致威爾森第一次向律師承認自己的違法行爲時，律師「立刻告訴

我，我顯然陷入了極大的困境，最好的辦法就是成爲其他國家的公民」。他爲自己沒有守法的辯護讓人覺得軟弱無力，他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個自由職業者。一九四三年底，他在《紐約客》雜誌得到了一份固定工作，工資中已扣除所得稅。一九四六年他出版《赫卡特郡回憶》，市場極爲成功，那時他擔任《新共和》雜誌的副主編，拿到的最高薪水已達七千五百美元。但就在這一年，他再次結婚，不得不爲前兩次離婚支付各種費用，他爲此利用了《赫卡特郡回憶》一書帶來的意外之財。他說自己當時是打算補交所得稅的，因爲書正暢銷，收入不斷增加，但此書突然被控淫穢，收入也就中斷了。於是，「我想最好等我掙了更多的錢，再去申報一九四五年以來的所得稅」。一九五五年，機會來了，《紐約客》發表了他研究死海經卷的備受推崇的長篇論文，該文還被改寫成一部成功的專著。就在那個時候，他去找稅務律師，後者的忠告令他青天霹靂：「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我們的稅制已變得那麼苛刻，也不知道對沒申報個人所得稅的處罰那麼嚴厲。」

這樣的供認實在令人驚訝。這是一位整個三〇年代期間廣泛評論社會、經濟、政治問題的人物，還曾經向當局提出過公共開支過大的意見和主要工業國有化的強烈建議。他還出版了一部大書《到芬蘭車站》，對那些透過占有資產階級財產來徹底改變普通人地位的思想，他曾以極大的熱情追溯過它們的發展。他對於國家在實行他熱烈擁護的「新政」期間付出的高昂代價有何感想？難道他不覺得促使這些改革實行，是每個人的責任，尤其是像他這樣對那些不太支持新政的人們負有直接道義責任的人？他所贊同的馬克思主義口號「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究竟如何？或者他認爲這只適用於他人而不適用於自己？簡而言之，這是一個關注人類卻不關心具體的人的激進分子嗎？威爾森

的態度其實是那種典型的知識分子：他以偉大道德權威的口吻告訴世人怎樣處理各項事務時，卻認為這些意見實際上同他自己無關——那是「普通人」的事。

兩位律師和一群會計，共花了五年時間才結清威爾森欠下的稅款。國稅局自然要給他吃苦頭，罰了他六萬九千萬美元，其中有十年百分之六的利息，加上百分之九十的罰款——百分之五十因為欺騙，百分之二十五因為拖欠債務，百分之五因為沒有報稅，還有百分之十是因為隱瞞收入。不過這算比較寬大的處置了，威爾森每次不申報所得稅都該被監禁一年，而且由於他以貧窮為藉口替自己辯護，還不得不支付一萬六千美元的訴訟費，國稅局最後以二萬五千美元的折衷方案使他免受重罰。對此威爾森本該感到慶幸，但他反倒寫了充滿攻擊謾罵的《冷戰與所得稅：一份抗議書》，這完全是失去理智的反應。這些麻煩使他恐懼地發現：現代國家行使最富挑戰性的職能——作為收稅人的角色——所具有的殘酷性，但對於一個曾以從理論和實踐上研究國家為己任而又富於想像力的人來說，這並不應該是個意外。他站在道德上最軟弱的立場攻擊國家，他在堅定支持國家以人道的理由所進行的擴張時，極大地忽視了它惡的潛質，而只有當他由於自己的疏忽與之發生衝突時，才被激發了反抗情緒。這正好就是威爾森的狀況。他在書中試圖迴避自己的前後矛盾，他爭辯說，大部分所得稅都花在由冷戰狂熱症引發的國防開支上。但那時他自己的所得稅還沒交，也並沒有用於國防。他還忽略了一個要點，那就是到他支付稅款的時候，聯邦政府的所得稅用於社會福利的比例正迅速增長。對這一點也避而不談合乎道義嗎？總之，這本書表現了威爾森最陰暗的一面，讓人慶幸的是，他到四十歲時，就基本上不再是個涉足政治的知識分子了。

事實上，一旦回到文人的真正角色，威爾森成熟時期的創作產量驚人，包括《死海經卷》、關於印第安人聯盟的《向易洛魁人致歉》和論述美國內戰時期文學的《愛國者之血》。這些書和其他許多作品的共同特徵就是體現了勇氣與勤奮——研究經卷要學習希伯來語——以及對真理堅定不移和鏗而不捨的關注，這就把他與多數知識分子區分開來。更能顯出威爾森與眾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和寫作都圍繞著一個中心：對作為群體和個體的人而非抽象的思想，給予強烈而熱情、深刻而開明的關懷，正是這份關懷讓他的文學批評注入了色彩和生氣，令人愉快。威爾森在最清醒的狀態下，心頭總是存有一種認識，即作品不是脫離現實的東西，而是來自男男女女活生生的心靈與頭腦，理解它們關鍵在於主題與作者之間的互動。思想的殘酷就在於以為可以強迫人類去適應它。偉大藝術作品的德行就在於它所確立的、透過闡發個體到表現一般的方法。談到米萊時，威爾森的文字充滿動人的光彩，他提出了詩人一職的完美定義：

當她對個人的深切體驗做出最高的表達時，她能夠讓自己與更普遍的人類經驗認同起來，並作為人類精神的發言人站在前列，宣告它的危難與興衰；但作為人類表達方式的大師，她憑藉語言本身的光輝使自己超越常見的困窘、壓迫與恐慌。

這正是威爾森的人道主義，使他能夠理解這一過程，並把他從太平盛世的迷途中拯救出來。

11 高蘭茨——被良心折磨的出版家

書香門第

對知識分子的任何逐例研究，都突顯了一件事：他們很少注重真實。他們都急於發揚救贖和超越的真理，把這種真理的確立視為他們對人類的使命。在論證過程中遇到的客觀事實所體現出來的世俗、日常的真理，他們並沒有多少耐心；這些棘手、比較次要的真理被漠視、篡改、修正，甚至被處心積慮地壓制。我們已經考察過的那些人中，也多少有這樣的毛病，唯一的例外是威爾森，也許他根本不是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現在再來看另外兩個知識分子，在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中，瞞騙——包括自欺——成了關鍵性的角色。

其中第一位是高蘭茨（Victor Gollancz，一八九三—一九六七），他的重要並不是因為提出了卓越的思想，而是因為他是一位代理人，通過他，許多思想強烈而明顯地影響了社會。也許他是二十世紀卓越的知識分子政論家，他絕非壞人，即使犯錯，也會意識到良心在刺痛。但他的經歷表明，

在推廣太平盛世論時，瞞騙的效果達到了驚人的程度。甚至在他活著的時候，與他人交往過的人也意識到，他對真理是多麼傲慢。但是現在，要感謝他的女兒麗薇爾的誠實，她公開了父親的文件；也要感謝第一流的傳記作家愛德華茲（Ruth Dudley Edwards）的公正和技巧，高蘭茨瞞騙的伎倆可以接受準確的檢查了。

高蘭茨的出身很幸運，婚姻更幸福，他生於書香門第，又與另一個門當戶對的家庭聯姻。高蘭茨一家是來自波蘭的正統猶太人，祖父是漢布魯猶太教堂中唱詩班的領唱，父親亞歷山大是勤勉成功的珠寶商，虔誠而博學；叔父赫爾曼·高蘭茨爵士是拉比和猶太學者，從事公眾服務業；另一個叔父以色列·高蘭茨爵士是莎士比亞學者、不列顛科學院秘書，倫敦大學英語系實際上是由他創建的；一個嬸嬸是牛津的學者，另一個嬸嬸是優秀的鋼琴家。他妻子露絲也受過很好的教育，上過聖保羅女校，受過藝術家的訓練，娘家羅伊一家，以成功地結合學術、藝術和商業而著稱，家中的女性也都與男子一樣，積極地追求文化（葛拉茨〔Graetz〕著名的《猶太史》就是由貝拉·羅伊翻譯成英語的）。

在高蘭茨的一生中，周圍的人物都沉浸在歐洲文明的光輝之中。他很小就有了各種享受的機會，他是家中唯一的兒子，父母寵愛他，姐妹們服從他，實際上他被當成唯一的孩子。他有大量的零用錢，得以很早就迷上歌劇——二十一歲的時候就已經看了《阿伊達》四十七次——參觀歐洲的歌劇院，是他標準的度假形式，直到他去世都是如此。他得過聖保羅的獎學金，得到極好的古典教育——每週兩次把《泰晤士報》的社論翻譯為希臘文和拉丁文——免試升入牛津的新學院，後來獲

得校長拉丁論文獎，古典文學的成績得到甲等。

高蘭茨也是個激進的知識分子，他從易卜生、梅特林克（Maeterlinck）、威爾斯、蕭伯納、惠特曼那裡吸取激進思想，似乎很早就對多數重大的問題有了定見，之後也從未改變自己的觀點。在中學和大學，他的同伴們就發現他很固執而且自信滿滿。他很早就拋棄了猶太教，理由是無法忍受從他梅達谷（Maida Vale）的家到拜斯瓦特（Bayswater）的猶太教堂之間四十分鐘的步行路程（因為猶太教在安息日禁止乘車），他的誇張可見一斑——實際上只需要十五分鐘。在牛津大學時，受一位激烈的無神論者莫萊的影響，他從猶太革新派變得什麼也不信了。但是後來，他又以「至上者」耶穌為中心，為自己建立了一種柏拉圖式的、基督教的獨特版本。這種滲透性的宗教有個很大的好處，無論高蘭茨採取什麼世俗立場，都可以得到教義上的認可。不過他也行使猶太人的特權，講一些無關痛癢的反猶太人的笑話。

高蘭茨有一陣子視力很差，使他得以避開第一次世界大戰，此後隨之而來的是他的災難期。他在諾森布蘭德火槍營當少尉，其間因違背軍規而使自己十分孤立，受到少尉軍事法庭的威脅，躲到雷布頓教古典文學。他教六年級，那裡所有的學生都即將上前線，很可能有去無回。高蘭茨證明了自己雖然具有破壞性，但也是出色的教師。他已是半個和平主義者（雖然是個少見的攻擊型的和平主義者）、理論上的女權主義者、勉強算是社會主義者、反死刑者、刑罰改造論者、（在那時）未知論者。他決定改變在所有這些問題上的信仰，他後來寫道：「我決心與男孩們和所有我能掌握的人日夜談論政治。」他後來一生中的格言是：他是先知、朝聖的博士（Magus），他掌握了真理，並決

心把它灌輸給其他人。家長們並不希望孩子服從於一個有特權接近他們的人——他是在濫用自己的地位，其中包含了不誠實——所做的顛覆性的宣傳。高蘭茨並不介意家長們的這種想法，實際上，他與同事施姆威爾一起為自己的態度辯護，寫出了兩本小冊子：《一所公立學校裡的政治教育》，要求把「學習政治作為公立學校教育的基礎」；另一本是《學校和世界》。詭計多端的校長（後來成為坎特布里大主教）費希爾承認高蘭茨有傑出的能力，也注意到多數職員無法容忍他，就警告他懸崖勒馬。後來——根據陸軍部的命令，陸軍部已經編了一個在雷布頓的「和平主義者的活動」的檔案——在一九一八年復活節那天突然把他解僱了。

大膽的商業作風

高蘭茨其後的經歷是在負責猶太人食品分配的食品部工作，之後在新加坡度過了一段時期，後來又為急進研究集團和羅恩特里信託公司工作，最後在本恩兄弟（Benn Brothers）出版公司擔任發行人時發現了自己的特長。這家公司出版眾多雜誌，比如《果農》、《汽油世界》等，高蘭茨發現這些雜誌很沉悶，包括大部分參考書。他說服了本恩爵士，讓他把書籍部改造為獨立公司，他擁有代理權和股份，三年之中取得了驚人的成功。本恩在日記中寫道：「這反映了對高蘭茨的天才的最大信任，他一個人承擔了責任。高蘭茨是個猶太人，他很難能可貴地把教育和藝術的知識與經營能力結合了起來。」高蘭茨的秘訣是成批出書，包含各種價格策略，不受季節和流行變化的影響，還厚

顏地使用輕浮的廣告做選擇性的推銷。他出一些關於新技術類——如自動電話——的書，那些生意人就不能不買；此外，他也出各種小說。他開創了極爲成功的「本恩六便士叢書」，已勾勒出「企鵝叢書」的輪廓。天平的另一端是昂貴的藝術圖書，如《睡著的公主》，使用巴克斯特（Bakst，譯註：俄國畫家、舞台設計家）的設計，根據他所聘用的出色助手傑洛德所說，藝術圖書中有點瞞騙行爲，彩圖是贗品，是由袖珍畫家所繪，然後再拍成照片。到了一九二八年，高蘭茨每年掙到五千英鎊，但他想得到公司的一半股票，並改名爲「本恩和高蘭茨」公司，本恩爵士拒絕，他於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把本恩一些最優秀的作者拉了過來，如賽兒絲（Dorothy Sayers）便是其中之一。

新公司的結構很奇特，有高蘭茨過人能力的烙印：爲符合他的利益，他勸誘別人放棄自己的利益，服從他的安排。他投入的資本遠低於一半，卻使自己當上了執行董事，絕對控制著投票權和股息支付前的百分之十的純利，這同羅德斯（Cecil Rhodes，譯註：英國人，一八七〇年代在南非開採鑽石致富。曾任好望角總督，後以他的姓氏爲名建立了羅德西亞〔現名津巴布韋〕）在南非的鑽石和黃金投資中所作所爲完全一樣，也許高蘭茨的靈感得自於他，之所以行得通，是因爲幾乎從一開始公司就賺來大量利潤，投資者獲利甚多，足以讓他們滿意了。高蘭茨的成功是因爲他的書暢銷，特別是小說；暢銷的原因是低價格策略，並將廉價製作的書加上天才的印刷專家莫里森（Stanley Morison）的出色設計：統一用紅色和黃色的新式封面，然後採取在英國甚至美國出版業都從未見過的強迫宣傳吹捧這些作品。

高蘭茨公司的繁榮除了這些商業方面的原因外，還經常使用秘密、精明和欺詐的手段。他的間

諜向他報告其他公司的情報，特別是不滿的作家情況，如果高蘭茨認為這個作家有爭取的價值，就會給他寫一封長信，加上所擅長的奉承。還有些人不請自來，因為高蘭茨在鼎盛期比大西洋兩岸任何出版家都更善於推出新人，或是把一本平凡的書變成暢銷書。甚至「廣告促銷」這個詞在倫敦爲人所知之前，他已使這門藝術變得完美了。高蘭茨陣營中的作家曾經發現其弊端，但是他卻真誠地相信，在賣書的時候，他的廣告方法遠比書本身重要得多，他爲了提高廣告預算，毫無顧忌地強迫作家接受較低的預付款和版稅。他恨經紀人，因爲這些人不喜歡他的做法，他盡一切可能勸告作家不用經紀人。他喜歡莫瑞埃（Daphne du Maurier）這類作家，因爲他們對錢不感興趣。他常常在「友誼的基礎上」達成口頭協議，自信記憶力很好。他有在腦袋裡重新編寫歷史的驚人本領，然後慷慨激昂、不容置疑地捍衛他的新版本，於是就出現了糾紛。當小說家戈爾丁（Louis Golding）責怪他沒有付給其暢銷書《木蘭花街》原來答應的紅利時，高蘭茨用一封六頁的信來回答，表現出一派真誠，讓人以爲他的正直受到了傷害、他的行爲沒錯。對一個向他的記憶力挑戰的經紀人，他寫道：「你竟敢這樣！我是不可能犯錯的！」他那些大膽的商業作風，依靠令人生畏的怒火和叫囂來維持。他激動起來的時候，整個大樓都聽得到他的聲音，他喜歡拿著長線的電話在辦公室裡走來走去，一邊對著話筒向經紀人或敵人大喊大叫。他的信變化多端，可以從歇斯底里的怒火到甜言蜜語的請求——他對此道高人一等。當他發怒的時候，會把急件扣押一天，讓「太陽煽動我的怒火」，結果在他的文件中有許多打上了「沒有發出」的標記。一些作者因此屈服投降，另一些作者則躲掉了，不過在一九三〇和四〇年代，對公司有利的是，至少到這裡的作者能夠平衡。

獲得高利潤還有另一個原因，高蘭茨付給的工資低，當有人提出需要時，他會支付一筆錢或提供貸款，而不是增加工資或預付款。在許多方面，他像狄更斯筆下的人物，吝嗇時會求助於他的橡皮圖章董事會，要求董事會強迫他節儉。他會說：「我的董事會，正如我口述的這封信，指示我……。」即使以出版行業的標準來看，他所付的工資也是偏低的，爲此他盡可能僱用女性，從女權主義的立場看似公正，確實做了一件好事，但真相可從兩方面來看：首先，可以勸使女性接受更低的工資和更惡劣的工作條件；其次，女性更能服從他那極情緒化的處事方式，他會向她們大發雷霆，弄得她們淚流滿面；他會擁抱她們，不分對象親吻——這在三〇年代是少見的——或用小名喊她們，說她們是多麼可愛。有些女職員很欣賞這種充滿人情味的辦公氣氛。她們也知道，在高蘭茨公司，儘管工資不高，她們有晉升的好機會，高蘭茨也給她們機會去獨斷專行。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一份職員備忘錄，呈現了高蘭茨公司全盛期的風貌：

一段時間以來，我已經發現我們現在缺少過去那種使員工生氣勃勃的精神……缺少了過去的
那種快樂，這使我極爲不快。我想我們可以加強領導而恢復過去的榮景；我決定讓蒂布絲小姐
擔任總管，以及領導主樓層所有的女職員……事實上，她將擔任在俄國工廠裡蘇維埃領導人的
那個職位。

在這種家長式的統治下，一些女性如魚得水，其中林達被他升爲主管，三次給她休假，還讓她

稱他「親愛的老闆」。男生的日子就不是那麼好過了，不是高蘭茨不能發掘男生的才能，正好相反，他非常善於發掘，但他不喜歡男生，男生也不喜歡他，他不可能與他們一同長期工作。他發掘了那個時代最優秀的出版家之一的傑羅德（Douglas Jerrold），但卻違背諾言，把傑羅德打發到一家新公司去了；他也發掘了另一位著名的傳媒策劃人科林斯（Norman Collins），但最後找機會和他吵了一架，把他趕走了，用一位奴性十足的女性取代了他。莫里森是他公司相當成功的設計師之一，高蘭茨與他的關係也是以一場爭吵結束，莫里森因此出走。高蘭茨與男作者的爭吵可以寫成故事。戰後，他把侄兒魯賓斯坦帶來了，也是一位很少見的能幹行政人員，高蘭茨清楚地知道他到一定時候會繼承衣鉢；但是魯賓斯坦在被剝削多年後也被趕走了。

自欺欺人

本書的主題之一是：知識分子領袖人物的私生活與他們的公開形象是分不開的，彼此互為因果。私下的罪惡或弱點總是反映到他在世界舞台上的行爲，高蘭茨就是這樣一個著名的範例。他是擅於自欺的怪物，瞞騙自己也瞞騙別人。他相信自己是個偉大人物，天性仁慈，是人類真正的朋友；事實上，他卻是無可救藥的自私自利者，這一點在他對女性的行爲中最能看清。他聲稱致力於女性的利益，特別是他自己的利益。實際上，他愛她們其實是要她們爲他服務，與沙特一樣，願做一個聽著搖籃曲的嬰兒，被一群忠誠的、灑過香水的女性包圍。由於他母親的生活圍繞著他父親，

而不是他，所以他把母親排除在自己的生活外，母親的形象在他的自傳中根本沒有出現，在寫於一九五三年的一封信中，他承認：「我不愛她。」他一生都讓自己為女性所包圍，他也不能不成為她們利益的最高代表。他發現男性相互競爭的想法是不可容忍的。年輕的時候，他有崇拜他的姐妹；成年以後，有崇拜他的妻子（來自於他姐妹的婆家），妻子又及時地獻給他許多崇拜他的女兒，這樣他就成了家庭六名成員中唯一的男性。露絲有頭腦、有能力，但是為高蘭茨服務卻成了她的職業；只有一個問題，高蘭茨不想讓她去猶太教堂，她沒有屈服；而在其他部分，她只是高蘭茨的奴隸，不但管理高蘭茨在倫敦和鄉間的家，還為他開車、理髮、理財（非常奇怪的是高蘭茨自己無法處理）和給他零用錢。露絲與他的男僕一起打理他的私事，他在許多方面如同孩子般無能，這也難怪他喜歡喊妻子「媽媽」。他們出國時，孩子和保姆被安置於另外一間比較便宜的旅館，這樣露絲就可以完全為他服務。她還原諒了他許多不忠的行為，以及對女性動手動腳的惡習——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為此說：任何通姦行為與高蘭茨的調情相比都變得純潔。顯然，高蘭茨喜歡妻子監督他的情婦——就如同布萊希特的海倫和沙特的西蒙波娃所為——或許這樣就可以表明得到了她的寬恕，免除了愧疚感，但她卻不可能鐵石般地順從。高蘭茨要求他所有的女人、家人和僱員堅定不移地忠於他，甚至包括想法，他曾拒絕給一位女性工作，只因她不贊成廢除死刑的觀點。

至少還有一個原因可以解釋高蘭茨對女人忠誠的要求：他有一種非理性的恐懼。當每天早晨他父親出去工作時，母親就有父親不再回來的感覺，種種複雜的焦慮憂愁日復一日。高蘭茨繼承了這種恐懼感，他的恐懼集中於露絲。他從小養成的不正常的工作習慣導致他長期失眠，這反過來又加

重了他的恐懼感。雖然他擅於瞞騙，但他那潛在的良心難以平靜，始終感到歉疚。他相信經常不檢的性行爲最後一定會得到性病，對性病他又懂得很少，他的傳記作者認爲他其實是爲「臆想性病」所苦。到戰爭中期，極其痛苦的疥瘡、皮膚疼痛、恐懼和極度的衰弱把他打垮了。豪德爾勳爵認爲他患有「神經末梢過敏症」，最明顯的症狀是他認爲自己的陰莖失去了機能，他在一份自傳性的文件中說道：「當我坐著的時候……我的一個部分消失了，我感覺到它正縮進我的身體。」同盧梭一樣，他爲他的陰莖而煩惱，雖然理由沒有盧梭那麼明顯。他不時把它拿出來檢查是否有性病的跡象，甚至確認它還在不在。他會在辦公室裡的窗邊一天做幾次這樣的儀式，他以爲隔著磨砂玻璃外面就看不見，但對面劇院中的職員卻指出他的習慣讓人感到不安。

高蘭茨的白欺給自己也給別人帶來痛苦。很清楚，在某些方面對客觀實際的把握如此軟弱的人，自然不適合給人們提供政治上的指導。高蘭茨一生都是社會主義者，他相信社會主義是專門用於幫助「工人」的，堅信他知道「工人」的所思所需，但沒有證據證明他曾認識過工人，除非有人把曾經當過鍋爐工的英國共產黨頭頭波里特（Harry Pollitt）也算做工人。高蘭茨在倫敦拉德布羅克路的房子裡有十個僕人，在伯克郡布里姆頓的鄉間莊園裡有三個園林工人，但是除了透過信件，他很少與他們連繫，不過他堅決否認他與無產階級沒有接觸，他旗下一位作家哈里森指責他苛扣應當發給職員的款項，他給哈里森的回信中滿是他特有的憤慨：「當你到了我這個年紀的時候，如果你還像我這樣爲工人階級努力工作，你幹起事來就不會這麼糟糕了。我要告訴你，當我比你大得多的時候……我的視力已經壞透了，但我的生活條件比你還差得多。」他自認爲過著半修道院式的生

活，但從一九三〇年代中期開始，他總是享受女司機駕駛的汽車、長雪茄、葡萄佳釀，每天在薩沃伊午餐，總是住在最好的旅館裡。

奇怪的是，從一九二八至三〇年開始，高蘭茨積極參加了反對資本主義的事業，就在這時，他成了極成功的資本家。他論證說，資本主義是鼓勵人們天生的貪婪，以及由此而來的暴力傾向。我們發現他在一九三九年九月給劇作家李維的信中說：馬克思的《資本論》「在我看來，其中第四部是世界文學中最吸引人的一卷」，它把「超級偵探小說的魅力同福音書」結合了起來（他有可能讀過嗎？）。這是高蘭茨與蘇聯長期戀愛的序曲。他匆匆閱讀了韋布關於蘇聯體制如何運轉的荒誕說法，稱此書具有「令人驚奇的魅力」，那些用於消除對蘇聯政權民主實質的「誤解」的章節，是「本書中最為重要的部分」。正好是在大清算的高潮中，高蘭茨提名史達林為「年度人物」。

高蘭茨的政治活動起於向工黨領袖麥克唐納要求一個議會席位，但一直杳無音信，於是他就轉而出版說教產品。三〇年代初，他出版的左傾政治書籍比重日增，價格低、數量多，其中包括科爾（G. D. H. Cole）出色的暢銷書《智慧者亂世指南》和《馬克思的真正含義》，以及斯特雷奇的《為權力而來的鬥爭》——此書可能是大西洋兩岸當時的政治讀物中最具影響力的。就在這時，高蘭茨不再是商業出版家，而是政治宣傳家，也是此時，有系統的瞞騙開始了。高蘭茨的新策略是一封信，他寫信給西敏寺牧師會的迪莫爾牧師，委任他編輯《基督教及其危機》，並規定此書必須顯示具有「官方性」，要有「大批教會高層人士」的來稿；但是他又寫道：「我或許是個相當特殊的出版人，我出版我認為極其重要的議題，我不贊成的東西絕不出版。」因此，這本書必須從這種立場出發：

「基督教不僅是拯救人的宗教，而且本質上它也必然關注政治」，所以它必然為「直接的、實踐的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而「全力以赴」。

西敏寺牧師不管這些明顯的瞞騙言語而編了此書，在一九三三年正式問世。同樣的精神指示也發給了其他作者。吳爾夫編輯《智慧者防止戰爭的道路》，高蘭茨告訴他，最後一章〈國際社會主義是和平的關鍵〉是高潮，其他人必須「逐步引向最後這一部分」，但是為了隱藏這個目的，「希望」前面的幾章不要讓那些「在眾人公認與社會主義連繫在一起的人」來寫。隨著三〇年代的過去，瞞騙的成分變得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明顯。高蘭茨在給一個編輯的內部信件中，批評了共產黨人馬漢論工會的一本書，他抱怨說：「隨著發展，左派曝光很多，這種情況要避免，特別是在這個問題上。」他需要的「不是左派出來說話，而是用左派的筆做出表面公正的闡述」。他意味深長地寫道：「你可以想出各種謀略的」，他的結論是：「兩種觀點都可以用這種方法表現出來，同時又有了一種公正的莊重氣氛，無可挑剔，讀者不可避免地得出公正的結論。」

在高蘭茨的書中確實開始有了種種瞞騙讀者的「謀略」，比如總是用「左派」代替「共產黨」。在高蘭茨的許多信中，也坦率地反映出他的壓抑感，常常訴說良心的極度痛苦，比如他給密勒的一封信談論一本有關西班牙著作的信，便命令密勒刪去其中兩章，他知道這兩章是真實的，信的開頭是：「我為寫這封信而感到苦惱，幾乎是羞愧。」他同意密勒所說沒有「任何言過其實」，但是「絕對避免不了的」是「許多段落會從那兩章中挑選出來廣泛引用，以達到證明『共產黨人粗野』這樣一種宣傳目的」，他覺得他不能「出版任何能給另一方提供宣傳機會的東西」，這將會「削弱（共產

黨的)支持」。他補充說，密勒也許覺得「這是在玩弄真理；這種想法不對，人們必須考慮最後的結果」。信末他懇求：「請原諒我」——這正如同對他包養情婦的過錯，他也想從露絲那裡得到形式上的赦免。

高蘭茨給作者和編輯的一些指示，雖然明確禁止不誠實的行為，但也極其含糊——無疑是寫下了他良心中的極度痛苦——完全沒有具體說清是如何的不誠實。比如他給一本歷史教科書的作者寫信說：「我希望最公正地論述——但也希望我公正的作者具有激進思想。」他補充道：「作者的激進主義」給他提供了一種保證，「就算做出了一切努力，偏頗還是出現了」，那就不會是「通向錯誤方向的偏頗」。正如高蘭茨這一時期的信件，他實際上說的是他要有偏頗的書，但不要露出偏頗的樣子。

趨炎附勢

高蘭茨的檔案中保留下來的這些信件特別吸引人，因為成了很少見的證據：一個知識分子在毒害著真理的源泉，他知道自己做錯事，但又聲稱是爲了比真理更高的事業，以此來證明自己行爲的正確。高蘭茨很快就大規模地幹那些不誠實的事了。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掌權以後，他決定刪去他的書目中任何不賺錢和沒有宣傳目的的書。他爲推銷社會主義和蘇聯的形象，下了大量賭注。其中第一個是「新蘇維埃文庫」，這是直接通過蘇聯大使館和政府安排，由蘇聯作家所寫的宣傳讀物。

但是在拿到那些文稿時，意想不到的困難產生了：因為叢書的醞釀與大清算同步進行的，幾位預定的作者突然消失於古拉格群島，或者被行刑隊拘捕。一些書稿送給高蘭茨的時候，作者的名字是空著的，以等待被處死的作者被官方恢復名譽以後再填上。還有一件麻煩事：蘇聯檢察官維辛斯基在史達林政權中所起的作用，相當於希特勒「人民法庭」的主席弗萊斯勒，他受邀寫作《蘇維埃司法》；但是這位檢察官正忙於將同志判處死刑而無暇寫作，當稿件來齊，因寫得太急太糟而無法出版。高蘭茨的讀者得以慶幸不知道這些問題。

這套叢書出版以後，高蘭茨又下了一次更大的賭注：成立「左派讀書俱樂部」。最初的目的為反擊不願意庫存宣傳極左讀物的書商。這個俱樂部在一九三六年一至三月間做了大規模的廣告戰，正好與第三國際在全歐採取的「人民陣線」政策相呼應。突然間，工黨這樣的社會民主黨不再是「社會法西斯主義者」了，而成爲「鬥爭中的伙伴」。左派讀書俱樂部的會員同意，至少在半年內以每個月半克郎購買由高蘭茨、斯特雷奇和倫敦經濟學校的拉斯基教授三人組成的委員會所指定的書籍。他們也可以免費得到《左派書訊》月刊，有權參加一系列的活動——如暑期學校、集會、電影觀摩、討論小組、戲劇演出、國內外度假、午餐會、俄語培訓班等等，還可以使用俱樂部中心。三〇年代是參加各種組織的好時機，其中許多組織是希特勒爲各種年齡和利益的人創建的，這就是爲什麼他能在德國獲得極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共產黨學他有點遲了，左派讀書俱樂部則顯示出這套方法是多麼有效。高蘭茨本來希望到一九三六年五月能招到二千五百個會員，事實上來了九千個，最後人數增加到五萬六千人，俱樂部的影響甚至比這些數字顯示的還要大：在三〇年代所有傳媒機

構中，這個俱樂部是其中制定議題、引領討論潮流最成功的組織，但它卻是建立在一連串的謊言基礎上。第一個謊言可見於俱樂部小冊子：選書委員會「共同地、充分地代表了『左翼』運動中所有積極的、嚴肅的主要觀點」。事實上，左派讀書俱樂部的目標就是為共產黨的利益效勞。斯特雷奇這一時期完全被共產黨所控制，拉斯基是工黨成員，剛剛被選進工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但他已在一九三一年改信馬克思主義，追隨共產黨的路線直到一九三九年。高蘭茨一直到一九三八年末都是共產黨可靠的同路人，為共產黨盡心盡力。他為共產黨的機關報《工人日報》寫了一篇令人生厭的文章〈我為何閱讀《工人日報》〉，此文被該報的宣傳體系利用。高蘭茨還說該報忠實、準確、信任讀者的理解力——他知道這一切全是毫無根據的——他還說：「這個特色如同與淑女和紳士相對的尋常男女。我遇過許多淑女和紳士，發現他們之中許多人極其討厭，而尋常男女的品質卻令人非常興奮。」一九三七年他訪問了俄國，並且宣稱：「我第一次感到這麼快樂……人在這裡會忘掉世上其他地方的罪惡。」

不過，高蘭茨對共產黨最大的實際貢獻，還是聘用共產黨員為左派讀書俱樂部的職員，林德、彭斯和利維斯負責編輯所有的稿件，雷德組織俱樂部的各種團體，他們這時若非都是共產黨員就是為共產黨所控制。俱樂部所有的政策乃至小問題，都與共產黨官員討論過，經常是由高蘭茨和共產黨總書記波里特直接處理，這些都是公眾所不知道的。俱樂部經過仔細的考慮，隱瞞了共產黨成員的身分，稱他們為社會主義者。俱樂部挑選出來的首批十五本書中，除了三本，全都是共產黨員或秘密黨員所寫的；高蘭茨憂慮此舉也許會使俱樂部失去獨立性的印象——這在共產黨的眼裡相當寶

貴，正如共產黨最重要的理論家達特（R. Palme Dutt）在給斯特雷奇的一封信中與高采烈地說的：民眾認為俱樂部是「獨立的商業機構」而不是「某個特定政治組織的宣傳」，這一事實構成了它對黨的價值。

第二個謊言是，高蘭茨反覆宣稱的左派讀書俱樂部的全部組織，包括其分支、集會和活動「本質上是民主的」，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在為寡頭統治所做的偽裝背後，它事實上只是高蘭茨本人的專制，就是出於這一原因，他控制著俱樂部的財政。他並沒有為俱樂部保留獨立的帳目，其收入和支出都由高蘭茨有限公司承受，一般人無法得知高蘭茨這項投資的盈虧。一些評論家斷言高蘭茨從中賺到一大筆錢，他便控告他們誹謗。他在一封私函中告訴那些作家，俱樂部的虧空令人吃驚，但他又補充：「完全可以相信，從許多方面來看，認為我們賺大錢比認為我們虧空的風險要小得多。」這種說法也許只是將付給作家一點點版稅或甚至不付的行為正當化。如果公司只是分擔俱樂部的日常開支和促銷俱樂部其他書的話，就會讓人認為俱樂部會給公司帶來好處。由於高蘭茨一手掌管收據、支付工資和帳單，所以最後的決定權都由他作主，俱樂部的成員沒有發言權。在為俱樂部刊物《新聞》尋找編輯時，高蘭茨規定說：「他必須同時具有進取心和服從我的指示，毫不遲疑，無論這些指示對他來說多麼愚蠢。」

第三個謊言是斯特雷奇所說的：「我們從來不想只因我們不同意書的結論就不選用它。」除了一兩本象徵性的工黨圖書以外——工黨領袖阿特里受邀撰寫《展望工黨》——所有證據都顯示，追隨共產黨的路線通常是選書的主要標準。一個特別惡名昭彰的例子是索爾海莫的《辯證唯物主義導

論》，高蘭茨認爲此書是正統的，一九三七年五月同意出版；但就在這時，作者捲入了一場與莫斯科的爭論，雖不引人注目，但波里特要高蘭茨禁止出版。由於這本書已經做了廣告，高蘭茨因此反對說：俱樂部的敵人會抓住不出這本書來「確證俱樂部不過是共產黨的一個組成部分」。波里特以他那無產階級老戰士的腔調回答：「不要出版！不然我就得去對付那個老雞姦犯和那個大個兒雞姦犯，還有一位教長血紅的屁股了。」（他這些稱呼是指史達林、達特和坎特布雷教長約翰遜牧師），高蘭茨遵命行事，這本書被壓住了。他後來寫了一封牢騷信給波里特：「我痛恨、也討厭做這樣的事，我的天性就是這樣，這些虛偽會毀壞我的內心。」共產黨想禁止的另一本書，是由一位極受人尊敬的退伍老兵、社會主義者布萊斯福所寫的《爲什麼資本主義意味著戰爭》，因爲此書批評了在莫斯科所進行的審判。當一九二七年九月書稿提交給彭斯時，他的意見是，即使對這本書進行大量的刪節和修改，黨也是不能接受的。這一次高蘭茨又同意不予出版，他寫信給作者說：「在這件事上，我不能違背良心」，出版這本批評莫斯科審訊的書，「就如同對聖靈犯罪」。拉斯基是布萊斯福的老朋友，他本人也對莫斯科的審訊不滿，認爲應該出這本書，並以辭職要脅，果真如此，就會損害左派讀書俱樂部作爲「人民陣線」的門面。高蘭茨只好勉強按照拉斯基的要求做了。但到八月，此書出版時卻沒有任何宣傳——就正如布萊斯福所說的，「被人們遺忘了」。高蘭茨還發明了一個「技術上的原因」來禁印吳爾夫的一本書，因爲書中出現對史達林的批評，但是吳爾夫有自己的印刷廠，對印刷的知識比高蘭茨多，他揭穿了這個謊話，並威脅如果違約就會有麻煩，這樣高蘭茨又一次讓了步，只是他確信這本書會失敗。

左派讀書俱樂部出版的讀物實際上是經過精心設計，用瞞騙的方法推行共產黨路線。正如高蘭茨寫給俱樂部教育書籍「左派家庭大學書庫」的編輯信中所說的：「論述當然不應是攻擊型的馬克思主義」，作品的寫作方式應當是「讓讀者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得出正確的結論，同時沒有加入俱樂部的人也不會因為感到『怎麼有這麼多馬克思主義的廢話』而卻步」。高蘭茨有時與共產黨統治集團的連繫是非常緊密的，他曾匯幾筆現金給波里特，波里特曾說：「我在想，今天早晨你能不能讓我得到這筆英鎊支付的錢，我很抱歉給你帶來麻煩，高蘭茨，但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共產黨的檢查制度深入到非常小的細節，如後來成爲《工人報》編輯的坎貝爾，就是負責從書目中剔除托洛斯基和其他「非人物」的作品。

不誠實的出版立場

雖然無法爲高蘭茨的傳記作者所說的「一大堆表明有罪的資料」的行爲辯解，但還是必須在歷史背景中考察他的行爲。三〇年代是個充斥謊言的時代，比二十世紀任何一個年代還多。納粹和蘇維埃政府利用龐大的財政資源，僱用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說了無數謊話。那些曾經獻身於真理而被人讚頌和崇敬的機構，現在則處心積慮地壓制真理。在倫敦，正如《泰晤士報》編輯道森所承認的，他把通訊員所提供的可能損害英德關係的資料「排除在報紙之外」。在巴黎，爲了證實德雷福斯的無辜而創建的著名人權同盟，最重要的成員夏萊耶自覺必須退出這個組織，以抗議它爲了協助隱

瞞史達林的暴行真相所採取的無恥手段。德國共產黨操縱著職業說謊機構，特定目標是通過諸如反帝同盟等各種陣線組織來瞞騙知識分子同路人。這些組織最初由德國共產黨員溫森堡從柏林指揮，希特勒掌權以後又從巴黎指揮，《新政治家》的編輯馬丁稱溫森堡是「一位富有靈感的宣傳家」；溫森堡的得力助手、捷克共產黨的凱茲被馬丁稱為「狂熱而無情的政委」，凱茲吸收了各種各樣的英國知識分子來幫助他，其中包括前《倫敦時報》新聞記者、左翼黃色報刊《週報》編輯考克本，他幫助凱茲編造想像的新聞故事，後來考克本把這些功績寫下出版，眾議員克勞斯曼在《新聞記事》中抨擊他說了謊還毫不羞恥、得意洋洋。克勞斯曼在一九三九至四五年戰爭期間，因為公務而捲入了英國政府的「信息誤導行動」（也就是說謊），他寫道：「戰爭期間，黑色宣傳也許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大多數人都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厭惡。」克勞斯曼也正好是那種典型的知識分子，總是做著缺少強烈求真精神的宣傳，考克本指責他的觀點是「可笑的、安逸的道德立場，至少對我來說，看到一個人燒掉自己的宣傳謊言……而又通過『厭惡』自己的行為以便問心無愧，似乎很可笑」。在考克本看來，對一種人們為之戰鬥的事業，「是值得為它去說謊的」。（這又是什麼事業！溫森堡和凱茲兩人都是因為「叛變」而被史達林所殺，凱茲被害的原因，是他曾經與考克本這樣的「西方帝國主義分子」勾搭。）

對於高蘭茨的種種不誠實，應當在這種背景下考察：其中最惡名昭彰的事是拒絕出版喬治·歐威爾的《向加泰隆尼亞致敬》，這本書揭露了共產黨人對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的暴行，不只高蘭茨拒絕出版歐威爾的作品，馬丁也拒絕刊載歐威爾所寫的一系列相關問題的文章，三十年後，高蘭茨還

繼續爲此辯解：「在抗德戰爭期間，我不能發表歐威爾的文章，就如同我不能發表戈培爾的文章。」他還勸他的文學編輯莫狄姆爾剔除歐威爾的一篇「值得懷疑的」書評，此事莫狄姆爾後來非常後悔。高蘭茨與歐威爾的關係延續很久，非常複雜，彼此敵視和譏諷。高蘭茨在左派讀書俱樂部成立前出版的《通向棉布碼頭之路》，是對英國左派的批評，爲此他決定再出一個「左派讀書俱樂部」版本，想把書中引起反對的部分去掉，但歐威爾不同意，於是高蘭茨親自爲本書寫了一篇很長的導言，力圖把歐威爾的「錯誤」解釋成是「中產階級成員」的筆調。事實上高蘭茨也是這個階級的成員（甚至比歐威爾富裕），如果說他們之間有所區別，就是他與工人階級沒有任何接觸，所以這篇導言一點都不誠懇。後來美國出版商重新出版了這本書，高蘭茨既非常慚愧又憤怒。

高蘭茨在與歐威爾爭吵得最嚴重的時候，對自己與共產黨的關係產生了另一種想法，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也許是基於商業利益的考量，塞克爾與瓦保格公司（Secker & Warburg）正急於爭奪《向加泰隆尼亞致敬》等書稿及作者，這些作品本來很自然是由高蘭茨出版的，但是由於共產黨的反對而作罷，高蘭茨的共產黨路線，實際上是爲自己的公司製造了一個難以輕視的敵手。第二個原因是高蘭茨關注的範圍有限，書籍、作者、女人（除了露絲）、宗教、事業，從來不可能使他的熱情長期地維持下去。有一段時期，高蘭茨喜歡左派讀書俱樂部，以及在艾伯特廳（Albert Hall）召開的盛會，這是共產黨出於自己的利益而幫助組織的，在大會上，坎特布里的教長拖長聲音說：「上帝護佑左派讀書俱樂部。」高蘭茨發現自己有對公眾演說的天分，但總是面對共產黨的明星們從訓練有素的聽眾中得到大量喝彩，比如波里特，高蘭茨便顯得不悅。到了一九三八年秋天，他已經對

這一切失去了耐心，感到厭煩了。

高蘭茨處於這樣的情緒時，更易於敞開自己的心靈。他在巴黎過聖誕節的時候，讀了關於莫斯科審判的一份詳細報告，使他相信審判是個幌子，回到倫敦後，他告訴波里特，左派讀書俱樂部至少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再兜售莫斯科的路線。直到二月份，他在《左派讀書俱樂部會訊》中承認，「蘇聯確實存在讓知識分子充分自由的障礙」，這年春天，使歐威爾感到驚訝的是，高蘭茨決定出版他的小說《為空氣而來》，這是路線變更的確鑿標誌。到這年夏天，高蘭茨顯然急於和莫斯科斷絕關係，他樂於見到八月希特勒與史達林簽訂的和約，模糊地說，他是帶著一種輕鬆的心情——這意味著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得到了與共產黨完全斷絕關係的天賜良機。他立即開始寫反對莫斯科的宣傳品，列舉了大量有識之士早就知道的惡行，正如歐威爾對戈勒爾（Geoffrey Gorer）的評論：「可怕的，如此愚昧的人能有如此的影響。」

左派讀書俱樂部在高蘭茨與莫斯科斷交後，就不如以往了，俱樂部的職員分裂了，林德、雷德和利維斯依附了共產黨，高蘭茨決定不解僱利維斯和林德（她已經不再是他的情婦了），但他獨有的商業手法把他們降級，削減工資。這樣的做法就與馬丁的不同，馬丁至死都多少照顧到他三〇年代的同路人；也不同於考克本玩世浮誇的舉止。高蘭茨決定貫徹到底，從悔改中得到好處，他在一九四一年編了一本書，內容包括拉斯基、斯特雷奇，歐威爾的文章，書名為《左派的背叛：共產黨政策的考察和駁斥》，在此高蘭茨正式承認左派讀書俱樂部的罪過：

關於俄國的稿件，無論好壞，我都接受，因為它們是「正統」；我拒絕了真誠的社會主義者和正直者的稿件，因為它們不是……我只出版證明莫斯科審訊正確的書，而把社會主義者對這些審訊的批評寄到別的地方去……現在，我以我的人格擔保——我心裡在那時確信——這一切全錯了。

高蘭茨內心的變化及認錯，其中有多少真實，又是如何發生，都難以說清。在戰爭中期他確實經過心靈的黑夜，而且之前說過他的病情最爲嚴重。後來在蘇格蘭——對知識分子來說是少有的事——他聽到了上帝的聲音，上帝告訴他「不會鄙視」一顆「謙卑而悔悟了的心」，他的疑慮消除了，獲得了以他自己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看法爲形式的新宗教信仰，也獲得了新情婦和對出版的新熱情，他熱心地促成工黨出版一套「黃色險境」的叢書。不過他很快又回到那些老套的詭計，一九四四年四月，他拒絕了歐威爾辛辣的諷刺作品《動物農莊》，他說：「我不可能出版（對俄國）這種性質的攻擊。」這本書也被送到了塞克爾與瓦保格公司，這家公司後來又把歐威爾著名的暢銷書《一九八四》弄到手，逼得既憤怒又後悔的高蘭茨用「評價極度言過其實」來忘了這件事。在他此後的歲月裡，歐威爾的誠實——當然還有馬丁——總是使他難以釋懷，也迫使他在氣惱中對歐威爾發起攻擊，但攻擊並沒有挑動多少道德上或其他方面的情緒。高蘭茨寫道，他不能接受說「歐威爾的知識分子的誠實是不會做壞事的……照我看來，不顧一切地掛念誠實，就不可能真正地誠實……他也不是有某些單純的地方嗎？像他這樣具有高度智力的人，這種單純實際上不也是某種小小的不誠實

嗎？我是如此認為。」

跟不上時代

高蘭茨活到一九六七年，已經沒有如三〇年代所具有的權力和影響。許多人認為，工黨在一九四五年選舉中取得的歷史性勝利，應當歸功於他及《新政治家》和《每日鏡報》，這個勝利創建了英國和許多西歐國家戰後的政治框架，並一直延續到柴契爾時代。然而，艾德禮首相並沒有給高蘭茨一個他自認為應當得到的貴族頭銜；他什麼也沒有得到，一直到哈羅德·威爾遜首相，才比較大方，在一九六五年給了他騎士封號。高蘭茨的虛榮心爲他帶來了麻煩，他總以爲自己比實際上更著名或更聲名狼藉。一九四六年，他在一艘船上度假，船靠上加納利島群島，他突然感到一陣恐懼，並大聲喊道「上岸佛朗哥的警察就會逮捕拷問他，他堅持要英國領事上來甲板保護他，領事派書記來向他保證，這個島上沒人聽過他，高蘭茨失望地說道：「他自己就沒聽過我。」

戰後高蘭茨的事業實際上是在沒落，他寫了一些十分成功的作品，但事業卻逐步被擠出了市場領導的地位，他跟不上時代，也無法賞識新的知識分子明星，維根斯坦一九四五年九月給他寫了一封信，他的答覆是一張只有一行字的便條：「感謝你的來信，我確信你說得非常好。」他把這位哲學家的名字也拼錯了，以爲他是個默默無聞的大學教師。他失去了一些最優秀的作者，沒有邀到重要的書稿。他稱揚俄國小說家納博可夫的《羅麗泰》是「精神領悟的罕見傑作」，卻沒能買下此書，

於是就大發雷霆，說這是一本「極其下流的作品，其文學價值被過分地高估了」，甚至又在《文人》雜誌上說這是一部「色情」作品。在廢除死刑的成功抗爭中，高蘭茨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這件事比其他任何事都占用了他更多的時間，也許是最深入他內心的事——但是他在這項冒險活動中的角色，被凱斯特勒（高蘭茨恨他）和文雅善辯的加德納所掩蓋，而由他們獲取了榮譽。更糟的是，在一九五七年發起的核裁軍運動中，高蘭茨沒有得到高層的位置，那時他不在場，使他感到屈辱的是，他回來以後發現自己甚至並沒有被邀請加入委員會，他把這看成「劫掠式的侮辱」，給他留下了「破碎的心」。當選主席的老朋友科林斯被他指責，高蘭茨認為主席之位才是適合他的，其實科林斯曾為讓他進入委員會進行過一場失敗的爭取；後來他又認為普里斯特利應當對此事負責，因為早在三〇年代初兩人曾就普里斯特利的《英國旅行》發生過爭執，他認為普里斯特利對他的敵意就來自於此，實際上，普里斯特利只是許多發起人之一，他們均表示無論如何都不與高蘭茨一起工作。

最後，幾乎所有的人都發現高蘭茨自我中心主義的虛榮使人無法忍受，特別是他經常火山爆發式的脾氣。一九一九年高蘭茨曾對他的姐夫說，他還不能決定要做溫切斯特的校長還是首相。實際上他是幸運的，他在事業上的精明使他能夠建立個人的獨裁專制，沒有人能挑戰他，他沒有能力使別人和他一樣，這一點並不那麼重要。愛德華茲從高蘭茨的檔案中引用了一封很有特色的信，對高蘭茨的勾勒比任何描寫都出色：高蘭茨曾受邀演講，但當出現了另外一個更有吸引力的約會，高蘭茨就取消了這場演講，演講的主辦者是一位礦工，非常生氣，寫了一封信譴責高蘭茨，高蘭茨用激

憤的語言回了一封長信，他斥責礦工「在太陽落在你的怒火上之前寫信」，他極為詳細地解釋他是因承擔了種種十分沉重的義務才取消了這次演講，他用最強硬的詞語反駁礦工，因為他是「出於道德義務」才這樣做，然後繼續說：「事實上，在我口述時便開始發脾氣的說法，顯然是荒謬的。」他在下面又加了兩段指責礦工「十分無禮」的話，信的最後是：「我已經意識到這一事實：我以溫和的語調為這封信開頭，但卻以激烈的語調結束這封信。不管我給了你什麼樣的忠告，我也意識到這一事實：我現在並不覺得好像是讓太陽落在我的怒火上，因此我要秘書立即寄出這封信。」這種極自我的說詞，也像是某一位盧梭、馬克思或托爾斯泰的筆調。但是有可能看出一些自我嘲諷的暗示嗎？我們肯定懷有這樣的希望。



12 海爾曼——除了謊言還是謊言的好萊塢編劇

大說謊家

高蘭茨爲了實現太平盛世的目標，玩弄了真理；海爾曼（Lillian Hellman，一九〇五—八四）則是這種知識分子：虛偽對她來說是自然而然的。與高蘭茨一樣，海爾曼是西方知識分子掩蓋史達林恐怖主義陰謀的其中一員；與高蘭茨不同的是，海爾曼從來不承認她的錯或謊言，除非是以敷衍、虛偽的方式。相反地，她所追求的生涯中，包含著一種甚至更加明目張膽、厚顏無恥的謊言。也許有人會問：爲什麼要爲海爾曼操心呢？她並不是一個有想像力的藝術家，藝術家必須懂得虛構，真實的世界與幻想的世界不可避免地重疊在一起。就以海明威爲例，他也是一個惡名昭彰的說謊家，但期待從一個杜撰小說的人身上得到真理公平嗎？對海爾曼來說，不幸的是，對真理的漠視在她的生活和工作裡占了重要的位置。不能忽略她的存在有兩個原因：她是第一位以劇作家身分獲得國際地位的婦女，因此也成了全世界受過教育婦女的象徵；第二，在她一生的最後十年中，部分

出於她瞞騙的結果，在美國知識分子的舞台上，她所獲得的聲威和權力很少有人可以匹敵。海爾曼的個案提出了一個重要而普遍的問題：知識分子從他們所讚美的人那裡，有多少程度期望及獲得真理？

海爾曼生於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日，父母是中產階級猶太人，她在自傳中竭力貶低母親、高舉父親，這點與高蘭茨一樣，只是她是出於政治及個人的原因。她的母親來自富有而且人丁興旺的紐豪斯家族和馬克斯家族，他們在資本主義的美國發達起來。伊薩卡·馬克斯於一八四〇年代從德國來到美國，他依照猶太移民的共同模式，開始是做流動小販，然後成了定居的商人，在內戰中發了財；兒子創建馬克斯銀行，先是在德莫波里斯，後來又去了紐約。海爾曼把母親朱莉亞·紐豪斯說成傻瓜，而實際上她似乎有教養並受過良好的教育，很可能就是海爾曼才華的泉源。海爾曼發現，避開紐豪斯家族和馬克斯家族在政治上是有好處的，她竭盡所能的否認母親家族的猶太人身分。

與母親相比，父親馬克斯是海爾曼心目中的英雄，身為獨女，父親的寵愛挫敗了母親對她強迫性的教育。海爾曼的祖父母是一八四八年來到美國的政治流亡者，她把父親描述成激進分子，誇大他所受的教育和天賦，實際上她父親與馬克斯家族和紐豪斯家族一樣，似乎只想在資本主義環境下賺錢發財，但他卻不擅此道。他的企業於一九一一年垮了（海爾曼後來將之歸咎於一個虛構的合伙人），此後依靠富有的姻親，以卑微的推銷員終老。除了海爾曼自己所說的外，並沒有證據顯示他父親是個激進主義者。海爾曼曾在一篇關於種族關係的文章中說，她父親如何救了被兩個白人男子強暴的黑人女孩；後來她又講過在十一或十二歲的時候，她是如何堅持要與她的黑人保姆索弗洛尼雅

一起坐在有軌電車「只供白人乘坐」的位子上，最後在吵吵嚷嚷的抗議之後被趕走。這個故事是四十年以後，即一九五五年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的著名反抗行動的預演，說得婉轉點，恐怕未必可能。

馬克斯的姐妹們開了一家供膳的寄宿所，海爾曼在此出生，並度過許多時光。她是一個孤獨、活潑、眼光敏銳的孩子，她觀察在那裡住宿的人，編造他們的故事，得到了許多材料。後來在曼哈頓，她與所住的旅館經理威斯特習慣偷拆旅客的信件——成為威斯特《小姐寂寞心》作品中的素材，也成了海爾曼戲劇中的細節。她自稱是「最討人厭的孩子」（我們完全相信），抽菸、到紐奧良胡鬧、離家出走，經歷了讓人驚異的冒險——不過這些事的可信度低。她父親去紐約工作，她也進了紐約大學，考試作弊，身高五呎四吋，「相當樸素」，可能不漂亮卻吸引人。她在十多歲的時候就已擁有強烈的女性人格。

海爾曼的傳記作者賴特（William Wright）細心客觀的追蹤海爾曼早期的經歷，與她的童年時代一樣，他發現要從她不可信的自傳中抽絲剝繭很不容易。海爾曼十九歲的時候，在波尼暨李維萊特出版公司（Boni and Liveright）任職，這是當時紐約最具企圖心的出版公司，由賀拉斯·李維萊特掌管。海爾曼宣稱她在紐奧良就發現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其諷刺小說《蚊子》是經過她才出版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她嫁給劇場經紀人庫布爾，流過一次產，後來又懷孕，離開出版業之後開始寫評論。她曾跟考特發生戀情，考特後來當上《生活》雜誌的外國編輯，一九七〇年代他打算發表海爾曼寫給他的信，有些信的空白處還畫了色情圖畫，海爾曼採取了法律行動予以阻止——

直到考特貧困而死，這些信件也就意外的銷毀了。跟庫布爾結婚後，一九二九年海爾曼到巴黎和波昂旅行，在那裡她曾考慮加入納粹青年團或前往好萊塢。她會短期為安娜·尼科斯審讀劇本，後來卻聲稱是她發現了鮑姆（Vicki Baum）的《大旅館》，這也並非事實。在好萊塢，庫布爾擔任編劇，海爾曼則為米高梅電影公司審稿，每週五十美元。

《雙姝怨》

海爾曼的激進主義是從她加入電影行業工會開始的，工會裡的作家們對大製片廠所給的待遇極為不滿。不過，海爾曼的政治和感情生活中的關鍵性事件發生在一九三〇年，這時她認識了偵探劇作家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後來海爾曼把漢密特及與漢密特的關係浪漫化了，所以我們有必要弄清楚漢密特這個人。漢密特出身於馬里蘭一個古老上流社會的貧窮家庭，十三歲就輟學，做過各種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打過仗、負過傷，後來他在平克頓私家偵探公司當偵探，熟悉警察工作的內幕。漢密特曾為電影喜劇演員阿布克爾所僱用的律師工作，這位演員被控強姦，在法院的訴訟中被搞垮了，後來私家偵探告訴漢密特，那名女子不是死於姦殺而是性病。這個案件造成了漢密特的憤世嫉俗（他著迷於肥胖的惡棍，這類人物在他的小說中經常出現）。漢密特遇到海爾曼的時候已經出版了四部小說，且正因他最好的小說《馬爾他之鷹》而名聲日隆。

漢密特有嚴重的酒精中毒，他的小說成功對他來說也許是壞事，不但帶來了金錢與名聲，也意

味著他不再需要努力工作。他不是天生的作家，他發現創作是一件令他極其沮喪的事，經過許多努力於一九三四年完成了《瘦子》，並因此帶來名利，此後他根本都不寫了。他通常躲在旅館裡，帶著一箱酒，喝得爛醉如泥。過去有一陣他似乎還堅持著原則，而酒精潰敗了他的道德。他有個妻子叫約瑟芬，還有兩個孩子，但只是隨意地給他們一點錢花，他有時對人很大方，卻常記不起這些人。他妻子給他的出版商諾普夫出版公司（Alfred A. Knopf）的信還保留著，信中說：「過去七個月，漢密特先生只寄給我一百美元，沒有寫過信，也沒有說他有什麼麻煩——我現在非常沮喪——孩子們需要衣服，他們吃不到好食物——我找不到工作——我與父母一起生活，他們越來越老了，不可能給我們更多的幫助……。」漢密特被人發現帶著一張手寫的合約在某處喝酒，指派給他的製片廠秘書密爾德麗無事可做，因為他不寫作而是躺在床上，密爾德麗描述了他怎樣以電話召妓的——她們通常是黑人或東方女子，悄悄地上樓，密爾德麗只好轉過身來視而不見。漢密特可能曾賺到二百萬美元的版稅，卻常弄到身無分文和欠債的地步，他只有把衣服一件一件套在身上，偷偷溜出帳單越積越厚的旅館（比如在紐約的皮埃爾旅館他就欠了一千美元）。

酒精也使漢密特變得喜歡罵人和施暴，還不只對婦女而已。一九三二年女演員薇安控訴遭到他的攻擊，根據這位女演員所說，漢密特在旅館裡喝醉意圖侵犯她，她抵抗卻被他狠狠打了一頓。漢密特沒有努力辯駁，於是被判二千五百美元的傷害賠償。漢密特認識海爾曼不久，就在一次宴會上打中她的下巴，把她打倒在地，他們之間的關係從來沒有輕鬆過。一九三三及三六年，他兩度從妓女身上染上淋病，第二次較為嚴重。他們倆因女人一直爭吵不休，雖然最後都分別與原先的配偶離

了婚，但還有個疑惑：他們是否生活在一起？如果一起生活過，又維持多久？若干年後，當海爾曼所說的謊言被揭穿後，小說家維多（Gore Vidal）嘲諷道：「有任何人看見他們在一起嗎？」

顯然，海爾曼爲了自我宣傳，誇張了他們之間的關係。實際的情況是：一九三八年海爾曼移居紐約，她在帕萊森特威爾有一間房子及一個農場，她得知漢密特在比菲利衛爾廈旅館裡醉昏了，奄奄一息，所積欠的帳款已達八千美元。海爾曼把他用飛機運回紐約，由救護車送進醫院。後來他就住在海爾曼家中住了一段時間，但又養成上哈林黑人區妓院的習慣，樂此不疲。於是，他們之間的爭吵更多，一九四一年，有次漢密特喝醉，強行與海爾曼做愛，被她拒絕，此後他就再也沒跟她做愛了。他們之間保持著微妙的關係，漢密特一生的最後三年（他死於一九五八年），他在海爾曼紐約的家中過著行屍走肉般的生活，對海爾曼來說是無私的，因爲她犧牲了自己喜愛的工作室，她會對客人說：「請輕一點，樓上有個快死的人。」

關於他們的友誼，很清楚的是，海爾曼能成爲作家大大要歸功於漢密特。關於他們的寫作經歷，實際上有人認爲事有蹊蹺：漢密特遇到海爾曼後不久，創作就萎縮成一條細流，然後就完全乾枯了；相反，海爾曼卻開始文思泉湧，功成名就。似乎創造精神從一個人身上移到另外一個人身上，直到漢密特死了，她就再也寫不出一個成功的劇本。也許是純粹的巧合，也許不然，就像海爾曼一切事情都很難說得清一般。可以肯定的是，海爾曼第一部轟動一時的作品《雙姝怨》，就跟漢密特有很大關係，甚至可以說他想過這部戲。舞台上的女同性戀題材早在一九二五年就是百老匯爭論的問題，那年警察查禁了波戴（Edouard Bourdet）所寫的一部女同性戀劇的譯本《俘虜》。海爾曼

爲舒姆林審讀劇本時，自己也開始寫劇本了，漢密特把她的注意力吸引到羅夫海德（William Roughhead）的書《壞伙伴》，此書說的是二一〇年發生在蘇格蘭的一件駭人聽聞的案件：一個黑白混血的女子，無緣無故生出怨恨，控告兩位管理學校的姐妹是同性戀，巧妙地使用謊言毀滅了她們的性命。這件因女子的謊言而引出的災難，迷住了海爾曼和漢密特，《馬耳他之鷹》就是以女人的謊言爲線索，把那些五彩繽紛、錯綜複雜的事件連繫在一起。漢密特喝醉了的時候會胡說八道，清醒的時候，即使是很麻煩的事，他也會一絲不苟地做好。他老於世故，會制止海爾曼的怪念頭；相較之下，海爾曼迷戀謊言，常常說謊。對於《雙姝怨》的靈感來源和第一晚上演的情況，她就常說謊，而且從不提到受惠於羅夫海德的書。當這部電影上演時，一位評論家布朗指責她剽竊——這是她不得不面臨的許多這類指控中的第一樁。

儘管如此，《雙姝怨》仍然是一部優秀的劇本，它對原作的改動是激動人心的關鍵。在實際寫作過程中，已很難確定漢密特究竟發揮多少作用。海爾曼的戲劇才華之一，是她具有一種極強的能（同蕭伯納一樣），讓劇中那些最該受指責、最不爲人同情的人物說出種種花言巧語，這是她的戲劇張力的表現方式。《雙姝怨》由於主題的因素，注定要引起爭論。劇中的雄辯和銳利的語言加重了反對者的敵意，也鼓勵了捍衛者的激情。在倫敦，張伯倫勳爵拒絕發給演出證，在芝加哥和其他許多城市也被禁演（波士頓的禁演令有效期間爲四分之一個世紀），但紐約的警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這部戲立即遭到了批評，票房極爲成功，連演了六百九十一場。此外，由於主題大膽和劇情出色——最主要造成正統派的憤怒——立即使海爾曼在革新派知識分子所愛戴的人物中得到了特殊的

地位，直至她去世為止。此劇沒有獲得一九三四至三五年度的普立茲最佳劇本獎，因為評委中的里庸牧師反對這部戲的主旨。於是紐約劇評家協會便成立，專設了一個新的獎項授予海爾曼。

這部電影的成功也為海爾曼帶來了一份合約：在好萊塢寫電影劇本，每週二千五百美元。此後十年，她交替為電影和百老匯工作，她的成就是摻雜的，但總體給人深刻的印象。她寫罷工的劇本《未來的日子》，對她來說是場災難，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演，六天之後就停演了。另一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小狐狸》是寫一九〇〇年左右美國南方人對金錢的貪欲，劇中以她童年時代就認識的人為依據，此片又一次造成轟動，上演了四百零一場，功勞應歸於漢密特尖刻而有建設性的批評，這是她的劇本中寫得最成功、結構最好、最經常上演的一部。海爾曼兩年以後又寫出一部轟動一時的《守望萊茵河》，同時，她為好萊塢寫的六部電影劇本中有三部成為經典，她為米高梅的創辦人古德溫 (Sam Goldwyn) 寫《雙姝怨》，並接受他的勸告除去了同性戀的情節，改名為《這三個人》，獲得極大成功；《死亡結束》也頗成功；《守望萊茵河》贏得了對海斯辦公室 (Hays Office) 的一場著名的勝利（片中德國左派反納粹的英雄繆勒設計殺死了惡棍泰克伯爵，海斯辦公室提出抗議，認為凶手必須受到懲罰，但海爾曼反對，她認為戰爭時期殺死納粹或法西斯分子是正確的，她得勝了），這部電影還被選在羅斯福總統面前放映。一九四二年她還為古德溫寫了《北方的星》，是為蘇聯友好宣傳而作，這是好萊塢出品的跟共產黨路線有關的三部電影之一（另外兩部是《莫斯科使命》和《俄羅斯之歌》）。

海爾曼的戲劇和電影劇本的主題，與三〇年代中期開始的左翼激進主義關係密切，但是認為她

被漢密特吸收進共產黨的看法也許是錯誤的。首先，她的政治傾向比漢密特更富攻擊性，如果他們這方面有什麼影響的話，該是她把漢密特引入嚴肅而正式的政治活動中。再說，她與漢密特斷斷續續保持著性關係直到一九四一年（她自己說是一九四五年），同時她還與許多男士有染，其中有雜誌經理英吉索爾、百老匯的兩個製片人，還有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三等秘書梅爾比。她因複雜的性關係而聲名狼藉，但她也享受著成功帶來的歡快。正如她的一個朋友所說：「很簡單，她在性問題上敢作敢為，那個時代的婦女沒人敢這樣。其他人亂交，上帝知道，但是卻寫不出第一流的電影劇本；海爾曼從不遲疑，她得到了成功。」當然並不總是如此，照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所說，海爾曼一九三七年在巴黎勾引海明威就沒有成功；米勒（Arthur Miller）說，海爾曼對他懷有敵意是因為他貶低了她，「海爾曼遇到每個男人都如此，我沒興趣，她也因此永遠不原諒我。」在她中年的後期，常花錢買來英俊的年輕男子陪伴。她的成功眾所周知，給了她非同一般的聲譽，謠言也就從此而來。比如，有人說，她在菲爾德的家中，男人們打撲克，誰贏就把她帶進臥室。她的回憶錄在其他方面誇誇其談，唯獨沒有提到成了她俘虜的那些人。

有這種名聲和嗜好的人，在三〇年代不太可能得到美國共產黨這種非常教條主義的組織的信任，不過她的名字對他們來說肯定是有用的。她真的是共產黨員嗎？她寫罷工的劇本《未來的日子》不是灌輸馬克思主義的作品，《守望萊茵河》走到了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之間的支持希特勒——史達林和約的共產黨路線的反面了。另一方面，由共產黨控制的好萊塢劇作家協會的成員都是活躍分子，特別是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艱苦的鬥爭中，如果說海爾曼在一九三七年加入了共產

黨是合乎邏輯的，正如她說漢密特入了黨一樣。這一年是共產黨發展的高峰期，黨支持了羅斯福的新政和遍布各地的人民陣線政策，而三〇年代初期的皈依者傾向於成爲嚴肅的理想主義者，他們閱讀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就像威爾森），在一九三七年又不辭而別了，人民陣線的路線使共產黨得以在短時期內時髦起來，也從娛樂業當中招募到大量成員，他們不懂政治，但又急於迎合知識分子的潮流，海爾曼就屬於這類；但是當潮流消退以後，她繼續支持蘇聯的政策，多年沒有放棄，這一事實強烈地暗示，她雖然在黨內的資格還不老，但已經成了黨的機器。她總是否認自己是黨員，柏克萊反證說，一九三七年六月，海爾曼與漢密特、帕克、斯圖爾特、坎貝爾等人出席了在他家中召開的會議，目的是組成共產黨的好萊塢支部；後來，海爾曼拿出了憲法第五修正案，對這次會議的問題不做回答。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對她的訊問有力地證明，她在一九三七至四九年間是共產黨員。她在聯邦調查局的檔案幾乎有一千頁之多。除了柏克萊，《工人日報》的前總編輯布登茲也說她是共產黨員，並提供了兩個資料證明她在黨的會議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最大的可能是，由於種種原因，包括她的亂交，共產黨讓她做個秘密黨員，把她視爲同路人加以控制，雖然是給了她某些自由，但更爲有利。這是對她這一時期的全部行爲和態度的唯一合理的解釋。爲了實現蘇聯政策，她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確實也做了一些與她的劇本無關，以幫助共產黨滲透到美國知識分子生活中的事。她參加了共產黨重要的陣線團體，也出席了一九三八年六月在紐約舉行的第十屆共產黨全國大會，她在《紐約時報》親史達林的記者杜蘭蒂的指導下，於一九三七年十月訪問了蘇聯。那時蘇聯的審訊正處於高潮，她回國以後卻說對此一無所知，至於西方的自

由主義者對審訊的攻擊，她說她無法將「對野蠻的痛恨所做的真實控告」與「對一個國家和人民的盲目仇恨而捏造的事實」區分開來，但是第二年她的名字出現在《新大眾》一則贊同審訊的廣告之中。在惡名昭彰的凱茲（Otto Katz）資助下，她於一九三七年兩次訪問西班牙，還連同其他作家給了親共產黨的宣傳影片五百美元捐款，海明威也與此有關連。她對自己在西班牙的活動充滿了謊言——蓋爾霍恩對此給予詳細駁斥——她在那裡究竟幹了些什麼，現在已經難以確證了。

政治恩怨

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海爾曼也捲入了跟其他作家的恩怨，這使她的政治立場變得充滿仇恨和複雜。她在西班牙急於支持蘇聯的路線，造成她跟《紐約時報》記者卡內的爭吵，卡內堅持發表跟莫斯科版本不同的真相，海爾曼則指責他在安全舒適的法國度假勝地報導戰爭。此外，海爾曼還支持一九三九年蘇聯對芬蘭的入侵，她說：「我不相信有那樣一個美好、可愛、小小的芬蘭共和國，不相信人人都在為她哭泣，我在這裡，對我來說，她看來是一個親納粹的小共和國。」她因此與女演員班克海德起了爭執，班克海德在舞台上主演過《小狐狸》，基於諸多原因（主要是性的嫉妒），她原就是海爾曼的仇敵。班克海德為芬蘭救濟機構義演，海爾曼指責她拒絕為西班牙作類似的義演。班克海德反駁，這種指責是「厚顏無恥的杜撰」。沒有證據顯示海爾曼去過芬蘭，她的傳記作者認為不太可能。海爾曼繼續在各種出版物上攻擊班克海德，甚至這位女演員死了以後還不善罷甘

休。她寫班克海德酗酒的家庭、使用毒品、如何勾引黑人侍者；她還講了一個令人反感的故事：班克海德堅持要讓一位客人看看她丈夫勃起的粗大陰莖。

海爾曼與班克海德之間的爭吵其實是關於誰站在「工人」一邊的問題。事實上，她們兩人除了偶爾從工人隊伍中找來情人以外，誰也搞不清工人階級。海爾曼曾為紐約自由派的晚報《PM》做過調查，包括跟一個汽車司機、兩個在商店裡的人和兩個黑人兒童談話，她從中得出的結論是：美國是個警察國家。她沒有工人朋友，唯一例外是碼頭工人史密斯，他曾在西班牙服役，確實不是一個典型的美國無產階級。不過他的成長和海爾曼、漢密特，以及他們富有而激進的朋友都不同，他說：「作爲一個前共產黨員，我不滿意他們的態度——如此軟弱和知識分子氣。我懷疑他們中有誰參加過什麼會議或做過什麼工作。他們與官員一樣，而我是個士兵。」他尤其不喜歡漢密特「拿手杖掀起他女朋友的裙子」以顯示他的魅力的習慣。海爾曼所過的生活跟她喜歡說的「鬥爭」實在相距甚遠，她在東八十二街的房子和一百三十英畝的威斯特切斯特農場中，過著跟紐約的富人一樣的生活，她有女管家、男管家、秘書、私人女僕，她去看最時髦的精神病醫生，每小時收費一百美元。她的舞台劇和電影劇本給她帶來了尊敬和財富。一九四四年九月，她應蘇聯政府之邀前往蘇聯訪問，住在哈里曼大使的住宅裡，在那裡她與外交官梅爾比私通，她在都會旅館、國家旅館及大使館都留有房間。這次旅行她造出了一大堆謊言，說她在蘇聯停留了五個月，梅爾比——作爲一個更可信的見證人——卻說是三個月。她在一九四五年的《礦工》雜誌上，和在她於一九六九年出版的第一部自傳作品《一個不成熟的女人》中，對她在俄國的經歷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敘述，雜誌上的

文章沒有提到會見史達林，自傳中卻說雖然她沒有要求見史達林，但史達林卻同意會見她，她以沒有重要的事與不想占用他寶貴的時間禮貌地謝絕了。這個極其荒謬的故事與她回國時所說的相矛盾，她在紐約新聞出版業代表大會上說，她求見史達林，但得到答覆是，史達林「因為波蘭人的事正忙得不可開交」。

在一九三〇和四〇年代初期，海爾曼是左派中成功的女英雄、享有盛譽的成功人士。到四〇年代後期，她的生活進入了新階段，在激進派所謂的苦難時代中，她仍然頗為榮耀。在一段時間裡，她繼續從事政治活動，與其他極左派成員一道，一九四八年支持華萊士出任總統。一九四九年她得到蘇聯支持，是召開文化科學界世界和平大會的組織者之一。她的麻煩也開始了，她戰後所寫的劇本沒有以前的作品成功，《小狐狸》的續集《森林中的另一個部分》，寫的是同一個家庭的故事，從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開始，演出了一百九十一場，但沒有引起注意。使人注目的是她那任性的父親，他在劇中出場，始終穿著鮮艷的服裝，坐在前排座位上數著新美元鈔票，中場休息時他宣布：「我女兒寫這部戲，寫得更好了。」六個月以後，海爾曼根據她的精神病醫生勸告，讓她父親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下一部戲《秋天的公園》有些曲折，海爾曼聽到漢密特對初稿的批評後，就把它撕了；德克薩斯大學圖書館尚保存著寫著「初稿」的完整手稿。此劇一九五一年三月開演，只演了一百零一場。

與此同時，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一直在徹底搜查電影行業。所謂「好萊塢十君子」因為拒絕回答委員會關於政治活動的問題，被看成蔑視委員會而被傳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電影製片人一

致同意解僱任何介入此事的作家，電影劇作家工會的雜誌在一篇海爾曼寫的題爲《猶大替罪羔羊》的社論中，對這一決定發起了攻擊，其中一段話讓人吃驚：「沒有任何一部美國電影有共產主義的一句、一字。」法律的石磨緩慢地轉動，漢密特爲那些被控蔑視的劇作家捐助了保釋金，他們之中三個人拿走保釋金不見了，聯邦調查局認爲漢密特知道他們身在何處，於是派人到海爾曼的農場搜查。漢密特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被帶上法庭，要他說出捐助保釋金的其他人，以找到不見了的那幾個人。漢密特頑固地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因此入獄。海爾曼說她賣掉了農場以支付漢密特六萬七千美元的法律費用。

海爾曼自己也在一九四八年上了好萊塢的黑名單，四年以後（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被傳訊出席這個令人畏懼的委員會，正是此時，她在失敗的危險中抓住了勝利。海爾曼一直非常擅長於公共關係，這是她和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如布萊希特和沙特）所具有的技能，正如之前我們所提到的，布萊希特可以把出現在委員會化爲宣傳上的助力。海爾曼則更加突出，並爲她此後成爲激進派殉難女王的聲譽奠定了基礎。與布萊希特一樣，委員會成員的愚蠢幫助了她。出場之前，她得到律師拉奧詳盡的指點，使她理解了自己非常麻煩的法律處境。她給拉奧的指示是：不願交出名單，不想下獄，也不想引用第五修正案案件辯解，因爲如此會顯得像在保護自己而會被當成認罪（在那時的用語是「第五修正案共產黨員」）。不過只要表明她只是在保護別人，她也準備引用第五修正案。這使拉奧爲難，因爲第五修正案只是針對自陷法網來保護證人的。怎樣才能引用第五修正案把海爾曼救出牢獄，同時又讓她以援救別人的無辜者面貌出現？拉奧後來說，海爾曼會進監獄，是毋

庸置疑的，「如同一個代數問題，但我開始是看成一個公共關係問題。我知道，如果第二天的《紐約時報》大標題是『海爾曼拒絕交出名單』，我就贏了，如果是『海爾曼引用第五修正案作辯解』，那我就輸了。」

海爾曼爲他解決了這個問題，她於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給委員會主席伍德寫了一封狡詐虛偽的信，辯說她已經得到建議，不可能引用第五修正案爲自己辯護，也拒絕回答關於別人的問題。接著說了一個大謊：「我不喜歡任何形式的顛覆和背叛，如果有，我會認爲向有關當局報告是我的義務。」隨後她使出極出色的辯論伎倆，顛倒處境：如果只是她自己的自由遭到威脅，而用第五修正案保護了其他無辜的人，她就願入獄：「爲了救自己而去傷害我多年前就認識的無辜人們，是沒有人性、下流可恥的事，我不能也不願修剪我的良心去適應這個時代的風氣，雖然我很久之前就得出結論：我不是一個政治人物，在任何政治團體中都不會有我的適當地位。」委員會主席似乎明白了海爾曼所玩弄的詭計而暴跳如雷，一個還沒有掌握法律要點的委員提議把這封信記錄在案，拉奧十分高興，立即把信的副本發給了新聞界。第二天，他果然得到了他所想要的標題。海爾曼後來在有關這些事件的自傳作品《邪惡的日子》中，對這個故事大加渲染，她創作了許多細節，包括一個人在走廊裡大聲喊道：「感謝上帝，終於有人有如此的勇氣了。」海爾曼其實不需操心，她的信已從聽證會進入了歷史，也以一個無私而勇敢的婦女爲良心的自由所做的動人抗辯，而被收入了文章選集。

這是後來關於海爾曼傳說的精髓，與之相關的神話是：由於與黑名單的關係，以及因政治迫害

導致她和漢密特所要支付的巨額法律帳單讓她破產；但是這種說法沒有任何根據。《雙姝怨》於一九五二年重新上演，給她帶來可觀的收入。她保留著在紐約的老房子，直到搬入一棟更舒適的公寓。她確實賣掉了農場，但在瑪莎葡萄園的對面，又買下一塊很好的地產，後來成了富有的知識分子休閒的地方，比紐約邊緣地區更加時髦。漢密特經濟的困難原因很多，當他最後戒酒時，每天盯住電視機打發時間，他的慷慨大方並沒為自己打算，海爾曼卻沒有這種危險，但她與漢密特有個相同的習慣——拒繳所得稅。正如沙特和威爾森的例子所顯示的，在激進的知識分子當中都有一個共同的癖好：提出雄心勃勃的政府計畫，自己卻不覺有責任為其做出貢獻。

漢密特不交所得稅此舉可以追溯到三〇年代，並非入獄之後才暴露出來，早在戰前就已被聯邦調查局注意，當然，他也與其他債權人一樣，迫使國稅局向他們強制徵收。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聯邦法庭裁決他在一九五〇至五四年間，共欠下十萬四千七百九十五美元的稅。當局並不特別苛刻，稅務員報告說沒有收到錢：「經過調查，我認為是在跟一個破產的人交涉。」到漢密特死的時候，他所欠的債務，包括利息，已經達到十六萬三千二百八十六美元。與漢密特相比，海爾曼的債務更大，一九五二年的估算在十七萬五千到十九萬美元之間——這在當時是個很大的數目了。她後來宣稱已經窮得只好到梅西百貨公司工作，但這也不是事實。

最有權力的女人

在五〇年代，海爾曼消沉了，這是激進分子處境困難的十年。但是到了一九六〇年她又重新崛起，新劇本《頂樓裡的玩具》以漢密特的想法為基礎，加上自己童年時代在寄宿所的回憶。此劇於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在紐約上演，演員陣容強大，共演出五百五十六場，並再次獲得紐約劇評家協會獎，海爾曼也掙得一大筆錢。然而，這是她的最後一部嚴肅劇，第二年漢密特死了，在許多人看來，沒有漢密特，她就不可能再寫出另外一部戲來了。可以想像得到，她有了另一種生活目標。激進主義在整個六〇年代復活了，到這十年結束的時候，它幾乎與三〇年代一樣劇烈，海爾曼也處於鼎盛期。她去俄國的旅行又製造出一批謊話，還斷言赫魯雪夫在秘密會議上確定史達林的罪行，在他昔日的恩主背後插了一刀。海爾曼對美國流行的看法嗤之以鼻，她於是決定：是寫回憶錄的時候了。

這些回憶錄是二十世紀成功的偉大出版品之一，為海爾曼帶來的名望和在知識界的權威甚至超過了她的劇本。在海爾曼還活著的時候，這些回憶錄竟然就靠印刷出來的文字和公共關係的機器，把她神化了。《一個不成熟的女人》出版於一九六九年六月，是暢銷書，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舊畫翻新》出版於一九七三年，暢銷四個月；第三部《邪惡的日子》出版於一九七六年，則至少暢銷了兩三個星期。海爾曼從拍攝自己生平的電影版稅上獲得了五十萬美元，還得到了散文大師的新頭銜，被柏克萊加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邀請開設寫作研討班。獎勵和榮譽自此源源而來，紐約大學推選她為「年度婦女」，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蘭代斯授予她「戲劇藝術獎」，猶太大學授予她「成就獎」，此外還獲得「麥克杜威文學貢獻獎」，以及耶魯、哥倫比亞和其他許多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

到了一九七七年，她又回到好萊塢社會的頂層，出席了電影藝術科學院授獎（譯註：即奧斯卡金像獎）典禮。同一年，根據她的回憶錄改編的電影《朱麗亞》問世，廣受讚揚，也得到了各種獎勵。在美國東岸，海爾曼是激進而又瀟灑的女王，在進步的知識界、在鬧哄哄圍著她打轉的社交界，她是最重要的一個有力的經紀人。確實如此，她在七〇年代的紐約，就像沙特在一九四四至四五年的巴黎那樣有影響力。她創立並選拔重要的委員會，編出了自己的黑名單，讓知識界一群奴性十足的走狗管制他們，紐約激進派的名流急於聽從她的擺布。她的權力部分來自於她所製造的恐懼感，她知道如何在公開場合或私下板起臉來，她會唾人的臉、大聲辱罵、用手提袋打頭。在瑪莎的葡萄園裡，她毆打那些穿過她的花園走去海灘的人——她的怒火令人畏懼。她現在已經非常有錢，僱用了一群律師，凡是對她的權力哪怕是最微小的反對或冒犯，她都要進行政攻擊。那些諂媚者如果以為只是在她的聖壇前頂禮膜拜，就可能遭到狠狠的一擊。布萊希特的朋友班特利演出了一部不合百老匯傳統的反政治迫害的戲《你現在在在哪裡？你去過嗎？》，劇中女演員讀了海爾曼的信，海爾曼要求付給版稅，否則就要禁止他們演出。她是個帶著傳票的蕩婦，多數人寧可付錢給她，據說她得到一百萬美元才撤銷了對一九八一年《小狐狸》重新上演的訴訟。一些被認為有影響力的機構，常常在她發出命令之前，就趕忙按照她的吩咐行事。比如，波士頓的小布朗公司不肯出版特里林夫人的一本書，因為她不願刪除書中批評海爾曼的一段話，特里林夫人只不過是針對海爾曼在《邪惡的日子》中對她已故丈夫的惡毒攻擊辯護而已：「海爾曼是我所有認識的女人當中最有權力的一個，也許是我所有認識的人當中最有權力的一個。」

海爾曼的權威基礎出自其自傳裡塑造的神話，某些方面可以和盧梭在《懺悔錄》中對自我的神聖化相匹配。正如已經反覆證明的，一些知識分子領袖人物（如沙特、西蒙波娃、羅素、海明威、高蘭茨）的回憶錄是完全不可信的。這些知識分子自我美化中最危險之處，是以坦率和悔改來麻痺讀者，比如托爾斯泰的日記，乍看之下是誠實的，但實際上處處隱瞞。盧梭的《懺悔錄》，狄德羅和時人就已經察覺到有心的欺瞞傑作，用一塊坦率的裝飾板掩蓋謊話連篇的泥坑。海爾曼回憶錄的模式如出一轍，她承認記憶中有些模糊不清之處，也有小小的錯誤，於是就給了讀者努力從過去模糊不清的泥沙中篩選出準確的事實的印象。所以這本書一出現，就有許多評論家讚揚它真實可信，包括最敏銳的評論家。

到了七〇年代，在讚揚和奉承海爾曼的歌聲喧鬧之中，那些親身經歷過她的謊言的人所發出的聲調逐步大了起來，特別是《邪惡的日子》出版以後，她遭到一些重量級人物的挑戰，但主要集中揭露她說法上的歪曲和疏漏，還沒有有意識到她的捏造，並沒有引起多大注意，也沒有給海爾曼帶來嚴重的傷害。

而此後，海爾曼犯了一個災難性的錯誤。這個錯誤並不尋常，竟發生在海爾曼非常在行的領域：公共關係。她與瑪麗·麥卡錫長期不和，可以追溯到三〇年代美國左派隊伍中史達林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的分裂，她們於一九四八年在沙拉勞倫斯學院的研討班上發生爭論，瑪麗發現海爾曼在關於帕索斯和西班牙問題上說謊，後來於一九四九年的沃爾多夫代表大會，她們又繼續交火。從此瑪麗就不斷指責海爾曼大量說謊，不過顯然並沒有給她帶來多大的傷害。在一九八〇年一月的「狄

克·凱維特節目」中，瑪麗重複一遍她對海爾曼謊言指責中最廣為人知的一句話：「我曾在訪談中說過：她寫的每一個字都是謊言，包括『and』和『the』。」瑪麗說這話時，海爾曼也在看這個節目，她的憤怒和對訴訟的愛好戰勝了她的精明，她起訴瑪麗，要求賠償二百二十二萬五千元，她以旺盛的精力堅持不懈地把官司打下去。

之前對海爾曼撒謊的指責並沒有給她帶來傷害，而現在公眾豎起了耳朵，預感將有一場殺戮發生。無論如何，對簿公堂總是有害公共形象，一個起訴別的作家的作家從來不被人喜歡。大家都知道海爾曼很有錢，而瑪麗卻不得不賣掉房子來支付訴訟費用。雙方的朋友都加入戰場，人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海爾曼誠信的問題上來了。更嚴重的問題是，這場官司帶來了屬於知識分子的新遊戲：追查海爾曼杜撰過的東西。瑪麗很快就不得不支付二萬五千美元的費用，當她面臨破產的時候，除了繼續勇往直前之外別無退路。正如海爾曼的傳記作者賴特所說：「海爾曼起訴瑪麗，等於逼迫這個國家中最敏銳、最精神飽滿的頭腦去仔細檢查海爾曼的全部作品，追查謊言的真相。」其他人也很樂意加入。在一九八一年春天出版的《巴黎評論》上，蓋爾霍恩列舉文獻證明了海爾曼有關西班牙的八大謊言。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則把瑪麗的注意力吸引到穆麗爾的八卦上來了。

揭穿謊言

斯彭德與穆麗爾有過一段短暫關係。穆麗爾是富有的美國女子，曾結過婚，到維也納進修精神

病學，加入了一個反納粹的地下組織，化名為「瑪麗」，私下傳送信息和偷渡人員，她愛上了一位名叫布亭格爾的奧地利反納粹的社會主義者，並與他結婚。一九三九年戰爭爆發以後，他們離開歐洲，定居新澤西州。海爾曼從來沒有見過穆麗爾，但是從她的紐約律師那裡聽過她、她的丈夫及他們的地下活動等情況。美國富有的女繼承人嫁給了一位中歐的社會主義者和抵抗運動的領袖，這個故事構思就成了《守望萊茵河》的開端。海爾曼是在布亭格爾夫婦去新澤西後五個月開始寫作的，但實際情節跟他們沒有什麼關係。當海爾曼寫《舊畫翻新》的時候，她又抄襲了穆麗爾的經歷，將她化身為「朱麗亞」，不過，這一次她也把自己當成朱麗亞的朋友寫進了故事，充滿英雄和討喜的色彩，她把這一切都當做事實寫進自傳裡。

這本書問世以後，並沒有人對海爾曼提出疑問。直到穆麗爾讀過以後，給海爾曼寫了一封非常友好的信，指出了她的經歷與朱麗亞的相似之處。她沒有得到答覆，後來海爾曼說她從來沒有收到過那封信。既然海爾曼從來沒有見過穆麗爾，她就只能辯說會有兩個美國地下工作者：一個是「朱麗亞」，一個是「瑪麗」。那麼朱麗亞是誰呢？海爾曼說，她已經死了。那麼她的真實姓名是什麼呢？海爾曼表示不能披露：因為她的母親還活著，可能會被德國反動派迫害。隨著海爾曼謊言真相爭論的發展，穆麗爾逐步放棄了她對海爾曼的信任，一九八三年，她在耶魯大學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化名瑪麗》。此書出版以後，《紐約時報》和《時代》雜誌的記者對《舊畫翻新》和電影《朱麗亞》提出了令海爾曼難堪的問題。奧地利抵抗運動檔案館主任斯泰納博士確證只有一個「瑪麗」。無論朱麗亞就是瑪麗，還是朱麗亞只是個杜撰，任何情況都可以揭穿海爾曼是個大撒謊家。瑪麗連繫

穆麗爾，把這些資料內容作爲此案的準備。一九八四年六月，《評論》發表了波士頓大學麥克萊肯的著名文章《海爾曼的朱麗亞及其他虛構》，他作了大量的偵探式研究，包括火車時刻表、輪船航程表、戲劇節目單和其他可以查證的事實，拼湊出《舊畫翻新》中海爾曼所敘述的朱麗亞細節。任何人心氣平和地讀了這篇文章，都不會再有任何疑問了：朱麗亞的情節的確是一段虛構，是以海爾曼從來沒有見過的一位女性的真實經歷爲基礎所寫的。

麥克萊肯的調查也揭開了海爾曼生活中另一個陰暗角落的蓋子：她對金錢的追逐。她總是很貪婪，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愈甚。她的多數訴訟都帶有賺錢的目的。漢密特死後，她跟一個有錢的費城人柯溫私通。柯溫勸她投資，並給她想出一個得到漢密特版權的詭計（漢密特的版權在政府手中以抵他所欠的稅）。由於收到的版稅很少，柯溫就說服政府把版權拍賣，最高價爲五千萬美元。海爾曼又說服漢密特的女兒同意賣出，並騙說否則她們就要對漢密特的債務負責。海爾曼和柯溫是僅有的投資人，他們各出了二千五百美元就得到了版權，海爾曼其後就精神抖擻地爲這筆文學財富而奔忙了，很快美元滾滾而來——她僅僅把漢密特的一個故事改編爲一部電視劇，就得到了二千五百美元。柯溫後來也死了，按照海爾曼在《舊畫翻新》中所說的，他沒有留下任何遺囑。麥克萊肯卻確認柯溫有遺囑，海爾曼從這個遺囑中什麼也沒有得到，這表明柯溫死前和海爾曼有過爭吵。顯然，海爾曼勸告過柯溫的妹妹，說柯溫的遺願是把他漢密特版權中所占有的份額送給海爾曼，這位妹妹就寫了封信，把版權轉讓給海爾曼了。如此，海爾曼就享用著漢密特價值越來越高的版權，直到她去世爲止，這也是她在自己的遺囑裡留給漢密特貧窮的女兒們唯一的東西。

海爾曼死於一九八四年七月三日，即麥克萊肯的文章發表一個月後。這時她建立在虛構上的聲譽，正在她耳邊碎裂。從她作為左派激進分子的雄心勃勃的女王開始，她就處處設防，知識分子的英雄或女英雄們是不會輕易就被除掉的。正如義大利南方的農民，當他們所喜愛的聖徒被揭露只是虛構的人物，但過了一段時間，他們還是會繼續貢獻祭品和祈禱。熱愛進步的人也是這樣迷戀他們的偶像，儘管這些偶像的雙足是由泥土所製。雖然盧梭一生的荒唐甚至在他那個時代就廣為人知，但理性的崇拜者們還是向他的聖壇蜂擁而去，把關於他的德行的神話變成了固定的信念。沙特長期聲望的下降、後期觀點的昏庸，都不能阻擋五萬名巴黎的博學者為他的葬禮而出動。海爾曼在瑪莎的葡萄園中的葬禮，也有許多人參加，有很多名流前來致敬。她身後留下了近四百萬美元，大部分由兩個機構托管，其中一個是漢密特基金會，基金「在馬克思學說的信徒、已故的漢密特的政治、社會和經濟信仰，當然是激進主義的信仰指導下」進行授予。儘管揭露出如此多的謊言，關於海爾曼的神話製造業還是繼續平靜地運轉。一九八六年一月，海爾曼去世十八個月以後，這位神聖作家的傳記劇《莉蓮》在紐約上演，觀賞者眾。隨著八〇年代的過去，世俗的彌撒顯示，奉獻給這位理性女神的蠟燭仍然在燃燒。莉蓮·海爾曼，跟她的英雄史達林一樣，最終會埋藏在幽暗之中，抑或她的虛構故事及她所做的一切仍然是進步思想的戰鬥象徵？我們等著瞧。不過，兩百年來的經驗顯示：豐富的生活伴隨眾多的謊言，同樣體現在這位老女人的身上。



13 理性的逃亡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世俗的知識分子的主要目標有了重要變化，重點從烏托邦主義轉入享樂主義。這一變化剛開始很慢，後來就逐步加快。研究變化的起源，最好的方法是考察三個英國作家的觀點和他們的關係，他們都生於一九〇三年：歐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〇三—一五〇）、沃（Evelyn Waugh，一九〇三—一六六）、康納利（Cyril Connolly，一九〇三—一七四）。可以把他們分別看成舊式的理智論者、反理智論者和新式的理智論者。當歐威爾被致命的疾病擊垮時，沃才開始小心翼翼地跟他結交；沃和康納利成年以後一生都在爭吵；歐威爾和康納利讀書時就相識。這三位作家彼此都持有謹慎、懷疑、甚至嫉妒的目光，而康納利則自覺是三個人當中的失敗者，他把自怨自艾的兩行詩寫在維吉爾的一本書中，送給了戲劇批評家衛斯萊（T. C. Worsley）…

在伊頓有歐威爾同學，在牛津有沃同學

他之前此後都微不足道。

但他的說法遠非事實，在某些方面可以說他是三人中影響最大的一個。

人更重要：歐威爾

我們先看歐威爾。他幾乎是舊知識分子的典型，也就是說，他在政治上是以對烏托邦、對未來的社會主義的信奉，取代了他不相信的宗教理想主義，對他而言，上帝是不可能存在的。他相信人類，但是他觀察奉獻的對象時靠得太近，反而看不清楚。歐威爾原名布萊爾（Eric Blair），生於一個不那麼重要的帝國創建者的家族，他看起來就屬於那種家族。他身材瘦高，頭髮剪得短短的，蓄有濃密整齊的小鬍子。他祖父在英國駐印度的軍中服役，外祖父是緬甸的柚木商人，父親供職於印度內務部鴉片局。他和康納利同進一家屬於上層社會的私人學校，後來又都進了伊頓公學。他所以接受這種昂貴的教育，是因為他跟康納利一樣聰明，指望能得到獎學金並為學校增光，但後來這兩個孩子都對這所學校做了有趣而有敵意的描述，使學校受到了傷害。歐威爾的文章〈這，這就是歡樂〉誇大其詞，甚至失真，他在伊頓公學的導師高歐了解私立學校的狀況，他相信歐威爾是被康納利收買才做出這種不公平的指責。如果是這樣，那是康納利唯一一次鼓惑歐威爾幹出不道德之事的機會，特別是其中包含著謊言。正如高蘭茨咬緊牙關所評價的：歐威爾令人痛苦地誠實。

歐威爾離開伊頓後，前往印度當了五年警察（一九二二—二七），這樣他就看到了資本主義的醜陋面：鞭刑和絞刑，他無法忍受。兩篇出色的文章〈絞刑〉、〈獵象記〉對不列顛帝國精神的殺傷

力，恐怕超過其他任何作品。他休假回到英國，辭去內務部的職位，決心當個作家。他考慮了各種筆名，最後選了「喬治·歐威爾」。歐威爾是這樣一種知識分子：他相信——至少在青年時代相信——世界可以用理智的力量改造，因此他是用觀點和概念來思考的。但是他的本性，或許是受過警察訓練，使他對人民具有強烈的興趣，他的警察本能一定在告訴他，事情並非如外表那樣，只有探索和細緻的調查才能產生真理。

因此，與大多數知識分子不同，歐威爾以對工人階級生活的近距離考察，開始了他的社會主義理想主義者的生涯。在這方面，他與威爾森有某些共同之處，同樣懷有對嚴格的真理的激情；但他比威爾森更加堅持尋找關於「工人」的知識，而且對這種經歷的追求，長年都是他生活的中心主題。他最初住在倫敦的貧民窟諾丁丘陵（Notting Hill），一九二九年到巴黎當洗碗工和廚房雜工。後來得到肺炎（他終生為肺疾所苦，四十七歲時死於此病），住進了巴黎一家慈善醫院，他的冒險才告結束，這段慘痛的經歷在他的《巴黎倫敦落魄記》一書中沒有被提及。後來他又在蘭開夏郡的韋根（Wigan）工業城跟流浪漢和吸毒者生活在一起，在一個工人階級家庭中搭伙並合開雜貨店。他所有的這些活動都是一個目的：「我覺得我不但要脫離帝國主義，而且要脫離任何人統治人的形式，我自己要深入到被壓迫者之中，成為他們中的一員，站在他們這邊反抗暴君。」

這樣，到了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歐威爾不但道義上支持共和國——如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西方知識分子——還親自為共和國戰鬥。他正好是在共和軍中負擔最重、犧牲最大的一支——無政府主義的民兵（POUM）——中，這一經歷對他此後的一生極具關鍵。歐威爾最初是想親自到

西班牙先看看局勢，但去西班牙很難，通道實際上被共產黨所控制。歐威爾先去找高蘭茨，後來被推給斯特雷奇，斯特雷奇又叫他去找共產黨的首領波里特。波里特要他先同意加入共產黨控制的國際旅，否則就不給他寫推薦信。歐威爾謝絕了，倒不是因為對國際旅不滿——事實上，次年他在西班牙還試圖加入——而是因為他不想這麼快在考察前就失去了選擇。於是他轉向一個叫作獨立勞動黨的左翼派別，被送到巴塞隆納的無政府主義者那裡，他就這樣加入了POUM民兵。他被巴塞隆納震動了：「這是一個工人階級掌權的城市。」他更被民兵的存在所震動，在這個城市裡，「市民生活許多常見的主題——勢利、金錢統治、對老闆的恐懼等——絕對不存在了，一般的社會階級劃分消失了，這在英國那種被金錢所敗壞的氣氛中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他尋求戰鬥，在戰鬥中負了傷，這是使他在某些方面精神高揚的經歷，他給康納利寫了一封信，對他婉轉的責備：這場戰爭，康納利只是旁觀者，像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只是一個「關心的」過客。歐威爾在信中寫道：「遺憾的是，你在亞拉岡的時候沒有到我們的陣地來看我，否則我會在戰壕裡請你喝杯茶。」歐威爾把民兵描述為「一個更常見到希望而非冷漠無情或玩世不恭的團體，在那裡『同志』一詞意味著真正的同志關係，而不是大多數國家中那種騙人的鬼話」，那裡「沒有人熱中名利」，「一切都短缺，但沒有特權、沒有逢迎拍馬」。他覺得，這種「樸實的跡象，社會主義的開始階段也許就像這樣」。信中最後的結論是：「我看到了一些美好的東西，終於真正信仰了過去從來沒有信仰過的社會主義。」

隨之而來的事卻令人沮喪：共產黨依據史達林的命令對無政府主義者清算。成千上萬個歐威爾的同志被直接殺害或拷打處死，所幸他自己逃過了一命。在回英國的途中，他清楚地看到，要出版

這些可怕事件的書是困難的，無論是「左派讀書俱樂部」的高蘭茨，還是《新政治家》的馬丁（「左派讀書俱樂部」和《新政治家》是英國進步思想所依靠的兩個主要機構），都奉命不讓他說出真相。他被迫轉向別處。歐威爾總是把經驗放在理論之前，這證明他是對的：理論說，左派行使權力時會秉公處理，尊重真理；經驗卻告訴他，左派的不公正和殘酷所能達到的程度，迄今為止幾乎無法預測，只有德國納粹的滔天罪行可與之匹敵，爲了自己所維護的更高真理，它可以拼命壓制真理。第二次大戰中，一切價值觀和忠誠都變得混亂，大戰中的種種經歷給了歐威爾教訓：人比抽象的觀念更重要——他永遠確信這一點。歐威爾沒有完全拋棄這個信念：思想的力量能夠創造更好的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仍然是個知識分子，但是他攻擊的核心，從現存的、傳統的資本主義社會轉向騙人的烏托邦，諸如列寧這樣的知識分子正是力圖用烏托邦來代替它。歐威爾最偉大的兩部作品《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本質上是批判現實化的抽象概念、批判集權主義者對心靈和肉體的控制、批判他所說的「中央集權的經濟易於產生的墮落」。

這一重點的轉移，必然導致歐威爾對知識分子本身採取高度批判的觀點，也充分體現了他的軍人氣質。他的作品中隨處可見離題的話，比如談到龐德時說：「即使是從詩人那裡，人們也有權期待普通的禮儀。」而他的警句是：窮人、普通人，比起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看重他所謂的「通行的正派」，更依附於諸如正直、忠誠、誠實等樸素的美德。他在一九五〇年去世時，他的最高政治目標還是不清楚，他仍然是含含糊糊地被歸入左派知識分子。隨著他聲譽日隆，左派和右派相互爭鬥，都爭著說他忠於己方，但在他死後的四十年中，他越來越被當做打擊左派知識分子概念的棒

子。那些感到同本階級關係最密切的知識分子，長期把他看成敵人，比如瑪麗·麥卡錫在關於歐威爾的文章中，就說他的政治觀點時有混亂，處處表現出特權意識，她尖刻地說，歐威爾「氣質上是保守的，就像退休的上校或工人那樣反對舉止、衣服或極端的思想」，他是個「剛出現的市儈，確實是個市儈」，他的社會主義是「未經檢驗的、精神失常的思想，一種純粹的誇張」，他對史達林主義者的追擊是偶然的、「僅僅是個人厭惡的產物」，他「政治上的失敗……是思想的失敗」，如果他還活著，必然會向右轉，「他死了，對他來說，或許是一件幸事。」（最後這個觀點——死比反對赤色好——是個顯著例子，反映了典型知識分子優先考慮的事。）

專業的知識分子離開歐威爾的一個原因是，歐威爾越來越相信繼續尋找政治解決辦法是正確的，「正如醫生必須盡力去挽救一個也許快死的病人一樣」，我們不能不以「承認政治行為主要是非理性的」為出發點，所以，知識分子一般並不習慣於一定要用這種解決辦法。但在知識分子對歐威爾變得懷疑的同時，那些有相反主張的人——算是文人吧——卻傾向於同情他。舉例說，沃就從來沒有低估生活中非理性的重要，他開始與歐威爾通信，到醫院看望他，如果歐威爾活下去，他們的友誼也許會很好地發展，他們第一次合作，提出了一個共同的要求：不要因為他們喜歡的作家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愚蠢（跟龐德相比他幾乎無害）的戰時廣播而被迫害。這說明了他們兩個人都堅認，跟意識形態上正確性的抽象概念相比，具體的人更重要。沃很快發現，歐威爾可能成為知識界隊伍中的逃兵。他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我與我的共產黨表弟克勞德吃飯，他要我警惕托洛斯基主義的文學，結果我讀了歐威爾的《動物農莊》，非常喜歡。」他同樣承

認《一九八四》的力量，但他發現，在參加反抗歐威爾所描述的暴政時，宗教精神竟然沒有保存下來，令人難以置信。沃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給歐威爾的最後一封信中寫道：「你看，你的書使我多麼激動，以至我要冒險作一次佈道。」

人是流放者：沃

歐威爾勉強強、猶豫不決地所接受的東西——烏托邦主義的失敗是由於人類行為基本上是非理性的——沃在他大部分的成熟期卻是吵吵嚷嚷地加以維護。確實從來沒有一位大作家（甚至吉卜林這樣的作家）對這種反理智論的立場做出更清楚的表述。沃和歐威爾一樣，相信個人的經驗，相信自己看到的東西，反對理論上的想像。他沒有認真探索過的東西是沒有價值的。跟歐威爾一樣，他跟被壓迫者生活在一起，熱中於旅遊，常去偏遠難行的地區。他見過許多人和事，對於這個世界既有實踐的也有書本的知識。當他寫作嚴肅的問題時，也非常注意真實。他的一部政治著作《法律下的掠奪》是描述墨西哥革命政權的，引言是對讀者的警告，他將寫作這個問題的論據講得十分清楚，對他來說，這些根據似乎是很不充分的。他要讀者注意那些跟他觀點不同的人的作品，警告他們不要簡單地根據他的敘述來斷定墨西哥正在發生的事，他強調說，他為「介入」文學感到悲哀。他說，許多讀者「討厭自由印刷的特權」，他們決定通過組成讀書俱樂部，「給自己加上自願的審查制度」——他心裡想的是高蘭茨的「左派讀書俱樂部」——所以，「他們完全可以相信，無論他們讀

的是什麼，都是爲了鞏固他們現有的觀點而寫的」，因此，沃認爲，這是對他自己的信仰的適當總結，對他的讀者也是公平的。

沃說自己是個保守主義者，他在墨西哥所見到的一切都在增強他的信念。人的本性「是流放者，在這個地球上永遠不會自我滿足或完美」。他認爲，人們幸福的機會「並不受到他們周遭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太大的影響」，人類狀態的突然變化，通常會把事情弄得更糟，這卻爲「不道德的人爲了錯誤的理由而鼓吹」。他相信要有政府：「人們不可能在沒有規則底下共同生活」，但規則「應當限於維護安全的最小範圍」，「沒有一種受命於上帝的政府形式比另一種形式好」，「社會中的無政府主義成分」是如此強烈，所以「保持和平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財富和地位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討論消滅它們的好處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人們「在階級系統中自然而然地爲自己安排好了」，所以「任何合作都是必要的」。戰爭和征服同樣是不可避免。藝術也是人類的自然功能，偉大的藝術作品「碰巧」都產生於「政治專制系統之下」，「雖然我並不認爲它與任何特定的系統連繫在一起」。沃最後說，他是愛國者是基於這樣的意義：他不認爲不列顛的繁榮必定會傷害其他任何人，如果有，「我希望不列顛繁榮，而不是她的敵人。」

這樣，沃就描述了社會是什麼樣和應當怎麼樣，以及他對此的反應。他自己確實有理想化的眼光；但是作爲一個反理智論者，他坦承是不現實的。正如他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一部著作的導言裡所說的，他理想的社會有四個階層：頂層是「光榮和正義的源泉」，接著是「從上級獲得職務，並作爲傳統、道德和美的守衛者的男女」，他們必須準備犧牲，但也得到保護，免得被「世襲的家財所帶

來的腐敗和野心所污染」，他們是藝術的培育者和風氣的監督者。其下是從事行業和學術的階級，他們從兒童時代起就被培養「正直的習慣」。底層則是體力勞動者，他們為自己的技能而感到自豪，共同對君王的忠誠把他們跟上面各層的人聯合起來。沃的結論斷言：理想的社會本身是不朽的，「總的說來，一個人最適合的，是他目睹他父親所從事的工作」。但是這種理想「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也永遠不會有，我們每一年都與之相距更遠」，儘管如此，他並不是失敗主義者，他說，他不想只是哀嘆，然後屈從於時代精神，「因為時代精神是組成這個時代的人的精神，越是強烈地表現出對流行時尚的不贊同，把它從毀滅性的過程中轉移出來的可能性就越大。」

沃不斷地盡其最大能力表現出「對流行時尚的不贊同」，他有這樣的觀點自然不會參與政治，正如他說的，「我並不渴望在我的君王選擇他的僕人時提出建議。」他不但自己避開政治，而且感到悲哀：他的那麼多朋友和同時代人，包括康納利，屈從於三〇年代的時代精神，把自己泛政治化，背棄了文學。康納利使沃為之傾倒，沃以各種方式在幾本書中提到他，以狂熱而敏銳的旁觀者對他的作品加以解釋。沃為什麼有這種興趣？原因有二：首先，沃認為康納利值得注意，因為他具有出眾的智慧，在作品裡他能夠「一段接著一段，都具有精美的形式，運用風趣的戲擬、出色的敘述、聰明的隱喻」，有時還具備「令人難忘的獨創性」；但同時康納利缺乏文學結構感——沃寧願稱之為文學的建築學——也缺少持續的活力，所以他不能寫出大作品，沃發現這種不協調很有意思。其次，但更重要的是，沃把康納利看成時代精神的代表，因此把他當珍貴的鳥看待。沃在康納利的一本《不平靜的墳墓》（此書現藏於奧斯丁的德薩斯大學人文學研究中心）中，對他的性格作了許多註

釋：他是「我們這代人當中最典型的」、「缺乏真正的學術性」、「喜愛閒暇、自由和舒適」、有「浪漫式的勢利」、「浪費和缺乏自信」、「高度的表達才能」；但他又被「懶散所拘束」，被他的愛爾蘭氣質所妨礙，無論他多麼費力地要消除它，他「還是個愛爾蘭男孩、移民、思鄉病人。他衣衫不整，害羞，在酒館裡玩笑不斷，口中隨時準備引文，害怕女巫、教士，為自己的小把戲洋洋自得」，他有著「愛爾蘭人的根深柢固的信念：只有兩種實際的存在——地獄和美國」。在三〇年代，沃爲這一事實而感到痛惜：康納利在寫「當代文學史」時，不是按照作家「運用和探索自己才能的方式」，而是寫成「一連串的运动」：挖地道、丟炸彈、軍事包圍，或者是黨派欺詐、弄虛作假，這也許是出於他身上的愛爾蘭因素。沃嚴肅地責備康納利「投入」「介入的魔爪」，即他所有年輕的朋友都陷入的那個陰暗寒冷的政治深淵。他認爲，「對這樣偉大的天才，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結局，是所有的敵人當中最險惡的。」他認爲康納利不會長久地迷戀政治，無論怎麼說，他可以做些更好的事，像康納利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去教導人類如何生活呢？

《不平靜的墳墓》：康納利

確實如此。康納利從任何意義上看都並非壞人，他在非同一般的程度上展示了知識分子的道德弱點。原先，至少從三〇到五〇年代，平等主義流行的時候，他自稱是平等主義者，他是個勢利的人，曾抱怨道：「沒有比把我當成愛爾蘭人更使我惱怒的了。」他說「康納利」只是他的八個曾祖

父母中的一個愛爾蘭人的姓氏。他出身於職業軍人和水手的家族，父親是普通軍官，祖父卻是海軍上將，他的一個姨媽是金斯頓伯爵夫人。一九五三年《新政治家》一篇名不見經傳的人物略傳中，論者雷蒙德（John Raymond）指出，康納利在《可能的敵人》中篡改了他的傳記細節，一九三八年（那是無產階級的年代）的原版中隱瞞了他的外祖父族系和地主親戚，在一九四八年的修訂版中經過有心的安排，他們又出現了，那時知識分子的潮流有了變化。雷蒙德注意到康納利總是為正確地把握這種「文化趨向」而「探測目標」，「對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英國文學的裝腔作勢、雜亂無章、裝神弄鬼，沒有人比他有更多的知識。」

康納利早就很勢利了，像許多重要的知識分子如沙特等一樣，康納利是個獨子，他母親溺愛他，稱他是「瘦小子」。他是個被寵壞了的自我中心主義者，長相醜陋，不善運動，他發現了寄宿學校的粗暴，為了能生存下去，首先，他熱情地奉承那些上等人家的孩子，會興奮地告訴母親：「這學期我們當中貴族真多……暹羅王子、切爾斯福特伯爵的孫子、馬登侯爵的孫子——侯爵是埃塞克斯伯爵的兒子——還有一個是助爵的孫子、一個是倫敦主教的侄兒。」他生存的第二個手段是才智。跟沙特一樣，他很快就發現，智力上的機靈，特別是使其他孩子發笑的能力，使他勉強被人接受了。後來他寫道：「『康納利很有意思』，這句話將會流傳，我很快會召來一大群人。」在有權勢的孩子面前，康納利如同宮廷小丑，甚至到了伊頓公學，他仍是如此，不過在那裡他擴展到智慧的領域：「我在公學的初中部，完全成了蘇格拉底。」康納利以「被騾子踢臉的公費生」而知名，他以其才智如願成了「大爺」。理所當然地，牛津大學隨之對他開放。他的同代人約瑟爾勳爵對他說：

「你得到了波里奧獎學金，你也成了大爺，你知道，如果你今後一生中不幹任何事，我是不會感到驚奇的。」

康納利意識到這個預言有成真的危機，他對自己跟對別人一樣敏感，早就承認自己是個享樂主義者，他的目的並不是要追求「完美的幸福」那般完美，但是就算他積極進取，由於他沒有可以繼承的財產，如何能幸福呢？沃就指出他的懶散，康納利自己也承認「懶惰使我無所作爲」。他在牛津不甚勤快，被評爲丙等。後來他弄到個輕鬆的工作，爲富有的作家史密斯（Jogan Pearsall Smith）抄寫文稿，事雖少每週卻可得八英鎊，這在當時是相當大的數目了。史密斯希望有個鮑斯韋爾，但是他注定不能如願，因爲鮑斯韋爾式的寫作需要刻苦和勤奮。此外，康納利很快跟一位有錢的女子簡恩結婚，每年有了一千英鎊的收入。他好像喜歡她，但這對夫婦太過只顧自己而不想要有孩子。有次在巴黎，簡恩流產失敗，不得不再做手術，此後她再也不能生孩子了；她的腺體因此受到影響，開始變胖，丈夫也就對她失去了興趣。康納利對女性的態度似乎從來沒有認真過，他承認，對他來說，「愛」是「獨生子的表現癖」的形式，意即「想把我的個性踩在人的腳底下，如同小狗藏起濕漉漉的球」。同時，簡恩的錢也足夠讓他不必要正常工作，因而康納利在一九二八至三七年間的日子記中有這麼一段：「無所事事的上午」，「上午極爲空閒，大約兩點鐘吃午飯」，「我躺在沙發上，努力想像一片濃密的黃色陽光移過一堵白牆」，「太過懶散了，一個這麼懶散的人難以依靠任何人或事，他們大多數是會避開的」。

事實上，康納利也不全像他所說的那麼懶，他完成了對文學風氣進行敏銳批評的著作《可能的

敵人》，一九三八年這本書出版後，被認為是那十年中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由此可證，康納利的確有才能領導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群。西班牙戰爭爆發時，他本人立即泛政治化了，並曾三次到西班牙訪問，就如某一階級的知識分子必須去歐陸旅遊爲自己取經一樣。康納利從波里特那裡得到一封委任信，當康納利的同伴奧登在巴塞隆納的公園隨地小便——在西班牙是重罪——而被捕時，這封信就用得著了。

康納利將這幾次訪問的見聞刊於《新政治家》，文風犀利，跟當時其他多數知識分子所寫的基調灰暗的表態文章相比，使人耳目一新。他自我介紹說：「我屬於有史以來世上最沒有政治色彩的人之一……我們與其去參加政治集會，還不如去教堂。」他們當中「更現實的人物」——他舉沃和克拉克（Kenneth Clark）爲例，他們已經領悟到「他們所過的那種生活有賴於和統治階級密切合作」；其他人則一直搖擺不定，直到西班牙戰爭爆發：「（現在）他們的思想已經完全泛政治化了，我以爲，這是國外局勢所造成的。」但他敏銳地注意到，左派許多人物具有野心，或者是因爲「恨他們的父親，或者是不喜歡他們的公立學校，或者是在海關遭到了侮辱，或者是爲性關係擔心」。他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文學和政治價值的重要性，他稱讚威爾森的《阿克賽爾的城堡》是「唯一具有美學又具備經濟標準的左派批評著作」。

康納利要說的是，泛政治化的文學沒有發揮作用。一旦理智告訴他安全的時候，他就立即公開宣布「介入」過時了。一九三九年十月，一位富有而對他讚賞有加的人，爲他設計了一個完美的角色：編輯一本發表新作品的雜誌《地平線》，宗旨是以文學的特長對抗戰時完全封閉的精神。一開始

這本雜誌就很成功，奠定了康納利身為知識界主要代言人的地位。到一九四三年，他覺得自己已經能夠評論三〇年代的錯誤了：「這十年中最典型的文學都是泛政治化的，它在兩個方面遭到了失敗，因為它沒有實現任何政治目的，也沒有帶來任何具有長久價值的文學作品。」康納利開始以對啟蒙式的享樂主義的追求，來代替知識分子對烏托邦的探索，他在《地平線》的專欄和一本闡述快樂表現逃避現實思想的書《不平靜的墳墓》中都在強調。康納利在青年時代就把他的思想體系稱為尋找「完美的幸福」；在三〇年代的無產階級時代，他稱之為「審美的唯物主義」，現在它成了「對文明標準的捍衛」。

但是事實上直到一九四六年六月戰爭結束，康納利才在《地平線》的一篇社論中詳細地表明他的綱領。頗具典型意義的是，正是目光敏銳的沃注意到這份說明，他一直密切關注康納利的所作所為，即使在動盪不安的戰爭之中也是如此。後來他在《榮譽之劍》三部曲中，諷刺戰時的康納利是「不安分的常青樹」，稱他的雜誌是「殘剩品」，稱他漂亮的女助手——莉絲和索尼亞，前者和康納利共枕，後者成為歐威爾的第二任夫人——是小法蘭克人和兔子。這時沃把《碑》一書的天主教讀者吸引到康納利綱領的窮凶極惡上來。康納利曾列出以下十個目標，稱之為「文明社會的主要標誌」：一、廢除死刑；二、改造刑法，建立模範監獄，實施犯人重新就業；三、促進貧民窟衛生和建設「新城鎮」；四、對照明和取暖予以補助，「像空氣一樣免費供給」；五、免費供應藥品、食品 and 衣服；六、廢除檢查制度，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寫作、說話和行動，廢除旅行限制、貨幣兌換控制，停止電話竊聽和為異議人士設立檔案；七、修改禁止同性戀、墮胎和離婚的法律；

八、限制財產所有權，保護兒童權利；九、保護建築和自然美，讚助藝術；十、制定反對種族和宗教歧視的法律。

這個綱領事實上是為實現一個寬容的社會所制定的準則，如果除去康納利某些不切實際的經濟思想，他所號召的一切，在六〇年代都被寫進了法律——不只在英國，甚至在美國和多數西方民主國家。這些變化幾乎影響了社會、文化和性生活的各個層面，使得一九六〇年代如同二七九〇年代般，成為現代歷史上最關鍵的幾個十年之一。沃感到驚恐，這是可以理解的，他質疑康納利的提議，認為會破壞基督教社會根基，而被對快樂的追求所取代。康納利把這些看成文明最終的確立，其他人則認為是在地獄中結束文明。然而，毫無疑問地，這顯示多少有影響的知識分子離開了政治的烏托邦，轉而去侵蝕社會的紀律和準則。這一點在十八世紀為盧梭證明，在十九世紀又為易卜生證明，現在又再一次被證明了，而在康納利所說的泛政治化的三〇年代，它失敗了，從知識分子的任何觀點來看，六〇年代是寬容的，它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勝利。

每個胖子體內都囚禁著一個瘦子

康納利雖然一直活到了一九七四年，但他在確定了生活程序表之後，卻很少透過革命實行。他生來不是進行長期鬥爭或逞英雄的人，有時想法上願意，但是羸弱的體質並不允許。他說過一段話很適用於他：「每個胖子體內都囚禁著一個瘦子，他狂暴地躁動著，想掙扎出來。」但是瘦子康納

利從來沒有出現。在「反英雄」這個詞造出來之前，他就是這種人，他所走的每一步都顯示了他的貪婪、自私和小心眼的破壞力。早在一九二八年，他因為一張洗衣房的帳單沒有付款，麥卡錫(Desmond MacCarthy)就稱他是機會主義者和寄生蟲。任何一個殷勤接待過康納利的人，都有理由感到後悔，比如，有一位在祖父的時鐘底部發現了「盥洗室殘垢」的東西，伯納斯爵士在他的家具中發現了一隻裝著死蝦的破盆，毛姆查到康納利偷了他的獎品鱷梨中的兩個，逼他打開手提箱倒了出來。康納利住過的臥室抽屜裡，曾放置幾個星期前吃了一半的食物，又或者幾根麵條、火腿片會在主人的書裡出現，以示讀到這裡。他「帶著惡意，漫不經心地把雪茄菸灰彈到一位著名美國知識分子的妻子在烹飪比賽中獲勝的食品上」。康納利還有一些毫無騎士風度的行爲：一九四四年當V形炸彈投向倫敦的時候，他跟一位高貴的女士正在床上——就跟三十年前羅素所做的一樣，她可能是帕蒂塔女士，沃說她是這一時期康納利的女主角。只不過，當羅素跳下康斯坦斯夫人的床時，他做出一付對人類野蠻行爲十分氣憤的姿態；而對康納利來說，他跳下床是因為驚慌，卻用一句漂亮話來彌補：「極度的恐懼趕走了愛情。」

顯然，這種人即使有精力，也不可能領導改革運動走向文明。當然不可能。懶散、嫌麻煩、厭倦，使康納利在一九四九年扼殺了《地平線》：「我們關上了對著貝德福廣場的長窗戶，電話拿走了，家具收藏起來，過期的雜誌送進地下室，檔案在塵土中腐爛。只有稿件還是源源不斷地投來，就像自殺之奶。」康納利後來與可憐的簡恩離婚，轉而跟某位知識分子的情婦、美貌的芭芭拉結婚，但是這場婚姻（一九五〇—五四）並不成功，兩人彼此猜忌，也都繼承了托爾斯泰和索尼雅相

互競寫日記的傳統，準備將來出版。這場婚姻破裂以後，康納利向威爾森激動地埋怨過芭芭拉的日記，其中寫到她跟他的關係，也許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出現在小說中。威爾森記下了他的話，並說：「她把他的那部日記藏了起來，這部日記記下了他跟她的關係，他知道藏在哪裡，於是趁她不在，破門而入，把日記拿回去了。」此事看來像無的放矢，因為至今沒有出現過這本日記。芭芭拉的日記在一九八七年出版了，康納利會擔心其中的內容是有原因的，因為它提供了一幅怠惰的知識分子仰面而臥時令人難忘的畫像。

舉例言之，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芭芭拉寫道：「（康納利）又陷到床裡去了，像一隻死鵝，還穿著睡衣……他深陷枕頭，閉上雙眼，表情像是剛從痛苦中解脫出來……一個小時後我進了臥室，康納利還在躺著，閉著眼睛。」十月十日的日記寫道：「（康納利）在盥洗室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了，那時我在洗衣服。後來我進了臥室，發現他赤身站在那裡，以失望的神情凝視著空中……我回到臥室，發現他繼續盯著空中……我寫完一封信，回到臥室，他還在那裡，背對房間，倚著窗框。」一年以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日記：「（康納利）不願下去吃飯，他躺在床上，嘴吮著被單的一角……他躺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了，折疊著的被單一頭從他嘴裡拖下來，像是蛹殼。」

然而，這位文明價值觀的擁護者生下的是寬容的蛋，伊拉斯謨（Erasmus）以同樣的方式生下宗教改革的蛋。不過孵蛋卻是別人的事了，在這個過程中增加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新因素，康納利確實沒有預見到，如果他預見到了，他會感到後悔的：這就是對暴力的崇拜。這是一個奇怪的事實，暴力對某些知識分子總是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它跟希望得到激進、絕對的結論是一致的。此外，我們

如何解釋托爾斯泰、羅素，以及其他許多名爲和平主義者對暴力的興趣呢？沙特也是，他迷戀暴力，在如同昏暗雲層般的委婉詞句的後面，暴力沾濕了他的手，正如他所說的：「年輕的時候，面對警察，我們的工作不僅是要證明警察就是一種暴力，而且要把年輕人團結起來，反對暴力。」後來，有個知識分子沒有投入支持黑人的「直接行動」（即暴力），沙特說他「犯了謀殺黑人的罪惡——那些被警察、被制度所殺死的（黑豹黨徒）好像就是他扣下扳機殺死的」。

知識分子跟暴力的結合是如此經常地發生，不能認爲只是偶然現象。它常常讚美那些採用暴力的「行動者」形式。墨索里尼的知識分子追隨者之多令人吃驚，他們並不全是義大利人；希特勒在登上權力巔峰時，在校園裡始終如魚得水，他對學生的競選呼籲超出他在人民中的表演，他在教師和大學教授們之間的性能總是非常出色，許多知識分子被吸入了納粹黨的高層，更多人則參加了令人憎惡的衝鋒隊暴行。比如，在希特勒東歐「最後決戰」的先鋒部隊四個機動殺傷營中，軍官中大學畢業生的比例就高得異乎尋常，指揮D營的奧蘭道夫就獲有三所大學的學位，其中一個學位是法學博士。同樣的，史達林在他的時代也有眾多知識分子追隨。

知識分子對暴力的鼓勵或從容，有時是一種典型的思維不嚴密的結果。奧登關於西班牙內戰的詩〈西班牙〉，發表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其中一行惡名昭彰：「下意識地接受殺人有理這種罪」。歐威爾大體上喜歡這首詩，但批評了這一行，因爲只有那些「殺人至多只是個字眼的人」才寫得出這樣的詩。奧登爲這行詩辯解說：「如果有所謂正義的戰爭，那麼爲了實現正義，殺人就是必要的了。」但是他又把「必要」一詞去掉了。馬丁在第一次大戰中曾在貴格會救護隊服役，他跳脫了現

實中的暴力，卻昏頭昏腦地不時為暴力辯護。

第一個善用電視媒體的知識分子：梅勒

另一方面，一些知識分子甚至對暴力事實並不厭惡。梅勒（Norman Mailer，一九二一—）的例子特別能說明問題，在許多方面，他是我們正在考察的那種知識分子的典型。他出身於上流社會，是由女性當家的家庭中唯一的男孩，從小就在女性小圈子中備受寵愛，其中有他的母親範妮和她的許多姐妹。母親的娘家謝奈德爾也很富有，她自己管理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後來梅勒的姐妹也加入這個圈子。這男孩是模範的布魯克林兒童，安靜、得體，在班上總是第一名，十六歲進入哈佛大學。他的長進得到家中女性們熱情的讚揚，「家裡所有的女人都把梅勒看成貓咪」，這是他的第一任妻子貝特麗斯的評價，她還寫道：「範妮不願意她的小天才結婚。」「天才」是範妮嘴裡提到梅勒時常用的詞，在梅勒多次進出法庭的其中一次場合中，她告訴記者：「我的孩子是天才。」梅勒的幾個妻子，或早或晚，都極不願認識這個範妮總管。第三任妻子坎貝爾夫人抱怨說：「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跟他母親一道吃飯。」第四任妻子是個膚色白皙、金髮碧眼的女演員，自稱貝弗莉，因為說了反對範妮的言語而受到嚴厲指責（甚至受到身體的攻擊）。然而，這些妻子正是梅勒兒童時代女性小圈子的替身，因為梅勒跟她們離婚後，除了其中一個，仍都跟他保持關係，他辯解說：「當你跟女人離婚以後，友誼就開始了，因為其中無價值的性關係不再存在。」他總共有過六個妻子，跟她

們生下了八個孩子，第六任妻子諾里斯和梅勒的長女同年。此外還有其他許多女人。第四任妻子抱怨說：「我懷孕的時候，他搞上一位空服員，我們的孩子帶回家三天，他就開始幹那種事。」他從一個女人轉到另一個女人，使人不得不想到羅素；而那如後宮般的氣氛，又使人想起沙特。雖然梅勒出身女性當家的背景，但仍具有強烈的大男人主義。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是因為妻子期望有個職業，梅勒就把她當成「處於發育階段的女性解放分子」而打發了。他抱怨第三任妻子說：「坎貝爾夫人放棄了一千萬美元而嫁給我，但她卻從來沒有為我做過一頓早餐。」至於他跟第四任妻子關係的結束，是因為她紅杏出牆。他的女人之一曾抱怨說：梅勒不願意跟有職業的女性發生任何關係。一九七一年，小說家普里契特（V. S. Pritchett）在評論梅勒的一本書時說，梅勒有這麼多的妻子（當時還只有四位），顯示他「對女性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她們具有的某種東西」。

梅勒和許多知識分子共有的第二個特點是自我宣傳的天才，他的著名小說《裸者與死者》的出色推銷，是他的出版商拉因哈特（Rinehart）的高度專業性的策略，是戰後最費苦心、確實也是最成功的推銷活動之一。宣傳活動一開始，梅勒就把他自己的公共關係——這在其後的三十年中，都是一種奇蹟，對所有人都都是一種警告——包括他的作品、眾多妻子、離婚、他的觀點、吵架，以及政治活動，巧妙地編織成一件無縫的天衣，作為自己的廣告。他是第一個有效地運用電視推銷自己的知識分子，在其中演出了一幕幕值得回憶、有時又令人震驚的場景。他早就領會了電視對動作的胃口是永遠不會滿足的，他沿著海明威曾經引導的方向，使自己成為知識分子中最活躍的人物。他設計出所有這些「自我推銷，是爲了什麼呢？虛榮和利己。當然，也不能過於強調像托爾斯泰、羅

素、沙特這些人的許多行爲，用他們想吸引別人的注意就能準確地解釋，雖然表面看來他們是非常理性化的。這裡還有一個比較世俗的目的：掙錢。梅勒大男人主義的愛好被證明是很費錢的，一九七九年他被第四任妻子帶到法庭，他在申辯中說，不可能每週付給她一千美元，因為他每週還要付給第二任妻子四百美元、第五任妻子四百美元、第六任妻子六百美元。他有五十萬美元的債務，欠他的經紀人十八萬五千美元，沒有付的稅款八萬零五百美元，以致國稅局對他的房產保留了十萬美元的扣押權。他爲自己所做的這些廣告顯然是想吸引讀者，做得非常漂亮。這裡只舉一個例子，他的長篇論文《性的囚徒》攻擊了女權主義，並爲他在婚姻上的越軌行爲做詳盡的討論，此文發表於一九七一年三月的《哈潑》上，這一期雜誌在書報攤上的銷量打破了一百二十年創刊以來任何一期的記錄。

然而，梅勒的自我推銷也有個嚴肅的目的：推動一種思想，這成爲支配他的工作和生活的主題——人類需要拋棄某些限制自己發揮力量的約束。迄今爲止，多數受過教育的人，把這種約束跟文明相提並論——比如詩人葉慈就明確地把文明界定爲「自我抑制的試驗」。梅勒對這一假設提出了疑問：有些時候，人身暴力對某些人也許並不是必要或正義吧？他通過一條迂迴曲折的道路到達了一個立場。年輕的時候，他是標準的共產黨同路人，一九四八年華萊士的總統競選活動中，他代寫過十八篇演說稿，卻在一九四九年惡名昭彰的沃爾多夫代表大會（譯註：沃爾多夫是紐約的一家旅館的名稱，美國共產黨一九四八年在這裡召開代表大會）上跟共產黨斷絕了關係，此後他的政治觀點雖然有時反映左翼自由派的看法，但變得更有個性和獨創性，特別是他的小說創作和新聞報導，引導他去考

察黑人的地位和美國西部地區黑人文化的形式。豪 (Irving Howe) 的雜誌《異議》於一九五七年夏季號發表了梅勒的論文《白種黑人》，這是他最有影響力的作品，甚至是戰後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文中他對年輕、自信、堅持自我權利的那些黑人的「嬉皮意識」和他們的行為進行了分析，認為這是一種反文化的形式，他加以解釋、辯護，這又促使激進的白人採取這種「嬉皮」態度。梅勒論證說，黑人文化有許多方面，進步的知識分子應當仔細考察，如反理性主義、神秘主義、對生活的力量感，特別是暴力以至於革命的作用。梅勒寫道，想一想兩個年輕人把一家糖果店老闆拷打致死的實際個案吧，其中就沒有有價值的部分嗎？「我所殺的不僅是一個五十歲的弱者，也殺死了一種制度，我侵犯了私有財產，也跟警察建立了新的關係，把一種危險的因素引入了自己的生活。」既然狂熱向內轉，對於創造活動是一種危險，當暴力被使用、被具體化和得到發洩的時候，這本身也不是創造性的嗎？

這是第一次對個人暴力——作為跟社會的「制度化暴力」所對立的東西——做出認真的考察，並力圖賦予其合法性的精心作品，它在某些地區引起了憤怒是可以理解的。豪後來承認他最好是刪去關於糖果店老闆被殺的段落。這時作家波德豪里茲 (Norman Podhoretz) 攻擊它是「我所見過道德上最令人討厭的觀點之一」，它表明「嬉皮思想會通向哪裡」；但是大批的年輕人——有白人也有黑人——所期待的正是這種引導和理性化的說明。《白種黑人》是六〇和七〇年代發生的許多事件的文獻，對迄今為止被認為不屬於文明行為的舉止和態度，他從理論上賦予了正當性，也給康納利十年前所提倡的寬容化的程序加上了重要的、也是有害的條目。

梅勒依據他的中心思想，透過公開和私下的行動，來強化和宣傳它，使它具有更大的影響。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他因為在普洛溫斯鎮的警察局中吵鬧而被判酗酒罪。十一月十四日，他再次被控在百老匯一家俱樂部中有妨礙治安的行爲。五天以後，他在紐約家中舉行盛大招待會，宣布競選紐約市長，到了半夜，當五湖四海的客人離開他的宴會時，他在自己寓所外面的街道掙扎著醉意，跟他們打了起來，到凌晨四點三十分，他回到屋裡，眼睛被打瘀，嘴唇紅腫，襯衫上沾著血跡。他的第二任妻子阿黛爾是有西班牙血統的秘魯畫家，有一次規勸他，他就拿出一把二吋半的鉛筆刀刺進她的腹部和背部，傷口有三吋深，僥倖沒死。此事造成麻煩的法律程序，阿黛爾拒絕簽署訴狀，訴訟一年後結束，梅勒被延期宣判和緩刑。他這一時期的評論沒有顯示任何愧疚感。在接受華勒斯（Mike Wallace）訪談時，他說：「對於少年罪犯來說，小刀是非常有意義的，你看，這是他的寶劍、是他的男子氣概。」他還補充道，中央公園應當有年度的幫會比武。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他在「猶太青年聯盟詩歌中心」朗讀他的詩作，其中有這樣的句子：「只要你用起一把刀／就留下了某種愛」；該中心主任以「猥褻言論」爲由趕緊打鈴落幕。這件事情結束以後，梅勒總結說：「十年的憤怒使我這麼做，我感覺好多了。」

梅勒還故意進行公開的努力，以推進反文化。一個被《白種黑人》所鼓勵的青年國際黨徒魯賓，策劃了一九六五年三月二日在柏克萊舉辦的反越戰集會，梅勒是大會上的主要發言人，他說，約翰遜總統所說的「偉大社會」正在「從玩雜耍到拉大便」，他勸告二萬名學生說，不要只是批評總統，而是要侮辱他，把他的相片倒過來貼在牆上。他的一位聽眾霍夫曼很快就成爲反文化的高級宣

教士，他說，梅勒表明了「不是把目標對準決議，而是對準做出決議的核心人物，這就能更有效地調節你的抗議情緒」。兩年以後，即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在五角大樓前的大遊行中，梅勒扮演了一個顯眼的角色，他用下流話來取悅和刺激無數的聽眾，他對他們說：「我們要去試一試，把它戳在政府的屁股上，正好是五角大樓的括約肌上」，他因此被逮捕，入獄二十天（緩期二十五天）。被釋放後，他告訴新聞記者說：「親愛的美國同胞，你們看，今天是星期天，我們去焚燒在越南的基督徒的血和肉。」——他爲自己的引喻辯護說，雖然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但他跟一位基督徒結婚了。這就是他編號第四的妻子。

實際上梅勒把嬉皮的語言——即馬路上的聲音——帶進了政治，他在腐蝕政治家的神聖性。一九六八年五月，學生騷動的高峰期，有位作家在《鄉村之聲》上撰文分析梅勒的呼籲時說：「他們爲什麼不能研究研究梅勒呢？這個梅勒，在運動發生之前他就宣傳革命了；這個梅勒，他稱約翰遜總統是怪物，而精打細算的自由主義者還在爲他寫作講演稿；這個梅勒，他變成了黑人、變成了錢罐、變成了古巴、變成了暴力、變成了存在主義……而在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眼睛裡，新左派仍然是一陣閃光。」當梅勒確實在壓低政治語調時，並不清楚他是否在提高其內容。他對文學生活的影響與此類似，他和同行作家的爭鬥可以跟易卜生、托爾斯泰、沙特、海明威相比，甚至超過他們。他也跟海明威一樣，有時爭吵就演變爲暴力。一九七一年，在一次凱維特（Dick Cavett）的電視節目上，梅勒跟維多打耳光、撞頭。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聚會上，梅勒對維多說：「你看起來像個骯髒的猶太老頭。」維多回答說：「你看起來才像個骯髒的猶太老頭。」梅勒把一杯飲料潑

到維多的臉上，維多就咬梅勒的指頭。

《哦！加爾各答》：泰南

梅勒把寬容跟暴力的交織概括為六〇和七〇年代的特徵，他從他丑角式的行爲中奇蹟般地逃脫出來，其他人就沒有如此幸運了。知識分子猛然離開舊式的烏托邦理論，而轉向新的、讓人眼花撩亂而又越來越野蠻的享樂主義時，確實有一些可悲的傷亡者。一九四六年六月，當康納利發表他的宣言的時候，泰南（Kenneth Peacock Tynan，一九二七—八〇）剛在牛津大學麥格德林學院過完第一年，他已成爲知識分子社群中的領袖。四個月以後，新學期開始了，我這一年級的新生曾敬畏地目睹著他來到麥格德林的宿舍，我驚奇地注視著這位高個兒、漂亮而有女人氣的青年，他有淡黃色的捲髮、插圖畫家比爾茲萊那樣的顴骨、時髦地有點結巴、梅紅色的外套、淡紫色的領巾、紅寶石的圖章戒指。我推著我唯一的學生用普通皮箱，而他的東西及工讀生似乎把他的房子塞滿了，他以平靜而傲慢的威嚴指揮著這些工讀生。他的一句話尤其觸動我：「伙計，小心那個箱子，裡面裝的是貴重的襯衫。」並非只有我一人被這句話觸動。一九四六年，泰南和我屬於少數幾個直接來自中學的大學生，而大部分學生都參加過戰爭，有些人已經得到了較高的軍階，並目睹、甚至參與過駭人聽聞的屠殺場面；但他們還從來沒見過眼前這樣的事。對此，來自步兵衛隊的粗壯少校沉默寡言，在轟炸柏林中殺死成千上萬人的轟炸機駕駛員直瞪眼，擊沉過俾斯麥號的海軍少校畏畏縮縮地

打量著。泰南統治著他自我創造的舞台，他選擇了最佳時間，氣宇軒昂地走了過去，後面跟著的是那些辛辛苦苦的搬運工。

在這個奇怪的年輕人背後，有一個更奇怪的故事（雖然當時他自己並不知道），也許出自於報紙專欄，但跟麥格德林的畢業生、英雄人物王爾德或麥肯齊（Compton Mackenzie）確實沒有關係，而是得自班涅特（Arnold Bennett）。泰南生平的全部事實都被他的第二任妻子卡薩琳仔細收集起來，發表在一部細緻而悲傷的傳記中，成為這類傳記的典範。一九二七年泰南在伯明罕出生，長大後進入當地著名的文法學校，十分活躍，扮演過《哈姆萊特》中的主角，獲得半額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他認為自己是備受羅絲和布商彼得寵愛的獨生子。父親每兩個星期給他二十英鎊零用錢，這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了。事實上，泰南是個私生子，他父親是班涅特所說的一張「紙牌」，過著雙重生活，一個星期裡有一半時間他是伯明罕的彼得·泰南，另一半時間是治安官彼得·皮科克爵士，身著燕尾服、大禮帽、灰鞋套、手織絲襪衫，成功的創業者，六次當選為沃林頓市長，有一位皮科克夫人，還有許多小皮科克也安排得妥妥當當。直到一九四八年，泰南在牛津大學的生活結束時，這個騙局才被揭穿。這時彼得爵士死了，在沃林頓的那個合法家庭突然義憤填膺地趕來，宣稱具有處理遺體的權利，泰南淚眼汪汪的母親被拒於葬禮之外。牛津的大學生突然發現自己是私生子，這種事情不是沒有發生過——麥格德林學院的另一個學生，被認為是男爵的胡爾頓就是如此，以致他不得不把自己門牌上的「爵士」拿掉——泰南對這件事的反應是立即編出一個故事：他的父親是喬治首相的財政顧問。不過這一發現還是給他造成很大傷害。他用「皮科克」作為全名的中間部分。

此外，他母親由此對兒子產生的罪惡感，也有助於解釋爲什麼從一開始她就過分地維護和溺愛他；而他對待自己的母親也總像是對待某種高級僕人。

泰南總是習慣於指揮周圍的人，他具有大師的風格。有段時期，牛津嚴格執行布料的定量分配，他卻穿得像個王子。除了梅紅色的珍貴襯衫外，他還有一件用紅色絲線縫起來的斗篷。他的另外一套衣服是深綠色的，據說是用彈子球台的料子縫製的。他的綠色鞋子是小山羊皮做的，他用化妝品——「嘴的四周恰是一個小小的深紅色的湖」。這樣他就恢復了牛津在審美上的奢靡名聲。在他一生中，總是輕易就成爲城裡被談論最多的人物，他寫作和演戲、在大學生俱樂部裡滔滔不絕地講演、爲雜誌供稿並做編輯、舉辦倫敦娛樂界的名流前來參加而轟動一時的招待會（收取十先令的入場費）。他有一個由年輕女士和受尊貴的紳士所組成的宮廷。他的摹擬畫像被嫉妒的執袴子弟所焚燒。

此外，跟那些在牛津激起短暫浪花的人物相比，他確實有所不同：他在現實世界中獲得了成功，他寫劇本和評論，跟著名演員亞歷·堅尼斯（Alec Guinness）一起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很快就使自己成爲倫敦最厚顏無恥的文字新聞記者，他的格言是：「寫那些邪門歪道的東西，要純粹的邪門歪道。」他把激勵的標語釘在書桌上：「挑動情緒，刺痛傷害，製造旋風」，他始終遵循這些規則。這也很快給他帶來了他所垂涎的一個職務：《標準晚報》的戲劇評論家，他可以賣弄一番了。過了一陣，他又在當時英國最好的報紙《觀察家》弄到了一個更有影響力的劇評家的位置，讀者正如在麥格德林學院宿舍裡的學生一樣，瞪眼看著這個令人驚訝的非凡人物，他似乎懂得世上一切的一切文學，使用著諸如貪得無厭、散兵游勇、興奮異常之類的字眼。他成了倫敦戲劇界的強人，戲劇界

人士面對著他，皆抱敬畏、恐懼或仇恨之心。他把奧斯本的《憤怒的回顧》炒熱，製造出一個「憤怒的青年」的說法。他把英國介紹給布萊希特，尤其是發起了一個大運動，給劇場提供補貼，使布萊希特式的戲劇產生了影響。當英國的國家劇院建成以後，一九六三至七三年間，他是第一位藝文經理人，並使其作品成爲世界性、不變的保留劇目，從而確定了這家劇場的地位。在他的統治期內，那裡演出了七十九部戲劇，其中大部分出自他的意見，有一半作品風行一時，這是一個驚人的記錄。他在美國也已經是著名人物，這要歸功於一九五八至六〇年間他發表在《紐約客》上的一流評論。在國家劇院他確立了全球性的聲譽，甚至六〇年代有段時期，他很可能是全球戲劇界最有影響力的人，而且正如我在本書裡已經說過的，戲劇比任何其他藝術更能影響人們的行爲。

泰南也不是沒有嚴肅的目的，跟康納利一樣，他同樣是含糊地把享樂主義和寬容跟社會主義連繫在一起，一九五七年，在「憤怒的青年」的《宣言》中，他提出了一個經過認真考慮的目標說明，堅認藝術不能不「公開表明見解，必須承擔自己的義務」，但同樣的，社會主義應當意味著「走向愉快的進步」，是「快樂的國際宣言」（當時是「快樂」被綁架之前的時代），梅勒在這一年寫作和出版了《白種黑人》，某部分也是想要打破舞台上和出版中的禁忌的目的。在英國，對於鏟除陳舊的審查制度，沒有人比泰南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在這方面的努力被一些更傳統的政治態度所強化，雖然這些態度也有其寬容的層面。一九六〇年，在使用了各種策略之後，他成功地把一個有四個字母的詞（譯註：即「fuck」這個字）用進了《觀察家》。第二年他在海德公園組織了一場支持卡斯楚的示威，一些漂亮姑娘助了他一臂之力。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英國廣播公司的深夜電視諷刺節

目中，他用了「fuck」一字，以竟其自我宣傳之效，有段時間，他成了這個國家中最聲名狼藉的人物。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他在一般舞台上表演編排好的裸體，並加上自己的評論《哦，加爾各答！》。這部戲後來演遍全世界，總票房超過三億六千萬美元。

性、虐待、色情電影

然而泰南在消滅審查制度的同時也消滅了自己。他在一九八〇年的去世是因肺氣腫引起的，他從父親那裡遺傳了一個虛弱的肺，又經常吸菸，終至於此。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經無法挽回地毀滅了自己的道德生命，他所做的只能稱之為在性祭壇上的自我殺戮。他很早就開始了對性的迷戀，後來他聲稱十一歲時開始手淫，並常常誇耀其中的樂趣。在生命走向結束的時候，他老是這樣總結自己的性格：把自己描述成一個「同性戀手淫」的正在消亡的類型。孩提時他就盡力收集色情作品，這在戰爭時期的伯明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他中學時代演出《哈姆萊特》時，他勸誘了阿蓋特（James Agate）——他後來成爲一位最重要的評論家，也是聲名狼藉的同性戀者——爲節目寫篇短評。阿蓋特照辦了，並邀請這個年輕人去他倫敦的寓所，把手放在他的膝蓋上說：「你是同性戀嗎？我的孩子。」「我恐怕不是。」「哎，我想，那樣做也不關別人的事。」泰南說出了真相。他有時喜歡穿女性的服裝，也並不特別去糾正別人認爲他是同性戀的看法，他認爲這樣可以使他更容易接近女性。不過他從來沒有過同性戀的經驗，正如他所說的：「甚至輕輕的觸摸也沒有過。」但

是，他對施虐——受虐狂很感興趣，阿蓋特發現了這一點，把自己廣泛收集色情作品的秘訣告訴了他，圓了泰南的腐敗。

泰南後來開了一家百貨商店，過了一陣子，他各種各樣的女房東，以及他的兩個妻子湊巧都發現了它，都大吃一驚。奇怪的是，因為泰南從來不想費神去隱瞞他對性的興趣，有時還公開宣布。有一次在牛津大學生俱樂部的辯論中，他宣稱：「我的主題是——在天色微明的時候，只要一條皮鞭。」他在牛津跟一大批年輕女子有關係，會要求她們把內褲送給他，他把這些內褲跟他用來裝飾牆壁的鞭子並排掛在一起。他喜歡風騷的猶太姑娘，特別是常受嚴父肉體懲罰的猶太姑娘。他對她們當中的一位說過：「嚴責」一詞使「懲罰具有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美好情趣」，他補充說：「打屁股一詞很有力量，具有恰如其分的中學女生的特色……性交就意味著打屁股，美就意味著屁股，並且總是意味著欲望。」他從來不指望他的兩個妻子中誰肯做這種事，他把這些與享受犯罪感連在一起，是有罪的、邪惡的。但是他一旦成為戲劇界的強人後，就可輕而易舉地找到無戲可演的女演員，只要她們得到他的幫助，就能配合他的要求作為報答。

女性對他性虐待的不滿還算輕微，在這方面他還算溫和，尤令女性們不滿的是他的自大和專制。有位女子離開了他，因為她走進飯店時，他總是阻攔她照鏡子。另一位女子說：「妳一離開他，他心裡就沒有妳了。」他對待女性就如同對待他的物品。在許多方面，他具有愉快的天性，富於感受力和理解力，但他希望女人圍繞著男人轉，就如衛星圍繞著行星。他的第一任妻子艾蘭有個人的志向，她寫了一部一流的小說（有人問康納利這部小說的長處，他回答：「哎，我不該這麼想，正如

另一位妻子要證明她的存在一樣。」，引發了一次次激烈的爭吵，喊叫、摔東西，還罵「我殺死你，你這個雜種！」之類。對於婚姻的爭吵，梅勒曾大大數落泰南夫婦一番：「他們相互開火，你只要坐在那裡喝彩，好像在看一場職業拳擊比賽。」泰南保留著一種不合理的權利：他自己並不誠實，卻期待配偶對他忠誠。有一次，他從情婦那裡回到倫敦的寓所，發現他的第一任妻子跟一個裸體男子正在廚房裡，泰南認出他是一位詩人，也是英國廣播公司的製作人，沒什麼大不了，他從臥室裡抓起那人的衣服丟進了電梯，平時的他並沒這麼勇敢。跟第一任妻子離婚後，他勾引卡薩琳離開丈夫與他同居，她後來成爲他的第二任妻子，那位丈夫打破了泰南家的前門，泰南顫抖地躲在沙發後面。那位丈夫後來在靠近卡薩琳母親家的地方抓到了泰南，在泰南躲進房子得到安全之前，發生了一場混戰，泰南金色的頭髮——現在是灰色的了——被扯下了一些。第二任妻子繼續說道：「泰南和我在我母親家堅持了一段時間，後來我們偷偷溜進黑夜，在離路不遠的地方，泰南發誓說我們被人跟蹤了，我們就爬進附近的一個垃圾箱。」那位丈夫就是泰南原先瞧不起的劇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泰南不願意提到他。

泰南的第二次婚姻跟第一次一樣破裂了，因爲他堅持自己有絕對的性自由，卻要求妻子忠誠。

他跟一位失業的女演員長期私通，並跟她演出一套精心編造的施虐—受虐狂的幻想劇，其中由他扮成女性，那位女演員扮成男人，有時還有一個妓女加入。他告訴卡薩琳，他打算把這套戲每星期繼續做兩次，「雖然一切常識和理性，以及別人的好意和友誼都反對我這麼做……但這是我的選擇、我自己的事情、我的需要……這完全是喜劇，也有點下流，但它如同傳染病在襲擊我，我除了

發抖以外什麼事情也不能做，直到發作過去。」這已經夠糟了，更糟糕的是，泰南決心把自己的專業放到一邊，改做色情作家，而他在這方面又並不成功。早在一九五八年，他的約會簿上就有這樣的字句：「寫劇本。寫色情作品。寫自傳。」一九六四年他跟《花花公子》雜誌扯上關係，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要給這家雜誌提供色情的材料，卻被他們拒絕了。泰南為《哦，加爾各答！》耀眼的成功所鼓舞，他似乎樂觀地相信，他能將色情作品改造成為嚴肅的藝術形式。在七〇年代初期，他打算收羅一批著名作家，以編輯一部想入非非的手淫作品集，但是使他蒙受羞辱的是遭到了納博可夫、葛林（Graham Greene）、貝克特和梅勒等人的斷然拒絕。此後，他越來越深陷於製作一部色情電影的計畫，曠日持久，最終流產了，原因只有一個：他從來沒有籌集到資金。跟多數知識分子不同，泰南並不貪婪，正好相反，他非常大方，甚至不顧後果，這是他和沙特相同的性格。他母親死後，把已故的彼得爵士財產中的很大一部分留給了他，他就盡快地把它花光。他漫不經心，從國家劇院得到的盈利極少，關於《哦，加爾各答！》，他簽了一個愚蠢的合約，從這部戲劇極其成功的演出中只得到二十五萬美元。他一生最後的歲月中，花了許多時間為一個計畫籌集資金，他比較聰明的朋友對這個計畫的看法是蔑視和失望。他對自己也有了懷疑，他在普洛溫斯寫信給卡薩琳說：「我在這裡弄出此色情作品，算什麼呢？太丟人了。」在聖特魯培（St Tropes），他夢見一位裸體的姑娘，滿身塵土和糞便，頭髮被剃光，頭上釘著幾十枚大頭針。他寫道：就在這時，「我醒過來了，害怕極了，旅館庭院裡的狗不知為什麼突然叫了起來，據說人看不見的魔王經過時牠們就這麼叫。」泰南最後的歲月，對性的迷戀和體質的虛弱構成了災難性的對比，他的寡妻把這些講述得非

常動人，使得那些認識他、稱讚他的人爭相閱讀，令人想起了莎士比亞的名句：「肉欲的滿足是精力可恥的浪費。」

同性戀、暴力、毒品：法斯賓達

帶著更強烈的暴力特徵的寬容，有一個更讓人難忘的受害者，這就是法斯賓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一九四五—八二），他也許是德國有史以來最具天才的電影導演。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希特勒自殺後隨之而來的災難裡，他生於巴伐利亞。康納利、梅勒、泰南這些知識分子力圖給文明人提供新的自由，他是這種自由的年輕受益者，也是犧牲品。在一九二〇年代，德國電影領導著世界，納粹的出現造成電影界的才能之士四處流散，好萊塢分得了其中的一些名流；納粹政權覆沒，美國占領軍當局在德國的土壤上移植好萊塢電影。這個時代到一九六二年結束了，這一年二十六位年輕的德國電影編劇和導演發表了被稱為《奧本豪森宣言》的德國電影的獨立聲明。兩年以後，法斯賓達離開了學校，這時他二十一歲，已經拍攝過兩部短片，在一個被布萊希特的陰影統治著的德國藝術界，他組成了一個被稱為「反戲劇」的小製片團體，在他們第一部獲得成功的作品中，他本人扮演了布萊希特《三分錢歌劇》中的麥克騎士。雖然「反戲劇」在理論上是平等主義，實際上卻實行等級制度和組織性的專制，法斯賓達如同一個暴君，用路易十四管理凡爾賽的方法管理。他就是靠這個拍出了他第一部成功的電影《愛情比死亡寒冷》，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只用了二十

四天的時間就拍攝完成。

法斯賓達以驚人的速度，使自己不但成爲這個寬容時代裡的主要、而且是代表性的電影製片人，他具有強大的意志和權威，還有一種令人羨慕的乾脆、果斷的能力；這些使他能夠迅速而且經濟地製作出高品質的電影。評論界的讚美很快出現了。但直到一九七四年《恐怖吞噬心靈》上檔，他才取得全球票房上的成功，這已經是他的第二十一部電影了。而從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往後的十二個月中，他拍攝了九部長片，其中《四季商人》在評論界和商業上都是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有四百七十個場景，是在十二天中拍完的。到三十七歲，他已經拍攝了四十三部電影，十三年中，每一百天拍一部，沒有間斷。星期天他總是在工作，也總是讓別人工作。從職業的意義上說，他有一種狂熱而持久的自我約束力，他說過：「等我死了，我就可以睡覺了。」

在法斯賓達多產的背後，是他的放縱和讓人雞皮疙瘩的手淫習慣。他的父親是醫生，他六歲的時候父親就離家，棄醫寫詩，靠經營破爛的房產過活。他的母親是演員，後來曾經出現在他某些電影中，母親離婚之後嫁給了一個短篇小說作家。法斯賓達童年和少年時代的背景中，包含著波希米亞生活方式、文學，以及變幻不定、不道德、不負責任的東西。他讀過許多書，很早就開始創作短篇小說和歌曲。他跟做其他一切事情一樣，迅速而果斷地吸收寬容的新文化。用嬉皮的新語言來說，他有馬路上的智慧。他十五歲時就幫父親爲貧民窟裡的公寓收房租，曾宣稱跟屠夫的男孩相愛，他父親的回答是（典型德國式）：「如果你想跟男人上床，你就不能去找大學裡的人嗎？」此後，法斯賓達就冷酷而猛烈地追求六〇年代新文化的三大主題之一：毫無顧忌的性享樂。隨著他在

戲劇和電影界權力的增長，他的追求和無情也在增長。

法斯賓達的大部分情人是男性，有些甚至已經結婚有孩子，並經歷過可怕的家庭變故。他們的關係從一開始起就有施虐——受虐狂和極端主義的傾向。他從工人階級中吸收男子，把他們變成演員，也變成他的情人。其中一個他稱爲「我的巴伐利亞黑人」；另一個曾在北非當過男妓，殺過人，害得法斯賓達及其伙伴經常感到恐懼；第三個曾當過屠夫，自殺了。除此之外，法斯賓達對女性也有興趣，他會以家長般的語氣說「建立傳統家庭」這樣的話。他對女性的態度是把她們當成他的所有物，控制著她們。在他早年的生活中，爲了給電影籌款，他就利用所控制的女性爲來自國外的移民、德國人所謂的「客工」服務。一九七〇年，他跟一位叫英格麗·卡文（Ingrid Caven）的女演員結婚，她以爲能把法斯賓達改造成異性戀者。他們的婚禮變成了一場可以預見的鬧劇。新娘發現臥室的門鎖著，新郎跟他相好的男人在她床上。他們離婚了，法斯賓達後來又跟他的電影編輯朱麗安娜結婚，但是在酒吧、旅館和妓院中，他繼續在炫耀他的同性戀生活。十分奇怪的是，他卻要求朱麗安娜忠誠，一九八〇在把小說《柏林亞歷山大廣場》拍攝成電影的時候，他發現她跟電氣工程師過夜，法斯賓達妒火中燒，罵她是婊子，她則當他面撕掉了結婚證書。

法斯賓達在他的電影和生活方式中，也反映出新文化的第二個重大主題：暴力。還是非常年輕的時候，法斯賓達就已經跟巴德爾（Andreas Bader）（曾參與創建西德最惡名昭彰的恐怖主義幫派）接近，法斯賓達也跟巴德爾——美因豪夫集團中製造燃燒彈的舒恩萊因接近。他的演員朋友拜爾說過，法斯賓達常常表示會禁不住想去參加恐怖活動，但他告誡自己：「『對於事業』來說，拍電影比

走上街頭更重要。」當一九七七年十月巴德爾及其黨羽在獄中自殺時，法斯賓達憤怒地大叫：「他們謀殺了我們的朋友。」之後於一九七九年拍攝的一部電影《第二代》，描述恐怖主義的威脅被當局所利用，使德國重新變成了極權主義的國家。這部電影激起了強烈的憤怒，漢堡一群暴民把電影放映員打昏，銷毀了電影；在法蘭克福，一些年輕人把硫酸彈投進電影院。法斯賓達通常是從國家取得電影補助——這也是時代的一種標誌——但是他拍這部電影是用自己的資金：他是爲愛或恨工作。

不過，這時他又接受了新文化的第三個主題：毒品，並被其毀滅。六〇年代，在要求毒品自由法的請願書上簽名，已成爲知識分子的標準行爲。法斯賓達年輕的時候，曾把偷來的汽車開出國界換錢，但他那時似乎沒有捲入毒品。很自然地，他成爲德國嬉皮舞台中的一員，也跟布萊希特一樣，爲自己設計了一套適宜的服裝：破牛仔褲、方格襯衫、磨損了的漆皮鞋、稀疏的絡腮鬚，每天一根接一根地抽一百支菸。他吃大量的油膩食品，到三十歲時，已經開始肥胖臃腫，像青蛙，他自己稱：「越變越醜，是你把自己封鎖起來的辦法……你的結實、肥胖的身體是一座奇特的堡壘，可以抗拒所有的愛慕。」酒也喝得很凶，睡覺時服用大量鎮靜劑之類的藥品，在一九七六年拍攝《中國輪盤賭》之前，似乎還沒有服用烈性毒品，那時他三十一歲。後來他服用古柯鹼，因確信它能帶來創造力，於是經常服用，劑量也不斷增加。到了一九七七年拍攝《布爾斯威塞》的時候，他還強迫一個演員扮演他服毒後的情形。

這些事情發展到不可避免的高潮。一九八二年二月，他在柏林影展得到了金熊獎，他還想得到

坎城影展的金棕櫚獎和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從而演出一場帽子戲法。但他在坎城影展上沒有得獎，他在那裡為古柯鹼花掉了二萬馬克，並用他下一部電影的銷售權換取毒品貨源。他養成了對女性施暴的怪癖，有次喝醉或服了毒品，他變得暴怒異常，毫無理由地踢了女場記。五月三十一日，他的生日宴會上發生了一件事，他給前妻英格麗一個巨大的塑膠製陰莖，說是能讓她快樂一陣。他繼續工作和會客，但毒品、酒和禁用安眠藥的用量一直上升。六月十日早晨，朱麗安娜發現他死在床上，電視攝影機還在轉動。葬禮的棺材是空的，因為警察還為了毒品檢驗他的屍體，事實是如此簡單而明瞭，實在不值得花費時間研究。爲了對已故的藝術家表示尊重，按照歌德和貝多芬的方式給他帶上了死亡面具，那年九月的威尼斯影展上，這部可怕影片的盜版在聖馬可廣場的咖啡桌之間流傳。

《下一次是火》：鮑德溫

泰南和法斯賓達可以說是享樂主義祭壇上的犧牲品。也還有一些人成爲知識分子所要證明的暴力犧牲品，其中就有鮑德溫（James Baldwin，一九二四—八八），他是二十世紀美國黑人作家中最敏感、在某些方面也是最強有力的人物。他本來可以憑藉輝煌成就，過著幸福和充實的生活，但是相反地，他被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新風氣弄得十分悲慘，這種風氣要他相信必須痛恨他憤世嫉俗的作品主旨。這個案例突顯了一個怪現象：知識分子本來應當教導人們相信自己的理性，但卻鼓勵他

們去服從感情；不是鼓勵討論以實現人類的和諧，而常常都是挑動暴力進行裁決。

鮑德溫對自己童年和青年時代的敘述不太可信，不過根據他的傳記作者愛克曼（Fern Marja Eckman）的著作和其他資料，還是可以看出一個梗概。鮑德溫二〇年代在哈林區的背景資料有一些遺失了。他是八個孩子中最大的一個，直到三歲時，母親還沒結婚。他祖父是奴隸，繼父是個星期日傳道士，搖喊派教徒（Holy Roller，譯註：搖喊派是美國基督教的派別，在做禮拜時以叫喊和亂動表示虔誠），在一家裝瓶廠工作，收入微薄。不過，儘管貧窮，鮑德溫還是得到了很好而嚴格的教育。他母親說，他總是一手抱著弟弟或妹妹，另一手拿著書本，他認真閱讀的第一本書是《黑奴籲天錄》，反覆讀過很多遍，此書對他的作品影響很大，儘管他自己想除去其痕跡。父母發現了他的才能，就鼓勵他，其他人也給他鼓勵。在二〇和二三〇年代，哈林區的學校還沒有失敗主義的種族意識，人們相信，黑人只要夠努力工作，就會超過別人。貧困從來不被認為是不學習的理由，學習的標準很高，學生要麼符合這些標準，要麼就會受到懲罰。鮑德溫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成長。在公立第二十四學校，他的班主任艾耶是一位非常優秀的人物，後來成爲紐約市唯一的黑人校長；另一位老師密勒把他領進了他的第一部戲劇，並鼓勵他寫作。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初中，鮑德溫十三歲時，在校刊《道格拉斯領路人》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不久他就成爲校刊編輯。他得到兩位著名的黑人教師的幫助，一位是詩人庫倫，教他法文；另一位是波特爾。鮑德溫少年時代作文就極爲優美，他也對自己的進步感到十分高興。他離開學校一年以後，給這個校刊投了一篇稿，讚揚學校的「善意的精神和友誼」，是「國家最偉大的初中之一」。鮑德溫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這時也

成爲著名的青少年的傳教士，公認「非常熱情」。他得到禮拜堂裡的老黑人的稱讚、鼓勵和極友好的對待。之後，他到紐約一所著名高中求學，在極出色的校刊《鵲》上發表了他的小說，後來又成爲編輯。同樣，他在這所學校裡得到第一流教師的善待，他們都對他傑出的才華盡量給予鼓勵。

鮑德溫後來在《鵲》上發表的文章，看得出來他失去了信仰。他脫離了教會，轉做行李搬運和電梯工人，後來到了新澤西的建築工地工作，晚間寫作。這時他也得到一些前輩，包括黑人和白人的鼓勵和幫助。當時最重要的黑人作家賴特（Richard Wright）使他得到了薩克斯頓信托紀念獎金，他因此能夠去巴黎旅行。他在《國家》和《新領袖》上發表作品，他的崛起並不轟動，而是慢慢發跡。熟悉他的人都同意他工作認真勤奮，很有家庭責任，把省下來的錢都寄了回去，一切顯示他很幸福。他的飛躍是在一九四八年，他在猶太知識分子的雜誌《評論》月刊上發表了一篇備受讚譽的文章《哈林區的猶太人區》。許多人借錢給他，好讓他繼續他那富於想像力的工作，馬龍·白蘭度提供的一筆借款，使他能夠完成表現哈林區教會生活的小說《到山上去說》，一九五三年出版時贏得一片讚揚。他開始過著世界知名的知識分子生活，完全繞過了黑人資產階級，直接從哈林區跳到了格林威治村和巴黎左岸。他不過問南方的事，黑人問題對他也不是主要問題，他的早期作品和最好的作品中有許多看不出他的黑人身分，他在生活和作品中都主張反種族隔離，他的一些最好的文章是投給主張取消種族隔離的《評論》的，這家雜誌的編輯波德豪里茲後來說：「他是個黑人知識分子，幾乎可以在完全同樣的意義上說，他們這些人也是猶太知識分子。」

在五〇年代的下半葉，鮑德溫感受到知識分子中新出現的一種風氣：一方面是寬容，另一方面

是贊同仇恨。他是——或者說他相信自己是——同性戀者，他的第二部小說《喬瓦尼的房間》就是跟同性戀有關，出版商拒絕出版，他被迫轉投另一家，（他要自己相信）是因為前一家出版社付給他的錢太少的緣故，這一經歷使他對美國出版業滿懷怒火。而且他發現，這種來自於他這樣的「被剝奪者」的怒火，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成為話題，都是時髦和正當的。他把他的怒氣擴展開來，包括指向那些他曾經表示過尊敬的人物和機構，包括賴特和其他許多幫助過他的黑人前輩。他開始對白人進行總體的評價，重新描述他的個人史，他變成了另一個知識分子，他的自傳披上了謊言的外衣，危險地走上錯誤的方向。他發現自己是個非常不幸的孩子，因為父親告訴他，他和他父親所見過最醜的孩子，醜得就像惡魔的兒子。關於父親，他寫道：「我想不起來，在那麼多年中，他的孩子有哪個看到他回家時會感到高興。」他說當父親死時，他聽到母親在嘆息：「我是個四十一歲的寡婦，帶著八個我從不想要的孩子。」他在學校裡被人野蠻地欺侮，他帶著恐怖描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初中，當他一九六三年重訪這所學校時，他對學生說：「白人們要讓自己相信黑人在這地方非常幸福，你們要做的事就是一刻也不要相信它。」他宣稱在他就讀的高中，只有白人是快樂的，對他的這種說法，他的同時代人艾威頓（Richard Avedon）予以否定。鮑德溫在談到那些幫助過他的英語老師時說：「我們相互仇恨。」對那些他曾經喜愛過的書，比如《黑奴籲天錄》，他不斷的強烈指責。他攻擊那些自稱反對種族隔離主義的黑人中產階級，他研究了南方，並在五〇年代後期跟民權運動連繫，這兩者他在此以前都是不關心的。不過對金恩博士的甘地式作風，他並無興趣；對羅斯亭（Bayard Rustin）這類黑人知識分子，鮑德溫也不關心。在梅勒的《白種黑人》所營

造的氣氛中，鮑德溫越來越熱中於玩弄感情牌，特別是對梅勒本人。他告訴梅勒，他寧願花時間跟白人種族主義者在一起，而不願跟白人自由主義者在一起，因為在前一種情況下，他至少知道自己應該站在哪裡。

事實上，鮑德溫在美國、歐洲，都花了大量時間跟白人自由主義者在一起，沒有什麼比白人自由主義者的殷勤好客更讓他喜歡了。鮑德溫繼承了盧梭的知識分子古老的自大傳統，把享樂轉為高貴的善事而降貴紆尊地接受它，正如他的傳記作者愛克曼在一九六八年所寫的：「當處於創作的陣痛時，鮑德溫通常是從一座房子走到另一座，正如巡視領土的中世紀的國王，他把接待他的特權授予那些榮幸的臣民，以此施行王者的恩澤。」鮑德溫也邀請他的朋友，把他的東道主住宅改成非正式的俱樂部聚會地，然後就以「你的房子太開放了」為由離開，有位東道主並不生氣，反而懷著敬意讚揚說：「鮑德溫在你家中的時候不像是客人，倒像是在招待一個旅行團。」他越是製造仇恨，他得到的就越有用。他效仿盧梭真是非比尋常。

仇恨在廣泛地傳播，黑人自由主義者甚至比白人遭到更多的仇恨，正如他們中間的一位所抱怨的：「無論你認為自己多麼自由，鮑德溫總是讓你感到自己身上還是有些湯姆叔叔的成分。」六〇年代初，波德豪里茲要求鮑德溫對馬爾坎·X (Malcolm X) 和他的黑人穆斯林所煽動的暴力活動進行調查，並允諾把他的調查結果公布在《評論》。鮑德溫去調查了，但是他以更高的價錢把稿子賣給了《紐約客》，此文又加上他對青年時代所經歷的種族歧視的描述，在一九六三年以書的形式出現，名為《下一次是火》，在美國暢銷書排行榜中連續四十一個星期高居前五名，並發行到全世界。

從某方面來說，它是梅勒《白種黑人》邏輯上的繼承者，或許可以說沒有《白種黑人》就沒有它。不過，無論在美國還是在其他地方，《下一次是火》的影響都要大得多，因為這是一份以種族為基礎所構想出來的黑人民族主義中最重要的黑人知識分子所做的聲明——迄今為止，他們都是在文學傳統和西方文化的話語模式中操作。鮑德溫這時賦予他的憤怒正式的文學表達形式，把它固定化，捍衛它和宣傳它，如此造成了新的種族上的不對稱，沒有一位白人知識分子會想到要宣稱所有的白人都仇恨黑人，更不用說去捍衛這種仇恨了；而鮑德溫現在卻堅持說黑人仇恨白人，他的著作還要表明黑人的仇恨是正當的。這樣，對於黑人種族主義迅速傳播的新形式——它正在奪取全世界黑人社會的領導權——他從理智上證明了其合理性。

鮑德溫是否真的相信黑人種族主義，以及相信種族隔離的裂縫是不可避免的，很容易被人懷疑。年輕時的鮑德溫會強烈地否定它，這跟他的實際經歷有所矛盾——這就是為什麼年長時的鮑德溫要重寫他個人的歷史。這樣，鮑德溫最後二十年的生活就是以一種虛偽，特別是以一種應當受到譴責的混亂為基礎的。事實上，他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國外，遠離任何鬥爭，但是他的作品被自己點燃的火所燒毀，喪失了影響力。他賴以生存下去的，是《下一次是火》的精神，這種精神強化了法農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所做的瘋狂攻擊，以及沙特的某些花言巧語的主旨；暴力是那些被種族、階級或環境規定成為道德罪惡的犧牲品的人的合法權利。

從學術專業到公共事務：喬姆斯基

在此，我們涉及了知識分子生活中最關鍵的問題：對暴力的態度。這是一道柵欄，多數世俗的知識分子，無論他們是不是和平主義者，在這裡都遲疑不決，變得前後不一——確實是完全失去條理。他們在理論上，正如他們在邏輯上，必然會譴責暴力，因為暴力是跟解決問題的理性方法對立的；但是在實踐上，他們不時發現自己是贊同暴力的——這可以稱之為「必要屠殺併發症」——或者是贊成他們所同情的人使用暴力。其餘的知識分子，當他們面對著希望維護的人在實施暴力的事實，就以巧妙的論證，把道德責任推給了他們希望攻擊的人。

這種技巧的另一位著名的實踐者，是語言哲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一九二八—），在其他方面，他更屬於舊式的烏托邦主義者，而不是新式的享樂主義者。他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生於費城，很快就在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等重要的大學成爲名家，也是在梅勒出版《白種黑人》的一九五七年，喬姆斯基出版了《句法結構》的巨著，對於一個從古代延續至今的爭論——即我們如何得到知識，特別是獲得如此之多的知識——這本書具有高度獨創性、關鍵性的貢獻。正如羅素所說的：「人們跟世界的接觸是短暫、個別和有限的，然而他們怎麼能夠懂得那麼多的東西？」對這個問題有兩種相對的解釋。一種理論是人生來具有理念，如柏拉圖在他的《梅諾》一書中說：「人並不知道自己有所不知道的東西有關的真正知識。」精神最重要的內容是從一開始就有的，雖然需要外部的刺激或經驗作用於感覺，才能把這種知識帶入意

識。笛卡兒認為，這種直覺的知識比任何其他知識都更可靠，任何人生來都有它的殘留部分，雖然只有那些最愛思考的人才意識到它的豐富潛能。歐洲大陸的哲學家大多採取這一觀點。

與這一觀點相對立的是由洛克、伯克萊和休謨一脈的盎格魯—撒克遜的經驗主義傳統，認為肉體的特性是可以遺傳的，而人心生來就是一張白紙，精神的一切特性都要通過經驗獲得。這些觀點一般都有著高度完美的形式，通常流行於英國、美國等地。

喬姆斯基對句法的研究——句法是制約詞和聲音的排列以形成句子的原則——使他發現了他所謂的「語言普遍律」，世界上語言的差異比表面上所顯示的要少得多，因為一切語言都共享語言普遍律，它決定了句子的等級結構。他及門徒所研究的一切語言都符合這一模式，喬姆斯基對此的解釋是：句法是直覺的，它固定不變的規則深入人類的意識，它們必定是遺傳學上繼承的結果，我們運用語言的能力是天生而非學習的。喬姆斯基對他的語言學資料的解釋也許並不正確，但迄今為止又似乎是唯一有道理的解釋，這一解釋也把他堅定地置於「笛卡兒陣營」或「歐陸陣營」。

不僅是在學術界，這在知識分子中也引起了巨大的轟動，也使喬姆斯基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名人，就如羅素發表了關於數學原理的作品以後，以及沙特把存在主義通俗化以後所得到的名聲那樣。名望的誘惑使他們把從自己學科得到的名聲作為資本，以獲取宣傳自己觀點的舞台。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羅素和沙特都不能抵抗這種誘惑，喬姆斯基也是如此。在整個六〇年代，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知識分子越來越為美國在越南的政策，以及執行這一政策時的暴力程度所激怒，在這裡就出現了一種悖論：知識分子為了得到種族的平等或殖民地的解放，越來越願意接受使用暴力，

甚至是透過恐怖集團，而當他們發現西方的一個民主政府爲了保護三個小國免受一個專制政權的占領而使用暴力時，就如此反對，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實在沒有一種合乎邏輯的方法可以解釋這一悖論。知識分子提供的解釋是，他們一方面反對「制度化的暴力」，另一方面又在證明個體、私人的反抗暴力的正義性（同一理論還有許多變種），他們認爲這樣解釋就夠了。對於喬姆斯基，這些解釋確實足夠了，他成了知識分子中對美國的越南政策最重要的批評者，他從解釋人類如何獲得使用語言的能力，轉而建議他們如何實施語言的地理政治學。

現在，這些知識分子的一個特點是，他們從自己的學科——在此他們被公認爲大師——轉到公共事務上，可以說他們聽取意見時沒有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大的權利，他們認爲自己的轉向並無不妥。他們總是宣稱自己的專業知識使他們的觀察更富價值。毫無疑問，羅素認爲他在哲學上的技能對人類許多問題的建議都是值得注意的——喬姆斯基在他一九七一年的「羅素講座」中表示贊同這種主張；沙特說，存在主義跟「冷戰」所引起的道德問題有著直接的關係，它是我們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種答覆；喬姆斯基則得出結論說，他關於語言普遍律的作品，就是美國不道德的越南政策的主要證據。怎麼得出這一結論呢？喬姆斯基論證說，這得看你接受哪一種知識理論，如果人心生來確實是一張白紙，那麼人們現在跟過去一樣，如同是一塊塊黏土，可以把它塑造成我們喜歡的任何形狀，這樣，他們就成爲國家政權、公司經理、專家治國論者或「中央委員會」進行他所謂的「行爲規範」的適合的主體。另一方面，如果男男女女具有一種天生的心理結構，對文化和社會的模式有一種本能的需要，這種模式對於他們是「自然的」，那麼國家的種種努力最終必然失敗，但

在失敗的過程中，它們會阻礙我們的發展，並包含著可怕的殘酷性。美國企圖把它的意願和它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的特定模式，強加在印度支那人民身上，就是這種殘酷性的惡劣範例。

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就需要罕見的剛愎自用，這對於任何研究知識分子的人來說，都可悲地感到似曾相識。喬姆斯基的論證從天生的結構開始，如果說有根據的話，是它構成了對任何一種社會工程的總辯駁。由於各種原因，社會工程確實已經成為明顯的騙局和現代史上最大的禍害，在二〇世紀，在蘇維埃俄國、納粹德國和其他地方，它已經殺死了千百萬無辜的人，但是這種社會工程，包括它的全部錯誤，也是西方民主國家一直信奉的最後一件事。正好相反。社會工程是相信太平盛世的知識分子的創造，他們認為可以依靠獨自的理性光芒重新塑造世界。這是極權主義與生俱來的權利，盧梭是其先行者，極權主義是歷史上有關社會工程的最長的一次試驗，由於它並不成功，因此確認了喬姆斯基的總辯駁。

雖然所有社會工程的方案都由專制或極權的政府實施，但它們起初都是知識分子的作品。比如種族隔離政策，就是在南非斯泰隆布希大學（Stellenbosch University）的社會心理系中詳細設計出來的。非洲其他地方類似的制度——比如坦桑尼亞的「烏賈馬」（Ujamaa）、加納的「良心運動」、塞內加爾的「非洲自豪」運動、「尚比亞人道主義」等——都是在本地大學的政治系或社會系中炮製出來的。美國對印度支那的干涉，雖然當初也許是輕率的，但後來卻十分愚蠢地深陷下去，其最初的意圖正是爲了把那裡的人民從社會工程中拯救出來。

喬姆斯基卻無視這類討論，對於極權主義壓制或改變人的天性的企圖，他顯得毫無興趣。他論

證說，跟專制暴政一樣，自由主義的民主、放任主義的狀態，也應當反對，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作為它們必然的有機組成部分，就提供了一種強迫因素，這同樣是對自我完成的否定。越南戰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資本主義自由派在對一個小國的人民進行壓迫，這些人民正力圖表明自己天生的強烈要求。當然，戰爭注定是要失敗的，但同時也無比殘酷。

就美國而言，最初有著堅定的決心，要確保民主社會在印度支那得到一個發展的機會，而喬姆斯基這樣的知識分子的論點，無疑在決心的改變上起了主要的作用。當美軍撤出後，正如那些支持美國干預的人所預言，社會的工程師們就進來了，其後就真誠地開始了那些難以言述的暴行。美軍撤出的直接後果便是：一九七五年柬埔寨產生了二十世紀最殘暴不仁的罪行之一，一群左派知識分子，在沙特的巴黎接受過教育，如今控制著一支可怕的軍隊，進行一場以史達林的標準來看也是殘酷無情的社會工程的試驗。

喬姆斯基對這種暴行的反應是頗有啟發性的，這是一種複雜的歪曲，其中包含許多以晦澀的筆墨所做的捏造。不可能花費太多的時間去作詳盡的考察，但實質卻非常簡單：照喬姆斯基的定義——這一定義現在已經被認為是形而上的事實——美國是印度支那的惡棍，因此根本不能承認柬埔寨發生過大屠殺，直至找到了一些方法，可以表明美國要直接或間接地為這些大屠殺負責任。

這樣，喬姆斯基及其同伴的反應就經過了四個階段：一、從來沒有過大屠殺，這是西方宣傳機關的捏造；二、也許有過小規模的殺人，但是「柬埔寨的痛苦被玩世不恭的西方人道主義者所利用，他們不顧一切急於克服越南併發症」；三、殺人比最初想像的規模更大，這是美國的戰爭罪行

使農民變得野蠻的結果；四、喬姆斯基最終被迫引用「少數幾個權威的柬埔寨學者之一」的話，這些學者巧妙地改變了材料排列的次序，以證明最惡劣的大屠殺不是發生在一九七五年，而是發生在一九七八年中期，所以發生是由於「傳統主義、種族主義、反對越南人的原因」，這時的統治政權「曾經有過的馬克思主義的色彩喪失殆盡」，成爲「極端沙文主義的貧苦農民的民粹主義的工具」。它「最終」得到中央情報局的批准。中央情報局就從出於宣傳的目的對大屠殺進行誇大，進而實際上犯了屠殺罪。簡而言之，波布的罪行正是美國人的罪行。證明完畢。

到八〇年代中期，喬姆斯基的注意力從越南轉向尼加拉瓜，但他本人已經不準備跟那些具有理性的人們進行嚴肅的爭論了，他在重複著羅素和沙特的悲劇模式。又是一位似乎曾高踞於同伴之上的知識分子，沉重而緩慢地進入了極端主義的荒原，正如老托爾斯泰從雅斯納雅波良納出發時那樣，憤憤不平而又語無倫次。在許多夢想太平盛世的知識分子的生活中，似乎有著一個不祥的更年期、理智的斷經期，這也許可以稱之爲理性的逃亡。

結論：提防知識分子

我們的探討現在要結束了，從世俗的知識分子開始取代舊式的神職人員，成爲人類的引路人和導師，至今正好是兩百年左右。對於那些力圖教導人類的知識分子，我們已經查看了他們當中的許多個案，考察了他們是否具有完成這一任務的道德和判斷力的資格。我們特別考察了他們對待真理

的態度，他們尋找證據和評價證據的方式。他們對待特定的人，而不是對待人類整體的態度；他們對待朋友、同事、僕人，尤其是對待家人的方式。我們也涉及到若按照他們的勸告，會帶來的社會、政治的後果。

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讀者自己會做出判斷。但我覺得，當知識分子站起來向我們說教的時候，我發現，公眾現在已經產生了某種懷疑，那些大學教師、作家和哲學家，他們或許是很優秀的，但在普通群眾中，懷疑的傾向正在日益增長：他們是否有權告訴我們應當如何立身處世？人們越來越相信，作為導師或榜樣，知識分子並不比古代的巫醫或牧師更聰明、更值得尊重。我也具有這種懷疑。在街上隨便找來十幾個人，他們對道德和政治問題所提出的觀點，很可能跟某個層面的知識分子一樣合乎情理。但我還要再進一步強調，在我們這個悲劇的世紀，千百萬無辜的生命犧牲於改善人性的那些計畫——最主要的教訓之一是提防知識分子。不但要把知識分子跟權力槓桿隔離開來，而且當他們試圖集體提供勸告時，他們應當成為特別懷疑的對象。提防知識分子組成的委員會、研討會和聯盟，不要信任他們擁擠的隊伍中發出的公開聲明，不要對他們在政治領袖和重要事件所做的判斷太當真，因為知識分子不僅缺乏個人特色與批判性，而且一致遵循特定的行為模式。綜觀知識分子這個族群，他們在自己所欲攀附之權貴人士的圈子裡通常毫無批判能力，只是一味附和。因此他們非常危險，因為他們製造了輿論潮流和流行的正統思想，其本身常常導致非理性和破壞性的行為。任何時候我們必須牢記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